

中美经贸关系的未来十年： 迈向更深层次的互惠合作

US-CHINA
ECONOMIC RELATIONS IN
THE NEXT TEN YEARS :
TOWARDS DEEPER ENGAGEMENT AND
MUTUAL BENEFIT

前言 FOREWORD

CHINA-UNITED STATES
EXCHANGE FOUNDATION
中美交流基金會



中国和美国国情不同，历史和文化迥异。两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也各不相同，一方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另一方则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国经济规模巨大，都以不同的方式促进了世界经济活动。尽管2008年金融危机已过去四年，金融稳定依旧遥遥无期。如果两国能够携手合作，双方可以更好地促进全球经济复苏并有助于维护金融稳定。此外，中美两国是全球最大的两个贸易国，如果能共同合作，将有助于在全球范围内促进货物和服务贸易进一步自由化。

事实上，无论是能源安全、粮食储备、环境保护、气候变化、核武器扩散、打击恐怖主义、防止疫情，还是阻止毒品走私，以上种种及其它当今世界面临的跨国挑战都需要多边协作。但如果中美两国能就以上任何问题进行合作，成功则大大可期。鉴于此，从全球视角来看，中美关系是目前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从双方视角来看，中美经济关系在过去几十年已有长足发展，从几乎不存在到日渐发展为相互高度依赖和互利的双边关系。然而，未来这一经济关系又将走向何方？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中美交流基金会聘请了一批杰出学者，包括两国学术、商业以及政界领袖，就这一经济关系展开研究。这一研究报告不仅回顾过去，同时审视那些阻碍双方进一步商贸关系的商业困境。最重要的是，该研究报告展望未来，总结提出“两国都希望为本国国民建立一个安全可靠的、高质量的、可持续的发展和就业的模式。本项研究认为，这种双边关系，若能与时俱进，定能为双方实现共同目标做出重大贡献。”确实，在未来十年中，两国的紧密合作可以创造巨大商机并为各自人民带来数以百万计的就业机会。中美关系从全球视角来看是非常重要，从双边视角来看也是如此。

毋庸置疑，过去的42年以来，美国八任总统和中国五代领导人高屋建瓴，致力于创建良好的中美关系。虽然历经起伏，但中美关系始终都在往前迈进。

然而，我们需要认识到，由于了解不够、互信不足及各自在某些全球战略性问题上的不同看法，中美关系进一步发展受到影响。而且，在商业关系中也遇到不少阻碍，例如网络安全问题、知识产权保护以及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等问题。为此，未来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我们需要建立互信，还要处理好各类分歧和阻碍。但无论如何，以上都不应成为两国进一步合作的绊脚石。

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呼吁中美两个大国建立新型的双边关系。双方领导人都刚开始新一任期。让我们抓住这一历史时刻，为这一目标奋斗。中美关系的良好发展有益于两国人民以及世界的长期和平与繁荣。

董建华

中美交流基金会主席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在思考为本报告撰写前言时,我越来越坚信,中国和美国只有建立起健康的国与国之间的整体关系,两国间良好经贸关系的潜力才能真正得以充分发挥。中美两国关系现今的状态如何?未来又将如何发展?作为现代中美关系的最初架构者之一,亨利·基辛格博士2013年4月24日在北京召开的国家开发银行国际顾问委员会会议上所做的演讲,对这些问题作了精辟、深刻、远见卓识的阐述。在征得他以及国家开发银行前董事长陈元先生的同意后,我谨将他的演讲收录于此,供读者参考。

董建华

中美交流基金会主席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2013年5月21日

注:我们注意到基辛格博士的演讲时,本研究报告已付印。现我们以插页形式提供讲稿全文,以飨读者。



亨利·基辛格博士于国家开发银行国际顾问委员会会议上的演讲 2013年4月24日 中国北京

首先，我要对陈元主席几十年来的诚挚友谊，他对国开行的卓越领导和对朋友们热情鼓励表示衷心的感谢。对于我们这些从一开始就关注中国的人来说，这些年来我们目睹的改革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这当然得归功于杰出的技术知识，但同样也要归功于对改革初期多数专家都认为不可能的事敢闯敢干的精神。因此，请让我代表大家，特别是以我本人的名义，对您的贡献表示感谢。同时，也请允许我在此祝愿新任主席万事如意，并坚信他秉承的优良传统将得以发扬光大。

我加入国际顾问委员会并非因为我能对经济问题的讨论提供意见，因此，我今天的演讲主要就国际形势作一扼要分析。我想先说说这次来华的感受。自1971年以来，我到访中国八十多次，与中国领导人之间的会谈多不胜数。但没有一次像这次访问那样，让我离开时充满希望的信念，要知道我通常并不是个乐观的人。让我来说说为何这次我的感受有所不同。

虽然所谓的世界共同体有很大吸引力，但世界上不同地区基于不同的原则组成，各自追求不同的目标，因此世界共同体实在是不存在的。欧洲正处于摒弃民族国家模式的进程中，全球的国际体系建基于这一模式已长达两个世纪，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殖民政策的结果。然而在这一进程中，欧洲深陷于新体制尚未建立基础而旧体制已然失去信心的困境。欧洲的领导人不再具备能力像过去那样要求人民作出牺牲，然而，不愿牺牲就不能振兴。因此，客观结果是双重的：消费主导的经济无法积累足够的资源，而无风险的外交政策无法适应当代危机的要求。

反观亚洲，由于民族国家势力较强，实行的外交政策是欧洲19世纪的方式。亚洲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这些民族国家间建立非对抗的关系。中东面临的则是边界、国内制度以及国际体系的难题，而这些难题正影响着世界其他地区，并将其他地区也卷入其中，但尚无全面的指引方向。

我之所以提及这些，是因为在这个框架之下，还有中美两个大陆国家，这两个大国在历史上从未完全加入国际体系。中国坚信其独特性，出于地理和其他原因，大体上实行的是独立自主政策。美国也坚信其独特性，但认为肩负着传教士的责任，而这样做更多是基于意识形态，而非国家原因。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讲，世界新秩序的关键在于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

靠中美两国不能解决各种问题，但没有中美双方的合作，各种问题也不能得以解决。没有中美两国的合作，世界会分成对立的阵营，而对上述各组成部分而言，利用其他国家的对抗的诱惑极大。可见，合作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机遇。我有幸能从一开始就参与中美两国现代关系的构建，而很少有历史学家能够经历他书写的历史时期。当初，我们有共同的对手，因而双方目标一致。十年间，两国在制定并行不悖的政策方面发挥了极大创造性。这对冷战国际格局起了很大作用。

冷战结束后，出现了两个相互有点矛盾的情况。一方面，在美国，连续八届政府都奉行与中国友好合作的政策。这是非常重要的成就。而中国的五届政府也实行了同样政策。但问题又是两面的：如何界定这种合作？其次，后冷战时期如何进行合作？

因而在那段时期，我们都避免了严重对抗。但现今我们又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在美国，有很大一部分人将中国视为冷战遗留下来的问题。但前苏联几乎完全是一个军事强国，而中国却与世界经济紧密相连。中国的影响并非主要来源于其军事实力，而是来自于其国内的经济表现，这是非常不同的挑战。同样，在中国，很多人认为美国是一个走向衰弱的强国，而中国正在崛起，走下坡路的强国总是要力图打压正在崛起的强国，冲突在所难免。他们以还英国和德国的对抗作为例证。

另一方面，英国和德国的冲突主要源自政策短视而非事件的性质。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牢记一个重要事实：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欧洲历史的转折点，而欧洲从未从一次大战复原。如果任一卷入一次大战的领袖在1914年时能够认识到1918年世界将出现怎样的局面，那么他们可能不会选择开战。

中美之间的纠纷可能会带来更为严重的后果。因此我们的领导人知道，无论学术研究如何写，我们都不应以对抗的方式来处理。这一点，我们今天在场的一些人已说了二十年。因而我们常常受到批评，说我们受中国款待的诱惑太深，又或者我们被短期经验迷惑了。不过当今形势的重要一面是，两国领导人似乎都意识到，找出一种合作模式至关重要。我们成功解决了两国间的日常纠纷，但这还不够。两个大国间的互动过程中一定会产生很多日常纠纷。以我的经验，回首上世纪70年代，中美双边贸易比美国和洪都拉斯之间的贸易还少。而在现今这个互动广泛的新世界，我们面临非同寻常的机遇。这并非是我信口开河，而是在在我看来，两国领导人已达成了这一共识。

现今，如果我们能够将一般谅解转化为具体的政策，中美两国就可以共同开始对国际体系的发展方向 and 路径进行分析：这是求同存异制定平行不悖的政策的一个方法。我们需要借助于此是因为面临的问题一大堆，例如能源问题、环境保护、核不扩散、太空、网络安全等等不一而足，这些问题并不能靠一个国家解决。对于网络或太空安全等问题，现在还没有一个大家认同的定义来明确问题到底是什么。因此我们迫切需要有共同的方法来解决。几年前，这还被认为是一无希望的理想主义，但今天这是向前迈进的现实基础。

鉴于两国历史完全不同，美国人和中国人的基本观点并不总是那么一致，要达成这一目标困难重重。美国从来没有遇到过强势的邻邦，而中国的边境一直以来都不缺强敌。美国人认为每个问题都会有一个解决方案。中国人认为每一个解决方案都会产生新的问题。那么如何融合这些不同意见？这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重大难题。

然而我想重申的是，我来过这个都市，有幸结识这个国家的领导人，我相信中国正在进行的重大改革，以及现实变化对美国产生的影响，已为双方对话打下了良好基础，这是长久以来不曾见到的。尽管前路艰辛，争议不断，我对中美两国关系依然持乐观态度，相信这两个历史上曾是对手的大国能够在国际新秩序下成为合作伙伴。

陈元先生，再次感谢您邀请我与会，并诚挚感谢几十年来的友谊。

过去35年间，中美双边经贸关系从几乎空白发展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经贸关系。目前，中美互为对方第二大贸易伙伴。大规模货物及服务贸易、供应链集成、美国对华大规模直接投资以及中国更大规模投资美国国债，无不说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虽然两国经贸关系时常发生摩擦，但也给双方带来了巨大利益。

本项研究的目的是回顾过去35年来中美经贸关系的演变，从而理解两国对这一关系的相互依赖性。更重要的是，本文展望了两大经济体在未来十年可能的发展路径，以及未来两国如何实现更大的经济利益。两国均希望为本国国民建立起一种安全可靠、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和就业的模式。本项研究认为，这种双边关系，若能与时俱进，定能为双方实现共同目标做出重大贡献。

事实上，两国经济的发展已到了重要的十字路口。对中国而言，沿袭了30多年的经济发展模式必须做出改变，从出口主导转为内需主导，从投资驱动转为创新驱动。如果中国能在未来十年成功实现这一转变，将创造出一个规模空前的高达6亿人口的中产阶级，中国也将因此从“世界工厂”逐步转变为“世界市场”。

未来十年，随着美国进行结构调整以削减财政预算、贸易赤字并降低失业率，美国经济将实现稳健复苏。事实上，由于其在科学、技术及创新上的统治地位，以及更廉价的页岩油气所带来的能源优势，美国经济应该会持续受益。过去数十年美国能源依赖进口，而现在美国、加拿大甚至可能包括墨西哥的石油和天然气产量增长，以及能源使用效率提高，都将成为美国主要的“游戏规则改变者”，有人甚至预测，美国最终将成为能源净出口国。

虽然两国经济前景看起来充满希望，但我们不应低估各自面临的挑战。中国亟需深化经济改革，重新定义政府角色，提高经济的市场反应

能力，解决收入分配不均、环境恶化、基础教育和医疗覆盖不平衡等问题，完善法律法规和打击腐败。对于美国而言，其面临的挑战则是如何达成经济政策上的理性共识，从而确保经济能在某种程度上按预期发展。从世界范围看，两国仍面临欧洲经济不确定性以及可能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此外，面对核扩散、恐怖主义及领土争端等问题，两国必须携手维护世界和平。两国面临诸多来自国内和国际的挑战，这些挑战不易解决，也不容忽视。

在前进道路上，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两国间总体关系的发展，受制于两国在某些全球重要战略问题上互信不足且存在分歧。因此，双方必须逐步建立互信，控制和处理好战略分歧。建立互信并非一蹴而就，但是我们希望这些分歧不会妨碍两国建立更为紧密的经济合作。

此外，两国企业界已经明确两国商业增长中存在的困难和阻碍。对美方来说，这些问题包括中国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角色问题（包括作为贷款提供方的国有银行问题），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和执行以及网络安全问题（尤其在盗窃商业秘密方面）。而对中国来说，这些问题包括美国限制高技术产品向中国出口，美国政府对中国企业赴美投资经常表现独断，并采取贸易保护主义行为。

在一个广泛和不断变化的中美经贸关系中，势必存在争议和问题。坦白承认并承诺解决这些问题是双方关系成熟的表现。本项研究不可能完全和及时解决这些问题，其主要目的在于关注两国如何通过合作增强经贸关系。成功的合作不仅使两国人民获得经济利益，而且有助于两国建立互信。正因如此，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将会对深化两国交流合作产生负面影响。

中美两国经济攸关性很强。毫无疑问，两国经贸关系的扩大将带来巨大收益。未来十年，预计美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将略低于3%的水平，而



同期中国经济年均增速将达到7.5%左右。增进合作将为两国带来巨大的潜在经济机遇，其中有些机遇更有利于中国，而有些则对美国更有利。但无论如何，两国都会实现双赢。

两国可通过合作获得大量经济机遇，以下几点为例：

- 一、科学和技术合作，特别在能源方面，可以提高两国能源利用效率并更加环保。这些努力最终有助于削减温室气体排放，进而降低气候变化风险。2006年，中美两国政府联合启动了该领域的合作，这一任务在未来将更为迫切。
- 二、作为全球两个最大贸易国，中美应带头重启多哈回合贸易谈判，并就双边自由贸易协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启动早期磋商。
- 三、未来十年，美国将开展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项目重建工作。中国投资者可以利用其储蓄盈余，以债券或股权方式，为其提供融资。这不仅对美国有利，同时也有利于中国，因为投资回报相当诱人。

通过与中国扩大合作，美国将受益于如下经济机遇：

- 一、2000至2010年，美国对华出口增长了五倍。未来十年，预计随着中国经济和中产阶级规模继续扩大，美国对华出口很可能延续这一趋势，中国将可能取代加拿大和墨西哥成为美国最大的出口市场。此外，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前景光明。通用汽车已成为中国汽车市场的领头羊，沃尔玛是中国最大的零售商，麦当劳和肯德基在中国家喻户晓。以上企业及其它尚未投资中国市场的美国企业在中国发展的潜力巨大。
- 二、2012年，仅有150万中国人前往美国旅游。如果能进一步简化签证手续，到2020年，预计

这个数字将超过每年500万。

- 三、像过去日本公司一样，中国公司希望通过在美国境内生产最终产品来进入美国市场，这会拉动美国GDP并创造就业。汽车零部件、高端钢铁产品及家电消费行业正在引领这一潮流。

通过与美国扩大合作，中国将受益于如下经济机遇：

- 一、粮食和食品安全问题是中国人民普遍关心的主要问题之一。中国正在推动农业及相关产业现代化。美国拥有最先进的农业技术以及食品安全保障制度。美国耕地广袤，农业产量大、效率高，可帮助中国确保粮食和食品的安全性。
- 二、尽管目前中国能源严重依赖煤炭，但中国页岩油气储量巨大。与美国公司就中国新兴的页岩油气产业进行投资和技术合作，有助于中国降低对煤炭能源的依赖。
- 三、中国服务业相对不够成熟，而美国拥有全球最发达的服务业。中国需要发展服务业，向其国民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美国公司可以通过对华出口和直接投资，帮助中国发展服务业。

如果上述情况能够实现，将为两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经济机遇，这些机遇会转化为就业机会。例如，截至2022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增长预计将创造181万个新就业岗位。

为了更好地抓住经济机遇和创造就业，我们为两国政府提出如下建议：

- 一、借助两国政府机构的专家意见，两国智库应就中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可行性和利益进行研究，并于一年内完成相关研究报告。如果取得积极的研究成果，则应发起相关谈判进

程。中美两国是全球最大的贸易国，因此两国应带头重启多哈回合贸易谈判。

二、对建立中美双边投资协定的讨论已有不少时日。为了推动双边投资流动，我们催促两国政府尽快（最好在一年内）完成正在谈判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

三、两国政府需要鼓励更多企业在能源领域实现科技合作，例如可再生能源、页岩油气、二氧化碳捕捉、使用及隔离、电动汽车等。此外，由于以上合作与气候变化息息相关，两国应在2013年12月的德班会议上达成共识，联合其他国家共同确保在2015年成功实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相关成果。

四、两国应该简化签证申请程序，并逐步将签证有效期延长至5年、10年并最终实现免签。在两年内实现两国签证5年有效应该是一个合理的开端。

五、在美国国务卿克里访华期间，两国同意在“战略与经济对话”层面建立一个讨论网络安全问题的特别小组。这个小组应致力于制定一个路线图，内容包括：第一，两国在网络安全领域如何加强合作和提高执行力；第二，两国如何合作制定一项针对网络空间的国际准则。这些任务迫在眉睫，我们建议两国战略与经济对话小组应该在18个月内完成此项谈判，并在此期间及时发布中期报告。

六、不管是出于全球还是国内利益考虑，中国都积极推动知识产权保护法。事实上，由于激励创新、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的需要，中国自身也希望保护知识产权。为了达到此项目标，还需要进行很多工作。我们对中国政府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国务院负责知识产权保护的跨部门机构—国家保护知识产权工作组，应进一步增强知识产权执法力度，以确保顺利执行和制止侵犯知识产权行为；

第二，中国应考虑建立一个全国性特别法庭

处理知识产权纠纷，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中国知识产权纠纷的解决和处置；

第三，我们看到，最近“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达成协议，中央和地方政府机构将在2013年底前全部使用正版软件。我们敦促所有国有企业和银行系统能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此项工作。

七、放松高科技出口管制是中国的一贯主张。我们建议美国政府应加快处理该问题，并希望出现一个双赢结果。

八、美国部分针对中国企业贸易和投资的政府决策，包括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法案，建立在政治而不是政策考量之上。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运作应该更加透明，更容易被中方理解。我们建议美国政府发布更加清晰的投资审查流程。

以上涉及到中美两国的重大利益，这是全球最重要的经济伙伴关系，对世界而言也极为重要。虽然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无法确保全球经济繁荣昌盛，但不稳定且毫无成效的中美关系却一定会危及全球繁荣。

若两大经济体能够持续成功合作，到2022年，中美双边关系的相互依赖度将远超之前。与此同时，通过更好地保护环境、降低气候变化风险、加强多边贸易体系，两国可为全球公共利益做出巨大贡献。最重要的是，这种相互依赖性为两国间整体关系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

目前，两国领导人开始了新一届任期。为了实现经济和就业的可持续增长，两国正在为经济发展确立一个新的方向。携起手来，两国一定能共创未来！时不我待，让我们抓住机遇！



第一部分

一、把握有利时机

一代人的机遇

过去的几十年，中美经贸关系从无到有，已经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双边经贸关系。如今，美国和中国是全球第一大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全球第一大和第二大贸易国，还是彼此第二大贸易伙伴。目前，庞大的货物贸易量、供应链集成、不断扩大的服务贸易规模、美国对华大规模直接投资以及中国更大规模地购买美国国债，无不说明了两国关系的重要性。虽然两国经贸关系时常发生摩擦，但也带来了巨大的双边利益。

基础经济学认为，两国双边贸易规模与两国经济规模成正比，因此展望未来，中美两国庞大的贸易规模，以及伴随未来经济增长不断扩大的趋势并不令人惊讶。如果中美两国希望继续享受并扩大双边经贸利益，就必须共同探寻新的合作机遇。

本项研究的目的，一是将中美关系放在当前不断发展演进的经济环境中进行考察；二是发掘具有合作潜力的领域，针对如何抓住机遇和解决分歧提出可行方案。通过提高对整体经济框架的了解，本项研究希望能够为推动全球最重要的双边经贸关系的建设性发展做出贡献。两国均希望为本国国民建立起一种安全可靠、高质量、可持续的增长和就业的模式。本项研究认为，这种双边关系，若能与时俱进，定能为双方实现共同目标做出重大贡献。

在前进道路上，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两国间总体关系的发展，受制于两国在某些全球重要战略问题上互信不足且存在分歧。因此，双方必

须逐步建立互信，控制和处理好战略分歧。建立互信并非一蹴而就，但是我们希望这些分歧不会妨碍两国建立更为紧密的经济合作。

此外，两国企业界已经明确两国商业增长中存在的困难和阻碍。对美方来说，这些问题包括中国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角色问题（包括作为贷款提供方的国有银行问题），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和执行以及网络安全问题（尤其在盗窃商业秘密方面）。而中国则认为美国限制高技术产品向中国出口，美国政府对华贸易和中国企业赴美投资方面也经常表现独断，并采取贸易保护主义行为。

这些问题真实存在，并与两国扩大经济互动密切相关。在一个广泛和不断变化的中美经贸关系中，势必存在争议和问题。坦白承认并承诺解决这些问题是双方关系成熟的表现。如果要解决这些问题，两国政府必须坦诚地面对它们。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时间，但必须以积极态度推动解决¹。

在讨论未来之前，让我们从了解历史开始。四十一年前，美国的尼克松总统和中国的毛泽东主席把握时机，促成了中美两国合作，共同抵御前苏联霸权。两国领导人明白中美关系对两国的战略重要性。他们的合作改变了世界！

1978年12月15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三天之后，中国宣布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经济向世界开放。从那时起，中美关系历经8任美国总统和4代中国领导人。四十年来，两国致力于建立一个强大和持久的中美关系。虽然时有起伏，

¹ 第二部分第6篇分报告集中讨论了这些问题。



但双边关系总体保持了稳定发展。随着1991年前苏联解体，中美经贸关系逐渐发展成为中美关系的基石，两国从双边经贸关系中获益良多。

然而，中国的经济已经走到了紧要关头：中国必须改变三十多年来一贯遵循的发展模式——从出口导向型转变为内需（包括消费）拉动型，从输入驱动型转向创新驱动型。此外，几十年来的收入与财富的持续增长，开始使中国成为世界市场中越来越重要且快速增长的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世界工厂”和跨境投资的重要源头和目的地。为此，中国将不得不在世界经济中扮演一个与过去截然不同的角色。如何适应这些新的现实问题对中国而言是一个巨大挑战。的确，今后的十年将是中国发生变革的十年。近年来，美国经济正在从最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也不得不开始对经济结构做出重大调整，在减少预算和贸易赤字的同时，努力降低高失业率。但是，它仍然是世界上最具创新能力和技术最先进的国家，还享有获取更廉价的页岩油气所带来的能源优势。的确，未来十年对美国而言也将是变革的十年。

未来几十年，中美两国将依然是全球前两大经济体。奥巴马刚赢得了总统连任，习近平则于2012年11月当选新一任中共总书记，于2013年3月当选中国国家主席，将在未来十年中领导中国。中国和美国必须现实地面对两国所面临的挑战，包括两国之间和本国国内由于经济发展和贸易投资增长而引起的错位问题。中美两国更加紧密的经济合作，可以帮助两国推动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两国需要抓住机遇，为今后十年开展更紧密的经济合作奠定基础。

两国还面临许多共同的挑战，如核扩散、恐怖主义、可持续发展以及气候变化问题。两国的协同合作将会帮助两国成功应对这些问题。这不仅是为了两国的自身利益，也是为了世界的长期和平与繁荣。鉴于今天两国经济存在高度的相互依赖性，如果两国间互相对立，将会给他们

自身乃至其他国家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承认差异的研究

本研究汇聚了中美两国顶尖的经济学家和企业领袖，在总结过去的同时，更加注重展望未来。研究概述了两国通过经济交流和互动实现的收益与付出的成本，还指出了两国经济基本面的互补性，这是两国实现长期持续经济互惠合作的基础。此外，我们认识到，两国探寻互惠合作领域的做法，必须考虑到两国在实现复苏和长期包容性增长的过程中各自面对的难题和挑战。

最后，本研究详细阐述了中美两国在提供全球性公共产品方面的合作机遇。例如，作为两个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在减缓气候变化所产生的风险方面，以及作为两个最大的贸易国，在进一步加强多边贸易体系建设（通过多哈回合谈判）方面，显然需要加强合作，并在全球寻求解决方案过程中发挥领袖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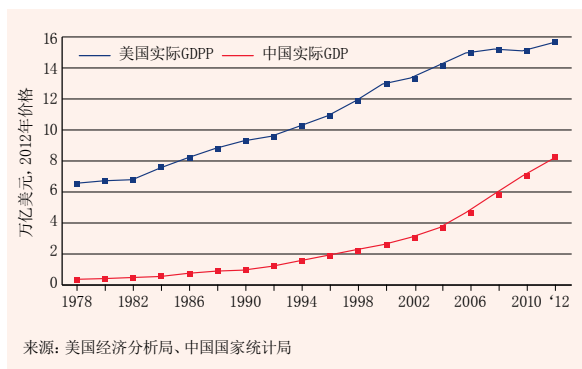
二、回顾过去

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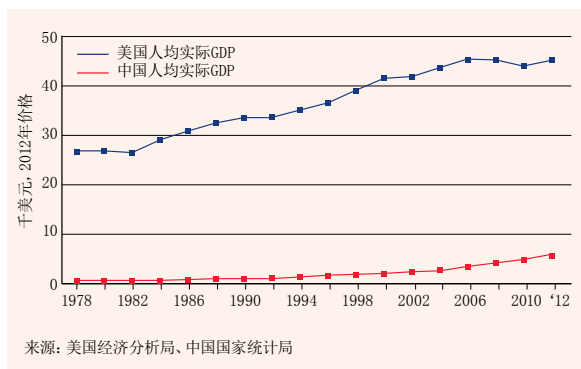
1978年标志着中国推行经济改革开放政策的开始，同时也标志着十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导致的混乱和经济停滞时代的结束，从此，中国逐步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在1978—2012年间，中国实际GDP从3,410亿美元增至8.262万亿美元（按2012年价格计算），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见图1）。

中美经贸关系的未来十年：迈向更深层次的互惠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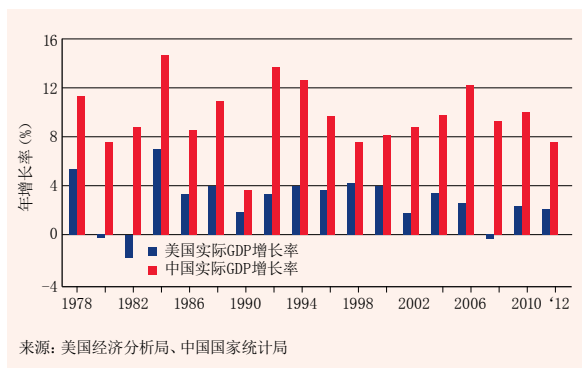
图表1: 1978-2012年中美两国实际GDP



图表3: 1978-2012年中美两国人均实际GDP



图表2: 1978-2012年中美两国实际GDP年增长率 (%)



中国已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1978年以来,计划经济已基本让位于市场经济,现代化基础设施得以建立,对所有适龄儿童实施免费的9年制义务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体系得到普及。总之,数亿人民摆脱了赤贫,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在这35年里,中国由封闭走向开放,受教育程度更高、更具国际视野和环保意识的新一代中国人已经成长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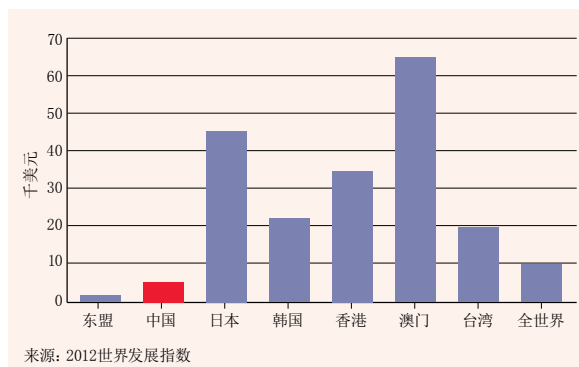
1978年,美国经济仍处于1973年石油危机后的复苏期,在那次危机中,石油价格上涨到原来的四倍,而仅仅一年后又发生了第二次石油危机。这两次石油危机导致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的高通胀和高利率。直到八十年代中期,随着石油的实际价格下跌,通胀才恢复到正常水平。在九十年代初互联网繁荣的帮助下,美国实现了有史以来最长的经济增长,尽管其间

出现了短暂中断,但这一增长势头基本上持续到2007年次贷问题导致了全球金融危机,才使增长戛然而止。从那之后,美国一直处于渐进的、从历史标准来看较为缓慢的复苏进程中。然而,从1978年到2012年,美国实际GDP按2012年价格计算,从6.54万亿美元增长到15.68万亿美元,年均增速达2.6%(见图表2),在发达国家七国集团中是最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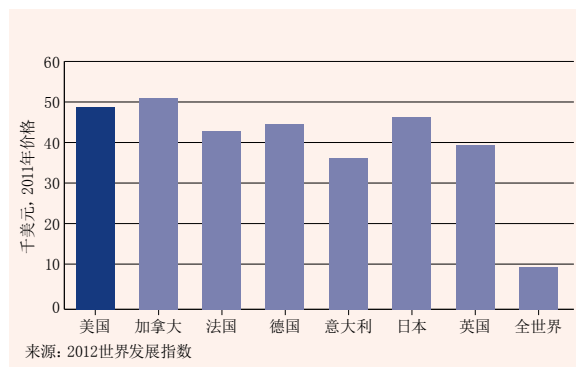
个人收入情况则是另一番情景。中国经济规模庞大原因是其人口数量庞大(超过美国人口的四倍)。尽管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排名世界第二,但从实际人均GDP来看,中国的排名依然在八十名以外,这说明中国依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发展中经济体。1978-2012年间,中国实际人均GDP从354美元增至6,102美元(2012年价格),年均增速达到8.7%。相比之下,美国实际人均GDP从29,390美元增至49,880美元(2012年价格),超过中国2012年人均GDP的8倍,年均增长率为1.6%,两国差距依然很大(图表3)。还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大陆实际人均GDP仍然远远落后于东亚其他经济体,例如香港、韩国、新加坡和台湾(图表4),而美国人均GDP也远高于发达国家七国集团中除加拿大以外的其他国家(图表5)。

在1978-2011年间,中国人均个人实际消费额由168美元增至1,911美元(2011年价格),但个人

图表4: 2011年部分东亚经济体人均GDP



图表5: 2011年七国集团经济体人均实际GDP



消费占GDP比重却由48.4%下降到34.4%²。相比之下, 美国人均个人消费由17,769美元增至38,269美元(超过中国目前水平20倍)。2011年美国个人消费额占到GDP总量的70.9%。由此可见, 中美两国实际人均个人消费的差距甚至超过了两国人均实际收入的差距。鉴于中国消费量对GDP的比例较低, 中国个人消费未来有很大的增长空间。事实上, 中国能否实现持续增长, 取决于其作为国民收入重要组成部分的消费量的增长。

在1978年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之前, 中国货物和服务贸易总额只有203亿美元, 而美国当时已经是(目前依然是)全球最大的贸易国, 贸易总额达到3,992亿美元。最初, 中国外贸从很低的基础起点开始迅猛增长, 但主要体现在进口方面。直到九十年代, 在1994年1月1日人民币贬值及美国授予中国(非永久性)最惠国待遇的作用下, 推动了出口增长, 中国外贸才开始稳步增长。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外贸增幅扩大, 尤其是2005年多纤协定下纺织品贸易配额体系终结, 外贸增速进一步提高。到2012年, 中国的商品与服务外贸总额达到4.3万亿美元, 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贸易国, 仅次于美国的4.9万亿美元, 同时中国也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

图表6: 2011-2012年中美两国国际贸易比较

	中国(10亿美元)		美国(10亿美元)	
	2011	2012	2011	2012
货物出口	1,904	2,049	1,497	1,564
货物进口	1,660	1,818	2,236	2,299
货物贸易总额	3,564	3,867	3,733	3,863
服务出口	183	197	606	632
服务进口	238	261	427	437
服务贸易总额	421	457	1,033	1,069
货物与服务出口	2,087	2,246	2,103	2,196
货物与服务进口	1,898	2,078	2,663	2,736
货物与服务贸易总额	3,985	4,324	4,767	4,932
货物与服务贸易盈余	188	167	-560	-540

来源: 美国经济分析局、中国国家统计局

国(见图表6)³。然而, 中国多数出口的国内附加值始终处于较低水平, 2011年平均值大约为23.7%⁴。由于总出口中“加工与组装”产品出口比例有所下降, 预期未来国内附加值将上升。预计中国在内外因素影响下, 出口增速将下降而进口增速将加快⁵。

同期, 美国外贸增速虽然降低, 但更趋稳定, 这是因为美国基准水平较高, 且是WTO(及其前身“关贸总协定”)创始国之一, 其间只受到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和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拖累。但是, 从1997年开始, 美国对全球贸

2 2012年的中国个人消费数据目前尚无资料。1978年和2011年, 中国实际人均GDP分别为346美元和5,555美元(2011年价格)。

3 2012年, 单以货物计算, 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国, 但与美国的差距很小, 而以货物与服务合计贸易额计算, 则不是最大贸易国(见图表6)。

4 中国对美国的国内出口附加值更低, 2011年为2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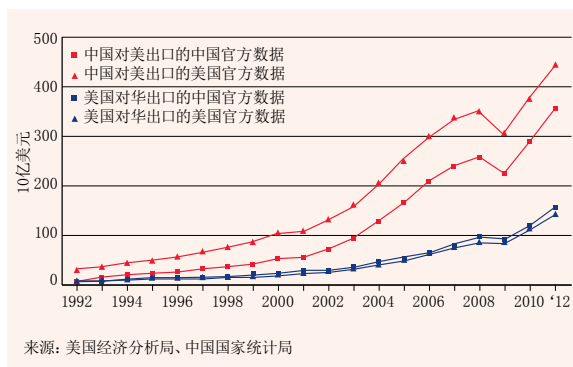
5 参见第二部分第5篇分报告的讨论内容。

易赤字开始增加。然而，直至今日，美国仍然是全球商品和服务贸易第一大贸易国（见图表6）。

图表7比较了中美两国在2011年和2012年的国际贸易水平。美国同时还是世界上最大的服务贸易国。有趣的是，美国对全球的贸易赤字远远超过中国对全球的贸易盈余。例如，2012年，美国的赤字为5,400亿美元，而中国的盈余为1,670亿美元。此外，中国对美国的贸易盈余（2012年中国或美国数据分别为2,010亿美元或者是2,990亿美元）比其对全球的贸易盈余还大，这表明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一直处于赤字状态（见图表6）。

自1978年起，美中之间的贸易额出现了飞跃式增长。据中国官方数据，中国对美国的货物与服务出口额从1992年的96.5亿美元增至2012年的3,640亿美元⁶。据美国官方数据，相应数字分别为270亿美元和4,460亿美元⁷。同样，据中国官方数据，美国对中国的货物及服务出口额从1992年的105亿美元增至2012年的1,630亿美元，而据美国官方数据，相应数字分别是90亿美元和1,470亿美元。据中国官方数据，2012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盈余为2,010亿美元，而据美国官方数据为2,990亿美元。图表7展示了基于中国和美国官方数据的中美双边贸易年度水平。两套数据均显示，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双边贸易飞速增长，并且中国拥有大量双边贸易盈余。有趣的是，从上一个十年中期开始，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额比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增长更迅速。这一趋势预计还会持续，因为中国的内需（包括消费）将成为中国下一步经济增长和美国经济的相对缓慢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图表7：1992-2012年中美双边货物与服务贸易水平



全球因素

回首以往，1978年以来中美两国经济成就令人瞩目。过去35年间，中美取得的经济繁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球有利因素。

首先，在这段时间里，除了局部冲突，世界基本处于和平环境中，有利于经济平稳发展。冷战结束为全球创造了和平的局面。

第二，美国领导进行了信息和通讯技术革命，推动全球各地实时获取信息，即时通讯也不再受到地域和时间的限制，信息传输变得比以往更经济实惠，大幅降低了跨境和远距离商业交易成本。这不仅促进了货物贸易，还使原本不可贸易的服务成为可贸易商品。即使非常复杂的生产程序，也可以基于利润进行切割，或者称之为“原子化”——分散细化成子程序，在成本最低的不同地区完成，从而实现利润最大化。另外，全球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统一的市场，这也提高了创新和扶植品牌的潜在收益。不管是拥有发达信息和通讯技术以及先进产品和工艺发明技术的美国，还是在全球劳动分工的最终装配阶段拥有较低工资从而形成比较优势的中国，都是巨大获益者。

然而，生产分散化和跨国供应链发展产生的全球劳动力分工和再分工，导致相关工作岗位向较低成本地区转移。那些低技能的工作岗位向海外转移，不仅对美国来说是个挑战，最近也开始影响中国。很多这种工作岗位已经从中国流向

6 2012年的服务贸易额是估算数字。官方数字尚未发布。

7 美国和中国官方数字之间的统计差异由许多原因造成。这与两国对出口额和进口额价值的计价方式不同有关（船边交货或者离岸价对到岸价），而且与对自香港转口到中国的中国产品的处理方式和计价方法等差异有关。例如，参考K. C. Fung、L. J. Lau 和Yanyan Xiong的讨论“美中双边贸易平衡调整估算值更新”，《太平洋经济评论》，第11卷，第3号，2006年10月，第299-314页。



孟加拉国、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越南，甚至是缅甸。全球劳动力分工和再分工还意味着全球经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一体化和相互依赖。

信息和通信技术革命的另一个结果，就是扩大了企业高级管理层的控制面，使组织更加扁平化，并消除了很多中层工作岗位。低技能岗位的流失和中层管理岗位的消失，导致中低层工作者工资增长缓慢。因此，个别国家中，全体工作者尚未平等地享有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收益。这已成为很多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解决这些不平衡问题仍然是各国的首要任务。

第三，全球经济中的新兴力量，包括中国、俄罗斯、前东欧社会主义经济体等，无论其是否是WTO成员，都在全球贸易增长的供给端和需求端创造了大量新机会。与欧元区和东盟地区深化经济合作也会为跨境贸易和直接投资，以及全球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但是，这些新兴力量也意味着全球劳动力规模扩大，给全球发达经济体工资水平带来下行压力。

第四，石油以及其他能源类产品的实际价格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本世纪中期基本保持了相对较低水平，为全球增长营造了有利的经济环境。

第五，过去几十年，全球GDP区域分布有了显著变化。东亚经济体（包括东盟10国和中、日、韩三国）在全球GDP中的比重由1970年的10%升至2012年的约25%。如果包括南亚在内，比重将达到30%。中国在全球GDP中的份额，也从1970年不到2%升至2012年超过10%。相比之下，美国所占份额从1970年的35%降至如今的略高于20%，欧洲所占份额也由1970年的25%降至如今的20%⁸。东亚经济体占据了全球贸易四分之一的份额，而1970年大约只占10%。此外，如今东亚经济体中大约一半

的国际贸易发生在东亚国家内部。这使得中国和其他东亚经济体在美国和欧洲陷入衰退的环境下，虽然增速放缓，仍然能够继续增长。事实上，从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至今，中国经济仍保持了年均9%以上的增长速度。

最后，过去35年里，中国领导人抓住了改革开放的机遇，创造了巨大的经济价值，赢得了广泛声誉。其间，他们展现出处理重大问题和挑战的能力，特别是带领中国成功渡过了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近期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

中国和美国如何获益

过去35年间，中美经贸关系为中国带来了巨大利益。中国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后，美国向中国开放出口市场，随后世界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纷纷向中国开放。这帮助中国早期的改革开放政策取得了成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美国授予中国（非永久性）最惠国待遇，以及2000年中国成功完成WTO谈判，都极大推动了中国外贸的发展。

规模庞大的美国消费市场为中国出口敞开了大门，包括服装、家用电器、鞋类、玩具以及所有其它种类的轻工业制造产品。据估计，2010年中国向美国出口的每笔价值10亿美元的货物和服务，为中国带来价值5.98亿美元的GDP附加值，以及每年34,000个就业机会⁹。2010年，中国对美出口额达到了2,933亿美元，产生了大约价值1,754亿美元的附加值，占中国经济总量的2.9%，以及每年997万个就业机会，占中国非农就业人口的2.9%¹⁰。中国轻工业出口主要是取代了其它东亚经济体，例如香港、台湾、韩国、马来西亚和泰国¹¹。美国已经数十年没有在本国大量生产类似产

8 如今的欧洲数据比1970年包含了更多国家，主要是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东欧国家。因此其占全球GDP的比重实际上比本文中提供的数字所显示的值下降很多。

9 这些不仅包括出口直接产生的附加值和就业机会，还包括通过在出口产品生产使用的国内输入的生产间接产生的附加值和就业机会。

10 中国GDP为6.06万亿美元（2010年价格），而2010年中国非农就业人口总计为3.4687亿人。

11 见第二部分第一篇分报告——霍建国的《1978年到目前美中经济关系的发展》，其中列举了多种产品，美国从中国进口比重的增加与从其他东亚经济体进口比重的减少相匹配。

品了。所以，美国向中国流失的就业岗位并不像美国政客宣称的那么多。事实上，由于工资水平上涨和环境政策更加严格，中国本身正在失去这些就业岗位，其中大部分在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东南亚经济体转移¹²。

美国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已开始对华直接投资。过去十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额达到年均30亿美元。直接投资不仅给中国带来了资本，还带来了技术、人才、进入海外市场的机会、专有技术、商业运营模式和先进的管理方法。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仅仅处于起步阶段，但增长迅速，从2007年的248亿美元增至2012年的772亿美元。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时处于很低的水平，平均大约为每年14亿美元。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统计口径有很大差异，2011年，中国商务部的统计数字为18亿美元，而美国商务部的统计数字为43亿美元¹³。不过，目前两国在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统计数字上基本相同，大约为50亿美元。

据美方和中方统计数字，截至2011年美国累计对华直接投资存量分别为540亿美元和700亿美元，远超过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存量（美国和中国的数据分别为95亿美元和90亿美元）^{14, 15}。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给中国公民创造了广泛的就业机会。据美国经济分析局（BEA）数据，2010年有1,189家美国企业在华投资，实现销售额和净收入分别达到3,040亿美元和390亿美元，雇佣人数约为154.1万。据中国商务部国际经济贸易合作研究院统计，2010年美国在华投资企业共雇佣

184.2万人，缴纳税金149亿美元。尽管这些数据有出入，但从整体上看，美国在华投资企业为中国带来了数百亿美元的利润和每年将近200万工人的事实是毋庸置疑的。

美国也从中美经贸关系中获益颇丰。据测算，2010年美国每向中国出口10亿美元货物和服务，能够创造8.66亿美元GDP附加值和6,300个就业岗位。2010年美国向中国共出口1,134亿美元，按此计算，共创造982亿美元附加值和71万个就业岗位。中国向美国出口物美价廉的商品，帮助美国压低了通货膨胀率。除了对美出口，美国跨国公司也将中国作为供应链终端，生产最终产品并分销世界。这提高了美国及其跨国公司的全球竞争力。美国在华投资企业持续实现了大幅盈利。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中国从美国的进口量迅速增加。2000年到2011年间，美国向中国的出口额增长五倍以上。自2006年起，中国已经取代日本，位居加拿大和墨西哥之后，成为美国产品第三大进口国（仅次于加拿大和墨西哥，两国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国伙伴国的其余两位成员）。此外，中国人民银行（也就是中国央行）目前持有1.2万亿美元美国国债，是全球最大的美国国债持有国。中国持续购买美国国债，有助于美国 and 全球压低利率水平，维持金融系统稳定。

因此，良好的中美经贸关系对两国是双赢选择。

三、展望未来

未来前景

全球经济环境仍然不确定：美国经济复苏迟缓，欧元区似乎在从一场危机走向另一场危机。甚至连其他金砖四国经济体（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也面临严峻的经济形势。

中国已为其自身确立了2010至2020年期间实现人均GDP翻番和人均收入水平翻番的目标，届时将整体达到“小康”水平。由于其拥有经济基本面

12 尽管中国早就颁布了各项法律，要求中国的工厂安装各种防污染设备，但某些工厂一直未曾启用防污染设备。最近，由于政府和中国公众的环保意识有所增强，国家进一步加强了使用这些设备的强制执行力度。

13 中国商务部的数字来自2011和2012年期间最终受益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的变化量。否则，商务部2011年做出的直接估算是5.8亿美元。一家私营公司荣鼎集团已做出估算，2011年，中国对美国的外商直接投资达到46亿美元。

14 中国商务部的数字来自2011和2012年期间最终受益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的变化量。否则，商务部2011年做出的直接估算是5.8亿美元。一家私营公司荣鼎集团已做出估算，2011年，中国对美国的外商直接投资达到46亿美元。

15 据国际货币基金（IMF）的数据，2011年美国在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存量是578亿美元，而中国在美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的相应存量为38亿美元。



的有利因素（即有形资本的快速增长及充足的富余劳动力），以及宏观经济管理方面的丰富经验，中国应该能够实现其目标。这要求年均增长率达到7.5%。只要中国能够保持总需求的增长，这是能够实现的，而总需求的增长来源于基础设施投资、城市化以及个人及政府消费的增长^{16, 17}。个人消费有可能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要推动力之一，而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将是推动消费的主力军。据麦肯锡的预测，这一人数将从2012年的2.3亿人增至2022年的6.3亿人¹⁸。

然而，不管是内部还是外部，中国仍将面临巨大挑战。从内部看，随着城市化加速和轻工业产品出口萎缩，能否实现和维持充分就业将继续考验中国政府。此外，中国为过去35年的高速经济发展付出了代价，例如，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地区间和地区内）、基础教育和医疗资源分配不均衡、基础设施不足、环境恶化现象严重（包括空气和水的质量问题）、工业和食品安全恶化，以及腐败现象泛滥。这些问题都需要得到强有力地解决。同时，中国还需要深化改革，并继续进一步扩大经济开放，中国新一届领导班子将以此作为首要工作来抓。

从外部看，除全球经济环境仍然充满不确定性之外，中国在东海和南海与其邻国之间一直存在领土争端问题。毫无疑问，中国和全球其他经济体需要一个和平发展的环境。因此，对于各国政府而言，当务之急是要防止这些领土争端问题。相关国家应着眼未来，排除外部干扰和影响，相信可以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解决好有争议的问题，集中精力实现共同繁荣。美国和中国在维护该地区和平和繁荣方面都肩负着重要使命，

但最关键的是依靠这个地区的人民形成共识，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过去三年半的时间里，美国经济复苏缓慢，但出现了一些鼓舞人心的迹象。总体上看，美国经济表现比几乎所有其他主要发达国家好很多。此外，美国仍然具备非常充足的经济生产能力，美国仍然是世界上科技创新的主要来源地，例如谷歌、苹果手机和平板电脑、脸谱（Facebook）和推特（Twitter）都是美国的发明。而美国页岩油气丰富储量的发现以及水力压裂技术的成熟使得美国更容易获得廉价能源，从而使其产业更具有潜在竞争性，尤其是在与加拿大和墨西哥联合的情况下，保证了其能源安全。预计未来十年美国很可能会成为世界能源净出口国，这将成为“游戏改变者”，因为美国贸易逆差将大大减少，而美国能源价格将保持较低水平，成为制造业复苏的基础。在这些有利因素的基础上，美国经济预计在未来十年将以3%的年均速度增长¹⁹。

同时，降低持续的高失业率是美国的首要问题。美国还需要将整体周期性预算赤字降低到可控水平，建造和重建基础设施。美国应继续在教育和科技方面加大投入，以保持美国在创新方面的领先优势。在国际上，美国应该在保持全球和平稳定方面发挥领导作用。

从长期看，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的领先优势在于，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能够吸引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赴美生活和工作。美国拥有全世界最好的大学，在研发方面投入了大量资源。这是未来几十年其他国家无可比拟的比较优势。

图表8和图表9列出了未来十年美国和中国GDP水平和实际增长率的预测。到2022年，预计美国仍将是全球最大经济体。按2012年价格计算，美国GDP将达到21.1万亿美元，相比之下，中

16 2010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5,234美元（2012年价格）。十年之后的2020年这个数字将变为10,468美元（2012年价格）。这意味着人均GDP实际增速以及GDP增速每年将分别达到7.2%和7.7%。鉴于2011年和2012年的GDP实际增速分别为9.2%和7.8%，在今后十年的剩余时间内如果年均增速达到7.5%，将足以实现该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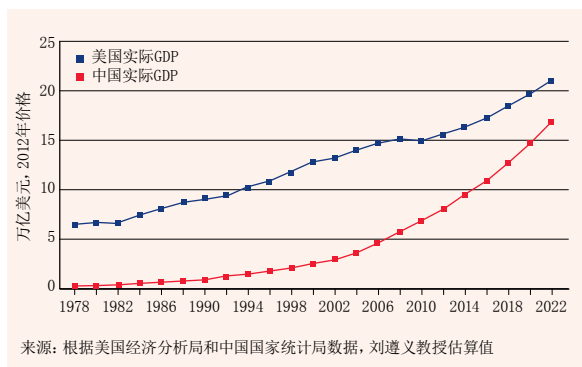
17 中国经济如今已不再像过去一样受到供给的限制，而是受到需求的制约。几乎主要的制造业部门都面临产能过剩问题。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核心通胀率，也就是去除农产品和能源价格后的通胀率一直保持较低水平。

18 见第二部分第四篇分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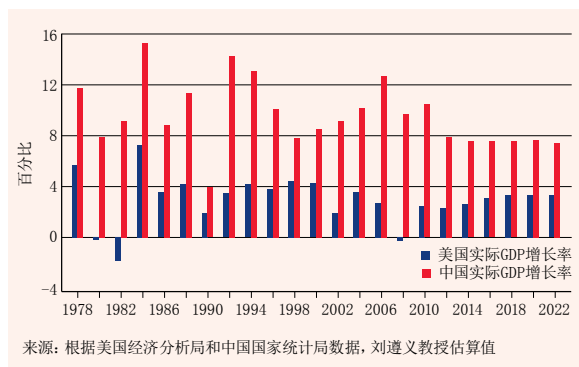
19 1983年至2007年这段时间被称做“大缓和时期”。美国的GDP1983年为7.07万亿美元，2007年为15.24万亿美元，根据2012年的价格，实际年均增速为3.25%。但是一些美国的经济学家认为将该增速作为一个长期的平均增速过于乐观，因为美国人口的不断变化和劳动力增长减缓，特别是当前经济复苏步伐异常缓慢，都会造成负面影响。

中美经贸关系的未来十年：迈向更深层次的互惠合作

图表8：1978-2022年中美两国实际GDP的实际和预测水平



图表9：1978-2022年中美两国实际GDP的实际和预测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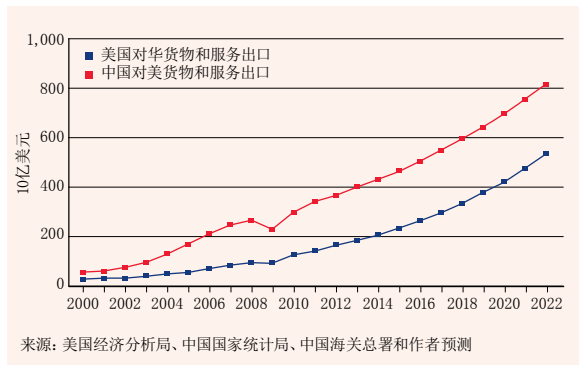


国虽然经济增速更高，但届时只有17万亿美元。美国实际人均GDP预计将达到62,600美元，而中国只有12,000美元，仍然比中国高出5倍。

到2022年，中美两国很可能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还将成为全球最大进口国，美国对华出口预计将超过5,300亿美元，是目前规模的3倍以上²⁰。中国将取代加拿大和墨西哥，成为美国商品最大的进口国。美国每向中国出口10亿美元，将为美国带来8.66亿美元的GDP并每年创造6,300个就业岗位，按此计算，到2022年，美国对华出口预计产生价值为4,600亿美元的GDP以及超过334万个工作岗位，比2010年新增263万。考虑到中国对高技术产品和能源的旺盛需求，如果美国放宽高技术产品和石油天然气对华出口限制，美国对华出口额可能会更高。

到2022年，预计中国对美出口将达到8,050亿美元。据测算，中国每向美国出口10亿美元的商品或服务，将产生附加值5.98亿美元，并每年增加12,700个工作岗位，因此，2022年，预计中国对美出口将为中国带来4,800亿美元的GDP和1,022万人就业²¹。这些数据都非常瞩目。中国对美商品和服务的年贸易顺差有可能仍高达2,750亿美元（

图表10：2000-2022年中美双边货物和服务出口的实际和预测值



见图表10)，但其占GDP的比例只有1.5%。

美国对华服务贸易出口也蕴藏了巨大机遇。目前，中国服务业产值占本国经济的比重不足45%，而美国则占到了80%²²。美国服务业成熟，具竞争力，服务水平高。中国服务业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美国服务业在中国市场前景广阔。2000—2010年十年间，尽管很少被关注，但美国服务业对华出口增长了五倍，其中包括法律、咨询、金融、会计等服务。这个趋势很可能将继续下去。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更多好莱坞电影在中国上映，NBA在中国受众极广，迪斯尼将在上海开设主题公园。这些只是个别例子，美国服务业具有很好的发展潜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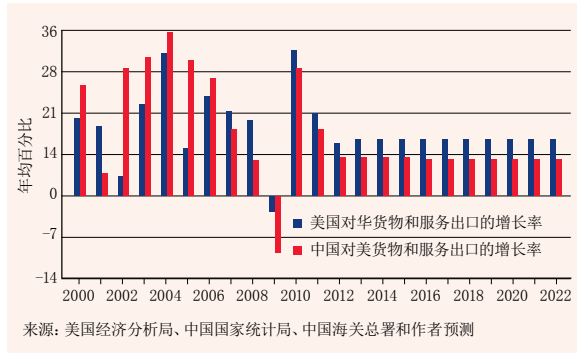
20 5,300亿美元是2022年美国对华商品与服务出口量的四个估算值的平均值，这些估算值分别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Gary Hufbauer 博士和中美交流基金会的研究团队给出。见附件表1。

21 如果中国出口产品附加值上升，可能给中国带来更多GDP，但同时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下降也可能降低就业率。

22 服务业包括政府服务。



图表11：2000-2022年中美双边出口的实际和预测增长率



但是，这种贸易增长和给两国带来净收益的潜力并非唾手可得。双边或多边的紧张局势，或货币争端，以及宏观经济问题都可能使事态的发展背离我们的意愿。如果这些情景真的发生，中美两国将付出高昂的代价。

中国中产阶层的崛起

中国自1978年成功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中国人民创造了大量财富。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分享到经济繁荣所带来的成果。同时，政府开始建设社会保障体系。中产阶级开始形成规模。其结果是，家庭消费开始增加，从最初的购买电视、家具和其他家居用品，到购买房屋、汽车、电脑、移动电话等。此外，像其他国家一样，中国居民开始享受美食、娱乐活动和国内外旅行。大量留学生赴海外追求更好的教育。在不断壮大的中产阶层的拉动下，中国国内的实际零售额增速在过去十年达到了年均13.8%，或者说，比中国实际GDP增速快大约50%。但是，值得特别关注的是，不管是与历史的纵向比较还是与历史的横向比较，目前消费占中国GDP的比重很低。

预计未来十年中国中产阶级规模还将大幅增长，中国中产阶级需求快速增加，不仅为中国，也为美国乃至世界提供经济增长动力。这种需求不仅来自于中产阶级规模的扩大，还来自于中国消费占GDP比重从很低的水平不断上升。

差异性和互补性

尽管从GDP和对外贸易总量来看，中美两国均为全球前两大经济体，但两国间还是有很大不同。美国在技术方面是全球最发达国家，而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人均GDP高出中国8倍。两国处于完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

但是，正是由于存在巨大的差异，中美两国经济具有互补性。差异越大，两国比较优势重合的部分越少，经济交流合作实现的收益也越大。例如，具有相似自然资源禀赋的两个经济体，如果也具有相似的低工资率和高资本成本，则不会从彼此之间的贸易或投资中获得很多收益，因为他们产生的成本结构很可能是基本相同的²³。

从基本生产要素——有形（实物）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的可利用情况看，中美两国情况差别明显。美国有形资本（建筑物和设备）存量的绝对值几乎超过中国三分之一（2012年美国为23万亿美元，中国为18万亿美元），折合成劳动力人均值后，是中国的6.2倍²⁴。简单来讲，就是每个美国工人可以使用的建筑物和设备数量比中国工人高出6倍，这也是美国工人比中国工人生产率更高的原因之一。

从劳动力情况看，中国仍然拥有富余劳动力，2012年，其工龄人口几乎是美国的5倍。中美两国工资差异体现了中国的富余劳动力（以及劳动力中蕴含的人力资本的质量）。美国联邦政府法定最低工资标准是每小时7.25美元，而中国最低工资标准各省不同，北京的最低工资标准最高，为每小时2.43美元，全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最低工资标准的加权平均值仅为1.85美元。这表明尽管中国近些年非技术类初级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但仍然不到美国的三分之一。

²³ 然而，如果他们专门从事不同的利基市场，即，如果他们有可能在随时创建的不同产业内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则发达经济体仍有可能从彼此之间的交易中获益。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的观点（2008）。

²⁴ 见第二部分第十一篇分报告。这些数据会随汇率变化而变化，但从整体上看，美国在有形资本劳动比上远超中国是不争的事实。

图表12: 2010-2012年中美生产要素比例比较

	中国			美国		
	2010	2011	2012	2010	2011	2012
工龄人口人均有形资本(千美元, 2011年价格)	14.27	16.09	18.02	113.41	112.32	111.43
工龄人口人均耕地面积(公顷)	0.12	0.12	0.12	0.79	0.78	0.78
工龄人口人均研发资本(美元, 2005年价格)	382	449		15,731	16,058	
每一千工龄人口年均授予美国专利	0.003	0.003	0.004	0.522	0.523	0.580

来源: 中国人口普查数据、《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国际金融统计数据库、中国统计局、美国专利和商标办公室、世界发展指数

从土地情况看,美国拥有1.63亿公顷可耕种土地,而中国只有1.22亿公顷。美国可耕种土地面积超过中国三分之一,但人口不到中国四分之一²⁵,因此人均可耕种土地面积比中国高出6倍。此外,美国农业具有很高的生产率。

从人力资本情况看,2012年美国高等教育总入学率为95%,而中国只有27%²⁶。相似地,美国工作适龄人口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接近40%,而中国只有不到10%。从研发资本情况看,2012年美国资本存量超出中国的10倍。同年美国授予本国公民专利数量为121,247个,而授予中国公民专利数量仅为3,786个²⁷。

图表12列出了美国与中国生产要素比例的比较情况,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美国在人均有形资本、人均耕地和人均研发资本方面都一直而且将继续领先于中国。这意味着美国在有形资本密集型产业、土地密集型产业(例如农业)、人力和研发资本密集型产业(例如高科技产业)领域具有很大的比较优势,而中国则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具有比较优势。

虽然通过合理投资,有形资本、人力资本和研发资本会逐渐积累,但这需要经历较长时间。2012年中国的研发支出占其GDP比重刚达到1.97%,而美国这个比重在过去几十年间达到2.5%到3%。因此,美国在无形资本方面的比较优势

很可能会持续至少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美国将继续为世界主要创新源头。同时,中美之间在有形资本劳动比方面也存在巨大差距,中国同样需要花费时间追赶。而且,耕地面积也很难增加,所以相比中国,美国在土地密集型经济活动中将一直具有比较优势。

互补性的另一方面体现在两国储蓄率的巨大差异。美国总储蓄率大约为12%(扣除折旧后的私人储蓄率为8%,由于大量政府借款,国家净储蓄率略呈负数),而中国储蓄率则接近50%。中国储蓄和投资都过多,而美国储蓄太少。如果中国国内储蓄超过投资,那么中国将对全球产生外贸顺差,这种局面对于中国既不可持续,也不理想。如果中国将所有储蓄都形成投资,将不会产生贸易盈余,但将很可能导致过度投资,从而造成产能过剩和资本回报率下降。为了降低国内储蓄率,中国应着力提高国内个人消费。尽管中国正在努力,但将个人储蓄率降至30%左右的合理水平,仍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所以,目前来看,国内需求的增加不能仅仅依靠国内个人消费,还应该通过加大教育和医疗服务等公共或政府消费、提供清洁空气和水等公共产品,以及扩大国内投资来实现。

共同的利益和责任

除了经济互补性,一些共同利益也为中美两国经济合作提供了机遇。例如,中国“十二五”(2011-2015年)规划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由出口

25 2012年美国和中国的人口分别为3.1亿人和13.39亿人。

26 入学率包括所有中学后教育,例如大学专科和职业技术学院。

27 第二部分第12篇分报告。



驱动转变为内需驱动，由资源投入型经济转变为创新型经济，从而实现国际贸易平衡。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将扩大国内总需求，包括投资和消费。此外，中国还将促进进口。这与美国总统奥巴马承诺将在2014年实现美国出口翻一番的目标一致，中美两国可以通过合作推动美国对华出口，使之成为两国致力合作的途径之一。

为增加国内个人消费，中国需要提高家庭可支配收入，并提供可信的社会安全网。为了鼓励中国的创新，中国必须加强知识产权执法力度。这不仅仅迫于美国及其它国家的压力，从自身利益而言也应如此。中国发明家与国外发明家一样，都应受到知识产权保护。

两国的共同经济利益，还包括降低全球经济系统失灵所带来的下行风险。尽管这种情况一般不可能发生，但如果真的发生，要限制其损害，这同样需要两国共同合作。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美两国很快达成协议，分别在各自国家采取大规模经济刺激措施。

另一个共同的经济利益是维持国内完全就业。过去几十年间，全球出现了就业岗位由高成本地区向低成本地区稳步转移的趋势，近些年，这种趋势伴随全球化和信息与通信技术革命而有所加速。这是美国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开始面临的挑战，也是中国这十年即将面临的挑战，因为与其他新兴国家相比，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从更长期来看，也存在技术影响。计算机网络代替了普通白领的工作，且自动化和机器人也开始取代制造业领域的工作。就业增长主要体现在高技能专业领域，而低技能领域工作持续流失。目前尚没有可以解决这一问题的好而快捷的办法。教育、培训和再培训将会有所帮助。同时还需要增加不可转移的就业岗位的数量，例如旅游服务业的岗位。通过进一步加深合作，两国可能会发现为双方带来工作岗位的领域和方式。例如扩大服务业可以为中国创造数百万工作机会。美国公司在服务业方面具有丰富经

验，在发展其自身服务业的同时，还可以帮助中国发展服务业，美国也可以进入中国不断增长的服务业市场并从中获利。

最后，美国和中国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有责任共同引领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例如，应对气候变化风险。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他们拥有共同的能源安全目标，同时还是两个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因而应该在降低气候变化风险和确保全球可持续发展方面共同承担责任。因此，两国应在提高能效、再生能源、核能、清洁煤及页岩气和页岩油技术方面进行大胆合作。另一个全球公共产品是由贸易、投资以及相关机构构成的多边贸易体系。再次强调，两国可以共同为全球经济持续增长提供所需要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四、迈向更深层次的合作

本报告第三节阐述了中美两国间未来的经济前景和巨大的经济互补性以及双方的共同利益。在这一节，我们将讨论两国应如何充分利用好这些机遇和互补性，在七大具有前景的领域，为两国的人民创造工作机会和经济繁荣。随后将针对两国政府、智库、企业界和其他社会各界提出开展合作的具体建议。

（一）货物与服务贸易

如本报告上一节所述，到2022年，中美两国将成为世界上彼此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且，两个经济体如此不同，在两国之间签定自由贸易协定，建立自由贸易区，将使两国经济利益最大化。目前能够完全发挥两国合作潜力的方法，就是两国在符合实际的情况下，尽快展开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但是，在付诸行动前，需要对中美自由贸易区进行认真的可行性、潜在利益和成本分析。

美国企业逐渐认识到，除了作为制造基地以外，对美国出口产品而言，中国市场蕴藏了巨大

潜力。过去十年间美国对华出口额增长了4倍多，然而，美国对华出口，尤其是美国中小企业对华出口的潜能尚未完全受到重视。鉴于中国物流及配送系统仍不完善，存在效率较低、独特性等问题，美国中小企业在进军中国市场的道路上遭遇了不少困难。

自几年前起，美国商务部和香港贸易发展局为帮助美国中小企业开发东亚的货物及服务市场（尤其是中国市场）做出了一系列努力，颇具成效。这些机构每年在很多州进行走访交流，推动美国中小企业出口，中小企业对这些活动了解越多，他们对中国出口的可能性就越大。

另一种帮助美国中小企业向中国进口商销售货物和服务的可行方法，是每年在美国主要城市（如旧金山）举办出口贸易商品交易会。在促进美国出口方面，这类交易会可以发挥与中国过去每年为促进出口举办的广交会同样的作用。为确保交易会发挥其应有作用，美国出口企业和潜在出口企业、中方进口商及其他贸易和服务公司应积极参与，以尽快形成规模。它的优势在于，许多以往从未考虑出口的美国中小企业能以较低成本，不需出国就可以参加交易会。此外，还应鼓励美国中小企业参加在香港这类地方举办的贸易交易会，许多中国进口商和贸易公司都积极参加这些交易会。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建立省州级或城市级伙伴关系，也是帮助太平洋两岸中小企业建立联系的有效途径之一。中美两国进出口银行应加大对两国小企业出口的信贷支持。通过网上服务促进并加强双边贸易关系，还可以使两国中小企业提高销售的效率，降低成本。这应该是两国政府积极追求的目标。

（二）投资

鉴于中国国内消费和生产市场的持续快速增长预期，中国依然是美国直接投资的理想目的地。目前，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与美国在华直接投资的数量级相同，在中国政府的鼓励下，中国对美直

接投资将继续增长。中美两国需要进一步释放双边投资潜力，以创造更多的就业和经济机遇。

两国缔结双边投资协定将会提供巨大帮助。此外，中国政府可以考虑扩大《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的“鼓励”和“限制”目录，而美国政府可以考虑为中国对美直接投资设立“安全港”目录，此举将极大推动中美双边投资流动。

此外，中国拥有庞大和日益增长的国内消费市场。那些早期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企业，如通用汽车、福特、宝洁、沃尔玛、联邦快递、肯德基、麦当劳、星巴克等，均获得了巨额利益，赢得了可观的市场份额，而且在中国也已家喻户晓。随着中国中产阶级的持续扩大，他们的在华利益将会进一步增加。美国的跨国公司在中国零售市场直接运营，可以满足中国中产阶级顾客的需求。

美国服务业随着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由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变为内需（包括国内消费）拉动型经济，有望进一步扩大在中国服务业的规模。通过出口或直接投资的方式，美国在参与中国服务业发展过程中拥有巨大机遇。这一切已经发生：由美国公司开创的服务业连锁经营模式，已经轻而易举地植根中国。除此之外，许多中国本土的连锁店采用了这种进口模式，在各地不断涌现。大众娱乐等其他服务（NBA）也被引入中国。沃尔玛商场遍布各地。为了满足零售消费者需要，外国直接投资可以通过全资子公司的形式进入中国服务业部分领域，实际上中国零售业已经非常开放。

在其他一些行业中，如银行业和保险业，中国出于宏观审慎和保护的原因，对开放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中国采取渐进的方式开放金融领域，以期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外国金融机构进入，也有助于中国金融业的进一步改革和自由化。根据现行规定，如果准许某家外国金融机构在中国设立商业银行全资子公司，那么以此类推，限制这家子公司在该



领域兼并、收购或持有其他金融机构不能超过20%的股份。中国的监管机构在该外国子公司总资产上设置限额，在其收购后设置适当的资本要求，这是合理的。可以考虑允许一些符合条件的外国金融机构在中国设立全资子公司，在该领域内无论是普通成长，还是兼并收购，那都已无关紧要了。

根据美国联邦储蓄委员会估计，2012年美国家庭金融资产总额高达54.39万亿美元。然而，目前，对于美国个人投资者来说，中国间接投资机会非常有限。美国的个人投资者只有通过香港H股投资中国企业，或投资那些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纳斯达克交易所以及其他交易所上市的中国企业。他们还可以投资一些共同基金，这些基金往往由国外资产管理公司以“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的名义在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股票交易。但是，美国投资中国企业的个人投资者相对较少，所以，如果中国逐步取消资本管制，他们是否会冲击中国证券市场，目前尚不清楚。因此，在这一方面应审慎地进行，并且应在两国之间达成共识，协调防范风险的方法。

中国不少企业受到了美国市场欢迎，例如海尔和联想，它们均在美国投资设厂，生产家用电器和电脑。生产汽车配件和高端钢铁产品的企业也落户美国。事实上，日本为打开美国消费市场在美国投资建厂的做法很值得中国企业学习。美国能源、制造业和农业项目吸引了大量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房地产项目也引起了很多中国企业的兴趣。除此之外，基础设施投资也可能成为未来热点。所有这些经济活动都将为美国创造GDP和就业。

间接投资(也称“证券投资”)方面，由于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央行)将大量外汇储备投资于美国国债，中国因此成为美国的主要间接投资国。中国拥有约1.2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此外，中国还间接投资了约一万亿美元其他美元计价资产。随着国际社会逐渐接受人民币计价，以及

人民币在外贸结算中的广泛应用，中国央行将不需要持有如此巨额外汇储备。中国央行持有美国长期国债对美有利，但此刻这种做法可能会给中国央行带来资本风险，可能导致利率、通货膨胀以及汇率的变化。对美国财政部来说，一个可能的双赢策略是美国财政部出售给中国央行长期(例如30年)“通胀保值债券”(TIPS)，或用其与中国央行目前持有的短期非通胀指数型国债进行互换。对于债券持有国来说，通胀保值债券不仅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抵御通货膨胀，还能降低利率和汇率方面的风险。

中国资本账户开放后，中国的私人投资者很可能成为美国股票市场、私募基金、对冲基金的重要投资者。目前，中国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总额约为9.5万亿美元。到2022年，中国实际人均GDP将翻一番，中国家庭财产将可能至少翻一番，达到19万亿美元。如果有机会，中国私人投资者将使投资更加多元化，加大投资外国金融资产。如果我们按照日本居民家庭3%的外国资产持有比例来计算，中国居民家庭对外间接投资将达到5,700亿美元，随着中国人均GDP和家庭财富的持续增长，预计每年中国私人对外间接投资将达到约285亿美元。美国需要大量新建或更新陈旧的基础设施，这将创造数百万就业岗位。中国投资者可以利用其储蓄盈余，以债券或股权方式，为其提供融资。这不仅对美国有利，对中国也有利，因为投资回报诱人。美国相关机构应该着手研究如何吸引中国投资者投资美国基础设施项目。

(三) 农业合作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其对粮食等农产品的需求量持续增大。中国中产阶级的崛起意味着对肉类和家禽的需求也在显著增加，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也将提高农产品需求，因为城市居民农产品消费量比农村居民高出50%。迄今，中国农业生产率的改善有助于满足人们对

更高质量食品的需求。但水资源及土地资源的缺乏，成为中国农业规模持续扩大的长期严重瓶颈。过度饲养家禽牲畜、大量使用农药、杀虫剂等产生的一系列环境卫生问题，也对人们的健康产生了长期危害。如何整合国内及全球资源和技术，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粮食需求，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是中国当前面临的一项主要挑战。

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农产品供应国，中国是美国农产品最大的销售市场，不仅是因为美国相对丰富的耕地面积和充沛的水资源，而且还由于美国农业的高效生产和先进的科学技术，而这一切都源于美国长期对农业研发的投资。在未来几年里，仅仅依靠提高国内供应，中国难以满足新增需求。然而，美国有能力扩大农业产量，以满足海外的新增需求，尤其是对谷物和肉类产品的需求。如果美国生产商能够确保中方具有可靠和长期稳定的需求，中国进口商能够确保美方产品的安全性和可靠性，那么美国出口中国的农产品数量将进一步增加。通过与中国的农业合作，美国充分利用剩余的土地资源，从而带动经济活动，创造新增的长期就业岗位。

目前，中国从世界各地进口猪肉、牛肉和鸡肉，但是从美国的进口却受到限制，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限制猪肉的进口是因为美国生产者用激素饲养猪，而这在中国和欧洲是禁止的。如果美国生产者承诺不再使用激素，如同对欧盟一样，中国市场就能够向美国开放猪肉进口。鉴于猪肉在中国饮食中的重要性，对猪肉潜在的需求是巨大的²⁸。第二，限制牛肉进口是因为疯牛病的风险。近年来，没有发现新的病例，已经扫清了这一个障碍，但需要两国讨论并形成备忘录，一旦发现新的病例，应立即停止向中国出口。最后，从美国进口家禽屡次成为两国贸易纠纷的受害者，希望能够尽早解决这一争端。

因此，美国生产商有机会向中国提供猪肉、牛肉和鸡肉，另外还包括玉米和大豆，而在玉米和大豆的供应方面，美国一直是中国最大的供应国。在中国，转基因玉米和大豆被用作饲料。从长远来看，中国政府和食品业企业应该考虑直接从美国进口猪肉、牛肉和鸡肉，而不是进口饲料谷物。对中国来说，这可以节约稀缺的土地资源，提升猪肉、牛肉和鸡肉的质量，改善卫生条件，还有可能降低货运成本（饲料与肉的比例大约是8:1），以及为美国创造额外的经济活动和就业机会。

基于对中国粮食和食品安全的充分考虑，两国之间的农业合作潜力是巨大的，而且显然是双赢的。因此，中美两国应着力扩大这种合作。如果一切顺利，从现在起的未来十年，中美两国农产品的总贸易额将比现在翻一番。

在世界市场上，谷物和肉类的自由供应波动相对较小，一个促进美国增加对华农产品出口的有用方法是使用长期（例如20年）商品供应合同，买卖双方预先确定交易价格（例如在成本加利利润的基础上）。这种长期供应合约将会激励美国生产者投资于新的长期生产能力，与此同时，缓解中国进口商对商品供应不确定性的担忧。双方同意的定价机制也缓和了商品价格波动带来的影响。美国生产者和中国进口商能够按照上述要求完成玉米、大豆等谷物产品的长期供应合同。肉类和家禽类也可以实行相似的长期供应合同。

然而，两国担心出于某种原因，其中一方政府可能会阻碍农产品从美国出口或者向中国进口。为了保护中国进口商及美国出口商的利益，确保这个长期合同的履行，合同可以规定，中国进口商将获得一个装有一年农产品供应量的仓库，以此作为供货担保。与此同时，如果供应确实被交付，中国进口商将一年购买农产品所需资金存入美国的第三方银行账户中，以此作为购买担保。在进出口双方事先协定下和政府支持下，

²⁸ 猪肉及其价格在中国的家庭消费和消费者价格指数中占据很大比例。中国的通货膨胀，很多时候是由于猪肉价格上涨而引起的。



这种担保安排足以防止双方不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因为，协议不论哪方违约，都会自动终止。不论出于何种原因，如果美国没有按照合同供货，那么拥有新产能的美国生产商将会面临无人购买的窘境。即便中国拒绝收货，中国进口商仍需付清货款。这样长期的供应合同能够免除中国对粮食安全方面的顾虑，建立真正的相互依存关系。

（四）旅游合作

正如本报告第二节“全球因素”中讨论的那样，在当今世界经济的环境下，任何一个可向低成本地区转移的工作都会转移出去。然而，旅游业却并非如此。人们在住宿、食物、零售、交通、通讯，以及娱乐方面的需求能够刺激旅游业产生许多无法转移的低技能工作。比如，一个想去纽约旅游的人一定会亲自抵达纽约，在那里住宿、餐饮、购物，从而为当地服务业创造需求。

香港已经成为中国大陆游客的受益者。2003年，香港启动“港澳个人游”计划，旨在吸引内地游客赴港旅游，那时内地赴港过夜游客人数为850万²⁹。到2012年，这一数字增至3,490万，约占香港过夜游客总数的72%。大陆游客平均停留三晚，日均消费1,054美元。旅游业为香港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尽管香港的制造业和后台工作岗位基本上都转移到大陆或其他国家，但旅游业帮助拥有700万人口的香港的失业率降至3.2%。日本、欧洲、台湾经验也证明，大量富裕游客涌入将对当地经济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

十年前，中国每年大概有1,660万出境游客（包括香港和澳门）。到2012年，这个数字增长到8,320万，到2022年，中国出境游客预计将达到1.827亿³⁰。美国吸引中国游客的原因很多：美

国是世界上最发达和技术领先的经济体，有着丰富多彩的文化和传奇的历史，是好莱坞、百老汇和迪斯尼的所在地，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大学，还有美丽的自然风光。此外，中国游客对美国消费产品——从时装到电子产品的兴趣浓厚。对于正在崛起的中国中产阶级，出境游将迅猛增长，这些游客将给当地带来强大的消费力量，从而推动当地经济发展。

2012年，约有150万中国游客赴美旅游。到2022年，这个数字很可能达到573万，占中国出境旅游总人数的3.1%。如果美国像对待日本韩国游客那样，同意给予中国免签证政策，那么预计到2022年，每年赴美旅游人数将大约在810万到1,070万之间。

据测算，中国赴美游客日均消费约750美元，假设平均停留14天，这意味着平均每个中国游客在美国的花销为9,000美元（没有计算抵达和离开当天）³¹。每100万中国游客赴美旅游，将在美国总共花费90亿美元，并创造35亿美元的附加值和61,352个就业岗位。到2022年，如果中国赴美旅游人数达到年均1,000万，那么预计将创造约350亿美元的GDP和61万个工作岗位。

如今，有13万名中国学生到美国求学。同样，也有3万名美国学子来到中国读书。两国已经承诺在接下来的五年当中，把美国来中国求学人数增至10万人。毫无疑问，交换留学生不仅是两国间建立友谊、增进理解的重要桥梁，还会为加快两国经济发展、促进就业作出重要和直接的贡献。赴美留学生（可把他们视为“长期游客”）也像游客一样，提高国内总需求。赴美的中国留学生每天花销较少，但每人每年总花销却很大，平均约为5万美元。假如每年有10万名中国留学生到美国深造，并且按照平均每人4年来算，那么这些学生一年的总支出则高达200亿美元。这能够另外创造78亿美元GDP和超过13.6万份固定工作

29 这个数字没有包括当天返回大陆的游客。

30 2011年3月，根据波士顿咨询集团的一篇报告计算，2010-2020年间，预计中国游客出境游次数年增速为10%，2020年中国游客长途旅行次数将达到2,000万次。我们认为，考虑到日本、香港、台湾、韩国等地经验，10%的增速还是相对保守的。

31 美国商务部测算，中国游客赴美人均消费7,100美元。

岗位。此外，每年有数以千计的商业人士来往于两国之间，他们为GDP和就业带来的积极效果也十分显著。

2011年，美国赴华旅游游客约为212万，约为美国总出境旅客的3.6%。如果中国能够更好地宣传本国旅游资源，使游客更容易获得签证，美国赴华旅游游客数量将会增加。两国应共同致力于推动开展双边旅游。

两国之间的人员互访，不仅支撑了两国的经贸关系，也有助于两国人民增进互相理解和建立友谊，从而推动更加紧密的经济合作。两国经济关系越紧密，就有更多人往来，两国之间的桥梁也会越牢固。

（五）科技合作

当今，不管以什么标准来衡量，与中国比起来，美国的科技具有压倒性的优势。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对人力资本及研发多年来的投资。美国已经成为主要创新之源，比如iPhone和Facebook。美国在科技方面遥遥领先，远胜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所有国家。中美之间在科技领域无疑存在巨大差距，在短期内这一现象还将持续，接下来的十年也依然如此。

中国在不断加大对人力资本及研发的投资力度。同时，中国还在营造一种合作研究和创新的文化氛围。中国认识到科技对于其现代化建设和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1978年以来，在《中美政府间科技合作协议》的推动下，中美两国在学术和研究领域的科技合作从未停止。合作领域包括：能源、环保、基础科学、交通、卫生、医药、核安全、民用核能技术、农业方面的研究等。知识产权保护是合作的主要障碍³²。在这方面，一个重要的步骤是两国政府建立平台，向中国人民宣传知识产权对未来发展的重要价值。不论是属于中国人或外国人

的知识产权，中国都必须进一步加强保护。实际上，中国需要从知识产权的消费者变成知识产权的生产者。

未来，政府间的科技合作可以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和加强。一个值得两国政府认真考虑的合作内容是“载人航天项目”。毫无疑问，美国在这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中国也在该领域取得了不小的进步。我们相信载人航天项目可以给两国带来双赢。其他可行的合作项目包括基因组学，也就是通过应用遗传学疗法治疗目前的不治之症，以及通过传统中医治疗慢性病。

（六）能源合作与研究

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和消费国。两国共同生产世界上30%的能源，消耗世界上40%的能源。因此，能源安全是两国共有的目标。由于拥有丰富的页岩油和天然气以及水力压裂技术，美国有潜力成为最大的能源净出口国。这将使美国不再依赖局势动荡的中东地区供给石油。美国能源公司拥有领先的能源勘探和开采技术，可以和中国能源公司展开合作，以清洁有效的方式来开发页岩油和天然气，这将有益于两国经济³³。通过合作，美国可以帮助中国实现能源安全，摆脱对中东地区石油的依赖。这也可能使美国成为对华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国。

我们很高兴看到，2006年的战略经济对话使政府间能源领域的科技合作进一步扩大。从那时起，两国政府已经认识到科技合作的重要性。为此，两国政府建立了中美清洁能源研究中心，致力于合作开展清洁煤炭技术、电力汽车和节能建筑物等研究。两国的科学家、学者和研究人员广泛参与了这项合作，商界人士也应邀加入。

同时，两国政府鼓励企业界直接参与能源合作。如今，两国已经开展了大规模商业合作，涉

³² 见下文第5节的讨论。

³³ 根据2011年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EIA)的预测，中国页岩气技术可采储量为1.3万亿立方英尺，超过美国50%。



及清洁煤、煤液化、智能电网、生物燃料、第三和第四代核能、高压输电、二氧化碳封存，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技术（煤制气）等。下面是两国成功实现科技合作的两个案例：

- 一、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和美国西屋公司在中美两国合作建设了核电站，还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合作投标建设核电站。
- 二、中国神华集团和通用电气合作研究开发煤制气技术。
- 三、中国的新奥集团和美国的杜克能源公司合作开发清洁能源。

此外，两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两国人民非常关注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以及降低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能源方面的科技合作可以使能源使用更高效和更环保，也可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通过携手合作，中美两国能够确保能源安全和能源价格合理，并降低气候变化风险。这不仅有利于两国，也有利于整个世界。

（七）加强可持续发展的合作

中美两国均已庄重承诺应对气候变化威胁，保护环境，帮助世界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两国都致力于减少排放。在私人部门的支持和参与下，两国政府已经启动在可再生能源、核能、清洁煤炭科技、电力汽车、二氧化碳封存，以及其它减少碳排放方面的合作研究。如果成功，这些研究将会抑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加，从而减缓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这应该成为两国优先考虑的问题。

五、向两国政府的建议

中美两国的经济互补性和深入合作转化成经济机遇，需要两国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和参与，特别是工商界的参与。但最重要的是，两国政府的领导作用将产生决定性影响。政府能够构建一

个公开、透明、公平和竞争的市场环境，以吸引投资和贸易。因此，我们向两国政府提出八点建议。

- 一、借助两国政府机构的专家意见，两国智库就中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可行性和利益进行研究，并于一年内完成相关研究报告。如果取得积极的研究成果，则应发起两国相关谈判进程。中美两国是全球最大的贸易国，因此两国应带头重启多哈回合贸易谈判。
- 二、对建立中美双边投资协定的讨论已有不少时日。为了推动双边投资流动，我们催促两国政府尽快（最好在一年内）完成正在谈判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
- 三、两国政府需要鼓励更多企业在能源领域实现科技合作，例如可再生能源、页岩油气、二氧化碳捕捉、使用及隔离，以及电动汽车等。此外，由于以上合作与气候变化息息相关，两国应在2013年12月的德班会议上达成共识，联合其他国家共同确保在2015年成功实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相关成果。
- 四、两国应该简化签证申请程序，并逐步将签证有效期延长至5年、10年，并最终实现免签。应该让两国人民感受到自己受到对方的欢迎。这些改变需要时间，但在两年内实现两国签证5年有效应该是一个合理的开端。
- 五、在美国国务卿克里访华期间，两国同意在“战略与经济对话”层面建立一个讨论网络安全问题的特别小组。这个小组应致力于制定一个路线图，内容包括：第一，两国在网络安全领域如何加强合作和提高执行力；第二，两国如何合作制定一项针对网络空间的国际准则。这些任务迫在眉睫，我们建议两国战略与经济对话小组应该在18个月内完成此项谈判，并在此期间及时发布中期报告。
- 六、不管是出于全球还是国内利益考虑，中国都积极推动知识产权保护法。事实上，由于激励创新、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的需要，中国

自身也希望保护知识产权。为了达到此目标，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完成。我们对中国政府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国务院负责知识产权保护的跨部门机构——国家保护知识产权工作组应进一步增强知识产权执法力度，以确保顺利执行和制止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第二，中国应考虑建立一个全国性特别法庭处理知识产权纠纷，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中国知识产权纠纷问题的解决和处置；第三，我们发现，在近期“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推动下达成协议，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机构将在2013年底前全部使用正版软件。我们敦促所有国有企业和银行系统能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此项工作。

七、放松高科技出口管制是中国的一贯主张。我们建议美国政府应加快处理该问题，并希望出现一个双赢结果。

八、美国部分针对中国企业贸易和投资的政府决策，包括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方案，建立在政治而不是政策考量之上。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运作应该更加透明，更容易被中方理解。我们建议美国政府发布更加清晰的投资审查流程。

在中美两国政府和人民的支持下，中美经济互补性和深入交往的潜力将很大可能被释放出来。

六、结论

综上所述，中美经贸关系很明显可以，也应该达到前所未有的相互依赖。在未来十年，两个国家的坚定努力会给两国人民带来很多经济和就业机会。

奥巴马总统在2012年11月7日连任获胜后的演讲中说：

“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在他们成长的国家中，拥有最好的学校和教师，继续作为全球科技、发现和创新的领导者，拥有最好的工作岗位和全新的商业机遇。”

同样，中国新一届领导人习近平在2012年11月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后说：

“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两国领导人的话表明，两国人民为自己和后代追求更好生活的目标是一致的，两国间更紧密的经贸合作将帮助两国人民实现他们的梦想。两国人民需要把握今天的机遇，开始为梦想的实现奠定基础。到2022年，正值尼克松总统访华50周年，我们希望通过更加深化经济合作实现共赢，推动中美关系在互信、互谅、和平的基础上持续发展。两国领导人开始了新一届任期。为了实现经济和两国人民就业的可持续增长，两国正在为经济发展确立一个新的方向。携起手来，两国一定能共创未来！时不我待，让我们抓住机遇！



执行委员会

共同召集人

冯国经

冯氏集团主席

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主席

中美交流基金会副主席

冯国经博士为冯氏集团主席，该集团是以香港为基地的跨国集团，核心业务包括贸易、物流、经销和零售，旗下利丰有限公司、利亚零售有限公司及利邦控股有限公司皆为香港联交所的上市公司。冯博士现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周大福珠宝集团有限公司(香港)及土耳其 Koc Holding A.S. 的独立非执行董事，他亦是美国Prudential Financial, Inc 亚洲区咨询会的主席。

冯博士是国际商会荣誉主席，该商会总部设于法国巴黎。他亦为中美交流基金会副主席及世界贸易组织以下的「世界贸易未来」高级别咨商小组的成员。另冯博士透过经纶慈善基金有限公司创办了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该院是一所以香港为基地的独立非牟利智库。

冯博士在中国内地及香港担任多项社会公职，包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和香港特区政府经济发展委员会成员等。

冯博士持有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电机工程学学士及硕士、以及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并曾任职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

刘遵义

香港中文大学蓝饶富暨蓝凯丽经济学讲座教授

斯坦福大学李国鼎经济发展荣休讲座教授

刘遵义教授一九六四年取得斯坦福大学物理学理学士学位(优异成绩)，并先后于一九六六年及一九六九年取得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经济学硕士与博士学位。他自一九六六年起任教于斯坦福大学经济系，一九七六年晋升为正教授，一九九二年出任该校首任李国鼎经济发展讲座教授，二零零六年自斯坦福大学退休并出任李国鼎经济发展荣休讲座教授。二零零四年至二零一零年间刘教授担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二零一零年刘教授被委任为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子公司中投国际(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并兼任香港中文大学蓝饶富暨蓝凯丽经济学讲座教授。



成员

迈克尔·博斯金 Michael J. BOSKIN

美国斯坦福大学Tully M. Friedman经济学讲座教授、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

迈克尔·博斯金是斯坦福Tully M. Friedman经济学讲座教授，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同时还是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研究员。他著有150多本著作和文章，涵盖国际经济发展、税收和预算理论和政策、储蓄和消费模式，以及变革的技术和人口统计学对资本、劳务及产品市场带来的影响。他在华尔街日报及其他重要报章常有署名专栏，包括一个通过报业联合组织在145个国家发行的全球经济双月专栏。

他在1989-1993年担任乔治布什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在此期间他推出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在清洁空气法案引入SO_x排放交易概念，并就解决第三世界债务和储蓄贷款财务危机和对政府支出施加首要有效控制提供帮助。他曾担任消费者价格指数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1996年报告改变了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政府统计机构测量通货膨胀、生产率和实际GDP的方法。除了担任全球政府和企业顾问之外，博斯金博士还在不少企业和慈善机构担任董事。

博斯金博士于1967年以本科最高荣誉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并作为杰出毕业生获校长荣誉奖，此后他于1968年在伯克利硕士毕业，1971年博士毕业，一直就学经济学。除了斯坦福和加州大学，他还曾在哈佛和耶鲁大学任教。在他众多的专业奖项和表彰中，博斯金博士最以斯坦福大学杰出教学奖为傲。

樊纲

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

北京大学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教授

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转轨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早年上山下乡，1982年由河北大学经济系（七七级）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系，主攻“西方经济学”专业，1985年至1987年赴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及哈佛大学访问研究，1988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92至1993年任《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1994至1995年任经济研究所副所长。1996年起创办国民经济研究所；2006年起兼任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2006-2010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委员会委员。2004年被法国奥弗涅大学、2010年被加拿大皇家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2005、2008、2010年，樊纲连续三次被美国《外交政策研究》与英《观点》杂志评选为“世界最受尊敬的100位公共知识分子”之一（2010年为“世界100位思想家”之一）。

执行委员会

成员

海闻

北京大学副校长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院长兼汇丰商学院院长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

海闻，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院长，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

1969年至1978年黑龙江虎林县红卫公社下乡。1978年至1982年北京大学经济系学习，获学士学位。1991年6月美国戴维斯加州大学经济系毕业，获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88年至1990年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旧金山、圣克利门托）经济系讲师。1991年至1992年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经济系讲师。1992年至2002年美国福特路易斯学院商学院经济系副教授、副教授（终身职）。1995年回国创办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常务副主任。2005创办北京大学深圳商学院，任院长，2008年更名为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社会兼职：中国经济学年会理事会理事长（2008-），中国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促进会副理事长（2000-），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1998-），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2011-）曾获中国国家教委、人事部“全国优秀留学回国人员”，“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等。

迈克尔·斯彭思 Michael SPENCE

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斯坦福商学院Philip H. Knight管理学荣誉教授

2001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迈克尔·斯彭思在2006-2010年期间担任发展中国家独立委员会主席。他是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的经济学教授，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管理学荣誉教授以及前任院长（1990-1999）。他还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和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在2001年，斯彭思教授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曾著有《下一次大趋同：多速世界经济增长的未来》一书，该书由Ferrari, Straus and Giroux出版社于2011年5月出版。

斯彭思教授在Genpact和Mercadolibre以及一些私人机构担任董事会成员。他是斯坦福管理公司和国际商会研究基金会的董事会成员。此外，他还担任Oak Hill投资管理公司和PIMCO公司的高级顾问。





第一章

1978年至今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

霍建国

中国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

参与撰稿人:李伟 马家华 黄志龙

摘要

白 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此期间，美国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出口市场之一，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不仅带来了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也带动中国产品走向国际市场。两国的经济合作为中国的剩余劳动力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相应地，美国也从中国的发展中获得了许多好处。美国从中国进口大量质优价廉的产品，使其得以控制物价上涨，从而维持低利率，为美经济增长提供助力。同时，很多美国跨国集团和中小企业也在中国设立生产和贸易公司，产品不仅销售到美国，也销往中国和其他市场。中国已成为很多美国企业的利润中心。服务贸易也是中美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的服务业全球竞争力强，业务范围遍及金融服务、教育、能源、环保等等。加强双边服务贸易合作对中美双方有多重益处，不仅有助支撑美国的高收入就业岗位，也有利于中国服务领域的扩大，而这正是中国下一阶段经济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投入产出模型分析显示，中美贸易在2010年为美国创造73万就业岗位，为中国创造1,140万就业岗位。¹

超过半数的中国出口产品是由外企生产，其中很多出口产品的配件是从其他经济体进口的，尤其是从设立在其他东亚国家的跨国公司进口。这一生产和贸易模式导致了美国对大部分东亚国家贸易逆差，而对美国贸易顺差。中国出口的快速增长因而伴随着亚洲区域内贸易的激增，以及很多行业和产品全球供应链的日益成熟。这也

反映在美国的贸易统计中。美国进口统计显示，在美国很多产品的进口规模变化不大的情况下，从中国进口增加的部分，刚好是从其他东亚经济体进口减少的部分。这一因素反映了外国企业越来越将中国当成他们的装配基地，从而增强他们的全球竞争力，这显示了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很多外国企业来自美国。因此，中美经贸合作已远远超出双边关系的范畴。广而言之，中美合作是全球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中美两国都从过去几十年全球化进程的迅猛发展中获得了好处。尽管加强中美两国贸易合作对双方都有好处，但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仍时有发生，双方都强调维护公平贸易，又相互指责对方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

两国具体的贸易争端可以通过相应的WTO争端解决程序加以解决。更为重要的是，双方应认识到，两国经济互补性强是促进双方贸易关系不断发展的基础，未来双边贸易增长仍有巨大的潜力，对增加就业和推动经济增长都将发挥重要作用。中国的“十二五规划”提出增加进口和扩大内需，旨在未来五年内将向美国的累计出口额增加至十万亿美元。²与此同时，美国的“国家出口计划”提出将出口规模翻番，从2009年的1.5万亿美元增加到2014年的3万亿美元。这两个计划将有助于促进中美贸易，特别是两国的贸易平衡。自2006年始，美国向中国的出口势头迅猛，超过中国向美国的出口增长。从2001年到2011年，美国向中国的货物和服务出口翻了四倍，意味着出口额每五年增长一倍，平均年增长速度近15%。

1 细节内容请参见第二部分第8篇分报告。

2 抨击中国对全球债务危机于事无补”，陈德铭，每日电讯报，2011年11月3日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asia/china/8867884/Bashing-China-isnt-going-to-solve-the-worlds-debt-crisis.html>



中国经过30年的快速发展，现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市场。随着中产阶层快速增加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发展，中国对粮食和铁矿石、煤炭、石油等能源的需求不断扩大，在国际商品市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中国的储蓄额日益增多，在全世界寻求投资机会，除了间接投资，直接投资也在增加。与此同时，世界其他国家也都想利用中国经济发展的机会。为实现贸易增长，中美双方应本着合作的精神，实现各自的目标。在2012年5月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基础上，两国要致力于加强建设更加开放的全球贸易体系，共同抵制贸易保护主义，促进双方经济增长，实现更为平衡的贸易关系。

为帮助美国中小企业增加对中国出口，本文建议中美两国可采取举办商品交易会的形式。中国进出口交易会，即广交会，对中国产品出口起

到了重要作用。可以在美国举办类似的商品交易会，比如在旧金山，以帮助美国中小企业产品出口中国。两国之间也可以加强建立州与省之间和兄弟城市之间的合作关系。

美国对高科技产品的出口限制阻碍了其商品对中国的出口。2002年开始，美国与中国的高技术产品贸易出现逆差。逆差从2002年的118亿增加到2010年的942亿³。增加对中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可以减少中美之间现有的贸易不平衡问题。双方应该加强在高技术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美国应改革其出口控制程序使其合理化。

中国和美国是全球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占2011年全球商品出口的18.5%和进口的21.8%⁴。两国的经贸关系在全球经济体系中举足轻重。中美两国加强合作，不但符合两国利益，对促进全球经济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3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

4 《世贸组织2012年报告》，国际贸易统计。

1978年至今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

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历程

中美经济交流历史

在2012年，中国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国则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按中方统计，2012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总值4,847亿美元，是1979年建交时的198倍⁵；美方统计数字更大，2012年为5,362亿美元，是1979年的226倍⁶（见图表1）。美方统计，2011年中美双边服务贸易达380.3亿美元⁷（见图表2）。

中美直接投资规模也有显著增长。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由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3.26亿美元增加到新世纪初的54.2亿美元⁸。截至2011年底，美累计在华投资设立企业6.65万家，实际对华投资700亿美元，占中国吸收外资总量的5.9%，在中国外资来源地中排名第三（位列香港、日本之后）⁹。

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在2003年至2011年期间增长了近28倍，从6,500万美元飙升至2011年的18亿美元。¹⁰根据美国智库荣鼎集团¹¹数据，2012年中国对美投资高达历史性的65亿美元。在2010年期间，中国企业在美国50个州的至少35个州有业务运营。¹²

自从中美1979年1月建交至今，两国经贸关系经历了不断深化的发展历程。中美经贸关系大体上划分为四个阶段：

5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

6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

7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8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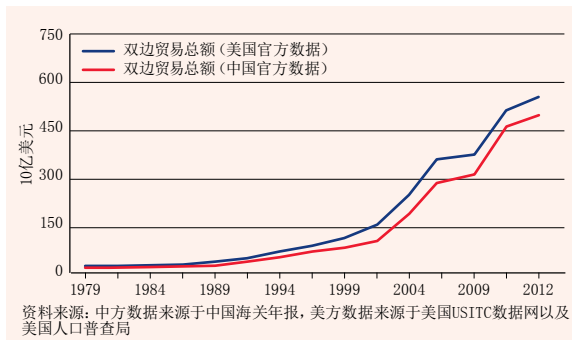
9 细节请参阅第13篇分报告。

10 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细节请参阅第13篇分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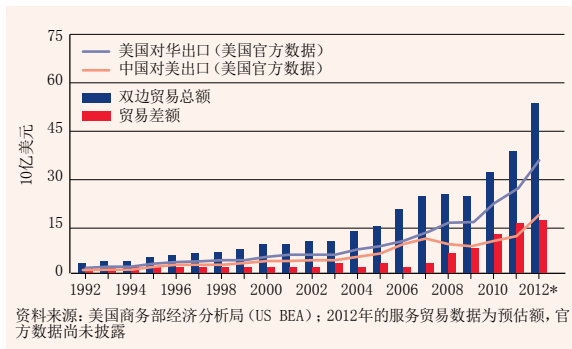
11 “中国的海外投资：数据双城记”，Thilo Hanemann，美国智库荣鼎集团，2013年1月4日。

12 细节请参阅第13篇分报告。

图表1:1979年-2012年期间中美货物贸易



图表2:1992年至2012年中美服务贸易



阶段一：中国经济改革和开放以来双边贸易快速增长(1979至1992年)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并于1979年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此阶段的最大特点是，中美之间的经贸合作基本以发展货物贸易为主。根据中方数据，双边货物贸易额从1979年低起点的24.5亿美元，快速增加到1992年的174.9亿美元¹³。美方统计分别为23.7亿美元和331.5亿美元¹⁴。

13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

14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



大部分贸易以所谓的“来料加工装配”贸易的形式存在，大部分进口原材料和配件输入中国，所有成品都用来出口，以此最大程度减少对严格规管的本土市场的影响。

阶段二：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美联系进一步加强（1993至2001年）

已故中国高层领导人邓小平在1992年中的南巡讲话标志了第二阶段的开始。该年末中国政府宣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重申经济改革和向世界开放的努力。

受惠于1994年1月1日人民币大幅贬值以及美国授予中国（非永久）最惠国待遇¹⁵，中国出口大幅上升，带动中美贸易额稳步上扬。在1999年，中美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达成双边协议。这一协议加快了加入世贸组织的步伐，并有利于中美经贸关系长期、稳健的发展。

中美双边货物贸易稳步增长。按中方统计，中美双边贸易额从1993年的276.5亿美元增至2001年的804.9亿美元¹⁶（美方统计分别为403.0亿美元和1,215.2亿美元¹⁷）。在此阶段，中美经贸合作领域扩大，在服务贸易、技术合作等方面也开始取得较大进展。

美国对华直接投资迅猛增加，1992年仅为5.11亿美元，1993年增至20.6亿美元，2001年达44.3亿美元¹⁸。

阶段三：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进一步拓展双边贸易和投资（2002至2010年）

2001年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里程碑”，也为中美两国经贸关系开启了新篇章。中国开始构成东亚乃至全球消费品生产网络中的重要一环。

《多种纤维协议》（MFA，又称《国际纺织品贸易协定》）在2005年1月1日终止，该协定旨在为发展中国家出口到发达国家的纺织品制定配额。这对中国贸易的发展又是一件大事。考虑到中国在纺织品行业有很大竞争力，该配额体系的终止促进了中国出口的快速增长。

中国在本阶段继续保持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地位，按美方统计，这一阶段美国对华出口增长317%，自华进口增长192%¹⁹。

在此期间，中美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增长219%，达314.3亿美元，而同期美国整体增幅仅为84%；中国在美国服务出口中所占份额从2.1%增至4.0%²⁰。

新世纪初，中国企业开始进入美国和其他国家市场直接投资，但总量不大，截至2010年，对美投资总额不到50亿美元²¹。同年，美累计在华投资设立企业6.5万家，实际对华投资700亿美元，占中国吸收外资总量的6.7%。

阶段四：中美承诺致力加强合作（自2011年开始）

中美正进入一个成熟全面的经贸交流阶段。在2011年5月，两国签订《中美关于促进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和经济合作的全面框架》。中美明确双方会基于共同利益，从战略、长期和全面的角度，来促进更广泛的经贸合作，合力营建全面、互惠的经贸合作关系，推动两国的繁荣和幸福，并实现世界经济的强劲、可持续的平衡增长。在未来十年内，中美会进入一个崭新且全面互惠的经贸合作关系，两国将能够在贸易、投资、金融、技术、清洁技术、基础设施以及全球经济治理方面开展广泛的合作。

15 在2000年，美国国会授予中国贸易永久最惠国待遇（MFNS）。这为中国在全球经济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打开了大门。

16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

17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

18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19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

20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21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入世后的中美经贸发展

过去30年的一大重要经济事件就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美两国都因此获益匪浅。在世贸组织协议框架内的市场开放为中美两国贸易的发展打破了此前的瓶颈。这有利于创造就业，提高收入并推动了两国的经济发展。

货物贸易

美国对华货物出口额由2001年的192亿美元增长到2012年的1,106亿美元，同期对华出口占其货物出口总额的比重由2.53%提高到7.1%（图表3）²²。目前，中国是美国大豆、棉花等农产品的最大出口市场。美国在汽车和航空产业领域也具有相对优势。例如，据波音公司预测，未来20年内，中国新飞机需求量为5,000架，价值6,000亿美元，届时，中国将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商业航空市场²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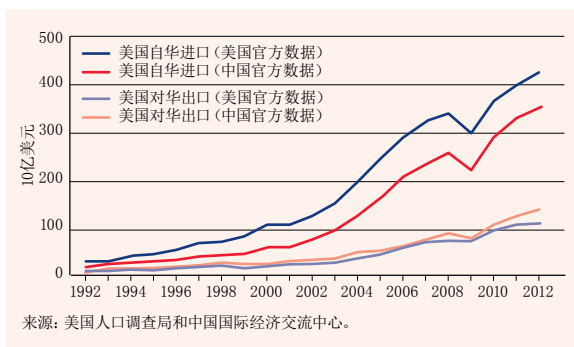
中国对美国货物出口也持续快速增长，2001年到2012年间，保持着年平均增长19%的发展速度，达到4,256.4亿美元²⁴。作为美国最大的货物进口国，中国出口的机械、玩具、运动器械、家具、床上用品、鞋等产品具有相对竞争优势。

服务贸易

美国对华服务贸易出口从2001年的54.1亿美元增至2011年的267亿美元；同期，美国对华服务贸易顺差由18.8亿美元增加到153.7亿美元²⁵。（图表二）美国在旅游业、教育、金融服务和专利转让等领域具有明显竞争优势。

中国计划增加服务业占GDP的比重，2010年为43%，到2015年计划增加到47%，这就为美国的服务业者提供了大量机会²⁶。中国正在大力发展

图表3:1992年至2012年期间美国和中国间的商品贸易额



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以取代低成本、低附加值的产业。在设计、品牌塑造、IT、研发、法律和金融服务等领域，来自美国专业服务业企业的投资，可帮助中国企业实现产业升级和改造。加强对华服务贸易合作可以帮助美国增加就业。

未来商业竞争的关键取决于企业提供具有附加值服务的能力。事实上，很多企业越来越着重建立自己的服务优势。例如，全球最大的汽车制造企业通用公司就在2010年设立了自己主导经营的通用金融公司。这个专属机构为通用消费者提供低息贷款和租赁业务，从而提高了公司销售量，成为一个重要利润增长点。

为满足亚太地区不断增长的商业航线飞行员和技师需求²⁷，波音公司扩张了在中国的航空服务业务，大大提高了培训规模。为飞行员和技师培训引入了先进的787训练设备，新安装了747-400完整飞行模拟机，将其在上海的波音航空服务培训基地的投入增加了3倍。

中美经贸摩擦

日益密切的中美经贸关系对双方都有利，这已形成共识，但是，两国在很多问题上仍存在争议和分歧。

22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

23 美国波音公司于2011年1月19日发布的中国批准购买200架波音飞机的公告。

24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

25 数据来源于美国经济分析局

26 服务业占美国GDP的68%。资料来源：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http://www.ustr.gov/trade-topics/services-investment/services> (2012年10月25日)。

27 《波音飞行员和技术人员前景报告》预测对全球飞行员和维修技术人员的最大需求将来自于亚太区。中国的预期要求引领了亚太区的整体需求，该区域在未来20年需要72,000名新的商务飞机飞行员以及超过108,000名维修技术人员。

中国货币政策

很多美国决策者、劳工组织以及与进口密切相关的业界代表指责中国政府虽然已实施渐进改革，但却在操控汇率，造成人民币对美元价值偏低，并声称这行为等同于中国补贴对美出口产品，以及对美国进口产品征收关税。他们认为中国通过操纵人民币贬值达到增加商品竞争力的目的。

中方对此的回应是，中国致力于“继续进行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但是绝对不采取任何大规模、一次性的贬值措施，称“避免人民币汇率的急剧波动非常重要²⁸”。自中国于2005年开始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面值对美元已上涨了23%²⁹。(图表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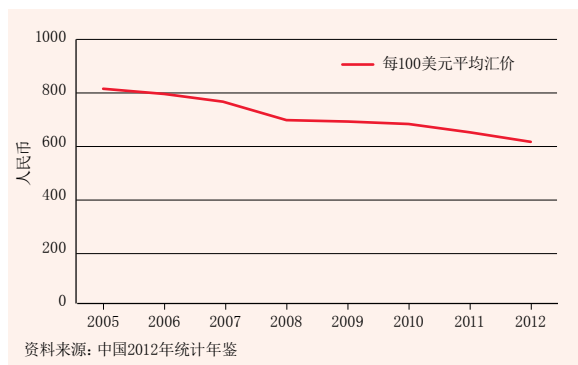
贸易限制措施

中美两国都采取过一系列贸易限制措施，比如关税配额、进口税、贸易救济等。历史证明，贸易限制措施在经济危机期间也许可以短期内迎合国内的政治需要，但是会阻碍长期的经济复苏。

中美都采取过征收双反税的贸易救助措施来保护国内的相关产业和就业，其结果就是导致越来越多的案件需要诉诸WTO贸易争端解决机制。

自2010年以来，中国对美国进口产品发起了一系列“双反”诉讼，包括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己内酰胺、干酒糟、涂布白卡纸、乙二醇单丁醚、二乙二醇单丁醚和间苯二酚³⁰。同期，美国也对中国进口的产品发起了反倾销调查，包括钢制轮毂、钢瓶、晶体硅光伏电池和模块、风机塔架和不锈钢控制水槽³¹。

图表4: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以100美元可兑的平均额计)
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2005至2012年)



2012年3月，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一项法令，授权美国商务部，向包括中国在内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惩罚性反补贴税，来补贴生产商和进口商。

知识产权保护

过去10年来，虽然中国大力推进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完善相关法律，定期查处重大侵权案件，但是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仍然不够完善。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估算，由于中国存在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美国在中国经营的知识产权密集型企业2009年版税和许可费损失高达482亿美元³²。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发布的报告指出，2010年破获的盗版商品中有66%来自中国。通过快递和快递的中国产盗版商品也有增加趋势。

政府采购

外国公司很少有机会能进入中国的政府采购市场。2009年6月，中国政府下发了有关优先购买国货的规定，5,860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要求优先向国内企业采购。美国企业担心，即将出台的中国政府采购法的最后实施条款，将会鼓励采购国产商品而对外资企业产品不利。

28 中国人民银行，有关“促进人民币汇率体系、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的公告，http://www.pbc.gov.cn/publish/goutongjiaoliu/524/2010/20100621164121167284376/20100621164121167284376_.html (2012年6月19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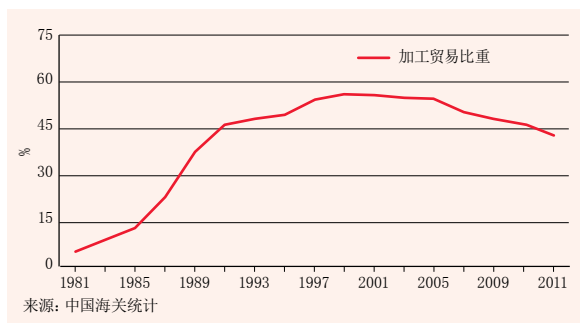
29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30 世贸组织(2012年):总干事就贸易相关发展的报告(2011年10月中-2012年5月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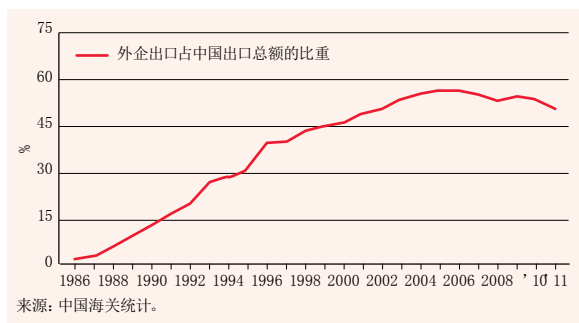
31 世贸组织(2012年):总干事就贸易相关发展的报告(2011年10月中-2012年5月中)。

32 细节请参阅第14篇分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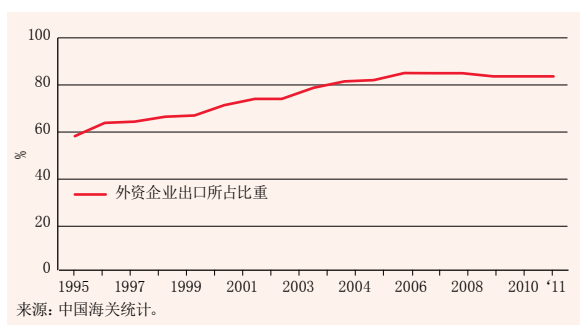
图表5:加工贸易在中国出口中的比重(1981-2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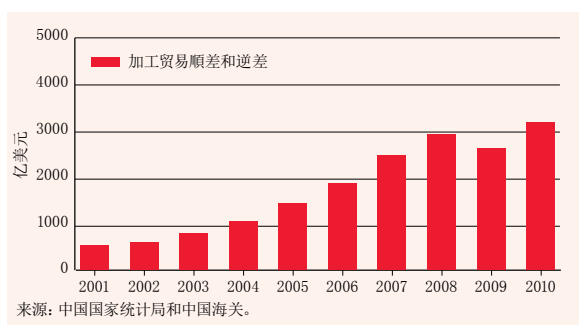
图表7:外资企业出口所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重



图表6:外资企业出口在中国加工贸易出口中所占比重



图表8:中国的加工贸易差额情况(2001-2010)



中国实行政府采购协议是履行WTO承诺的一部分。目前具体协定的内容仍在协商当中。自2007年起,中国已提交3份出价清单,然而其他协议成员国要求修改有关内容,使之与他们加入时的条款保持一致。

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和观点

即使近年来美国向中国的出口增速已经大大超越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增幅,但长期以来中国向美国出口大大高于美国向中国的出口,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很有可能持续一段时间。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美国的低储蓄率以及高消费率是美国对世界其他地区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然而,要理解中美贸易不平衡状况,需要先了解中国的贸易模式。

(a) 尽管过去十年来,加工贸易的重要性相对减少,但是仍然占据2011年出口比重的44%(图表5)

图表9:中国一般贸易差额情况(2001-2010)



(b) 2011年,外资企业占出口份额的52.4%,占加工贸易的83.7%(图表6-7)

(c) 中国贸易顺差以加工贸易为主(图表8)

(d) 2009年后连续两年,中国的一般贸易为逆差(图表9)

这些事实显示中国贸易盈余的很大部分来自于出口加工业,而出口加工业主要由外资企业兴建,旨在将中国作为最终产品的装配基地。

中国日益融入东亚和全球供应链也导致亚洲其他国家美国的贸易盈余正在“转移”到中国。因而在作出有效结论之前必须细看以往沿用的贸易统计数字。

在中国进口高科技产品中，美国所佔的份额正在下降，而中美在高科技产品贸易领域，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也迅速扩大。由此可见，美国限制高科技产品出口中国，造成对中国贸易逆差的部分成因。

中国是亚洲生产网络的最后组装环节

美国对中国存在大额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是，随着全球化生产的发展，很多产品都在中国进行最后组装。来自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和其他很多相邻国家和地区的公司，将工厂移到中国，将其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也转移到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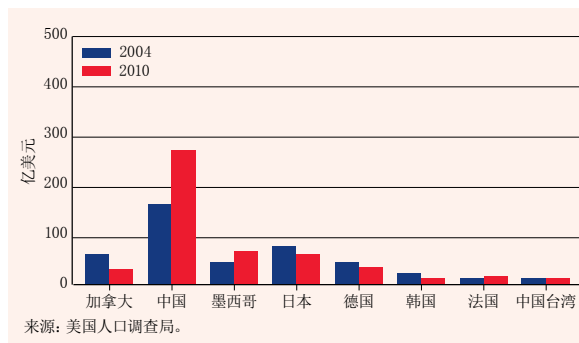
图表10显示，近年来，美国对韩国、日本和台湾的逆差逐渐减少。从2004年到2010年，韩国对美国的贸易逆差从199亿美元减少到101亿美元；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逆差从752亿美元减少到598亿美元；台湾从129亿美元减少到99亿美元。减少的部分构成了中国对美国的大额贸易顺差，以及与相邻经济体和地区逐渐增加的逆差。

中国大陆对日本的贸易逆差从2004年的208亿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557亿美元；对韩国的贸易逆差从344亿美元增加到696亿美元；对台湾的贸易逆差从511亿美元扩大到860亿美元（图表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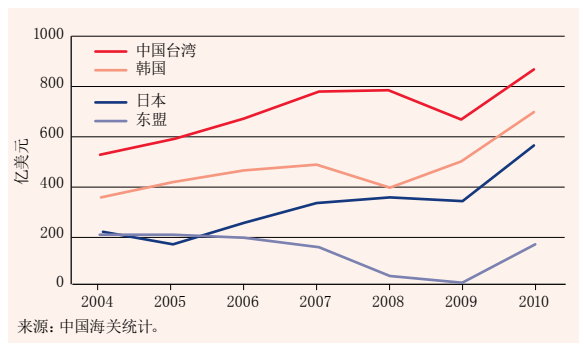
很多之前对美国贸易顺差的经济体的生产向中国转移。2004年到2010年，亚洲一直保持着占美国贸易逆差55%的比重。作为很多消费品的生产基地，中国成为美国对亚洲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从24.85%上升到43%。美国的低储蓄率和高消费率进一步推动了对华贸易逆差的不断增长。

下列数据也可说明其他亚洲经济体贸易顺差向中国转移的情况。图表12显示，美国自东亚进口制造业产品占美国制造业进口的比重在

图表10:美国贸易逆差主要来源地对美贸易顺差变化 (10亿美元)



图表11:中国与周边经济体的贸易逆差 (2004-2010)



1990-2009年间基本没变，在40%左右。然而，自中国的进口比重从3.51%飙升到23.72%，而中国之外的东亚经济体从39.18%逐步降至18.72%。

1990-2009年，高技术产品的自华进口比重从1.81%增长到28.33%，中高技术产品的比重从1.06%增长到13.53%，中低技术产品的比重从1.87%增长到15.45%，低技术产品的比重从9.37%增长到36.86%，而信息通讯技术（ICT）产品的比重从1.97%增长到40.31%。与此相对应的则是，在1990-2009年间，自中国之外的东亚经济体进口比重，高技术产品从60.64%逐步降至24.64%，中高技术产品从37.97%降至22.74%，中低技术产品从21.63%降至11.81%，低技术产品从33.57%降至10.25%，ICT产品的比重从72.34%降至30.59%（详见本篇附录）。

近年来，全球资源配置趋势发生改变。由于劳动力成本和燃料价格上涨，越来越多的制造

获利者是谁？

大量产品组装的利润微薄。以下案例展示了中国加工贸易获利的真实情况。

美泰公司芭比娃娃

从2000年到2009年，中国玩具出口的45%流向美国。一个芭比娃娃在美国市场的售价是9.9美元，其中中国生产企业仅拿到0.35美元，而品牌拥有者美泰公司拿到8美元（资料来源：新华社于2010年“就中国贸易盈余和贸易差额对盛光祖的采访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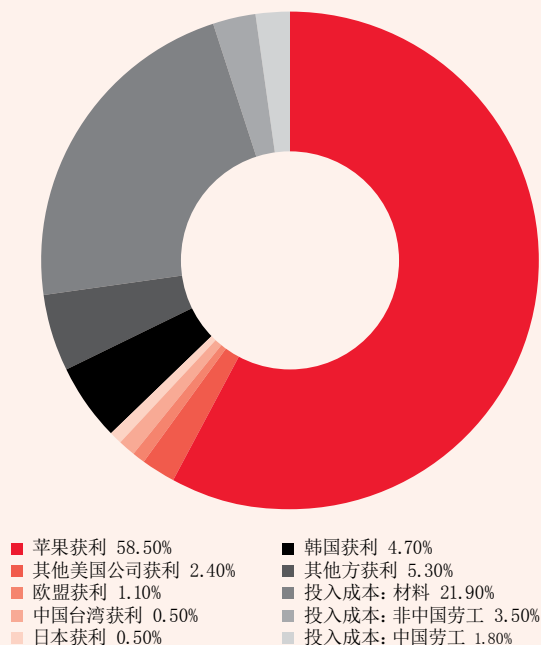
惠普笔记本电脑

从2000年到2009年，中国总共出口了6.2亿台电脑，其中30%出口到美国。在此期间，中国从美国进口了价值56亿美元的英特尔芯片和其他元件（资料来源：新华社于2010年“就中国贸易盈余和贸易差额对盛光祖的采访报道”）。据上海海关的数据，中国出口到美国的惠普笔记本电脑，最终用户的购买价是1,000美元一台。其中美国公司得到169.6美元，而中国企业的加工费用仅为30.3美元，为零售价的3%。

苹果手机

苹果手机是苹果公司的最大收益来源。美国学者肯尼斯·克莱默 (Kenneth L. Kraemer)、格雷戈·林登 (Greg Linden) 和杰森·戴德里克 (Jason Dedrick) 确认，苹果公司拿到iPhone 4手机零售价格的58%，远远大于供应环节的其他公司的收入。2010年亚洲开发银行学会的一项研究显示，在中国对美iPhone手机20.02亿美元的出口中，96.4%实际上是增加值的转移，其中日本为6.7亿美元，德国为3.26亿美元，韩国为2.59亿美元，美国为1.08亿美元，其他国家为5.42亿美元，而中国获得的增加值仅为7,345万美元，在中国国内增值率仅为3.6%（资料来源：Xing Yuqing和Neal Detert, “iPhone如何扩大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亚洲开发银行工作文稿257，日本东京，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2010年12月，见图表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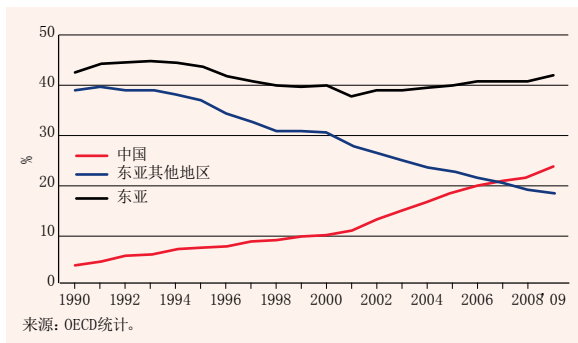
图表13：2010年iPhone手机的价值分配



来源：Kenneth L. Kraemer, Greg Linden和Jason Dedrick, “抓住全球网络的价值：苹果的iPad和 iPhone”，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和美国雪城大学



图表12:东亚经济体对美国制成品进口的贡献 (1990-200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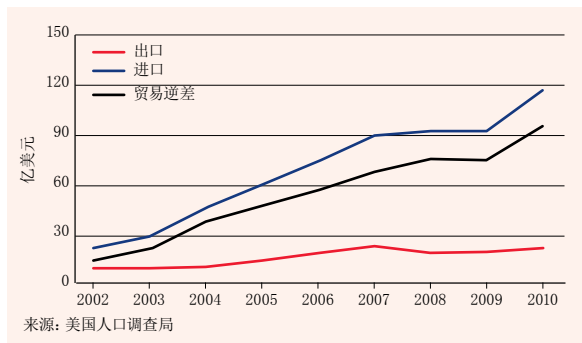
企业把生产地迁移到新兴市场,如越南、印尼、柬埔寨和墨西哥。一些企业实施「中国加一」策略,开始在中国以外的新兴市场设厂,转移供应链。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有望部分向这些新兴市场转移。

总值数据不能真实反映双边贸易中国的获利部分加工贸易占据中国外贸的一半左右,其特点是,国内附加值部分相对较少,进口部分较多。传统的贸易统计方法不能正确反映两国之间贸易不平衡的真实情况。如果不是只统计货物和服务的总进出口额,而是将各自的实际商品附加值分开来计算,那么情况就会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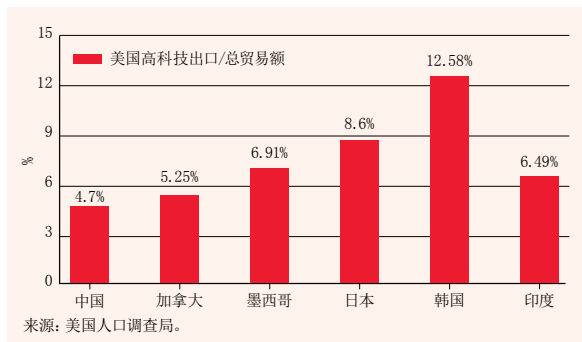
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学院陈锡康教授研究发现³³,2011年美国每向中国出口1,000美元(包括从香港再出口),能为美国经济创造880美元的附加值。而中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中国每向美国出口1,000美元(包括从香港再出口),仅能创造573美元的附加值,即美国对中国出口产品创造的附加值比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多54%。此外,用商品附加值计算,2010年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为917亿美元,比用贸易总额计算得到的数据2,179亿美元减少了58%。

33 细节请参阅第8篇分报告。

图表14: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产品贸易趋势 (单位: 10亿美元)



图表15: 2010年美国对各国高科技出口占与各国双边贸易额比重



高技术出口管制

美国严格限制其高技术产品对中国的出口。从2002年起,美中高技术产品贸易形成逆差,当年美国的逆差额为118亿美元。到2010年,逆差额扩大到942亿美元(图表14)。2003年,美国收紧对中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管制,特别是软件和设备,加强对中国核技术和导弹技术发展的监控。四年后,美国商务部宣布,重新限制向中国出口两用产品和技术³⁴,规定了31个条款,共20个类别的产品不允许出口到中国。

根据中方数据,中国自美国的高技术产品进口份额,由2001年占总高技术产品进口的18.3%下降到2010年的7.1%。同期,中国的高技术产品进口额从640亿美元增长到4,127亿美元,增长了

34 双用途指那些可以同时用于民用商用和军用的物品或技术。

5.4倍,平均每年增长23%。在此期间,美国对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加了150.7%,大大低于对欧洲(219.6%)和日本(332.8%)出口的增长。如果美国能放宽对中国高技术出口的管控,对中国的出口额将会显著增加。

中美双方从经贸合作中受益

在过去的30年里,中美紧密的经济联系不仅带来了更多的货物和商品贸易,同时创造了就业机会,提高了两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同时也促进了创意、人员和技术的交流。以上经贸方面的利益很大程度依靠中美两国之间的坦诚对话和建设性的合作。

美方获益

中国成为很多美国产品的重要海外市场

据美国商务部统计,中国1979年仅为美国第23大出口市场,2007年以后一直位居第3位。2012年,从美国出口到中国的货物总额高达1,106亿美元,是1979年的64倍。中国占美国出口的比重也从1979年的不到1%增加到2012年的7.1%³⁵。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中国名列美国42个州的前五大出口市场,并是路易斯安娜、俄勒冈以及华盛顿州的首要出口市场³⁶。

中国成为美国很多产品的重要海外市场。美国的高科技和重型制造业产业(如机电设备、医疗器械、飞机和汽车等)对华出口快速增长。2010年美国汽车对华出口额为45亿美元,同比增长134.34%(同期美国汽车出口总额增长34.4%)。据波音公司统计,波音飞机是中国航空公司客、货运输体系中的主流机型,截至2009年6月,中国运营的1,383架民用飞机中,有736架(或53%)为波音

飞机³⁷。2010年美国飞机对华出口57.6亿美元,同比上升7.9%(同期美国飞机出口总额上升3.9%)。

美国企业对华投资回报巨大

美国对华投资排名第三。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统计,截至2011年底,美国对华投资高达542亿美元,其中49.25%投资于制造业,其次为批发业贸易(8.9%),控股公司(非银行)(8.94%),信息产业(5.56%),存款机构(5.49%),矿业(5.25%),以及金融(除存款机构外)和保险(4.58%)³⁸。

美国通过对华直接投资取得中国市场份额。据中国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检商务部统计数据,2011年美国对华投资实现销售收入约3,104亿美元,其中在中国国内销售额约为2,281亿美元,出口额为823亿美元,出口到包括美国市场在内的国际市场。

1994年以来,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额占美资企业总销售额的比重基本在70%左右。1994年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额为25.2亿美元,此后迅速增长,到2008年在中国市场销售额为989.5亿美元(图表16)。与对华出口相比,从1999年起,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额一直超过当年美国统计的对华出口金额(图表17)。

中国成为诸多美资企业的利润中心。据中国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检商务部统计数据,2011年美国在华投资企业实现利润211亿美元。尽管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绝大多数美国在华投资企业业绩良好,成为其跨国集团利润的重要增长点。2005年,美国在华投资企业利润汇回境内总值为33亿美元³⁹。另据有关测算,1999-2009年间,美国在华直接投资的经营性净收益率为15%,加上资产升值和人民币升值因素,实际收益率为18%⁴⁰。

37 <http://www.boeingchina.com>, 2011年9月8日登录。

38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39 Erik Britton、Christopher T. Mark, Sr.,“中国影响:评估美国对华贸易和投资对美国经济产生的影响”,该报告由牛顿经济研究院和Signal集团于2006年1月发布。

40 潘英丽,《为何需要加快金融转型》,《解放日报》2010年11月14日第八版。

35 数据来源于美国人口普查局。

36 2000-2010年美国对华出口”,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2000-2010年美国各州对华出口”,发布于2011年3月30日, https://www.uschina.org/public/documents/2011/03/full_state_report.pdf。

图表16: 1994-2008年美国在华附属公司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额及其占总销售额的比例

	金额-百万美元	比例
1994	2,520	78.14%
1995	4,377	81.06%
1996	5,825	67.12%
1997	8,213	67.67%
1998	9,292	63.60%
1999	14,306	70.19%
2000	18,524	70.28%
2001	23,036	70.54%
2002	30,205	73.02%
2003	36,824	75.53%
2004	46,207	74.43%
2005	52,665	67.88%
2006	65,107	67.76%
2007	79,349	70.99%
2008	98,952	75.32%

来源: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 “1994-2008年美国海外直接投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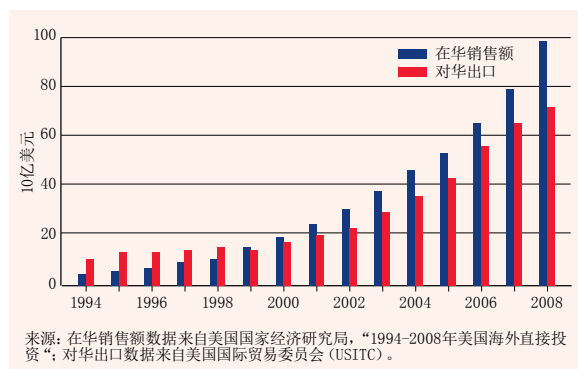
美国企业积极参与中国服务行业

美国在对华服务出口方面保持贸易盈余。该数据从1992年的5.15亿美元增至2011年的153.7亿美元,增长了29倍⁴¹。美国经济研究局(BEA)的数据显示,2011年中美服务贸易总额达到历史性的380.3亿美元,其中70%是美国对华出口。

截至2010年底,中国承诺开放的100个服务业部门大部分有美国企业投资。在会计、银行、保险、证券、商业等领域,美国在华服务企业均有良好的经营业绩。据中国司法部统计,截至2011年3月,美国律师事务所共设立驻华代表处101家,占各国(地区)律师事务所在华代表处总数的42.98%。据中国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检商务部统计数据,2011年1,343家美国咨询企业在中国销售收入23亿美元。

41 资料来源: 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图表17: 1994-2008年美国在华附属公司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额及当年对华出口额



从中国进口消费品大大提高了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平

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质量可靠,成本低廉,帮助美国保持低通胀。

进口中国制造的产品,也有助于改善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在进入美国市场的中国产品中,服装鞋袜、玩具箱包、电子电器等日用消费品占75%左右。

以鞋类产品为例,按美国海关统计,2010年,美国从中国进口鞋类产品总金额150.7亿美元,占美国鞋类产品进口金额的76%;从中国进口数量为20.7亿双,占总进口数量的87%。从具体的平均单价来看,美国自华进口鞋为7.57美元/双,自全球进口鞋均价为8.61美元/双,自中国以外地区进口均价为15.56美元/双,因此,如果用美国自中国进口均价与自中国以外地区进口均价进行比较,则美国从中国进口鞋每双节省成本7.99美元。从这个角度看,2010年美国消费者从中国进口鞋类产品共为其节省了165.5亿美元⁴²。

中美劳动力分工惠及两国工人

由James Fallow撰写一篇名为《中国产,世界用》(“China makes, the world takes”)的报道

42 资料来源: USITC

图表18: 1993-2008年美国对华货物与服务出口拉动的美国就业人数(单位:万人)

	当年对华货物贸易支撑的美国就业人数	当年对华服务贸易支撑的美国就业人数	总就业
1993	112.2	16.1	128.4
1994	114.0	17.0	131.0
1995	139.3	20.4	159.7
1996	135.4	24.6	160.1
1997	138.3	27.6	165.9
1998	149.0	30.1	179.1
1999	130.3	28.7	159.0
2000	150.5	34.9	185.4
2001	173.8	38.4	212.2
2002	187.4	40.2	227.6
2003	222.7	37.8	260.5
2004	250.2	45.6	295.8
2005	280.0	51.4	331.4
2006	350.1	62.1	412.2
2007	388.3	72.4	460.7
2008	413.6	80.4	494.0

资料来源:根据美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署与经济统计局发布的《出口拉动美国就业》报告计算。

指出,中国工人从事年收入1,000美元的工作,可带动美国设计师、市场营销者、工程师和零售商每星期赚取1,000美元或以上的收入。这也间接帮助了美国国内企业⁴³。

另一篇由旧金山联储发表的一篇文章⁴⁴指出,中国产品仅占美国私人消费支出的2.7%。2010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和服务中,尚不到一半反映了中国进口的真实成本,其余部分为美国从事运输、销售及营销活动的公司和工人获得。

对华贸易大大增加了美国的就业机会。2010年4月,美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署与经济统计局发布《出口拉动美国就业》报告,分析了1993至2008年美国出口对就业的拉动情况。根据该报告中出口金额拉动的就业数量以及美对华出口所占比重计算,1993年美国对华出口拉动的美国就业人数为12.84万人,其中货物贸易出口拉

动就业为11.22万人,服务贸易为1.61万人。2008年,对华出口拉动的美国就业人数为49.4万人,其中货物贸易出口拉动就业为41.36万人,服务贸易为8.04万人(图表18)。

陈锡康教授及其团队的一项研究表明,美国对华出口10亿美元的货物和服务将会在美国创造6,400人年的非农就业。鉴于2010年美国对华出口达到1,145亿美元,这意味着为美国创造了732,800个就业机会。

很多人抱怨,中国因素使美国丧失了很多就业机会。事实上,从2004年起,美国劳工统计局(BLS)开始收集由于工作转移到海外而造成的工作流失数据,这些数据显示,2004年以来,美国每年因此而流失的工作岗位为5,000—16,000个,这仅占美国历年流失工作岗位总数的0.4—1.6%,不但在美国全部就业工人中微乎其微,而且公司内部转置的比例也在66%—93%之间⁴⁵(图

43 James Fallow, “中国产,世界用”,美国大西洋月刊,2007年1-8月,第19页。

44 Galina Hale 和Bart Hobijn, “中国制造的美国背景”,FRBSF经济报道,2011年8月8日, <http://www.frbsf.org/publications/economics/letter/2011/el2011-25.html>。

45 按雇主已知的分类工作移动情况,从2004年到2008年,2008、2009和2010年(数据获得于2011年9月8日)。 <http://www.bls.gov/mls/>

图表19:2004-2010年因外包或转移到海外的美国工作流失数据

	流失到海外工作数目				当年总流失数	流失海外所占比重
	总数	公司内部	公司外部	公司内比例		
2004	16,197	12,905	3,292	79.68%	993,909	1.63%
2005	12,030	9,438	2,592	78.45%	884,661	1.36%
2006	13,367	11,776	1,591	88.10%	935,969	1.43%
2007	11,856	9,887	1,969	83.39%	965,935	1.23%
2008	11,431	10,392	1,039	90.91%	1,516,978	0.75%
2009	10,378	9,630	748	92.79%	2,108,202	0.49%
2010	5,336	3,548	1,788	66.49%	1,257,134	0.42%
2011上半年	3,325	3,042	283	91.49%	486,482	0.68%

资料来源：按雇主已知的分类工作移动情况，从2004年到2008年，2008、2009和2010年（数据获得于2011年9月8日）

表19)。该统计虽然未能显示出具体国别情况，但中国应只是其中一部分，而且即使全部与中国有关，也不足以构成影响中美关系大局的因素。

中方获益

美国在中国GDP及出口增长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三十多年来，中国从进入美国市场、获得美国投资和技术中获得巨大利益。与美国不断扩大的经贸合作，帮助中国缓解了市场、资源和技术瓶颈，推动经济规模持续扩大、结构改善以及质量提高。同时也深化了中国的人力资本、实物资本和技术资本，帮助推动了中国现代化进程。

近20年来，中国经济保持着年均10%左右的增长速度，这种增长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坚持开放贸易和投资体制紧密相关。作为外向型经济特征明显的国家，出口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具有重要地位，占GDP的40%以上，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超过20%。而作为中国最大的出口国，美国占了中国出口的20%左右。这一比例自1998年以来基本没有变化，自2008年起降到18%左右。美国也是中国贸易顺差的最大来源。

对美出口贸易支撑了中国国内的就业水平

在30多年的贸易往来中，中国对美出口商品也大

体经历了一个结构不断优化的过程，从早期的初级产品、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占有较大比重，逐步转变为机电类产品居于主导地位的出口格局。

对美出口有助于中国国内创造就业机会。陈锡康及其团队估计，2010年中国对美出口每10亿美元的货物和服务，相应会创造38,930人年的非农就业。鉴于2010年中国对美出口额达2,932亿美元，这一数据意味着当年创造了1,140万人年的非农就业，占中国非农就业的2.4%。此外，美国企业的中国分公司为中国GDP贡献的数字从1994年的6.78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273亿美元。

2011年美国在华投资企业缴纳税款217亿美元，从业人员数为219.0万人，其中外籍人员2.61万人，新增就业29万⁴⁶。

中美经贸合作促进了中国的产业升级和现代化

截至2010年底，美国企业累计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超过250个。在华投资企业的研发支出也增长迅速，从1994年的700万美元增长到15.17亿美元（图表20）。这些研发中心的设立，对于提高中国的技术水平，发挥了巨大作用⁴⁷。

46 资料来源：商务部对中国外资企业的年度审查数据。

47 细节请参阅第13篇分报告。

图表20:美国在华投资控股公司对中国GDP及就业的贡献

	GDP增加值 (百万美元)	研发支出 (百万美元)	就业人数 (千人)
1994	678	7	62.4
1995	1,092	13	80.9
1996	2,073	25	101.4
1997	3,194	35	138.4
1998	3,004	52	175.5
1999	3,945	319	252.4
2000	5,495	506	252.0
2001	5,995	(0)	273.0
2002	7,631	645	316.7
2003	8,747	565	338.9
2004	12,529	575	459.9
2005	16,221	668	521.8
2006	18,489	759	591.5
2007	21,438	1,173	676.2
2008	27,296	1,517	774.2

来源:美国经济研究局,“1994-2008年美国海外直接投资”。

未来十年的合作前景: 美国增加出口和中国增加进口将有利于实现贸易平衡

受益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增长态势,中国经济预期会在下一个十年及更长的时间内继续快速发展,城镇化、产业升级以及消费开支增长继续成为主要发展动力。与此同时,虽然美国经济受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影响仍处艰难的调整时期,加上美国仍需管理公共部门赤字等问题,但考虑到美国的强大创新和科技能力,美国经济未来依旧光明。展望未来十年,中美两国的持续发展会为两国创造更多的经贸合作机会,两国应深化交流,从而获益于这一互相依赖的经贸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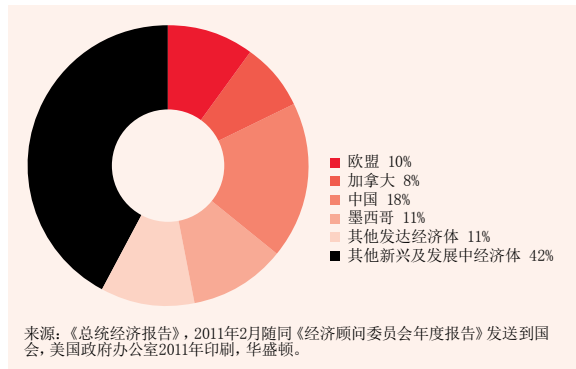
中国的“十二五规划”提出增加进口和扩大内需,美国的“国家出口计划”提出将出口规模翻番。这两个计划将有助于促进中美贸易,特别是两国的贸易平衡。两国应寻求贸易合作共识,在未来十年实现贸易平衡。

中国大力促进进口和国内消费

中国的第十二个五年规划指出,国内消费将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关键驱动力。这将通过大力推进城市化、稳步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创造良好的消费环境来实现。到2015年,中国计划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加到32万亿元人民币,年均增长15%。

中国也将逐步改变过去十年的出口导向型贸易政策,将更加注重巩固出口和促进进口来实现贸易平衡。中国的目标是增加进口规模,使五年内的进口总额达到10万亿美元以上。中国还计划将从美国进口的货物增加一倍,从2010年的919亿美元增加到2015年的2,000亿美元。增加进口将需要发展一个更加开放的消费品市场。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中国将于2020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进口国。

图表21:美国名义出口增长的预计份额(2009-2014年)



美国的出口翻番和再工业化

2010年1月,奥巴马总统提出美国的国家出口计划,计划到2014年将美国的出口翻番,达到3万亿美元,这意味着要保持15%的年均增长率。除了设立一个“出口促进内阁”参与介入到所有重要的经济部门外,美国政府还为实现这一目标制订了具体的行动计划。

据《2011总统经济报告》,从2010年到2014年,加拿大、欧盟和其他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将在美国的出口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其中,美国出口增长的10%将靠欧盟实现,8%靠加拿大实现。另外超过70%的出口增长将依靠中国、墨西哥、巴西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来实现。依靠中国实现的出口增长份额将达到18%,远高于其他经济体(图表21)。

通过实现出口翻番计划和“再工业化计划”以及其他诸如逐步放松高新技术出口管制等手段,来振兴美国的制造业,不仅有助于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还将有助于创造更多工作岗位。

美国制造业回归

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发现,未来五年美国会有七大产业集群把生产基地从中国转移回美国,这七大产业是运输商品、电气设备/家用电器、家具、塑料及橡胶制品、机械、金属产品和电脑/

电子产品,这些产业可创造200万到300万个工作岗位和大约1,000亿美元的产值。这七大产业每年消费约2万亿美元,约占美国从中国进口的70%,2009年价值近2,000亿美元。工作岗位直接来自工厂增加的工作,间接的也有通过支持服务获得,如建筑、运输和零售等⁴⁸。

BCG预测,未来五年中国沿海城市许多产品的总生产成本仅会比美国一些地方准备建设的工厂低10%-15%。考虑到运输、库存等其他因素,从中国采购的产品和在美国制造的产品的成本差距将会进一步缩小。美国某些州,如南卡罗来纳、阿拉巴马和田纳西,将会成为工业化国家成本最低的生产地。BCG最终得出的结论是,美国公司在本国的生产能力建设将会进一步增强。目前已可以看到这种转变的迹象⁴⁹:

- 科尔曼(Coleman)公司正在将其16夸脱轮式塑料冷却器的生产从中国转移到堪萨斯州的威奇塔(Wichita, Kansas),这样做正是因为中国的制造和运输成本在不断上升。
- 福特汽车公司在和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United Auto Workers)签订优惠协议同意其按每小时14美元雇工后,正在将2,000多个工作岗位带回到美国。
- 美国公司Sleek Audio(美妙声音)已经将其高档耳机的生产从中国供应商那里转移到了美国佛罗里达州马纳蒂(Manatee)县自己的工厂。

美国出口控制改革

奥巴马总统于2009年8月呼吁对美国的出口控制体系进行全面审查后,美国开始实施其出口控制改革(ECR)计划(见图表22)。该计划提出分三

⁴⁸ Harold L. Sirkin, Michael Zinser, Douglas Hohner和Justin Rose (2012年),“美国制造已近顶峰:哪个行业、为何以及何种程度”,美国波士顿咨询集团。

⁴⁹ Harold L. Sirkin, Michael Zinser和Douglas Hohner (2011),“美国制造的回归:为何制造业会重返美国”,美国波士顿咨询集团。

图表22:出口控制改革计划 (ECR Initiative)

阶段	控制清单	许可发放	执行	信息技术
一	要对两份清单的管辖混乱加以厘清、细化和协调;建立新的控制标准。	执行以法规为基础的改善措施,以简化申请许可过程	同步协调执行;建立联合执行中心(EFC)。	厘定企业方面的需求。
二 (需要告知国会;需要额外的资金)	整合两份清单,划一分层结构;应用标准;适当取消单向控制;多方提交增加或去除控制的建议。	完全过渡到可对照的控制清单;协调的许可申请制度全面实施。	扩大范围和守则	过渡到单一电子许可发放系统。
三 (需要立法)	把两份清单合并为一份清单;为更新清单制定程序。	成立单一许可发放机构。	把执行步骤集中在单一机构下。	实施单一的许可登记和执行系统。

来源: Ian F. Fergusson和Paul K.Kerr (2012年),“美国出口控制体系以及总统的改革倡议”,华盛顿美国国会研究服务研究报告。

个阶段从根本上改变美国的出口控制体系,其目标是达到四个“单一”,即单一许可发放机构、单一控制清单、单一执行机制和单一信息技术系统。该计划认为,美国应做出的改变是尽量减少对技术转移的限制,有关的出口限制只应针对那些明显危及美国国家安全且不易从其他渠道获得的技术。

在2012年5月举行的第四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ED)中,美方同意“促进向民用最终用户和民用最终用途出口高技术产品”并“在美国收到《出口管理条例》(Export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s)所要求的全部信息后,及时回应中国提出的特别请求,及时审核中国希望购买的民用最终用户和民用最终用途产品可能涉及到的出口控制⁵⁰(图表23)”。

中国的关税削减

根据美国贸易代表(USTR)办公室公布的《2011年就中国遵守WTO规则情况给国会的报告》,中国每年都能按时兑现其针对工业品做出的关税减让承诺。在与有关WTO成员所进行的入世双边谈判期间,中国同意从2002年到2010年通过降低工业品进口税率,增加美国公司和其他外国公司的市场准入。在每年的第一天,中国都按时执行其按计划和要求的关税减让。事实上,加入

WTO以来,中国已把进口美国最重要商品的平均关税从25%下降到7%,显著增加了一系列美国出口商品的市场准入⁵¹。

中国在2012年已实施了几轮关税下调。1月份,它降低了约730种商品的临时进口关税税率,其中包括能源和原材料、高科技制造设备、农业生产物资、食品和公共健康产品。4月份,中国进一步降低了对某些进口产品的关税,其中包括分切刀片切纸机(从8%降到3%)和显微镜物镜(从15%降到10%)。在第四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中国承诺将在2012年底前对进口关税进行新一轮削减。

对促进双边贸易的建议

美国和中国都认识到,实现更加平衡的贸易关系可以促进两国的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稳定和促进国际安全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下面是对推动双方未来十年双边贸易的建议:

1. 在美国和中国商会的参与下,两国应在反倾销、反补贴和其他贸易问题方面建立信息共享和早期预警机制,以避免决策失误。
2. 中美两国政府必须就他们在世贸组织争端达成快速解决。迅速解决这些争端可以防止问题进一步扩大到其他不相关领域,并会减少两国采用纯粹的以牙还牙的报复行动。
3. 生产分散化和销售网络全球化的兴起,使得外国直接投资和贸易之间的互补性越来越

⁵⁰ 美国财政部,第四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联合经济事实跟踪清单, <http://www.treasury.gov/press-center/press-releases/Pages/tg1567.aspx> (2012年4月5日)。

⁵¹ 美国贸易代表,2011年就中国履行WTO义务的情况向国会提交的报告,2011年12月发布,第28页。

图表23: 第四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所取得的成果

加强宏观经济合作	推进持久的全球经济复苏, 并建立一个强大、可持续与平衡的未来全球增长。 美国计划走以增加投资、出口和总储蓄率为特点的经济增长模式。 中国计划转变经济发展模式, 主要是通过增加消费来改善民生, 扩大内需。进口关税将进一步下降。 双方都计划建立更加市场化的汇率制度, 增强汇率灵活性。
促进贸易和投资开放	改善对本国经济和全球经济开放、公平和透明的投资环境。 构建更加开放的全球贸易体系, 共同抵制贸易保护主义。 加强执法力度, 打击知识产权侵权行为。
国际规则和全球经济治理	建立由出口融资主要提供者组成的国际工作组, 创建一套针对符合最佳国际惯例的官方出口融资指南。 加强区域自由贸易协议的信息交换。 对双边贸易方式进行深入研究。

来源: 美国财政部, 第四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联合经济事实跟踪清单, 2012年4月5日。

- 强。中美双方应建立一个双边投资委员会来促进在制造业和服务领域的投资, 并就有关双边投资的法律和政策定期交换意见。
4. 美国扩大高科技产品对中国的出口是缓解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一个重要举措。双方应促进高技术产品贸易, 美方应进一步放宽其出口控制。
 5. 双方应为中小企业组织特别的贸易展销会, 以促进美国对中国的出口, 并加快建立省与州、城市与城市之间的伙伴关系。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是世界上最大的制成品交易会, 对促进中国的出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美国为帮助中小企业把产品销售到中国, 可(在旧金山那样的城市)设立类似的交易会。
 6. 双方应共同防止贸易问题政治化。应及时通过沟通解决争议, 避免可能的争端升级。智库学者应建立专门的研究团队, 开展合作研究和实施其他项目, 这样双方才能对共同关心的贸易问题形成整体的共识。
 7. 迄今已有近150个国家承认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但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却由于政治、外交和意识形态等原因, 至今没有这样做。中国为获得这些国家对中国经济地位的认可, 还需加快市场化改革步伐⁵²。
 8. 世贸组织多哈回合的多边贸易谈判从2001年开始后的进展一直很慢, 而且近期看不到有结束的迹象。造成谈判僵局的原因主要是包括美国、欧盟、中国、巴西和其他主要贸易国家的立场存在根本的分歧。美国和中国应该共同努力, 实现多哈回合谈判取得圆满结果。
在多哈回合贸易谈判不能取得进展的情况下, 很多国家已经把精力转向更小、更集中的议题。例如, 美国和韩国之间的双边自由贸易协议(FTA)已于2012年3月正式生效。美国还在进行亚太地区的贸易协定谈判, 被称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协定的谈判就是以达成一个广泛的区域协定为目标⁵³。日本、中国和韩国也曾计划在2012年开始三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9. 美国和中国可以开展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可行性研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CCIEE)估计, 如果中国和美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话, 关税可降低10%, 2011年中国经济可增加3.93%, 同期美国经济可增加0.45%⁵⁴。中美自由贸易协定将进一步促进两国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 更为重要的是, 这会给世界市场带来信心。

52 根据世贸组织的规则, 中国将在加入世贸组织15年后获得市场经济地位。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 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最迟会在2016年得到所有世贸组织成员的承认。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未能得到有些国家的承认, 中国产品的成本要按照替代国的市场价格计算。而替代国的成本往往比中国的实际成本高很多。由于计算标准不是中国的实际成本价格, 就使得中国企业容易遭受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

53 《经济学人》杂志信息部全球预测服务(2012), “双边贸易交易正在前行”, 《经济学人》杂志。

54 魏建国(2012), 《自由贸易协定的过程需要时间》,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结语

一些经济指标表明，全球经济正在趋于稳定，而欧元区的债务问题仍给全球金融系统带来风险。贸易保护主义也可能会拖累贸易增长。很多政府的紧缩政策导致很多发达国家失业率居高不下。越来越多央行采取“量化宽松”政策导致对汇率的普遍顾虑，有些国家已经表达了他们对本国出口竞争力的担忧。这一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引起很多新兴国家对全球资本流导致的资产泡沫和通胀的忧虑。贸易保护主义，资本流控制以及其他针对这一新经济政策环境不确定性的行政手段仍将成为全球的挑战。此外，《巴塞尔协议III》的落实和执行会对金融交易的定价和供应造成负面影响。全球经济复苏的道路充满挑战。

中美两国政府和两国企业界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合作，使双边贸易关系在过去30年取得了积极进展。由于经济复苏的道路仍崎岖不平，双方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以充分发展商业关系和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为企业、雇员和消费者带来更大的共同利益。

参考文献：

波音公司(2011年)，“中国批准购买200架波音飞机”，西雅图，波音通讯

陈锡康、郑国汉、冯国钊、刘遵义(2007年)，“出口导致的本土增值和就业增加估计：中国出口对美的应用”

《经济学人》杂志信息部全球预测服务(2012)，“双边贸易交易正在前行”，《经济学人》杂志

Erik Britton, Christopher T. Mark, Sr. (2006)，“中国影响：评估美国与中国进行贸易和投资的影响”，牛顿经济和 the Signal Group.

Galina Hale and Bart Hobijn(2011)，“中国制造的美国内容”，FRBSF 经济通报

Harold L. Sirkin、Michael Zinser、Douglas Hohner和Justin Rose(2012年)，“美国制造已近顶峰：哪个行业、为何以及何种程度”，美国波士顿咨询集团

Harold L.Sirkin、Michael Zinser和 Douglas Hohner(2011)，“美国制造的回归：为何制造业会重返美国”，美国波士顿咨询集团

Ian F. Fergusson和Paul K.Kerr(2012年)，“美国出口控制体系以及总统的改革倡议”，华盛顿美国国会研究服务研究报告

美国商务部国际贸易局(2010年)，“出口支撑美国就业”，华盛顿美国商务部

James Fallow (2007)，“中国产，世界用”，美国大西洋月刊

冯国钊和刘遵义(1998年)，“中美双边贸易差额：到底有多大？”，太平洋经济评论，第33-47页

冯国钊、刘遵义和熊艳艳(2006年)，“中美双边贸易差额的调整估计更新”，太平洋经济评论，第299-314页

Kenneth L.Kraemer、Greg Linden和Jason Detrick(2011)，“抓紧全球网络的价值：苹果的iPad和iPhone”，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和美国雪城大学



刘遵义、陈锡康、郑国汉、冯国钊、裴建锁、宋恩荣、唐志鹏、熊艳艳、杨翠红和祝坤福(2006), “中美贸易差额就本土增值量的估计”, 斯坦福大学国际化发展标准中心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的声明》, 2012年6月19日

美国贸易代表, 2011年就中国履行WTO义务的情况向国会提交的报告

Wayne M. Morrison (2011), “中美贸易问题”, 华盛顿国会研究服务专题报告

美国财政部, 第四次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联合经济事实跟踪清单, 2012年4月5日

Wayne M. Morrison 和Rachel Tang (2012), “中国稀土行业和出口体系: 对美国的经贸影响”, 华盛顿国会研究服务专题报告

魏建国(2012), 《自由贸易协定的过程需要时间》, 北京,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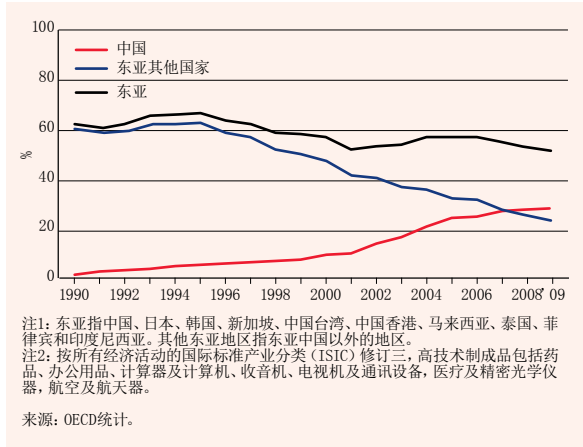
白宫(2011), 总统的经济报告, 于2011年2月与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年报一起提交国会, 美国华盛顿

世贸组织(2012), “总干事就贸易相关发展的报告(2011年10月中旬-2012年5月中旬)”, 世贸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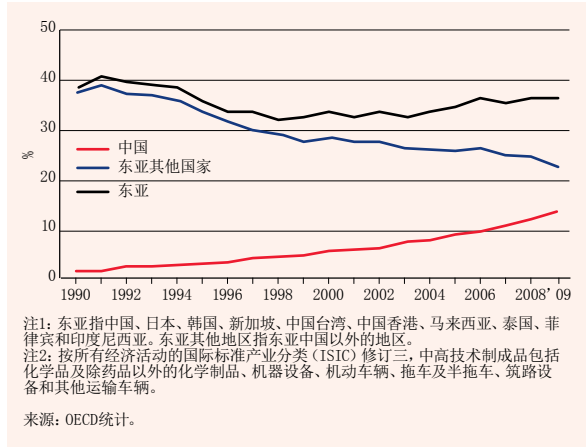
世贸组织(2012), “中国的贸易政策报告”, 世贸组织

附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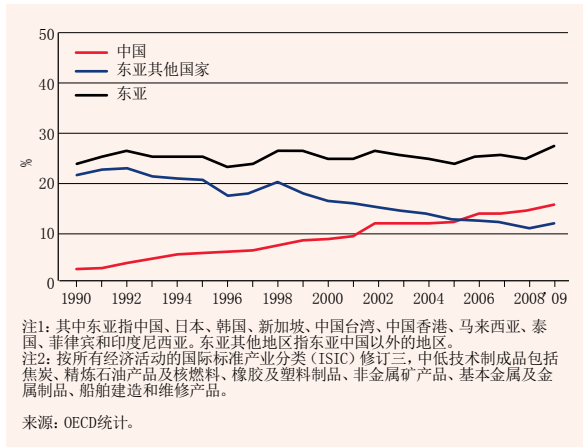
图表1A:美国自东亚进口高技术产品的比重(1990-200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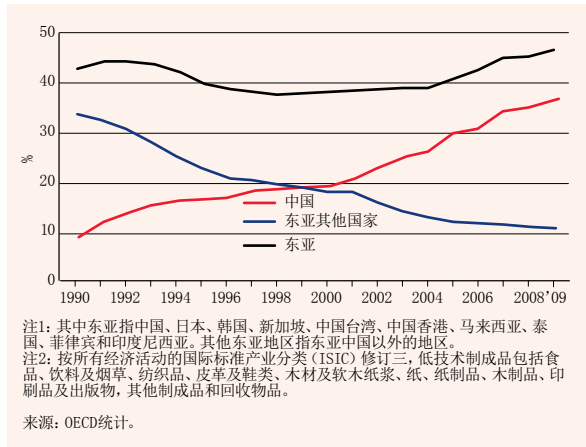
图表2A:美国自东亚进口中高技术产品的比重(1990-200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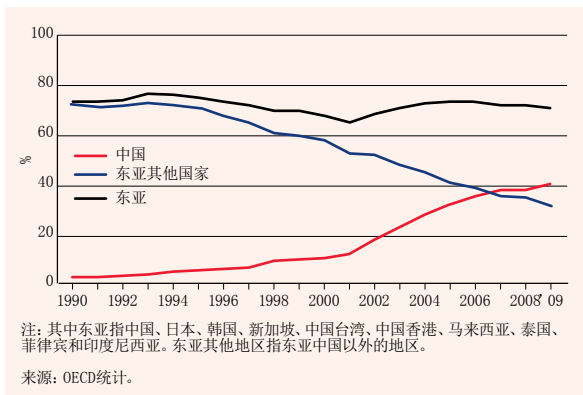
图表3A:美国自东亚进口中低技术产品的比重(1990-2009年)



图表4A:美国自东亚进口低技术制成品的比重(1990-2009年)



图表5A:美国自东亚进口ICT产品的比重(1990-2009年)





第二章

中美之间经济互补性的演变

刘遵义

香港中文大学蓝饶富暨蓝凯丽经济学讲座教授、中投国际(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永军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经济研究部副主任

参与撰稿人:曾少军

摘要

中美两国在经济发展所处阶段、资源、劳动力、资本、科学技术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这种差异构成中美两国经济合作的基础和互补性，两国的比较优势由此形成。尤其是中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一些重要自然资源短缺，如能源和水资源等，为两国提供了双赢的经济合作机会。利用美国的技术来解决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不仅给美国公司提供了商机，也有利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同时有助于减轻全球面临的共同问题。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中国对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大量投资，中美两国比较优势逐渐改变。许多亚洲经济体（比如日本、韩国、台湾）的发展经验显示，比较优势不是像传统教科书理论所说的那样仅取决于要素禀赋，而是可以通过一段时期逐渐获得。中国肯定也会效仿，力图从低成本、劳动力密集、装配型生产经济转变为在多个领域具备竞争优势的经济体。

然而，即使中国逐步走向现代化，中美两国经济合作的潜力也不会减小。例如，随着中国消费者收入的增加，中国市场的重要性日益显现。鉴于中美两国经济的巨大规模、美国经济不断自我改造的能力以及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可以预见，无论是规模还是复杂程度，中美两国经贸合作方面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依然很大。

中美两国的经济合作不仅仅局限于两国的双边关系。在这个联系日益密切的世界，中美两国的经济合作是全球商品和服务供应链、相互关联的全球投资流向，以及技术、人力资源和商业机会交流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已经成为亚洲和美国之间多种商品供应链中的关键环节。展望未来，随着新兴经济市场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中美两国在第三方市场进行合作的机会也非常充裕，这是因为美国在技术方面占优势，而中国在发展中国的实际操作经验更丰富。中美两国的经济合作不仅仅对于两国的经济来说很重要，对于世界来说也是如此，既有利于世界经济增长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又有利于应对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和全球治理等全球面临的挑战。

中国的储蓄率比美国高得多，这是因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人口组成也更年轻化。因此，即便中国国内的投资率较高，中国仍出现净储蓄投资盈余。这一情况与美国在过去二十年间的低储蓄率和持续的经常项目赤字形成了对比。然而，过去美国对华直接投资远远超过了中国对美直接投资，这是由于美国的技术和管理水平较高，而且美国企业的全球市场覆盖能力也比中国企业强。不过，过去几年中国政府对美国的证券投资也很大，这可以通过中国持有大量美国国债看出来。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近年来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也迅速增加。然而，从长期来看，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中国的储蓄率会下降。由于中国和美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两国的储蓄投资情况反映了两国具有差异性和快速变化的经济、社会和人口状况。投资活动对两国经济和全球金融市场的发展将产生显著影响。两国在促进储蓄和投资的有效配置方面合作空间很大。

美国一直以来都是，并且仍然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但最近几年的发展情况显示美国经济需要进行再平衡，从过度消费和经常项目赤字转变为增加出口。中国已经成为出口制造大国即世界工厂，但也日益成为世界市场，因为中国需要进一步改革经济，以更多依靠内需而不是出口来拉动



经济增长。中美两国都需要借助对方的力量进行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同时也需要对过去中美两国经济合作中的思维和政策进行深刻的前瞻性检讨。

就GDP和国际贸易而言，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两国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美国是技术最发达的国家，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新兴经济国家。

中美之间经济互补性的演变

一、由于生产要素丰裕度不同和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中美两国间的比较优势非常明显

2012年，美国总劳动人口为2.09亿，中国是10.04亿，几乎相当于美国的5倍。中国的耕地面积是1.22亿公顷，占其国土总面积的12.7%。美国的耕地面积为1.63亿公顷，比中国多33%，占其国土总面积的20%。

美国生产部门的人均有形资本比中国高出12.5倍，矿业的人均有形资本比中国高出90倍，公共部门人均有形资本比中国高出14.5倍。

近年来，中国加大了对各级教育的投资，但在人力资本投资方面还需要迎头赶上。中国大学的入学率是25%，而美国的入学率是86%¹。2010年，美国大约有6,250万人拥有学士学位。对于25岁到64岁的人口来说，拥有学位的比例是31.7%。中国2010年大学毕业总人数为1.196亿。对于25岁到64岁的人口来说，拥有学位的比例是9.7%。

美国成功地建立了诸多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和科研实验室（这可以通过诺贝尔奖的获得数量体现出来）。美国大学像磁铁一样吸引着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前去学习。事实上，美国最好大学的某些院系有大部分学生来自美国之外。这些毕业生中的很大一部分最后都留在了美国工作，或

者即使去了世界其他地方工作也和美国保持着密切联系。这就使得美国能建立一个全球性的校友网络，这些校友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和经历。近年来中国的大学入学比率显著增加，但中国大学的教学质量和排名还需要进一步提高²。

美国在创新方面全球领先，在科学和技术水平方面远远超过中国。就国内生产总值中研发费用所占的比率而言，美国总是保持2.6%到2.8%的水平，而中国经过努力在2011年的比率才达到1.81%³。

中美两国的煤炭资源、页岩气乃至页岩油等资源都很丰富。两国间可能会有双赢机会进行技术合作⁴。中国的人口占世界的百分之二十，但只有世界百分之七的淡水资源，且淡水资源分布不均衡。解决中国对水资源的需求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中国从美国进口包括肉类的农产品，用肉类进口取代原料进口，实际上是进口水资源的方法之一⁵。

美国在创新和科学技术方面领先于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系统集成也领先于中国。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里，知识和技术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寻求，这种系统集成的能力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竞争力指标。另一方面，中国在技术应用方面进步非常快，随着中国工业化的推进，技术应用的广度和深度在不断拓展。

1 注：数据来源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2011年全球教育摘要。入学率指的是某教育水平学生的入学率，主要表现为占该教育水平学生人数的百分比。

2 请查看本报告末尾的附录一和附录二以获取两种不同的世界大学排名。
3 详细信息请查看第11篇分报告。
4 请参看第11篇分报告获取更多细节。
5 请参看第9篇分报告获取更多细节。

图表1: 资本、劳动力、土地、人力资本及研发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比较

	中国			美国		
	2010	2011	2012	2010	2011	2012
有形资本 美元 (十亿) (2011年价格)	14,256	16,136	18,093	23,435	23,322	23,289
劳动人口 (百万人口)	999	1,003	1,004	207	208	209
就业 (百万人口)	761	764		139	140	
耕地面积 (百万公顷)	122	122	122	163	163	163
高等教育入学率 (人数)	5,754,200	6,082,000		2,997,614		
研发资本 美元 (十亿) (2010年价格)	382	450		3,251	3,334	
美国专利数量 (单位)	2,657	3,174	4,637	107,792	108,626	121,026

资本流量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和国际金融统计数据库。资本存量由刘遵义教授估算。
中国: 中国统计年鉴2012表3-3; 2012年度统计报告数据。美国数据: 世界发展指标。

中国: 数据来源于2008年人口调查; 美国: 来源于世界发展指标 (仅于2009年发布)。
中国和美国人口普查数据。
研发支出数据: 来源于经合组织数据; 研发存量由刘遵义教授估算。
数据来源于http://www.uspto.gov/web/offices/ac/ido/oeip/taf/cst_utl.htm

图表2: 中美两国生产要素所占比较

	中国			美国		
	2010	2011	2012	2010	2011	2012
劳动人口人均有形资本 (2011 千美元)	14.265	16.090	18.020	113.407	112.322	111.430
劳动力人口人均面积 (公顷)	0.0012	0.0012	0.0012	0.0079	0.0078	0.0078
劳动力人口人均研发资本人口 (2010 十亿美元)	382	449		15,731	16,058	
每千劳动人口的美国专利授权	0.0027	0.0032	0.0046	0.5216	0.5232	0.5791

由以上图表1的数据计算

但是, 随着中国技术水平的提高, 中美两国合作的机会也不断增加, 其中包括联合开发第三方市场商业的潜力。例如, 在核技术领域, 中国近些年已建立众多核电站以满足对能源的需求。在这个过程中, 中国从美国和其它发达国家进口了多种核技术, 并获得了许多实际应用经验。这也为中国与美国合作一起将第三代核能源出口到第三方国家提供了新机会⁶。

二、中国的竞争优势及其对未来中美经济合作的影响

传统教科书关于贸易的理论重点在于不同生产力要素差异所产生的比较优势。此类理论能帮助理解在资本和技术方面具有优势的发达国家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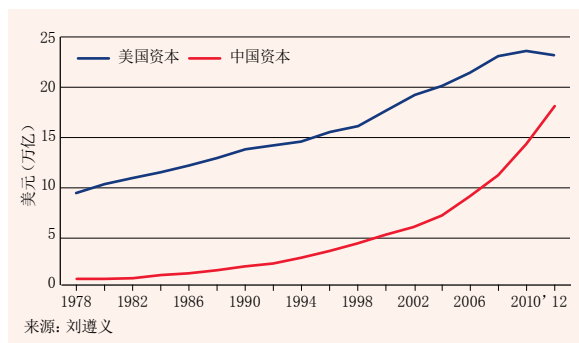
在资源方面具有优势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情况。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 其竞争优势主要在于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这也导致了外国直接投资的大量涌入, 主要是利用当地低廉的劳动力成本, 创造物美价廉的消费产品供出口。

随着中国经济的逐步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加速推进, 其竞争优势也在发生变化。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大量投入, 通过增加教育机会、学习及实践机会不断提高劳动力质量, 以及改善包括精简政府法规在内的软件基础设施, 能显著提高制造行业的效率和生产能力。

中国经济规模庞大, 许多行业的上游和下游之间的联系在不同地区发生着变化, 从而使得供应网络联系紧密且不断发展。这类生产者的联合能发挥网络效应、促进中国企业竞争力提升, 例如在供应商中变得更具竞争力, 投入的选择和变量类别增加, 劳动力资源的获得也更有

⁶ 请参看第11篇分报告获取更多细节。

图表3: 中美两国的有形资本, 美元 (10亿), 2011年价格



图表4: 大学毕业生一本科学位或以上—按年龄段, 2010年

年龄段	美国		中国	
	人数 单位: 千人	年龄段 (%)	人数 单位: 千人	年龄段 (%)
25 - 34	13,480	32.81	15,874	8.01
35 - 44	13,378	33.08	8,781	3.62
45 - 54	13,061	29.43	3,895	2.11
55 - 64	11,229	31.72	1,388	0.99
15 - 64	51,148	31.71	29,937	3.41

资料来源: 美国人口调查局; 中国国家统计局

效, 行业内和行业间的供应链效率更高、成本更低。紧凑的供应链网络也使得网络内的公司反应时间更短, 并更快地应对市场环境变化或消费者需求的变化。当今商业社会的变化速度不断加快, 这种网络效应能提高所有供应链内公司的全球竞争力。

同时, 中国经济增长导致其国内市场的扩张, 其重要性不断提升。这也是全球企业都想要在中国投资或对中国行销的重要原因, 因为对于中国当地市场的更深入了解并在中国市场取得成功, 已经成为全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许多行业和公司来说, 中国经济规模大意味着在许多商业领域, 从规模经济中获得提升并受益的潜力巨大。在中国市场获得成功能使企业在全全球市场竞争中获得规模优势。这也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近年来开始向海外市场扩展的原因, 在这之前他们在中国国内市场已经站稳了脚跟并已具有一定规模。

中国及在华企业的比较优势在不断变化。这意味着中美两国的经济合作基础将不断发生变化, 其合作在本质上要求两国在思维和方法上有所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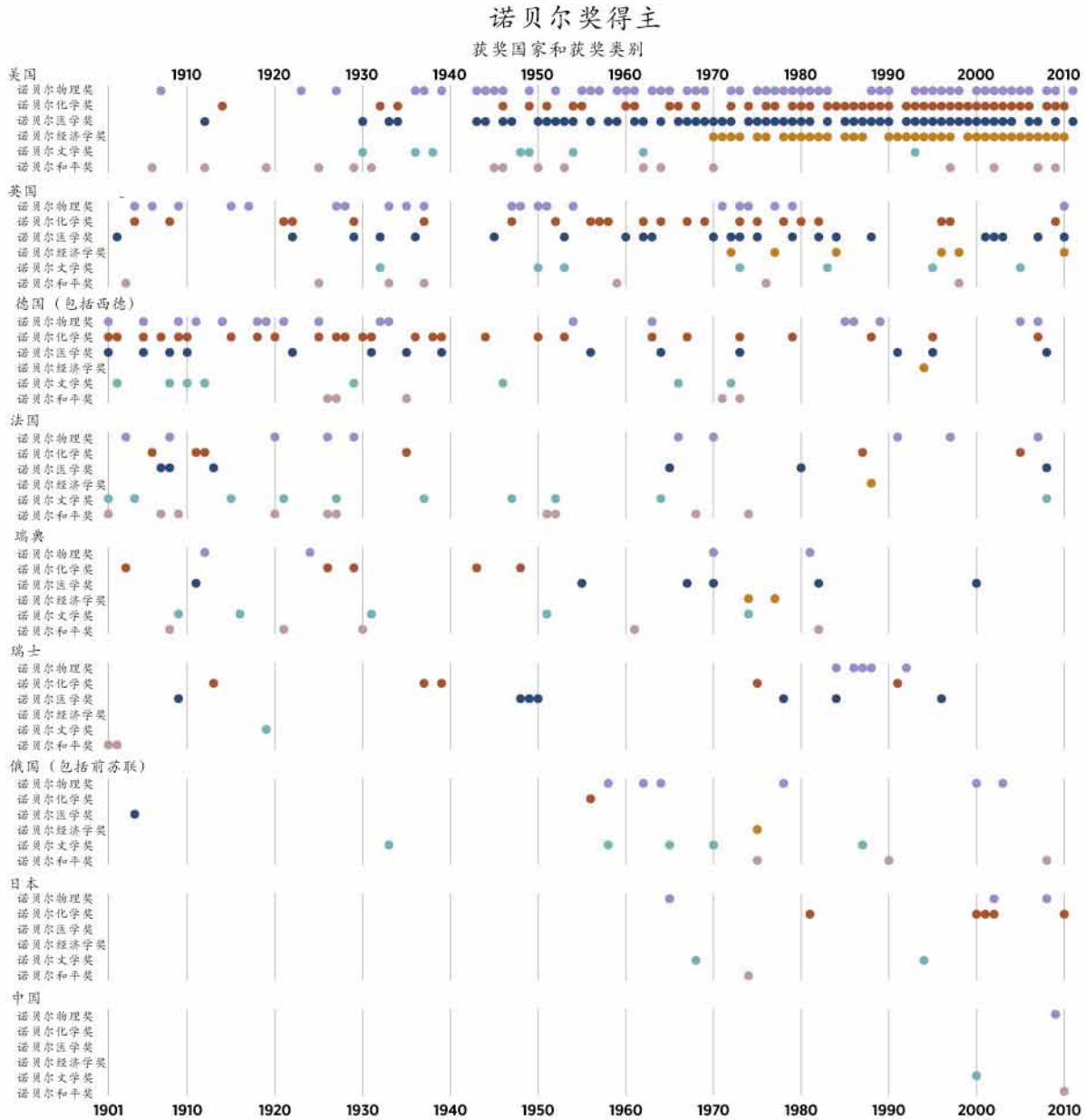
生产力要素和比较优势理论意在解释出口产品的工业国家和出口原材料的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贸易的益处, 然而很长一段时间的观察显示, 世界贸易的很大一部分都是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 例如, 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 多数是制成品的贸易。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和进口国列表中大多数是发达国家。而且这种贸易的一大部分是“产业内”贸易, 而不是“产业间”贸易, 即专业生产某产品零部件的生产者进口其不生产的部件。因此, 这种“类似产品”贸易可能无法用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和生产要素理论进行解释。

消费者对多种产品中某种产品的偏好能帮助解释发达国家之间所进行的消费品贸易。即使贸易参与国技术水平相同、资本劳动力要素比例类似也能进行这种贸易。这也是北京的消费者可能在麦当劳进餐而美国消费者则在中国人开办的中式餐馆进餐的原因⁷。

保罗·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进一步解释了经济规模扩大、回报增加的现象(即生产规模扩大, 则单位产品的成本下降), 公司可以选择在一个地方生产以满足不同地区的消费者需求, 而不是在不同消费者附近分别进行生产, 只要运输成本不至于产生太大的影响就行。另外, 规模收益增加也会导致垄断性竞争的市场格局形成, 导致小部分生产者垄断全球市场。“由于规模经济的影响, 市场竞争性不够。但是, 这也意味着即使是两个在消费品味和倾向、技术和生产力要素方面类似的国家之间也能进行贸易,

⁷ 请查看泰勒·考恩2008年10月13日发布的关于边际革命的博文文章: “什么是新贸易理论”, 网址: <http://marginalrevolution.com/marginalrevolution/2008/10/what-is-new-tra.html>。

图表5: 美国在科技领域的领导地位 (以诺贝尔奖获得情况衡量)



Forbes blogs.forbes.com/jonbruner

来源: www.nobelprize.org



并从贸易中获益”⁸。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不仅仅解释了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大量贸易，也描述了生产者的区位选择策略是如何在工业生产中形成特定地理模式的动态过程。

“新贸易理论”还说明尽管在过去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模式主要是由相对经济优势驱动的，然而两国间生产要素的差异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以及未来经济合作的潜力仍非常重要。即使未来两国的差距缩小，情况亦是如此。

中美两国经济规模庞大，同时中国经济的发展变化又非常快，美国经济又总是以自我改造而闻名，这都说明两国经济合作的机会非常多⁹。但两国政府都需要有开放的心态，利用机会促进合作，消除出现的合作障碍。例如美国对中国出口的旅游服务就将在未来几年显著增加，但是这也要求加快签证流程为此提供便利¹⁰。

另外一项值得注意的重大进步就是“南-南”贸易和投资的增长。例如，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数据显示，发展中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占世界总出口的比例从1990年的百分之十二增加到了2010年的百分之二十三¹¹。由于这种变化是经过较长时间而发生的，此类贸易规模的扩大也日益重要起来，且随着新兴经济持续发展，这种贸易的快速增长带来了重要的商业机会。虽然这种“南-南”贸易发生在发展中国家，贸易的很大一部分却是由这些新兴经济之外的境外企业和跨国企业所进行的。例如中国出口有超过一半是由位于中国国内的外资企业进行的。“南-南”经济的快速增长也为中美经济进一步合作提供了更广泛的空间和机遇。

三、全球化背景下的中美合作、生产分散化和供应链的全球一体化

随着过去几十年间经济和贸易政策的自由化、信息革命和技术的显著进步，全球化的趋势出现，这使得生产分散化，全球供应链系统也在不断发展。从上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这种进程的势头进一步加快。

在东亚，全球供应链的发展在上世纪的70年代和80年代主要体现为亚洲制造业生产的“雁型模式”，由日本领头，亚洲四小龙紧随其后（其中包括中国台湾、韩国、香港和新加坡），其后是东亚其它国家（大体是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低成本生产逐步转移至低成本经济体而发达经济体则注重关键零部件和高技术投入品的生产。

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东亚的全球供应链发展提供了新的领域和驱动力。随着中国经济的起飞，中国生产投资快速增长。在上世纪80年代，一开始主要是加工生产外向型经济，主要是由香港和台湾生产厂家在中国大陆的沿海地区进行生产。伴随着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全世界其他国家的投资者开始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投资。中国的产业领域不断拓宽，技术水平也不断提高。

一开始，大部分外国生产型投资集中在下游的生产加工，意在利用中国作为生产基地，将所生产产品出口到世界其他国家。这一现象的部分原因是中国政府的政策要求这些制成品应主要用于出口，另一部分原因是当地市场没法进行此类产品的生产。

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东亚的生产格局逐步改变，因为亚洲其他地区要适应中国这一重要生产大国的崛起。这也导致了发达的东亚经济体将低附加值的生产转移到中国，而这些经济体更加专注于零部件的生产或是自然资源开发领域。例如，过去韩国和台湾在鞋业制造方面占据优势，现在这样的产业已经不再具有优势。

⁸ 请查看保罗·克鲁格曼在1979年11月发布于国际经济刊物上的“不断增加的回报、垄断性竞争和国际贸易”一文的第469至479页。

⁹ 请查看第5篇和第6篇分报告关于中美贸易预测的内容。

¹⁰ 请查看第10篇分报告获取更多信息。

¹¹ 请查看2012年6月联合国贸易暨发展会议发布的“南-南贸易监控情况”。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大多数的鞋业制造工厂迁移到了中国。到上世纪90年代，电脑和其他电子产品的组装也转移到了中国。中国制造业所需要的零部件、机械设备以及化学或原材料则从世界的其他国家进口。上游生产流程如产品设计和原型生产，以及下游生产流程如市场及配送、客户服务则大部分在中国以外的地方进行。

同时，中国本土企业日益成熟，转而成为全球供应链的一部分。

中国的巨大规模意味着可以保持多个行业的规模经济。中国能吸收较多的上游、下游生产和相关行业，从而产生聚集效应和协同效应，而且这些相关的公司和行业也能快速地对市场做出反应。中国因此成为许多国家重新调整全球价值链决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深刻影响了东亚商业活动的重组，结果是越来越多的行业和公司将中国作为成品的装配地，然后进行出口，很大一部分是出口到美国市场。

中国出口的快速增长也反映了越来越多的公司和产业重新调整全球范围内的分工合作，许多跨国企业越来越多地将中国作为其产品的最后组装地，出口到世界其他国家。中美贸易，从实质上来说已经不再是两国之间的贸易。中美贸易实质上代表了全球供应链的一部分。例如中国对世界其他国家出口的一半都来自于外资企业或中外合资企业，其中许多是美国企业。中国对美国的双边贸易顺差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其他经济体对中国贸易顺差的一种转移¹²。

中国出口到其他国家的产品的中国的跨国企业进行生产的同时，利润大部分都被跨国公司获得（因此，销往欧洲的苹果产品可能会作为中国产品出口，因为产品是在中国进行组装的，但大部分利润被美国苹果公司获得。从苹果公司看来，它并不拥有组装i-Pad平板电脑的富士康

(Foxconn)公司，富士康是在香港上市的一家台湾公司)。而在其他情况下，跨国公司也有其本土制造商，本土制造商将部分或全部分享其资本的附加值回报。由此，在中国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就被国外资本所有者获得。这也成为外国直接投资者所在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

新兴国家作为越来越重要的市场崛起，为中美经济合作创造了更多机会。在这个“2.0版全球化”的世界，新兴经济占据了全球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和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已经进入了国外扩张的时期。这些中国企业非常了解新兴国家消费者的需求，在新兴经济体的不同运作环境中的实际操作经验丰富。这些中国企业因此也成为了在全球覆盖面积广阔、有强大的品牌资源和技术实力的美国跨国公司的良好合作伙伴。

四、人口和经济发展差异导致中美两国在储蓄和投资方面具有互补性

中国的储蓄率高于美国，因为中国还是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人口年龄也相对年轻。即使是国内投资率高，中国仍然是一个净储蓄投资盈余的国家。这与近些年来美国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美国的储蓄率低，且经常项目持续存在赤字。

由于美国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较高，美国企业的全球覆盖率也比中国企业更为广阔，美国对华直接投资远远超过了过去中国对其他国家的直接投资。过去中国对美国的证券投资巨大，这可以通过中国所持有的大量美国国债中看出来。展望未来，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的储蓄水平会下降，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将增加。中国和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两国的储蓄和投资情况对方都将产生深远影响，也将影响全球金融市场的发展。两国加强合作的空间依然

¹² 请查看第一篇分报告获取更多信息。



很大，从而可以促进储蓄和投资进行更有效的配置¹³。

五、中美两国都需要再平衡并进一步加强经济合作

在2005年到2007年的时间里，世界经济经历了最快的高速增长时期。可以明确的是，这种快速增长明显是不可持续的。在许多发达国家，金融体系以过高的杠杆比率配置资产，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积累的债务太多。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标志着全球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转折点，许多发达国家不得不开始艰难的去杠杆化进程和宏观经济的“再平衡”。这些发展情况对新兴世界国家的经济增长也产生了影响。

在美国，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经济增长是由一系列因素支撑的：过度消费、很低甚至是负数的家庭储蓄率、金融市场过热推动住房价格上涨、持续的财政赤字和不断增加的经常项目赤字。由于2007/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水平急剧恶化。

由于家庭财务需要去杠杆化遏制了消费需求的恢复，经济疲弱导致失业率较高和收入增加缓慢，政府债台高筑、政治出现僵局导致其无力提供更多刺激经济方案，因此，增加出口是使美国重回可持续发展轨道的重要一环。的确，这也逐渐成为事实。

中国近些年经济发展的特点是“不稳定、不均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经济增长过分依赖于出口和过度投资。有必要扩大内需以促进经济增长。同时还迫切需要通过提高经济效率来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进行技术升级、投资人力资源、鼓励创新、促进“包容性增长”、避免环境恶化。世界银行已经不止一次提醒中国，如果中国

未能解决上述问题就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的“十一五”规划和“十二五”规划也强调要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并且这种结构调整已经在慢慢发挥作用。

在前进的道路上，中美两国都需要在经济再平衡的过程中借助对方的力量以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中国对美出口的快速增加在过去帮助了中国的经济发展，那么美国需要在中国鼓励拉动内需的情况下加大进入中国市场的力度并以此促进自身的经济发展。除了直接出口产品到中国外，美国也可以从服务出口中获益。旅游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第十篇分报告会进行更详细的讨论。

中国需要继续从美国获得技术支持以升级其经济结构，而美国则需要出口技术以获得商业竞争力。过去，美国投资的一大部分都流往中国，而在未来十年间中国对美国的投资将显著增加。

认识到中美经济的这种模式转变非常重要。未来十年促进中美经济合作的要素将不同于过去数十年间。要促进中美合作的发展，两国政府都有必要对政策和看待问题的视角进行反思并一致向前看。

¹³ 请查看第12篇分报告获得更多信息。

附录一

图表1A: 世界大学排名 2011-2012

世界排名	大学	国家
1	国家	美国
2	哈佛大学	美国
2	斯坦福大学	美国
4	牛津大学	英国
5	普林斯顿大学	美国
6	剑桥大学	英国
7	麻省理工学院	美国
8	伦敦帝国学院	英国
9	芝加哥大学	美国
10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美国
11	耶鲁大学	美国
12	哥伦比亚大学	美国
13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美国
14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美国
15	瑞士联邦理工学院苏黎世分校	瑞士
16	宾夕法尼亚大学	美国
17	伦敦大学学院	英国
18	密歇根大学	美国
19	多伦多大学	加拿大
20	康奈尔大学	美国

来源:《泰晤士高等教育》, <http://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uk/world-university-rankings/2011-2012/top-400.html>。



第三章

未来十年全球和中美经济展望与挑战

迈克尔·斯彭思

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摘要

发达国家目前占全球经济总量约50%。各国仍在苦苦挣扎，希望恢复其增长和就业的可持续模式。其中，美国经济进一步去杠杆化，经济开始增长，但尚未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且就业情况仍然滞后。相对而言，发展中国家经济都在增长，有一定适应能力，即便面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超低的大环境，发展中国家仍在某种程度上能保持可持续发展。中国正向中等收入国家转型，中国经济

在供应方面变化迅速，逐步转向国内消费以及高回报投资并伴随着高附加值出口的发展模式，这日渐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创新、竞争以及市场化在这一转型过程中至关重要。新一届领导面临的主要经济挑战在于如何实施多项相应的改革措施，支持这一正在变化的发展模式。概括而言，中美两国都在未来十年面临重大、艰难的经济挑战。建立互助互惠的关系极有助于两国获得成功，并将惠及全球其他经济体。

未来十年全球和中美经济展望与挑战

一、导言

未来十年，全球及个别国家将出现重大经济结构调整，其速度和效果难以预料，也因此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2008年以前，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发达经济体通过大量借债推动经济增长，这些债务有的来自私有部门（家庭、公司和金融机构），有的来自公共部门。这种增长方式还包括过度消费而投资不足以维持增长。部分国家金融部门行为失当和缺乏监管也助长了这种无法持续的增长。最终，这种不健康的生长动力在2008年戛然而止。

我们正处于去杠杆化的过程中，需要逐步降低债务水平。在这个过程中，国内总需求下降，导致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丧失了许多就业岗位。目前，去杠杆化尚未完成。总体

上看，私有部门债务持续下降，而政府部门债务则在上升。

美国和欧洲低利率或负利率的货币政策也有助于去杠杆化的实施，这些政策降低了高负债给经济造成的损失，加速了资产价格（包括房产价格）回升，从而改善了资产负债表，降低了财富缩水对消费产生的不良影响。然而，与此同时，储蓄者资本收入受损。此外，低息还可能导致经济增长重新回到借贷消费的模式上。

需求长期不振意味着经济增长还将低迷一段时间。在开放的全球经济环境中，经济复苏在一定程度上还要依赖向仍在增长的市场的出口。但是，我们很容易忽视的一点是，这种增长潜力只适用于经济的可贸易部门。最近的研究表明，通常情况下，发达经济体可贸易部门大约占全部产出的三分之一，在就业中所占比重略低于三分之一。不可贸易部门产值更大，而且完全依赖于



国内总需求。由此我们认为，过去4年多一直受到需求拖累的经济增长模式还将延续一段时间。

欧洲（特别是欧元区）饱受上述因素困扰，再加上自身缺陷（形成货币同盟而没有形成财政和政治同盟），这导致欧元区在应对主权债务危机和相关系统性风险时明显力不从心，在解决经济增长中面临的结构调整问题，以及提高生产率和竞争力方面，也显得无能为力。事实上，欧洲大部分国家已经处于负增长，这种情况还将持续几个月。

最近，意大利和西班牙这两个系统重要性国家承诺实施财政稳定政策和经济改革，而以德国和其他欧元区核心国为后盾的欧洲央行则着手稳定主权债务市场（避免超额收益增加和信用风险出现危害性“自我实现”式上升），这缓解了欧元区的系统性风险。欧元区还承诺将于2013年实现银行系统稳定和统一监管的目标。

虽然情况得到了改善，但系统性风险仍然没有消除。实现稳定的过程尚不彻底，仍存在不确定性风险，同时，财政稳定性措施也将进一步延缓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全面复苏。

发达国家依然占有全球经济产出的一半以上，上述增长趋势说明，未来五年发达国家需求十分有限，这也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只有通过创造内部需求才能实现高速增长。这与过去的情形完全不同。过去，发达经济体经济规模大，增长稳定，发展中国家只需要将经济增长的重点放在供给、生产率、竞争力和结构转型等方面。虽然这些供给面的发展战略很重要，但目前如何创造足够的需求也成为关键。

由此，我们认识到，发展中国家经济规模扩张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趋势，这种规模扩张是由国民收入增长和需求快速转型造成的，还可以表现为全球中产阶级及其购买力的爆炸式增长。这一趋势对于中国和其他主要发展中国家制订成功的经济增长战略具有重要意义，为小型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巨大的潜在市场，同时也为

发达国家在全球供应链中附加值较高的可贸易部门提供了难得机遇。

发展中国家将继续在可贸易部门的结构转型和生产率增长中获利，但当前，中国等主要国家的增长则主要依靠不可贸易部门的需求增长，以及不可贸易部门的长期生产率和附加值增长。不可贸易部门增长是无法通过外部竞争推动的，只能依靠内部竞争、完善规章制度、增加人力资本、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和创新等措施实现。

二、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稳定¹

各种新技术和全球化正在深刻影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教育层次的个人就业选择。技术创新不仅减少了常规就业岗位数量，也引起了全球供应链和网络的改变，从而导致许多国家可贸易部门的常规工作岗位以及存在各种技能要求的非常规工作岗位重新分配。这种强大的趋势很可能持续下去，它过去主要影响了发达经济体，而在不远的将来，将蔓延至发展中经济体。

技术海啸的核心是信息技术，摩尔定律、计算机和数据库标准化网络以及其他过去无法实现的服务大大推动了该技术的发展。技术分析师指出，我们正处于结构转型的加速阶段，远未达到或接近终点。这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上述趋势的强大推动力，以及相关数学概念。摩尔定律认为，半导体芯片中晶体管的数量每18个月就会翻一番，如果换算成增长速度，接近60%。中国是全球发展最快的经济体，增速达到10%，GDP每7年翻一番。我们知道这将带来怎样的改变。技术增长速度比GDP增速高出6倍，这给过去三十年带来了成本的大幅下降以及廉价服务业规模的扩大。

¹ 译者注：该章节部分翻译参考《技术和就业挑战》，迈克尔·斯彭思，Project Syndicate，2013年1月15日，网址：<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global-supply-chains-on-the-move-by-michael-spence/chinese>

我们还知道，即使增速很高，其初始作用很小。30年前中国经济增速接近10%，但由于其经济总量较小，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微乎其微。然而，经过了30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总量达到了7.5万亿美元。现在即使是8%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是很了不起的成就，对全球经济的贡献也会与日俱增。这种影响同样适用于技术领域（但是以复杂的创新叠加的方式）。过去30年到现在，成本下降速度达到年均60%，使总成本降低了130万倍，正是这种变化带来了以下影响：生产自动化，常规就业岗位转移，构建复杂高效的全球供应链从而获取人力资源。我们的重点是，技术专家认为这种增长还将继续，而且会对经济产生更加显著的影响。

那么，决策者，特别是发达国家决策者，应该如何面对就业领域的挑战（以及对收入和财富分配的挑战）呢？我们可以从当前的研究中得到许多关于经济结构的演化如何影响就业的有趣结论。

发达国家可贸易部门至少已经有20年没有产生任何实质性就业增长了，即使创造了就业岗位，也集中在高收入、高学历层次，而中低收入和学历就业在减少。高端服务业就业岗位的增加伴随着制造业供应链中高就业部门的衰退。

在2008年危机爆发前，中低收入增长完全来自经济中的不可贸易部门，该部门大约要占发达国家产出和就业的三分之二。其中雇员人均收入和附加值几乎保持稳定。就业岗位可能因技术进步而削减，但不会因全球竞争而削减，而不可持续的债务推动型内需增长延迟了当前的就业赤字。

结果，发达国家以更快的速度削减常规岗位，同时增加非常规岗位（比如仍无法用机器和联网电脑取代和削减的岗位）。这使得教育和高水平技能的回报大增，发达国家资本所有者和高端雇员收入比重二十多年来持续增加。

于是，发达国家的增长和就业出现了分离。

这一趋势的关键推动力—技术在其中扮演了多重角色。常规人力岗位被机器和机器人取代是一个强大而持续的趋势，这一趋势在制造业和物流业中可能会进一步加速，与此同时，电脑网络正在取代信息处理行业中常规的白领岗位。

这一趋势部分来自纯粹的自动化，另一部分则来自“脱媒化”，即银行、在线零售以及某些政府服务不再需要中介，而这里提到的只是少数领域。

但技术的影响并未到此为止。实现自动化、脱媒化和降低远程成本的信息技术同样使全球供应链和网络的构造更加复杂和地区多样化。

由于发展中国家收入的增加和比较优势的变迁，全球供应链一直在转移。全球供应链能够将生产活动配置在人力和其他资源最具竞争力的地方。随着交易、合作和通信成本的下降，供应链中不仅包括中间产品和装配线，也包括越来越多的服务，比如研发、设计、维护和支持、客户服务、商业流程及其他。

其结果是全球供应链的“原子化”：将生产程序细致分割成为可能，提高了效率，几乎可以配置于任何地点。距离仍然是运输和物流成本方面需要考量的因素。但是，随着发展中经济体开始构成最大的新兴市场，成为全球需求增长主要推动力量，符合生产逻辑的“原子化”生产过程将更具吸引力。

全球供应链、网络和服务的有效分解导致了两个结果。首先，全球经济的可贸易部门占经济的总比重增加，在该部门，经济活动和就业岗位是直接竞争。不仅是全球，对于个别国家来说也是如此。

其次，全球供应链中无竞争力的部分将不再会因为毗邻高竞争力部分而得到保护。临近性不再是一项必要条件。

这些动态以及相关挑战并不只是发达国家才需要面对。比如，在未来十年，中国将以高附加值制造业和服务业岗位取代大量劳动密集型



装配岗位，不但在可贸易部门是如此，在快速增长的不可贸易部门同样如此（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自动化和叠加式制造业领域的扩张，以及成本的下降将影响全球劳动密集型产业，包括位于早期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

适应这些趋势的一个关键要素是投资。对发达国家个人、企业、教育机构和政府来说，在教育和技能领域宽基础、大手笔、高效率的投资是至关重要的。填补技能市场的信息空白也将增加这类投资的效率。但是，由于公共部门投资不足，增长缓慢、失业率高、结构调整迟缓的问题将继续存在。我们目前还不清楚发达国家是否具备足够的财政实力或者意愿，在短期内扭转这种趋势。危机已经影响到个人收入，而以追求长期可持续增长为目的的扩大投资将进一步打击中短期消费。虽然有可能实现扩大投资，但在当前阶段，政治因素似乎降低了这种可能性。

在危机和需求下滑的共同作用下，这些基本趋势将带来多重影响。失业在一定程度上主要体现在年轻群体中，收入分配问题恶化，大部分财富将流入资本所有者或人力资本拥有者手中。这导致了恶性循环，即上层收入者积累了更多物质和人力资本，而更高的资本份额给他们带来了更多收入。各国往往通过税收体系，提供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亦或国有化（例如中国）来避免这种趋势恶化。少数国家通过成功实施技能发展计划，在全球供应链的高附加值产业中保持了自己的地位。

由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和全球化所带来的收入分配不均的不良趋势已经威胁到发达国家的社会稳定和政治功能。政府应出台果断措施遏制这种趋势发展，而不应陷入政治僵局和无休止的纷争辩解之中。这种不稳定性还对投资和复苏产生负面影响。此外，在过去4-5年里，解决政府投资赤字问题的相关重要改革受到阻碍或延迟，这已经对政府的财政灵活性造成广泛而严重的损害。

毫无疑问，全球经济的技术基础和结构的复杂性，以及其变化速度令人感到困惑和新奇，理解和应对仍需时日，至少从目前看来，我们的应对措施落后于其变化速度。

三、中国和中等收入转型

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转型”阶段，有时也被称作“中等收入陷阱”。之所以称之为“陷阱”，主要是因为很多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增长大幅放缓，很多历史数据都支持这个论断。

中等收入转型涉及到一个经济体中，可贸易部门和不可贸易部门在需求端和供给端存在复杂的相互影响的结构变化。中国的“十二五”规划紧扣结构调整的主题，其中包括家庭收入在国民收入中份额上升，政府和企业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比重下降，从而带动家庭需求和消费增长。投资仍将保持稳健增长，但公共政策更趋合理，通过加强国有企业竞争和治理、改善市场环境、发展金融产业、减少不平衡、加大对经济供给端资金支持等措施，减少回报率低的公共投资项目。城镇化将扩大和吸收农村地区劳动力，大量资金将投入到相关基础设施（运输、水力、污水处理系统、电信、当然还有电力）建设，以及住宅和商用房地产开发中。

这个发展阶段的关键在于经济中不可贸易部门效率得到提升，原因是该部门规模扩大，更加重要，而且不存在国际竞争。当然，如果政策允许，外国投资者可以进入不可贸易部门（例如雀巢和家乐福进入食品领域，以及其他一些外资企业进入建筑、酒店和金融领域），这是政策选择问题。

另外，创新也是中国转型发展的重要因素。创新具有全球共享性，创意、知识和技术可以相对自由地跨境流动。中国的自主创新将为全球经济增长做出重要贡献。

中国分析家和决策者对西方国家的宏观金

融管理和监管模式一直持怀疑态度（这种态度无疑是正确的），担心公共部门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和负债失衡问题。这些问题会阻碍政府成功应对危机，开展逆周期需求调控，推动结构调整和解决收入分配等措施。随着中国社会服务和保障体系的完善，我们期望中国不会减持公共财产。因此，中国将面临如何管理好公共财产的挑战，以促进而不是妨碍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

对发达国家宏观经济和公共财政管理方面的合理怀疑，不应该延伸到动态创新等微观领域。就像上面提到的，创新是目前中国发展阶段首要任务。创新型生态系统一般具有一些共同特点，其中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存在实际和潜在竞争。这促使在位企业和新进入企业在产品、服务和节约成本方面不断创新，成功地创新可以使企业在短期内获得市场支配力。虽然各地区情况不同，但这种模式已经获得充分理解，而目前确实没有其他路径可循。为企业在竞争、市场准入、资金、规章制度等各方面创造一个公正和公平的市场环境，将成为未来机制和体制改革的目标。

中国的经济规划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要解决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和社会基本服务和保障分配不公问题。解决好这个问题，不仅有助于提高效率 and 促进增长，还可以维护社会稳定。打击腐败和保障投资市场机会均等也能够为缓解社会矛盾和促进经济增长提供直接助力。

为了完成主要的结构调整，需要进行全面深入的体制改革。目前普遍认为，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多次关键改革，成就了中国经济过去十年的辉煌，经济走向成熟，规模不断扩大和深化。一个得到广泛认同的正确观点是，只有继续加快和深化改革，中国才能顺利实现结构调整和经济持续增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就是说，中国过去三十年经济增长赖以成功的模式已经进入尾声。未来需要调整经济增长方式，倚重包括消费需求在内的内部需求，并进一步扩大国民经济市场化比重。

针对政府在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当前社会议论纷纷，中国内部需要协调处理好不同意见，为提出的一揽子改革措施做好准备。随着国家日渐富裕，中国也像其他国家一样，会产生强大的特权阶层，而政治和政策则需要合理地平衡不同阶层的利益。大众的利益，特别是那些尚未能通过有效途径充分表达意愿的群体的利益，应当优先解决，而中国共产党将从中发挥核心作用。

中国正处于向新一届领导集体成功过渡的阶段。当前的领导人参与了“十二五”规划重点项目的准备工作。它是一个全面的路线图，如果改革政策措施能够符合当前发展阶段的要求并顺利实施，则必将成功。然而，我们要知道，过去成功和快速实现中等收入转型的国家很少，而像中国这样规模国家的成功案例更是绝无仅有。而且，过去的成功都伴随着有利的全球经济环境，那时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中比重较大且不断增长，但现在全球经济则呈现出较大的阻力和风险。

此外，与其他经历过此过程的国家相比，虽然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系统重要性在增加，但人均收入水平较低。中国的经济政策和增长模式影响了全球原材料、资源产品和制造业产品的价格，也影响了国际金融市场秩序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模式。因此，与过去不同，未来十年，中国不但要为自身的增长方式转变和政府角色转型领航，也需要平衡其政策的内部动态性和外部影响。假以时日，由于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和增长保持较高水平，中国经济的外部影响力也将进一步加强。

多数人认为，未来十年全球经济如何演变，主要取决于中美两个全球最重要国家的政策措施，取决于两国是否能够通力合作，在提供公共产品和创建稳定开放的全球经济环境方面发挥领袖作用。欧洲将继续缓慢复苏，未来也许能够形成一个统一的经济体，以更加适当和团结（而不是分散）的方式参与全球事务。如果这种情况



出现，统一治理下的欧洲将成为中美两国的重要合作伙伴，共同领导和适应全球变化，但短期内这并不会实现。

四、合作

中美两国可以在多个领域开展合作，自然资源和环境合作就是其中的重点。在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推动下，全球经济规模将在未来十年到十五年内翻一番，之后再过十五年将达到目前规模的三倍。届时，过去支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模式不再适用，气候、食物、水、能源和居住条件将无法承担过大压力。事实上，各国已经开始逐渐适应新的增长模式，其主要表现为对下一代的生存环境担心，责任感增强，价值观转变，这需要世界各国进一步加快和提高这种适应能力、创新能力和学习能力。在此过程中，中美两国应该成为积极的参与者和领导者。两国的经济规模如此庞大，意味着两国必须去适应这种变化。两国的参与程度为推动国际合作提供了直接动力。当前的全球问题错综复杂，而中美在能源安全高效、绿色增长、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可以成为解决全球问题的良好开端。

目前各国纷纷致力于解决能源问题。中国的“十二五”规划也在该领域提出了宏伟目标。尽管规划中仍有国家管控性措施，例如汽车的“平均燃油经济性标准”，但相对于美国，中国的政策在降低中央集权方面已经有了很大进步。美国希望通过发展页岩油和页岩气，未来能够成为能源独立国家，而使用天然气也可以推动绿色经济发展。实际上，美国的人均碳排放量已经开始下降。

中美两国经济的互补性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得到了提升。我们可以将过去的发展简单地概括为：美国给中国带来了开放的市场、外国直接投资和先进技术，同时本身也获得了充沛的劳动力

资源，从而生产出物美价廉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现代制造业的全球供应链中，中国为关键制造业部门提供了劳动密集型生产部件。现在，这个过程正在改变，中国正在成为一个迅速增长的市场，过去中国消费者无力消费的商品越来越多地涌入中国，这也有助于中国吸收先进技术。可贸易部门中低附加值的就业岗位将会流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虽然这些就业岗位在中国的工资水平仍然较低，但受到人力节约型技术的影响很大。中国将对美国经济中很多领域进行对外投资，其中包括基础设施领域。尽管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正在向高附加值产业转移，但美国将继续向中国开放市场，提供、分享和吸收先进技术和人才，也将继续巩固其全球顶尖教育和基础研究中心的地位。

当然，两国也存在良性竞争。过去二十年间，两国的比较优势差距正在缩小，但尚未完全消失。未来十年中国还无法成为高收入国家，但从收入、资本深度（包括人力资本和能力）方面看，这种差异正在缩小。与过去的日本和韩国一样，中国跨国企业知名品牌将会出现在国际市场上。他们将与世界各国的跨国企业竞争，成为全球供应链架构的设计者。我们要看到，他们将在全球与来自欧洲、美国、日本的跨国企业竞争。这种良性竞争是在公平和规则化的环境中进行的，在全球经济快速扩张的过程中，这不是零和游戏，每个参与者都有足够的空间成为游戏中的强者。

这种发展趋势的结果是全球供应链和网络架构转型。过去，大体上讲，全球供应链由东方向西方转移，更精确地说，是通过东方向西方最终需求端转移。但这种现象已经成为过去，需求和增长，即使是绝对量的增长，也将不再集中在西方国家。

另外，还有一种潜在力量，使过去“非本土化”的趋势发生了部分逆转，开始向“本土化”的方向发展。“本土化”主要表现在能源成本上升，劳动力成本在总成本中比例下降，定制产量增

加，由周期性大批量订单向订单即时更新和供应链调度管理方面转变，以顺应客户采购行为的实时变化。这促使企业推行“本土化”生产。过去几年，这种趋势使得很多供应链关键部分迁回发达国家，而从现在和未来情况看，生产将向企业各自的市场转移，其中也包括发展中国家。

五、人口老龄化

美国、中国、欧洲和日本都处于人口老龄化进程中，老龄人口比例上升。各国老龄化程度不同，日本最为严重，其次是欧洲国家，然后是中国和美国。美国未来的移民政策尚存疑问，如果按照过去的趋势，移民将延缓美国的老龄化进程。

伴随着大量公共债务和非债务性负债（美国说法是权益）的老龄化将给西方国家的社会保障系统（包括医疗）造成严重问题。中国需要面对如何精确计算老龄化给社会保障系统带来的负债问题，以及如何限制这些问题。发达国家的例子应该引起警惕。

总体上讲，养老金和社会保障系统建立在寿命和工作年龄上的假设和参数已经不再适用。政府需要改造这个系统，但这个过程将非常艰难，部分原因是老年人往往根据过去的经验决定生活方式，操之过急的做法在政治上不可行，也不公平，但大量的长期负债会恶化长期财政失衡也是不争的事实。另一方面，专家们认识到，在现行系统中进行较小改动，将会对解决长期负债问题大有裨益。

毫无疑问，为了适应新形势，个人储蓄行为也要作出改变。可以通过改造社会保障系统来适当刺激储蓄，而合理的退休政策也能够增强人们的适应能力。似乎可以确定的是，工作年龄需要延长，但这又给企业如何支持员工在工作生涯的不同阶段实现转型带来了问题。

这些问题与之前我们讨论过的技术驱动型就业有关。公平地讲，在向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技

术和人口环境转变过程中，我们尚处于初级阶段，也许工作模式的根本性变化将成为转变过程的一部分。

六、发展中国家的韧性

后危机时代，发展中国家表现出了强大的韧性。前面讲过，这是发展中经济体规模扩大、收入上升、贸易增加（尤其是亚洲国家之间），以及需求更加符合比较优势的结果。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流向发达国家最终需求端的贸易比重将越来越小。

这种持续增强的反弹势头仍将继续，但发展中国家仍旧依赖于发达国家市场。全球需求的很大比重依然来自于发达国家，而发达国家（例如当前欧洲国家）增长大幅下滑将在中短期内对新兴经济体产生不利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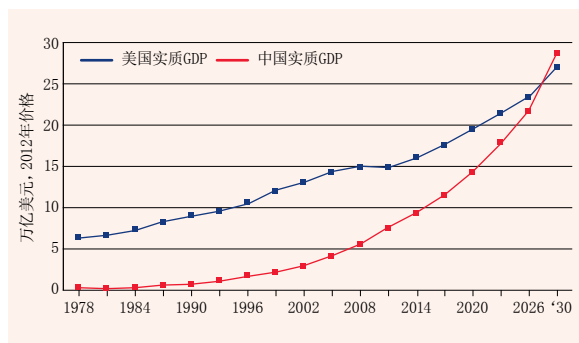
七、中美和全球经济预测总结

上文中我们看到，未来十年世界各国和全球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是，经济结构和政策向着更健康和更加可持续的方向转变。中国结构调整的轮廓已经相对清晰，剩下的问题是如何将政策和制度发展付诸实施。2013年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就职后，将进一步明确并正式宣布优先改革的措施和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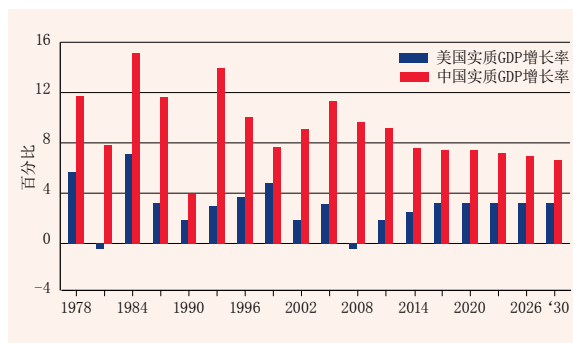
美国经济富有活力和灵活性。目前经济正在复苏，而且复苏势头很可能延续下去。去杠杆化的实施、能源领域的发展，以及劳动生产率和竞争力的提升都加速了经济复苏。然而，总需求不足依然是经济增长的拖累因素，而对于庞大的不可贸易部门，这种现象尤其明显。此外，在需求和投资领域进行逆周期的财政操作，却因财政灵活性大不如前而受到限制。

美联储之前宣布，将使用货币政策降低资产负债表受损造成的影响，通过提高资产价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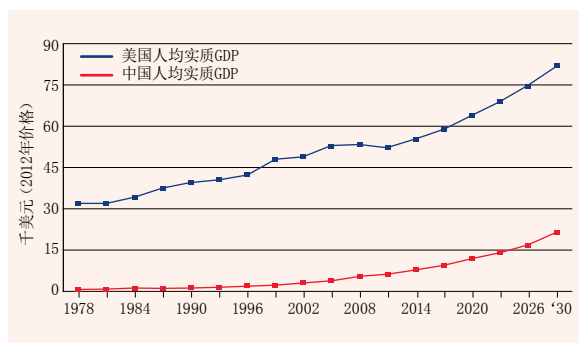
图表1: 中美两国实质GDP的实际值和预测值(万亿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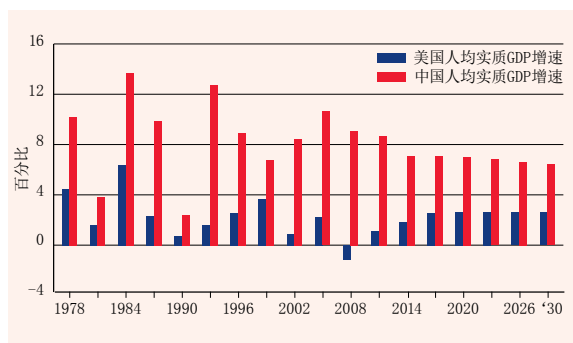
图表2: 中美两国实质GDP增长率的实际值和预测值



图表3: 中美两国人均实质GDP的实际值和预测值(千美元)



图表4: 中美两国人均实质GDP增速的实际值和预测值



和财富效应来刺激需求。但政治两极化加大了政策的不可预见性。很多中立议员认为,可信的短期刺激政策,加上中期赤字削减计划,以及降低长期负债的组合措施是最优的政策选择(特别是考虑到削减赤字能够保障增长导向型公共投资),但是,从目前的政治环境看很难实现。

尽管经济的实际增长正在缓慢恢复到潜在增长水平,但就业复苏乏力和收入分配转移带来了更多问题。收入从储蓄较少的人群向储蓄较高的人群转移,会对总需求复苏产生更大的不确定性。尽管供给面的增长(尤其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决定了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但短期内经济增长主要受需求制约也是共识。

欧洲复苏进程将非常迟缓,同时存在下行风险。去杠杆化过程缓慢,亟需各成员国(特别是核心国)共同出台协调和补充政策推动结构调整,其结果很难预料。协调政策的潜在挑战主要

是如何分担责任,谁将承担经济再平衡带来的成本,承担多少。

按照目前趋势,美国经济将缓慢和稳健复苏,从国际上看,趋同的过程仍将继续。到2015年,整个东亚地区GDP总量将超过美国,其中中国占有很大比重。预计约16年后(也就是2028年),中国实际GDP将超过美国,届时中美两国实际GDP均超过25万亿美元(2012年价格),是当前中国GDP的三倍。当然,这个结果也可能更快发生(美国经济也在增长,但增速低于中国经济)。到那时,中美两国经济总量将分别占到全球产出的15%。

中国人口总量估计在2045年达到均衡水平,此后基本保持稳定。有的预测认为,中国人口总量在2035年达到顶峰,但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出现,因为中国政府很可能在2035年前放宽人口政策。

到2030年,中国人均GDP预计达到19,960美元,仅稍高于美国人均GDP(76,750美元)的四分之一。

八、面对当前全球不确定性和增长挑战时,中美两国经贸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全球经济面临诸多挑战和不确定性,中美两国的经贸合作比过去更加重要。这不仅有助于实现双边互利,也为两国解决争执和摩擦提供了合作途径。此外,在全球经济结构和合作方面,世界其他国家也要仰仗中美的领袖作用。贸易开放、金融稳定和规范、能源安全、环境、气候变化等问题集中摆在我们面前,如果想成功实现全球再平衡和进步,不可能缺少中国或美国的参与。



附录 1

美国国会预算局：经济预测

美国国会预算局2012年至2023年经济预测					
	估算	预测		预计年平均	
	2012	2013	2014	2015-2018	2019-2023
第四季与第四季同比(百分比变化)					
国内生产总值					
实际	1.9	1.4	3.4	3.6	2.2
名义	3.7	2.9	5.3	5.7	4.3
通货膨胀					
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	1.5	1.3	1.8	1.9	2.0
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 ^a	1.5	1.5	1.9	2.0	2.0
消费价格指数 ^b	1.9c	1.5	2.0	2.2	2.3
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b	1.9c	1.8	2.0	2.2	2.3
价格指数	1.8	1.5	1.9	2.1	2.0
雇佣成本指数 ^d	1.9	2.2	3.3	4.0	3.6
第四季水平(百分比)					
失业率	7.8c	8.0	7.6	5.5e	5.2f
与上年同比(百分比变化)					
国内生产总值					
实际	2.3	1.4	2.6	3.7	2.3
名义	4.1	2.9	4.4	5.9	4.3
通货膨胀					
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	1.7	1.3	1.7	1.9	2.0
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 ^a	1.7	1.3	1.8	2.0	2.0
消费价格指数 ^b	2.1c	1.6	1.9	2.2	2.3
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b	2.1c	1.7	2.0	2.2	2.3
价格指数	1.8	1.5	1.8	2.1	2.0
雇佣成本指数 ^d	1.8	2.1	2.9	4.0	3.6
历年平均					
失业率(百分比)	8.1c	7.9	7.8	6.1	5.4
就业人口(月度变化,以千计)	157c	105	182	171	75
利率(百分比)					
三个月期国库券	0.1c	0.1	0.2	2.2	4.0
十年期国库券	1.8c	2.1	2.7	4.5	5.2
税基(占GDP百分比)					
工资薪金	44.1	43.5	43.9	44.2	44.9
国内经济利润	9.6	9.3	9.7	9.7	7.7

此处的数据并不反映由商务部经济分析局于1月30日发布的GDP和相关数据值,以及劳工部劳工统计局于1月31日发布的雇佣成本指数和2月1日发布的就业人口数据值。

a. 不包括食品和能源价格。

b. 所有城市消费者的消费价格指数。

c. 2012年实际值。

d. 私营企业员工工资薪金的雇佣成本指数。

e. 2018年数值。

f. 2023年数值。

来源:美国国会预算局,(2012年的实际值来自劳工部、劳工统计局;联储局)

附录 2

非正统的中美GDP预测比较

图1: 2022年非正统美国GDP水平预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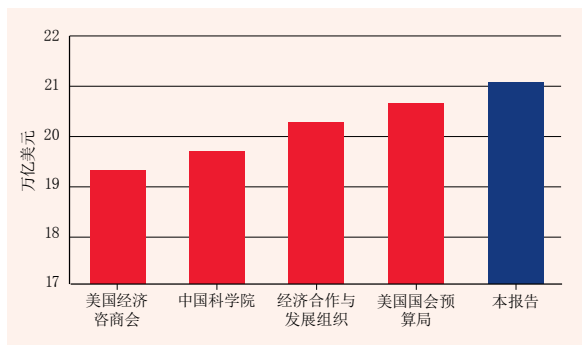


图2: 2012年-2022年美国年复合实际增长率的非正统预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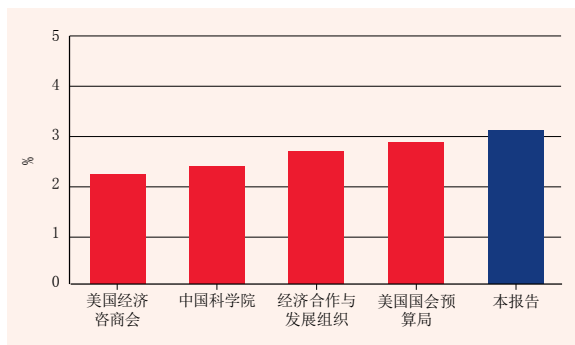


图3: 2022年中国GDP水平的非正统预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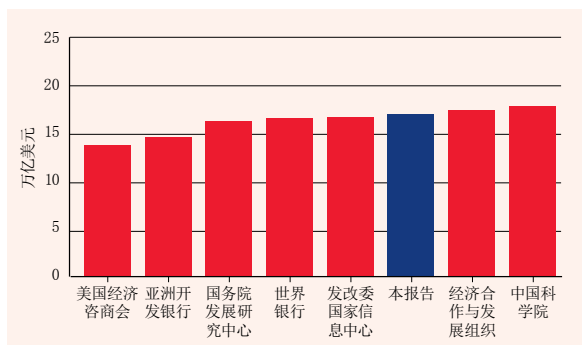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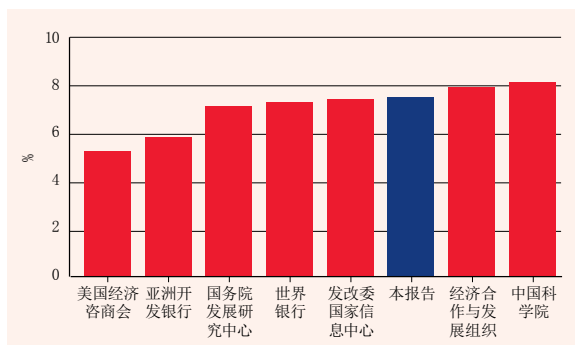


图4: 2012年-2022年中国年复合实际增长率的非正统预测



资料来源:

亚洲开发银行, “亚洲GDP和贸易长期预测”, 亚洲开发银行, 2011, <http://www.adb.org/sites/default/files/projections-gdp-trade.pdf>

中国科学院陈锡康(2013), 中国科学院, 将要发布

美国经济咨商会 (The Conference Board), <http://www.conference-board.org/data/globaloutlook.cfm>, 2013

美国国会预算局, <http://www.cbo.gov/publication/43902>, 2013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十年展望: 潜在增长率的下降以及新发展阶段的开始”, 2013年中国发展论坛会议报告,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2013年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http://stats.oecd.org/Index.aspx?QueryId=39742#>

国家信息中心, 发改委国家信息中心未发表的预测报告, 2012年

世界银行, 《2030年的中国》, 世界银行, 2012年, <http://www.worldbank.org/en/news/feature/2012/02/27/china-2030-executive-summary>

参考文献:

Kathryn J Byun 和 Christopher Frey, “2020年的美国经济: 不确定时代的复苏” (The US Economy in 2020: Recovery in uncertain times), 《每月劳工评论》, 2012年1月。

James Manyika, David Hunt, Scott Nyquist, Jaana Remes, Vikram Malhotra, Lenny Mendonca, Byron Auguste和Samantha Test, “美国经济的发展和更新: 重组美国经济引擎” (Growth and Renewal in the United States: Retooling America's Economic Engine), 麦肯锡全球研究所, 2011年2月。

迈克尔·斯彭思, “后危机时代世界的风险” (A Post-Crisis World of Risk), Project Syndicate, 2011年6月15日。

迈克尔·斯彭思, “全球经济增长背后的残酷事实” (Hard Truths About Global Growth), Project Syndicate, 14 September, 2012年9月14日。

迈克尔·斯彭思, “新兴市场弹性” (Emerging-Market Resilience), Project Syndicate, 2012年10月12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十二五”规划》, 2011年3月。

世界银行, 全球经济展望。

美国国会预算局, “预算和经济展望更新: 2012至2023财年”, 2013年2月。



第四章

未来十年全球与中国经济形势分析

陈文玲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经济学家兼战略研究部部长

王鹏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战略研究部副研究员

摘要

未来十年，如无大的意外，全球经济复苏势头虽然得到巩固，但全球经济复苏步调不均衡、不稳定。经济增长将出现南高北低、前低后高的趋势。发达国家将面临如何走出经济困境、避免世界经济二次探底的挑战；新兴经济体将面临如何战胜输入型通胀、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挑战。国际货币体系亟待变革，但难以很快达成共识。世界老龄化趋势加快发展，劳动适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不断缩小。粮食安全、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等全球公共性问题亟须全球共同合作，并建立统一的制度安排妥善解决。

面对这些问题和挑战，转变传统思维模式，形成发展共识，是推动世界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释放经济发展潜力的最大希望。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对全球经济贡献显著上升，为争取世界经济走出低迷、迈向复苏和繁荣提供了战略空间。充满“睿智”的创新，驱动人类从工业(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跨越，在推动未来十年全球经济发展中也极具潜力。低碳经济、循环经济、新能源发展将成为未来十年全球经济的新支柱之一，或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引擎。建立共同承担责任的全球治理机制，重塑人们对经济增长的信心和国际经济新秩序，是未来十年世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未来十年，中国将成为在世界经济发展中举足轻重的国家，虽然经济增长速度将稍低于上个十年，但经济发展的质量将大大提高，并将拉长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周期。中国将将迎来消费的黄金时期，成为全球市场规模增长最快的国家，国内消费需求将接过投资和出口的接力棒，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将成为第一贸易大国和继续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要素组合和资本进入的重要国家，并逐步成为对外投资的大国。未来十年，中国将成为具有科技创新能力和人才储备的国家，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中国将继续加速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到2022年，城市化水平将达到目前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工业化将进入中、后期。中国将把持续改善人民生活、满足让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作为工作重点，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构建和谐社会。同时，中国将成为金融制度更加市场化和国际化的重要国家，人民币将逐步在国际贸易结算、国际资本市场和国际货币储备中的发挥更大作用。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还将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将始终是未来十年经济工作的主线，以支持一个经济大国可持续发展。



未来十年全球与中国经济形势分析

未来十年全球经济发展的“基准情景”¹

一、全球经济的未来十年：经济复苏势头虽然得到巩固，但全球经济复苏步调不均衡、不稳定。经济增长将出现南高北低、前低后高的趋势。

发达经济体在减少家庭债务的过程中，消费将趋于正常化；亚洲等地国家出口的高速增长也将向常态回归，新兴市场国家正着眼于在外需与内需之间取得平衡，并逐步倚重国内消费。总体看，全球经济出于增长中枢下移的过程，进入低于过去60年趋势增长率的“新常态”。据世界银行统计，按照市场汇率加权计算，1973-2011年全球GDP年均增长3.0%，其中2000-2011年增长2.7%。预计未来十年，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在2.5%左右。²

全球经济结构面临调整，新兴经济体消费占GDP比重上升，投资占GDP比重下降，经常项目顺差缩小。世界银行报告³预计，到2025年，东亚经济体消费占GDP比重由2010年的40%上升至47%，印度和拉丁美洲国家的比重也将缓慢上升，而美国则由70%下降至63%左右。东亚经济体投资占GDP比重由45%跌至37%，俄罗斯、土耳其、拉丁美洲等新兴经济体也均出现不同程度下滑，而欧元区国家将由16%上升至18%。

全球贸易规模继续扩大，对全球产出的贡

献升高。世界银行报告⁴预计，到2025年，全球贸易占产出的比重将由49.9%上升到53.6%，新兴市场国家内需扩大促使进出口贸易规模大幅增加，进口占贸易份额由35%增至45%，出口份额由38%增至50%，同期，发达经济体进口、出口份额分别下降至55%和50%。新兴经济体全球贸易份额逐渐接近发达经济体。

二、未来十年世界经济面临的一系列新挑战

（一）全球将面临发达国家如何走出经济困境、避免世界经济二次探底的挑战。

近两年，国际金融危机进入新阶段，主要表现是主权债务系统性透支和风险，私营债务部门风险向公共债务部门风险转移，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政府债务缠身。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像传染病一样蔓延。目前，全球主权债务总额已逾95万亿美元，超过了55万亿美元的全球股市总市值，亦超过62亿美元的全球GDP总值。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⁵，发达国家囊括全球十大外债发行国，举债总量占全球八成多，2014年发达国家债务总额占GDP比重将超过100%，2015年占GDP比重将达到122%，直到2030年，才有可能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

从经济危机规律和发达经济体经济现状看，此轮国际金融危机尚未结束。近几十年，美国、欧洲经济周期缩短，衰退-复苏-扩张-衰退，各阶段大多为半年，至多不超过一年。但此次经济衰退后的复苏已历时四年多，不仅没有快速反

1 其假定前提是，全球依然保持和平发展的基调，不会出现大规模的战争和冲突；将继续保持开放式的自由贸易环境；全球金融系统相对稳定；全球经济治理没有实现新的突破，各国经济在合作和对抗的博弈中前行；中美两国经济政策能够顺利实施，经济转型基本按计划进行；中美经贸关系按照一般情形发展，中美经贸合作没有实现新的突破，也没有决裂冲突和对抗。

2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未来十年中美经济发展趋势判断与测算》，2012。

3 世界银行：《全球发展地平线 2011—多极化：新的全球经济》，2011。

4 世界银行：《全球发展地平线 2011—多极化：新的全球经济》，2011。

5 IMF：《全球金融稳定报告》，2011。

弹，部分欧洲国家甚至发生“双底衰退”。发达经济体能否从当前的泥沼里尽快挣扎出来，成为推动世界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而不是“拖累”，这是全球经济未来十年发展的关键。

(二) 全球将面临新兴经济体如何战胜输入型通胀、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挑战。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粮食价格和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食品价格上涨成了新兴经济体CPI大幅上涨的主要因素。国际货币基金（IMF）追踪的1929年以来的十四轮经济周期中，本轮复苏是最缓慢的，但信贷反弹却是最快的。目前全球央行的资产规模约为18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30%，是十年前的两倍。发达经济体深陷债务泥潭，都在并继续通过量化宽松或无限期、无限量宽松货币政策来维持债务循环，长期低利率和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性泛滥将成为常态。考虑到全球产出缺口会逐步减小、资源价格将在跌宕起伏中继续走高，全球可能将面临高通胀压力，金融市场动荡加剧。

拉美新兴大国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虽然发展势头很猛，但经济发展模式可持续性不强，产业结构单一，基础设施落后，工作效率低下，资本投入产出率不高。未来，假如发达经济体不能尽快走向复苏，新兴经济体发展模式转变缓慢且困难，加之较大的外部冲击，特别是外部输入型通胀等压力，整个世界缺少经济增长点和有后发优势地区的替代，全球经济有可能面临增长停滞甚至再次陷入衰退的风险。

(三) 国际货币体系亟待变革，但难以形成共识和共同行动，世界金融体系动辄引发震荡。

金融危机实质上是由于全球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造成的，大多数国家就此已基本形成共识。在雷曼破产后，流入美国的国际资本增多了数倍，而不是减少了，这说明国际投资者希望持有美元作为避险资产，也说明继续选择美元作为

储备货币和贸易结算货币，是各国自主选择的结果。在一定意义上，美元的“霸权”地位，是选择使用美元的所有国家赋予的，所有的国家包括美国自己也认为，国际货币体系必须改革，但目前却仍然选择美元。

持有越多美元和美元资产的国家，越怕美元贬值，越不敢大量抛售美元，因为担心剩下的大部分可能陷入更大幅度贬值的窘境。格林斯潘曾在爆发“次贷风波”和金融危机后坦言，造成这些问题与他多年采取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低利率有直接关系，而他的继任不仅仍走在他的旧路上，而且采取了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日本长期实行“零利率”和无限期宽松货币政策，英国也推出宽松货币政策，澳大利亚、印度等国紧步其后，欧洲一些国家和通胀压力较大的经济体则步入加息周期，使这个世界金融市场动辄顷刻间震荡。未来十年，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能否推进，并在推进中不使世界经济大幅震荡，是对各国特别是对美国智慧的考验。如果国际货币体系不发生变革，将不会对全球性美元泛滥和美国贸易和财政“双赤字”现象产生制约。其结果是，美元将持续贬值，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将持续上扬，最终，全球经济将面临难以克服的通胀风险，这将继续沉重打击全球经济，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并可能导致全球经济的再次衰退。

(四) 世界老龄化趋势加快发展，劳动适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不断缩小。

联合国最新人口调查报告显示⁶，2011年全球人口已突破70亿，全球人口从60亿增至70亿只用了十二年，预计2025年将达到80亿，到本世纪末将达到100亿。发达国家老龄化与“婴儿荒”同步，美、日、意、德等国家60岁以上人口比例都将达到30%以上，儿童人口增长率持续低迷甚至负增长。

⁶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Population seven billion: UN sets out challenges”，BBC，October 26, 2011，<http://www.bbc.co.uk/news/world-15459643>。



令人担忧的是，老龄化在向发展中国家加速挺进，一些发展中国家“未富先老”或“边富边老”。到本世纪中期，发展中国家老龄化率将上升到14%，老龄人口将比现在增加4倍。在劳动力曾经取之不竭的东亚，劳动适龄人口的比例将从2010年的64%降至2050年的57%。

老龄化社会加速到来，劳动适龄人口逐步减少，既预示着全球性人口红利将逐步结束，从而改变经济规模持续扩大的发展前提；也将对传统福利社会模式、教育、就业、养老等一系列问题提出变革的迫切需求。据联合国报告预测，到2050年，全球人口将达到91.5亿的峰值，其中60岁以上人口将突破20亿，占全球总人口近22%，6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将增至16%；届时每位65岁以上的老年人仅能依靠3.9个年龄介于15岁至64岁的劳动力供养，而在2010年这个比例还是1: 8.7。

全球人口老龄化还预示着储蓄水平和投资水平下降，消费水平上升，但购买力却急剧下降。然而，全球经济体，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能否实现消费水平以及老年人口购买力水平的整体上升，取决于相关政策的执行力和有效性，例如，金融业的发展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将极大地降低人用于整个生命周期未来的预防性储蓄。

（五）全球将面临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等问题的多重挑战，一些国家和地区将粮食转为生物燃料将加剧粮食和能源问题。

世界粮农组织报告称⁷，未来十年国际粮价将继续高位运行并持续波动，有可能比1997-2006年的平均价格水平上涨16%-40%。据联合国统计，目前世界上每7人中就有1人受到饥饿威胁，本轮粮食危机又导致4,400万新增饥饿人口。预计美国到2022年将需要1.8亿吨玉米来生产生物燃料，相当于5.8亿人全年的口粮。其他一些国家用粮食生产生物燃料的计划也在陆续实施之中。

国际能源供求矛盾更加突出。2011年初，BP在英国伦敦发布的《BP2030世界能源展望》⁸指出，全球的碳排放高峰将在2020年后很快到来，届时的碳排放水平较2005年高出20%。未来20年一次能源消费会增长将近40%。非经合组织国家能源消费到2030年将比现在增长68%，年均增幅达2.6%，并构成世界能源消费增长的93%。据国际能源署预测，到2030年，全球现有油田产量将下降2/3。可以预见，随着世界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全面进入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市场化和国际化发展阶段，国际能源供需平衡更加脆弱。

（六）世界将面临更多全球公共性问题，建立解决这些难题的制度安排将遇到一系列新的挑战。

例如气候变暖问题。据世界银行报告，预计21世纪（2000-2100年）全球温度将比工业化前升高5°C⁹。2009年11月24日发布的《哥本哈根诊断》报告指出¹⁰，到2100年全球气温可能升高7°C，海平面可能升高1米以上。再比如贫困问题，发展中国家有1/4的人口仍处在极度贫困状态¹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10年世界发展指标》，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使全球又增加了6,400万极度贫困人口。

世界经济还面临着人口爆炸、全球环境恶化、自然灾害、掠夺式地滥用自然资源、贫困、疾病、国际恐怖主义、生物技术规则和移民规则、建立新的贸易投资规则等诸多方面的问题。用传统思维应对这些问题已难以奏效，迫切需要有效的方法以解决全球共同面临的问题。但从目前来看，建立解决这些问题的全球性制度安排还有待形成共识并采取统一行动，但这些议题尚未开始进行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的进程。如何

7 世界粮农组织：《2010年到2019年粮食展望》，2010。

8 《BP2030世界能源展望》，伦敦，2011年1月

9 世界银行：《2010世界发展报告：发展与气候变化》，2010。

10 《哥本哈根诊断2009：将世界上升到气候科技》，宾多夫、宾查勒等，新南威尔士大学气候变化研究中心，悉尼，2009。

11 按照世界银行的定义，人均日收入低于1.25美元为极度贫困。

在未来十年或更长时间内解决这些问题，将决定今后几代人在这个星球上的生存质量、生活质量乃至生命质量。

三、充满机遇和希望的未来十年：寻求共同认知、共同语言与共同行动

（一）转变传统思维模式，形成发展共识，这是推动世界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释放经济发展潜力的最大希望。

美国制定了再工业化和新能源发展战略，向实体经济回归，将制造业确定为产业发展主要战略方向，并实施五年出口倍增计划。还将通过新能源发展战略，促进经济复苏和创造就业。欧盟首脑会议2010年6月通过《欧盟2020战略》，决定未来十年推动经济实现智能、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确定了就业、研发、气候变化、教育、减贫等五项具体目标。同年6月，日本政府出台新增长战略，通过国内要素和扩大对外开放两个渠道寻求经济增长动力。中国、巴西等新兴国家也走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道路上。面向未来十年，如何充分发挥国际组织（如IMF、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银行，以及其他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作用，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全球气候变化等议题上积极推进和协调，促进变革、调整、转型、创新、发展，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共同期盼。

（二）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对全球经济贡献显著上升，为争取世界经济走出低迷、迈向复苏和繁荣提供了战略空间。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对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等“金砖五国”的预测表明，到2015年，五个国家GDP占全球比重将由目前的17%上升到23%，2020年这一比例将达到31%，2025年将达到41%，2030年将达到47%，甚至有可能占全球50%以上。这些国家未来十年的整体崛起，将为全球减

少贫困人口进一步做出巨大贡献，对这些国家和所在地区、对全球经济发展都有利。随着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增加，越来越多人认同，新兴经济体崛起是一种不可逆转的长期发展趋势。

（三）充满“睿智”的创新，驱动人类从工业(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跨越，这也是未来十年世界经济发展中最大的变量。

近几年，世界经济在坎坷中孕育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各国以科技革命带动产业革命进而实现经济增长的信心。美国制定了《国家创新战略》、《2010—2014年智能电网研发跨年度项目规划》；欧盟推出“创新联盟”、“欧洲数字化议程”和史上最大规模科研和创新投资计划；日本制定了第四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2011—2015年）草案，而韩国的《绿色增长国家战略及五年计划》则已于2010年进入具体实施阶段。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国家也加快了在科技创新与科技发展道路上的步伐。可见，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均将科技创新与科技革命作为经济复苏和发展的突破口，积极改造传统产业，竞相角逐新兴产业，为世界经济注入了新活力。世界银行报告¹²预计，生产率较高的新兴经济体将实现6%左右的年均增长水平，而生产率较低的新兴经济体也将有年均3%的增速。

（四）低碳经济、循环经济、新能源发展将成为未来十年全球经济的新支柱之一，或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引擎。

在全球反思经济模式的今天，低碳经济、循环经济不但是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结构调整的大方向，也是少数在国际金融危机中逆势发展的领域。据汇丰（HSBC）的一项研究显示¹³，按目前趋

¹² 世界银行：《全球发展地平线 2011—多极化：新的全球经济》，2011。
¹³ HSBC：《衡量气候经济》，2010。



势，到2020年时，低碳行业的年收入将超过2万亿美元。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发展新能源成了很多国家共同的战略选择，发展低碳经济、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成为科技创新的热点。据《BP2030世界能源展望》，在2010-2030年间，可再生能源（包括太阳能、风能、地热能源和生物燃料）对能源增长的贡献率将从5%增至18%。以先进核能、可再生能源为代表的新能源将逐步取代石油、煤炭等化石能源的主导地位。生物燃料产量预计将由2010年的180万桶/日上升至2030年的670万桶/日，其在未来20年中的增长，将是非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液体燃料供应增长的125%。

（五）建立共同承担责任的全球治理机制，重塑人们对经济增长的信心和国际经济新秩序，是未来十年世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当今世界经济正在经历一场大震荡、大调整和大变革，需要找到一条有效的全球经济治理之路，共同搭建或改造全球治理的主要平台。国际金融危机打破了旧的国际经济秩序，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构变革，已将应对全球问题的议案提上日程。联合国去年发表了《2010年世界经济与社会概览》，提出“改革全球储备货币体系，改革世界经济治理结构，改革全球治理机制”；G20讨论的议题从经济金融问题向其他方面扩展；金砖国家首脑峰会提出世界经济必须实行包容性，等等。全球经济治理的关键，在于提升全球经济的风险预防和管理能力，加强全球金融系统的稳定性，监控通胀风险，坚持推进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缩小全球贫富差距。

加快推进世界银行、IMF、WTO、G20等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改革，坚持全面性、均衡性、渐进性、实效性原则，健全和完善现有国际组织机构，形成一个有利于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国际经济

体系和全球治理体系。这是全世界的共同利益和最大的公共品，有利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建立一个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经济秩序。国际机构在协调全球性问题时应体现出权威性、合法性、公正性和有效性，使世界性经济组织和各种国际论坛具有引导性、透明性、战略性和疏导性，逐步形成全球共同认知、共同语言和共同行动，这不仅决定着未来十年的世界，也决定着人类的未来。

四、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未来十年全球经济发展可能出现的两种“替代情景”。

（一）“乐观情景”¹⁴：世界迈向新一轮经济增长“超级周期”。

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预计¹⁵，乐观情景下，未来十年世界经济增长率达到5.4%。其中发达经济体增速达到3%，新兴经济体增速达到7.4%，而美国、欧洲、日本、中国、印度经济的实际增长率将分别达到3.4%、2.4%、2.4%、9.4%和9.8%。全球实际经济规模到2020年将增至105万亿美元，比基准情景规模扩大约15万亿美元¹⁶。

（二）“悲观情景”¹⁷：疲软的复苏抑或“失去的十年”。

这样的情景发生的可能性不大，但也不是绝非可能。给出“悲观情景”，是为了给世界各国统一认识、统一行动提供一种特别的警示。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预计¹⁸，在悲观情景下，未来十年，世界

¹⁴ 其假定前提是，由于全球化条件下各国利益高度重合和融合，大家取得共同认识并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加强合作，互利多赢；优势互补，重建秩序；创新调整，应对挑战；互相让步，包容发展。

¹⁵ 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011全球经济展望》，2011。

¹⁶ 按照2010年全球GDP为62万亿美元计算。亚洲开发银行预计，2020年全球GDP为90万亿美元，我们将此作为基准情景下的预测。

¹⁷ 其假定前提是，主要国家缺少“战略清醒”，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实体经济“感染”叠加效应持续发酵，全球经济“二次探底”并引发社会动荡；拒绝反思，“君临天下”；失衡加剧，复苏缓慢；市场动荡，环境恶化；关系纠结，集体坍塌。

¹⁸ 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011全球经济展望》，2011。

经济增长率只有2.6%，其中发达经济体增速为1%，新兴经济体增速为4%，美国、欧洲、日本、中国和印度经济增长率分别只有1.3%、0.6%、0.1%、5%和5%。届时全球经济规模只有80万亿美元，比基准情景规模缩小约10万亿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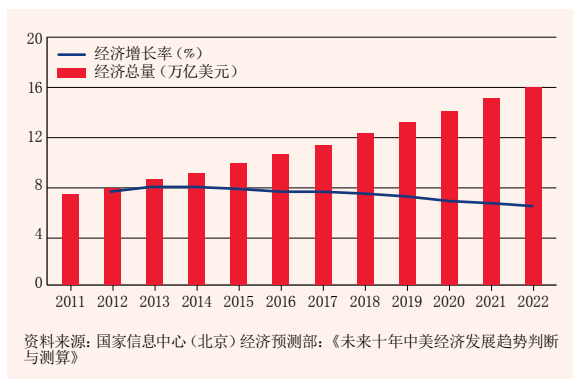
中国未来十年经济发展展望

中国从1978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向世界敞开了自己的大门，从成为世界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到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使中国获得了实际利益，尤其重要的是，中国向美国和世界发达国家学习，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经济制度的重建令中国释放了巨大的潜能。过去十年间，中国发展的现实已远远超出预期，GDP增长幅度接近10%，城市化率达到47.6%，2009-2011年政府拿出8,500亿元人民币，为12.67亿人口建立了医疗保险制度。未来十年的中国又将是怎样一幅图景呢？

（一）中国将成为在世界经济发展中举足轻重的国家，虽然经济增长速度将稍低于上个十年，但经济发展的质量将大大提高，并将拉长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周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十二五”规划）确立了“十二五”时期（2011—2015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目标：在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基础上，中国经济发展的预期速度年均增长7%。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确保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2010年翻一番，按此目标计算，2010-2020年间年均经济增速为7.1%，基本与“十二五”规划目标一致。按照7%的平均增长速度，届时GDP总量将达到12.5万亿美元¹⁹。中国国家信息中心预测显示，到2022年，中国年均增速达

图表1：2011-2012年中国经济总量和增长率预测



到7.4%，届时GDP总量达到16万亿美元（图表1）²⁰。世界银行报告²¹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在未来30年内将逐渐走低，2011-2015年年均增长速度为8.6%，2016-2020年年均增速降至7.0%，到2030年，年均增速只有5%。但即使如此，到2030年，中国经济也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经济大国。

未来十年的发展，中国将更加关注生活的幸福感，而不仅仅是规模和速度。GDP是衡量一国经济实力的核心指标之一，但不是唯一指标，当前中国人均GDP在世界排名为93位，还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到2020年将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也就是说，到2020年，中国人均GDP将超过1万美元²²，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据国家信息中心预测，到2022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11,517美元²³。（图表1）

（二）中国将成为全球市场规模增长最快的国家，中国经济将迎来消费的黄金时期，国内消费

19 按人民币汇率1:6.38计算。

20 2011年中国GDP总量为7.3万亿美元。

21 《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2012。

22 2011年中国人均GDP为5414美元。

23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未来十年中美经济发展趋势判断与测算》，2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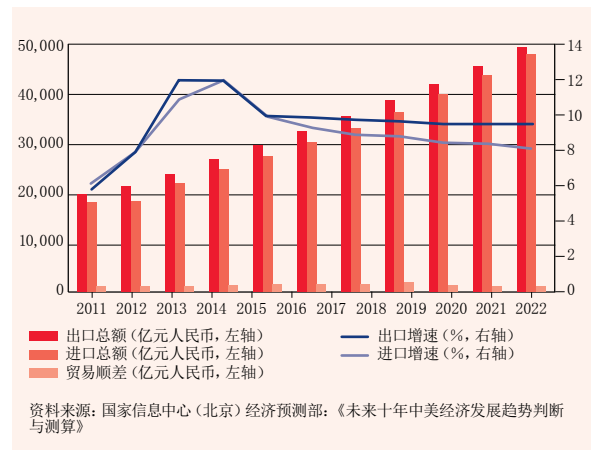
需求将接过投资和出口的接力棒，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我们预期消费仍将加速增长，并接过投资和出口的接力棒，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中国消费结构将进一步提升，居民消费潜力将得到进一步释放，国内市场总体规模将位居世界前列。2012年，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率为51.8%，六年来首次超过投资。世界银行报告²⁴预计，到2020年，中国经济中投资占GDP的比例由2011年的42%降至38%，消费占GDP的比例由56%增至60%。摩根士丹利报告²⁵指出，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将迎来消费的黄金时期。2020年中国的消费总量将达到美国的2/3，占世界消费总量的12%。中国的新增消费已于2008年超过美国，并在2020年达到世界新增消费的20%。预计2020年中国新增消费将大致为美国新增消费的两倍。近年来，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快速发展，于2012年，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的目标基本实现，建立了世界上最大人群享有的医疗保障制度。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体系进一步完善，有助于释放居民消费需求，形成以内需拉动为主要动力的经济发展方式。

（三）中国将成为第一贸易大国和继续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要素组合和资本进入的重要国家，并逐步成为对外投资的大国。

中国已成为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中国参加了100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签署了300多个国际公约。中国也是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积极实践者。迄今已同163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双边经贸合作机制，已签署和正在谈判的有15个自由贸易区协定，同129个国家签署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同96个国家签署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未来十年，中国将与世界上更多国家和

图表2：2012-2022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和增速



地区建立自由贸易区，建立与周边国家跨境经济合作区，积极推动多哈贸易回合谈判，在国际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未来十年中国将成为第一贸易大国。国家信息中心预测，考虑到全球经济增长格局变化和全球贸易增速下降、我国出口结构变化以及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年均升值2%左右等因素，2013-2022年我国出口年均增长9.4%，进口年均增长10.0%；贸易顺差基本维持在2,500亿美元左右的水平。（图表2）

中国正在成为对外投资大国。2011年，中国海外投资存量达到4,000亿美元，位居全球第13位，过去十年里年均增速高达44.6%。据美国亚洲研究中心与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联合发布的报告预测，未来十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将达1万至2万亿美元²⁶。然而，由于文化差异以及对当地法律和规章制度不够了解，中国的对外投资之路并不平坦，再加上经常遭遇被投资国的歧视性政策或政治阻力，进一步增加了对外投资的难度。然而，与以往不同，中国当前对外投资不仅是出于自身需要，还是陷入债务危机和经济困境的发达国家的需要，亦是有资本需要的国家和地区的选择。在中国政府的鼓励和引导下，随着经

²⁴ 世界银行：《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2012。

²⁵ 摩根士丹利：《2020年前的中国经济》，2010。

²⁶ 美国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和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敞开美国大门？充分利用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罗森和哈曼尼，2011。

图表3: 科技人才现状与主要发展目标

年份	R&D人员(万人年)	R&D研究人员(万人年)	每万劳动力中R&D人员(人年/万人)	每万劳动力中R&D研究人员(人年/万人)	R&D人员人均R&D经费(万元)	R&D研究人员人均R&D经费(万元)
2008	196.5	105.0	24.82	13.3	23.5	44.0
2015	280	150	33	18	38	71
2020	380	200	43	23	50	100

资料来源: 国家信息中心(北京)经济预测部:《未来十年中美经济发展趋势判断与测算》

验不断累积,我们相信,中国将加快对外投资步伐,进一步扩大对外投资规模。

(四) 中国将成为具有科技创新能力和人才储备的国家,到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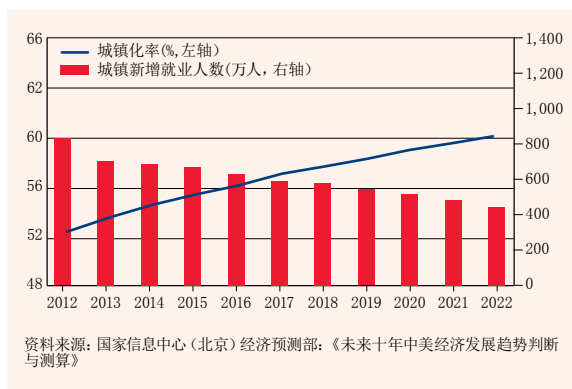
中国已制定了面向2020年的国家人才发展规划、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科学和技术发展中长期规划等。按照规划,预计到2020年,中国人才资源总量将从现在的1.14亿人增加到1.8亿人,增长58%;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33%,人才贡献率达到35%,可以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提供充足的优质劳动力;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2.5%以上,力争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0%以上。为了建立一个良好的创新环境,中国正在努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措施。

培养人才的根本是提高教育能力。到2020年,毛入学率将达到90%;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0%。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9.5年提高到11.2年,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达到20%,具有高等教育文化程度的人数比2009年翻一番。

(五) 中国将继续加速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到2022年城市化水平将达到目前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工业化将进入中、后期。

30年前8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现在一半以上的人口搬到了城市。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已超过50%,达到51.3%,提前实现了“十二五”规划预期

图表4: 2012-2022年中国城镇化进程



目标。照此速度,到2022年,中国城市化率将超过60%。世界银行报告²⁷预计,在未来不到20年时间里,中国2/3的人口将居住在城市,届时中国城市人口总和将超过美、日、欧三大经济体城市人口的总和。这是人类历史上迄今最大规模、最宏伟的城市化进程,也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巨大增长动力。(图表4)

中国新型工业化进程将继续加快,工业化的水平将有更大的提高。节能环保技术、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动力汽车等重点领域将有更快的发展。中国“十二五”规划提出,到2015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8%左右。到2022年,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减少40-45%。

27 《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 2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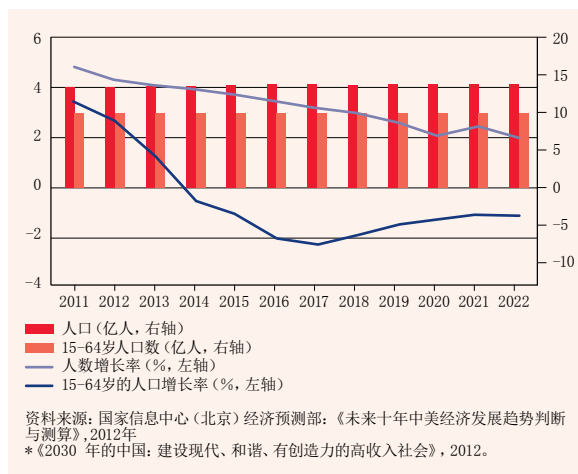
(六) 中国将把持续改善人民生活、满足让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作为工作重点，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构建和谐社会。

目前中国年人均GDP已达到5,500美元，2022年将超过1万美元。未来十年，人口增长率将呈下降趋势，到2022年人口数不会超过14亿人，其中15-64岁劳动适龄人口增长率将出现负增长(图表5)。人均预期寿命提高一岁，达到74.5岁。社会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政府财政对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补助标准逐步提高。

提高低收入者和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缩小社会贫富差距，是政府重视民生的重要方面。2011-2015年，最低工资标准每年将提高13%以上，绝大多数地区最低工资标准达到当地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的40%以上；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年均增长10%以上；建设3,600万套城镇保障性住房，使此类住房覆盖面达到20%，逐步解决贫困人群的住房问题。世界银行²⁸预计，到2030年，城乡贫富差距将由2010年的3.2:1缩小至2.4:1。

中国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拉动城镇就业人数增加约130万人，考虑未来十年服务业就业比重提高，制造业结构不断升级等因素，预计来十年就业弹性将逐步减小100万人。由于我国劳动人口绝对数量将下降，就业压力较小，城镇失业率将基本保持在现有水平。

图表5: 2011-2022年中国人口预测*



(七) 中国将成为金融制度更加市场化和国际化的重要国家，人民币将逐步在国际贸易结算、国际资本市场和国际货币储备中的发挥更大作用。

中国一直努力创造必要条件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从2005年7月21日开始，中国开始了汇率和利率的市场化改革，到2012年5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累计升值已超过30%。人民币已实现了贸易项下自由兑换，资本项下自由兑换的比重也超过了40%。目前，采用人民币结算的贸易额已占到中国贸易总量的10%。中国已与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当局签署本币互换协议，货币互换的总金额已达8,292亿元人民币。香港已成为第一个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上海将成为继香港之后的国际化金融中心。毫无疑问，未来十年，中国将继续加快金融制度改革，使之更加市场化和国际化。货币互换规模进一步扩大，上海在亚洲金融交易中占据主导地位，新加坡，伦敦，纽约等国际金融中心将陆续成为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

除了继续加快现有的金融机构改革，推进国家控股的大型金融机构改革，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和现代公司治理结构，还将显著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深化股票发行制度改革，建立

28 《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2012。

上市公司退市制度。为了防范金融风险，中国正在研究建立逆周期动态资本缓冲和预防性拨备制度，加强对流动性、杠杆率的监督管理，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

（八）中国还将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将始终是未来十年经济工作的主线，以支持一个经济大国可持续发展。

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用世界7.9%的耕地和6.5%的淡水资源养活着世界近20%的人口。中国城乡、区域发展很不平衡，经济增长过于依赖物质资源投入。中国自主创新能力较弱，在国际产业体系和贸易分工中仍处于产业链低端。中国人民生活水平还不高，社会保障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增长还面临着诸多压力：通胀压力、资源环境压力、老龄化社会压力、贫困压力等。按照联合国人均日消费水平不足一美元的标准，中国还有1.5亿贫困人口。按照国际标准²⁹，中国已于1999年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预计2012年前后，中国15-64岁劳动适龄人口数量处于不断下降趋势，在未来20年内，可能迎来人口红利消失的重要转折点。劳动力数量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减小。

目前，外需萎缩加剧国内产能过剩，“传统比较优势丢失”已经开始显现。在外需萎缩的冲击下，出现大量外需性产能过剩行业。外需型产能过剩行业既包括纺织、鞋帽、箱包等传统行业，也包括风电设备、多晶硅、光伏太阳能电池等新兴行业。中国还面临形成新的“比较优势”真空。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使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比较优势逐渐丧失，而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尚未建立。

资源环境的挑战更为严峻，2/3的城市缺水现象越来越严重，几乎1/4的地表水受到污染，3

亿多农村人口还不能喝到安全的水。摩根斯坦利报告³⁰预计，如果中国不能很好地解决自身问题，就不可避免地出现经济增长放缓和持续高通胀率。在这种情况下，未来十年中国年均经济增速只有6.5%。卡耐基基金会³¹也指出，在悲观的情景下，中国在未来五年年均经济增速为7.1%，后五年仅有5.8%。

总体而言，导致中国未来经济减速的风险既来自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包括房地产市场的不振和投资能力萎缩、全球经济减速造成的出口下降等因素，也来自中国经济内部结构问题。前者可以通过政府出台一系列应对措施解决，后者情况更为严峻和棘手，需要继续大力推进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否则很可能陷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³²。

然而，随着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几亿人进入城市将释放出巨大消费需求，足以支撑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以比任何时候更加自信地迈向未来十年，也以比任何时候更加清醒地面对自身存在的种种挑战和问题。中国行走新的历史征程上，进一步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在更大范围积极参与全球事务，承担更多的大国责任，主动提供全球性公共产品，接受新形势、新问题和新机遇的考验，这是一个新兴大国的抱负和胸怀。

29 王德文：“人口低生育率阶段的劳动力供求变化与中国经济增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网。

30 《中国档案：2020年前的中国经济》，摩根士丹利，2020。

31 《中国经济前景2006-2020》，卡耐基和平基金会，2007。

32 《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2012。



第五章

美国经济状况

迈克尔·博斯金

斯坦福大学T.M.弗里德曼经济学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助理研究员

摘要

相 比较历史上从深度衰退复苏的情况，目前美国经济正在缓慢复苏。美国人对经济前途悲观，对子女未来的生活水准可能低于他们现有水平感到担忧。他们正在质疑是否缓慢增长正成为新的常态。

虽然我们预测短期经济会呈微弱增长态势，但这会引起一系列本土和国际因素所带来的风险，包括财政政策、欧洲衰退、中国影响以及规管的激增。

政治体制在各大问题上分歧重重，是进行财政整合还是采用短期刺激，是调整税收机制还是政府开支，大家意见不一，此外，各方对政府

规模和职能范围也有不同主张。随着婴儿潮那一代陆续进入退休时代，劳动力增长正在放缓，随之逐步提升了退休人士和工作人士数量比，从而导致福利支出激增。

然而，美国的情况相比其他发达国家更为有利，它面临的人口压力要比欧洲和日本小得多，而且税收和社会福利负担比欧洲大部分主要国家都要低。此外，美国在技术、生产力和高等教育等方面的优势，结合其更为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特别是如果能伴随着合理的政策改革，应该会帮助美国经济度过难关。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复苏旅程会一帆风顺。

美国经济状况

短期

美国经济仍处于金融危机及深度衰退之后的历史性缓慢复苏期。从深度衰退中复苏通常是强劲而迅速的，正如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一样；而从金融危机中复苏有时却是缓慢的，虽然情况并不总是这样。经济发展仍远远低于潜在水平（见图表1）。自衰退结束之后每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保持在2%左右。

好消息是，蓝筹共识的私人预测者（Blue Chip private forecasters）预计美国经济将出现温和上升，预期今明两年的增长率将上升到2%至3%之间，不过这一数字仍远远低于理想水平。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预测今年经济增速

为1.4%，明年为3.4%，其后几年将维持在3.5%。白宫预测经济将出现稳健回升，2013年的增长率为2.6%，2014年略超3.4%。

当然，美国和加拿大经济的表现比其他发达大国要更好，其中有些国家经济正在萎缩（见图表3）。

虽然我大致认同蓝筹共识的预测并以此为基础，我认为未来几年经济表现更差的风险较大，当然也存在经济表现更佳的机遇。

短期存在的风险主要来自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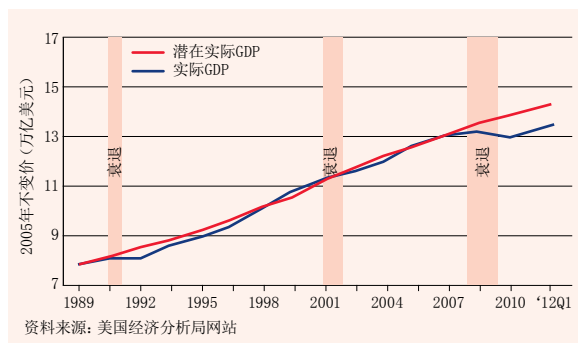
- 1 财政政策，尤其是额外税负，再加上无法就中长期的财政整顿达成一致，这里的整顿主要是指降低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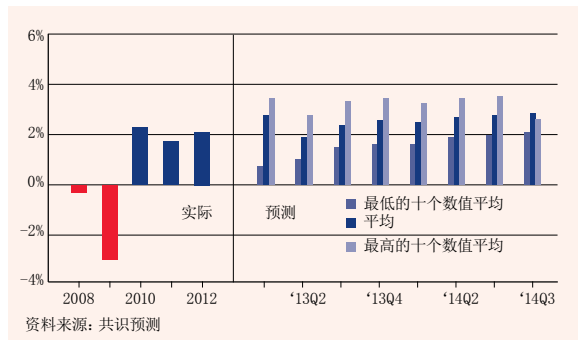
- 2 欧洲衰退日益加深，这对美国约20%的出口额造成了影响。欧洲的债务和银行危机仍是主要问题，这不光是欧洲的问题，也对美国和全球经济造成影响。欧洲银行的资本远比美国银行薄弱，但是和信用市场相比在经济中所占的信用份额更大；
- 3 中国（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具备全球系统重要性的第一大新兴经济体）目前仍处于政治转型初期，自身也面临着一系列复杂的经济问题；
- 4 地缘政治问题，如恐怖主义、核扩散造成的对抗（如伊朗的石油问题），如果最坏的情况出现，后果足以引起衰退；
- 5 私营部门持续去杠杆化的进程目前仍在持续；
- 6 小企业信贷仍然偏紧；
- 7 近年来规管条例的激增导致成本和不确定性上升，额外的规管进一步加剧这一情况。而大片的经济领域受到卫生改革、《多德—弗兰克法案》、环境保护局规管条例影响，被迫进行非商业性决策，而无视他们本身的非经济利益；
- 8 目前货币政策的退出风险迫在眉睫。预期美国联邦储备局（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在2014年将达到4万亿美元。量化宽松的效果越来越微弱，再多超额储备也无法进一步放松银行贷款。推高资产价格可能会催生泡沫，泡沫的破灭会严重扰乱经济。美联储称将提高存款准备金的利率以阻止银行的贷款规模增长过快，因为这会推高通货膨胀率。但是考虑到近期历史，很难想象国会和公众会任由美联储把上百亿美元送给（而非借给）银行而坐视不理。

当然美国经济也存在很多机遇，这些机遇可能使经济表现超过预期。房地产市场终于开始反弹，尽管幅度还很小，但是现在该市场可以助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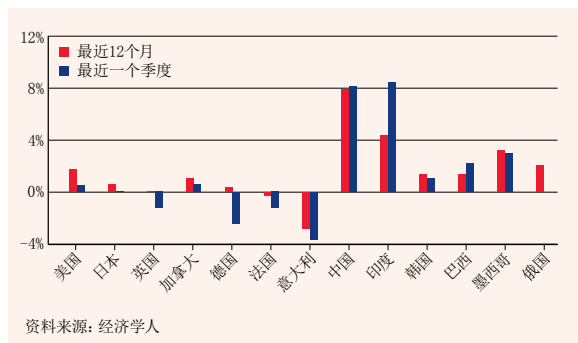
图表1: 1989-2012年期间美国实际GDP



图表2: 蓝筹共识对美国经济增长的预测: 2013至2014年期间(按季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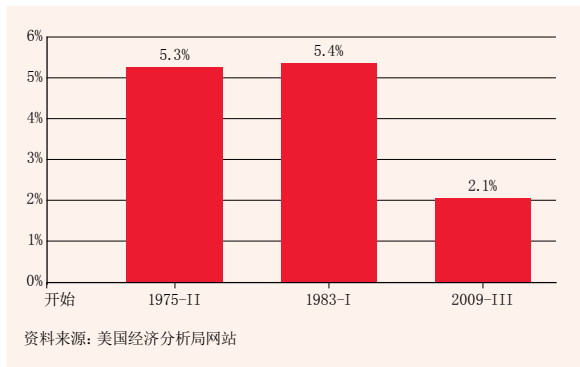
图表3: 选定国家的GDP增速(最近12个月和最近一个季度, 即2012年第四季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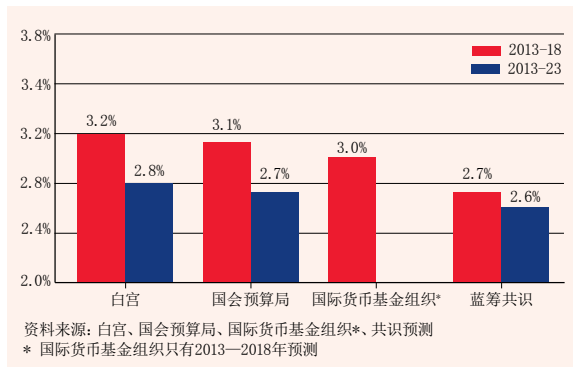
而非拖累经济增长。各州及地方增加税收、减少支出的财政拖累也可能已经达到峰值。

“水力压裂法”这一技术革命使美国国内的石油和天然气行业重现繁荣，创造了就业、收入和政府税收。同时，随着海外开采权限的放宽，如加拿大石油以及曾经不可想象的墨西哥石油

图表4: 严重衰退低谷期以后的14个季度的美国实际GDP平均增长率



图表5: 美国2013-2023年期间实际GDP增长率长期预测



行业对外资开放,我们可以大幅降低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战略影响力。如果政策或不安全开采没有将其扼杀,这将不仅仅是一个潜在的经济变革,而是几十年来最重要的对美国有利的地缘政治变化。

此外,很多资金正等待入场,这些资金目前逗留于相对安全的资产,如房产或者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收益率几乎为0。企业正在等待经济转强以及未来税收和监管环境向有利方向变化,并期待会有更多有利的投资和用人机会。简而言之,市场上有被压抑的投资需求。

与二战之后两次深度衰退后的复苏过程相比,这次复苏显得相对乏力。20世纪70年代中期和80年代中期的复苏是急速而强劲的。如图表4所示,本次复苏过程中的GDP增长速度仅为前两次的40%,就业的恢复速度也只有原来的25%。在衰退之后的3年半时间内,前两次的复苏平均创造了1,430万就业机会(经劳动力人口增长调整)。本次复苏创造的就业机会则少了1,000万,异乎寻常地发生大批量劳动力离开了劳动力行列。

接着我们将注意力转向长期,美国人现在处于1978至1982年滞胀之后的最悲观时期,调查数据显示,美国对子孙后代的生活水平是否会超过自己这一观点持怀疑态度的人数达到创纪录新高,他们想知道经济是否还能恢复正常,或者新的经济常态就是增长率长期处于很低的水平,

甚至是出现日本式的长期滞胀;他们想知道美国走向欧洲式福利国家的艰难旅程是否会停滞,货币政策和政府债务的急剧增加是否会最终导致通胀高企;他们想知道就业市场的低迷是一个周期性的问题还是劳动力市场的一种永久变化,以及福利开支大幅增加导致政府债务持续扩大(也许会发生在财政赤字较低、政府债务占GDP比重较稳定的几年之后)是否会严重影响孩子们未来的生活前景。

图表5列出了几个机构对美国未来5年和10年的经济增长预测。未来5年,年平均增长率预计最低为2.7%(蓝筹共识),最高为3.2%(白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预测处于两者之间。所有机构对未来10年增长率的预测都更低一些,这反映了两点:第一、未来五年的经济预测反映出随着美国经济从深度衰退中逐步复苏,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会进一步赶上潜在GDP的增长速度。第二、受人口因素的影响,劳动力增长预计将放缓。这主要是因为二战后婴儿潮那一代人逐渐到了退休的年纪(值得注意的是,非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出现了大幅下降,如果这一比率出现任何反弹,就说明经济情况出现了好转,并且表明近年来政府大力推行的几项重要的鼓励就业的收入支持计划产生了作用)。由于劳动力增长预计将放缓,到2023年的10年内甚至以后更长时期内,实际GDP增长率预



计将放缓至2.3%（白宫）、2.2%（国会预算局）、或者2.5%（蓝筹共识）。如果加上合理的政策改革，包括提高对政府项目和税收体制进行改革的动力，以及（或者）接受更多的经济移民（政治上有不确定因素），美国应当能达到或者超出上述预测的最高值。

财政整顿的前景喜忧参半。最新的研究表明，二战之后经合组织成员国进行财政整顿的成功经验（即在稳定预算的同时避免出现经济衰退）显示，税收增加1美元对经济的影响相当于实际支出平均减少了5至6美元。与增加税收相比，减少支出，尤其是减少福利支出和转移支付，导致经济衰退的可能性更小，有时还可能促进经济增长。最近经同行评议的期刊登出了十几篇研究，其中包括奥巴马总统的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首任主席的一篇文章，一致列述了加税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因为美国经济和其他国家的经济有所不同：美国经济占全世界经济总量的比例超过了五分之一、美国的利率水平已经很低、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很多其他国家也在同时进行财政整顿，所以我们在对财政整顿的短期收益进行评估时不能过于乐观。

成功控制支出的典型案例发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克林顿总统和共和党国会统治下。但在2000年以后，在华盛顿州以及其他很多州，更常见的是相反的情况，经济繁荣带来政府收入的增加，政治家们就迫不及待地想要大范围地增加支出。理想情况下，随着经济的复苏，削减支出的计划将会逐步实施，但是我们很难给出有说服力的论据证明这种情况一定会发生，因为预算具有政治经济性、以前的预算协议情况并不理想、而且本届国会难以约束下届国会的行为。

长期

但是美国经济的长期前景也不像很多评论说的那么黯淡，美国股市最近还是创下了名义上的新

高。这些悲观主义者声称由于财政、银行、贸易、就业和人口等方面的诸多问题，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将面临不可避免的衰落。

更为均衡的观点认为，上述（部分）担忧是完全有道理的，这些问题确实很难克服，尤其是欧洲的银行和债务问题以及美国的财政问题。但是，在历史上任何一个时刻，我们都可以列出一个类似的清单，上面满是据称无法克服的难题，如20世纪60年代的自动或结构性失业问题，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滞胀问题，80年代末来自日本的竞争问题，但是市场经济与生俱来的弹性与活力，尤其是在美国，技术创新及生产力提高的浪潮完全克服了这些困难。

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美国更占优势，因为美国的人口压力没有欧洲及日本（中国最后也是一样）那么大，与欧洲相比，美国的税收更低，国家的福利负担也更轻。但是目前美国正在扩大其福利范围，政府债务也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历史经验来看，美国的政治体系都会回到钟摆的正中间，那么这次会不会太晚了？美国已经有将近一半的人在接受政府救济，只有一半的人在缴纳所得税。对于一个想要控制福利支出的国家来说，这可不是一个健康的政治经济状态。

最重要的是，美国在技术、生产力和高等教育方面仍处于全球领先地位，这一优势远远超出信息技术范畴。幸运的是，近年的历史经验显示，有些国家能成功将福利状态回调至可以维持稳健经济增长的水平，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的美国以及90年代中期至2000年之后的加拿大。

总而言之，我对美国经济的持续、缓慢复苏以及温和的长期增长持谨慎乐观态度。但是未来的事情谁也说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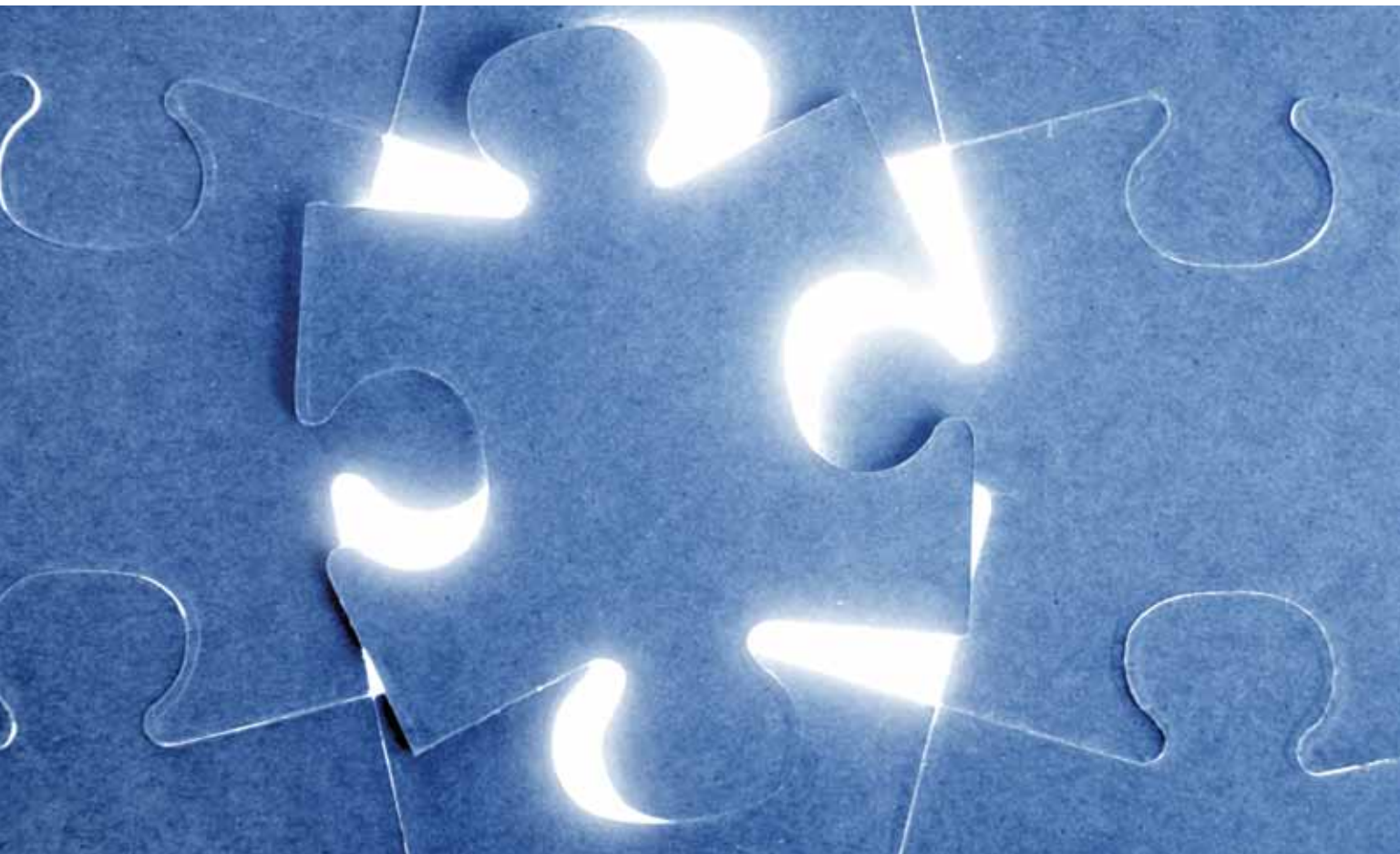


附录二

图表2A: 2011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

世界排名	大学	国家
1	哈佛大学	美国
2	斯坦福大学	美国
3	麻省理工学院	美国
4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美国
5	剑桥大学	英国
6	加州理工学院	美国
7	普林斯顿大学	美国
8	哥伦比亚大学	美国
9	芝加哥大学	美国
10	牛津大学	英国
11	耶鲁大学	美国
12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美国
13	康奈尔大学	美国
14	宾夕法尼亚大学	美国
15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美国
16	华盛顿大学	美国
17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	美国
18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美国
19	威斯康星大学	美国
20	伦敦大学学院	英国

来源: 上海交通大学



第六章

中美经济关系中的困难与障碍

郭国全

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名誉高级研究员、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前任政府经济顾问(2004-2008)

摘要

过去几十年，中美关系发展迅速，但是由于两国在经济、政治、历史、文化和价值观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两国在交往中不时会出现问题和纠纷。

在商业领域，美国企业经常抱怨中国不愿加速开放自己的市场、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受到不平等待遇、中国监管规则的不足使外国投资者置于竞争中的不利位置。最近几年，比较受关注的问题包括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不足、网络安全问题、国有企业以及市场准入等问题。

中国方面认为，尽管中国在过去35年改革开放期间取得了快速发展，但整体而言中国仍是一个地域发展极不平衡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请美国耐心一点，因为中国也很想进一步推进改革和现代化，但是这些都需要时间，因为这些事情的复杂程度非常高，并且改革需要循序渐进。

同时，中国也抱怨美国限制高科技产品对中国的出口、不肯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以及

将中国与美国之间的经贸往来政治化，故而导致美国政府行为经常显得随意及具有保护主义色彩。

中美双方对于这些问题的不满和担忧都是合情合理的，需要严肃对待。两国政府采取积极态度，及时化解这些不满应该有助于解决部分问题。但是有些争议在短期内是无法完全解决的，未来随着两国接触和交往更加深入，还会有新的问题出现。

尽管存在这样的问题和争议，两国没有让这些困难成为阻碍两国双边经济关系持续发展的障碍，过去这些年，中美两国双边关系已经发展成为全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实际上，由于两国都是带着某种程度的猜疑的眼光来看待对方，所以经济关系的持续发展，可以帮助双方相互了解，促进互信。只有增加和深化这样的经济联系，才能使双方下定决心，建立共同利益，进而使两国在未来的发展中克服双方关系中的种种困难。



中美经济关系中的困难与障碍

引言

中国从1978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自此以后，中国采用循序渐进的方式由中央计划、政府严格控制的经济逐渐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决策权力的分散化、市场力量的引入、以及对外贸和外商投资逐步放宽管制都是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主要政策方向。改革开放在不同地区和不同领域的进展速度各不相同，主要取决于该地区或经济部门是否已具备改革条件，还取决于政府的发展政策和策略。

这种渐进式的改革使中国在过去35年中取得了飞速发展，中国没有经历20世纪90年代以东欧国家为典型的“休克疗法”。但是，这种渐进主义的方式也带来了许多困难和挑战，其中一项挑战就是市场导向和政府控制在经济发展中长期共存。例如，在改革初期，政府控制价格和自由市场价格共存，这就给当权者带来了套利的机会并滋生了腐败。今天，在中国经济的很多领域，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相互竞争，这引起了很多有关不公平竞争的抱怨，这些抱怨不仅来自外商投资者还来自本国企业。此外，有些享受特殊待遇的国有企业逐渐变成既得利益者，他们部分会想尽办法保护自己的特权，阻止改革的深化。

中国发展的另外一个特征是虽然有些部门和地区在过去35年内出现了高速增长，但是其他一些部门和地区却落在后面，有一些是远远落在其他部门和地区的后面。如果政府在制定政策时考虑欠发达部门和需求，通常就意味着这些政策对于在相对较发达部门和地区运营的投资者来说太过保守。

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但是和大部分社会一样，中国的习俗和惯例、社会价值、文化偏好和体制能力等的发展速度要慢得多。教育人民、改变人民的思维和行为模式都需要很长的时间。一个高效、现代化的市场经济机构和组织的建设不仅需要新的监管规则、新的制度结构和大量在专业服务领域有经验的专家，还需要形成很多不成文的行为规范、法律和先例以及遵守法律的文化。

在这样复杂的背景下，中国的私营企业需要克服很多特有的困难。尽管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带来了许多机遇，但是竞争环境并不是公平的，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竞争规则还可能不断发生变化。因而，很多外商投资者和私营企业在开展业务时会抱怨困难重重且受到不公平待遇也就可以理解了。

中美经济关系遇到的机遇与挑战

在中国35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美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美国一直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美国企业是中国外商投资的重要来源之一。2012年，美国和中国双边货物与服务贸易总额达到5,270亿美元，美国企业以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在中国进行了总额超过700亿美元的投资，而中国企业最近几年也开始积极在美国进行投资。两国之间的跨境金融投资金额也非常巨大。在所有的主权国家投资者中，中国政府是美国国库券和机构证券的最大投资者。

展望未来，经济学基础理论认为双边贸易的增长大体与两国的经济规模成正比，因而我们预计中美两国的货物与服务贸易额会随着两

国的经济增长而增加。预测两国货物与服务双边贸易额在到2022年的十年期间会增长2.5倍¹。此外，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对高科技产品、高质量消费品与服务、专业的企业和金融服务的需求会快速增长，而这些恰好是美国企业的强项。

除了贸易以外，两国之间的跨境投资也很可能进入新的发展时期²。美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将如过去20年一样流入中国，而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将进入高速增长期。据预测，未来十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将超过1万亿美元，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资金是流向美国。中国对美国的年外商直接投资额预期很快将超过美国对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两国之间的金融投资流过去一直受到中国外汇及投资政策的限制，但是近年来中国正积极放开这些限制，随着放开进程的持续，两国之间的金融投资很可能出现快速增长。

中美经济合作进一步增长的机会非常大，包括规模上的增长和领域的扩大。过去两国之间的合作给双方带来了巨大利益，未来这一趋势仍将延续。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美国和中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不管是在历史、文化和价值方面，还是在经济和政治体系方面。两国关系的整体发展经常会因为双方在重要全球战略性问题上的意见不一致和相互不信任而蒙上阴影。两国政府经常带着猜疑的眼光看待对方。在商业关系中，双方不时会提出严重的担忧和争议，尤其是美国企业。尽管大多数担忧是（至少是当中一部分）有根据的，但是有些担忧却因为对事实的误解、政治化或错误解读而被夸大了。

两国必须通力合作来认真解决这些问题，但同时，如果中美想要继续享受和促进两国关系带来的互利互惠，两国就得寻找新的机遇。因此，当务之急是建立互信，管理和解决两国的战略分

歧。建立互信需要时间，但是两国之间的分歧不应当成为两国开展更密切的经济合作的障碍。

两国的企业部门已经找出了阻碍两国经济关系进一步深化的困难与障碍。这些因素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最近美国方面担心的主要问题是中国经济中的国有企业问题（以及国有银行作为资金提供者的问题）、中国的市场准入问题、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执行问题、以及网络安全问题（尤其是商业机密盗窃问题）。中国方面抱怨的问题主要包括美国限制高科技产品向中国的出口、美国政府否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美国政府在贸易和投资领域的行为通常都显得随意而保护主义色彩浓郁。

这些因素对扩大经济合作具有实质性影响。对于中国和美国这样具有广泛而活跃的商业互动的两个国家来说，肯定会存在争论和担忧。坦率地承认这些问题，并承诺解决这些问题，这才是双边关系走向成熟的标志。双方政府只有正视这些问题之后才能解决它们，这是一个困难的任务，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完成，但是一定要完成。

但是，双方也应当意识到短期内解决这些问题还存在一定困难。实际上，有些问题永远也无法作为一个独立的问题直接解决，而是必须经过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因而，重要的是集中精力通过合作促进两国未来潜在在经济关系的发展。两国的成功合作不仅可以给两国人民带来经济利益，还可以在两国之间建立互信。两国的合作和互动越多，两国的互信程度越深，这反过来又可以减少双方的分歧。

1 详见本报告的第八和第九篇分报告。

2 详见本报告的第十三篇分报告。



美国提出的不满以及本文的建议

知识产权保护³

美国，以及中国国内及国际的机构都指出，中国过去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不管是外国还是中国公民的知识产权，都是不足的。

中方承认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的不足，但是指出，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已经竭尽所能改善知识产权保护状况。中国的法律及机构设置正在加强，而根深蒂固的文化观念也正在改变。

中国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到要努力通过科学、技术和创新来推动经济增长，因此，保护本国居民或企业拥有的知识产权对中国来说也是有利的。我们应当注意到中国政府承诺在所有中央、省级和市级政府中杜绝使用盗版软件就是这个方面迈出了一大步。政府主动采取措施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知识产权保护正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

建议：

首先，在认识到有必要在国务院内成立一个跨部门的知识产权保护机构以全面实施政府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各项政策之后，一个名为“国家知识产权领导小组”在2004年成立了。现在是时候加强这个小组的执行和协调功能，以达到有效及全面的执法。

第二，对于中国来说，建立一个国家特别法院专门解决知识产权纠纷也许是有用的。该法院在全国享有司法权，其裁决是有约束力的，且会在全国执行。这在很大程度上会促进中国知识产权纠纷的解决，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第三，美国和中国都应当承诺加快处理双方投资者在当国已获批专利的注册申请。例如，中国的专利主管机构可以考虑接受企业或个人

在申请美国专利的过程中向美国专利主管机构提交的文件，反之亦然，这样就可以加快中国和美国的专利审批速度。

第四，我们建议中国政府杜绝使用盗版软件的承诺不应当仅适用于中央、省级和市级政府，还应当适用于中央所有和地方所有的国有企业。

最后，我们还提议中美之间增加专业交流，以提高对专利、品牌和版权所有者权利的了解。

网络安全⁴

政府之间的间谍活动不是什么新鲜事，这种事情古来有之，政府很可能还将继续使用所有能用上的手段来开展间谍活动，其中包括网络空间。但是，个人使用网络空间从事商业或工业间谍活动以窃取信息或搞破坏应当视为犯罪。

美国宣称中国政府直接或间接组织了针对美国的网络攻击。但是，中国政府坚决否定了这一指控。事实上，中国也视自己为网络攻击的受害者。实际上，在认识到网络攻击可能带来的巨大伤害之后，中国已经认定黑客行为非法。尽管中国政府否认自己直接或间接参与组织网络攻击，中国政府承认中国可能存在个人参与黑客行动的现象。

在这样一个时点，两国政府之间迫切需要进行直接和公开的对话。这可以促进相互理解，最终达成协议，共同阻止跨境网络犯罪，将网络黑客绳之以法。

自2009年之后，两国的智囊团，即美国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一直在进行“中美网络安全对话”。他们在2012年6月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对两者达成的协议和存在的分歧进行了概述。这样的对话有利于促进互信，值得鼓励。

³ 详见本报告的第十四篇分报告。

⁴ 详见本报告的第十四篇分报告。

建议:

为了最终达成协议阻止上面提到的跨境网络犯罪,两国政府间对话是必不可少的。实际上,这样的对话越快开展越好。两国也应当和国际社会一起采取行动,制定针对国际网络犯罪的监管规则,目前这一块还有所欠缺。

国有企业和市场准入⁵

美国方面抱怨中国国有企业的“特权”地位,与中国国有企业竞争,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海外,都是不公平的,因为它们处于垄断地位并且可以优先获得贷款。此外,还有人担心国有企业是中国国家的代理人,不是基于单纯的商业原则运作。这些抱怨不仅来自美国方面,国际社会和国内相关利益方也时常发出这样的抱怨。

中国方面指出,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国有企业在过去35年的国家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在国家建设方面的工作还没有完成。同时,他们也指出,经过了35年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影响逐渐增强,国有企业的影响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大了。实际上,今天在中国,对于国有企业未来应当朝着什么方向发展也有不同的观点。

如今,归中央政府所有的国有企业只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不到15%,就业只占8%多一点。他们主要占据着关乎国家安全的战略性核心产业。同时,中国飞速增长的私营部门充满活力,已经占据了信息技术产业(例如阿里巴巴、腾讯、华为、新浪和百度)和房地产行业(例如大连万达商业地产、万科、恒大集团和碧桂园)。即使在能源领域,有些私营企业,如新奥能源和中国燃气,在中国数百个城市负责当地燃气供应。中国还有一些私营汽车制造商,如吉利和比亚迪,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实际上,如今中国私营部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超过了50%,就业的比例

占到了60%。剩下既非央企又非私营的35%的国内生产总值和32%的就业是由农业部门、个体户、合作社以及归地方政府所有的国有企业创造的。

市场准入方面,美方要求更广泛、更简便的市场准入权,这里的市场准入既包括对中国的货物和服务出口也包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市场准入方面的抱怨包含几个方面,首先是中国的政府采购和国有企业采购缺乏透明度和公平的竞争环境,其次是中国政府不允许外资企业在一些工业和服务业行业取得控股权,尤其是投资银行和保险业。国际社会和中国国内也表达过同样的担忧。

中方对此作出回应,在取得控股权方面,中国采取逐步放宽的策略是为了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以及出于保护新兴产业的需要。中方已经要求美方以长远的眼光看待其在中国的投资。

在政府采购方面,美方呼吁公平公开的采购程序,因为外国公司和中国私营企业有时会被排除在采购过程之外。中方已经明确表明政府的态度,采购过程中不应当偏向央企和地方国有企业,所有参与者应当享受同等待遇。但是,政策执行有待进一步加强。

建议:

自从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和2013年3月的人大会议之后,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反复强调,中国想要顺利实现经济转型,持续深化改革并转变政府职能以促进市场竞争是关键。随着中国发展和改革的深化,美国企业似乎能在帮助中国发展服务业方面起到建设性作用。

事实上,中国的经济转型将催生出世界上最大的交易市场,整体而言,这对美国企业来说是一次机遇。《上海美国商会2012-2013中国商业报告》称,虽然美国企业发现中国的监管和政策环境变得越来越具挑战性,但是被调查者中仍有91%对未来五年的企业前景持“乐观”或“谨慎乐观”态度。

⁵ 详见本报告的16篇分报告。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建议两国的智囊团从美国和中国角度全面彻底地审视国有企业和市场准入的问题。这可以增进了解，甚至有可能帮助两国政府找出方法推进上述问题的解决。

中国提出的不满及本文建议

对高科技产品出口的限制

美国对中国进行高科技产品出口限制是从1989年开始的，自此以后，美国对中国的高科技产品出口占中国高科技产品进口总额的比例逐渐下降。数据显示，2001年，中国高科技产品进口总额达560亿美元，其中美国占比16.7%；到2011年，这一进口总额达到4,610亿美元，但是美国所占比例缩小至6%。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多年来，中国对高科技产品的需求都是通过从欧洲、日本、以色列和很多其他国家进口来满足。据估计，未来十年，中国对高科技产品的进口需求平均每年的增长率将超过20%。

我们都知道某些高科技产品具有军事用途，对这些产品的出口进行限制也完全可以理解。但是，美国对出口管制有时候显得非常随意，经常把一大片中国市场完全留给了美国之外的竞争者。过去曾经向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提出建议，但是这件事情仍在考虑中，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

建议：

我们建议美国在解决这个问题上要有一点紧迫感，这样就很有希望得到一个双赢的结果。

市场经济地位

中国反复抱怨的一个问题是尽管目前市场力量在决定中国几乎所有商品的价格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美国（以及欧盟）一直没有承认中国的“

市场经济地位”。没有市场经济地位使中国在反倾销调查中处于不利地位，因为国内价格不能用来判定一国的出口是否存在倾销现象。在反倾销调查中使用“模拟市场价格”经常会对出口国造成不利影响，中国就是受其影响的出口国之一。

根据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2015年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将自动得到承认，到这个问题就会消失。中国认为现在就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是公正的，如果美国这么做，这将成为一个重要的友好之举。

建议：

尽管2015年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将自动得到承认，但是我们仍建议美国尽快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经济事务政治化以及其他行政行为

中国还抱怨美国不时有将两国间贸易及投资领域的经济事务过度政治化的倾向。对中国企业来说，美国政府在贸易和投资领域的某些行为，包括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行为，都显得非常随意，且保护主义色彩浓郁。这些行为包括向中国产品征收特殊的关税及税收，否决中国企业在某些领域的直接投资，其中既包括国有企业也包括私营企业。美国出于国家安全考虑作出这样的决定可以理解并接受，但是美国应当给出详细解释，当然这些决定不应当是出于政治考虑。

建议

我们建议美国政府就投资批准流程出台更清晰的监管条例。

结语

中国经济正处于重要的转型时期，为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政府非常清楚有必要深化

改革开放、改善市场结构、促进公平竞争、通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高创新能力。

两国都希望为本国的国民创造一个安全、优质、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就业环境。过去几十年的历史经验表明，过去建立并维护得很好的中美双边关系对实现这个共同目标有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2013年3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致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恭喜他当选中国新一任领导人，并讨论了中美关系的未来⁶。奥巴马总统强调了两国共同努力扩大贸易和投资领域合作机会、解决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的重要性。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国家主席强调了解决网络安全威胁的重要性，这个问题是中美共同面临的一个挑战。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进行经常性会晤。

同样，2013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北京接见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时表示，中美两国应当共同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双方应当坚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两国关系。习近平希望两国以积极态度和发展眼光推进对话合作，以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精神妥善处理分歧矛盾。习近平还指出双方应当进一步拓宽合作领域，增强互动，采取积极措施解决双方关切的问题，不能将经贸问题政治化⁷。

⁶ 详见：<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3/03/14/readout-president-s-phone-call-chinese-president-xi-jinping>

⁷ 详见http://www.gov.cn/lhdh/2013-04/13/content_2377091.htm



第七章

中国中产阶级崛起及其对中国和世界经济的影响

鲍达民

环球董事总经理，麦肯锡公司

“不言而喻，最好的政体是由中产阶层的公民组成的。凡中产阶层数量充足的城邦，往往能得到最出色的治理。”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06年

摘要

当前，中国正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经历着社会和经济的深刻转型。经济的高速增长，伴随着席卷而来的城市化浪潮，推动着国民收入水平显著提升，一个拥有强大消费力的新兴中产阶层正在崛起。2012年，中国的中产阶层数量已经超过美国的总人口。

城市的快速膨胀造成多重压力，包括交通

拥堵、空气污染以及清洁水和居住面积的长期性短缺。中国需要治理这些问题以确保可持续增长，回应新兴中产阶层的需求及愿望。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中国中产阶层的崛起将同时对中国和世界的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并且为美国带来难以限量的商业机遇。到2022年，中国中产阶层消费的商品和服务将高达3.4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总GDP的24%。

中国中产阶层崛起及其对中国和世界经济的影响

中产阶层力量正重塑着中国

直至2000年，中国的城市中还只有4%的家庭属于中产阶层¹。截至2012年，这一比例攀升至68%。预计到2022年，中国中产阶层数量将增至6.3亿——占城市家庭总量的76%，全国总人口的45%。中国正在快速成为一个中产阶层主导的国家。

工业化及城市化是中国中产阶层快速崛起的关键原因。其发展和扩张几乎都发生在城市——今后也将如此。如今的中国，城市人口占

到了全国总人口的52%；预计到2022年，这一比例或将增至63%。从目前到2022年，中国将新增1.7亿城市人口，城市人均收入差不多是农村人口的3倍。

城市中产阶层的壮大哺育了大量的高技能劳动力，他们为生产力的提高做出了贡献。相应地，他们的劳动生产率也因为城市化得到了提升。城市化既带来了如基础设施大发展等“硬件”益处，也带来了诸多“软件”好处，如教育、医疗、个人金融服务的改善。对于中国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成就，人们有目共睹。但政府所做的那些能够真正释放日益庞大的中产阶层经济潜力的软性投资，却较少得到重视。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例，在2005年的时候，只有不到1.5亿的中国

¹ 根据我们的定义，中产阶层的家庭可支配收入在6万-22.9万元人民币之间。在购买力同等情况下，相当于在意大利和巴西的平均收入区间之间。这一群体在生活必需品的花费小于50%，而且其消费行为和消费习惯有别于其他阶层。



图表1: 上层中产阶级将成为新主流群体

年均家庭收入(阶层) —— 美元		城市家庭—— 百万			家庭数量变化 2002-22, 百万
		100% = 165 2002, %	100% = 256 2012, %	100% = 357 2022预计, %	
富裕阶层	>34,000	1	3	9	29
上层中产阶级	16,000 to 34,000	2	14	54	188
大众中产阶级	9,000 to 16,000	7	54	22	66
贫困阶层	<9,000	90	29	16	-92

来源: 麦肯锡“解读中国” - 宏观经济模型更新, 2012年4月

人享受基本医疗保险,但截至2011年底,已覆盖总人口的95%以上。对于受惠的城市居民来说,医保的自付比例已从59%降至35%。这个例子可以说明,中国政府现在已经意识到中产阶级发展的质量与数量同等重要。一条平衡的城市化道路对于中产阶级的健康发展至为关键。

中国正朝着劳动生产率更高、现代意识更强的中产阶级时代转型。这将影响中国未来几十年的经济增长模式,其中劳动生产率正成为一个日益重要的增长引擎。而这一切,将巩固中国的商业核心市场地位。

中产阶级结构的深远变化

除了数量不断壮大,中产阶级的增长模式也在不断变化。目前,中国的中产阶级结构正经历着一些显著变化。

“上层中产阶级”渐成新主流群体

我们将目前的中国中产阶级划分为两个群体:一个是大众中产阶级(家庭年均可支配收入在6万-0.6万元人民币,相当于9,000-1.6万美元),2012年在所有城市家庭的占比为54%;另一个是占城市家庭中14%的上层中产阶级(家庭年均可支配收入在10.6万-22.9万元人民币,相当于1.6万-3.4万美元)。其中,上层中产阶级的消费占到中国城市个人消费的20%,超出其实际人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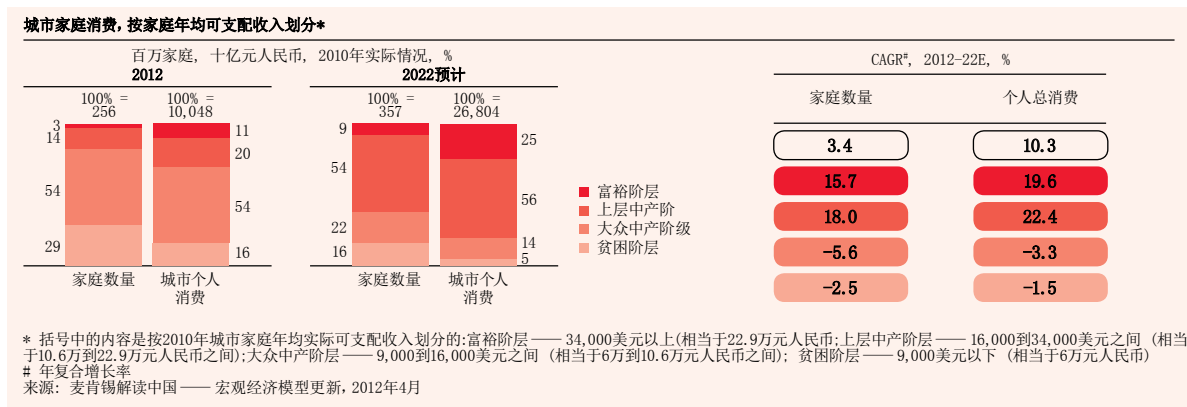
占比(见图表1)。

这个结构在十年之后将会出现很大改变。到2022年,上层中产阶级在城市家庭总数的占比将升至54%,占中国全部中产阶级家庭总数的71%,一跃成为新的主流群体。届时,上层中产阶级将贡献城市个人消费的56%以及中国个人消费总量的49%(大众中产阶级只贡献13%)。

上层中产阶级成为主流群体将推动消费市场更加成熟、更具吸引力。与大众中产阶级相比,上层中产阶级消费者更愿意为高品质产品支付溢价,他们对知名品牌的信任度更高,在非生活必需品和服务(与之相反的是生活必需品,如食物、衣服和住房)的开销往往也更多(见图表2)。这一群体的心态更为国际化,他们对国际品牌持开放态度,甚至热切追捧。

比起大众中产阶级,上层中产阶级是一个更为成熟、经验更丰富的消费者群体。比如,将近60%的上层中产阶级消费者购买了数码相机,而大众中产阶级消费者只有40%。在笔记本电脑的购买上,两者的比例分别为51%和32%。衣物柔顺剂的购买情况也类似,比例分别为56%和36%(见图表3)。从首次购买基础产品种类的趋势可以看出,大众中产阶级仍处于消费行为的早期阶段。比如,在厨房家电用品类开销增加的大众中产阶级消费者中,69%的人表示自己是首次购买,而上层中产阶级消费者的这一比例仅为24%。

图表2: 中产阶层的增长规模正在重塑中国



图表3: 上层中产阶层和大众中产阶层的显著差异

		上层中产阶层	大众中产阶层
他们是谁	家庭收入	▲ 10.6万到22.9万元人民币	6万到10.6万元人民币
	35周岁以下的消费者比例	▲ 45%	38%
他们在哪里住	拥有数码相机的家庭比例	▲ 58%	40%
	使用衣物柔顺剂的家庭比例	▲ 56%	36%
看重什么	耐用性*	36%	▲ 62%
	情感因素 [#]	▲ 23%	16%
他们如何消费	愿意支付溢价 [†]	▲ 49%	40%
	消费升级 [‡]	▲ 39%	24%

* 将“耐用”作为智能手机五大购买因素之一的受访者
将情感因素(如“显示我的品位”)作为购买手机时一项重要考虑因素的受访者比例
† 表示“只要在支付能力承受范围内, 愿意为最好的电子消费品支付溢价”的受访者
‡ 在白电升级消费上实际支出增多(如, 除通货膨胀以外的原因)的受访者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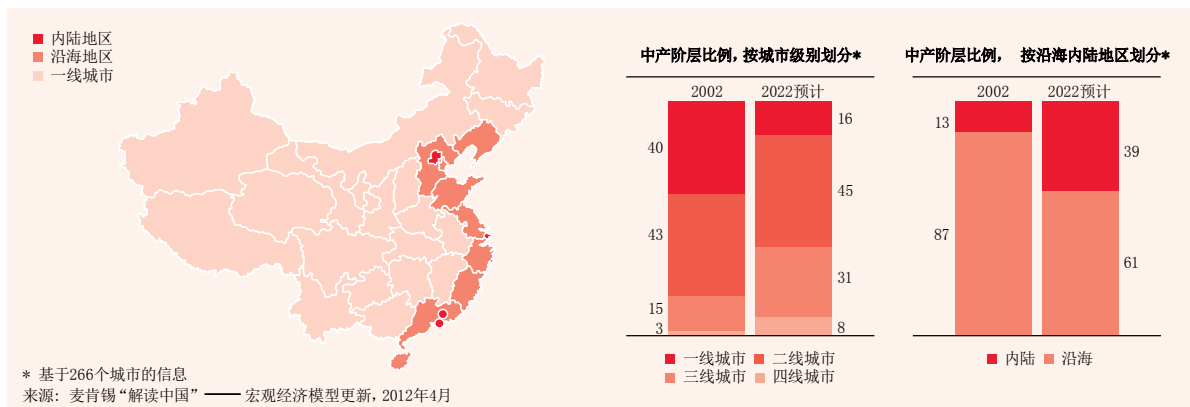
来源: 麦肯锡“解读中国”——麦肯锡年度中国消费者调查, 2012

这两大群体对“是什么因素让产品具有吸引力”的回答迥然不同。大众中产阶层消费者更看重基本功能方面的优势。2/3的大众中产阶层消费者将“耐用性”列为洗衣机的五大购买因素之一, 而上层中产阶层消费者中该比例不到一半。另一个例子是智能手机, 62%的大众中产阶层消费者将“耐用性”列为五大购买因素之一, 而上层中产阶层消费者中该比例仅为36%。在购买洗衣液、智能手机、方便面时, 他们也更可能将低廉的价格作为购买因素之一, 比例是上层中产阶层消费者的两倍。

上层中产阶层消费者越来越注重情感因素和社会因素。与大众中产阶层消费者相比, 他们更可能将“彰显我的品位”, “让我觉得我的家庭生活更美好”等情感、社会因素列为选购洗发水和智能手机时的考虑因素(可能性比大众中产阶层消费者高50%)。

相比普罗大众而言, 中国的上层中产阶层的视野更外向和开放, 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过去保守、内向的国民性格的一次突破。这一点对他们的消费行为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更钟情外国品牌。以个人消费类电子产品为例, 65%的

图表4: 中产阶级增长的区域中心正在迁移



上层中产阶级偏爱外国品牌，而城市普通消费者的比例为56%。34%的上层中产阶级偏爱外国食品及饮料，而普通城市消费者仅有24%。他们还更热衷于出国旅游，2011年10%的上层中产阶级曾出国旅游，而全国城市居民这一比例仅为3%。2011年，近一半的上层中产阶级消费者增加了出国旅游开支，增幅平均达36%。

这种国际化视野折射出了上层中产阶级的一些“身份标签”。例如，他们通常受教育程度较高，34%拥有学士或更高学位；外语能力较强，26%英语流利。互联网普及率的提高也加速了这一波国际化浪潮：68%的上层中产阶级是网民，而城市总人口的网民比例只有57%。这些中产阶级网民中，80%的人网龄超过四年。

中国市场将会继续保留其特殊性，但随着上层中产阶级成为新的主流，我们有理由期待中国市场更加接近世界其他成熟市场。

中产阶级成长的地域重心迁移

如果商界希望把握住这轮商机，就必须对中产阶级究竟来自哪里进行细致研究，因为这一群体成长的地域正在改变。

2002年，中国40%的中产阶级生活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四座一线城市，或称“特大

城市”中²。然而，我们预计到2022年该比例将降至16%，主要增量将来自二、三线城市：二线城市中产阶级从2002年的43%升至2022年的45%；三线城市则从2002年的15%提高到2022年的31%（见图表4）。

从特大城市向中型城市的迁移同时也意味着从沿海城市向内陆城市迁移。2002年，仅有的生活在内陆城市的中产阶级比例为13%，到了2022年有望达到39%。

在这里，我们以两个小型城市为例来描绘地域重心迁移的强度。吉林省蛟河市是一座内陆四线城市，由于其作为东北亚经济区核心的交通枢纽而获得快速发展，同时还拥有草药及可食用真菌等丰富的自然资源，并且是中国重要的葡萄酒及米酒产地。2000年，该市7万户家庭中尚不足900户为中产家庭；到2022年，该市将增至16万户家庭，其中9万户（即60%左右）跻身中产阶级。甘肃省武威市也是一个内陆四线城市，其发展优势包括：（1）地处金昌——武威经济开发区内；（2）丰富矿产资源（邻近的石墨

2 中国的城市可按经济发展程度及政治重要性分为四个级别。一线城市有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四个城市2010年的名义城镇GDP均超过9,320亿元人民币，人口超过1,000万；二线城市主要是省会城市，还包括一些2010年名义GDP在1,200-9,320亿元人民币之间的大型城市，人口200-800万；三线城市2011年的名义GDP为220-1,200亿元人民币，人口在40-150万之间；四线城市2010年的GDP小于220亿元人民币，人口多在10-90万之间。

图表5: 新生代中产阶级的消费行为与其长辈迥然不同

	新生代上层中产阶级消费者	调查陈述举例	新生代上层中产阶级	非二代上层中产阶级
他们的信心如何	对自身未来财务状况充满信心	“今后5年我的家庭收入将大幅增加”	▲ 64	55
他们的支出意愿	消费升级	“在我所能承受的价格范围之内,我通常会为价格高昂的最佳产品支付溢价”——以个人护理产品为例	▲ 41	34
他们对创新的重视程度	喜欢尝试新产品	“在我认识的人当中,我总是第一或第二个尝试新事物的人”	▲ 29	23
	品牌忠诚度较高	“一旦我要购买一系列消费电子产品,我愿意购买同一品牌的产品”	▲ 46	42
他们如何采集信息	更加依赖互联网进行搜索	“在购买新产品之前,我通常会会在互联网上搜索其他人的使用体验/评价/反馈意见”——以个人护理产品为例	▲ 21	12

资料来源: 麦肯锡“解读中国”——年度中国消费者研究, 2012

烯和钛铁矿为全国最大); (3) 两条铁路及若干条高速公路的交通要道。2000年, 全市8.7万户家庭中仅有900户为中产阶级。到2022年, 预计全市65万户家庭中将有60% (即39万户) 为中产阶级。

新生代中产阶级消费者的历史转型进行时

出生在“80后”的新生代中产阶级消费者正在崛起。他们的父辈经历过多年的商品短缺, 所以最重要的是确保家庭财务安全, 而“二代”的出生和成长在物质相对丰富的时代, 由于安全感的提升, “新生代消费者更注重“享受生活”, 由于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 他们往往都是家中的独生子女。

麦肯锡调研发现, 新生代比他们的父母更有消费信心, 也更愿意为优质产品支付溢价。事实上, 他们认为贵的产品就是好的产品³。他们热衷于尝试新产品, 体验新科技。与父母比起来, 他们更忠实于信赖的品牌, 喜欢小众的细分产品而不是大众化品牌。更重要的是, 他们比起上一代信息来源更多, 比如他们非常依赖互联网获取产品信息 (见图表5)。

³ 麦肯锡《解读中国第二代消费群》, 2013年2月。本报告基于持续7年的入户消费者调研, 针对100个产品类别, 对来自60多个城市的7万名消费者进行了调研。

这一代人正成为中国经济的不可或缺的消费群体。到2020年, 这一群体将贡献全国35%的消费量, 他们将成为休闲产品、个人服务、旅行及高级酒店的主力消费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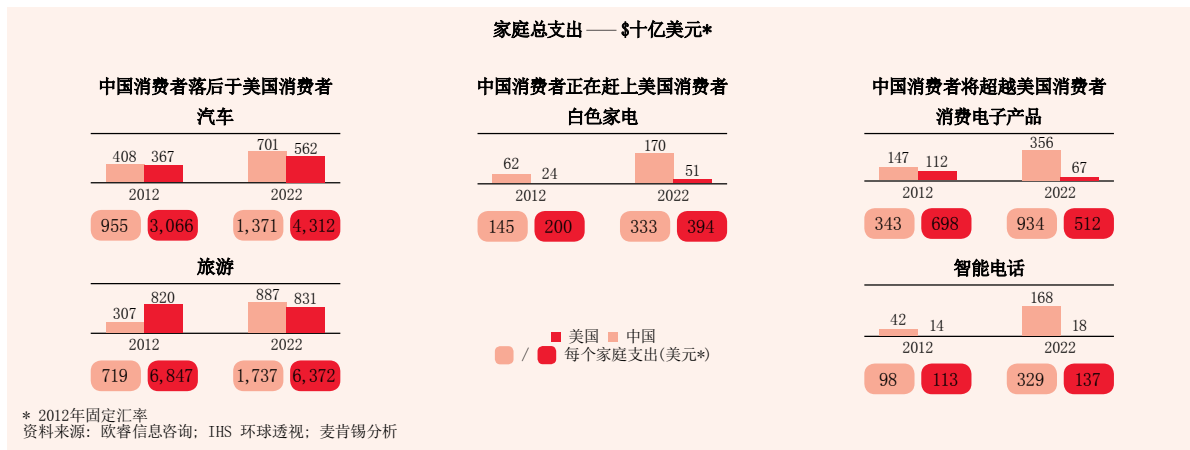
对宏观经济的深刻影响

中国中产阶级的崛起正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支撑着国内消费的扩大及私人投资的增长, 并且在教育水平提升的帮助下, 成为创新的“孵化器”。

现今, 中产阶级贡献了中国城市居民个人消费的73%和全国居民个人消费的58%。如果衡量对国内生产总值 (即GDP) 的贡献, 中产阶级占到城市GDP的24%和全国GDP的20%。到2022年, 中国中产阶级个人消费预计将达2.3万亿美元, 比2012年翻一番, GDP占比24%。而上层中产阶级的消费将增长七倍, 并占中国城市消费总量的49%。

由于推动生产力提升, 中国中产阶级的崛起还会影响到中国未来若干年的发展“质量”, 而这个群体同时还带动了个人服务的爆炸性增长。过去十年间, 服务业对中国经济生产力增长的贡献率接近40%。

图表6: 各商品种类的消费者市场规模和家庭支出



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 中国中产阶级壮大的红利才刚刚开始显现。随着教育和医疗水平的提高, 全球化进程中拓宽视野, 中国中产阶级将成为全球最大的高技能人才库。这一趋势将成为中国科技创新及进步的基础, 推动产业升级, 并跃升至价值链上游。个人金融服务的发展将对中产阶级消费者的财富加以管理和利用, 创建一个更加有力且高效的资源分配机制, 与国家金融系统并行, 从而提升资本利用率。随着与西方消费者在包括零售、餐饮消费、美容美发、以及私教、培训和健康服务等诸多领域的差距缩小, 城市就业岗位和商机的创建必将因之而飞跃式发展。从长远来看, 生机勃勃且蕴含极大生产力的中产阶级将是中国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中产阶级消费者崛起带来巨大的市场机会

中国中产阶级强劲且持续的增长以及收入的递增, 将为全球各个行业消费类企业提供巨大的市场机会——为新兴消费者以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方方面面提供广泛的产品及服务。到2022年, 中国消费者在白色家电类的户均消费将

接近美国水平, 而电子消费产品和智能电话的户均消费量将远超美国(见图表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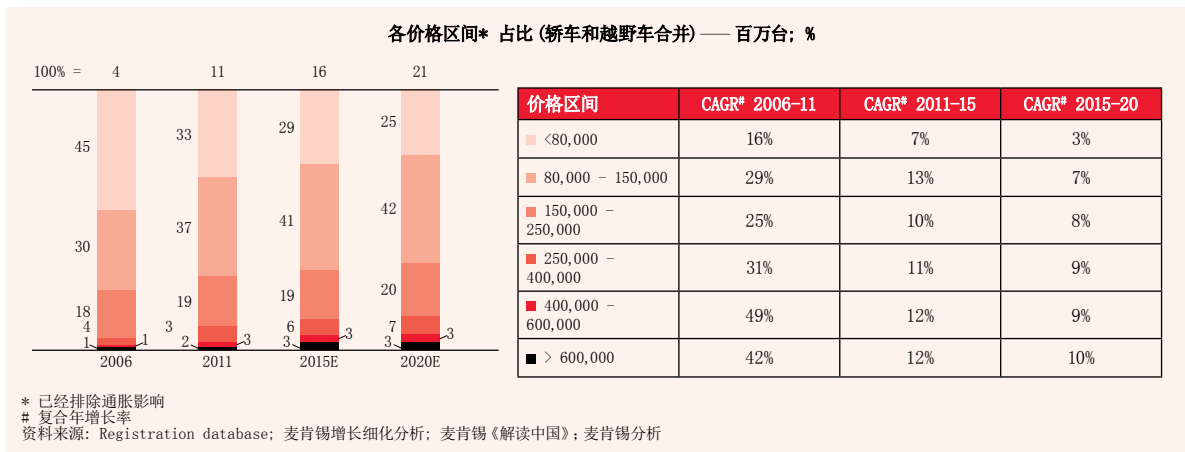
抓住这一波消费升级的浪潮

过去五年, 大多数产品种类的渗透率已显著提高。高科技产品的渗透率剧增在上层中产阶级尤为明显。举例来说, 平板电视在上层中产阶级的渗透率已从2007年的24%上升至2012年的68%。从销量看, 从2007年的1,000万猛增到2012年的5,000万台, 翻了五番, 比当年整个北美地区(美国和加拿大)的销量(4,200万)还多。另外, 智能手机的渗透率从2007年的0激增到2012年的50%。

另一相应的变化是, 愿意支付溢价购买高品质商品的消费者数量增长相当可观。近半数的上层中产阶级消费者称, “只要在经济能力承受范围之内, 就会一直支付溢价以购买最好的产品”。而所有受访者中只有40%左右愿意这样做。

汽车市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的乘用车市场至2015年将有望持续保持2位数的增长, 在2015至2020年之间, 市场依然健康发展, 增长率放缓至6%左右。当前的强劲增长是由3个主要因素所驱动: 城市化、家庭收入持续增长和汽车渗透率低。汽车价格通常是介于8万至25万人民

图表7: 汽车市场的消费升级趋势明显



币之间 (折合12,000美金-40,000美金) —— 约有60%的汽车都落在这个价格区间之内。在这一区间, 增长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下层中产阶级首次购车的消费者。未来十年, 随着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跻身上层中产阶级, 我们预计消费升级将成为新的趋势。在这十年间, 高端车的销量将会增加。2011年, 高端车的渗透率为9%, 超过日本和韩国。2016年, 麦肯锡预测中国的高端汽车年销量将会超越美国, 晋升为全球最大的高端汽车市场 (见图表7)。

某些产品和服务的渗透率仍将持续增长, 然而, 随着中产阶级的日渐壮大, “消费升级” 将成为中国消费者格局演变中最重要的主题。麦肯锡的2012年消费者调研指出, 约三分之一的上层中产阶级受访者表示, 过去一年他们的消费支出增加了。60%消费支出的上升是来自于发生在所有品类的通货膨胀, 但在上述表示实际消费支出增多的受访者中, 有三分之一提到趋优消费是主要原因⁴。

根据麦肯锡的消费者调研, 中国人往往把高品质与知名品牌及高价联系在一起⁵。出于这

个原因, 只要经济能力许可, 他们就会乐意选择消费升级。2012年, 39%的上层中产阶级对白色家电 (包括冰箱、空调和洗衣机) 进行了消费升级, 而平均城市居民中只有23%。以洗衣机为例: 上层中产阶级在2012年最近一次购买洗衣机的平均花费为2,100元人民币, 比2009年多了300元人民币或多了17% —— 但是在这期间, 洗衣机的平均价格上涨不足5%。同样地, 黑色家电 (包括平板电视和家庭影院系统) 也出现了消费升级趋势 —— 52%的上层中产阶级表示, 2012年在此类产品上支付了高额的费用, 较整个城市人口的比例高出了23%。在休闲活动和娱乐项目上同样出现了大量的消费升级, 而且上层中产阶级引领着消费升级。在休闲活动和娱乐项目上, 2012年有近1/3的上层中产阶级表示较上年增加了实际支出, 而2011年这一比例为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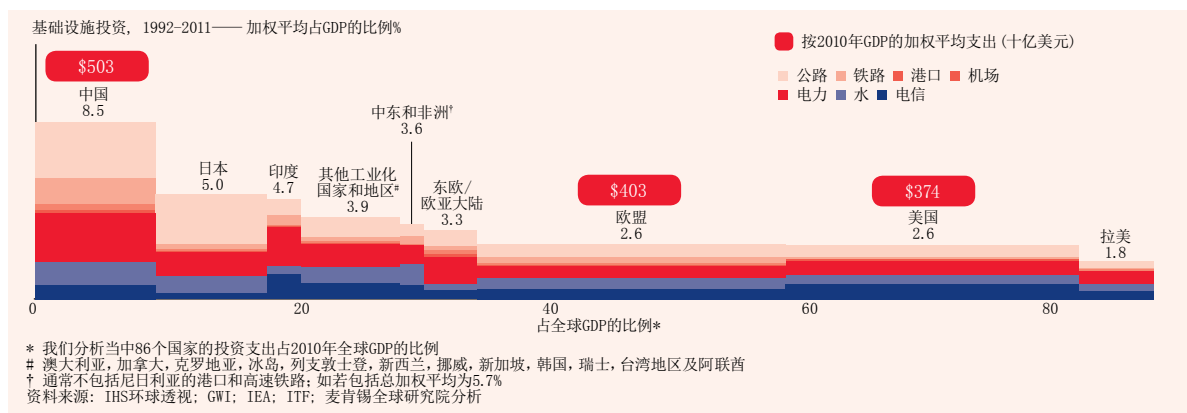
服务业增长的窗口已经打开

2022年, 预计服务业对中国GDP的贡献率将从目前的44%升至50%, 某种意义上归因于上层中产阶级越来越愿意为服务业埋单。因此, 包括娱乐、旅游、休闲活动、老年人照顾服务、安全服务和设备 (包括防盗警报器和保安摄像机)、教育和

4 《从大众消费到新主流消费: 跟上快速变化的消费者节拍》, 麦肯锡 “解读中国” 2012年度中国消费者调研报告, 2012年9月。

5 麦肯锡 “解读中国” 2012年度中国消费者调研报告, 针对10,000个居住在44座不同城市的家庭, 覆盖了约50个产品品类和300个品牌, 以了解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偏好和未满足的需求。

图表8: 中国已经超越美国和欧盟成为世界最大的基础设施投资国



物流等所有上述行业的增长速度必然加快。对全球性公司而言, 进军上述领域或是提升在这些领域影响力的时机已然成熟。

我们看到服务领域的消费提升已经成为趋势。2011年, 41%的上层中产阶级消费者每月外出就餐的平均花费为70元人民币, 较前一年有所增长。相比之下, 美国2011年同期只有15%的上层中产阶级消费者外出就餐的花费增加了。在旅游方面也同样如此。2012年, 中国27%的上层中产阶级消费者的旅游开支较前一年高, 而大众中产阶级只有22%, 美国的上层中产阶级为25%。

2012年中国人的非生活必需品类(包括教育、休闲、娱乐、医疗卫生和金融服务)消费中, 18%来自上层中产阶级, 这相当于他们家庭年支出总额的35%。预计到2022年, 上层中产阶级对非必需消费品消费的贡献率将升至52%——相当于其家庭年支出总额的42%。在教育方面, 37%的中国上层中产阶级2011年的平均支出较2010年增加了25%。在医疗保健方面, 68%的上层中产阶级已购买或使用医疗保健服务或产品, 比城市总人口的平均支出高出7%。

预计金融服务的消费也会增加, 这反映出一个事实: 中国的家庭金融资产正以年均约20%的速度递增。我们预计这类家庭资产将由2011年

的2.6万亿美元大幅增至2022年的17万亿美元。在保险方面, 2022年保险公司总保费的50%或将来自城市中产阶级。

巨大的基础设施产能需求是另一重大商机

除了消费升级和服务业, 在城市基础设施的所有方面也蕴藏着无穷商机。当前, 中国城市所面临的挑战正在转变。依靠充沛的土地和向城市迁移的农村人口已经不可持续, 因此必须注重城市化的质量和生产力。各城市需提高资源利用率以缓解日益增长的水资源、能源和其他资源的需求。同时, 也应致力于控制空气污染和水污染, 并减少废弃物排放, 实现环境可持续性, 为中产阶级创造一个宜居环境。不仅如此, 各城市也应持续提高城市交通、住房和公共服务的质量, 以满足日益富裕的市民不断提升的期望。

从商业角度而言, 上述需求为建筑业带来机会, 包括地铁的建设及相关机械设备、道路和桥梁的建设以及废水处理系统。中国早已取代美国和欧盟, 成为全球最大的基础设施投资国(见图表8)。具备相关专业技能的全球性公司有机会为中国的下一波城市化浪潮帮忙出力。

这一领域的商机会有多大？我们只需关注各级政府当前的计划。以铁路为例，计划修建8条客运专线、若干城际铁路交通干线、兰新二线以及区际列车干线如郑州——重庆。规划中的45,000公里高速铁路网络用来连接5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以及位于中国西部的干线，包括拉萨——日喀则线。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建设城市轨道交通网络系统，并完成在天津、重庆、沈阳、长春、武汉、西安、杭州、福州、南昌和昆明的城市轨道交通系统。此外，合肥、贵阳、石家庄、太原、济南和乌鲁木齐兴建骨干线路也在规划之中。民用航空是另一个计划要大规模扩张的领域。当前规划包括北京兴建一个新机场，以及扩建广州、南京、长沙、海口、哈尔滨、南宁、兰州和银川的机场。成都、青岛和厦门兴建新机场目前还处于可行性研究之中。

各城市也需要新的建筑来满足城市居民在零售、餐饮和办公空间等方面的需求。我们预计中国的城市还需要300亿平方米的住宅和商业建筑面积，仅大城市就需要200亿立方米的用水。中国的港口应该达到2亿标准货柜（TEU）的集装箱运输能力才能满足城市消费者与日俱增的需求。

新建基础设施创造了巨大商机，基础设施的规划、运营和融资同样带来不可低估的机遇。比如：智利、菲律宾、南非、韩国和台湾正在着手打造相关框架协议，让私营企业在项目和组合规划当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有鉴于来自私营承包商的建议书越来越多，上述国家和地区希望通过框架协议来很好地应对，通常做法是提供奖金或者特殊采购流程，对奠定基础的私营承包商予以奖励⁶。基础设施的融资同样存在商机，包括交通和废弃物处理。在贷款利差较大的情况下，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有大批待建的新建项目⁷，

因此全球对于资金的需求极大。更进一步，通过与地方政府的合作，企业可确保能够参与世界一流的信息和通讯技术（ICT）——杰出城市所必备的竞争优势——包括建设自动化监控系统的公用设施和基础设施，从而减少损漏，加速故障反应时间，并显著改善系统总体效率。私营企业已经投身于节能领域的一系列举措，以探索绿色城市生活的解决方案。

结语

快速崛起的中产阶级群体正在重塑着中国，这一态势在今后仍将持续。他们的购买力以及拥抱新品牌（包括国外品牌）的外向和敢于尝鲜的性格，对于美国企业意味着无穷的新商机。为充分把握该新兴消费群体，商界需要深入了解他们，并细致观察其消费行为如何演变。但这块“蛋糕”并非仅供消费类企业独享，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入，支持城市建设增长所必需的基础设施，以及发展全球现代化城市独具的所有服务种类，都蕴含着难以限量的机遇。

作者简介

鲍达民（Dominic Barton）是麦肯锡公司的全球董事总经理。他在麦肯锡任职27年，为不同行业的客户提供咨询服务，包括银行、消费品、高科技以及工业。在担任现职前，他于2004年至2009年担任麦肯锡亚洲区主席，常驻上海，并在2000年至2004年担任过麦肯锡韩国分公司主管。

鲍达民活跃于达沃斯论坛、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普罗旺斯埃克斯经济论坛、亚洲企业领袖协会及发展中国论坛等国际论坛。他就企业在社会的角色、领导力、金融服务、亚洲、历史以及全球市场面临的问题与机遇等主题撰写了80多篇文章。鲍达民与Roberto Newell和Greg Wilson合著有《危险的市场：金融危机中的管理

6 《基础设施生产力：如何每年节省1万亿美元》，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和麦肯锡基础设施咨询业务，2013年1月。

7 同上。麦肯锡发现，从现在到2030年，全球需要投资57万亿美元用于交通、电力、水供给和电信领域，比之前18年的基础设施开支多36万亿美元，增加近60%。



第八章

2022年中国对外贸易及 对美贸易发展趋势预测

陈锡康

教授，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预测科学研究中心

杨翠红

教授，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预测科学研究中心

祝坤福

助理教授，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预测科学研究中心

段玉婉

博士生，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大学

杨恋令

博士生，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大学

郑莉

博士生，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大学

摘要

改 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快速增长期。1978年至2012年34年期间GDP年平均增速为9.8%，远高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中国经济总量跃居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对外贸易也迅速发展，货物进出口总额从1978年的206.4亿美元增至2012年的38,668亿美元，年平均增速为16.6%，远高于同期经济增速。中国对外贸易增长极大拉动了经济增长。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双边贸易发展迅速，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2012年中美贸易总额已达到4,846.8亿美元，其中，中国对美出口3,517.9亿美元，增长8.4%；自美国进口1,328.9亿美元，增长8.8%¹；1978-2012年中国对美进出口总额、出口额和进口额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9.97%、23.47%和16.58%，中美已经成为双方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

今后十年，即2012-2022年，中国经济走势是否会持续之前30年的高速增长，还是增速将大幅放缓？中国对外贸易和中美贸易是否会延续近几年增速下滑态势？本文将从影响2012-2022年中国经济增长、对外贸易以及中美贸易发展的有利因素、不利因素着手，分析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和对外贸易的运行环境，对主要经济贸易指标进行定量预测。研究表明，2012-2022年，中国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但仍将保持平稳较快增长速度，GDP年均增速将在8%左右；中国外贸增速及对美贸易增速将比2002-2012年期间的增速有非常明显的放缓，出口年平均实际增长速度可能在10%左右，对美货物出口年平均增速为7%左右。

1 本文中的中国除已特别说明之外，都是指中国大陆。

2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http://www.customs.gov.cn/1>。



2022年中国对外贸易及对美贸易发展趋势预测

1. 2012-2022年中国经济增速预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1978年至2012年34年间GDP年平均增速为9.8%，为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我们预测今后10年，即2012-2022年期间经济增速将明显趋缓。增速趋缓的主要论据如下：

首先，经济总量增大使得增速可能减慢。2012年中国GDP已经达到51.93万亿人民币，即8.26万亿美元，经济总量已经跃居全球第二。在这么大的经济总量的基础上，想再保持过去十年或30年的高速增长已经非常困难。

第二，随着中国人口增速放缓和人口的老齡化，人口红利将逐步减少。农村富裕劳动力数量较过去减少，劳动力价格将显著上升；中国过去十年或3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低廉劳动力优势将逐步缩小。

第三，为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淘汰高耗能和高污染产业，缓解社会矛盾，如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等，使得经济增速减慢；

最后，从外部环境来看，2012-2022年世界主要经济体，如欧盟和美国等遭受债务危机、金融危机、财政紧缩等影响，经济增长将趋缓，对中国出口商品需求的增速也将趋缓；今后十年人民币仍将维持升值趋势，同时贸易保护主义加剧，这些将严重影响中国出口增长，冲击中国经济。

我们预测今后十年中国经济仍将保持平稳较快增长速度。主要论据如下：

首先，中国目前发展水平仍然较低。虽然从经济总量来看，中国已经达到或超过发达国家水

平，但从人均水平来看，2012年中国人均GDP为6,076美元³，仅为美国（49,922美元）的1/8，俄罗斯（14,247美元）的1/2和希腊（22,055美元）的1/4。中国的人均出口额、人均进口额也非常低，经济发展潜力和外贸发展潜力很大。

其次，城镇化将成为中国今后20年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之一。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⁴，2001-2012年间中国城镇化率由37.66%提高到52.60%，平均每年提高1.36%。目前中国尚有半数左右居民住在乡村，城镇化潜力很大。世界上发达经济体城镇人口占全部人口比重通常为75%以上。预计今后十年城镇化率每年将提高1%左右，每年有1,500万左右人口从农村迁入城镇。这就对城镇基本建设和住宅建设产生巨大的需求，从而推动中国经济较快增长。

第三，中国各地区，特别是经济不太发达地区具有强烈的发展经济、改变地区落后面貌的积极性。在制订“十二五”规划时中国有19个省（市、区）提出了五年地区生产总值（GDP）或人均GDP翻番的目标；如辽宁省“十二五”规划提出，“十二五”期间GDP年均增长11%，并提出力争到2016年，全省人均生产总值等再翻一番。福建省“十二五”规划提出，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地区GDP年均增长10%以上，力争比2010年翻一番。

第四，居民消费保持稳步提高。随着居民收入特别是较低水平的居民收入快速增长，尤其是提高最低工资和“收入倍增计划”等收入分配格局改革措施的逐步实施，以及政府促进消费的一

³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http://www.customs.gov.cn/1>。

⁴ http://www.stats.gov.cn/was40/gjtjj_nodate_detail.jsp?channelid=75004&record=83。

系列惠民政策的推出，将提高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对消费品和服务数量和质量产生巨大需求，提升社会整体实际消费水平，有力推动中国经济较快发展。

第五，中国储蓄率较过去年份有所下降，但仍保持很高水平，大大高于同期经济增速。我国城乡居民仍保持较高储蓄水平，随着社会保障和医保覆盖范围的扩大，将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居民消费和投资的后顾之忧，促进居民消费和民间投资的进一步增长。

第六，2012-2022年间中国将继续具有“人口红利”，尽管力度有所减弱。部分学者考虑到中国人口老龄化加速和最近两年部分地区出现“招工难”现象，提出中国“人口红利”将终止，中国将进入低速发展阶段。我们认为尽管中国劳动力优势有所减弱，但至少在今后十年将继续拥有“人口红利”。主要论据有两个：第一、中国2010年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人数为27,931万人⁵。在现有技术和组织水平下，按每年工作250天计算，需农业劳动力21,044万人，即有6,887万人为富裕农业劳动力⁶，目前发达经济体农业劳动力的比重都少于5%。如果考虑到农业技术进步、农业规模经营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有15-20%的劳动力从事农业即可。中国2022年农业劳动力人数可减少到11,500-15,200万人，即2022年前大约有12,700-16,400万劳动力可从农业转向非农生产。第二、中国目前劳动力退休年龄为男年满60周岁，女职工年满50周岁，女干部（干部身份）年满55周岁。我国目前城市人口总体的平均退休年龄为56.1岁，其中男性平均退休年龄为58.3岁，女性为52.4岁⁷。这是在上世纪50年代人口平均寿命为50多岁时规定的。目前中国人的平均寿命超过70岁，如果适当延后退休年龄将增加大量劳动力。

最后，从国际竞争来看，相对于发达经济体，中国仍具有显著廉价劳动力优势；相对于发展中国家，中国具有技术水平较高、基础设施优良、制造业生产率高的优势。2012-2022年期间中国仍然具有出口优势和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优势，对外贸易有望在2022年前保持较快增速。

在前述综合分析的基础上，运用计量经济模型对2012-2022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进行预测分析。预测结果显示：未来十年期间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可能达到8%左右，人民币可能累计升值10.5%（年平均升值1%左右）。2022年按汇率计算中国经济规模可能达到或接近美国2022年水平，但人均GDP仅为美国1/4左右。

如果不发生大规模战争等意外情况，预计中国经济增速有三种情景：

- 第一、可能性最大的情景：年平均实际增速达到8%。

2002年到2012年10年期间中国GDP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0.5%。我们预计2012年到2022年10年期间中国GDP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8%。2012年中国GDP为8.26万亿美元，人均GDP为6,076美元，假设2012-2022年期间年均人口自然增长率为千分之四，即0.4%，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10.5%，在此情景下，2022年中国GDP将达到19.70万亿美元（2012年价格，下同），人均GDP将达到14,040美元。

- 第二、稳健的估计：年平均实际增速为7.5%。2022年中国GDP将达到19.34万亿美元，人均GDP将达到13,780美元。
- 第三、乐观的估计：年平均实际增速达到8.2%。2022年中国GDP将达到20.07万亿美元，人均GDP将达到14,300美元。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11》，中国统计出版社，北京，2012年。

6 王会娟，“分等级就业投入占用产出模型及其应用”，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

7 吴江和田小宝，《人力资源发展报告（2011-2012）》，社科文献出版社，2012年。



基于美国经济研究局统计数据进行测算⁸，2002–2012年期间美国年均经济增长1.65%。过去十年美国经济增速较低的主要原因是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我们预计2012–2022年美国较之前十年有所好转。预计美国经济增速有三种情景：

- 第一、可能性最大的情景，2012–2022年美国GDP年平均增长速度可能达到2.3%左右。2022年美国GDP将达到19.68万亿美元，人均GDP将达到57,410美元。
- 第二、乐观的估计，2012–2022年美国GDP年平均增长速度可能达到2.6%左右。2022年美国GDP将达到20.26万亿美元，人均GDP将达到59,120美元；
- 第三、稳健的估计，2012–2022年美国GDP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左右。2022年美国GDP将达到19.11万亿美元，人均GDP将达到55,750美元。

综合来看，2022年中国GDP总量将接近或达到美国水平，但人均GDP与美国相差仍非常大，仅为美国的四分之一左右。

2. 2012–2022年中国外贸增速和对美贸易增速预测

2012–2022年中国外贸增速预测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突飞猛进，根据中国海关统计，2000–2011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的年均名义增长速度为20.4%，出口额和进口额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20.3%和20.5%。其中，对美国进出口总额、出口额和进口额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7.7%、18.1%和16.7%。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经济持续低迷。受此影响，中国对外贸易增速大幅下滑，2012年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增长6.2%。其中，出口增长7.9%；进口增长4.3%，远低于2000–2011年增长速度。今后十年中国对外贸易增长充满挑战，尤其是国际经济形势，中国对外贸易增速将大幅下降。增速放缓的主要论据如下：

首先，2000–2011年中国对外贸易高速增长有其特殊性。2001年中国加入WTO，迎来了持续高速增长期，中国低廉的劳动力、较为完备的基础设施、优惠的政策和稳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保障了中国对外贸易的高速增长。2012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以当前的贸易规模，今后十年想维持继续高速增长基本不可能。

其次，全球经济持续低迷，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欧盟、美国和日本经济将保持低速增长，特别是中国最大出口经济体欧盟经济将处于萧条和缓慢增长中，世界其他国家经济增速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放缓。2012–2022年中国外需的增长将趋缓。

第三，人民币将进一步升值，影响中国商品竞争力和中国企业的出口积极性。预计2012–2022年期间人民币升值速度将趋缓，目前美国市场大部分商品价格与中国相接近，但中国服务的价格则显著低于美国。预计今后十年期间人民币每年平均可能升值1%左右，累计升值10.5%。

第四，贸易保护主义将进一步加剧，贸易摩擦增多。随着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特别是主要发达经济体增长放缓，以及贸易差额的扩大，针对中国出口商品的贸易摩擦将加剧。美国是对中国发起贸易调查最多、力度最大的国家之一。虽然目前全球贸易摩擦呈下降趋势，但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调查，尤其是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却在不断上升。

第五，国际产业转移的影响。随着中国工资的快速增长，中国的低成本优势将逐步减弱，部分加工出口品生产逐步转移到工资水平更低的印

⁸ <http://www.bea.gov/national/index.htm#gdp>

度、印度尼西亚、越南、泰国等地。2012-2022年期间，目前在中国出口中占一半比例的加工出口增长受到极大挑战。

最后，2012-2022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将直接影响对大宗商品的进口需求，如对澳大利亚的铁矿石、对亚洲很多经济体的零部件进口增速将有明显放缓。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预测2012-2022年期间中国货物出口总额的年平均实际增长速度可能达到9%-10%左右，货物出口实际增长速度将略高于GDP实际增长速度。以美元计算的中国货物出口总额年平均名义增长速度可能达到11%-12%左右⁹。

从中国贸易差额来看，中国将继续保持顺差地位，但顺差比例将有所下降。原因如下：

首先，中国的贸易顺差来自于加工贸易，一般贸易为逆差。如2011年加工贸易出口额为8,354亿美元，进口额为4,698亿美元，顺差为3,656亿美元。一般贸易出口额为9,171亿美元，进口额为10,075亿美元，逆差为904亿美元。而中国对外贸易中加工贸易将不断降低，预计2022年加工出口在货物总出口中的比重由2011年的44.0%降低到30.0%。加工贸易比例下降将带来贸易顺差比例下降。

其次，贸易顺差带来很多问题，中国政府将无意继续巨额贸易顺差。持续的贸易顺差给中国政府带来巨额的外汇储备，增加了中国的货币供给量和货币流通，带来长期的通货膨胀压力。同时，主要贸易伙伴如美国等长期贸易逆差，引起不断的贸易纠纷，强烈要求减少对华贸易逆差。

最后，人民币进一步升值将刺激中国进口的增长，同时严重影响中国商品的竞争力，对中国出口产生不利影响。从2005年开始至2012年年底，人民币名义汇率已经升值超过30%，极大影响我国外贸环境。

预计2022年按出口总额计算的中国货物进出口顺差占GDP比重将下降，2011年货物进出口顺差为1,551亿美元，占当年GDP比重为2.1%，预计2022年这个比重将降低到1%左右。

2012-2022年中美贸易增速预测

预计2012-2022年中国对美货物出口增长速度将显著低于中国对世界各国的平均货物出口增长速度。从最近几年中国出口的贸易伙伴数据来看，2006-2011年中国货物出口总额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4.4%。其中对美国、欧盟和日本等的货物出口增长速度分别为9.8%、13.4%和10.1%，均低于中国货物出口平均增速，而对印度、巴西、俄罗斯等国家的货物平均增速分别为28.2%、33.9%和19.7%，均高于中国货物出口平均增速。中国对美出口增速较低的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受债务危机、金融危机、财政紧缩等影响，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速度较低，对进口商品需求增长乏力；

其次，中国对美出口商品中加工出口比重特别高，2002年加工出口在中国总货物出口中比重为55.3%，而对美国货物出口中加工出口比重为66.9%，2011年加工出口在中国总货物出口中比重为44.0%，而对美国货物出口中加工出口比重为54.1%。由于中国的工资成本较高，部分加工出口生产由中国转移到墨西哥、印度、印尼和越南等工资水平更低的国家。这对中国对美出口增速影响较大。

最后，随着美国制造业的回归和刺激就业等一系列政策下，美国制造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将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对中国对美出口特别是加工出口产生较大影响。

初步测算，2012-2022年中国对美货物出口年平均增速7%，服务出口年均增长率为10%。2022年中国对美货物出口额为6,832亿美元，服务出口额为323亿美元。预计2022年中国对美货物和劳务出口总额为7,154亿美元(以2011年价格计算)。

⁹ 鉴于目前货物出口增长速度都按名义增长率计算，假设2011-2022年期间美元的通胀率为2%，故可近似地得出：2011-2022年期间中国货物出口总额年平均名义增长速度可能达到11%-12%左右



预计2012-2022年期间中国从美国进口额增速将远比中国对美国出口平均增速为高。主要依据如下：

首先，预计2022年中国居民消费水平将大幅度提高，特别是中国将出现年收入在3-6万美元，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这些中产阶级要求高质量、高水平的消费品，为美国贸易界提供了巨大商机，将极大刺激美国向中国出口。

其次，预计2012-2022年美国对华高技术出口禁运限制将逐步放松，随着两国科学技术水平日益提高，很多美国对华高技术出口禁运限制将没有必要继续。这将刺激美国向中国的出口。

美国对华出口中，资源型产品、高档消费品和奢侈品、医疗保健品、高技术制造业产品以及服务性产品具有很高的竞争优势，预计2012-2022年中国将在这些部门扩大从美国的进口。

初步预计2012-2022年美国对华货物和服务出口年均增长率为12%。2022年美国对华货物出口额为4,249亿美元，服务出口额为929亿美元。2022年美国对华货物和服务出口总额为5,178亿美元。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为1,977亿美元。

中国对美贸易差额上，由于中美贸易巨大的不平衡性，对美贸易顺差将持续。预计2022年中国继续保持对美国顺差，但顺差的相对比重将大幅度降低。主要依据如下：

首先，中国对美出口中加工出口比重较高，加工出口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出口品的价值必然大于进口的零部件和原料等的价值，因为加工费必然是正值；

其次，预计2022年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仅等于美国的五分之一左右。中国生产的廉价消费品和工业制成品在美国市场仍然会受到大部分美国人的欢迎；再次，由于美国政府的贸易限制，美国的高技术优势在对华出口贸易中得不到充分发挥。

最后，核算方法的改进。目前计算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差额是在出口总额基础上计算的。然

而，一个国家的出口总额并非都是这个国家的产品，其中包含从别的国家进口的零部件、原材料和能源的价值。随着国际分工日益发展，出口品的完全进口系数会日益增大。目前很多专家主张采用贸易增加值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实际出口数额和衡量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差额。中国出口的特点是加工装配出口比重高，出口品的完全进口系数高，完全增加值率低，按出口增加值计算的中美两国贸易顺差将比按出口总额计算有大幅度降低。

3. 贸易增加值的计算方法

贸易增加值的计算方法—非竞争性投入产出模型以及投入占用产出模型(DPN模型)

利用投入产出技术研究出口增加值和出口对就业的影响通常可利用如下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进行：

这个模型的经济假设为，整个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假定某个部门的产品不管其用途如何，不管是用于消费、投资或用于出口等，对中间投入品和最初投入品的消耗系数都相同。例如，生产的钢材不管是用于国内生产消耗、用于增加库存或用于出口，其对国内材料、电力等的消耗系数，对进口产品的消耗系数，以及单位产出的员工薪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和运营盈余等都假定相同。

目前这个模型已被广泛采用。基于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发布的U表 (Use Table) 和V表 (Make Table) 以及进口模型 (imports matrix) 等资料¹⁰，我们编制了美国1992、1997、2002、2007、2010等年度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计算了1987-2011年美国每1,000美元出口带来的增加值和就业(见附件：中国和美国出口对增加值和就业影响汇总表1987—2011)。

¹⁰ http://www.bea.gov/bea/dn2/i-o_annual.htm.

图表1: 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

投入 \ 产出		中间需求		最终需求					国内产量或进口	
		生产行业 1, 2, ..., n	中间需求	最终需求	资本形成总额	出口	其他	总计		
中间投入	国内中间投入	1-n	X_{ij}^D		F^{DC}	F^{DI}	F^{DE}		F^D	X
	进口中间投入	1-n	X_{ij}^M		F^{MC}	F^{MI}			F^M	M
全部中间投入										
主要投入	• 固定资产折旧 • 员工薪酬 • 生产税净额 • 运营盈余		V							
	总增加值									
总投入			X^I							

图表2: 体现加工出口生产和非加工出口生产的非竞争型投入占用产出模型(DPN模型)

投入 \ 产出			中间需求				最终需求					国内产量或进口	
			用于国内需求的生产(D)	加工出口生产(P)	非加工出口及其他生产(N)	总计	消费	资本形成总额	出口	其他	最终使用总计		
			1, 2, ..., n	1, 2, ..., n	1, 2, ..., n								
投入部分	国内中间投入	用于国内需求的生产(D)	1-n	X^{DD}	X^{DP}	X^{DN}		F^{DC}	F^{DI}	0		F^D	X^D
		加工出口生产(P)	1-n	0	0	0		0	0	F^{PE}		F^P	X^P
		非加工出口及其他生产(N)	1-n	X^{ND}	X^{NP}	X^{NN}		F^{NC}	F^{NI}	F^{NE}		F^N	X^N
	来自进口的中间投入		1-n	X^{MD}	X^{MP}	X^{MN}		F^{MC}	F^{MI}			F^M	X^M
	全部中间投入												
	增加值			V^D	V^P	V^N							
投入总计			X^D	X^P	X^N								
占用部分	资本: 海外资本			K^D	K^P	K^N							
	员工			L^D	L^P	L^N							
	自然资源												

中国出口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加工贸易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很大, 加工出口品的消耗结构与满足国内需求的产品差别极大, 因而我们提出反映加工贸易的非竞争型投入占用产出模型。其格式见图表2:

在图表2中, 中国整个国内生产分为三大部分: 用于国内需求的生产(D)、加工出口生产(P)和非加工出口及其他的生产(N)。在图表2中如果把非加工出口生产(N)归并到用于国内需求的生产(D)就得到DP Model (模型3)。

我们认为应采用投入占用产出模型(DPN模型)或DP模型来研究中国出口对增加值和就业的影响, 其原因如下:

第一、中国出口总额中有50%左右是加工出口。加工出口生产与其他产品生产的消耗结构存在很大差异; 加工出口生产中消耗的进口材料和零部件等所占的比重很大, 例如2007年加工出口消耗的进口品约占加工出口总额的58.5%, 而增加值部分比重很小, 只占17.4%。在中国对美出口中, 加工出口比例更是高达60%左右。因此, 在研

究中国出口的国内经济影响时，必须要将加工贸易单独分出。

第二、中国的非加工出口中很大一部分是由外资企业生产的，而外资企业非加工出口品的单位产值消耗进口品数额远大于内资企业生产用于国内需求产品对进口品的消耗。同时，生产非加工出口品的内资企业往往与国外联系较多，这些企业进口也较多。由于出口品一般具有较高的品质要求，因此为保证出口品质量，产品生产也会使用较多的进口原材料。

中国2007年加工出口、非加工出口和满足国内需求的生产单位产值中直接消耗进口品的比重分别为58.5%、13.7%和3.1%。三类产品单位产值中增加值比重也相差非常大。2007年加工出口、非加工出口和满足国内需求的生产单位产值中增加值比重分别为17.4%、27.0%和34.7%。

我们认为测算一国出口对该国经济的影响时，对美国、欧盟等国应采用模型1 (Table1)，对有加工出口国家如墨西哥、中国应采用模型2或3。对中国目前应采用模型3，今后如非加工出口商品与用于国内需求商品生产在消耗系数上相接近时，则可采用模型2¹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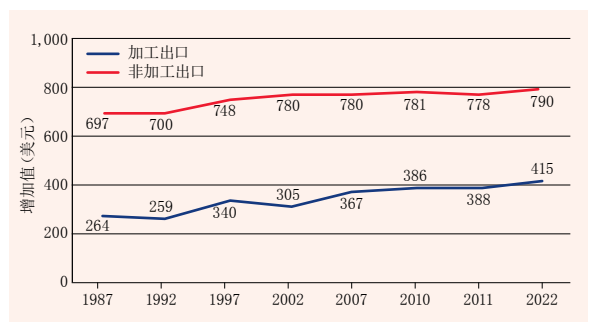
出口增加值的计算结果

本报告利用中国反映加工贸易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测算了1987、1992、1997、2002、2007、2010和2011年中国总出口和对美货物出口对中国GDP和就业的拉动作用（结果见附件：中国和美国出口对增加值和就业影响汇总表1987—2011）。目前2002和2007年中国反映加工贸易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已由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科学院通过调查资料编制而成。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利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87年、1992年和

199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结合海关统计资料等其他数据，利用非调查方法将反映加工贸易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拓展到1987年、1992年、1997年和2010年，进而测算了这些年中国出口对中国GDP和就业的影响。与此同时，课题组在2010年中国反映加工贸易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基础上，通过更新增加值系数和就业系数，测算了2011年中国出口对其GDP和就业的拉动作用。

1987-2011年中国每1,000美元出口带来的增加值的发展态势及2022年的初步预测如下图表3:

图表3: 1987-2022年每1,000美元中国出口加工贸易和非加工贸易所带来的增加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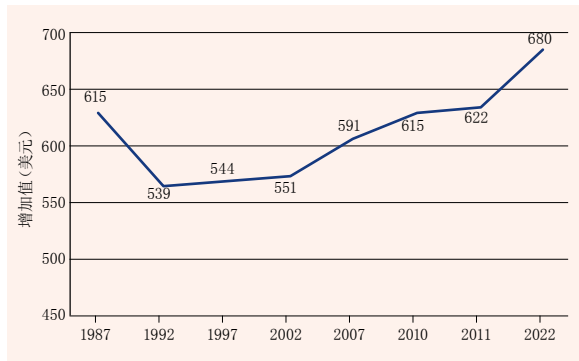
由于中国制造业的技术水平逐步提高，部分过去依靠进口的零部件为有价格优势的国内产品所代替，1987-2011年中国每1,000美元加工出口所带来的增加值呈逐步上升趋势，1987年为264美元，2002年为305美元，2007年为367美元，2011年为388美元。预测2012-2022年将保持这个趋势。预测2022年每1,000美元加工出口所带来的增加值为415美元左右。

加工出口每1,000美元所带来的增加值呈上升趋势。主要影响因素有二：一是中国制造水平提高，加工生产中消耗的部分进口零部件、材料等逐步用国产品代替。这使得加工出口的增加值率上升；二是中国从业人员工资水平上升。

非加工出口每1,000美元所带来的增加值比较稳定，但有小幅度上升的趋势。主要影响因素为：一是增加值率逐步上升，中国从业人员工资

11 关于投入产出技术及反映加工贸易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DPN模型)的计算方法请参阅：刘遵义、陈锡康、杨翠红、郑国汉、冯国钊、宋恩荣、祝坤福、裴建锁和唐志鹏，2010，“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及其应用：中美贸易顺差透视”，中国社会科学，第XXXI卷，章节1，第35-54页。

图表4: 1987-2022年每1,000美元中国出口所带来的增加值



水平上升；二是我国参与全球化进展，进口增速快于产值增速，非加工出口生产中对进口品消耗逐步上升，部分抵消前者使增加值上升的速度。

预测2012-2022年期间中国出口品的完全增加值系数¹²将呈上升趋势。主要原因如下：

一是随着中国制造水平的提高，加工生产中消耗的部分进口零部件、材料等将逐步用国产品代替。如1992年每1,000美元加工出口生产中直接消耗的进口品为733美元，1997年为633美元、2002年为666美元、2007年为585美元，2011年为564美元，呈明显下降趋势（参阅附表A1）。这使得增加值率上升，今后还将保持这种趋势。

二是当前中国从业员工工资水平低，具有较大上升空间，增加值率将逐步上升。

三是加工出口比重呈下降趋势。2002年中国加工出口额占全部出口额比重最高，为55.27%，之后不断下降，2011年加工出口比重下降到44.00%。2012-2022年加工出口比重将继续这一态势，预计2022年加工出口比重将下降到30%。出口增加值率与加工出口比重有着极强的相关关系，1987年由于加工出口比重很低，为22.34%，非加工出口比重为77.66%，非加工出口增加值率高，故1987年全部出口增加值率高。1992和1997年加工出口比重快速上升，因而

全部出口的增加值率快速下降。2002年以后加工出口比重逐步下降，再加上加工出口生产的增加值率上升，故由图表4可见2002年以后中国出口品生产的增加值率逐步上升。

从上一节测算结果来看，1987-1992年中国出口增加值率呈下降趋势，而1992-2011年期间每1,000美元出口带来的增加值呈逐步上升趋势（见图表4）。预计2022年出口增加值率为68%，即每1,000美元出口将提供国内增加值680美元。

同时预测2012-2022年期间中国出口品对进口品的完全消耗系数（垂直专门化率，即vertical specialization share）将呈下降趋势，而对国产品的消耗系数将有所提高。预计2022年出口生产对进口品的完全消耗系数为0.3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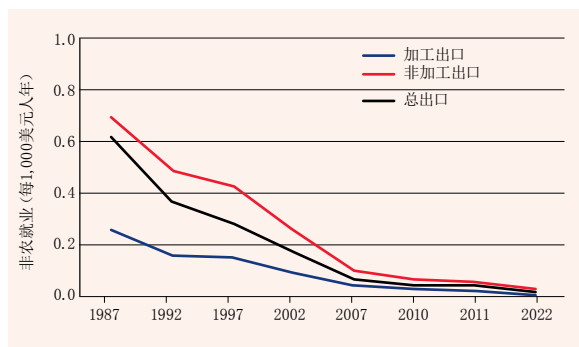
关于加工出口增加值率方面：预测2012-2022年期间加工贸易出口在中国出口总额和中国对美货物出口总额中的比重将呈下降趋势。预计2022年加工贸易出口在中国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为30%左右。预测2012-2022年期间在加工出口生产中对进口品的直接消耗系数和对进口品的完全消耗系数将呈下降趋势。2007年中国每1,000美元加工出口生产对进口品的完全消耗为633美元，2011年为612美元，预计2022年每1,000美元加工出口生产对进口品的完全消耗为585美元。预测2012-2022年期间每1,000美元加工出口品的完全增加值系数将呈上升趋势。预计2022年加工出口增加值率为41.5%，即每1,000美元加工出口品的完全增加值为415美元。

鉴于1987-2011年中国单位出口拉动的完全非农就业¹³呈快速下降趋势（见图表5）。随着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预计2012-2022年期间中国出口品的完全非农就业系数（单位出口额中直接和间接拉动的非农就业数量，或称为出口的非农就业率）将呈明显的下降趋势。预计2022年每1,000美元出口拉动的非农就业为0.0128人

12 出口的完全增加值系数指的是单位出口额中含有的直接和间接的国内增加值数额之和，或称为出口增加值率。

13 单位出口额中直接和间接拉动的非农就业数量，或称为出口的非农就业率。

图表5: 每1,000美元的中国总出口、加工出口和非加工出口拉动的非农就业



年,其中加工出口每1,000美元出口拉动的非农就业为0.0066人年,非加工出口每1,000美元出口拉动的非农就业为0.0154人年(见图表5)。

从总出口拉动的非农就业来看:2010年我国出口总值为15,777.5亿美元,每1,000美元出口拉动的非农就业为0.042人年,其中直接拉动的非农就业为0.019人年,间接拉动的非农就业为0.023人年。带动的非农就业为6,627万人年,其中直接拉动的非农就业为2,998万人年,间接拉动的非农就业为3,629万人年。预测2012-2022年期间中国出口拉动的非农就业总人数将缓慢上升。预计2022年出口拉动的非农就业人数为7,637万人,较2010年增加1,210万人,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3%。

4. 中国对美出口对中国经济和就业的影响及中美贸易顺差

利用投入占用产出模型(DPN模型)和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我们分别计算了1987-2011年中美两国每1,000美元出口带来的增加值(见附件)。

中国对美货物出口对中国GDP和就业的影响分析

美国一直是中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2010年中国对美货物出口额约

占中国总货物出口额的17.96%,远高于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出口额。因此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对中国的GDP和就业具有重要影响。基于中国反映加工贸易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本报告测算了1987、1992、1997、2002、2007、2010和2011年中国对美货物出口对中国GDP和就业的拉动作用(见附表A2、A3)。

中国对美直接货物出口对中国GDP和就业的影响

如附件所示,2010年中国对美国1,000美元直接货物出口能为中国带来563 美元增加值和0.038人年的非农就业,低于中国1,000美元全部出口带来的增加值(615美元)和非农就业(0.042人年)(和后面表格中数据不一致)。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对美出口中的加工贸易出口比重较高,2010年为57.4%,高出中国出口中加工贸易比重10.5个百分点。

从不同时间段来看,与中国单位全部出口类似,中国对美国1,000美元直接货物出口带来的增加值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变化,先由1987年的597美元下降至1997年的439美元,然后又上升到2011年的576美元。而由于中国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中国对美国1,000美元直接货物出口带来的非农就业随时间不断降低。

我们进一步测算了中国对美总直接货物出口对中国GDP和非农就业的影响(见图表6)。结果表明中国对美货物出口对中国GDP和非农就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010年中国对美直接货物出口总值为2,833亿美元,共为中国带来1,595亿美元的增加值,约占中国当年GDP的2.69%;为中国带来1,076万人年非农就业,约占当年中国全部非农就业人数的2.23%。1987-2011年中国对美货物出口总值飞速发展,年平均名义增长率高达19.28%;其带来的中国增加值也增长迅速,由1987年的28亿美元增长到了2011年1,869亿美元,年平均名义增长率为19.10%。相对而言,中国对美直接货物出口带来的非农就业人数随着时

图表6: 中国对美直接货物出口对中国GDP和非农就业的影响

年份	货物出口总值 (亿美元)	拉动总增加值 (亿美元)	占GDP比重 (%)	非农就业 (万人年)	在全部非农就业中比重 (%)
1987	47	28	0.87	265	1.26
1992	73	33	0.67	204	0.74
1997	327	144	1.51	657	1.88
2002	699	317	2.18	958	2.62
2007	2327	1226	3.51	1326	2.97
2010	2833	1595	2.69	1076	2.23
2011	3245	1869	2.55	1071	2.15

注: 中国对美直接货物出口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其他数据由课题组测算所得。

图表7: 中国对美直接货物和服务出口对中国GDP和非农就业的影响

年份	货物和服务出口总值 (亿美元)	拉动总增加值 (亿美元)	占GDP比重 (%)	非农就业 (万人年)	在全部非农就业中比重 (%)
2002	740	354	2.43	1096	2.99
2007	2433	1316	3.77	1433	3.21
2010	2932	1680	2.83	1142	2.37
2011	3358	1967	2.69	1139	2.28

注: 中国对美直接货物出口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服务出口数据来自美国经济分析局(BEA), 其他数据由课题组测算所得。

间的推移而增速放缓, 仅由1987年的265万人年增加到2011年的1,071万人年, 年平均增长速度仅为5.99%。这主要是由于单位货物出口拉动的非农就业随时间明显下降所致。特别地, 2007年以后, 中国对美直接货物出口拉动的非农就业总数呈下降态势, 这表明了中国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快于中国对美货物出口的速度。

图表6中第4列和最后一列分别展示了中国对美货物出口带来的增加值和非农就业在中国GDP和总非农就业中的比重。这些数据衡量了中国对美货物出口对中国经济和非农就业的重要程度。结果表明1992年以来, 中国对美货物出口在中国GDP和非农就业中的重要性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 呈现倒U型变化, 在2007年达到顶峰。这主要是由于2007年之前中国对美货物出口总量增长迅速。正如前文所说, 2007年之后, 受金融危机影响, 中国对美出口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打击, 出口增速放缓, 其对中国增加值和非农就业的贡献率也出现下降。

中国对美货物和服务出口对中国经济的贡献

中国对美国1,000美元货物和服务出口拉动的中国增加值和就业如附件A4所示。可看出加入服务出口后, 中国对美单位出口对中国增加值和就业的拉动均有所上升, 这主要是由于服务产品的完全增加值系数和完全就业系数较高所致。

随着时间的推移, 2002年以后, 中国对美单位出口拉动的增加值随时间不断上升, 而拉动的非农就业则不断下降。

我们进一步测算了中国对美总出口对中国GDP和非农就业的影响(见图表7)。2010年中国对美货物和服务出口总值为2,932亿美元, 共为中国带来1,680亿美元的增加值, 约占中国当年GDP的2.83%, 比仅核算货物出口影响时的比重提高0.14个百分点; 为中国带来1,142万人年非农就业, 约占当年中国全部非农就业人数的2.37%。2002—2011年中国对美货物和服务出口带来的中国增加值增长迅速, 由2002年的354亿美元增长到了2011年1,967亿美元, 年平均名义增



长率为21.00%。而中国对美货物和服务出口带来的非农就业人数随时间增长较缓，年平均增长速度仅为4.24%。

中国对美总货物出口(包括转口)对中国经济的贡献

在中美贸易中，有相当一部分商品是从中国经过香港转口，然后出口到美国的。这部分出口在中国海关统计中并未统计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因此为了更准确地反映中美贸易对中国经济和就业的影响，同时为测算中美贸易顺差做准备，本报告同时测算了中国对美总货物出口(包含从香港转口)对中国经济和就业的影响。中国经香港向美国的转口货物额来自于香港海关统计，但这部分出口额是按照香港的离岸价(FOB)统计的，与中国海关统计的中国FOB价格不一致。因此我们需要将这部分转口货物额进行价格处理。我们首先利用香港提供的中国大陆经香港向美国转口货物在香港的运费和流通费数据，扣除转口货物价值在香港的运费和流通费，从而将其转化为按照香港到岸价(CIF)统计的转口货物价格，然后再扣除中国将货物运往香港的运费和流通费(假设运费和流通费占中国FOB价格的8%)，进而得到按照中国FOB价格统计的中国经香港向美国转口的货物额。

附件显示，2010年中国对美国1,000美元总货物出口能为中国带来561美元的增加值和0.038人/年非农就业，分别比中国对美国1,000美元直接货物出口带来的增加值和非农就业少2美元和0.0001人年。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经香港向其他国家转口货物中加工出口比重较高引起的，2010年该比重为72.9%¹⁴。

同时，我们可以测算出中国对美国全部货物出口对中国GDP和就业的影响(见图表8)。结果

显示，2007、2010和2011年，中国对美全部货物出口可以分别为中国带来1,391亿美元、1,780亿美元和2,091亿美元的增加值，分别占当年中国GDP总量的3.98%、3.00%和2.86%；可以分别为中国带来1,390万人年、1,780万人年和2,091万人年的非农就业，分别占当年中国非农就业总量的3.40%、2.50%和2.34%。对比中国对美直接出口带来的增加值和就业，可以看出，如果包含中国经香港向美国的转口部分，中国对美货物总出口拉动的增加值增加11%—14%，拉动的非农就业增加9%—14%。另外，结果同时说明，即使包括中国经香港向美国转口的货物部分，近些年来，中国对美国总货物出口拉动的中国GDP和非农就业在中国总GDP和非农就业中的比重仍呈现不断下降趋势。

中美货物贸易顺差

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一直备受学者关注。根据中国海关统计¹⁵，2012年中美货物贸易顺差(中国对美货物出口总量减去中国从美国货物进口总量)为2,189亿美元。而根据美国海关的统计¹⁶，2012年中美货物贸易顺差(美国从中国货物进口总量减去美国对华货物出口总量)为3,151亿美元。但是由于中间品贸易的大量存在，以进口和出口总值为标准的贸易统计已经造成严重的重复计算问题。因此应以进出口贸易中的各国国内增加值来作为衡量贸易平衡的标准，本报告将利用贸易中的增加值方法对中美贸易顺差进行重估。

除此之外，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那样，在中美贸易中，有相当一部分商品是经过香港转口，为了更准确地反映中美贸易顺差，本报告在测算时考虑了中国大陆经香港向美国的转口和美国经香港向中国大陆的转口商品，并同时包括了美国经香港转运到美国的出口商品(途经香港口

¹⁴ 根据数据显示，1997年中国对美直接货物出口中加工出口比重，与中国经香港向美国转口货物中加工出口比重相差很小，在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下，1997年中国向美国单位总货物出口比中国向美国单位直接货物出口为中国带来的增加值要多。

¹⁵ <http://finance.china.com.cn/news/special/jjsj12/20130110/1230560.shtml>

¹⁶ <http://www.census.gov/foreign-trade/balance/c5700.html>

图表8: 中美货物贸易顺差计算

出口种类	2007		2010		2011	
	按货物出口总值计算 (亿美元)	按增加值计算 (亿美元)	按货物出口总值计算 (亿美元)	按增加值计算 (亿美元)	按货物出口总值计算 (亿美元)	按增加值计算 (亿美元)
中国对美货物出口	2662	1391	3173	1780	3649	2091
其中: 直接出口	2327		2833		3245	
经香港转口	335		340		404	
美国对华货物出口	712	612	994	863	1119	952
其中: 直接出口	652		919		1039	
经香港转口	59		75		80	
中美贸易顺差	1950	779	2179	917	2530	1139

注: 中国对美直接货物出口数据来自于中国海关; 美国对华直接货物出口数据来自于USITC; 中国和美国经过香港向对方的转口数据来自于香港海关统计。2007年中国公布的从美国进口的货物总额为694亿美元, 美国公布的从中国进口的以CIF统计的货物总额为3,401亿美元。2010年中国公布的从美国进口的货物总额为1,020亿美元, 美国公布的从中国进口的货物总额为3,830亿美元。2011年中国公布的从美国的进口货物总额为1,221亿美元; 美国公布的从中国进口的货物总额为 4,174亿美元。

岸, 未被香港海关统计的部分)。为避免价格问题对衡量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影响, 本报告中, 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包括转口)以及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包括转口)均以FOB价格计算。经过一系列数据处理后可知, 如果按照贸易总量统计, 2007年中美贸易顺差约为1,950亿美元。根据我们的测算结果(见图表8), 2007年中国对美国1,000美元出口可以为中国带来522美元增加值, 美国对中国1,000美元出口可以为美国带来860美元增加值, 前者仅为后者的61%(见图7)。因此利用增加值方法测算可知, 2007年中美贸易顺差为779亿美元, 相比按照出口总额测算(1,950亿美元)减少60%左右。

按照出口总量统计, 2010年中美货物贸易顺差为2,179亿美元, 其中中国向美国出口3,173亿美元(包括香港转口), 美国向中国出口994亿美元(包括香港转口); 2010年中国对美国1,000美元出口可以为中国带来561美元增加值, 美国对中国1,000美元出口可以为美国带来868美元增加值, 前者仅为后者的64.6%。因此按照增加值方法统计, 中国向美国出口1,780亿美元(包括香港转口), 美国向中国出口863亿美元(包括香港转口), 2010年中美贸易顺差为917亿美元。利用增加值方法测算的中美贸易顺差与按照出口总值的统计相比减少57.9%。2011年中美货物贸易

顺差为2,530亿美元。中国对美国1,000美元出口(包括从香港转口)可以为中国带来573美元增加值, 美国对中国1,000美元出口(包括从香港转口)可以为美国带来851美元增加值, 前者仅为后者的67.7%。结果显示, 2011年利用增加值方法测算的中美贸易顺差比按照出口总值统计的减少55.0%。

预计2022年中美双边贸易中, 中国向美出口增加值率为64.1%, 即每1,000美元中国向美出口, 将提供国内增加值641美元, 带来0.015个就业。美国对华出口增加值率为86%, 即每1,000美元中国向美出口, 将提供国内增加值860美元, 带来0.0048个就业。总的来说, 2022年中美双边贸易将给中国提供4,565亿美元的国内增加值, 占中国当年GDP(19.7万亿美元)的2.3%, 1,068万个就业岗位; 2022年中美双边贸易将给美国提供国内增加值3,578亿美元的国内增加值, 占美国当年GDP(19.68万亿美元)的1.8%, 提供约200万个就业岗位。

中国赴美旅游对美国国内增加值和就业的影响

近年来, 中国赴美旅游人数激增, 赴美旅游花费也快速增长。据美国商务部公布, 2004年中国赴



美人数只有20.3万人，到2011年达到108.9万人，增长了438%。中国赴美旅游花费也从2004年的11.15亿美元增长到2011年的77.40亿美元，年平均增长31.9%¹⁷。中国已经成为美国旅游市场发展最快的国家。根据美国商务部旅游观光办公室的报告显示，2011年中国大陆赴美游客人均消费额在美国前十大旅游客源市场中位居第一。

2011年，中国到美国旅游人数为108.9万人，总消费为77.4亿美元，人均消费7,107.4美元。考虑到中国人在美国旅游的消费结构与世界各国赴美游客平均的旅游消费结构不同，消费购物占到较大消费比重，而其他的部分消费水平可能较低。我们估算中国游客消费结构为：零售商品消费占到40%，住宿占15%，航空运输占17%，餐饮消费占10%，其余消费约占18%。利用2010美国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计算结果如下：

在人均消费为7,107.4美元情况下，根据我们测算，中国人去美国旅游每增加100万人，拉动的完全增加值为64.6亿美元，其中直接增加值为40.2亿美元；拉动的完全就业数为7.8万人/年，其中直接就业数为5.9万人/年。

考虑到旅游对经济和就业的拉动作用在当年并不能全部显现出来，我们同时测算了考虑时滞时，中国人去美国旅游对美国经济和就业的影响。结果显示，当年（第一年）影响产生的增加值和就业比重分别为完全拉动效应的约85%和91%，第二年的间接影响所产生的增加值为14%，就业为8%，剩余的增加值和就业均不到完全效应的1%。可以认为，间接影响在一年后就较弱了。

预测2012-2022年期间中国赴美旅游年平均增长15%，2022年中国赴美旅游将为美国带来约359亿美元的收入，拉动323亿美元的美国国内增加值，其中直接增加值197亿美元，为美国提供约29.4万个就业岗位。

美国对中国出口农产品对美国国内增加值和就业的影响

中美农产品贸易发展迅速，2001年至2010年，两国农产品贸易额由41亿美元增加到245亿美元，9年间增长了近5倍，年均增幅高达22%。2010年，中国自美国进口农产品186亿美元，占美国农产品出口总额的13%，中国已成为美国农产品出口第一大目的地。

美国对中国出口的农产品主要为豆类、棉花和玉米。2011年的比例为：豆类占61.1%，棉花占15.0%，玉米占5.0%，三类产品占到美国对中国出口农产品总值的81.1%。

据我们测算，美国对中国直接出口100亿美元农产品，将产生88.4亿美元的完全增加值，其中直接增加值为42.1亿美元；将产生6.7万人/年的完全就业，其中直接就业为3.2万人/年。

由于各部门生产过程长度不同，平均为2-3个月左右，故假定每轮影响的时滞为3个月。假定出口等需求在年中发生，则直接影响和第一轮间接影响在当年发生；第二轮到第五轮间接影响会在第二年发生；第六轮等间接影响在第三年发生。如果认为美国对中国出口农产品直接增加值（就业）和第一轮间接影响产生的增加值（就业）在第一年发生，则占到完全影响的75%左右，第二年的间接影响到第五轮所产生的增加值占到24%，剩余的增加值不到1%（0.8%左右）。可以认为，间接影响在两年后就很微弱了。

预计2012-2022年期间美国对中国农产品出口年平均增长10%，2022年美国对中国农产品出口584亿美元，拉动514亿美元的美国国内增加值，其中直接增加值292亿美元，为美国提供约29.2万个就业岗位。

¹⁷ http://tinet.ita.doc.gov/outreachpages/download_data_table/2011_China_Market_Profile.pdf.

以下为附件。

附件：1987-2011年中国和美国出口对增加值和就业影响汇总表

表A1. 中国每出口1,000美元带来的国内增加值和就业

年	出口种类	中国每出口1,000美元带来的国内增加值 单位：美元			中国每出口1,000美元导致的直接和间接进口额 单位：美元		
		直接	间接	全部	直接	间接	全部
2011	总计	237	385	622	291	87	378
	加工业	194	194	388	564	48	612
	非加工业	266	512	778	109	113	222
2010	总计	235	380	615	308	77	385
	加工业	190	196	386	568	46	614
	非加工业	268	513	781	117	102	219
2007	总计	226	365	591	342	67	409
	加工业	174	193	367	585	48	633
	非加工业	270	510	780	137	83	220
2002	总计	204	347	551	406	43	449
	加工业	166	139	305	666	29	695
	非加工业	240	540	780	166	54	220
1997	总计	191	353	544	410	46	456
	加工业	154	186	340	633	27	660
	非加工业	229	519	748	188	64	252
1992	总计	196	343	539	439	22	461
	加工业	142	117	259	733	8	741
	非加工业	228	472	700	270	30	300
1987 估算	总计	232	383	615	360	25	385
	加工业	147	117	264	729	7	736
	非加工业	251	446	697	274	29	303



表A1. (续)

年	出口种类	中国每出口1,000美元带来的就业 单位: 人年			中国每出口1,000美元带来的非农就业 单位: 人年		
		直接	间接	全部	直接	间接	全部
2011	总计	0.016	0.035	0.051	0.016	0.020	0.036
	加工业	0.008	0.014	0.022	0.008	0.010	0.018
	非加工业	0.022	0.048	0.070	0.021	0.026	0.047
2010	总计	0.019	0.043	0.062	0.019	0.023	0.042
	加工业	0.009	0.018	0.027	0.009	0.013	0.022
	非加工业	0.027	0.060	0.087	0.026	0.031	0.057
2007	总计	0.026	0.070	0.096	0.026	0.038	0.064
	加工业	0.014	0.031	0.045	0.014	0.022	0.036
	非加工业	0.037	0.101	0.138	0.036	0.052	0.088
2002	总计	0.095	0.160	0.255	0.091	0.082	0.173
	加工业	0.045	0.068	0.113	0.045	0.045	0.090
	非加工业	0.142	0.245	0.387	0.134	0.116	0.250
1997	总计	0.159	0.242	0.401	0.150	0.136	0.286
	加工业	0.067	0.120	0.187	0.067	0.074	0.141
	非加工业	0.250	0.363	0.614	0.233	0.197	0.430
1992	总计	0.218	0.449	0.667	0.199	0.167	0.366
	加工业	0.100	0.170	0.270	0.099	0.057	0.156
	非加工业	0.287	0.610	0.897	0.257	0.230	0.487
1987 估算	总计	0.438	0.636	1.074	0.409	0.205	0.615
	加工业	0.188	0.152	0.340	0.186	0.064	0.250
	非加工业	0.496	0.749	1.245	0.461	0.238	0.699

注: 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当年平均)为100美元兑372.21人民币(1987年), 551.46(1992年), 828.91(1997年), 827.70(2002年), 760.40(2007年), 676.95(2010年)和645.88(2011年)。

表A2. 中国出口到美国每1,000美元带来的国内增加值和就业 (包括香港到美国的转口)

年	出口种类	中国每出口1,000美元带来的国内增加值 单位: 美元			中国每出口1,000美元导致的直接和间接进口额 单位: 美元		
		直接	间接	全部	直接	间接	全部
2011	总计	220	353	573	350	77	427
	加工业	192	205	397	554	49	603
	非加工业	254	535	789	99	112	211
2010	总计	216	345	561	370	69	439
	加工业	191	207	398	555	47	602
	非加工业	252	537	789	110	101	211
2007	总计	203	319	522	411	67	478
	加工业	176	199	375	577	48	625
	非加工业	250	540	790	111	99	210
2002	总计	177	241	418	544	38	582
	加工业	168	152	320	647	32	680
	非加工业	210	554	764	177	58	236
1997	总计	172	279	451	511	38	549
	加工业	156	177	333	642	25	667
	非加工业	212	534	746	184	70	254
1992	总计	152	229	381	604	15	619
	加工业	140	93	233	760	7	767
	非加工业	172	470	642	329	29	358
1987 估算	总计	227	303	530	449	21	470
	加工业	151	44	195	802	3	805
	非加工业	264	427	691	280	29	309



表A2.(续)

年	出口种类	中国每出口1,000美元带来的就业 单位: 人年			中国每出口1,000美元带来的非农就业 单位: 人年		
		直接	间接	全部	直接	间接	全部
2011	总计	0.014	0.033	0.047	0.014	0.018	0.032
	加工业	0.008	0.016	0.024	0.008	0.011	0.019
	非加工业	0.022	0.052	0.074	0.022	0.027	0.049
2010	总计	0.017	0.039	0.056	0.016	0.022	0.038
	加工业	0.010	0.020	0.030	0.010	0.013	0.023
	非加工业	0.026	0.066	0.092	0.025	0.033	0.058
2007	总计	0.023	0.061	0.084	0.023	0.034	0.057
	加工业	0.016	0.032	0.048	0.016	0.022	0.038
	非加工业	0.035	0.113	0.148	0.034	0.057	0.091
2002	总计	0.062	0.110	0.172	0.062	0.065	0.127
	加工业	0.047	0.073	0.121	0.047	0.049	0.097
	非加工业	0.114	0.237	0.352	0.113	0.121	0.234
1997	总计	0.110	0.182	0.291	0.108	0.110	0.218
	加工业	0.068	0.113	0.181	0.068	0.072	0.140
	非加工业	0.214	0.353	0.567	0.209	0.206	0.414
1992	总计	0.133	0.321	0.454	0.122	0.111	0.233
	加工业	0.099	0.135	0.234	0.098	0.047	0.145
	非加工业	0.194	0.648	0.842	0.165	0.223	0.388
1987 估算	总计	0.380	0.535	0.915	0.376	0.195	0.570
	加工业	0.162	0.098	0.260	0.162	0.048	0.210
	非加工业	0.440	0.657	1.097	0.435	0.235	0.670

注: 中国经香港向美国转口的货物数据由香港海关统计数据和香港政府统计处数据经估计得到。

表A3. 中国向美国每1,000美元的直接货物出口带来的国内增加值和就业（不包括香港到美国的转口）

年	出口种类	中国每出口1,000美元带来的国内增加值 单位：美元			中国每出口1,000美元导致的直接和间接进口额 单位：美元		
		直接	间接	全部	直接	间接	全部
2011	总计	220	356	576	346	78	424
	加工业	193	206	399	553	48	601
	非加工业	253	532	785	102	113	215
2010	总计	216	347	563	366	71	437
	加工业	190	208	398	555	47	602
	非加工业	251	534	785	113	102	215
2007	总计	204	323	527	404	69	473
	加工业	176	198	374	577	49	626
	非加工业	250	533	783	117	100	217
2002	总计	180	273	453	507	39	547
	加工业	166	145	311	658	31	689
	非加工业	211	553	764	178	58	236
1997	总计	170	269	439	525	35	561
	加工业	155	180	335	641	24	665
	非加工业	212	535	747	184	69	252
1992	总计	156	289	445	536	19	555
	加工业	140	105	245	748	7	755
	非加工业	173	480	653	315	32	347
1987 估算	总计	251	346	597	379	24	403
	加工业	155	89	244	750	6	756
	非加工业	277	418	695	276	29	305



表A3. (续)

年	出口种类	中国每出口1,000美元带来的就业 单位: 人年			中国每出口1,000美元带来的非农就业 单位: 人年		
		直接	间接	全部	直接	间接	全部
2011	总计	0.014	0.032	0.046	0.014	0.019	0.033
	加工业	0.008	0.016	0.024	0.008	0.011	0.019
	非加工业	0.021	0.052	0.073	0.021	0.028	0.049
2010	总计	0.016	0.039	0.055	0.016	0.022	0.038
	加工业	0.010	0.019	0.029	0.010	0.013	0.023
	非加工业	0.025	0.066	0.091	0.025	0.032	0.057
2007	总计	0.022	0.061	0.083	0.022	0.035	0.057
	加工业	0.015	0.032	0.047	0.015	0.022	0.037
	非加工业	0.034	0.108	0.142	0.034	0.055	0.089
2002	总计	0.067	0.122	0.189	0.067	0.070	0.137
	加工业	0.046	0.070	0.115	0.045	0.047	0.093
	非加工业	0.115	0.236	0.351	0.113	0.121	0.234
1997	总计	0.098	0.179	0.277	0.096	0.105	0.201
	加工业	0.063	0.118	0.181	0.063	0.072	0.135
	非加工业	0.204	0.358	0.562	0.193	0.204	0.397
1992	总计	0.139	0.393	0.532	0.136	0.141	0.277
	加工业	0.103	0.151	0.254	0.103	0.052	0.155
	非加工业	0.178	0.645	0.823	0.170	0.233	0.403
1987 估算	总计	0.397	0.487	0.884	0.391	0.171	0.562
	加工业	0.204	0.055	0.260	0.204	0.024	0.228
	非加工业	0.490	0.695	1.184	0.480	0.242	0.722

表A4. 中国向美国每1,000美元的出口带来的国内增加值和就业（包括直接商品出口和服务出口）

年	出口种类	中国每出口1,000美元带来的国内增加值 单位：美元			中国每出口1,000美元导致的直接和间接进口额 单位：美元		
		直接	间接	全部	直接	间接	全部
2011	总计	226	360	586	336	78	414
	加工业	193	206	399	553	48	601
	非加工业	261	529	790	98	112	210
2010	总计	221	352	573	356	71	427
	加工业	190	208	398	555	47	602
	非加工业	260	530	790	108	102	210
2007	总计	212	329	541	390	69	459
	加工业	176	198	374	577	49	626
	非加工业	265	523	788	112	100	212
2002	总计	190	288	478	481	41	522
	加工业	166	145	311	658	31	689
	非加工业	231	544	775	167	58	225

年	出口种类	中国每出口1,000美元带来的就业 单位：人年			中国每出口1,000美元带来的非农就业 单位：人年		
		直接	间接	全部	直接	间接	全部
2011	总计	0.015	0.033	0.048	0.015	0.019	0.034
	加工业	0.008	0.016	0.024	0.008	0.011	0.019
	非加工业	0.023	0.051	0.074	0.023	0.027	0.05
2010	总计	0.017	0.04	0.057	0.017	0.022	0.039
	加工业	0.01	0.019	0.029	0.01	0.013	0.023
	非加工业	0.027	0.064	0.091	0.027	0.032	0.059
2007	总计	0.024	0.061	0.085	0.024	0.035	0.059
	加工业	0.015	0.032	0.047	0.015	0.022	0.037
	非加工业	0.037	0.105	0.142	0.037	0.054	0.091
2002	总计	0.076	0.125	0.201	0.075	0.073	0.148
	加工业	0.046	0.069	0.115	0.045	0.048	0.093
	非加工业	0.129	0.225	0.354	0.128	0.119	0.247

表A5.美国出口带来的国内增加值和就业

年	出口种类	美国每出口1,000美元带来的国内增加值 单位：美元			美国每出口1,000美元导致的直接和间接进口额 单位：美元		
		直接	间接	全部	直接	间接	全部
2011*	总计	434	402	836	104	59	164
2010	总计	475	387	862	87	51	138
2007	总计	451	410	861	84	56	139
2002	总计	470	422	892	69	40	108
1997	总计	489	411	900	62	38	100
1992**	总计	533	388	921	46	32	79
1987** 估算	总计	550	382	932	40	28	68

注：本表中出口为货物出口，未包括服务

年	出口种类	美国每出口1,000美元带来的就业 单位：人年			美国每出口1,000美元带来的非农就业 单位：人年		
		直接	间接	全部	直接	间接	全部
2011*	总计	0.0030	0.0029	0.0059	0.0028	0.0028	0.0056
2010	总计	0.0032	0.0029	0.0061	0.0031	0.0028	0.0059
2007	总计	0.0035	0.0034	0.0069	0.0034	0.0033	0.0067
2002	总计	0.0049	0.0046	0.0095	0.0048	0.0044	0.0092
1997	总计	0.0050	0.0053	0.0103	0.0049	0.0051	0.0099
1992**	总计	0.0059	0.0062	0.0121	0.0058	0.0060	0.0117
1987** 估算	总计	0.0077	0.0077	0.0154	0.0075	0.0074	0.0149

说明：

* 2011年的10表目前还没有公布，分10部门的出口数据也没有公布，这里使用的是HTS出口数据，10表使用的是2010年非竞争型表，处理方法是：首先将HTS-10位码对应到1067部门，再利用出口转换矩阵将出口数据的购买者价格转换为生产者价格，并将剩余出口额归入相应服务部门（包括铁路运输、水路运输、航空运输、管道运输、批发业等）；由于HTS都是货物出口，导致利用这种方法计算出的出口拉动作用会偏低；

** 1992和1987年的10表部门分类基于SIC（即Standard Industrial Classification，“标准产业分类法”），为了使计算结果与之后年份具可比性，利用商务部网站（<http://www.census.gov/>）给出的SIC到NAICS的对应，将基于SIC的97部门对应到NAICS67部门中，由于有很多部门有交叉，合并后的部门数只有46个，这里的计算结果就是利用基于NAIC的46部门110表。

表A6.美国向中国每1,000美元的货物出口带来的国内增加值和就业(包括香港的转口)

年	出口种类	美国每出口1,000美元带来的国内增加值 单位: 美元			美国每出口1,000美元导致的直接和间接进口额 单位: 美元		
		直接	间接	全部	直接	间接	全部
2011	总计	460	406	866	77	57	134
2010	总计	469	399	868	76	56	132
2007	总计	430	430	860	81	59	140
2002	总计	433	448	881	76	43	119
1997	总计	399	482	881	74	45	119
1992	总计	460	444	904	58	38	96
1987 估算	总计	478	448	926	42	32	74

注: 本表中出口为货物出口, 未包括服务

年	出口种类	美国每出口1,000美元带来的就业 单位: 人年			美国每出口1,000美元带来的非农就业 单位: 人年		
		直接	间接	全部	直接	间接	全部
2011	总计	0.0034	0.0030	0.0064	0.0030	0.0028	0.0058
2010	总计	0.0033	0.0030	0.0063	0.0030	0.0028	0.0058
2007	总计	0.0036	0.0036	0.0072	0.0034	0.0034	0.0068
2002	总计	0.0048	0.0048	0.0096	0.0046	0.0047	0.0093
1997	总计	0.0051	0.0060	0.0111	0.0048	0.0058	0.0106
1992	总计	0.0064	0.0069	0.0133	0.0061	0.0068	0.0129
1987 估算	总计	0.0080	0.0087	0.0167	0.0075	0.0081	0.0156

表A7.美国向中国每出口1,000美元的货物带来的国内增加值和就业（不包括香港的转口）

年	出口种类	美国每出口1,000美元带来的国内增加值 单位：美元			美国每出口1,000美元导致的直接和间接进口额 单位：美元		
		直接	间接	全部	直接	间接	全部
2011	总计	455	409	864	78	58	136
2010	总计	464	403	867	76	57	133
2007	总计	428	431	859	81	60	141
2002	总计	435	446	881	76	43	119
1997	总计	396	487	883	71	46	117
1992	总计	452	452	904	57	39	96
1987 估算	总计	469	458	927	41	32	73

注：本表中出口为货物出口，未包括服务

年	出口种类	美国每出口1,000美元带来的就业 单位：人年			美国每出口1,000美元带来的非农就业 单位：人年		
		直接	间接	全部	直接	间接	全部
2011	总计	0.0034	0.0031	0.0065	0.0030	0.0028	0.0058
2010	总计	0.0033	0.0030	0.0063	0.0030	0.0028	0.0058
2007	总计	0.0036	0.0036	0.0072	0.0034	0.0034	0.0068
2002	总计	0.0048	0.0048	0.0096	0.0046	0.0047	0.0093
1997	总计	0.0051	0.0060	0.0111	0.0047	0.0058	0.0105
1992	总计	0.0064	0.0070	0.0134	0.0061	0.0068	0.0129
1987 估算	总计	0.0078	0.0089	0.0167	0.0072	0.0082	0.0154



之道》(Wiley & Sons, 2002年)一书。他的最新著作是China Vignettes: An Inside Look at China (Talisman, 2007年)。

鲍达民引领麦肯锡致力于资本主义的未来、长期价值创造和企业在社会中的领导角色等领域的工作。这是一组研究计划和项目,以凝聚不同机构和各界领袖采取建设性的行动。其中一个项目是与Lynn Forester de Rothschild共同领导的推动包容性资本主义发展专责小组(由位于伦敦的智库——亨利·杰克逊协会赞助)。该小组由美国及英国的企业和社会领袖组成,制定约束和提升企业行为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创造社会和经济双重价值。

鲍达民是布鲁金斯学会理事、新加坡经济发展局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亚洲开发银行顾问、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国开金融(China Development Bank Capital Group)顾问委员会成员、加拿大亚太基金会董事会成员。他在企业领导以及对居住过的社区所做贡献方面获得过多种荣誉,例如,2013年2月他获得韩国前任李总统颁发的韩国国民勋章(牡丹章)。他是牛津大学布雷齐诺斯学院罗德奖学金信托基金理事及荣誉院士。他也是北京清华大学的兼任讲师。



第九章

中美双边贸易的长期前景

加里·克莱德·哈夫鲍尔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雷金纳德·琼斯高级研究员

迪恩·德罗萨

ADR国际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访问研究员

摘要

本报告利用引力模型和其他分析方法，对未来十年（2012–2022）中美双边贸易的增长前景、两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进行预测，在此，我们分别对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进行分析。

为方便深入研究，我们在表1、2、3展示了2000年以来相关的历史数据，包括中美两国的GDP、全球贸易额、经常项目平衡状况、中美双边的货物和服务贸易、两国的实际有效汇率和双边名义汇率。在此期间，美国经济年均增长率大约为2%，而中国增速通常在10%以上。美国长期处于对外经常项目赤字，而中国则一直保持了盈余。虽然美国的货物贸易对外是贸易逆差，但美国的服务贸易则保持了较大的顺差，中国状况则完全相反。中美双边贸易平衡状况同样具有这些特征。2010年，美国对华货物贸易逆差高达2,800亿美元，而对华服务贸易则保持了110亿美元的顺差。2005年以来，人民币无论是实际有效汇率还是对美元的实际汇率，都经历了升值的过程，同期美元的实际有效汇率则一直处于贬值态势。

我们核心的分析方法是利用引力模型变系数，分别对中美双边货物和服务贸易进行预测。我们根据2008–2011年的双边货物贸易数据，计算出两国对所有国家的贸易、中美两国间贸易的变系数。对货物贸易引力模型变系数的计算，我们选择2008–2011年这一较短的时间跨度，是因为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和2005年《多边纺织品和服装协议》终止，中国在随后几年后出现高速增长的货物贸易出口，在未来十年内可能无法再现¹。即便如此，本研究和预测的

结果既有一些通常的看法，也有一些十分意外的结论。其中，比较重要的研究结论发现，无论引力模型变系数如何设定（附件表A4），中国对美国货物贸易的出口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强劲增长，这是一个普遍的共识。但众所周知，中国已经成为亚洲输往美国的商品集合地。因此，如果贸易额以出口商品增加值替代销售额，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将大幅度下降²。然而，我们的分析仍然是以传统的贸易数据，来表示双边出口和进口贸易的规模。

按照传统的衡量标准，中美双边贸易在未来十年无疑将实现增长。然而，如果中国经济年均增速为7.5%（我们预测的中速增长），并以2011年作为贸易增长基准，那么未来的双边贸易增长将是巨大的，甚至在我们考虑了经济结构变化而不是基于标准的引力模型之后，对预测进行显著的下调，其结果也是如此。2011年，中美双边货物和服务贸易额大约为5,700亿美元，以此为基准，2022年，我们预测两种贸易方式的贸易额将达到1.6万亿美元（2011年价格）。2011年，服务贸易占双边贸易额的比重为5%，2022年，这一比重将上升到10%。

我们的基准情境预测，虽然在贸易规模上要低于国际货币基金（IMF）近期在《世界经济展望》的预测，但是2022年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无论是总额还是对美国的顺差，仍将保持很大的规模。实际上，基准情境的预测假定人民币的实际有效汇率不变，中国没有单方面的关税减免进程。然而，如果人民币在未来三年延续2005年

1 我们利用更长的时间跨度2000–2010年，来计算服务贸易的变系数。中国的服务贸易出口相对货物贸易出口规模很小，较长的时间跨度将显著放大双边贸易的观察值。

2 经合组织（OECD）和WTO估计，如果按照增加值计算，2009年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将下降25%，大约为1,310亿美元，低于按销售总额计算的1,710亿美元，这归因于中国出口产品中从境外获得的增加值较高，同时美国对华出口的附加值也很高。



以来实际有效汇率大幅升值的趋势，那么基于基准情境的预测结果表明，中国目前的经常项目顺差状况将变成逆差，中国对美国的贸易盈余将急剧萎缩。如果中国单方面消除对商品进口的关税壁垒（当前平均关税税率为8%），而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2022年中国的经常项目盈余将有所减少，但仍将保持在占中国GDP比例大约2.5%的较大规模。

表1 美国和中国的产出、增长、国际贸易及收支平衡状况（2000-2011）（10亿美元，市场价）

	美国						中国					
	国际贸易						国际贸易					
	GDP*	增速 (%)	货物和服务贸易		经常项目平衡	占GDP (%)	GDP*	增速 (%)	货物和服务贸易		经常项目盈余	占GDP比 (%)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2000	9,951	4.1	1,073	1,450	-416.3	-4.2	1,198	8.4	280	251	20.5	1.7
2001	10,286	1.1	1,008	1,369	-396.6	-3.9	1,325	8.3	299	271	17.4	1.3
2002	10,642	1.8	981	1,398	-457.2	-4.3	1,454	9.1	365	328	35.4	2.4
2003	11,142	2.5	1,024	1,515	-519.1	-4.7	1,641	10.0	485	449	43.1	2.6
2004	11,853	3.5	1,163	1,769	-628.5	-5.3	1,932	10.1	658	607	68.9	3.6
2005	12,623	3.1	1,287	1,996	-745.8	-5.9	2,257	11.3	837	712	132.4	5.9
2006	13,377	2.7	1,460	2,213	-800.6	-6.0	2,713	12.7	1,062	853	231.8	8.5
2007	14,029	1.9	1,655	2,351	-710.3	-5.1	3,494	14.2	1,342	1,034	353.2	10.1
2008	14,292	-0.3	1,843	2,541	-677.1	-4.7	4,520	9.6	1,582	1,233	420.6	9.3
2009	13,974	-3.1	1,575	1,956	-381.9	-2.7	4,991	9.2	1,333	1,113	243.3	4.9
2010	14,499	2.4	1,838	2,338	-442.0	-3.0	5,930	10.4	1,744	1,521	237.8	4.0
2011	15,076	1.8	2,105	2,665	-465.9	-3.1	7,298	9.2	2,087	1,898	201.7	2.8
2022	20,869 [#]	16,170 [#]

* 在引力模型的估算中，我们使用按照汇率计算的购买力平价真实GDP。在此，我们以不变价格和市场汇率来计算。
2022年GDP数据（2011年价格）假设中国实际预期增速为年均7.5%的中速增长，美国年均增速为3.0%。

数据来源：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October 2012), and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December 2012).

表2 中美两国的货物和服务贸易总额和双边贸易的情况 (2000-2011) (10亿美元, 美元当前价)

	美国对全球和对华双边贸易								中国对全球的贸易			
	货物				服务				货物		服务	
	全球		中国		全球		中国		全球		中国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2000	787	1,231	22	108	285	218	5.0	3.2	249	215	30	36
2001	734	1,153	26	109	273	216	5.4	3.6	266	232	33	39
2002	701	1,173	27	134	280	226	5.8	4.1	326	281	40	47
2003	733	1,271	34	163	290	243	5.7	3.8	438	394	47	55
2004	825	1,486	45	211	338	282	7.3	5.6	593	534	65	73
2005	916	1,693	49	260	372	303	8.4	6.2	762	628	74	84
2006	1,043	1,876	59	306	417	337	10.5	9.3	970	752	92	101
2007	1,168	1,984	70	340	487	367	13.0	10.7	1,220	904	122	130
2008	1,312	2,139	82	356	531	402	15.1	9.4	1,435	1,074	147	159
2009	1,074	1,576	78	310	501	380	16.0	8.2	1,204	954	129	159
2010	1,293	1,936	103	383	544	402	21.2	10.0	1,581	1,327	162	193
2011	1,502	2,237	123	417	604	428	1,904	1,660	183	238

	货物和服务贸易收支平衡								
	货物			服务			货物和服务		
	美国	中国	美国对华	美国	中国	美国对华	美国	中国	美国对华
2000	-444	34	-85	67	-6	1.8	-377	29	-83
2001	-419	34	-83	57	-6	1.9	-362	28	-81
2002	-472	44	-106	54	-7	1.8	-417	37	-104
2003	-538	44	-129	47	-9	1.9	-491	36	-127
2004	-661	59	-166	55	-8	1.7	-605	51	-164
2005	-778	134	-211	69	-10	2.2	-709	125	-209
2006	-833	218	-246	80	-9	1.2	-753	209	-245
2007	-816	316	-271	119	-8	2.3	-697	308	-268
2008	-827	361	-275	129	-12	5.7	-698	349	-269
2009	-503	250	-232	121	-29	7.8	-381	220	-224
2010	-642	254	-280	142	-31	11.1	-500	223	-269
2011	-735	244	-294	175	-55	...	-560	188	...

数据来源: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Statistics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Services (December 2012);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Gravity Model Data Set (June 2012); and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December 2012).



表3 美国和中国国际货物贸易、进口关税和汇率(2000-2011)(10亿美元:2011年价格)

	美国						
	国际货物和服务贸易				平均进口关税 税率	实际有效汇率	美元对人民币实 际汇率
	货物和服务		货物进口				
	出口	进口	全球	中国			
2000	1,073	1,450	1,231	108	3.6	107.8	107.3
2001	1,008	1,369	1,153	109	3.5	113.9	105.0
2002	981	1,398	1,173	134	3.5	113.6	102.5
2003	1,024	1,515	1,271	163	3.4	106.4	101.4
2004	1,163	1,769	1,486	211	3.2	101.4	102.6
2005	1,287	1,996	1,693	260	3.2	100.0	100.0
2006	1,460	2,213	1,876	306	3.1	99.4	95.6
2007	1,655	2,351	1,984	340	2.9	94.7	93.0
2008	1,843	2,541	2,139	356	3.2	91.0	86.9
2009	1,575	1,956	1,576	310	3.0	95.1	85.1
2010	1,838	2,338	1,936	383	2.9	91.4	85.8
2011	2,105	2,665	2,237	417	...	86.9	83.8

	中国						
	国际货物和服务贸易				平均进口关税 税率	实际有效汇率	人民币对美元实 际汇率
	货物和服务		货物进口				
	出口	进口	全球	美国			
2000	280	251	215	22	16.4	108.5	93.4
2001	299	271	232	26	15.4	113.2	95.4
2002	365	328	281	27	...	110.6	97.6
2003	485	449	394	34	10.7	103.3	98.7
2004	658	607	534	45	9.8	100.5	97.5
2005	837	712	628	49	9.2	100.0	100.0
2006	1,062	853	752	59	8.9	101.6	104.5
2007	1,342	1,034	904	70	8.6	105.6	107.6
2008	1,582	1,233	1,074	82	8.4	115.3	115.5
2009	1,333	1,113	954	78	8.2	119.2	117.9
2010	1,744	1,521	1,327	103	7.7	118.7	117.0
2011	2,087	1,898	1,660	123	...	121.9	119.9

数据来源: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October 2012);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Gravity Model Data Set (June 2012); and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December 2012). 双边实际汇率为作者估算。

中美双边贸易的长期前景

假定和情境分析

在引力模型框架中，GDP规模是双边贸易流量的主要驱动力，因此，预测中美两国GDP每年的实际增速是预测2022年双边贸易最关键的一步。我们的GDP增速预测基于三种不同假定：低速增长（美国2.5%，中国6.5%）；中速增长（美国3.0%，中国7.5%）；高速增长（美国3.5%，中国8.5%）。人口规模是另一个产生贸易活动的重要驱动力，但人口增长的稳定性要高于GDP增速。我们假设美国的人口年均增长率为0.9%，中国为0.5%。

我们模拟了人民币的两种情境：一是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未来十年将保持不变，二是2015年前人民币将延续2005年以来的升值节奏，每年大约3.4%升值幅度。在第二种情境中，实际汇率升值表现为人民币贸易加权名义汇率出现升值，同时中国将出现比主要贸易伙伴相对较高的通货膨胀。其他的研究方法也可测算出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经常项目平衡和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影响。

就贸易政策而言，我们考虑三种不同的情境，一是中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均没有显著的变化，二是中国基于最惠国待遇（MFN）的原则，单方面废除货物贸易进口的关税壁垒，三是美国和中国为了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通过相互共融，优先推动贸易自由化，废除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这实际上是在中美之间建立一个基本的自由贸易区（FTA）。我们使用“基本的”作为修饰词，因为我们不期待中美两国能在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关注的投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劳工和争端处理机制等领域达成广泛共识。因此，在评估这一情境

时，我们首先对废除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进行局部均衡分析，然后进一步假定引力模型FTA的变系数，评估FTA对未来十年中美贸易的影响。

引力模型简介

我们预测的重中之重在于引力模型。那些感兴趣的读者可做进一步了解，DeRosa和Gilbert（2005）详细介绍了引力模型的结构，并利用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计算出相应的引力模型结果。在这篇报告中，我们简要回顾了引力模型的主要特征，并利用它预测中美双边贸易的前景。本报告使用的模型与大部分引力模型相似，但在一些重要特征上仍有显著区别。模型不仅解释了双边两种贸易方式（货物和服务贸易）和区分进出口后的货物和服务贸易，同时还以170个国家的年度数据为基础，分析了两国2008–2011年的货物贸易、2000–2010年的服务贸易³。本研究的贸易数据剔除了1,000万美元（2011年价格）以下的双边或单一的贸易数据，是因为我们希望估算的变系数能较好地反映大规模的贸易流动。在此，利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来估算变系数。

本报告的模型使用了9个因变量的序列数据组来计算变系数：（1）数据库中中美两国与所有国家的双边贸易；（2）美国对所有贸易伙伴的货物贸易出口；（3）美国自所有贸易伙伴的货物贸易进口；（4）中国对所有贸易伙伴的货物贸易出口；（5）中国自所有贸易伙伴的货物贸易进口；（6）美国服务贸易出口；（7）美国服务贸易进口；（8）中国服务贸易出口；（9）中国服务贸易进口。

³ 部分国家之间2010年和2011年的双边贸易数据可能缺失。



正如所预期的，解释（自）变量估算的变系数结果表明，两个贸易伙伴的地理距离越远，双边贸易额越低，两个贸易伙伴GDP总规模越大，双边贸易额越大。其他关键解释变量的影响也是敏感的，一般都符合其他引力模型得出的结论。两国若拥有共同的语言或边界，有利于双边贸易活动，岛屿国家相对大陆国家而言，对贸易发展更为有利。历史上存在殖民地关系的两个贸易伙伴，或者是普惠制（Generalized System of Preferences, GSP）的受益者⁴，都有利于贸易的发展。除了空间距离外，引力模型认为与沿海国家相比，内陆型国家的贸易发展障碍更多。

针对所有国家的贸易模型还加入了一个变量，即超过500个FTA，已经集团化成9个主要的FTA或具有全球影响的FTA集团，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和欧盟执行的自由贸易协定等⁵。FTA变量是二分变量（0,1），又称为虚拟变量。若贸易或投资伙伴国是FTA成员国，而且两国间贸易协定已生效，变量值为1，反之变量值为0⁶。然而，FTA变量并没有加入到美国模型或中国模型，因为在变系数估算的期限内（货物贸易为2008–2011年，服务贸易为2000–2010年），美国和中国的FTA伙伴变化不大。

附件A的一系列表格显示了根据不同数据组估算的引力模型变系数，然后利用这些变系数预测2022年的贸易流量。附件表A3至表A6的检验结果表明，根据不同数据组估算的引力模型系数预测的贸易额差异很大。因此，为了达到预测目的，我们采用了三步预测法，首先，我们选择贸易额预测结果最接近2000年以来的实际贸易额的变系数，然后，我们利用特别调节因子来选择

变系数，以使预测的贸易额接近几年来的实际贸易额，特别调节因子见附件表A7。例如，在前期中国对美国货物贸易出口的预测，中国出口变系数将乘以特别因子1.5。最后，为了对2022年贸易额进行预测，我们修改了最初的特别因子，以反映在引力模型中没有无法体现的经济发展趋势。

如前文所述，2001–2008年期间中国扩大出口的条件十分有利，是因为2001年中国加入了WTO，大幅削减了关税税率，使自身成为全亚洲的组装基地。而且，几年后的2005年，《多边纺织品和服装协定》终止，中国纺织品进入全球开放的市场。

对外经常项目平衡必然体现国内储蓄、投资和政府财政收支平衡的状况⁷。随着中国主要领导人推进扩大居民消费和建设公共社会安全网，同时，中国人口结构正在走向老龄化，中国国内高企的净储蓄水平（这转变成对外经常项目顺差）未来十年下行可能性较大。与此同时，未来十年美国财政赤字将可能下降，家庭储蓄率也将上行。

中国的劳工成本正在迅速上升，而美国的工资水平保持平稳。其结果是，中国出口商品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将下滑，特别是相对于印度、印尼和越南等国家的竞争力，相反，与加拿大、欧洲和日本相比，美国出口部门的竞争力将上升。竞争力的此消彼长将预示着美国出口增速将越来越快，而中国出口的增速将逐渐下行。

适合美国市场的“中国制造”的出口商品可能将逐渐饱和，中国企业将拓展现有出口产品在拉美、非洲和亚洲的市场。

引力模型预测的中美双边贸易额，并不能直接反映两国的整体对外经常项目平衡状况。然而，近年来，中美双边的经常项目平衡状况，越

4 在普惠制条件下，发达国家对最不发达国家实行一种单边的贸易优惠政策，具体详见贸发会议（UNCTAD）（2005）。

5 集团化的FTA和优惠贸易协定包括：欧盟（EU）；欧洲自由贸易区（EFTA）；欧盟双边自由贸易协定（EU FTAs）；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南南锥体共同市场（Mercosur）；智利、墨西哥、澳大利亚、新加坡（CMAS）四国作为高度自由贸易国家对外签署的FTAs；东盟（ASEAN）自由贸易区（AFTA）；南亚自由和优惠贸易安排（SAPTA）；其他关税同盟和FTAs。

6 有必要说明，NAFTA的美墨双边贸易1994年前FTA变量值为0，1994年及此后为1。

7 在国民收入核算的基本等式中，经常项目盈余必须等于全国总投资（公共和私人部门）—储蓄缺口： $(M-X) = I+G - (S+T)$ ，其中 $(M-X)$ 为经常项目盈余（M代表进口，X代表出口），I是投资支出（家庭和企业），G是政府所有支出，S是私人储蓄（家庭和企业），T是税收。

来越能够反映两国对外整体的经常项目平衡状况⁸。我们利用这种相关性建立了引力模型，预测了中美两国的整体经常项目平衡状况。正如下一部分所阐述的，据此预测的两国对外整体经常项目状况，还反过来被IMF的预测结果所佐证。

补充研究方法和材料

引力模型在预测汇率和贸易壁垒变化的影响方面并不十分有效，其根本原因在于引力模型着重论证人口、国土、经济等规模量级的差异对贸易流量的潜在影响（例如，从1,000万美元到1,000亿美元不同量级）。在这一巨大的区间跨度内，汇率和贸易壁垒的变化与空间距离、GDP水平或共同的边界等因素相比，对贸易的影响是相对有限的。然而，汇率和贸易壁垒之所以备受关注，是因为它们直接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并影响到当年的贸易活动和经常项目平衡状况。

据此，本报告中我们利用其他研究方法和补充材料来评估汇率波动、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变化对2022年中美两国贸易状况的影响。我们使用IMF《世界经济展望（2012）》（WEO）关于2017年的预测结果，作为引力模型中关于贸易平衡状况的一个基准。WEO的预测认为，在基本稳定的国际真实汇率波动环境中，人民币在2017年前实际汇率波动也很小。我们把WEO的预测线性延伸到2022年。如果按照WEO线性延伸的预测结果，2022年美国对外经常项目总赤字和中国对外经常项目总盈余，以及中美双边的经常项目平衡状况，略高于以基准情境（GDP中速增长：美国增长3.0%，中国增长7.5%）利用引力模型的预测结果。WEO预测的结果表明，2022年美国对华经常项目贸易逆差为6,600亿美元，引力模型预

测的逆差4,120亿美元。相应地，美国对外经常项目总逆差预计为6,860亿美元（略低于WEO预测的7,340亿美元），中国对外经常项目总顺差为4,120亿美元（显著低于WEO预测的6,980亿美元）。

如前文所述，引力模型的预测并不力图反映汇率波动，而在WEO的预测中，同样把汇率稳定作为一个重要的基础。我们更进一步研究和预测表明，如果中国2015年之前保持年均3.4%的货币升值趋势，美国对华经常项目逆差以及美国对外经常项目总逆差的水平将出现显著下降。

我们利用威廉·克莱因和约翰·威廉姆斯（2012）关于人民币实际汇率维持年均升值3.4%（2005年以来升值速度）影响的研究结果。我们假设2015年前继续维持这一升值速度，然后停止升值。换言之，我们假设自2011年起，在未来四年内，人民币实际汇率累计升值14.3%（ $1.034^4 - 1$ ）。

关于货物贸易进口关税的单边自由化进程，我们采用了其他研究结果。世界银行利用WTO和UNCTAD发布的贸易预测数据，认为中国进口关税税率为7.7%⁹。我们假设中国的进口关税税率每下降一个百分点，中国货物贸易以美元计价的进口将增加1%。这一影响以以下条件为假设前提，即中国货物贸易人民币计价的进口并没有变化，因为进口量每增加1%，由于人民币的升值使得人民币计价的商品价格下降1%。然而，中国货物贸易进口的美元价值却和进口量同步上升。

关于非关税壁垒单边自由化对服务贸易影响的情境，我们利用了Hufbauer、Schott和Wong(2010)的研究结果。他们保守估计中国服务贸易进口非关税壁垒高达68%，但仍略低于世界银行(2012)的研究结果。Hufbauer et al.(2010)估算的服务贸易进口需求弹性系数

8 从中美两国近年来国际收支的数据中，我们注意到，美国对华经常项目赤字大约为美国经常项目总顺差的60%。与此同时，我们还发现中国对美经常项目顺差，几乎是中国对外经常项目盈余的总额。这一相关性可见附件表A8：2009-2010年，中国对美经常项目顺差，平均为美国对外经常项目总赤字的60%，与中国全部经常项目顺差相当。

9 世界银行，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World Databank, <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ata/home.aspx>, 2012年12月。



表6. 免除服务贸易关税壁垒对中美双边服务贸易的影响

	贸易壁垒 等价税率*	价格弹性	没有自由化政策的2022年 中美双边服务贸易预测 (10亿美元)*			废除服务贸易关税壁垒后的 贸易所得(10亿美元)			完全自由化后2022年中美 贸易预测 (10亿美元)		
			低	中	高	低	中	高	低	中	高
美国对华出口	67.9	-1.37	167.8	256.0	389.4	156.1	238.1	362.2	323.9	494.1	751.6
中国对美出口	6.0	-1.37	30.1	37.7	47.0	2.5	3.1	3.9	32.6	40.8	50.9

* 贸易壁垒等价税率 (TEBs) 来自于Hufbauer、Schott 和 Wong (2010)。世界银行 (2012) 估算的美国TEBs为3.8%，中国为76.2%。在此，我们使用Hufbauer、Schott 和 Wong (2010) 更为保守的估算结果。
美国对华服务出口较低水平的预测对应的中国GDP年均增长率为6%，中等水平预测对应7%的增长率，高水平预测对应着8%的增长率。中国对美服务出口低水平预测对应的美国GDP增长率为2%，中等水平对应着2.5%，高水平对应着7% (见表7)。

数据来源: The World Bank, 2012, <http://iresearch.worldbank.org/servicetrade/>; Hufbauer, Schott and Wong 2010.

表4 中美双边贸易和收支平衡 (2005-2011) 和2022年的预测值(10亿美元, 2011年价格)

年 情境	美国				中国			
	经常项目平衡	对华贸易			经常项目平衡	对美贸易		
		货物服务 贸易平衡	货物出口	服务出口		货物服务 贸易平衡	货物出口	服务出口
2005	-746	-209	49	8.4	132	209	260	6.2
2006	-801	-245	59	10.5	232	245	306	9.3
2007	-710	-268	70	13.0	353	268	340	10.7
2008	-677	-269	82	15.1	421	269	356	9.4
2009	-382	-224	78	16.0	243	224	310	8.2
2010	-442	-269	103	21.2	238	269	383	10.0
2011	-466	...	123	...	202	...	417	...
2022								
IMF《2012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								
1. 人民币实际汇率固定	-734	-660	698	698
引力模型预测								
1. 没有人民币实际升值	-686	-412	508	104	412	412	964	60
2. 2015年人民币持续升值	-455	-181	580	119	-295	181	828	51
3. 中国贸易自由化	-650	-375	545	104	375	375	964	60
4. 中美基本FTA	-442	-167	545	342	167	167	992	63

数据来源: IMF《2012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WEO) 和作者根据引力模型的预测。
IMF关于2022年经常项目平衡状况的预测是根据WEO2017年预测数据的外推结果。假设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8.5%，美国为3.3%，2022年中国经常项目盈余占GDP比例为4.3%，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占GDP比重为3.5%，IMF关于中美双边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平衡状况是根据2009-2010年双边贸易盈余或赤字占两国对外贸易盈余或赤字的比重进行大致的估算。引力模型的基准情境(情境一)反映了调节因子。2022年美国对华货物贸易出口的调节因子使用其对所有国家出口的调节因子2.6，中国对美货物贸易出口的调节因子为1.2，美国服务贸易出口调节因子为1.0，中国服务贸易调节因子为0.5。GDP潜在增长率的预测使用引力模型基准情境的估算，即假设2012-2022年美国年均增长率为3%，中国为7.5%。

为-1.37。在中美相互共融的情境中，消除服务贸易壁垒，将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对中国产生挑战，但自由化仍将对中国经济产生巨大收益，同时，中国对美的双边贸易顺差将下降。中国关键服务领域的价格将下降，如金融、电信、医疗卫生、教育和零售等，而美国的出口将大幅增加(见表6)。

2022年展望

自此，我们着手对以2011年价格计算的中美两国GDP增长在不同情境下的贸易前景进行展望。我们重点关注中速增速(美国GDP年均增长3%，中国GDP年均增长7.5%)情境贸易增长的前景。贸易前景有以下四类情境。

情境一：外部条件不变的贸易前景

第一类情境是“一切照旧的贸易前景”，即根据调整后的变系数线性趋势预测，如表4和附件表A7的注释中阐述的内容。在此情境下，人民币实际汇率无任何变化，中国和美国也没有采取任何消除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自由化举措。2022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预计为6,860亿美元（2011年价格），其中对华货物和服务贸易逆差为4,120亿美元，分别占2022年美国GDP的3.3%和2.0%，略高于2011年水平。从更大范围来讲，利用调整后的引力模型预测两国的整体对外贸易平衡状况，均低于IMF《世界经济展望》的预测结果（见表4）。而且，2022年美国对华出口的结构将有所变化：引力模型预测的美国服务贸易出口将达1,040亿美元，与美国货物贸易出口5,080亿美元的比例大约为20%，而2011年这一比例仅为17%。

除了美国对华服务贸易出现快速增长外，此情境下的一个突出特点是2022年中国对美国货物贸易出口将高达8,000-10,000亿美元。这表明中国作为美国市场的“亚洲工厂”地位重要性将上升一倍，即便是如前文所述考虑到调节因子之后，结果也相差无几。可以确信的是，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仍将上升，即便是新兴“亚洲工厂”的其他经济体将挤占一部分中国出口传统市场。因此，美国对外贸易总逆差的下降幅度并不等于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降幅（低于WEO的预测）。实际上，虽然我们的基准情境预测2022年美国对华贸易（货物和服务）逆差大约为2,500亿美元，低于WEO的预测，但美国对外贸易总逆差仅下降了500亿美元。

情境二：人民币真实汇率升值

在第二类情境中，我们考虑了2015年前人民币持续升值的结果，这将使得2022年中国经常项目整体出现逆差，逆差额为2,950亿美元，占中国按市场汇率计算GDP的1.8%。实际汇率升值的速度与2005年以来中国当局允许的汇率升值速

度相同，年均3.4%。我们接受克莱因和威廉姆斯（2012）的结论¹⁰，他们认为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常项目平衡逆差产生显著影响。根据他们的计算，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每升值1%，将使得中国经常项目总盈余（按市场价格计算）占GDP比重下降0.31个百分点。

根据我们的预测，即便是人民币出现显著升值，美国对外整体经常项目和对华双边经常项目仍将出现逆差。但是，在我们模拟的各类情境中，人民币升值情境下美国经常项目总逆差规模最小，2022年美国经常项目总逆差将从基准情境预测的6,860亿美元下降到4,550亿美元，占GDP比重为2.2%，对华双边贸易赤字也将从基准情境的4,120亿美元下降到1,810亿美元，下降到GDP的0.9%。正如在情境一中所强调的，如果中国一部分的“亚洲工厂”的地位由其他经济体来承担，那么美国对华贸易赤字将下降，但美国经常项目总逆差的下降幅度有限。

情境三：中国单边免除关税

美国和中国都对货物贸易进口实行非关税壁垒。然而，第三类情境中我们假定在下一个十年中国将单边免除货物贸易进口关税壁垒，但并不削减服务贸易进口的壁垒。中国当前的平均关税税率为7.7%。与其他研究相似，我们假定进口关税每下降一个百分点，中国货物贸易进口额将增加1%，因此关税完全免除后中国进口将增加大约8%。这一单一的弹性系数，尽管被广泛使用，但可能太保守了。如表4计算结果所示，美国经常项目总逆差和对华双边贸易逆差与基准情境的预测相比变化很小，变化都在350亿美元以下。相应地，对中国的经常项目盈余和对美贸易盈余的影响也不大。

如情景一所强调的，中国能否保持“亚洲工厂”地位对最后结果有很大影响。如果“亚洲

¹⁰ 对人民币汇率影响贸易流量持怀疑态度的观点见Edward P. Lazear, “中国货币操纵不是问题”，华尔街日报，2012年1月38日，P.A17。



工厂”转移到其他地区，中国的对外经常项目盈余将下降。然而，如果中国单边关税削减如期发生，这又将提升中国竞争优势，延长其“亚洲工厂”的地位，因为出口企业将更易从国际市场获得他们出口所需的中间品和资源投入。

从政治的角度而言，单边关税免除是一项激进的举措，将受到中国贸易伙伴的普遍赞赏。这一政策的贸易影响将是我们计算结果的双倍。经济成本（从重商主义的角度看）和政治代价之间权衡整体而言将十分有利于中国。

情境四：相互共融

第四类也是最后一类情境相比其他情境显得更为冒进。我们把它称之为“基本FTA”或“相互共融”：中国和美国都优先考虑免除货物贸易的关税和服务贸易的非关税壁垒。服务贸易的壁垒对这一类情境十分关键，然而，从政治上讲中国采取这一行动十分困难，服务贸易出口美国占据着比较优势，中国服务贸易壁垒如果以关税税率来衡量，高达70%左右。在这一类情境中，我们计算结果表明中美贸易额将扩张，美国经常项目总逆差将下降到4,420亿美元，而对华双边贸易逆差将降至1,670亿美元。就降低美国对外赤字而言，情景四与情景二中人民币升值一样都很有效。然而，我们再次强调，情境四的关键在于中国针对美国的服务贸易壁垒将采取激进的自由化政策。在情境四中，美国对华服务贸易出口规模将是基准情境的三倍（即每年3,420亿美元与1,040亿美元）。

我们认为中美两国的贸易协定在广度和深度几乎不可能是美国与韩国FTA的延伸，后者在优先领域完全废除了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壁垒。两国的“相互共融”将在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框架内进行，并可能把TPP成员国、与中国已签署FTA的东盟国家囊括进来。我们将此描绘成“相互共融情境”，通过局部均衡方法来计算货物贸易关税和服务贸易非关税壁垒免除后的双边贸易创造效应。

也许这些计算结果太过保守，因此我们也考虑如果中美两国相互共融能实行，中美双边贸易的增长可达到近年来其他FTA同等的水平。实际上，如附件表A1（货物贸易）和A2（服务贸易）所示，我们的引力模型预测的一些主要的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效应，远远大于我们使用简单局部均衡计算的结果。根据引力模型中所展示的几个主要FTA估算的变系数，保守估算中美基本FTA对双边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变系数是0.25。如附件所述，这一估算结果暗示中美双边贸易额有望增长28%，这一增幅远远大于其他主要方法估算的两国货物贸易增长前景和中国对美国服务出口的增幅（10%以下）。

但是有必要强调的是，利用我们的引力模型系数估算的已生效FTA贸易增长效应，要显著低于利用其他方法计算的美国对华服务贸易出口所获得的巨大收益。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当前大部分雄心勃勃的FTA，迄今为止在服务贸易壁垒的免除方面仍然很不够。因此，表A2的引力模型变系数反映自由化程度，远远低于在中美相互共融的情境下我们预期的自由化水平。

不同的GDP增长预测

我们还对中美两国不同GDP增速条件下的贸易效应进行了敏感分析，结果见附件表A3至表A6。除了在基准情境中两国都是中速增长的假定外，我们还对未来十年两国都是低速增长和同时高速增长条件下的贸易前景进行预测，也对美国年均增长2.5%、中国增长8.5%的“低-高”情境进行了分析。

不出所料，中美两国的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增长，将随着两国经济预测增速的上调而上升。然而，其他不同增长情境下都印证了一个在基准情境下的关键结论：2022年美国无论是经常项目整体状况还是对华经常项目的平衡状况，都继续保持逆差的趋势，而中国则继续维持了自身整体

表5. 不同情境下2000–2022年中美双边货物和服务贸易的扩张和增长前景2000–2022年

情境和年限	美国				中国			
	美国对华货物贸易出口		美国对华服务贸易出口*		中国对美货物贸易出口		中国对美服务贸易出口*	
	自始至终贸易增长率	复合增长率 (%)	自始至终贸易增长率	复合增长率 (%)	自始至终贸易增长率	复合增长率 (%)	自始至终贸易增长率	复合增长率 (%)
实际贸易, 2000 – 2011	4.4	14.5	3.5	13.2	3.1	10.9	2.6	9.9
贸易预测, 2011 – 2022								
1. 人民币实际汇率不变	4.1	13.8	4.8	14.0	2.3	7.9	5.8	15.8
2. 2015年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	4.7	15.1	5.5	15.3	2.0	6.4	5.0	14.4
3. 中国贸易自由化	4.4	14.5	4.8	14.0	2.3	7.9	5.8	15.8
4. 中美基本FTA	4.4	14.5	15.9	25.9	2.4	8.2	6.1	16.3

* 2000–2010年双边服务贸易扩张和增长率数据为实际值，2010–2022年为预测值。

表7 中美GDP增速的不同情境假设 (2012–2022)

增长率情境	实际GDP		人口	
	美国	中国	美国	中国
低速	2.5	6.5	0.9	0.5
中速	3.0	7.5	0.9	0.5
高速	3.5	8.5	0.9	0.5
美国低速/中国高速	2.5	8.5	0.9	0.5

和对美国的经常项目顺差。在相当大的区间范围内，经济增速的不同并没有改变这一基本结论。

贸易扩张和出口增长率的不同情境

在四种不同情境下，中美双边贸易都可实现扩张。关于中美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增长前景的进一步研究，将突出贸易扩张的模式和动力。表5展现了2000–2011年中美两国出口的实际规模、增长率和2011–2022年两国贸易的增长前景。这两方面的观察结果都特别有说服力。总体而言，在四种情境下，中国对美国的货物贸易出口增速均低于过去的十年增速，美国对华货物贸易出口将延续过去的增速。然而，中美两国在未来十年的服务贸易出口的预期增速将高于过去十年的增速：在几乎所有情境下，2010–2022年服务贸易的增长速度都是2000–2010年的两倍。在前三

类情境中，未来十年美国对华服务贸易出口增速上升幅度有限，仅高于过去十年平均增速13%大约1–2个百分点。然而，在第四类即“相互共融”情境中，美国对华服务贸易出口的年均增速超过25%。如果考察全部四种情境，中国对美国的服务贸易出口在四种情境下平均年均增速约为16%，而过去十年为10%。

高科技出口限制

中国贸易专家普遍认为，美国出口管制是对华货物贸易出口增长受到限制的重要原因，这一观点看似有一定道理。历史上，美国出口控制体系把贸易伙伴划分成四级：第一级是“高度信任”，通常指北约组织成员国 (NATO) 和日本；第二级是“信任”，包括爱沙尼亚和罗马尼亚；第三级是“危险”，包括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第四级是“威胁”，包括古巴、伊朗和北朝鲜。2001年，为了规范出口管制体系，第一级和第二级国家合并，但中国仍保留在第三级国家，即“危险”或“一定程度的威胁”，对这类国家将实行更严格的出口管制。初步看来，美国高科技产品对中国和其他第三类国家的出口增长受限似乎有一定道理。

在Asha Sundarem 和 J. David Richardson(2013)的工作论文中，他们利用引力模型估算



了美国高科技出口与其他发达经济体（法国、德国、日本和英国）和新兴出口大国（巴西、中国、印度、以色列和墨西哥）的差距。该论文重点研究了七类产品（3位数HTS分类法）包括化工产品（352）、电子装备（383）和科学设备（385）。令人吃惊的是，研究发现2004年美国对第三类国家的出口存在过度出口，七类产品的出口总量达250亿美元。特别是，2004年美国对中国的高科技产品出口规模高达100亿美元，高于引力模型的正常水平，并不存在高科技产品出口受限的问题。相反，美国与发达国家和新兴出口大国等竞争对手相比，高科技出口表现优越。如何解释这些大感意外的结果呢？

Sundaram和Richardson认为尽管存在出口管制体系，但美国高科技出口仍大获成功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尽管出口管制体系具有拜占庭式的特征，但自冷战以来管制程度仍有相当程度地放松，这一自由化进程还在继续。例如，2012年12月，国会授权总统有权违背法律禁令，放松对卫星产品的出口管制¹¹。中国打开了卫星残骸上的机密编码的电路板，这引起了美国对中国强烈谴责。另一方面，美国跨国公司积极全面推进在国内和境外的高科技产品研发和销售。实际上，大部分高科技产品出口并没有受到限制，美国跨国公司通常先于欧洲和日本等竞争对手进入全球市场。

在Sundaram和Richardson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可得出结论，美国出口管制是限制美国对华出口很小的因素，这一影响很可能接近于零。每年由于管制而导致对华出口受阻的规模不超过50亿美元。在“相互共融”情境下，进一步放松对华出口管制似乎很有道理，但它并不会使得美国出口出现预期的大幅攀升。

不同情境下的结论

四种情境下的贸易预测都表明了一个共同前景，即美国经常项目整体逆差、对华双边经常项目逆差、中国经常项目整体盈余等趋势仍将延续。2022年，美国对华双边赤字预计为4,000亿美元，而对外赤字总规模预计为7,000亿美元。美国对外赤字的大幅下降，需要重大的结构性改革，相应地，这要求对2000-2011年引力方程中估算的变系数进行调整（附列表A1和A2）。

结构性变化的情景会是什么呢？一种可能是人民币继续升值，如情景二所考虑的。另一种可能是贸易领域尤其是服务贸易快速、激进的自由化，如我们在情境三和情境四所考虑的。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这已经超出了本研究的范围但很可能会发生的，即美国从2011年的能源净进口国（能源贸易逆差3,310亿美元），转变成能源自给自足国，甚至在本世纪20年代中期变成能源净出口国¹²。这可能会是当前美国正在进行的页岩气和石油革命产生的一个重大成就。美国能源前景通过简单计算就可清晰地表明美国经常项目总逆差的变化。假设2022年美国“能源赤字”为零，其他条件不变，我们计算的美国对外经常项目逆差状况如下：基准情境的逆差将从6,860亿美元下降到3,550亿美元，情境二（人民币升值）的逆差将从4,550亿美元降至1,240亿美元，情景三（单边自由化）从6,500亿美元降至3,190亿美元，情境四（相互共融）从4,420亿美元降至1,110亿美元。在我们的模型中，虽然美国能源赤字归零不能完全消除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但逆差规模将急剧下降。

前文的讨论强调了中美两国的政治关系，将直接影响双边贸易赤字和盈余。然而，任何人都不能漠视两国从贸易扩张中所获得的GDP和国

¹¹ 见华盛顿邮报，2012年12月21日，P.B4。遗憾的是，总统获得的新授权没有对中国执行。原始法律禁令于1996年出台，起源于劳拉空间通信公司制造的卫星由中国火箭发射后出现坠毁（劳拉公司2000年被波音公司收购）。

¹² 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EIA）发布最新的《2013年能源展望年度报告》认为，2020年美国天然气的产量将可能超过国内需求量，将出现净出口，石油部门也很可能发生相似的变化。

民生活水平提升的巨大收益，无论是贸易赤字国或盈余国。根据我们的基准情境（情境一）估算，2022年中美两国的货物和服务贸易额将从2011年的6,000亿美元提高到1.6万亿美元。其他的研究结果综合表明，进出口贸易额每提高10美元，将通过多重渠道使得GDP增加4美元¹³。未来十年两国贸易增加额高达1万亿美元，使得2022年中美两国在其他途径所获得的GDP增长外，还可从中获得4,000亿美元GDP的额外收益。这一规模的收益在未来十年都一直保持在占两国GDP的2.0%至2.5%的比例，这对用任何标准衡量来说都是巨大的。

附件A

技术背景

附件A总结了引力模型系数和其他研究方法所使用的技术体系，这些研究方法作为引力模型的补充，用来评估其他三种情境：人民币升值、单边关税自由化和“相互共融”情境。

引力模型系数

我们第一步的分析结果如表A1和A2所示，分别利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估算了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回归系数。第一行的各类因变量是所有国家的出口额、美国对所有贸易伙伴的出口额、美国自所有贸易伙伴的进口额、中国对所有贸易伙伴的出口额、中国自所有贸易伙伴的进口额的对数值。

为了避免在估算回归系数对小额贸易赋予过高的权重，数据组将贸易额低于1,000万美元剔除。数据组包括2000年至2010年或2011年的贸易额和其他指标，数据选取将取决于各国的解释变量和双边贸易等指标最新数据的可获得性。所有指标计价货币都是不变美元价，GDP规模以

2005年汇率计算的购买力平价来衡量，双边贸易额利用美国消费价格指数平减来计算，预测值以2011年不变价格衡量。

表A1和A2的第一列是自变量。回归方程的基本结构包括对数方程和半对数独立方程。连续变量，如空间距离和两国的人均GDP，都以对数的形式出现。离合变量，如两个贸易国是否有殖民地关系、贸易伙伴是否签署FTA等，以两个虚拟变量的形式出现，0代表否，1代表是。内陆国家或岛屿贸易伙伴国用三个虚拟变量表示，0代表两个都否，1代表其中一国是，2代表两国都是。当自变量是连续的且以对数的形式出现，变系数可解释为弹性值。例如，两国人均GDP的变系数为0.086，这意味着人均GDP上升10%，两个贸易伙伴国（一方向另一方出口）的双边贸易将提高0.86%。当所有的自变量都是离合变量，应对其造成的影响进行适当调整。例如，某一欧盟成员国向另一成员国货物贸易出口的变系数为0.277，这意味着欧盟FTA使得一国对另一国的出口增加32%，即 $100 * \{\exp(0.277) - 1.00\} = 32\%$ 。在此， $\exp(0.277)$ 代表常数e的幂次方为0.277。

所有国家货物贸易的出口系数是以大约为2.3万个数据源估算的，服务贸易数据源有2.5万个。然而，中美两国针对各自的贸易伙伴进出口的系数是根据更少大约400条货物贸易数据和200-400条服务贸易的数据估算得出的。

其他的出口和进口额预测

表A3到A6展现了2022年利用不同引力模型预测的结果，即假设经济预期增长不同（低速、中速和高速—见表6）和相应的系数组（所有国家、美国和中国），读者能一目了然2022年不同的系数组对应着迥异的预期贸易增速。我们选择最接近近年来（2000-2011）实际贸易额的系数组，然后我们使用特别调整因子，使其更加接近实际贸易流量。调整因子在表4和附件表A7的注释中有详细介绍。据此，我们得出中美双边贸易预测的

¹³ 见 Hufbauer、Schott 和 Wong (2010)，附件A。

基准情境，如表4（情景一）所示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额。表A7显示中美双边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实际值和预测值，据此可看到2000-2011年根据调节因子估算的二者拟合程度。

垒很高，若实行自由化将使美国对华服务贸易出口大幅增加，这也是情境四的最大的特点。

与WEO预测值的比较

表A8显示了IMF《世界经济展望》中美两国的经常项目平衡状况、中美双边贸易赤字和盈余的历史数据和预测值，这为我们的引力模型得出的历史值和预测值提供了可比数据。WEO的预测期仅到2017年，因此，我们把WEO的数据外推到引力模型的最后期限2022年。WEO的预测不包括双边的货物和服务贸易规模，然而，WEO预测的两国经常项目平衡和双边贸易平衡状况与我们引力模型预测范围大体一致。WEO的预测假定实际有效汇率基本不变，引力模型的基准情境也没有考虑汇率变化的影响，同时二者都没有考虑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变化的影响。由此可见，引力模型基准情境的预测可视为人民币汇率、中美贸易政策均不发生变化的前提下进行的。

其他情境的计算结果

其他引力模型情境假设人民币升值和两国都实行贸易自由化。这类情境要求做进一步计算，因为引力模型并不适合评估汇率波动或贸易壁垒削减所带来的影响。表A9至A11显示了情境二（人民币升值）、情境三（中国单边废除关税）和情境四（中美两国同时实行贸易自由化政策）的计算结果。情境二的计算主要依赖于William Cline 和 John Williamson (2012)关于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影响研究。情境三采纳了传统的中国关税税率削减的单一反应系数，即进口关税每削减一个百分点，中国进口额增加1%。情境四的计算假设中美两国都优先进行贸易自由化，货物贸易关税削减同样采纳情景三的结果，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影响采纳Hufbauer、Schott 和 Wong (2010)的研究结果，这是因为中国服务贸易的壁

表A1 引力模型关于2008-21011年主要关税联盟和FTA货物贸易总额 (SITC 0-9) 利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的估算结果
(剔除1000万美元以下数据)

		All-country exports	U.S. exports	U.S. imports	China exports	China imports
Log distance	Estimate	-0.724***	-1.515***	-0.859***	-0.232	-0.510
	(s.e.)	(0.024)	(0.161)	(0.292)	(0.153)	(0.336)
	(t-statistic)	(-30.433)	(-9.412)	(-2.941)	(-1.518)	(-1.517)
Log product real GDP (PPP)	Estimate	0.959***	1.017***	1.103***	0.857***	0.585***
	(s.e.)	(0.031)	(0.091)	(0.165)	(0.102)	(0.126)
	(t-statistic)	(30.723)	(11.199)	(6.672)	(8.432)	(4.642)
Log product real GDP (PPP) p/c	Estimate	0.074**	0.321**	0.302	0.167*	0.632***
	(s.e.)	(0.029)	(0.132)	(0.220)	(0.098)	(0.185)
	(t-statistic)	(2.531)	(2.427)	(1.371)	(1.694)	(3.410)
Common language	Estimate	0.435***	0.529***	0.429	2.675***	3.855***
	(s.e.)	(0.040)	(0.139)	(0.274)	(0.553)	(0.776)
	(t-statistic)	(10.831)	(3.797)	(1.565)	(4.837)	(4.969)
Land border	Estimate	0.760***	-0.389	0.569	0.162	-0.080
	(s.e.)	(0.070)	(0.365)	(0.563)	(0.314)	(0.481)
	(t-statistic)	(10.914)	(-1.067)	(1.011)	(0.517)	(-0.167)
Number landlocked	Estimate	-0.150***	-0.268*	-0.375	-0.246	-0.281
	(s.e.)	(0.028)	(0.160)	(0.345)	(0.163)	(0.290)
	(t-statistic)	(-5.269)	(-1.677)	(-1.085)	(-1.504)	(-0.966)
Number islands	Estimate	0.211***	0.453**	0.053	-0.038	0.129
	(s.e.)	(0.038)	(0.202)	(0.327)	(0.147)	(0.531)
	(t-statistic)	(5.532)	(2.244)	(0.161)	(-0.258)	(0.242)
Log product land area	Estimate	-0.118***	-0.017	-0.016	0.083	0.527***
	(s.e.)	(0.016)	(0.061)	(0.097)	(0.062)	(0.112)
	(t-statistic)	(-7.286)	(-0.279)	(-0.168)	(1.350)	(4.717)
Common colonizer	Estimate	0.746***			-3.594***	-2.580***
	(s.e.)	(0.073)			(0.694)	(0.770)
	(t-statistic)	(10.282)			(-5.178)	(-3.352)
Ever colony	Estimate	0.406***	-0.091	-0.126	1.082**	1.264*
	(s.e.)	(0.083)	(0.286)	(0.464)	(0.517)	(0.650)
	(t-statistic)	(4.895)	(-0.319)	(-0.273)	(2.093)	(1.945)
GSP	Estimate	-0.059**	0.498***	0.582*	0.353**	0.397
	(s.e.)	(0.028)	(0.171)	(0.318)	(0.162)	(0.391)
	(t-statistic)	(-2.065)	(2.917)	(1.833)	(2.184)	(1.015)
E.U.	Estimate	0.277***				
	(s.e.)	(0.050)				
	(t-statistic)	(5.571)				
European Free Trade Area	Estimate	0.579***				
	(s.e.)	(0.110)				
	(t-statistic)	(5.269)				
E.U. FTAs	Estimate	-0.031				
	(s.e.)	(0.053)				
	(t-statistic)	(-0.586)				
NAFTA	Estimate	1.101***				
	(s.e.)	(0.224)				
	(t-statistic)	(4.914)				

Mercosur	Estimate	0.629**				
	(s.e.)	(0.254)				
	(t-statistic)	(2.474)				
CMAS FTAs	Estimate	0.652***				
	(s.e.)	(0.131)				
	(t-statistic)	(4.977)				
AFTA	Estimate	0.981***				
	(s.e.)	(0.174)				
	(t-statistic)	(5.646)				
SAARC	Estimate	-1.043***				
	(s.e.)	(0.354)				
	(t-statistic)	(-2.947)				
Other FTAs	Estimate	0.665***				
	(s.e.)	(0.068)				
	(t-statistic)	(9.792)				
Constant	Estimate	-24.889***	-29.431***	-39.256***	-29.967***	-34.560***
	(s.e.)	(0.781)	(2.473)	(4.102)	(3.807)	(5.248)
	(t-statistic)	(-31.872)	(-11.903)	(-9.571)	(-7.872)	(-6.585)
Observations		22,654	439	394	441	375
R-squared		0.642	0.903	0.740	0.922	0.720
Adjusted R-squared		0.642	0.901	0.733	0.920	0.712
RMSE		1.183	0.713	1.240	0.625	1.328
F-statistic	
Number of clusters		8472	150	136	151	131

Note 1: Two-stage least squares with robust standard errors determined by clustering ordered country pairs. Dependent variable is log real bilateral trade, T_{ij} (country i exports to importing country j). Instruments for the (assumed) endogenous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GDP variables are the contemporaneous product of population levels in partner countries, one-year lagged value of the product of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GDP levels in partner countries, and one-year lagged value of the product of GDP per capita levels in partner countries. ***,** denote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at the 10, 5, and 1 percentage levels.

Note 2: Trade agreements represented by indicator variables are: European Union (E.U.); European Free Trade Area (EFTA); EU bilateral free trade agreements (EU FTAs);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rea (NAFTA); Southern Common Market (Mercosur); Chile, Mexico, Australia, and Singapore bilateral free trade agreements (CMAS FTAs); ASEAN Free Trade Area (AFTA); SAARC Preferential Trading Arrangement (SAPTA); and all other customs unions and free trade agreements (Other FTAs).

Note 3: No coefficient estimate is reported when there is insufficient variation in the explanatory variable. Trade agreement variables are dropped from the U.S. and China. regressions.

表A2 对引力模型关于2008-21011年主要关税联盟和FTA服务贸易总额（所有类别）利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估算结果
（剔除1000万美元以下数据）

		All-country exports	U.S. exports	U.S. imports	China exports	China imports
Log distance	Estimate	-0.543***	-2.039***	-0.505	-1.467***	-1.242
	(s.e.)	(0.031)	(0.671)	(0.556)	(0.414)	(0.793)
	(t-statistic)	(-17.419)	(-3.037)	(-0.909)	(-3.547)	(-1.567)
Log product real GDP (PPP)	Estimate	0.891***	1.051***	0.945***	1.062***	1.209***
	(s.e.)	(0.032)	(0.092)	(0.100)	(0.163)	(0.308)
	(t-statistic)	(28.228)	(11.478)	(9.433)	(6.520)	(3.924)
Log product real GDP (PPP) p/c	Estimate	0.381***	0.655***	0.732***	0.798***	1.121**
	(s.e.)	(0.036)	(0.226)	(0.201)	(0.288)	(0.436)
	(t-statistic)	(10.640)	(2.902)	(3.639)	(2.768)	(2.572)
Common language	Estimate	0.804***	1.319***	0.691**	2.301***	2.365*
	(s.e.)	(0.064)	(0.397)	(0.297)	(0.824)	(1.342)
	(t-statistic)	(12.651)	(3.328)	(2.327)	(2.792)	(1.762)
Land border	Estimate	0.563***	-2.011**	0.279	-0.554	0.167
	(s.e.)	(0.092)	(0.982)	(0.863)	(0.642)	(1.195)
	(t-statistic)	(6.146)	(-2.047)	(0.323)	(-0.863)	(0.139)
Number landlocked	Estimate	0.006	-0.132	-0.433	-0.236	0.206
	(s.e.)	(0.043)	(0.401)	(0.352)	(0.322)	(0.527)
	(t-statistic)	(0.140)	(-0.329)	(-1.232)	(-0.734)	(0.391)
Number islands	Estimate	0.221***	0.569**	-0.064	-0.102	0.184
	(s.e.)	(0.060)	(0.231)	(0.271)	(0.566)	(1.027)
	(t-statistic)	(3.667)	(2.464)	(-0.236)	(-0.181)	(0.179)
Log product land area	Estimate	-0.165***	-0.079	-0.085	-0.062	-0.170
	(s.e.)	(0.017)	(0.060)	(0.056)	(0.129)	(0.208)
	(t-statistic)	(-9.427)	(-1.331)	(-1.512)	(-0.484)	(-0.820)
Common colonizer	Estimate	1.114***				
	(s.e.)	(0.206)				
	(t-statistic)	(5.410)				
Ever colony	Estimate	0.814***	-1.263**	0.124		
	(s.e.)	(0.094)	(0.512)	(0.340)		
	(t-statistic)	(8.649)	(-2.466)	(0.364)		
GSP	Estimate	0.238***	0.049	-0.254	0.367	0.944**
	(s.e.)	(0.046)	(0.312)	(0.163)	(0.278)	(0.415)
	(t-statistic)	(5.117)	(0.155)	(-1.557)	(1.322)	(2.275)
E.U.	Estimate	0.231***				
	(s.e.)	(0.059)				
	(t-statistic)	(3.911)				
European Free Trade Area	Estimate	0.606***				
	(s.e.)	(0.128)				
	(t-statistic)	(4.738)				
E.U. FTAs	Estimate	-0.130**				
	(s.e.)	(0.052)				
	(t-statistic)	(-2.514)				
NAFTA	Estimate	0.405***				
	(s.e.)	(0.138)				
	(t-statistic)	(2.945)				

Mercosur	Estimate					
	(s.e.)					
	(t-statistic)					
CMAS FTAs	Estimate	0.841***				
	(s.e.)	(0.258)				
	(t-statistic)	(3.262)				
AFTA	Estimate					
	(s.e.)					
	(t-statistic)					
SAARC	Estimate					
	(s.e.)					
	(t-statistic)					
Other FTAs	Estimate	0.078				
	(s.e.)	(0.104)				
	(t-statistic)	(0.751)				
Constant	Estimate	-28.840***	-32.626***	-41.206***	-41.750***	-55.280***
	(s.e.)	(0.995)	(8.812)	(6.796)	(6.277)	(13.842)
	(t-statistic)	(-28.996)	(-3.702)	(-6.063)	(-6.651)	(-3.994)
Observations		25,367	398	398	263	250
R-squared		0.620	0.855	0.849	0.842	0.675
Adjusted R-squared		0.619	0.851	0.845	0.837	0.663
RMSE		1.094	0.567	0.562	0.725	1.102
F-statistic	
Number of clusters		3491	38	38	28	29

Note 1: Two-stage least squares with robust standard errors determined by clustering ordered country pairs. Dependent variable is log real bilateral trade, T_{ij} (country i exports to importing country j). Instruments for the (assumed) endogenous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GDP variables are the contemporaneous product of population levels in partner countries, one-year lagged value of the product of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GDP levels in partner countries, and one-year lagged value of the product of GDP per capita levels in partner countries. ***,**,* denote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at the 10, 5, and 1 percentage levels.

Note 2: Trade agreements represented by indicator variables are: European Union (E.U.); European Free Trade Area (EFTA); EU bilateral free trade agreements (EU FTAs);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rea (NAFTA); Southern Common Market (Mercosur); Chile, Mexico, Australia, and Singapore bilateral free trade agreements (CMAS FTAs); ASEAN Free Trade Area (AFTA); SAARC Preferential Trading Arrangement (SAPTA); and all other customs unions and free trade agreements (Other FTAs).

Note 3: No coefficient estimate is reported when there is insufficient variation in the explanatory variable. Trade agreement variables are dropped from the U.S. and China. regressions.

表A3 美国货物贸易出口总额(SITC 0-9): 实际贸易额和预测贸易额(1995-2022)(百万美元, 2011年价格)

年	出口国家	进口国家	美国对华出口实际额	美国出口额预测数		
				对所有贸易伙伴的变系数	美国出口变系数	中国进口变系数
1995	美国	中国	22,499	9,055	5,445	29,347
1996	美国	中国	21,951	10,366	6,455	34,002
1997	美国	中国	21,640	11,873	7,658	39,417
1998	美国	中国	21,908	13,406	8,920	44,953
1999	美国	中国	24,772	15,166	10,417	51,413
2000	美国	中国	27,769	17,172	12,183	58,897
2001	美国	中国	31,699	18,833	13,678	65,054
2002	美国	中国	32,199	20,971	15,666	73,196
2003	美国	中国	39,533	23,714	18,309	83,918
2004	美国	中国	51,214	27,134	21,724	97,533
2005	美国	中国	54,590	31,232	25,977	114,161
2006	美国	中国	64,819	36,275	31,426	135,043
2007	美国	中国	74,261	42,399	38,335	160,979
2008	美国	中国	85,157	46,551	43,125	178,281
2009	美国	中国	79,803	49,090	46,053	188,362
2010	美国	中国	104,438	56,005	54,457	218,367
2011	美国	中国	123,124	62,088	62,076	245,009
2022 L	美国	中国	...	166,340	215,138	721,121
2022 M	美国	中国	...	195,518	265,292	872,759
2022 H	美国	中国	...	229,526	326,605	1,054,722
2022 L/H	美国	中国	...	205,529	283,018	925,627

数据来源和注释: 作者使用引力模型对所有国家对外贸易、美国对外贸易和中国对外贸易的2008-2011年变系数进行估算。2022年的预测以中美两国经济增长同时为低速、中速和高速增长等不同情境为前提条件, 同时假定两国的人口增长保持当前水平, 低速-高速情境假设在2022年前美国经济低速增长、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为了对2022年进行预测, 2022年全部国家的模型变系数调节因子为2.6, 调节因子是基于2000-2011年美国对华出口实际和预测值的比率、2011-2022年的预测值和作者的判断估算而得。



表A4 中国货物贸易出口(SITC 0-9)总额: 实际和预测贸易额 (1995-2022) (百万美元, 2011年价格)

年	出口国家	进口国家	中国对美实际出口额	中国出口额预测数		
				对所有贸易伙伴的变系数	中国出口变系数	美国进口变系数
1995	中国	美国	67,706	9,055	39,771	10,453
1996	中国	美国	73,911	10,366	45,382	12,507
1997	中国	美国	87,364	11,873	51,811	14,975
1998	中国	美国	97,445	13,406	58,321	17,588
1999	中国	美国	111,583	15,166	65,779	20,714
2000	中国	美国	133,558	17,172	74,262	24,430
2001	中国	美国	132,249	18,833	81,250	27,603
2002	中国	美国	157,664	20,971	90,251	31,845
2003	中国	美国	190,127	23,714	101,803	37,525
2004	中国	美国	240,936	27,134	116,177	44,928
2005	中国	美国	291,009	31,232	133,365	54,229
2006	中国	美国	334,156	36,275	154,471	66,264
2007	中国	美国	363,152	42,399	180,048	81,674
2008	中国	美国	371,901	46,551	197,247	92,464
2009	中国	美国	317,681	49,090	207,638	99,110
2010	中国	美国	389,305	56,005	236,306	118,232
2011	中国	美国	417,303	62,088	261,444	135,705
2022 L	中国	美国	...	166,340	684,681	502,810
2022 M	中国	美国	...	195,518	803,686	626,480
2022 H	中国	美国	...	229,526	942,203	779,236
2022 L/H	中国	美国	...	205,529	844,460	670,486

数据来源和注释: 作者使用引力模型对所有国家对外贸易、美国对外贸易和中国对外贸易的2008-2011年变系数进行估算。2022年的贸易预测以中美两国经济增长同时为低速、中速和高速增长不同情境为前提条件,同时假定两国的人口增长保持当前水平,低速-高速情境假设2022年前美国经济低速增长、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为了对2022年进行预测,2022年中国出口的模式变系数调节因子为1.2,调节因子是基于2000-2011年中国对美出口实际和预测值的比率、2011-2022年的预测值和作者的判断估算而得。

表A5 美国服务贸易出口总额(全部类别): 实际贸易额和预测贸易额(1995-2022)(百万美元, 2011年价格)

年	出口国家	进口国家	美国对华实际出口额	美国出口额预测数		
				对所有贸易伙伴的变系数	美国出口变系数	中国进口变系数
1995	美国	中国	...	914	811	317
1996	美国	中国	...	1,072	1,002	421
1997	美国	中国	...	1,259	1,239	560
1998	美国	中国	...	1,454	1,497	722
1999	美国	中国	4,978	1,682	1,815	935
2000	美国	中国	6,233	1,950	2,206	1,215
2001	美国	中国	6,551	2,174	2,545	1,472
2002	美国	中国	6,859	2,470	3,014	1,848
2003	美国	中国	6,644	2,861	3,663	2,404
2004	美国	中国	8,325	3,363	4,539	3,210
2005	美国	中国	9,430	3,982	5,680	4,344
2006	美国	中国	11,462	4,767	7,213	6,000
2007	美国	中国	13,896	5,752	9,259	8,410
2008	美国	中国	15,743	6,426	10,720	10,238
2009	美国	中国	16,413	6,833	11,616	11,389
2010	美国	中国	21,512	8,005	14,336	15,133
2011	美国	中国	...	9,059	16,892	18,883
2022 L	美国	中国	...	28,709	77,578	146,319
2022 M	美国	中国	...	35,683	103,849	217,951
2022 H	美国	中国	...	44,276	138,702	323,648
2022 L/H	美国	中国	...	38,159	113,622	246,432

数据来源和注释: 作者使用引力模型对所有国家对外贸易、美国对外贸易和中国对外贸易的2008-2011年变系数进行估算。2022年的预测以中美两国经济增长同时为低速、中速和高速增长等不同情境为前提条件, 同时假定两国的人口增长保持当前水平, 低速-高速情境假设在2022年前美国经济低速增长、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为了对2022年进行预测, 2022年美国出口的模式变系数调节因子为1.0, 调节因子是基于2000-2011年美国对华出口实际和预测值的比率、2011-2022年的预测值和作者的判断估算而得。

表A6 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总额(全部类别): 实际贸易额和预测贸易额 (1995-2022) (百万美元, 2011年价格)

年	出口国家	进口国家	中国对美实际出口额	中国出口额预测数		
				对所有贸易伙伴的变系数	对所有贸易伙伴的变系数	对所有贸易伙伴的变系数
1995	中国	美国	...	914	621	895
1996	中国	美国	...	1,072	780	1,100
1997	中国	美国	...	1,259	982	1,352
1998	中国	美国	...	1,454	1,204	1,626
1999	中国	美国	3,345	1,682	1,484	1,962
2000	中国	美国	3,954	1,950	1,832	2,372
2001	中国	美国	4,293	2,174	2,139	2,727
2002	中国	美国	4,788	2,470	2,569	3,215
2003	中国	美国	4,429	2,861	3,173	3,890
2004	中国	美国	6,407	3,363	4,003	4,795
2005	中国	美国	6,913	3,982	5,105	5,970
2006	中国	美国	10,183	4,767	6,617	7,541
2007	中国	美国	11,419	5,752	8,677	9,626
2008	中国	美国	9,775	6,426	10,167	11,103
2009	中国	美国	8,427	6,833	11,085	12,000
2010	中国	美国	10,188	8,005	13,926	14,739
2011	中国	美国	...	9,059	16,638	17,301
2022 L	中国	美国	...	28,709	86,589	76,402
2022 M	中国	美国	...	35,683	119,014	101,776
2022 H	中国	美国	...	44,276	163,178	135,277
2022 L/H	中国	美国	...	38,159	131,277	111,184

数据来源和注释: 作者使用引力模型对所有国家对外贸易、美国对外贸易和中国对外贸易的2008-2010年变系数进行估算。2022年的预测以中美两国经济增长同时为低速、中速和高速增长等不同情境为前提条件,同时假定两国的人口增长保持当前水平,低速-高速情境假设在2022年前美国经济低速增长、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为了对2022年进行预测,2022年中国出口的模型变系数调节因子为0.5,调节因子是基于2000-2010年中国对美出口实际和预测值的比率、2010-2022年的预测值和作者的判断估算而得。

表A7 实际和预测值的比率：使用平滑调整因子后的中美双边贸易（2000-2022）

	美国				中国			
	美国对华 货物出口 ¹	调节因子	美国对华 服务出口 ²	调节因子	中国对美 货物出口 ³	调节因子	中国对美 服务出口 ⁴	调节因子
2000	0.99	(1.6)	1.03	(2.7)	1.06	(1.7)	0.96	(2.3)
2001	1.01	(1.7)	1.00	(2.6)	0.97	(1.7)	0.99	(2.0)
2002	0.91	(1.7)	0.94	(2.4)	1.05	(1.7)	1.03	(1.8)
2003	0.97	(1.7)	0.80	(2.3)	1.14	(1.6)	0.86	(1.6)
2004	1.07	(1.8)	0.86	(2.1)	1.28	(1.6)	1.09	(1.5)
2005	0.98	(1.8)	0.83	(2.0)	1.36	(1.6)	1.03	(1.3)
2006	0.98	(1.8)	0.85	(1.9)	1.36	(1.6)	1.31	(1.2)
2007	0.94	(1.9)	0.85	(1.8)	1.28	(1.6)	1.24	(1.1)
2008	0.97	(1.9)	0.89	(1.7)	1.21	(1.6)	1.01	(0.9)
2009	0.84	(1.9)	0.91	(1.6)	0.99	(1.5)	0.89	(0.9)
2010	0.95	(2.0)	1.03	(1.5)	1.08	(1.5)	0.96	(0.8)
2011	0.99	(2.0)	1.06	(1.5)
2022	...	(2.6)	...	(1.2)	...	(1.0)	...	(0.5)

平滑调节因子是基于2000-2011年（服务贸易为2000-2010年）双边出口贸易实际和预测值比率的年均变化估算而得。2022年调节因子是基于作者判断、根据2011年或2010年调节因子估算而得。

- 1 实际和预测贸易额使用全部国家变系数（表A3）和年均调节因子1.9计算而得。
- 2 实际和预测贸易额使用美国出口变系数（表A5）和年均调节因子-1.1计算而得。
- 3 实际和预测贸易额使用中国出口变系数（表A4）和年均调节因子-6.1计算而得。
- 4 实际和预测贸易额使用中国出口变系数（表A6）和年均调节因子-10.3计算而得。



表A8 四种情境下的中美双边贸易分析

年	WEO (美国)		WEO (中国)		引力模型 (美国)				引力模型 (中国)			
	U.S. CAB	U.S.-CHN CAB	CHN CAB	U.S.-CHN CAB	U.S. CAB	U.S.-CHN CAB	Gds Xs U.S. \Rightarrow CHN	Svcs Xs U.S. \Rightarrow CHN	CHN CAB	U.S.-CHN CAB	Gds Xs CHN \Rightarrow U.S.	Svcs Xs CHN \Rightarrow U.S.
	当前价											
2000	-416.3	-83.4	20.5	83.4	-416.3	-83.4	22.4	5.0	20.5	83.4	107.6	3.2
2001	-396.6	-81.3	17.4	81.3	-396.6	-81.3	26.2	5.4	17.4	81.3	109.4	3.6
2002	-457.2	-104.5	35.4	104.5	-457.2	-104.5	27.3	5.8	35.4	104.5	133.5	4.1
2003	-519.1	-127.5	45.9	127.5	-519.1	-127.5	33.9	5.7	43.1	127.5	163.3	3.8
2004	-628.5	-164.1	68.7	164.1	-628.5	-164.1	44.8	7.3	68.9	164.1	210.5	5.6
2005	-745.8	-208.8	134.1	208.8	-745.8	-208.8	48.7	8.4	132.4	208.8	259.8	6.2
2006	-800.6	-245.3	232.7	245.3	-800.6	-245.3	59.3	10.5	231.8	245.3	305.8	9.3
2007	-710.3	-268.2	353.9	268.2	-710.3	-268.2	69.6	13.0	353.2	268.2	340.1	10.7
2008	-677.1	-269.0	412.4	269.0	-677.1	-269.0	81.6	15.1	420.6	269.0	356.3	9.4
2009	-381.9	-224.0	261.0	224.0	-381.9	-224.0	77.8	16.0	243.3	224.0	309.5	8.2
2010	-442.0	-269.2	237.6	269.2	-442.0	-269.2	102.7	21.2	237.8	269.2	383.0	10.0
2011	-465.9	...	201.7	...	-465.9	...	123.1	...	201.7	...	417.3	...
	预测值 (2011年价格)											
2012	-478.7	-430.8	185.8	185.8
2013	-484.8	-436.3	211.8	211.8
2014	-500.9	-450.8	258.6	258.6
2015	-532.5	-479.2	315.4	315.4
2016	-575.6	-518.0	399.8	399.8
2017	-623.0	-560.7	488.0	488.0
2018	-643.7	-579.3	524.2	524.2
2019	-665.1	-598.6	563.2	563.2
2020	-687.3	-618.6	605.0	605.0
2021	-710.2	-639.2	649.9	649.9
	2022年预测值 (2011年价格)											
情境一												
a. M - M	-733.8	-440.3	698.2	698.2	-686.2	-411.7	508.3	103.8	411.7	411.7	964.4	59.5
b. L - L	-591.4	-354.9	432.5	77.6	354.9	354.9	821.6	43.3
c. H - H	-794.6	-476.8	596.8	138.7	476.8	476.8	1,130.6	81.6
d. L (US) - H (CHN)	-718.3	-431.0	534.4	113.6	431.0	431.0	1,013.4	65.6
情境二	-455.2	-180.7	580.1	118.5	-294.9	180.7	828.3	51.1
情境三	-649.7	-375.2	544.9	103.8	375.2	375.2	964.4	59.5
情境四	-441.9	-167.4	544.9	341.9	167.4	167.4	991.6	62.6
相应的贸易所得	1.07	3.29	1.03	1.05

US = 美国; CHN = 中国; CAB = 经常项目平衡; Gds Xs = 货物贸易出口; Svcs Xs = 服务贸易出口; RMB = 人民币
 注释: 2000-2011年贸易数据为当前价的历史数据。2012-2022年预测值为2011年价格计算。WEO预测值为作者使用WEO关于 2017年经常项目盈余或赤字占GDP比重的预测水平的外推值。根据近年来的观察, WEO的估算假设中美经常项目平衡水平占WEO预测的美国对外经常项目赤字的60%, 占中国经常项目盈余的100%。情景一假设人民币实际汇率不变, 对四种不同情境进行计算; 2022年前美国和中国经济同时实现低速(L)、中速(M)和高速(H)增长, 以及美国低速、中国高速增长(见表6)。情境一(a)展示了关键分析内容; 情境二结果假设人民币在2016年持续升值; 情境三假设中国实现单边货物贸易自由化(关税弹性系数 $\alpha=1.0$); 情境四的结果假设中美相互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 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相应地贸易所得是在中美相互共同情境下, 情境四与情境一的比例。

表A9 情景二：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

经常项目盈余占GDP比重的变化使用Cline-Williamson (CW) 的计算结果，假设2012-2022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为7.5%。

China CAB

$$\begin{aligned} \text{CH_CAB} / \text{GDP} &= \text{CW Parameter} * (\% \text{CH_REER} / 100) \\ \text{CAB} &= [\text{CW Parameter} * (\% \text{CH_REER} / 100) * \text{GDP_2022}] + \text{CAB_2022} \\ \text{CAB} &= [\text{CW Parameter} * (\% \text{CH_REER} / 100) * \text{GDP_2022}] + \text{CAB_2022} \\ \text{CAB} &= [\text{CW Parameter} * ((\text{REER} / \text{REER_2022}) - 1) * \text{GDP_2022}] + \text{CAB_2022} \\ \text{CAB} &= [(-0.31) * (0.14) * (16169.8)] + 411.7 \\ \text{CAB} &= -290.1 \text{ (结果反映为整数)} \end{aligned}$$

美国对华出口，假设人民币兑美元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持续均速升值，进口价格弹性系数 $n = -1$

$$\begin{aligned} \text{USxCHN} &= \$\text{USxCHN_2022} + [\% \text{CH_USxCHN} * \$\text{USxCHN_2022}] \\ \text{USxCHN} &= \$\text{USxCHN_2022} + [n * (-1 * (\text{REER} / \text{REER_2022}) - 1) * \$\text{USxCHN_2022}] \\ \text{USxCHN} &= 508.3 + [-1 * (-1 * 0.14)] * 508.3 \\ \text{USxCHN} &= 579.5 \text{ (结果反映为整数)} \end{aligned}$$

中国对美出口，假设人民币兑美元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持续均速升值，进口价格弹性系数 $n = -1$

$$\begin{aligned} \text{CHNxUS} &= \$\text{CHNxUS_2022} + [\% \text{CH_CHNxUS} * \$\text{CHNxUS_2022}] \\ \text{CHNxUS} &= \$\text{CHNxUS_2022} + [n * (1 * (\text{REER} / \text{REER_2022}) - 1) * \$\text{CHNxUS_2022}] \\ \text{CHNxUS} &= 964.4 + [-1 * (1 * 0.14)] * 964.4 \\ \text{CHNxUS} &= 829.4 \text{ (结果反映为整数)} \end{aligned}$$

US-CHN CAB (= - CHN-US CAB)

$$\begin{aligned} \text{CAB_US-CHN} &= \text{CAB_US-CHN_2022} + \text{CH_TRDBAL_US-CHN} + \text{CH_SVCBAL_US-CHN} \\ \text{CAB_US-CHN} &= -411.7 + 207.8 + 23.1 \\ \text{CAB_US-CHN} &= -180.8 \text{ (结果反映为整数)} \end{aligned}$$

US CAB

$$\begin{aligned} \text{CAB_US} &= \text{CAB_US_2022} + \text{CH_CAB_US-CHN} \\ \text{CAB_US} &= -686.2 - 180.8 + 411.7 \\ \text{CAB_US} &= -455.3 \text{ (结果反映为整数)} \end{aligned}$$

US = 美国; CHN = 中国; CAB = 经常项目平衡; RMB = 人民币; REER = 实际有效汇率

表A10 情境三：中国实现单边货物贸易自由化

货物贸易进口将随关税免除而扩大，对经常项目变化产生负面影响，假设进口价格弹性系数 $n = -1$

美国对华出口

$$\begin{aligned} \text{USxCHN} &= \$\text{USxCHN_2022} + [\% \text{CH_USxCHN} * \$\text{USxCHN_2022}] \\ \text{USxCHN} &= \$\text{USxCHN_2022} + [n * (-1 * t_{2022} / (1 + t_{2022})) * \$\text{USxCHN_2022}] \\ \text{USxCHN} &= 508.3 + [-1 * (-1 * 0.077 / 1.077)] * 508.3 \\ \text{USxCHN} &= 544.6 \text{ (结果反映为整数)} \end{aligned}$$

US-CHN CAB (= - CHN-US CAB)

$$\begin{aligned} \text{CAB_US-CHN} &= \text{CAB_US-CHN_2022} + \text{CH_TRDBAL_US-CHN} \\ \text{CAB_US-CHN} &= -411.7 + 36.3 \\ \text{CAB_US-CHN} &= -375.4 \text{ (结果反映为整数)} \end{aligned}$$

US CAB

$$\begin{aligned} \text{CAB_US} &= \text{CAB_US_2022} + \text{CH_CAB_US-CHN} \\ \text{CAB_US} &= -686.2 + 36.3 \\ \text{CAB_US} &= -649.9 \text{ (结果反映为整数)} \end{aligned}$$

US = 美国; CHN = 中国; CAB = 经常项目平衡



表A11 情境四 - 中美相互共融推进FTAAP (服务贸易自由化)

Note: Change in imports owing to tariff elimination on merchandise trade, assuming import price elasticity $n = -1$, and service trade liberalization

美国对华出口

$$\begin{aligned}
USxCHN &= \$USxCHN_{2022} + [\%CH_USxCHN * \$USxCHN_{2022}] \\
USxCHN &= \$USxCHN_{2022} + [n * (-1 * t_{2022} / (1 + t_{2022})) * \$USxCHN_{2022}] \\
USxCHN &= 508.3 + [-1 * (-1 * 0.077 / 1.077)] * 508.3] \\
USxCHN &= 544.6 \text{ (结果反映为整数)}
\end{aligned}$$

中国对美出口

$$\begin{aligned}
CHNxUS &= \$CHNxUS_{2022} + [\%CH_CHNxUS * \$CHNxUS_{2022}] \\
CHNxUS &= \$CHNxUS_{2022} + [n * (-1 * t_{2022} / (1 + t_{2022})) * \$CHNxUS_{2022}] \\
CHNxUS &= 964.4 + [-1 * (-1 * 0.029 / 1.029)] * 964.4] \\
CHNxUS &= 991.6 \text{ (result reflects rounding)}
\end{aligned}$$

US-CHN CAB (= - CHN-US CAB) - 服务贸易自由化

$$\begin{aligned}
CAB_US-CHN &= CAB_US-CHN_{2022} + CH_TRDBAL_US-CHN + CH_SVCBAL_US-CHN \\
CAB_US-CHN &= -167.3 \text{ (结果反映为整数)}
\end{aligned}$$

US CAB

$$\begin{aligned}
CAB_US &= CAB_US_{2022} + CH_CAB_US-CHN \\
CAB_US &= -686.2 + 244.3 \\
CAB_US &= 441.9 \text{ (结果反映为整数)}
\end{aligned}$$

TL = 贸易自由化; FTAAP = 亚太自由贸易区; CAB = 经常项目平衡; US = 美国; CHN = 中国

参考文献

- Cline, William and John Williamson. 2012. "Updated Estimates of Fundamental Equilibrium Exchange Rates," Policy Brief PB12-23. Washington: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http://www.piie.com/publications/pb/pb12-23.pdf> .
- DeRosa, Dean A. and John P. Gilbert. 2005. "Predicting Trade Expansion under FTAs and Multilateral Agreements," Working Paper 05-13 (October).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http://www.piie.com/publications/wp/wp05-13.pdf>.
- DeRosa, Dean A. 2012. "Gravity Model Data Set," Washington: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mimeo (June 25, 2012).
- Hufbauer, Gary Clyde, Jeffrey J. Schott and Woan Foong Wong. 2010. Figuring Out the Doha Round. Policy Analyse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91 (June) Washington: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12. World Economic Outlook: Coping with High Debt and Sluggish Growth. October 2012.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12/02/> (accessed December 2012).
- Lazear, Edward P. 2012. "Chinese 'Currency Manipulation' is Not the Problem," Wall Street Journal, January 8, 2012, A17.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2. “Trade in Services by Partner Country – EBOPS 2002”, OECD Statistics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Services (database). <http://dx.doi.org/10.1787/data-00274-en> (accessed December 2012).

Sundaram, Asha and J. David Richardson. Forthcoming 2013. “Peers and Tiers and US High- Tech Export Controls: A New Approach to Estimating Export Shortfalls,” Working Paper. Washington: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2012. Annual Energy Outlook 2013 Early Release

Overview. <http://www.eia.gov/forecasts/aeo/er/index.cfm> (accessed January 9, 2013).

World Bank. 2012.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World Databank, <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ata/home.aspx> (accessed December 2012).



第十章 农业合作

德莫特·海斯

爱荷华州立大学农业经济前沿教授、金融学教授、经济学教授

潘苏文

世界农业经济和环境研究所高级经济学家

段志煌

USDA中国农业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客座教授、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局前中国项目负责人

张海森

中国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农业合作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摘要

美国与中国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农产品生产国与消费国。中国拥有13.3亿人口，经济正快速现代化，土地与水资源有限。因此，长期而言，中国需要充足的食物来源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国内需求。与中国相比，美国的人均土地面积与农业生产率相对较高，是世界上主要的粮食净出口国之一，尤其是土地密集型产品，如小麦、大豆、玉米与牛肉等。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丰富，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如某些水产品、苹果汁、羽毛及羽绒等。

过去十年间，两个国家在农业贸易自由化上都取得了明显进步。自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美国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快速增加。中国现在是美国农业出口的最大市场，而美国则是中国最大的供应国。相反，美国是中国农产品的第二大出口目的地国，而中国是美国的第三大供应国。展望未来，中美两国应当进一步发展互惠合作关系。

本研究给出的一个重要建议是，在美国供应商与中国采购方之间应建立长期(比如说十年或者更长年期)供应合同。所交易产品的数量与价格应基于双方共同商定的价格公式与协议预先确定。这种长期合同可以鼓励美国卖家长期投资新的供应链与物流链，而买卖双方将不再过于担心商品价格的短期波动。在协议中，必须考虑中国对长期协议中供应安全性的顾虑。对于美国供应商而言，其中的一个解决方案可以是在中国或第三国建立仓库，并存储一年的供应量作为担保。同样，中国可以将相关资金交由美国的中介或第三方保管。

本研究的另外一个建议是，中国进口更多的肉类而非饲料。此举有助于缓解中国本已紧张的土地与水资源压力。

在几乎所有国家，农业都是一个敏感的贸易问题。确保粮食安全是中国的战略目标，政府也因此总是强调粮食自给自足的必要性。对小农场主进行保护同样也就成为一个重要对策。中国的谷类作物高度自给自足，2011年小麦、水稻与玉米的净进口量还占不到本土产量的1%。中国面临着大量利用本土和全球资源以及积极参与农业贸易的机会。这有助于满足其日益增长的需求，并且可在不损害粮食安全的前提下缓解供应与价格波动。

同时，农业生产以及出口的连续增长是美国的竞争力所在。每10亿美元的农业出口额将会为美国创造8,400个工作机会。2011年，美国对中国的农业出口为200亿美元，与之相应的是超过16万个工作机会。这些工作机会分布于农业与非农业的一系列产业中。随着中国的发展以及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对进口高品质食品以及新型食品的需求也随之增加。这将会为美国农业产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出口机遇。

除了互利的贸易关系外，技术合作与双边投资方面也存在着大量机遇。长期而言，受限于土地与水资源以及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中国将不得不促进农业生产率的提升，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国内需求，同时还必须考虑很多相关的环境和健康问题。这将会为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合作创造更多机会，以实现农业发展的现代化、可持续性与弹性。



农业合作

导言

美国与中国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生产国与消费国之一。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棉花、水稻、猪肉、花生、苹果、茶叶与乳制品生产国。而美国则是世界上最大的玉米与大豆生产国与出口国，最大的牛肉生产国以及第二大禽类生产国。

过去十年间，两个国家在农业贸易自由化上都取得了明显进步。两国间的农业合作已发展成为最成功的双边关系之一。虽然在某些问题上的纠纷不可避免，但通过进一步深化农业部门的合作来实现巨大的收益才是更为重要的。这些益处包括经济增长和就业、粮食安全的增强、生产率与效益的提高、更低廉且稳定的粮食价格、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以及更可持续发展的环境。简言之，两国之间的分歧远远小于共同利益，前景大有可为。

一、坚实的合作基础

在农业领域，中美两国是天然互补的合作伙伴。土地与水资源的限制，以及食物需求的快速增长，意味着中国具有强烈的农产品进口需求。美国农业的生产能力远远超过了国内需求。因此，对美国而言，出口市场至关重要，尤其对其具有比较优势的土地密集型产品。而中国则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如某些水产品、苹果汁、羽毛及羽绒、蜂蜜、大蒜、生姜、茶叶、观赏植物、果树、花卉、干果及加工水果与蔬菜等。

如果农业贸易与合作得以加强，则两国都可以获得巨大好处。中国规模庞大的市场为美国提

供了输出过剩产能的机会。另一方面，进口美国农产品不仅可帮助中国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需求，而且能保证食品价格的低廉与稳定，还能减轻中国因土地与水资源利用而带来的环境压力。另外，中国农业部门现代化的需求，也为美国公司提供了具有吸引力的投资和技术合作机会。

二、资源互补性

耕地

在国内供给方面，中国农业生产的最大挑战是可耕地的限制。虽然中国的国土面积与美国相当，但中国大部分土地为不可耕作的荒漠、稀树草原与山地。中国的可耕地面积大约为1.2亿公顷，但需要养活高达13.3亿人口，其中包括4.9亿农村劳动力。相反，美国的可耕地面积大约为1.7亿公顷，只需要养活3.07亿人口，包括228万农业劳动力。简言之，美国可耕地面积比中国多40%；而中国人口却是美国的4倍多。在中国，每1公顷可耕地需要养活11人；而在美国，这一数据为每1公顷不到2人。世界平均水平为每公顷土地养活4.4人¹。

在过去十年，中国丧失了大约830万公顷可耕地。可耕地面积从2001年的1.33亿公顷减少至2011年的1.22亿公顷。除了自然灾害与土壤退化的因素外，经济快速发展与城市化是导致中国耕地面积萎缩的关键因素。在过去几十年，城市逐渐扩张并侵占了耕地。在中国的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中，中国期望2015年国家城镇化水平达到54%。届时，城市人口预

¹ Eric Trachtenberg, 未发表的手稿《中美农业合作》，2012年7月。

计将增加到7亿²。世界银行预测，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在2030年将达到70%³。中国领导人倡导，在渐进、健康的城镇化进程中对耕地⁴进行保护。但是，预计农业用土地的压力仍将继续存在，并将成为中国长期的主要挑战。

水资源

中国正面临着严重的水资源短缺。中国拥有世界上20%的人口，但是淡水资源仅约占世界的7%。伴随着水资源短缺的是水资源分布不均。中国大约80%的降水与融雪分布在长江以南，而在北部与西部大部分沙漠地区，降水与融雪仅为20%。中国的绝大部分耕地位于水资源较为缺乏的北方地区，例如，华北平原产出中国小麦总产量的一半，但需要消耗大量的水资源。平均而言，中国每年大约有1,530万公顷耕地（占总耕地面积的13%）面临干旱。

为缓解水资源分布不均的问题，中国启动了工期长达数十年的南水北调工程，以更好地利用水资源。该项目最初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经过几十年的规划，直到2002年才获得批准。同年，东线工程启动。次年，中线工程开始动工。工程预计将在2014年竣工。该工程投入预计超过5,000亿元人民币（大约800亿美元）。到2050年，每年将会从长江向中国北部地区输送大约448亿立方米的水。

然而，由于近年来长江也面临着严重干旱，南水北调方案在解决中国水资源短缺问题上的作用有限。2007年至2008年的干季，汉口地区的水位线降至13.98米，为1866年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新低。这次意外的水位下降导致超过40艘船只搁浅。2011年，长江遭遇了最近50年内最严

重的干旱。受影响最严重的是湖北省，其1月到4月的降水量比自1961年起的同期平均水平锐减了40%。此突发事件迫使政府从三峡水库开闸放水，以牺牲水电为代价满足灌溉、饮用水供应以及生态系统的需求。这一重大举措是在电力短缺的情况下做出的，凸显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干季的干旱严重程度。长江三角洲支持了中国4亿人口以及40%的经济活动。

南水北调也对社会造成了不良影响，在东线与中线的一期开发中，很多人不得不动迁。由于成本高昂、长江承载能力的不确定性以及其他环境与技术顾虑，西线施工被延期。

地表水的不足导致地下水资源过度开采，进而导致地下水储量快速消耗。例如，北京的地下水位已经下降了100至300米。因此，科学家预言，当地的含水层可能在30年内枯竭⁵。

中国还面临着水质问题。依照中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的统计，2006年，整个国家60%的河流可能无法作为安全饮用水源使用。2008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发布了一份关于黄河的报告。报告指出，工厂排污以及快速扩张的城市所产生的废水造成了严重的污染，整个黄河有1/3河段的水无法用于农业或工业生产。污染加剧了水荒。北方地区比其他地区更加严重。由于水资源的短缺，大约405万公顷的土地使用污染源进行灌溉，换言之，占整个国家耕地灌溉的7.4%，其中有2/3位于华北地区。

为弥补水资源的短缺，中国农民严重依赖化学肥料以及杀虫剂的使用，以维持农业产量的增长。然而，化学品的密集使用导致了土壤退化与污染，进而影响长期的农业生产能力。

劳动力

中国的农业从业人数为4.99亿，占全国总人口的37.5%，远高于美国的水平（从业人员228万，仅占

2 中国国家统计局于2011年4月末公布了其人口普查结果。依照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为49.68%。依照“十二五”规划，2011年至2015年期间，城镇化率将会增加4%。

3 “21世纪30年代中国城镇人口将达到70%”，《中国日报》，2012年4月3日，网址：http://www.chinadaily.com.cn/bizchina/2012-04/03/content_14974978.htm。

4 中国一直维持在18亿亩（1.2亿公顷）的耕地“红线”（基本耕地）。

5 Eric Trachtenberg, 未发表的手稿《中美农业合作》，2012年7月，网址：<http://www.chinawaterrisk.org>。



图表1: 美国生产、国内消费与结算库存概览(单位: 千公吨)

	2001/2002	2002/2003	2003/2004	2004/2005	2005/2006	2006/2007	2007/2008	2008/2009	2009/2010	2010/2011	2011/2012	2012/2013
生产												
大麦	5,407	4,940	6,059	6,091	4,613	3,923	4,575	5,230	4,949	3,925	3,392	4,796
玉米	241,377	227,767	256,229	299,876	282,263	267,503	331,177	307,142	332,549	316,165	313,949	273,832
棉花	4,420	3,747	3,975	5,062	5,201	4,700	4,182	2,790	2,654	3,942	3,391	3,703
大豆	78,672	75,010	66,783	85,019	83,507	87,001	72,859	80,749	91,417	90,605	84,192	82,055
小麦	53,001	43,705	63,805	58,698	57,243	49,217	55,821	68,016	60,366	60,062	54,413	61,755
国内消费												
大麦	5,661	5,179	4,990	5,672	4,570	4,596	4,324	5,127	4,604	4,537	4,193	4,680
玉米	200,941	200,748	211,595	224,610	232,015	230,674	261,632	259,272	281,590	285,014	279,023	262,571
棉花	1,715	1,620	1,410	1,480	1,235	1,140	1,091	712	771	889	681	733
大豆	50,867	47,524	44,600	51,410	52,751	53,473	51,627	48,112	50,671	48,403	48,810	47,207
小麦	32,434	30,448	32,498	31,783	31,320	30,940	28,614	34,293	30,978	30,710	32,155	38,110
结算库存												
大麦	2,006	1,510	2,619	2,796	2,350	1,500	1,485	1,932	2,515	1,945	1,306	1,661
玉米	40,551	27,603	24,337	53,697	49,968	33,114	41,255	42,504	43,380	28,644	25,122	16,062
棉花	1,622	1,172	751	1,196	1,321	2,064	2,188	1,380	642	566	729	980
大豆	5,663	4,853	3,059	6,960	12,229	15,617	5,580	3,761	4,106	5,852	4,610	3,397
小麦	21,150	13,374	14,872	14,699	15,545	12,414	8,323	17,867	26,552	23,466	20,211	18,818

来源: 美国农业部(USDA)农产品外销局(FAS)*

* 美国农业部(USDA)“世界农业供需预测”, 网址: <http://usda.mannlib.cornell.edu/MannUsda/viewDocumentInfo.do?documentID=1194>.

总人口的0.7%)。中国的农业劳动力数量是美国的200多倍, 在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如深加工食品)上具有比较优势。当然, 薪酬的差异影响了农业劳动分工, 尽管生产率、资金与原材料的可获得程度、贴近市场与基础设施能部分抵销此影响。

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城镇化正逐步推动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城市可以提供更高薪水的工作, 因此吸引了农村年轻人进入城市寻找工作机会并定居下来。年龄较大的农村人口较难适应城市工作对新技能的要求, 因此更倾向于留守并继续务农。这意味着,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中国农业劳动力将呈现老龄化趋势, 且整体质量下降。在接下来的十年里, 这可能会成为一个更为严峻的问题。

三、美国产能过剩, 需要出口市场

受创新与技术改进的驱动, 如改良种子、虫害控制以及更好的农场管理实践, 美国的农业生产

力在过去几十年中得到了快速提升⁶。放眼未来, 水土保持将在美国的农业生产中发挥关键作用。美国农业生产力的增速超过国内食品与纤维需求, 农民以及农业公司严重依赖出口市场来维持价格与收入。实际上, 美国农业部(USDA)的农产品外销局(FAS)已经与农民携手, 在开发与拓展全球农业市场方面做出了大量努力。

自1960年起, 美国的农业出口就高于进口, 给农业贸易带来了可观的顺差。这有助于抵销美国在非农商业贸易中的长期逆差。

过去二十年间, 美国农业出口价值在生产价值中的份额从1990年的13%提高至2012年的20%, 而同期出口量的份额则相对稳定地保持在大约20%⁷。过去十年内美国主要商品的生产、国内消费与结算库存参见图表1。数据表明, 美国主要农

6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 美国的农业几乎完全依赖提高生产率来增加产量。据美国农业部统计, 2009年美国的农业总产量是1948年水平的170%, 年增长率为1.63%。平均投入使用每年仅增长0.11%, 因此, 农业部门产出的正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生产率的提高。这与其他非农业部13.6%的年增长率形成了对比, 后者生产率的增长仅占总增长的1/3多一点。

7 “农产品出口份额”, 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局, 网址: <http://www.ers.usda.gov/topics/international-markets-trade/us-agricultural-trade/export-share-of-production.aspx> \1 “estimation”。

业商品继续处于顺差状态。

美国农业部长 Tom Vilsack 最近指出,每10亿美元的农业出口将会为美国人提供8,400个工作机会。这意味着,2011年的农业出口通过农业生产、运输、可再生能源、生产与其他部门带来了超过100万个工作机会。他同时指出,在过去的几十年,农业是紧随信息技术之后的美国第二大最具生产力的产业⁸。事实上,深陷经济增长乏力与整体贸易不平衡,农业生产和出口是美国经济的亮点。

据美国农业部的统计,在2011财年,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农业出口市场,向美国购买了价值200亿美元的货物。2011年,美国对华农产品出口在各个产业中创造了超过160,000个就业机会⁹。由于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将会带来食品需求前所未有的增长,中国市场具有相当的吸引力。中国的大豆、油料、棉花、兽皮、肉类和谷物市场将持续发展。随着收入的增加,中国农产品进口的产品组合也将更加多元化。中国人将消费更多高附加值食品产品,如肉类、奶制品、水果、蔬菜和园艺产品,消费水稻和小麦等主食则更少。美国农民和农业公司已做好准备,对其产品组合进行调整,抓住这一良机,以更好地满足中国消费者不断变化的需求。

四、对美国农产品而言,中国是一个巨大且持续增长的市场

在过去30多年中,中国经济平均每年增长约10%,令人惊叹。家庭收入也随之出现惊人的增长。收入的增长以及人口的不断增加,导致食品需求增加,以及消费者对高质量产品的需求。即便产量

增加,国内生产依然无法满足需求。虽然自给自足是中国政府的一项战略目标,并且中国的农产品出口也出现了迅速增长,但近年来,农业贸易赤字依然在不断增加。鉴于有限的土地资源和水资源,中国有必要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更多资源。

中国的中产阶级估计大约有2.3亿人,相当于三分之二以上的美国总人口,这一数字预计在2022年达到6.3亿¹⁰。这有望使中国成为继欧盟之后领先美国的世界第二大零售食品市场。随着收入的增长,人们的膳食结构将更加多元化。新型食品产品、进口和更高质量食品的需求将会给美国农业带来前所未有的机会。

图表2列出了不同机构对中国各种商品进口量的预测。基于这些预测,中国预计将在未来十年内进口约200万吨棉花、500至1,800万吨玉米、200至500万吨小麦、100万吨大米以及6,000至9,000万吨大豆。

图表3列出了美国农业部(USDA)经济研究局(ERS)对美国主要商品的国内生产与出口进行的预测。与中国进口的主要商品(图表2)的预测相比,除大豆之外,美国似乎可以满足未来十年中国对棉花、谷物与油籽的进口需求。

五、中美农产品贸易与合作可帮助中国解决长期顾虑并向美国开放巨大的市场与投资机会

粮食安全

中国首要关注的是粮食安全。在整部中国历史中,养活日益增长的人口一直是当务之急。政府采取的许多政策措施旨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包括农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保护耕地、省长粮食责任制与市长菜篮子责任制的政策都是为了保障谷物与其他主食食品供应;对商品粮基地和蔬菜基地进行金融扶持,是持续实现粮食

8 “农业部长Vilsack关于2011历年美国农业出口记录的声明”第0046.12号通讯稿,2012年2月10日,网址: <http://www.usda.gov/wps/portal/usda/usdahusd?contentid=2012/02/0046.xml&contentcont=1>。

9 “美国与中国签署农业战略合作计划”(发布号0057.12),美国农业部(USDA),2012年2月16日,网址: <http://www.usda.gov/wps/portal/usda/usdamediafb?contentid=2012/02/0046.xml&contentidonly=true>。

10 详情参见第7篇分报告。



图表2: 中国主要商品进口预测 (单位: 百万吨)

	2012/13	2013/14	2014/15	2015/16	2016/17	2017/18	2018/19	2019/20	2020/21	2021/22
棉花										
ERS-USDA	1.60	1.65	1.65	1.66	1.67	1.68	1.70	1.73	1.76	1.79
FAPRI										
WAEES	2.44	1.56	1.99	2.19	2.30	2.36	2.39	2.56	2.64	2.80
OECD-FAO										
玉米										
ERS-USDA	4.03	4.86	6.13	7.53	9.05	10.85	12.46	14.20	16.03	18.10
FAPRI	2.07	2.16	2.34	2.47	2.64	2.78	2.94	3.10	3.26	3.41
WAEES	1.34	5.69	7.96	8.85	10.01	11.05	11.97	12.61	13.11	14.03
OECD-FAO	5.83	6.86	7.35	7.85	8.26	8.83	9.35	9.91	10.43	11.04
小麦										
ERS-USDA	1.49	1.33	1.39	1.42	1.49	1.56	1.60	1.69	1.75	1.77
FAPRI	0.68	0.79	0.93	1.06	1.20	1.33	1.48	1.63	1.78	1.94
WAEES	1.53	3.40	2.69	3.23	3.08	3.21	3.12	3.06	2.94	2.84
OECD-FAO	6.08	5.86	5.06	4.13	4.01	4.41	4.66	5.01	5.14	5.32
水稻										
ERS-USDA	0.53	0.50	0.51	0.50	0.53	0.56	0.59	0.61	0.63	0.65
FAPRI	1.24	1.28	1.32	1.35	1.33	1.35	1.37	1.44	1.44	1.50
WAEES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OECD-FAO	0.53	0.51	0.56	0.64	0.68	0.72	0.75	0.78	0.81	0.86
大豆										
ERS-USDA	63.06	66.05	69.04	72.03	75.03	78.02	81.01	84.01	87.00	90.00
FAPRI	61.93	64.33	66.15	67.91	69.58	71.30	73.04	74.82	76.59	78.31
WAEES	61.00	63.86	66.08	67.59	69.20	70.67	72.15	73.70	75.21	76.70
OECD-FAO	58.60	60.37	61.68	63.95	65.68	67.01	68.45	69.94	71.46	72.75

资料来源: 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局 (USDA-ERS)、食品和农业政策研究所 (FAPRI)、世界农业经济和环境服务局 (WAEES) 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及联合国粮农组织 (OECD-FAO)*
 * 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局 (USDA-ERS) 概览, 网址: <http://www.ers.usda.gov>。
 食品和农业政策研究所 (FAPRI), 密苏里州大学与爱荷华州立大学食品和农业政策研究所 (FAPRI) 概览, 网址: <http://www.fapri.missouri.edu> 与 <http://www.fapri.iastate.edu>。
 世界农业经济和环境服务局 (WAEES) 概述, 2012年密苏里州哥伦比亚, WAEES产品。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及联合国粮农组织 (OECD-FAO), OECD-FAO 农业概览, 网址: Available <http://www.oecd.org/site/oecd-faoagriculturaloutlook/>。

图表3: 美国生产、国内消费与结算库存概览(单位: 千公吨)

		2012/13	2013/14	2014/15	2015/16	2016/17	2017/18	2018/19	2019/20	2020/21	2021/22
世界农业经济和环境服务局预测											
棉花	生产	3.76	2.85	3.07	3.21	3.21	3.28	3.30	3.34	3.35	3.35
	出口	2.55	2.24	2.39	2.51	2.49	2.56	2.62	2.67	2.70	2.73
玉米	生产	291.36	396.22	395.59	398.29	401.47	408.39	409.58	412.46	417.48	424.05
	出口	29.95	50.87	62.23	66.15	68.31	71.19	73.67	76.54	79.59	82.41
大豆	生产	77.84	90.26	91.36	93.08	94.63	94.13	96.67	98.24	99.53	100.68
	出口	34.08	37.90	39.87	40.10	41.12	40.69	41.26	41.86	42.05	42.13
小麦	生产	61.76	61.46	61.07	58.40	60.94	60.92	61.54	62.18	62.61	62.70
	出口	31.15	31.41	30.78	30.63	31.00	31.46	31.71	32.27	32.48	32.25
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局预测											
棉花	生产	3.53	3.83	3.85	3.88	3.90	3.88	3.90	3.92	3.92	3.94
	出口	2.56	2.87	2.98	3.05	3.07	3.09	3.09	3.09	3.11	3.11
玉米	生产	387.41	374.08	376.25	383.06	390.00	396.80	401.43	408.37	413.00	420.07
	出口	51.03	53.07	57.15	59.87	61.23	62.60	63.96	64.64	65.32	66.00
大豆	生产	87.50	90.22	91.72	92.67	93.62	94.57	95.39	96.34	97.30	98.25
	出口	38.92	41.23	41.78	42.32	42.46	42.59	42.73	43.00	43.27	43.41
小麦	生产	57.70	55.79	54.02	54.43	54.84	55.25	55.79	56.20	56.61	55.79
	出口	25.85	25.85	25.85	25.85	25.17	25.17	25.17	25.17	24.49	24.49
食品和农业政策研究所预测											
棉花	生产	3.70	2.95	3.04	3.05	3.11	3.15	3.18	3.24	3.30	3.36
	出口	2.47	2.33	2.33	2.35	2.42	2.46	2.51	2.58	2.65	2.73
玉米	生产	293.36	391.52	385.34	390.65	393.75	399.42	406.71	409.38	413.56	417.15
	出口	33.75	51.44	55.93	59.49	63.19	66.54	72.14	76.19	80.24	86.86
大豆	生产	73.26	90.52	90.71	92.12	94.14	95.53	95.98	97.22	97.91	98.47
	出口	30.29	39.73	40.66	41.72	42.95	43.79	43.72	44.03	44.11	44.00
小麦	生产	61.72	60.96	58.60	56.55	56.04	56.36	56.69	57.15	57.49	57.76
	出口	32.69	31.00	28.88	26.86	26.45	26.59	26.98	27.06	27.44	27.53

资料来源: 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局(USDA-ERS)、食品和农业政策研究所(FAPRI)、世界农业经济和环境服务局(WAEEs)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及联合国粮农组织(OECD-FAO)。* WAEEs概述, 2012年密苏里州哥伦比亚, WAEEs产品; ERS-USDA概览, 网址: <http://www.ers.usda.gov>; 食品和农业政策研究所(FAPRI)概览, 网址: <http://www.fapri.missouri.edu>与<http://www.fapri.iastate.edu>。

安全的最有效措施; 扩大国家粮食储备能力和谷物市场基础设施建设, 成为一项用以强化政府控制或调节全国粮食市场能力的主要措施; 已建立并实施的食物检疫制度用以保护消费者健康¹¹。

虽然中国已成功实现了很高程度的粮食自给并将尽量保持这种趋势, 但近期大多数国际组织仍预测中国在下一个十年将成为主要的棉花、大豆和玉米进口国。大豆、棉花和玉米的自给自足率将会分别低于20%、60%与95%(图表4)。

由于前文所述的土地资源和水资源的短缺、

都市化和环境退化等问题, 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美国农业出口可以帮助中国巩固短缺情况下的粮食安全。2012年2月在爱荷华州举行的农业研讨会上, 美国和中国签署了关于粮食安全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五年协议。协议很大程度上侧重于粮食安全与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 并加强两国间的食品供应与农业技术合作。

稳定食品价格

中国同样也需要维持稳定且可负担的粮食价格, 这对社会稳定至关重要。尤其是在短缺时期, 从美国进口有助于抑制价格上涨。例如, 在2007年至2008年, 蓝耳病使得猪肉产量减少了17%, 而价

11 Gu, S.与Zhang, Y., “中国粮食安全”, 《中国: 地区可持续发展》概述, 第1卷,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自然资源研究所, 中国北京。

图表4: 各机构对2012/13年至2021/22年中国自给自足率的预测

	2012/13	2013/14	2014/15	2015/16	2016/17	2017/18	2018/19	2019/20	2020/21	2021/22
棉花										
ERS-USDA	58%	58%	58%	58%	58%	59%	59%	59%	59%	59%
FAPRI	77%	76%	75%	75%	74%	73%	72%	71%	71%	70%
WAEES	69%	79%	75%	74%	73%	73%	74%	73%	72%	72%
OECD-FAO										
玉米										
ERS-USDA	98%	98%	98%	97%	97%	96%	96%	95%	95%	94%
FAPRI	99%	99%	99%	99%	99%	99%	99%	98%	98%	98%
WAEES	99%	97%	96%	96%	95%	95%	95%	95%	94%	94%
OECD-FAO	97%	97%	97%	96%	96%	96%	96%	96%	96%	95%
小麦										
ERS-USDA	99%	99%	99%	99%	99%	99%	99%	99%	99%	99%
FAPRI	100%	100%	100%	99%	99%	99%	99%	99%	99%	99%
WAEES	99%	97%	98%	97%	98%	97%	98%	98%	98%	98%
OECD-FAO	95%	95%	96%	97%	97%	96%	96%	96%	96%	96%
水稻										
ERS-USDA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95%	95%
FAPRI	99%	99%	99%	99%	99%	99%	99%	99%	89%	89%
WAEES	99%	99%	99%	99%	99%	99%	99%	99%	99%	99%
OECD-FAO	100%	100%	100%	100%	99%	99%	99%	99%	99%	99%
油菜籽										
ERS-USDA										
FAPRI	86%	86%	87%	87%	87%	88%	88%	88%	88%	87%
WAEES	85%	89%	90%	91%	91%	92%	91%	92%	92%	92%
OECD-FAO										
大豆										
ERS-USDA	29%	27%	25%	23%	22%	20%	19%	17%	16%	14%
FAPRI	18%	17%	17%	16%	16%	15%	15%	14%	13%	13%
WAEES	19%	18%	17%	17%	16%	16%	16%	15%	15%	15%
OECD-FAO	49%	49%	49%	48%	48%	48%	47%	47%	47%	47%

资料来源: 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局(USDA-ERS)、食品和农业政策研究所(FAPRI)、世界农业经济和环境服务局(WAEES)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及联合国粮农组织(OECD-FAO)。* ERS-USDA概览, 网址: <http://www.ers.usda.gov>; 食品和农业政策研究所(FAPRI)概览, 网址: <http://www.fapri.missouri.edu>与<http://www.fapri.iastate.edu>; WAEES概览, 2012年密苏里州哥伦比亚, WAEES产品;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及联合国粮农组织(OECD-FAO)农业概览, 网址: <http://www.oecd.org/site/oecd-faoagriculturaloutlook/>。

格飙升了54%。从美国的进口恰好弥补了这一短缺, 防止了更严重的价格上涨¹²。

环境问题

环境是中国严重关切的问题。土壤退化与污染加剧了耕地和水资源的匮乏。农产品的进口可以帮助减轻中国的环境问题。绿色技术与耕作方法的使用将会得到更多关注并得到推广, 这将为美国公司和投资者提供新的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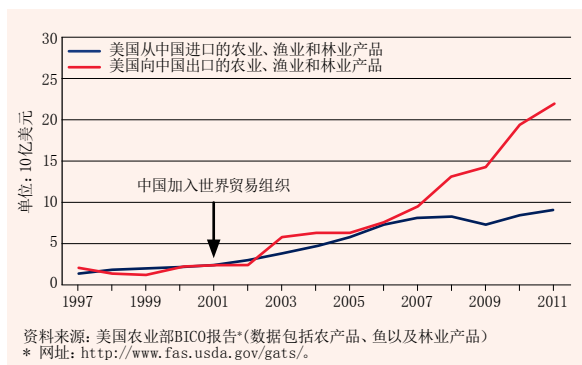
农业现代化

中国在农业现代化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例如, 生猪养殖的升级促进了饲料生意的提升。国内外投资也已经进入种子、化学品和粮食生产机械等领域。

采用技术和实现农业现代化是中国长期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部分。更多侧重点将放在耕地保护与资源节约型技术、生物技术、动植物健康与疾病管理、耕作方法改进和机械化、收获后加工、销售与冷链物流以及农业加工设施升级等方面。外国投资可以在这些领域发挥突出作用。

12 Trachtenberg Eric, 《中美农业合作》, 2012年7月(未公开发表文稿)。

图表5: 中美农产品贸易 (1997年至2011年)



随着美国农业不断应用最新技术以及实现无可比拟的生产率水平, 美国农业部门和投资者在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参与将给两国都带来巨大好处。

六、现有的农业合作

中美农业贸易快速增长

中国加入WTO之后, 美国对中国的农业、渔业和林业产品出口从2001年的22亿美元升高至2011年的219亿美元。同时, 中国对美国的农业出口从2001年的23亿美元上升到2011年的92亿美元¹³ (图表5)。

中国现在是美国农业出口的最大市场, 同时中国还是美国的第三大供应国。中国出口的主要产品包括茶叶、香料、苹果汁、新鲜蔬菜、木本坚果、猫粮和狗粮、深加工水果和蔬菜以及海产品; 而美国则主要出口大豆、棉花、玉米、兽皮与皮革以及海产品和林产品。这种贸易很大程度上是受美国供过于求, 需要寻找土地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市场驱动的。另一方面, 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 (如苹果汁) 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¹⁴。中国

¹³ 美国农业部BICO报告, 网址: <http://www.fas.usda.gov/GATS>。

¹⁴ ERS-USDA概览, 网址: <http://www.ers.usda.gov>; 食品和农业政策研究所(FAPRI)概览, 网址: <http://www.fapri.missouri.edu> 与<http://www.fapri.iastate.edu>; WAEES概览, 2012年密苏里州哥伦比亚, WAEES产品;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及联合国粮农组织(OECD-FAO)农业概览, 网址: <http://www.oecd.org/site/oecd-faoagriculturaloutlook/>。

图表6: 2011年美国对中国的十大出口农产品(单位: 千美元)

排名	产品	价值
1	大豆	10,480,227
2	棉花	2,623,395
3	兽皮	1,163,410
4	原木与木屑	1,079,281
5	饲料用谷类	842,770
6	其他可食用鱼类与海产品	750,766
7	红肉, FR/CH/FR	641,122
8	饲料与草料	627,108
9	硬木材	506,691
10	其他中间产品	468,799

来源: USDA BICO报告*
* 网址: <http://www.fas.usda.gov/gats/>。

图表7: 2011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十大农产品(单位: 千美元)

排名	产品	价值
1	其他可食用鱼类与海产品	1,784,403
2	其他增值木材产品	1,445,192
3	板材产品 (包括胶合板)	1,117,421
4	加工水果与蔬菜	948,906
5	其他针对消费者的产品	753,710
6	其他中间产品	641,134
7	果蔬汁	558,813
8	底栖鱼、鱼片/鱼排	486,454
9	虾	289,350
10	小吃	203,0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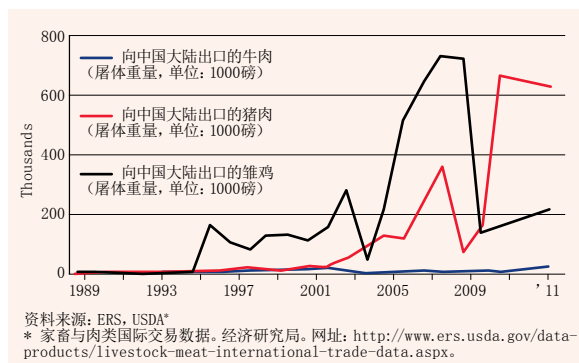
来源: USDA BICO报告*
* 网址: <http://www.fas.usda.gov/gats/>。

的需求改变了美国农业的面貌。例如, 在肉类产业, 鸡爪已加入出口行列。木本坚果部门正在发生变化, 其原因是中国的需求使价格提高, 很多新的山核桃树被种植, 以满足中国的需求。牛基因也有大量出口。美国甚至为中国的乳品生产出口苜蓿。与此同时, 中国也栽植了很多新品种, 以供给美国市场。

截至2006年, 美国在与中国的农业贸易顺差方面保持了相对适中的水平。然而, 自2007年起, 顺差快速增加, 并在2011年达到127亿美元¹⁵。

¹⁵ BICO报告, 网址: <http://www.fas.usda.gov/GATS>

图表8: 美国对中国的家畜出口



家畜贸易

2011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动物产品价值为449.3美元,而向中国出口的动物产品价值为2,629.0美元¹⁶。

美国向中国出口的雏鸡在2004年之后快速增加,并在2009年达到了7.338亿磅。2010年,中国对美国雏鸡产品开征反倾销与反补贴关税,此举使得美国的雏鸡出口急剧下滑。同时,美国向WTO就这些反倾销与反补贴关税提出了抗议。

2000年之后,中国从美国进口的猪肉快速增加。2003年,规模达到了4,470万磅(屠体重量)。尽管在2008年有大幅下降,但从美国的猪肉进口迅速反弹至2011年6.395亿磅的新高。

大豆贸易

大豆是中美两国交易的最重要农产品。自2011/2012年起,中国的大豆种植面积减少了13.8%,2012/13年总面积仅为579万公顷。图表10说明了在过去数年内大豆每月的价差。国内大豆与进口大豆的价差以及对蔬菜油与蛋白质需求的增长对刺激进口功不可没。中国在2011/2012年的进口额大约为6,000万公吨,而在2012-2013年将增加至6,300万公吨。中国国内自给自足率(图表9)一直低于20%的水平,在过去两年,从美

图表9: 2001/02年起中国的自给自足率

	大豆	油菜籽	棉花	玉米	小麦	大麦
2001/02	63%	82%	98%	100%	99%	57%
2002/03	39%	60%	89%	100%	100%	63%
2003/04	51%	61%	71%	100%	96%	68%
2004/05	36%	68%	83%	100%	93%	62%
2005/06	39%	59%	56%	100%	99%	47%
2006/07	36%	55%	78%	100%	96%	73%
2007/08	24%	62%	76%	100%	100%	72%
2008/09	20%	62%	84%	100%	100%	63%
2009/10	15%	69%	78%	99%	99%	44%
2010/11	21%	67%	74%	99%	99%	60%
2011/12	18%	71%	47%	97%	98%	46%
2012/13	18%	72%	61%	99%	98%	50%

来源: 美国农业部(USDA)农产品外销局(FAS)(2013年)*
* 美国农业部(USDA)《世界农业供需预测》,网址: <http://usda.mannlib.cornell.edu/MannUsda/viewDocumentInfo.do?documentID=1194>。

国获得了大豆出口总额70%多。大体而言,所有进口到中国的大豆都被加工成用于动物饲养的大豆饲料以及用于人类使用的烹饪用油。大量的交易是与美国作为世界最大大豆生产国的地位以及中国作为世界最大大豆消费国的地位相符的。

棉花贸易

由于纺织与服装工业规模大,中国对棉花的需求与日俱增。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棉花生产国、消费国与进口国。棉花的进口占据了国内消费40%的份额(图表9)。美国的棉花构成了中国1/3的总进口。棉花是中国从美国进口的第二大农产品。然而,由于运输费用的原因,美国在近年来被印度夺走了部分市场份额。自2011年起,印度同样也为中国提供了1/3的棉花进口额。然而,由于国内工厂使用日渐增加以及质量问题,印度的棉花出口受到了一定限制。因此,即便美国的棉花份额降低,美国向中国出口的棉花价值从2001年的不到5,000万美元增加到近期的超过30亿美元,这一趋势在未来预计还将继续。

16 《中国贸易》,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局,网址: <http://www.ers.usda.gov/topics/international-markets-trade/countries-regions/china/trade.aspx>。

玉米贸易

由于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玉米生产国，在2008/09年之前对玉米的进口很少。然而，由于家畜饲养的需求，中国在2009/10年以及2010/11年分别进口了97.9万公吨以及523.1万公吨玉米，其中大部分供应来自美国。在过去的五年里，美国占据了世界上40%的玉米出口，并在2007/08年达到了6,200万公吨的历史纪录。美国对世界玉米贸易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玉米种植带的天气状况。由于美国生物燃料的发展以及干旱问题，在2011/12年与2012/13年，美国分别只出口了3,900万公吨与2,300万公吨玉米。中国的玉米出口政策经常变化，并且似乎与国家的官方玉米生产统计很少有关联。因此，中国的玉米贸易难以预测。然而，随着人口的增长以及消费者对肉类产品的需求，长期而言中国预计将会继续增加对饲料谷类的进口。

蔬菜油贸易

蔬菜油是中国的第二大进口农产品。2012/13年，总进口量为856万公吨。在过去三年里，棕榈油与大豆油占据了进口总蔬菜油量的87%。很多棕榈油都来自印度尼西亚。由于大豆油与大豆进口关税的差别（大豆免税、大豆油为9%），与大豆相比，中国的大豆油进口量相对较低。

七、农业双边投资

自中国1978年实行经济改革起，外资开始涌入中国的农业行业。美国公司在中国的种植业、养殖业、谷类与油类加工、农业机械等领域进行了大量投资。这些举措还带来了大量的技术转移，促进了中国农业以及相关产业的发展与现代化。

此外，近年来，中国鼓励海外投资，尤其是在某些特定领域。事实上，与能源、公共事业和采矿等部门相比，中国在农业部门的海外投资才刚刚起步。全球食品价格在近年来的提升也促

图10: 中国的商品进口以及美国商品所占的份额 (2009/10-2011/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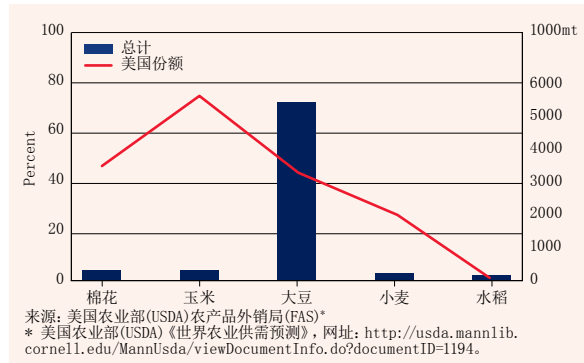


图11: 国内大豆港口价格与CIF价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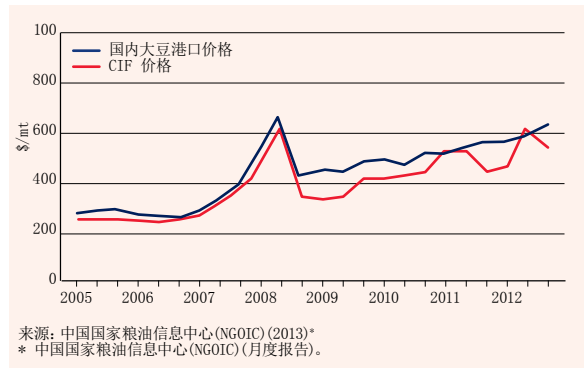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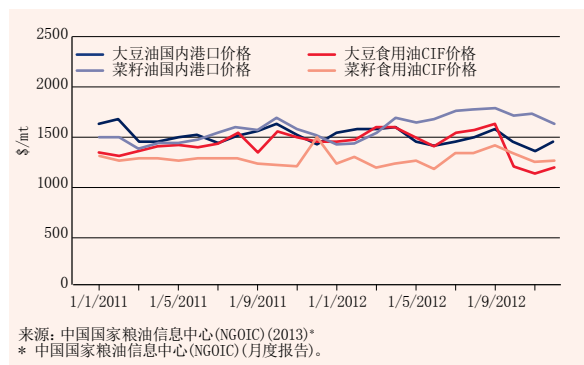


图12: 国内食用油港口价格与CIF价格比较



使中国展现出投资海外农业部门的兴趣。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是，2008年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COFCO)收购了设于弗吉尼亚的Smithfield公司的4.95%少数股权。Smithfield公司是全球领先的生鲜猪肉与包装肉类的加工商与销售商以及肉猪的最大生产商。随后，



在2009年末，COFCO斥资1.94亿元人民币收购了Smithfield与比利时ARTAL集团在中国的合资企业——Maverick。此项收购旨在扩展COFCO的高品质肉类业务。但COFCO同时还希望从Smithfield与Maverick获得技术与管理技能。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中国国有企业的海外投资与并购外，中国政府同时也在鼓励私营企业的海外投资与并购。2012年6月29日，中国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NDRC)、商业部(MOFCOM)以及国家外汇管理局(SAFE)会同另外十个管理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积极开展境外投资的实施意见》(“意见”)。《意见》为未来鼓励中国民营企业进行跨国投资与并购的详细措施奠定了基础。这可以被视作中国民营企业进行新一轮海外投资与并购的开始。很多民营企业主都希望在地理上将投资与财富多元化。农业是中国“优先发展”的部门之一。

鉴于最新的发展情况，中国的海外农业投资预计将会在未来保持高速发展。美国可能是其最青睐的投资目标之一，更多的关注将会放在农业技术与绿色技术上。

八、农业技术合作与人员交流不断加强

自中美联合农业技术工作组于1980年成立后，美国农业部(USDA)与中国农业部(MOA)已就超过450个项目进行了交流，涉及的访问专家超过2,500名，涵盖种植、生物技术、生物质能、害虫管理、农药管理与农业技术扩展等各个领域。此外，通过联合研究中心与实验室、合作平台与合作方案等各种协作模式，大批人员获得了现代农业技术的培训，并且为两国农业技术的发展与农业开发做出了突出贡献¹⁷。

¹⁷ 2012-2017年中美农业战略合作方案。

九、两国建立了一系列有效的对话机制

日益加强的合作为中美两国创造了巨大的机会。关键是在过去几十年所取得成就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有效的机制。两国政府都已经对此表示高度重视，并且建立长期的系列对话，包括农业合作联合委员会(JCCA)、农业技术联合工作组(JCCT)等。同时，两国政府继续致力于商贸联合委员会(JCCT)与战略经济对话(S&ED)。2月，两国农业部长签署了历史性的《战略合作方案》。这是引领两国未来五年农业关系的文件。此方案基于两国在农业贸易、科学与教育方面已经建立的牢固关系制定，旨在深化两国在优先领域的合作，如食品安全、动植物健康与疾病管理、可持续农业、基因资源、生物技术、新兴技术以及农业市场和贸易等¹⁸。

¹⁸ 2012-2017年中美农业战略合作方案。

图表13: 中国的农业补贴

		2009	2010	2011	2012	
直接付款	单位: 10亿美元	2.30	2.30	2.30	2.48	
种子补贴	单位: 10亿美元	3.02	2.30	3.49	4.30	
机械	单位: 10亿美元	1.98	2.36	2.78	3.42	
燃料、化肥补贴	单位: 10亿美元	11.51	13.00	13.75	17.26	
总计	单位: 10亿美元	18.80	20.32	22.32	27.45	
政府采购价格						
水稻	• 早熟籼稻	US\$/MT	286	295	324	381
	• 晚熟籼稻	US\$/MT	292	308	340	397
	• 粳稻	US\$/MT	302	333	406	444
小麦	US\$/MT	270	279	298	324	
玉米	US\$/MT	214	221	265	317	
油菜籽	US\$/MT	582	574	730	754	
大豆	US\$/MT	548	550	587	613	
皮棉	US\$/MT	1,912	1,912	3,143	3,246	

资料来源: 中国政府各种规章制度

十、持续关注与纠纷

两国之间的不满与顾虑

由于某些农产品被课以重税, 中国对中国农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的种种限制表示出不满。例如, 虽然美国整体关税水平相对较低, 美国对家禽的进口征收20%的关税、对大豆油的进口征收19%的关税并且对乳制品征收高达139%的关税。中国同时认为, 美国政府对农业进行了大量补贴, 这使得玉米、棉花、小麦与大豆等美国农产品在竞争中具有不公平的价格优势。美国则认为中国的农业补贴刺激了土地密集型产品的生产, 这阻碍了美国的出口(见图表13)。

美国为中国出口设置的绿色标准、包装要求以及其他技术壁垒是双方纠纷的其他领域。美国在对中国的农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时, 对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以及“不恰当替代国”的选择同样表示了异议。

同时, 中国的粮食进口也引发了国内对全球市场过于依赖以及粮食安全的顾虑, 尤其是, 大量进口产品的涌入将会大幅缩减本国的生产。此外, 中国还对从美国进口的转基因食品的潜在有害影响表示顾虑。

美国对中国采用“不科学且不一致”的卫生与植物检疫措施表示不满, 尤其是针对美国的牛肉与猪肉产品¹⁹。美国同时对中国的种子与转基因组织(GMO)监管体系表示顾虑。其中的一个例子是美国猪肉生产中胺类的使用。胺类是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批准的受体素, 可以增加瘦肉的产量并且在美国的生猪养殖行业广泛使用。然而, 在欧盟成员国、中国与俄罗斯等国家, 胺类被禁止使用。2002年, 中国禁止了所有受体素的使用, 而美国的产品均含有胺类残留, 这将美国排除在进口国列表之外。

此外, 美国认为中国的关税税率配额(TRQ)不透明且不确定。在2011年9月份的一起WTO案件中, 美国政府对向中国向各种美国禽类产品征收反倾销与反补贴关税提出了抗议。此外, 一些美国农业公司认为, 中国在农业部门对外资的限制措施将会限制竞争并放慢行业发展脚步。同时, 近年来, 美国政府正密切关注中国的农业补贴与扶持政策。美国的肉类出口商也饱受中国清关长时

¹⁹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预计中国的卫生与植物检疫(SPS)措施对美国向中国的出口的影响将大过关税。SPS措施对部分美国农产品造成了实质性的限制或有效的禁止。参见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 2011年《中国农业贸易: 竞争现状与对美国出口的影响》, USITC第5419号出版物, 网址: <http://www.usitc.gov/publications/332/pub4219.pdf>。



间延误的苦恼——这意味着他们无法出口冷却肉。

两国的努力与进展

在2011年向国会做出的《中国WTO合规性报告》中，美国贸易代表署承认中国每年在农产品方面都及时践行其关税承诺。向美国农民以及大农场主征收的最重要农产品的关税从1997年的平均31%降低至14%，这几乎都是在2002年1月1日起或2006年1月1日止的大约5年的时期内实现的。在2011年，中国并没有实施新的关税削减，最近为数不多的农产品关税削减都发生在2008年。

美国贸易代表署评论称，中国关税削减的累积效应以及需求的增加对美国2011年对中国某些出口的持续健康发展有重要作用。近年来，某些大宗农产品的出口显著增加，并且势头强劲，包括大豆与棉花等。美国对中国的大豆出口价值从2005年的22亿美元增加至2010年的108亿美元，几乎翻了五番。美国对中国的棉花出口从2004年14亿美元的历史纪录进一步提高至2010年的22亿美元。2011年1月至9月的原木等林产品出口受到大量需求的刺激，较2010年同比增长了86%。鱼类与海产品出口同样也有显著增加，在2011年的前三季度增加了57%。同时，消费者驱动的农产品出口在2011年前三季度增加了64%²⁰。

中国认为，尽管这可能使得国内农民因进口产品的竞争而面临困难，进而可能受到损失，但这是对WTO规则的坚定践行。例如，从美国进口价格低廉的棉花迫使甘肃与新疆的供应商廉价抛售。

过去几十年来，美国的农业政策越来越以市场为导向。1985年与1990年的《农场法案》都减少了对供应的控制以及对价格的扶持。1996年的《农场法案》则将价格扶持与收入扶持大幅削减，而将注意力更多集中在环保与水质上。1985

年施行的“出口增强计划”是美国最大的农业补助计划，在2002年后开始变得不活跃，并且在2008年的《农场法案》中被最终废除。美国的肉类产品、园艺产品与深加工食品没有补贴。2012年旨在终止乳制品出口刺激方案的《农场法案》并没有获得通过，其原因是“财政悬崖”相关的政治限制。联邦政府的赤字在接下来的几年将会增加政府对美国农业进行扶持的压力。例如，2013年4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发布了2014财年的预算案，其中打算终止直接支付并减少农作物保险的资金²¹。

中国保持高度的谷类自给自足，并未过于依赖美国的农业进口²²

中国保持着高度的谷物（水稻、大麦与玉米）自给自足，这些是国民的主食。2011年，中国共生产了4.9637亿吨谷类，其净进口仅为451万吨，只占国内生产的0.91%。然而，净进口的比例在近年来显著增加（2010年净进口占国内产出的总比例为0.38%），但自给自足率仍然保持了较高的水平。粮食的净进口预计在未来会持续增加，其原因是中国的决策者与学者已经就将自给自足率降低至95%的目标达成了共识。

谷物方面，2011年中国已经从大米的净出口国转变为净进口国，其三大进口来源国为越南、泰国与巴基斯坦。在2011年总计125万吨的小麦进口中，美国提供了43万吨（占比34.34%），为第二大进口来源国，最大的进口来源国为澳大利亚，数量为64万吨（占比51.11%）。玉米方面，美国是最大的供应国（96.16%），老挝（2.01%）与缅甸（1.62%）分列二、三位。

另一方面，中国对大豆的进口非常依赖，其中很大一部分被用于动物饲料。在2006至2011

²⁰ 美国贸易代表署(USTR),《2011年USTR关于中国WTO合规性向国会的报告》,2011年12月。

²¹ Jeremy Peter,《农业政策综述》,《新农场法案》,2013年4月12日,网址: <http://www.farmlifefacts.org/farm-policy-roundup-4-12-2013>。

²² 参见中国国家粮油信息中心(NGOIC)月度报告,网址: <http://big5.mofcom.gov.cn/gate/big5/wms.mofcom.gov.cn/aarticle/subject/ncp/subjectbb/200603/20060301783733.html>。

年,大豆的进口从2,830万吨增加到5,260万吨,而国内的产量则保持在大约1,400万吨的水平。美国是中国大豆进口的三大来源国之一。2011年,从美国进口的比例为42.46%,而其他39.18%来自巴西,14.90%来自阿根廷。市场仍然保持了多元化与竞争性。

转基因(GM)农产品

在中美双边贸易中,关于生物技术或转基因(GM)农产品的问题仍然存在,这些问题通常涉及管理、程序或技术层面²³。中国农业部被认为在转基因农产品审批/注册流程中需要花费大量时间且政策多变,这使得中美之间的转基因农产品双边贸易仍然潜力巨大且持续增长。与欧洲或日本政府不同,两国政府实际上都鼓励转基因技术的研究、生产与消费。

如今,美国与中国在转基因食品的种植面积上分列全球第一与第六。中国境内进行商业化生产的生物技术作物包括抗虫棉花、抗虫杨树、PRSV木瓜、VR甜椒、DR与VR西红柿等。在这些作物中,中国抗虫棉花的接受率为71.5%²⁴,而几乎所有在中国种植的木瓜都是转基因作物。在美国,2012年各作物的生物技术种植比例分别为:玉米88%、棉花94%、大豆93%²⁵。

中国与美国对转基因的进口都较为开放,两国之间转基因农产品的流动规模也非常大。仅在2010年,中国就从美国进口了150.02亿吨玉米(占157.3亿吨总玉米进口额的96.2%)以及1.3595万亿吨大豆(占总大豆进口额的42.5%)。这些进

口的大豆与玉米几乎全部是转基因产品²⁶。美国从中国进口的用于国内消费的加工过的西红柿从2003年的6.91亿吨增加到2007年的121.16亿吨²⁷,大部分也是转基因产品。

长远而言,中美两国可以在转基因研究与管理领域进一步合作,以提升消费者福利、生产率,促进贸易。如可以建立一种同步审批机制,则可以在产品在出口国获得完全批准之前在进口国进行生物安全证书的申请(需要在产品可以被出口至中国之前完成),此举可以减少生物技术产品的营销与贸易中不必要的延误。在适当的时候,可以开发统一注册制度,一国签发的批准将自动转换为另一国的批准。

在当今世界,转基因技术已经势不可挡。作为世界上两大农产品生产国与消费国,中国与美国合作对保护两国乃至全世界消费者的福利至关重要。两国之间对于监管体制的联合开发是向公众提供高品质转基因产品的唯一途径。对中美两国公众意见的研究反复表明,消费者并不是完全抵触转基因产品,但是他们坚持“知情权”。针对此问题,中美两国可以借鉴欧盟的经验。欧盟建立了强制性的标签制度,提供了由转基因生物构成或含有转基因生物的产品以及由转基因生物生产的食品与饲料的可追溯机制。此举可以对转基因对环境与健康的影响进行监控并且可以采取恰当的风险管理措施。为进一步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并增强可追溯性,中美两国可以在欧盟之前对使用转基因产品喂养的动物所产出的肉类、乳品与蛋类产品实行强制性标签立法。

虽然我们面临着巨大的机遇,但是转基因技术的推广最终需要全球管理体系的根本性变化,而这一方面我们尚未准备充分。与其他货物

23 问题包括缺乏低水平的存在(LLP)或“叠加特性批准”政策,这是具有高技术性的,参见:De Schrijver, A., Devos, Y., Van den Bulcke, M., Cadot, P., Deloosse, M., Reheul, D.与Sneyers, M. 2006年《转基因事件的风险评估》,《食品科技趋势》,doi:10.1016/j.tifs.2006.09.002,网址: <http://www.lacbiosafety.org/wp-content/uploads/2011/09/risk-assessment-of-gm-stacked-events-obtained-from-crosses-between-gm-events1.pdf>。

24 James, Clive, 2011,《全球商业化生物科技/转基因作物状态:2011年》,ISAAA第43号简报,ISAAA,纽约伊萨卡。

25 《美国转基因作物的接受情况》,美国农业部,网址: <http://www.ers.usda.gov/data-products/adoption-of-genetically-engineered-crops-in-the-us/recent-trends-in-ge-adoption.aspx>。

26 使用中国农业部的数据对玉米和大豆进口值的计算,网址: <http://www.ers.usda.gov/data-products/adoption-of-genetically-engineered-crops-in-the-us/recent-trends-in-ge-adoption.aspx>。关于转基因品种在进口中百分比的预测基于美国目前88%的玉米以及93%的大豆为转基因产品(参见上文因数)以及大部分非转基因食品被留在美国以优惠价格出口的假设(此假设得到了各种报告与分析的支持)。

27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美国西红柿进口监控》,2008年。



贸易不同，对转基因生物的跨国监管与追溯需要新的系统化整合和融合。只要技术交流继续进行，中美两国通过对话了解对方的机构与标准，我们相信两国可以达成包括农民、食品加工商、食品贸易商与消费者等利益相关方都认可的机制。

十一、建议

在美国出口商与中国进口商之间签订长期供应合同

对于大部分农产品而言，很大比例都是在本土进行生产与消费的。很多农产品的全球价格都受到供求边际变化的影响，因此倾向于波动。这种全球价格的波动性进而会影响全球的食品价格以及很多人的生活，并给很多生产者带来不确定性。

鉴于中国对食品需求的长期增长，本研究建议在美国出口商与中国进口商之间，通过两国政府建立并支持的平台，就长期商品供应合同进行谈判并签署。这将有助于鼓励在新产品和物流能力方面的投资，稳定商品供应者的收入并增强中国的粮食安全。

在中国，谷类（玉米、水稻与小麦）、大豆与肉类（牛肉、鸡肉与猪肉）等农产品需求潜力巨大。美国有增加产能并且向中国出口这些商品的能力。中国土地资源与水资源短缺，而美国在生产这些商品中生产率更高。为了保证中美两国之间成功、持续的农产品贸易，一方面，美国农民必须对中国的长期需求有信心，以使得其有意愿对土地与设备进行投资，并且雇佣并培训必要的人力。另一方面，中国的进口商也必须对美国供应的可靠性有信心。短期合同无法促进美国产量、投资与就业的增加，而只会让全球价格的波动更加剧烈。

对于中国而言，粮食安全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中国的进口商必须确信他们可以完全信任美国每年的出口。因此，需要基于双方的预测数据

签署长期供应合同，如十年或者二十年。定价公式应由双方共同商定（如成本加成法等），以保护买卖双方免受现货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如果要让中国相信美国出口商的供应不会因任何原因而被干扰，其中的一种方法是美国出口商在中国或者第三方国家设置仓库，并在其中存放等于一年合同供应量的农产品作为担保。如果美国出口商的供应中断，则中国进口商可以提取这些担保物。同时，中国的进口商应将一年期采购所必须的资金在美国或第三国进行托管，以对其购买行为进行担保。前述担保协定有助于减少不确定性并减少双方的违约行为。如果双方可以谈判达成长期供应合同，此举不仅在经济上是双赢的，同时可以促进两国长期的友好关系。

中国应进口肉类而非动物饲料

美国在土地密集型作物（如玉米与大豆）方面具有较大优势。因此，问题是消耗这些作物的动物应在何处进行养殖。在所有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如果将动物产品输送至中国的成本比将谷物作物输送至中国的成本低，则此产业应位于美国。反之，则应位于中国。

中国猪肉生产商在玉米或大豆上的每千克成本要比美国至少高出11美分²⁸。此价格差异可以抵销饲料的运输成本。而将肉类从美国运输至中国的成本是大约每千克26美分²⁹。从运出成本的角度分析，将肉类而不是谷类运输至中国似乎更行得通，前提是1单位的肉类需要消耗超过2.4单位的谷物。以猪肉为例，每千克活畜需要消耗3千克谷物。每100千克活畜将会提供76千克的畜体。每100千克畜体将会提供75千克的盒装猪肉。这意味着每千克的盒装猪肉需要消耗5.2千克的谷物。显然，运输猪肉的成本要比运输相当的谷物低。

²⁸ 这可以通过将中美两国玉米和大豆的价格进行比较证明，基本上，中国的每吨单价要比美国高出110美元。

²⁹ 此肉类运输成本数据来自使用集装箱定期将肉类出口到中国的美国出口商。

从动物的生产率来讲，将畜牧业放在美国也是有益处的。在美国，家禽的饲料转化率(FCR)为1.9-2.0(每磅肉类所消耗的粮食)，猪肉为3.3-3.6，牛肉为5.5-6.5。在中国，相应的数值分别为2.2-4.0、3.5-8.0以及超过10³⁰。这些差异进一步表明，相比从美国进口用于饲料的谷物与玉米，对中国而言，进口肉类更为经济。(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动物产品的经济性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会受到劳动力成本、规章制度、与市场之间的距离、物流以及其他问题的影响。此外，饲料转化率还取决于动物屠宰时的年龄)。

中国进口更多肉类的另一个有力理由为，肉类生产需要更密集的土地与水资源，而现今中国的耕地与水资源紧缺。与饲养家禽或家畜相比，农民种植植物将会生产更多的卡路里。同时，肉类生产需要更多的水资源。牛肉是耗水量最大的肉类。生产一吨牛肉平均需要15,500立方米的水，而猪肉需要4,850立方米、鸡肉需要3,900立方米、大豆需要1,800立方米、小麦需要1,300立方米³¹。因此，进口肉类(尤其是牛肉)对于中国而言就是进口水资源。

促进双边开放外国投资

两国之间关于农业部门的外资限制将会导致投资不足，进而最终引起竞争的缺乏以及效率的丧失，放慢农业发展的步伐并引起食物价格升高。为完全开发中美两国农业合作的利益，两国应减少外国资本参与并投资农业与食品产业的壁垒。这将为双方创造大量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并且促进两国农业的开发与进步。

当前，中国政府正在努力鼓励相关项目的投资，以解决北方地区水资源紧缺问题，以及全国范围内水土流失及污染问题。政府同时正在为较为贫困的西部省份进行招商引资。对于外资而

言，一个比较有吸引力的领域为用于出口的农产品。比如向日本与欧洲出口的鸡肉加工以及向全世界范围出口的水果与蔬菜生产、包装和加工等方面，目前已经有了大量的投资。对大豆粉碎工厂以及海产产品加工工厂的投资也正在大幅增长。包括一些农业综合企业在内的外资企业占据了整个外贸的半壁江山。最大的投资者为华商，大部分来自香港、台湾与东南亚³²。

为最大程度地发挥协作优势，应努力促进相关领域的跨境投资，如生物技术(如大规模转基因作物制种)、绿色农业技术(如农业废弃物回收利用)、新兴技术(如智能技术设备)以及现代物流等，在此不一一赘述。

放宽市场准入，营造有利的自由贸易环境

中美农业交易的益处不言而喻，设置任何壁垒都是不明智的选择。两国应当采取充分的措施来恪守其在WTO中的义务并履行关税承诺，同时还应放弃非关税壁垒的使用，如补贴、许可要求、卫生与植物检疫措施、包装标准等。保障机制、反倾销与反补贴措施不得被滥用，并且必须严格依照WTO的纪律约束使用。同时，两国应积极寻求通过协商与谈判解决贸易纠纷的途径。

两国为增强贸易联系这一可轻易实现的目标做好了准备，例如，中国在2010年5月取消了美国猪肉的进口限额。在限额取消之后，中国进口美国猪肉大幅增加。中美两国都因此而受益，此举使得美国猪肉进入中国市场重新恢复了活力，同时减少了中国的粮食物价暴涨。2012年12月，在第23届中美商贸联合委员会会议上同样缔结了一些农业合作协定。正如前美国农业部长Tom Vilsack所言：“我们有能力在某些关键问题上取得进展，同时提升美国产品的内在价值。然而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将继续在接下来

30 Trachtenberg, Eric., 《中美农业合作》，2012年7月(未公开发表文稿)。

31 参见“中国水危机”网站：<http://www.chinawaterrisk.org>。

32 Trachtenberg, Eric., 《中美农业合作》，2012年7月(未公开发表文稿)。



农产品供应链的投资促进粮食安全:案例研究

Continental Barge and Grain为一家涉及谷物事业各个方面的大型美国公司。该公司给人的第一印象与Cargill或ADM等美国谷物公司并无二致,提供全方位的船运与金融服务。然而,该企业的特别之处在于该公司为Zen-noh与Itochu持有。Indiana Packers公司的情况也类似,这家美国主要的猪肉加工公司为Mitsubishi Corporation与Itoham Food所持有。为什么日本企业希望参与谷物船运或猪肉加工这样利润较低的农业生意?

上述两家美国公司的雇员的探讨以及相关话题的学术研究表明,主要原因是美国希望“保证原材料的稳定供应”^{*}。日本人对供应链某些环节的控制给日本公司与日本社会以安全感,这显然是值得投资的。例如,我们可以想象,如果驳船运营商罢工,美国的谷物出口将受到怎样的影响。通过把持产业的关键元素,日本可以通过说服美国员工不去参与来抵销罢工的负面影响。

对于美国等粮食富余的国家而言,这种对粮食供应的顾虑是很难理解的。然而,如果我们分析美国在保障稳定的石油供应方面的努力,粮食进口国保障稳定进口商供应的顾虑就不难理解了。

面对粮食进口的需求,不难理解有些中国公司对控制生产与分配体系的兴趣。有些美国人会对此表示反对,但是重要的是,要意识到美国对中国的农业出口无法满足完全需求,除非中国对粮食配送体系的可靠性有信心。

^{*} 参见Raymond A. Jussaume与Kenney Martin, 1993,“日本在美国的粮食与农业投资:加利福尼亚与华盛顿现状”,《农业经济》,第4版第9卷,第413-424页,1993年7月。

的一年与中国的贸易伙伴密切协作。³³”

关税配额(TRQ)同样也是一个重要的贸易壁垒,也是对国内生产者的货物进行保护的措施。关税配额分配的透明性以及国家垄断贸易问题是涉及关税配额的主要顾虑。如何管理关税配额是未来的一大挑战。配额管理有两大标准:配额补充与非歧视原则³⁴。前者要求取消对进口的禁令,而后者需要对所有国家平等对待。目前,中国的配额分配基于历史市场份额确定,并通过“先到先得”方法通过许可证的方式分配。这很有可能引起歧视并且带来有偏见贸易的适

度风险³⁵。然而,向没有经验的贸易商进行拍卖可能会导致配额出租问题(一些有经验的贸易商可能会将配额出售,而非从事实际交易)。关税配额的管理困难重重,但是却有重要意义。中国政府应对其进行审查,以符合公众的最佳利益。可以考虑将一部分配额拿出并定期向有超过两年业务经验的参与者进行拍卖。

深化技术合作、信息交流与资源共享

为提升生产率并发展更先进、稳定且灵活的农业部门,中美两国必须加强下述前沿领域的合作与交流:

³³ 2012年第23届中美商贸联合委员会会议,2012年12月9日,网址:<http://www.ustr.gov/about-u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12/december/us-china-conclude-23rd-JCCT>。

³⁴ David W. Skully, 2001年,《关税配额管理经济学》,第1893号技术公报,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局市场与贸易经济部。

³⁵ David W. Skully, 2001年,《关税配额管理经济学》,第1893号技术公报,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局市场与贸易经济部。

- 1) 可持续农业 (如资源节约农业、土地保护、清洁农业实践、废弃物利用与回收、灾害管理等);
- 2) 生物技术与基因资源 (如种质开发、新物种的培育、转基因组织等);
- 3) 动植物疾病控制 (如诊断技术、农药与兽药的研发等)。

可以建立信息交流与资源共享机制与平台, 以对农业科技研发与应用中的最新进展进行交流。应促成并推进两国间政府机构、高校、研究所、农业协会与商会等各种交流活动。私营部门同样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农业技术联合工作组可以作为鼓励私营经济参与的一种机制。

同时, 建议签署长期技术合作合同。近期, 中美两国对农业技术合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农业开发合作主要由美国的私营经济部门与中国政府的支持研究中心进行。对于粮食与能源安全以及全球商品价格波动日益增加的顾虑推动了进一步的合作。然而, 中国应更加严肃地对待知识产权, 而美国则应提供更为详细的技术共享政策。

始终如一地执行透明且科学的监管体系, 并考虑同步批准与注册

中美两国应采取透明、一致且科学的方法对农业进口进行监管。目前, 两国在农产品的质量与安全性方面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与标准, 这经常会引起误解与不必要的纠纷。有鉴于此, 中美两国应通过双边对话、专题讨论以及深入的技术交流, 在用于农产品的科学检验与监管体系的建立方面密切协作。尤其需要注意的是, 两国应当强化农产品质量与粮食安全要求标准化的合作。同时, 应探究两地市场同步批准或注册的可能性。

在管理执行方面, 两国应努力确保管理决策程序的透明性与一致性。双方同时还应在公营-

私营监控与报告体系方面进行合作, 以解决动植物疫情爆发或粮食污染等突发事件。

在执行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AQ-SIQ)的标准规程与规章中, 中国的地方检验检疫(CIQ)部门并没有采取一致的方式, 这是美国的顾虑。例如, 某些地方检验检疫部门可能会偶尔与标准规程存在偏离, 只通过口头沟通新要求, 而并未对进口商进行预先警告。关于证明植物或植物的产品满足特定的进口要求的植物检疫证明, 大部分中国港口都接受电子签名, 然而某些港口有时强制性需要手写签名, 这大大增加了成本。有时需要合同或证书³⁶, 可能会进行反复无常的改动。强烈建议中国所有港口的地方CIQ部门始终如一地遵循标准AQSIQ规章, 以将执行的偏差降至最低。效率的提升将有助于减少美国出口商的费用, 节省下来的成本将最终使得中国的消费者受益。

促进农村开发

农村开发是中美两国政府共同的主要政策优先选项。美国农村容纳了全国1/5的人口。同样, 农村也是自然资源与国家财富的聚集地, 保存着美国文化、传统与历史中独特的部分。如今, 很多依赖自然资源的产业领域中, 工作机会与收入都出现了下降, 如农业、采矿业与林业等, 而通常那些有相关农业便利设施的地区则较为繁荣。在中国, 农村人口与城镇人口数量相当。其生活水平也有很大不同, 平均收入仅为城镇的1/3。在中国的南部与沿海地区, 农村区域得到了发展并且正在追赶城镇经济。在西北与西部地区, 农村社会仍然开发不足, 且与国家的其他地方脱离。有些地区甚至连清洁的水源与基本的交通仍然是大问题。

虽然美国与中国有着不同的历史与发展阶段, 两者的城乡收入极化现象都非常严重。因

³⁶ 中国美国商会 (AmCham China), 《2012年在华美国业务白皮书》, 2012年4月。



此, 在社会服务与投资方面存在巨大的机遇。正在衰落的地区必须多样化并且吸引新业务, 而正在成长的地区则必须制定可以保持成功的策略。可能的合作领域包括农村人口能够负担得起的及时医疗保健、农村教育以及其他社会服务, 尤其对老年人。旅游业同样也是一个充满潜能的投资领域。

结语

农业一直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的问题之一。尽管如此, 考虑到未来合作与巨大的机遇, 双方进一步增强农业贸易联系与合作十分重要。通过认识并尊重双方在资源禀赋、发展阶段、互补性以及发展需求与潜力方面的差异, 双方可以进一步探寻并扩展农业合作的深度与广度, 并进而实现可观的利益。

参考文献

中国美国商会(AmCham China), 《2012年在华美国业务白皮书》, 2012年4月

中国日报, “21世纪30年代中国城镇人口将达到70%”, 2012年4月3日, 网址: http://www.chinadaily.com.cn/bizchina/2012-04/03/content_14974978.htm

中国国家粮油信息中心(NGOIC) (月度报告)

中国水危机, <http://www.chinawaterrisk.org>

2012-2017年中美农业战略合作方案, 网址: www.fas.usda.gov/country/China/USDA-MOA%20Ag%20Cooperation%20Plan%202012%20signed%20EN.pdf

De Schrijver, A., Devos, Y., Van den Bulcke, M., Cadot, P., Deloouse, M., Reheul, D.与Sneyers, M., 2006年, 《转基因事件的风险评估》, 《食品科技趋势》, doi:10.1016/j.tifs.2006.09.002, 网址: <http://www.lacbio-safety.org/wp-content/uploads/2011/09/risk-assessment-of-gm-stacked-events-obtained-from-crosses-between-gm-events1.pdf>

中国商务部对外贸易司月报, 网址: <http://big5.mofcom.gov.cn/gate/big5/wms.mofcom.gov.cn/aarticle/subject/ncp/subject-bb/200603/20060301783733.html>

食品和农业政策研究所(FAPRI)概览, 网址: www.fapri.missouri.edu and www.fapri.ia-state.edu

Gu, S.与Zhang, Y., 《中国粮食安全》, “中国: 地区可持续发展概述”, 第1卷,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自然资源研究所, 中国北京。

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ISAAA)《2012年中国生物科技现状与趋势》, 网址: http://www.isaaa.org/resources/publications/bio-tech_country_facts_and_trends/download/Facts%20and%20Trends%20-%20China.pdf

James, Clive, 2011年, 《全球商业化生物科技/转基因作物状态: 2011年》, ISAAA第43号简报, ISAAA, 纽约伊萨卡

Jussaume, Raymond A与Kenney, Martin, 1993年, “日本在美国的粮食与农业投资: 加利福尼亚与华盛顿现状”, 《农业经济》, 第4版第9卷, 第413-424页, 1993年7月

2012-2021OECD-FAO农业概览, 网址: Available
<http://www.oecd.org/site/oecd-faoagriculturaloutlook/>

《农业政策综述》,《新农场法案》, 2013年4月12日, 网址: <http://www.farbillfacts.org/farm-policy-roundup-4-12-2013>

Skully, David W , 2001年,《关税配额管理经济学》, 第1893号技术公报, 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局市场与贸易经济部

Trachtenberg, Eric ,《中美农业合作》, 2012年7月(未公开发表文稿)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 2008年,《美国西红柿进口监控》; 2011年,《中国农业贸易: 竞争现状与对美国出口的影响》

美国贸易代表署(USTR), 《2011年USTR关于中国WTO合规性向国会的报告》, 2011年12月。

2012年第23届中美商贸联合委员会会议, 2012年12月9日, 网址: <http://www.ustr.gov/about-u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12/december/us-china-conclude-23rd-JCCT>

USDA,《美国转基因作物的接受情况》, 网址: <http://www.ers.usda.gov/data-products/adoption-of-genetically-engineered-crops-in-the-us/recent-trends-in-ge-adoption.aspx>

BICO报告, 网址: <http://www.fas.usda.gov/GATS>

ERS-USDA概述, 网址: www.ers.usda.gov

《中国贸易》, 经济研究局, 网址: <http://www.ers.usda.gov/topics/international-markets-trade/countries-regions/china/trade.aspx>

家畜与肉类国际交易数据, 经济研究局, 网址: <http://www.ers.usda.gov/data-products/livestock-meat-international-trade-data.aspx>

2012年《农业部长Vilsack关于2011历年美国农业出口记录的声明》(第0046.12号通讯稿), 2012年2月10日, 网址: <http://www.usda.gov/wps/portal/usda/usdahome?>

2012年《美国与中国签署农业战略合作计划》(发布号0057.12), 2012年2月16日, 网址: <http://www.usda.gov/wps/portal/usda/usdamediafb?contentid=2012/02/0046.xml&contentidonly=true>

《农产品出口份额》, 经济研究局, 网址: <http://www.ers.usda.gov/topics/international-markets-trade/us-agricultural-trade/export-share-of-production.aspx#estimation>

《世界农业供需预测》, 网址: <http://usda.mannlib.cornell.edu/MannUsda/viewDocumentInfo.do?>

《WAEES概述》, 2012年密苏里州哥伦比亚, WAEES产品



第十一章 中美旅游合作

张燕生

现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

参与撰稿人:李大伟 麦家驹 熊艳艳 张哲人

摘要

美国旅游业对中国出口的机会巨大且发展迅速。在中国，随着中产阶级的规模迅速扩大，对旅游服务的需求也进入了快速增长阶段。在2011年，中国大陆公民的出境旅游就达约7,000万人次，其中包括2,800万人次赴港旅游和1,600万人次赴澳门旅游。同年，中国游客在国际旅行中的花销约在726亿美金左右，世界排名第三。然而，2011年美国仅接待其中的不到110万中国游客，比较而言，2010年欧洲接待的中国游客人数在230万左右。据估计，2020年中国游客的长途旅行将达约2,000万人次。如果中美政府之间能营造一个更有利的政策环境，那么，美国这样一个广阔的、世界级的旅游资源会在不久的将来吸引更多中国游客。

考虑到中国游客逗留时间更长，在购物上花费更多，中国游客在美国的平均消费大大高于来自其他国家的游客。每一百万中国游客会给美国旅游业或相关支持行业带来61,000个工作岗位¹。这还不包括对其他经济方面产生的乘数效应。如果按目前的发展势头来看，到2022年，每年来自中国的访美游客会超过五百万人次。如果能采取更友好的措施，美国将能够吸引上千万来自中国的游客。这上千万的中国游客会为美国创造至少超过五十万的工作岗位。

在加州和纽约这样深受中国游客欢迎的地方，所受影响的程度可能更大。与此同时，在一些由于制造业全球化而失去工作机会的地区，旅

游带来就业造成的影响将更显著，因为旅游业的工作岗位一定是无法海外外包的。

中国游客以购物和消费出名，尤其在奢侈品消费上。香港近年的经验说明，中国内地游客的消费模式对全球奢侈品牌商业和零售市场动态有着显著影响。当前，由于中国购物者的比重不断上升，众多国际高端消费品牌在香港设立了自己的地区总部或供应链管理。在未来几年，汹涌而至的中国游客将对许多零售业巨头的全球策略产生重要影响，美国将有机会在其中占据有利位置。

然而，美国最大限度地实现中国旅游需求潜力的一个主要障碍，就是其在华现有签证申请条例。当前，在人口众多的中国大陆，美国政府仅在五个城市设立了签证中心。为了面试，有的申请者不得不长途跋涉，在结果不明朗的情况下，他们就要投入大量时间和金钱。要让签证申请程序更简单、便利，就需要跳出有思维方式的条条框框。

从旅游流向的另一端看，2012年有210万美国游客来华旅游，约占美国去海外旅游人数的3.6%，这一数字在过去五年中以约2.2%的年增长率递增。中国为旅游相关的基础设施现代化和服务标准升级作出了持续努力，并且放松了对外国旅游业经营者的限制。中国要吸引更多美国游客来华，并且增加其停留时间和消费，还需要在这些方面作更多努力。

¹ 估计方法请参见本章末的附件3

中美旅游合作

一、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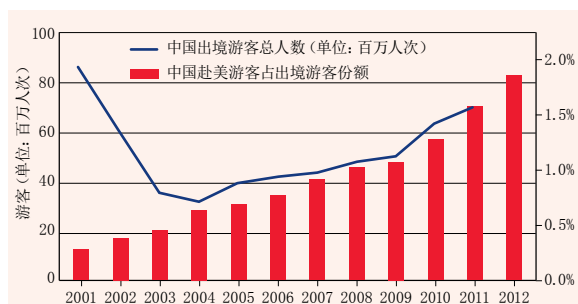
“每年有数千万世界各地游客来到美国。有越多的人来，就有越多的美国人找回自己的工作。我们要帮助全国的商业发展并创造工作。我们要力争，我们要赢。”

——美国总统奥巴马，2012年1月，佛罗里达奥兰多²

旅游可以在许多部门创造就业，包括航空、轮船、零售、酒店、餐饮和娱乐业。大部分与旅游相关的工作都是劳动密集型的服务性工作，不需要太多专业技能。在经济全球化蓬勃发展的世界里，劳动分工越来越细，生产过程被进一步分解，许多工作流程能细分为更小和更简单的工序，而许多工序能转移到其他地区完成，或转移到海外，通过外包来实现降低成本的目的，由此造成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低技能工人失业的原因。因此，旅游业可以创造无法海外外包的工作机会，帮助减轻失业问题。

中国的境外旅游已进入快速增长阶段，2011年人均GDP已达5,400美元且中产阶级数量不断膨胀。在过去的十年，中国境外旅游总人数³从2002年的1,700万人次增加到2012年的8,300万人次（见图表1）。近年来，中国游客不仅开始进行短途旅行，而且长途旅行的比重也进入快速增长阶段。据世界旅游组织⁴的数据显示，中国是2011年国际旅行的第三大消费国，旅游消费额达726亿美元，比2010年的549亿美元有显著提高。该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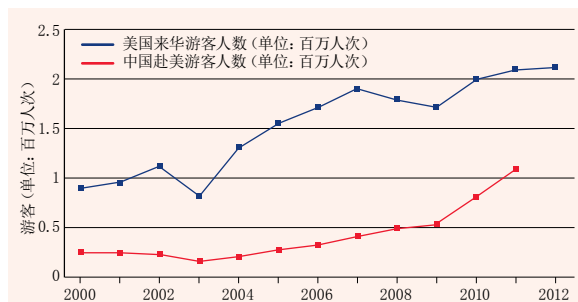
图表1: 中国出境游客总人数以及中国赴美游客占出境游客份额*



资料来源: 中国国家旅游局, 2012; 美国旅游观光办公室, 2012; CEIC, 2012

* 由于中国国家旅游局没有发布2001-2008年间中国赴美旅游者人数的统计, 这里采用美国旅游观光办公室 (OTI) 的数据来计算同期出境访美游客的份额。为保证一致性, 2009-2011年的统计也采用同样数据, 虽然中国国家旅游局自2009年以来已开始发布估算数据。

图表2: 中美间的互访



资料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 2012; 中国国家旅游局, 2012; 美国旅游观光办公室, 2012

织还预计, 未来几年中国境外旅游总数将达一亿人次⁵。一份来自波士顿咨询集团的研究报告⁶表明, 2020年, 中国长途境外旅游人数将达2,000万人次, 未来十年, 中国的国际旅游市场价值将年均增长17%。该份研究报告还预期, 到2022年, 中国境外旅游可能高达每年1.827亿人次⁷。由于中

² “总统发表关于旅游观光业发展战略的讲话”, 白宫, 2012年1月

³ 该数字包括去香港和澳门的游客

⁴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旅游发展报告, 2012年版”,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 2012年

⁵ “2020年旅游展望”, 世界旅游组织, 2000

⁶ “起飞: 中国和其他地区的旅游和旅游业”, 波士顿咨询集团, 2011年3月, 进一步细节请参见本章节的附件1

⁷ 2011年3月波士顿咨询公司估算2010至2020年间中国的出国旅游每年增长超过10%。

图表3: 中国大陆的入境旅游主要来源国

排名	国家	2011年入境游客 (百万)	2006-2011年平均年增长率 (%)
1	韩国	4.19	1.3
2	日本	3.66	-0.5
3	俄罗斯	2.54	1.1
4	美国	2.12	4.4
5	马来西亚	1.25	6.5
6	新加坡	1.06	5.1
7	越南	1.01	N.A.
8	蒙古	0.99	9.5
9	菲律宾	0.89	4.9
10	加拿大	0.75	8.4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旅游局,2012
注: 以上分析不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

国游客访美人数是从低起点开始增长的(见图表2⁸), 2011年赴美旅游人数仅占中国出境旅游总人数的1.5%。同年, 美国约有200万人次来华旅游, 而中国赴美旅游人数仅为该数字的一半。2010年, 中国居民赴欧旅游人数达230万人次⁹, 而赴美旅游仅为80万人次, 这反而说明美国旅游业扩大对华出口的潜力巨大, 有待进一步开发。

二、中美旅游现状

1. 丰富的旅游资源

中美两国幅员辽阔, 都拥有丰富的历史和地理景点, 对各种类型的旅行者具有多样性的吸引力。中国的自然或人工风景区, 比如黄山、泰山、乐山大佛、西安兵马俑、桂林山水等, 都很受美国游客欢迎。另一方面, 美国作为世界最发达经济体之一, 也吸引中国游客游访其迷人之处, 比如纽约市、黄石国家公园、大峡谷国家公园、美国独立纪念馆、波士顿的哈佛或者麻省理工这样的名牌大学、好莱坞、百老汇、佛罗里达和洛杉矶的迪士尼乐园, 以及遍布美国的唐人街。中美

两国都能为游客提供独特的文化体验、美食以及其他服务和经历。中国游客也对一些美国消费品的价格竞争力感兴趣, 比如时尚商品和电子产品。

2. 中美两国对对方的入境旅游市场都意味着巨大的潜力

2011年, 美国是中国第四大入境旅游来源国, 排在韩国、日本和俄罗斯之后(见图表3)。同年, 中国接待了约200万人次的美国游客。与美国经济和人口规模相比, 这是一个很小的数字, 同时预示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美国超过半数的入境游客来自其两个邻邦: 加拿大和墨西哥。在2011年, 中国游客约占美国入境游客的1.7%, 但在2006-2011年期间中国游客的增长势头迅猛, 平均每年增长27.7%, 中国在入境游客排名表的排名也相应稳步上升。

3. 旅游业对美国经济的贡献

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 2010年美国旅游业(包括国内旅游和国际出入境旅游)约占GDP的2.7%, 创造了750万份工作, 其中16%是由国际游客的需求创造的。作为美国最大的服务出口行业, 旅游业占总出口的7%和服务业出口的24%。据该

8 2003年访客锐减的原因在于香港SARS的爆发以及相对应世界其它地区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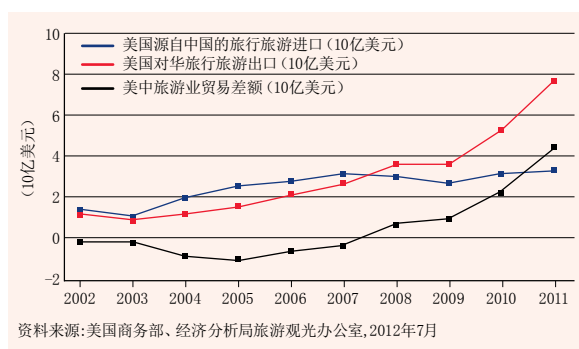
9 “自2017年起欧洲旅游业的新兴中国游客”, Z_punkt Foresight公司和TUI智库, 2012年6月(进一步细节请参见章节末的附件1)

图4: 美国入境游客的来源地

排名	国家	2011年的入境游客 (百万)	2006-2011年平均年增长率 (%)
1	加拿大	21.34	5.9
2	墨西哥	13.49	0.3
3	英国	3.84	-1.7
4	日本	3.25	-2.4
5	德国	1.82	5.6
6	巴西	1.51	23.5
7	法国	1.5	13.7
8	韩国	1.15	8.7
9	中国	1.09	27.7
10	澳大利亚	1.04	11.5

资料来源: 美国旅游行业办公室

图5: 中美旅游业贸易差额



出较多¹¹。2010年中国游客的消费支出对美国经济增加值的贡献约在22亿美金左右¹²。

如图表5所示, 美国旅游业对中国出口额从2007年的27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77亿美元, 年均增速约为30%。尽管中国游客赴美旅游人数少于美国来华旅游人数, 自2008年以来, 美国对华旅游业贸易仍保持顺差, 2011年美国对华旅游业顺差达到44亿美元。

三、旅游合作和推广机制

机构估计, 美国每增加65个国际游客, 就能在旅游业新增一个工作机会¹⁰。

最近五年, 中国游客赴美旅游的平均增长率是27.7%, 而赴美游客的总人数增长率是4.2%。2011年, 共有6,270万外国游客赴美旅游, 其中110万来自中国。2011年, 所有外国游客在美总消费额约为1,530亿美元, 其中中国游客的消费额为77亿美元。中国游客人数只占美国总游客人数的1.8%, 其旅游消费额却占总旅游消费额的5%, 这说明中国游客的人均消费额大大超过平均值, 其原因部分是停留时间较长, 部分是购物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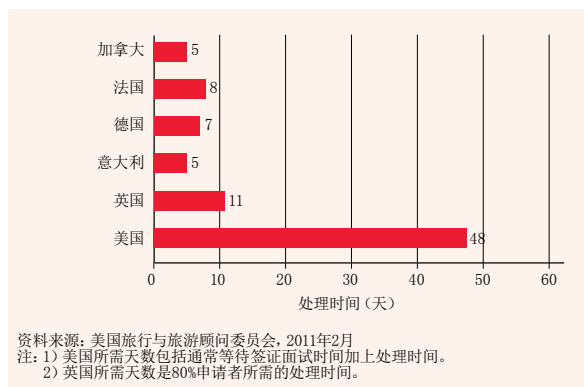
在过去的十年里, 中美两国认识到旅游业对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的重要性, 加强了旅游业合作。2007年两国首次举办了中美旅游部门负责人峰会, 之后在中美城市间轮流举行, 这成为推动中美旅游业不同层面合作交流的年度盛事。另一个重要的年度会议是中美旅游业领袖峰会, 中国国家旅游协会和美国旅游协会的成员在会上交流如何通过增进对双方市场的了解来改善两国旅游业之间的双边关系。

¹¹ 根据美国商务部旅游观光办公室的统计, 2011年每一个中国游客在美国的平均消费为7,100美元, 全部访美旅游者为2,470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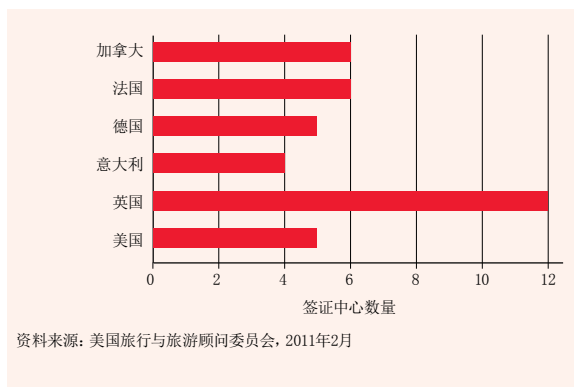
¹² 2010年美国旅游业的增值效应为3,936.8亿美元。同年, 非居住旅游相关产品和服务需求占总需求的15%。这个比例以往是分摊到美国旅游业国际游客需求总增值里, 2010年国际入境游客增值消费估计为590.5美元。2010年, 由于中国游客在美国的消费占总消费的3.72%, 中国游客给美国经济带来的增值消费大约为22亿美元。

¹⁰ 详见附件3。

图表6: 2010年7月部分国家驻华机构处理签证平均所需时间



图表7: 部分国家在华签证中心数量



2007年,两国政府推动制定了中美旅游业战略合作的框架协议,为促进之后的两国旅游业合作打下了基础。2007年12月两国签署的备忘录具有里程碑意义,标志着美国成为中国旅游的ADS国家之一(ADS,即Approved Destination Status签证,中文意思是“被批准的旅游目的地国家”,加注ADS签证后仅限于在被批准的旅游目的地国家一地旅游,此签证在目的地国家境内不可签转,不可延期,持有这种签证的人必须团进团出)。在该备忘录生效之前,对于团队旅游,只有得到中国政府批准的赴美商务、教育和官方考察团可以获得允许。根据该备忘录,合格的美国旅游业经营者被允许与中国某些省份的机构合作,来安排中国休闲旅游团赴美的旅行计划。除此之外,美国旅游机构和公司还可以来华经营自主品牌。从此以后,大量的美国旅行计划得以组织实施。该备忘录所通过的各项措施对增加近年中国游客赴美数量有突出贡献。一些省州层面签署的友好协定进一步增进了这种合作关系。

四、中美旅游业合作的主要障碍

近十年来,虽然中国赴美游客数量有了显著提高,仍有许多实质性问题阻碍中国居民赴美进行商务访问或休闲旅游。与此同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仍有差距,中国旅游业现有基础设施和制度

仍然无法满足美国游客访华人数增长的预期和需要。

1. 获得赴美签证的困难

中国游客在计划赴美旅游时,公认其最难的部分是获得签证。首先,拒签率非常高。根据调查¹³,近十年来平均拒签率保持在15%,2004年达到了22.6%的高峰。其次,面签的等待时间太长(见图表6),影响了中国游客的旅行计划和工作安排¹⁴。再次,仅在很有限的几个城市安排面签。对一个有13.3亿人口的国家,美国政府仅在其五个城市设立了签证中心,相比之下,英国在12个城市设立了签证中心(见图表7)。为了参加一个数分钟的面试,许多签证申请人不得不做长途旅行,花费一笔不小的开支。更有甚者,不少中国游客在美国海关和移民局接受安检时有过不愉快的经历,这也会影响他们再度赴美旅游的意愿。

2. 中美入境签证的有效期均较短

中美签证有效期较短给商务旅行者、学生和游客带来了不便。由于中国政府目前仅为美国人实行签发一年有效期的签证,基于对等原则,美国也

13 孙侃,《中国内地赴美商务签证疑难问题综合调查》,《出国与就业》,2007年第3期。

14 2012年美国政府引入了改善签证审批的措施,在本章稍后部分有详述。



只为中国居民签发有效期一年的签证。尽管美国政府希望能够签发有效期更长的签证，中国政府并未积极响应这一请求。

3. 对在华美国旅游机构的监管规定

2009年之前，中国政府对外资旅游企业在华最低投资和商务活动实施了严格的限制。尤其是，这些企业不许经营境外旅游业务。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某些公司还抱怨其旅游机构被要求使用中国国有的计算机机票预订系统。由于中国的外资产业指导目录“鼓励类”名单中还未包括旅游及相关服务业，美国旅游公司担心中国的政策会将其一直置于市场中的不利地位，为两国的旅游业充分合作带来困难。

与此相反，在美国，外国旅游公司在市场准入和商业扩展方面没有受到任何限制。美国贸易代表柯荣 (Ron Kirk) 因此要求中国政府履行允许合资公司进入旅游及旅游服务业部门的承诺和进一步开放市场¹⁵，放宽对美资企业直接投资中国出境旅游市场的限制，在两国间游客人数快速增长时能增进合作。

4. 中国需要实现规制和管理框架现代化并改善旅游基础设施

中国缺乏一个综合性的管理框架来推广好的旅游措施以及协调不同旅游部门，中国旅游业相关的法律法规也尚在制定过程中。对旅游业经营者不法行为的法律责任和罚款不明确并常常失效，这种状况无助于建立促进高品质服务发展的环境¹⁶。

大部分美国游客通常只游访少数几个热门的中国名胜。由于中国目前的旅游基础设施尚有待完善，美国游客会轻易忽略其他一些地方的历史或自然景观，这减少了他们在中国的停留时间。除了道路、酒店、饮用水和卫生间等旅游硬

件基础设施需要完善外，像高质量服务等软件基础设施也需要进一步提高。

五、近期的进步

2012年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关于中国非移民签证审核执行能力增强40%的行政令，并且要求80%的非移民签证申请者在登记申请的三周后得到面试安排。2012年3月向美国参议院提交的《通过提振旅游创造就业》(“Jobs Originated through Launching Travel (JOLT) Act”)提案提出，美国应当给中国游客签发更长停留期限的签证。在2012年5月公布的《国家旅游业战略》报告中，美国旅游业竞争力专责小组提出了美国政府为解决在华签证面试工作积压近期应采取的措施，包括增加签证审批人员数量和增加面试窗口等。根据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的说法，除了旅游高峰期之外，随着近期签证申请流程的改善，一般等待时间已缩短到一周¹⁷。这些都是向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步伐。但是，由于现有或潜在的申请数量之多，要克服在吸引中国游客过程中的各种困难，还需要更多努力。

就中国方面而言，2001年加入WTO后，中国逐步开放旅游和旅游服务业市场的程度，实际兑现超过承诺。比如，2009年国家旅游局公布的旅游机构管理条例中明确指出，外资企业的资本金要求享有同等的国民待遇。同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快旅游业发展的意见指出，中国政府将在开放外资企业经营出境旅游业务方面进行试点¹⁸。2010年，中国国际旅行社和美国运通 (American Express One) 合办了一家旅游机构，成为最先建立的三个中外合资旅游机构之一。

中国旅游业有关部门已开始重视行业发展

15 “科克就开放美国在华旅游业务对中国施压”，美中贸易内幕 (2011)
16 人民日报在线 (2012)，“中国考虑根除六个旅游法律漏洞”

17 美国国务院 (2011)，“骆家辉大使在华提供第100万签证：等候时间减少到一周”

18 另外两间合资公司是TUI中国 (中德合资)，和JTB新世纪国际旅游 (中日合资)

中的障碍并着手解决。中央政府已开始致力于立法工作,准备颁布旅游业的全国性法律法规¹⁹。一些地方政府,如山东和海南,已实施了符合其市场与社会发展情况的法规。比如,2010年山东省颁布的旅游行业条例明确规定了监管者、旅游业经营者和游客的权利与责任,并且引入了保护员工权益条款。

六、促进中美旅游业发展的共同利益

把握中国游客赴美境外游的商机可以为美国经济注入新的活力,尤其有利于增加那些热门旅游地区的就业。根据美国旅游观光办公室的预测²⁰,在2011-2017的六年间,中国赴美游客人数将以23.7%的平均年增长率从110万人次增至390万人次。考虑到在2008-2011的三年间,中国经济在受到全球经济减速的不良影响,使中国游客赴美旅游需求未恢复到正常水平的情况下,其平均增长率都能达到30%,美国旅游观光办公室的预测实在是太保守了。

随着中国中产阶级的不断发展壮大及其税后收入的快速增长,其对长途旅行的需求进入了高速增长时期。但是,其增长绩效仍依赖于美国政府对签证政策和申请程序便利程度的改善。本研究指出,美国应确定更高的中国游客入境旅游增长率目标。中国境外游客访美人次预期在十年后增加到573万,占中国境外游客总数的3.1%。如果签证和其他安排可以变得更便利,在2022年中国游客数量达到1,000万应成为合理的目标²¹。这意味着从2011年到2022年间的年均增长率约为22.5%。

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观点,每65个游客可以为美国旅游及相关行业创造一个工作岗位。

由于中国游客的人均消费约高出其他国家游客,每17个中国游客的消费总和就够为美国创造一个工作岗位。因此,1,000万中国游客就意味着为美国经济产生610,000个旅游部门工作岗位²²。

中美双向旅游促进活动也对中国经济带来显著利益。中国出入境旅游将得到更快发展。在未来的十年中,更多的中国居民可以享受到美国提供的优质服务。这些旅行可以开阔中国游客的眼界,丰富经历。

同时,在2007到2012年间,美国赴华游客人数保持着2.2%的年均增长率。尽管中国占美国居民出访亚洲总人数的21.6%,2011年中国在美国居民的出国旅行名单上仅排列第九。如果中国在旅游业基础设施和提高服务质量标准上有更大的投入,美国访华游客增长率还可以更高。服务业的发展在中国的“十二五”规划中占据了优先位置。推广旅游业还可以为中国的许多部门创造服务业就业机会。

目前,130,000名中国学生在美国求学,与此同时有30,000名美国学生在中国就学。两国致力于在未来五年内将来华求学的美国学生人数提升到100,000名。这一学生交流活动将会真正成为两国经济发展和就业方面的关键和直接的助力。在美国的外国学生能和游客一样增加国内累计需求。相对于中国游客而言,中国学生日消费能力不高,但年消费则大的多。假设来自中国的海外学生每年有100,000名,每名学生平均在美逗留四年并假设他们每年平均消费五万美元,这意味着每年的总消费支出已达200亿美元,该数字足以新建超过136,000个本土就业岗位。

最后,中美双向旅游可以提高两国间的信任和共识,加强两国人民的文化和交流。这将为未来其他领域的进一步合作和信任创造有利条件。

19 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2012),“中国着眼于通过立法发展旅游业”

20 美国旅游观光办公室(2012),“美国的国际旅游预估:2011-2017”

21 详见附件2

22 这种估计的详细方法见附件3



七、香港的经验

在2003年，在港住宿的内地游客仅有850万人次²³。这一数字在2012年已升至3490万人次，差不多是香港人口的五倍，并占香港入境游客的72%。在2011年，在港住宿内地游客的人均消费约为1,054美元，相比其他游客排名最高²⁴。香港处理大量内地游客涌入的经验对其他将面对同样情形的国家有启发和实际意义。

长期以来，中国都对本国人民出境旅游有着严格的限制，访客在香港和内地之间商务或旅游往往是单向的——从香港到内地。但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内地居民在旅游上的限制逐步放松，内地游客赴港数量开始迅速增加。2003年是一个转折点，中国内地实施了允许游客不需要参加旅行团便可以单独去香港游玩的自由行计划，开始只在部分主要城市和广东省实行，逐渐扩大到越来越多的省份和城市。自由行的签证申请程序、访问次数限制、停留期限等限制都逐步放松。当这些措施发挥作用时，内地赴港游客迅速增加。

当前，内地游客对香港意味着购买力，突出表现为大量内地游客频繁光顾香港的那些销售高价手表、珠宝、手袋和化妆品的商店。由于香港临近内地许多南方城市，到香港旅游的手续简便也使得许多内地居民能到香港接受医疗咨询、购买日用品及那些还未在内地发售的流行产品，如手机，以及参加流行歌星的演唱会。内地居民对香港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体现出他们对香港品质保障的偏好，尤其在内地不时出现假冒伪劣商品新闻的情况下。内地游客对香港商品有高需求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内地对某些奢侈品类商品征收进口税，这样一来，香港的奢侈品价格就显得更加便宜。

另外，中国幅员辽阔，手头宽裕的消费者遍布全国。中国市场的特点是消费者更愿意到大城

市去购买合适的商品和服务，而不是商品和服务去寻找消费者。在中国的大城市中，香港是零售业的领头羊。

2010年，旅游业为香港经济创造了约95.6亿美元的GDP和215,100个就业，占香港GDP的4.3%和总就业的6.2%。所占GDP比例低于就业比例，说明旅游业创造更多低技术要求的工作岗位。目前发达国家正经历着经济衰退，中国也处于经济调整时期，旅游业所创造的工作机会仍是香港得以维持低失业率（2012下半年为3.4%）的主要原因。

大量中国内地游客赴港对香港的零售业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对奢侈品。购买者需求的快速增长自然会刺激零售业销售额的相应增长。另外，购买者在港消费行为也体现了迅速增长中的内地中产阶级品位和偏好的变化。由于中国内地不同地区消费者的品位和偏好也有巨大变化，对许多品牌商来说，保证在港销售对理解这些变化非常重要。

香港还被中国内地视作时尚风格的引领者。时尚产品、新产品和许多国际品牌都必须在香港设立分店，做大量的产品广告和推广，以对内地各地富裕起来的消费者建立鲜明的品牌形象。大量奢侈品牌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进军香港。有些在香港设立了地区总部，发挥如战略布局、法律、金融、品牌推广和设计之类功能。还有的品牌，比如欧舒丹、新秀丽和普拉达，则通过在香港上市来增强中国内地消费者心中的认同感。

由于中国内地家庭收入的增长和旅游业限制的不断开放，中国内地出境游客人数将持续快速增长。香港近年来的经验与日本上世纪80、90年代爆发的旅游潮相似，预示着国际零售业尤其是高端品牌的美好前景。随着购买者的涌入，这些巨变将逐渐发生。

但大量涌入的内地游客也带来新的挑战。香港居民曾担心内地游客会带来高犯罪率和非法移民。随着内地和香港在移民和执法机构方面的合作不断增强，这些问题最终得到了有效

23 这一数字不包括一日游的内地游客

24 “2011年香港旅游业的统计评论”，香港旅游发展局，2012年6月

控制。而且由于近年来内地收入的不断上升，几乎没有证据说明内地游客导致了犯罪率的上升，也没有出现逾期停留多于其他地区游客的情况。香港当前面临的问题是，内地游客需求旺盛导致许多服务于本地市场的零售商租金也随之提高。内地居民对许多日用品的大量需求也会导致产品短缺，如2012年的新生儿配方奶粉事件。为了解决好这些问题，内地与香港政府部门正加强合作，调整放宽内地移民限制步伐，以解决好平行贸易运营问题。

八、我们的建议

在未来的几年，中美双向旅游的发展潜力究竟能否有效挖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政府所创造的政策环境。我们的研究显示，如果实施必要的政策调整，中国赴美游客人数可以发生量级的飞跃。2022年，美国实现每年吸引上千万中国游客的目标都是很现实的。近期美国政府改善签证程序的措施就很鼓舞人心，但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工作。

为了保持美国游客人数增长，中国还需进一步加强行业规范管理和基础设施建设。两国都应探寻能够推动双边直接投资、实现旅游业不断增长的方法。

1. 两国签证程序需要更加便利

为了满足中国赴美游客快速增长的需求，美国应加快加大努力，进一步拓展签证程序的容量空间。建议美国政府增加签证中心的数量并在签证中心聘用更多人手。为使签证程序更加便利，还要跳出有思维模式的条条框框，如可以采用录像面试和友好地使用中文。

2011年，根据美国旅游协会的报告《准备起飞》中的描述，如果改善签证政策能够重新回到美国曾有的全球海外旅游份额（如2000年的17%），那么，2020年预计能比2010年多创造出

130万个工作岗位，累计出口额可达3,900亿美元，十年间能够为美国经济带来8,590亿美元的累计额外产出。发掘中国旅游市场的潜力是实现这个预期的关键所在。

同样的，本报告也建议中国政府简化并加速签发中国旅游及学生签证。此外，改善签发商务签证的程序尤其重要。

2. 延长相互间的签证有效期

为了获得更多入境旅游的经济收入，美国一直鼓励中国政府考虑将签发给美国游客的签证有效期延长至一年以上。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说过，美国愿意为中国商务、旅游和留学签发五年期签证，并且已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同等要求。延长签证有效期可以鼓励两国间有更多互访和更好交往。建议两国将签证有效期先延至五年，然后考虑延至十年，并最终对双方国民实现免签。

3. 改善旅游业基础建设和规范

要升级为最受国际游客欢迎的世界级目的地，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尽管近年来已引入许多积极的促进措施，中国仍需要做更多努力和推动更彻底改革。比如，2011世界经济论坛（详见附件4）发表的《旅游业竞争力报告》中指出，中国应在中西部地区改善卫生设施，引入干净饮用水系统，进一步发展航空和公路交通的基础设施，改善酒店设施，引入因特网，提升为外国游客提供的服务质量，加大对旅游从业人员的培训力度和投入。此外，中国也可以考虑与美协商开放天空的航空协议。

两地游客数目激增的同时，中国两国之间的跨洋航班客运能力可能变得不足。建议中国两国政府的民航管理部门增加两国跨洋航班次数及服务点，特别是主要城市之间的直航。两国的航空公司需获得互惠的经停权，以促进双边旅游发展。例如，美国航班应该可以经停北京，允许乘客下落和搭乘，然后继续飞向西安。同样的，中国航班也应该可以经停檀香山后继续飞往旧金山。



同时我们也建议美国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美国的餐饮业评估是否需要改进及扩大相应的基础设施,例如机场、酒店客房等等,以满足未来十年中国游客潮的需要。此外,为了满足来自中国游客的新需求,相应行业也需要进行更多的员工培训²⁵。

4. 推广跨国旅游业投资

适当的诱因能有助两国开发互利的商业机会,鼓励两国间境外直接投资有助于实现旅游业发展所带来的利益。为鼓励外资公司进入出入境旅游市场,应允许在华建立更多的合资旅游公司。中国政府也应鼓励企业增加赴美直接投资,并提供外汇、保险和信贷等方面的支持。

附件1

未来十年中国的新一代游客²⁶

波士顿咨询集团和前瞻公司&TUI智库在各自的报告中都强调了出境旅游市场的发展潜力,以及未来中国游客偏好的多样化。

中国出境旅游市场的价值预计将从2010年的3,210亿人民币提高到2020年的15,440亿人民币,年均增长率为17%。同期,中国国际游客数量将保持年均增长10%。中国的出境旅游市场预计将在2020年增长到三倍于日本的规模。届时,中国将有2,000万人次的长途旅行。2020年甚至更早,韩国和日本约25%的国际游客都将来自中国。未来十年,中国也将成为北美的第三大入境旅游来源国。至于欧洲,中国将占其非欧盟国家入境游客数量增长的一半以上。

中国城市化、数字化、个性化及其他大趋势,都将改变其出境游客的消费模式。据估

计,2016年中国游客的需求偏好将明显不同于今天的中国游客。一些需求不会随时间而变化,如初次旅游的人会想游览名胜景点。除此之外,世界各国可以为未来的中国游客做更好的准备,届时他们已成为旅游常客。他们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人群:以中产阶级年轻人为主的探险家;热爱大自然和新鲜空气的休闲者;用旅行来丰富知识的鉴赏家,以及用旅行来打破日常生活规律,更加追求自我的梦想家。这类有经验的游客大多数将从被动的假期接受者转变为假期的创造者。

尽管中国旅游业的竞争激烈,但从产品尚未完全差异化、服务创新不足、无法满足市场不同人群需求等问题来看,中国旅游业仍处于发展中。如相比其他收入阶层来讲,富裕的游客们对旅行社策划的团队游并不满意。此外,很多中国游客抱怨跨国公司的高级酒店无法提供满足其预期的各种服务。

中国旅游业的现状是,旅游业需求在不断增加,但游客尚缺乏选择多样性和高质量服务。这一现状为许多公司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先发优势,他们将为后来者确立规范。除了为中国的大城市提供服务外,这些公司也被鼓励为迅速增多的中小城市的中产阶级游客服务。如果加大对消费者调查的投入,他们将能够在中国游客中打造象征信用和价值的知名品牌,还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引导他们的消费习惯。

附件2

中国出境游和赴美旅游人数的预测

熊艳艳²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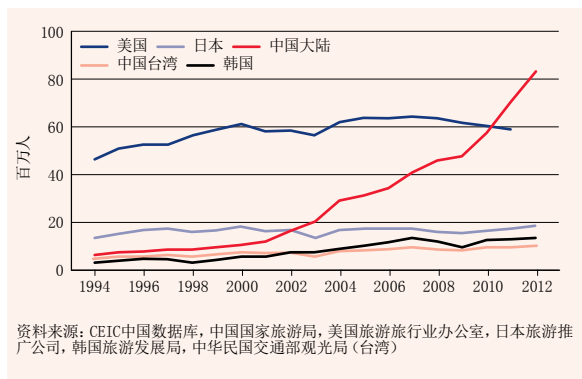
1. 每年出境旅游的中国大陆游客人数出现了大幅飞跃,从2000年的1,050万人次迅速增长到2012年的8,300万人次,年均增长率达19%。相比之下,

²⁵ 进一步细节请参见本章节末的附件1

²⁶ 这个附件是根据中国出境旅游市场分析的总结,名为“起飞:中国的境内外旅游业”,波士顿咨询集团和前瞻公司&TUI智库(2012),“2017年起在欧洲的新一代游客”

²⁷ 作者是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图表8: 部分经济体出境旅游总人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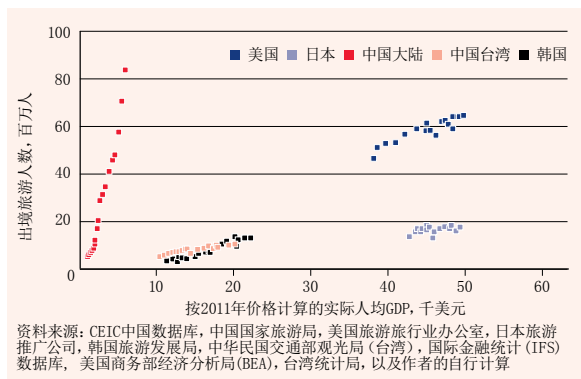
同期每年出境旅游的日本和美国游客人数基本固定, 韩国和台湾的增长率则分别为8%和3%。

2. 哪些因素驱动了出境游的增长? 实际人均GDP也许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日本和美国都曾长期拥有较高的实际人均GDP, 因此两国每年出境游的人数可能已达到了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中国大陆实际人均GDP在这段时期内的年均增长率达8%到9%, 因此其出境游人数以每年高达两位数的百分比增长也并不奇怪。图表9显示了出境旅游人数与实际人均GDP之间的关系。如该散点图所示, 每年出境旅游人数与实际GDP之间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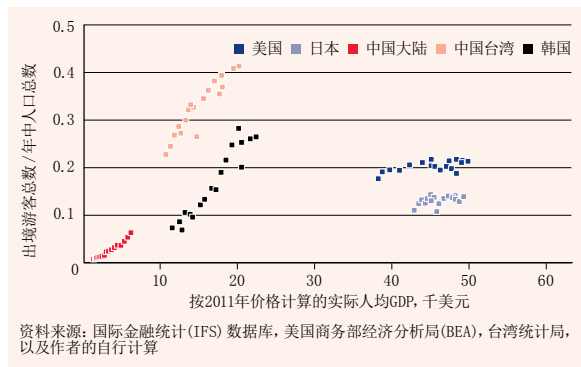
3. 然而, 在实际人均GDP相同的情况下, 人口更多的国家或地区出境旅游的游客总数也会更多, 因此有必要控制人口规模。不同经济体中出境游客的比例相差很大。2012年, 中国大陆年度出境游客人数占其人口总数的6.14%, 而日本约为13%, 美国约为20%。图表10中的散点图表明了该结果。毫无疑问, 年度出境游客总数比例和实际人均GDP之间也具有正相关关系。

4. 影响出境游客人数比例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该国或地区的面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面积越小, 游客就更有可能去该国或该地区以外的地方旅游。对美国和中国大陆来说, 国内旅游的选择很多; 而对香港这样的地区而言, 几乎所有的旅游都是出境的。因此, 不管中国大陆的实际人

图表9: 出境旅游总人数与实际人均GDP之间的关系



图表10: 出境游客总数占年中人口总数的比例与实际人均GDP之间的关系



均GDP上升到多高, 出境游客占其总人口的比例也不太可能达到韩国和台湾的水平。这一比例不太可能会超过20%。

5. 我们可以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做一个简单的回归分析, 以年度出境游客比例作为被解释变量, 并分别以实际人均GDP及其自然对数形式作为解释变量。估计结果汇报在图表11中。在以实际人均GDP的水平值作为解释变量的回归方程中, R平方值最高。该变量的估计系数为0.0113, 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说明按2011年价格计算, 中国大陆的实际人均GDP每增加1,000美元, 其年度出境游客的比例将上升1.13%。如果2022年中国大陆实际人均GDP较2012的水平翻倍, 按2011年价格计算, 也就是增长6,000美

图表11: 中国大陆出境游客总数占年中人口总数的比例对实际人均GDP的OLS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出境游客总数/年中人口总数	
	(1)	(2)
截距项	-0.0123 (0.0015)	-0.0107 (0.0032)
实际人均GDP	0.0113 (0.0006)	
实际人均GDP的自然对数		0.0330 (0.0034)
R平方	0.978	0.910
样本量	19	19

资料来源: 作者的预估
注: 图表11中所有估计系数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中是稳健性标准误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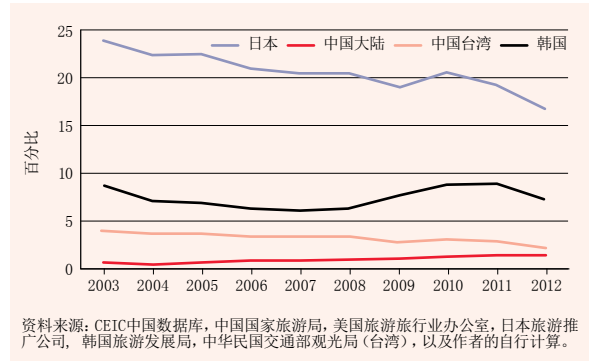
元,那么2022年出境游客人数占人口总数的比例将达到12.92%(6.14%+6.78%)。预计到2022年,中国大陆人口将达到14.14亿,这意味着出境旅游人数将达到1.827亿。2012年至2022年间,出境游客人数年均增长率为8.2%,较预期的同期实际人均GDP增长率略高。

6. 出境旅游的游客中,有多大比例会选择前往美国? 图表12列出了中国大陆、日本、韩国和台湾选择前往美国的游客人数占出境游客总人数的比例。有两个重要因素会影响该比例:是否需要签证和实际人均GDP。日本公民已经享受了一段时期赴美免签证的待遇,这也是其赴美游客人数占其出境游客总人数的比例大大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原因之一。韩国公民在2008年获得了赴美免签待遇,其赴美游客人数占出境游客总人数的比例从6.3%增长到2011年的9.0%。²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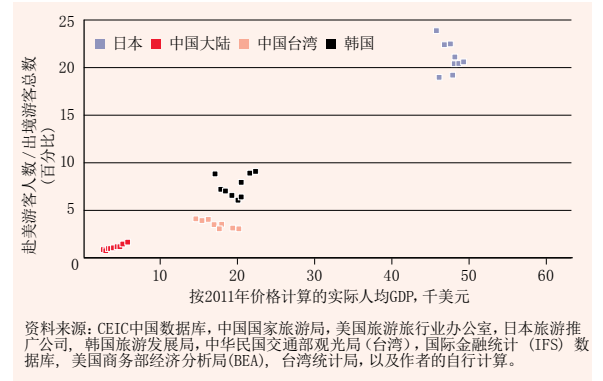
7. 实际人均GDP也是影响赴美游客比例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赴美旅游比前往一个临近的国家或地区旅游更加昂贵。在图表13中,我们用赴美游客人数比例对实际人均GDP作图,可以直观地看出实际人均GDP的影响作用。如图所示,它们之间确实具有长期的正相关关系。当然,每年

²⁸ 图4中,2012年韩国的数据为7.6%,这未必完全准确。因为这是根据前11个月的数据做出的估计,但它仍高于2008年的数据。台湾居民在2012年11月获得了赴美免签的待遇,由于时间尚短,当年的数据还未反映出赴美免签所带来的显著增长作用。

图表12: 赴美游客人数占出境游客总数的比例



图表13: 赴美游客人数占出境游客总数的比例与实际人均GDP之间的关系



也可能发生一些波动,这取决于本国或本地区的宏观经济形势。

8. 我们可以再做一个简单的OLS回归分析,将赴美游客人数占出境游客总数作为被解释变量,实际人均GDP及其自然对数形式作为解释变量。估计结果见图表14。和之前的分析一样,我们主要讨论R平方最高的回归方程(3)的估计结果。该结果表明,按2011年价格计算的实际人均GDP每增加1,000美元,赴美游客的比例就将增长0.264%。如果2022年的实际人均GDP在2012年基础上翻一番,即增长6,000美元(以2011年价格计),那么赴美游客人数占出境游客总数的比例也将从1.550%增长到3.134%。我们之前已经预测,到2022年中国出境旅游的总人数将达到1.827亿,因此中国赴美游客的总人数预计会达

图14: 中国大陆赴美游客人数占出境游客总数的比例对实际人均GDP的OLS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赴美游客人数/出境游客总数			
	(1)	(2)	(3)	(4)
	0.0004	-0.0028		
	(0.0009)	(0.0016)		
实际人均GDP	0.0025		0.0026	
	(0.0002)		(0.0001)	
实际人均GDP的自然对数		0.0099		0.0080
		(0.0012)		(0.0003)
R平方	0.944	0.903	0.996	0.991
样本量	10	10	10	10

资料来源: 作者的预估
注: 截距项的估计系数在10%的显著水平上不显著。实际人均GDP及其自然对数形式前的系数则在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括号中是稳健性标准误差。

到573万。与2012年的129万相比, 年均增长率将达16.1%。不过, 如果中国公民在这10年中获得了赴美免签的待遇, 根据韩国的经验, 赴美游客人数占出境游客总数的比例应该还会增加1.3%到2.7%。那么2022年中国赴美游客的总人数预计将会达到810万至1,070万之间。

附件3

入境游对美国就业市场影响力的评估

根据美国商务部的估计, “每增加65个国际游客来美旅游所带来的出口额足以支持一个旅游业相关的工作” (白宫, 2012)。这个数字是用2010年旅游业相关总产出和就业数据粗略估计的。商务部的经济分析局估计, 在部门间劳动边际生产率相等和其他基本劳动经济学定理符合的情况下, 游客每消费147,000美元就能增加一个工作岗位。2010年, 约有6,320万游客来美, 他们为旅游及相关产业带来了1,425亿美元的消费。平均每个国际游客在美消费约为2,255美元, 因此, 每65个国际游客的需求就能在旅游及相关行业创造一个工作岗位。

而中国游客人均在美消费远高出平均值, 其原因部分是他们停留时间较长, 部分是他们购物

消费支出更高。据估计, 典型的中国游客每日花费大约为750美金。假设平均逗留美国14天, 这意味着大约每一中国游客在美国平均花费9000美元 (剔除到达日和出发日不计算)。这个粗略估计指出, 每17个中国游客就可以为美国创造一个工作岗位。

假设在预测的时期, 中国游客在美人均消费的增长, 美国通胀率和生产率没有对基准年就业估算产生巨大的影响, 那么, 届时1,000万中国游客将为美国经济产生610,000份工作。

陈锡康教授²⁹关于中国游客为美国增加就业的投入产出分析指出, 如果将乘数效应纳入考量, 1,000万中国游客能为美国产生780,000份工作。保守起见, 这里用的是BEA数据。

附件4

世界经济论坛的《旅游业竞争力报告》

2011年世界经济论坛 (WEF) 发布的《旅游业竞争力报告》, 分析了139个经济体的影响旅游业竞争力的不同因素。图表15和16重点展示了中美之间的指数比较。这份报告强调, 中国需要加强的是政策环境、卫生健康、运输和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第一, 中国可以考虑与美国进行打开天窗式的协商。美国在“双边航空服务条款的开放程度”这一项排名18, 远远高于中国的116位。即美国将从航空开放中可能获益更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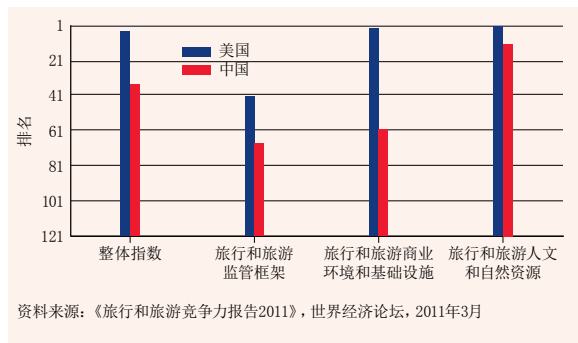
第二, 中国政府应当改善中西部城市的卫生间和饮用水源设施。

第三, 从机场密度和公路质量反映的多项指标来看, 中国需要进一步推动陆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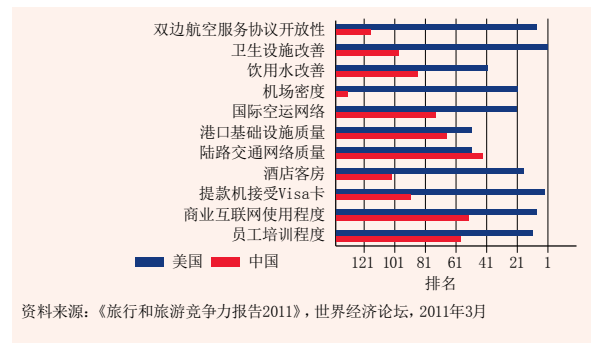
第四, 酒店和通讯装置, 包括因特网、手机网络等, 应当在欠发达地区得到改善。

29 详细请参阅报告第二部分的第八章

图表15: 2011年旅游业竞争力指数



图表16: 2011年旅游业竞争力指数,部分指标



最后,为了提升接待外国游客的服务质量,中国应当在培训教育旅游业劳动力方面投入更多。

参考文献

中国美国商会(2012),“签证政策”,《2012年美国在华商务白皮书》,北京,中国

美国经济分析局(2012),“2003-2011年间美国旅游卫星帐户”,华盛顿特区:美国商务部

陈锡康(2013),“投入产出分析”(未发表文章),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百人会(2011),“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演讲重点”,摘要:第四届大中华会议,网站来源: <http://www.committee100.org/Announcement/HK-Executive-Summary-29DEC2011-FINAL.pdf>

香港旅游发展局(2012年):“2011年香港旅游业的统计评估”,来自http://partnernet.hktb.com/en/research_statistics/research_publications/index.html

美中贸易内幕(2011),“科克就开放美国在华旅游业务对中国施压”,新闻摘要(2011年3月16日)

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2012),“中国着眼于通过立法发展旅游业”,网站来源: http://www.npc.gov.cn/englishnpc/news/Legislation/2012-08/28/content_1734343.htm

旅游观光办公室(2012),《2011市场报告:中国》,华盛顿特区:美国商务部

旅游观光办公室(2012),《美国的国际旅游预测:2011-2017》,网站来源: <http://tinet.ita.doc.gov/view/f-2000-99-001/index.html>

旅游观光办公室(2012),“美国旅游行业的进出口和贸易差额:2010”,华盛顿特区:美国商务部

旅游观光办公室(2012),“2011年美国居民出国旅游”,华盛顿特区:美国商务部

旅游观光办公室(2012),“2011年美国居民到亚洲旅游”,华盛顿特区:美国商务部

人民日报在线(2012),“中国考虑根除六个旅游法律漏洞”,网站来源: <http://english.people-daily.com.cn/90782/7948582.html>

中国国务院 (2009), 《国务院关于加速旅游业发展的几点意见》, 英文版本可见于<http://www.visithunan.org/InvestinHunan/DouZiZhi-Na/145.shtml>

孙侃 (2007), 《中国内地赴美商务签证疑难问题综合调查》, 《出国与就业》, 2007年第3期.

波士顿咨询集团 (2011), 《起飞: 中国的境内外旅游业》, 网站来源: <http://www.bcg.com/documents/file74525.pdf>.

美国国务院 (2011), “骆家辉大使在华提供第100万签证: 等候时间减少到一周”, 网站来源: <http://www.state.gov/r/pa/prs/ps/2011/12/178910.htm>

美国旅游顾问委员会 (2011), 关于2011年2月1日会议的“信函与建议”, 网站来源: http://tinet.ita.doc.gov/ttab/docs/02012011_letter.pdf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和世界旅行及旅游协会 (2012), “签证便利对G20经济体创造就业的影响”, 网站来源: <http://www.e-unwto.org/content/pr522h/fulltext.pdf>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 (2012), “UNWTO旅游业重点, 2012版”, 马德里, 西班牙: 世界旅游组织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 (2011), “UNWTO旅游业2030年目标”, 马德里, 西班牙: 世界旅游组织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 (2000), “旅游业展望2020”, 马德里, 西班牙: 世界旅游组织

美国旅游业竞争力专责小组 (2012), “国家旅游业战略”, 华盛顿特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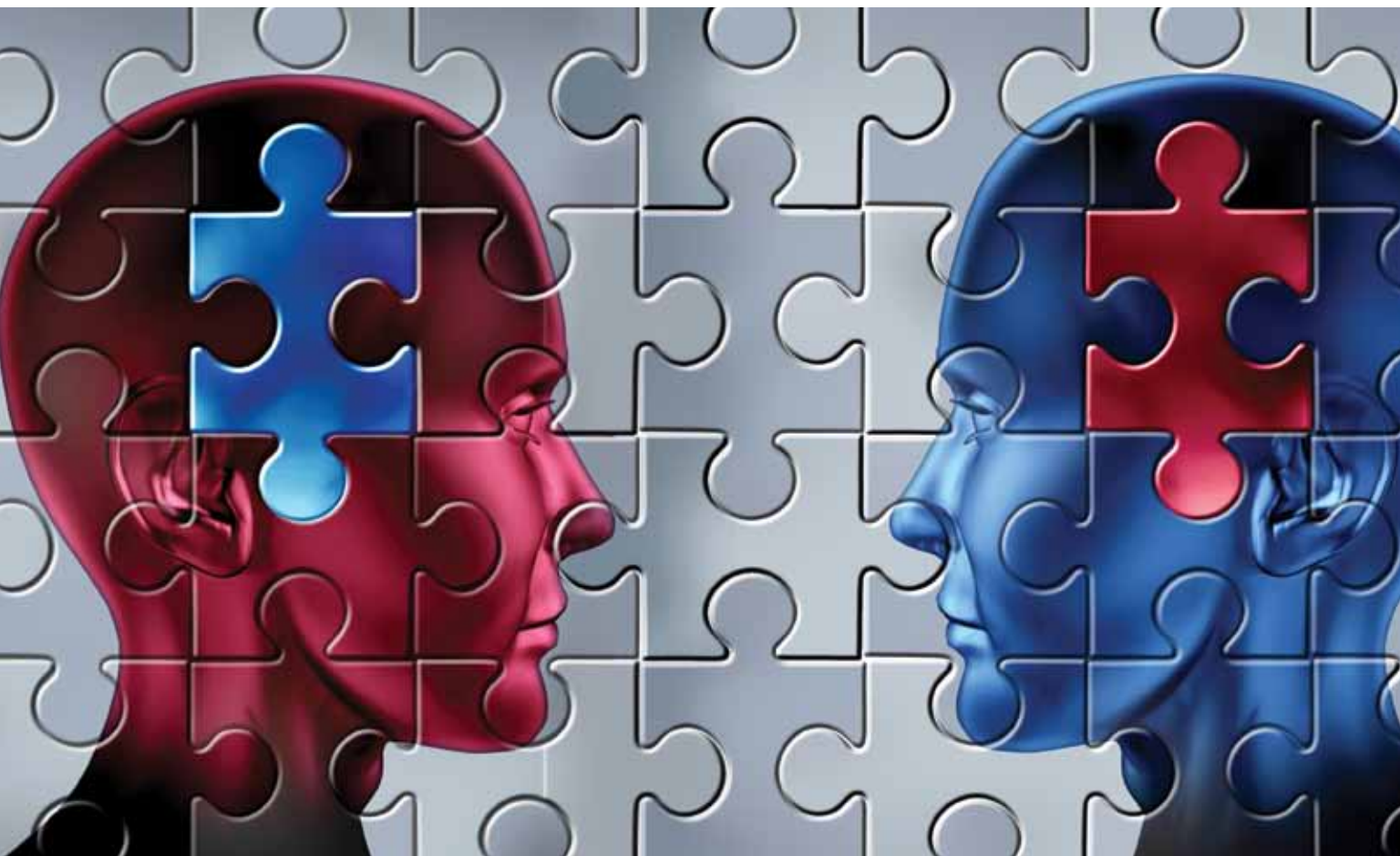
美国旅游协会 (2011), “准备起飞”, 华盛顿特区, 美国

白宫 (2012), “总统发表提振旅游业战略的演讲”, 网站来源: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2/01/19/remarks-president-unveiling-strategy-help-boost-travel-and-tourism>

白宫 (2012), “我们不能等: 总统奥巴马为提振美国旅游业付诸行动”, 网站来源: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2/01/19/we-can-t-wait-president-obama-takes-actions-increase-travel-and-tourism>

世界经济论坛 (2011), 《2011旅游业竞争力报告》, 日内瓦, 瑞士

前瞻公司&TUI智库 (2012), “2017年起游欧洲的新中国游客”, 网站来源: http://www.z-punkt.de/fileadmin/be_user/D_News/D_2012_06_Newsletter/New_Chinese_Tourists_in_Europe_from_2017_en.pdf



第十二章

中美科学与技术合作

薛澜

中国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兼院长

丹尼斯·西蒙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国际事务副校长

参与撰稿人:徐占忱 麦家驹

摘要

——▲ 二十世纪下半页以来，全球范围内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美国以其雄厚的——▲ 综合实力，强大的基础科技研发及制造能力，合理的科技人才梯队，推动世界历经一次次科技革命。中国作为东方古老的文明大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余年里，依托庞大的市场，通过向先进国家学习，吸收转化，迎头赶上。美中两国在科技创新领域走出了独特的发展之路，各具自身优势。“高科技”同“大市场”的相遇形成美中科技产业合作的巨大空间。自1979年建交以来，美中两国的科技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不乏能源领域、农业科技、无线通讯技术等方面的亮点。展望未来，依托美中两国科技大战略，在深化合作内涵及丰富合作模式上仍大有可为。美国企业凭借成熟的开拓经验在中国市场可

以进一步提升投资回报率，中国可以促进科技发展，加速产业升级，形成和谐双赢的局面。更重要的是，科技合作有助于美中两个大国在清洁能源、粮食问题、气候变化等一系列全球性公共问题上达成共识，更有效地承担国际责任。当然，不容回避的是，美中科技合作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障碍（如知识产权问题、信息安全及由此引发的限制出口、贸易壁垒等问题），需要两国共同的智慧协商解决。

本文的逻辑起于分析比较美中两国科技发展现状、重点和趋势，剖析两国发展的各自优势；再结合三十多年来两国科技合作的成果、经验，加以能源领域成功合作的示范效应，展望未来可能的合作图景；并探讨合作过程中的摩擦与争议，提出综合性的政策建议。



中美科学与技术合作

一、当前美中两国科技发展现状及趋势

当前美国科技发展总体状况： 传统优势，全球领先

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始终引领全球科技的发展方向，在科技人才、资金投入等诸方面都居全球领先地位。尽管目前面临全球经济形势下行以及政府赤字居高不下等不利因素，美国依然逐步加大对科技研发及相关制造业的资金投入。根据2010年发表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发展报告》，美国在科技研发投入和科研人才成果的优势保持世界首屈一指，遥遥领先其它国家和经济体。奥巴马政府更是希望将科研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从2.7%提升至3%，重点投入新兴能源尤其清洁能源的研发上^{1, 2}。美国政府相关具体措施包括：

促进美国制造业提升综合竞争力。根据2011年政府提出的“先进制造业协作”计划(Advanced Manufacturing Partnership)，2013年联邦财政拨款额达22亿美元，给美国国家标准与科技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能源部(Department of Energy)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用于制造业研发。

缔造清洁能源经济，面向未来创造就业。清洁能源领域被认为是支撑美国在全球科技领

先地位的核心产业之一³，得到联邦政府的大力推动和支持。2013年预算超过900亿美元。计划2035年前将清洁能源发电量从目前的40%上下提高到占80%的水平。增加清洁能源领域的基础研发，包括太阳能、风能、环保交通工具、生化制品等。

培养下一代的科技领袖、为未来十年培训十万名科技教师。提升美国未来的竞争力，科技人才是首务，科技精英是关键，而培养人才的教师队伍则是根本。政府计划面向幼儿园至高中12年级(K-12)为未来十年培训十万名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数学(Mathematics)教师(简称STEM教师团队计划)⁴。与此同时，为了弥补美国高科技人才的不足，美国也正在修改移民法，希望能够使科技领域在美国的留学生毕业后更加容易地移民美国。

继续加大基础研发投入，创造技术转型，带动就业市场。二战以来，美国在科技研发投入始终站在全球科技研发的最前沿，2013年政府预算投资1,422亿美元，除了一半左右用于国防研究之外，其它主要用于资助核心科研机构如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美国国家科学基金、能源部科学办公室和美国国家标准与科技所等，并提出创造技术转型，带动就业市场的政策，重点扶持清洁能源、无线通讯技术、先进制造业等提升产业水准，发展转型技术，制造更多就业岗位。但是由于美国的巨大财政赤字及由此带来的“财政悬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发展报告2010：当前世界科学的地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法国巴黎，2010。

2 白宫文件《支持美国创新》，<http://www.whitehouse.gov/omb/factsheet/supporting-american-innovation>。

3 白宫文件《创建明天的清洁能源以及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http://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microsites/ostp/fy2013omb_ee.pdf。

4 白宫文件《准备21世纪劳动力》，http://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microsites/ostp/fy2013rd_stem.pdf。

崖”，2013年的预算能否得到最终的落实仍然是个未知数。

支持生物医药产业。生物医药产业被誉为二十一世纪的朝阳产业，美国在这一领域的投入力度也保持领先，政府2013年预计向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拨款310亿美元用于基础和应用生物医药研究⁵。生物医药领域的科研创新可以大规模地创造就业机会，新型技术的诞生可使该领域的企业迈上可持续性发展之路，给社会带来更多产品和就业机会，在政策、科研和企业间形成良性互动，造福社会，推动新型知识经济前行。

加大对无线通讯技术和信息技术支持力度。无线通讯技术和信息技术在军工、商业及日常生活中应用广泛。美国在商业及经济上继续领跑全球离不开高效稳定的无线通讯技术的大力支持。为此，美国政府提出“全国无线计划”(National Wireless Initiative)⁶，鼓励研发生产新一代支持无线通讯技术的产品，包括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以及相关创新硬件、软件支持科技。目前已有100亿美金投入“无线科技创新基金”，推进前沿技术的研发与应用，这对未来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创造就业机会起着关键影响。

在纳米技术和相关材料工程技术方面领跑世界⁷。加大纳米技术商业化、产品化的力度。措施包括延伸研发链条，加速大规模生产；关注产业界需求，加快商业化进程；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全国设备、条件支撑体系；扶持纳米技术相关的小企业；增强美国在纳米技术领域的

国际化参与程度⁸。

确保军事工业科技继续居全球领先地位。

投资军工技术的研发与生产亦是科技创新的一部分，庞大的军工生产网络体系支持美国武装力量的全球投射，高精尖武器的研制与改良形成美国军事力量的核心，军用品的民用化也是科技创新的重要推力，网络卫星技术的高速发展得益于此⁹。

当前中国科技发展的现状及方向：跨越发展，迎头赶上

近年来，中国政府科技投入的持续增长和支持性的政策制定令世界瞩目。过去十年中国研发强度增加了数倍，中国研发支出以年均20%的速度增长，成为推动亚洲研发支出增长的主要力量。2012年中国的研发投入超过一万亿，研发收入占GDP的比重增加到1.97%，已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中国的科学论文和专利申请也在快速增长。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计划和政策措施，推动中国科技实现跨越发展。

2006年中国政府发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这部纲要是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及加入世贸组织后的首个国家科技规划，为未来十五年勾勒出科技发展的蓝图。纲要提出了到2020年科技工作的指导方针是：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到2020年，全社会研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2.5%以上，创新能力大幅提高，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¹⁰。纲要特别提出要加强自主创新，希望能够加强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减少对国外技术的依赖，为技术发展提供国内知识产权的支持。

5 白宫文件《支持美国创新》，<http://www.whitehouse.gov/omb/factsheet/supporting-american-innovation>。

6 白宫文件《奥巴马总统通过扩大无线接入来赢得未来的详细计划》，<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1/02/10/president-obama-details-plan-win-future-through-expanded-wireless-access>；白宫文件《总统在密西根州马凯特就全国无线网络计划的演讲》，<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1/02/10/remarks-president-national-wireless-initiative-marquette-michigan>。

7 白宫文件《国家奈米科技愿景及战略计划》，<http://www.whitehouse.gov/administration/eop/ostp/NNIstrategy>。

8 National Nanotechnology Initiative Strategic Plan,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2011《国家奈米科技战略计划》，国家科学与技术委员会，2011。

9 白宫文件《支持美国创新》，<http://www.whitehouse.gov/omb/factsheet/supporting-american-innovation>。

10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2006年。



纲要把中国科技发展的核心任务分成了如下几个板块：

重点领域及其优先主题：重点领域是指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防安全中重点发展、亟待科技提供支撑的产业和行业。优先主题是指在重点领域中急需发展、任务明确、技术基础较好、近期能够突破的技术群¹¹。重点领域及其优先主题包括能源、水和矿产资源、环境、农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业、信息产业及现代服务业、人口与健康、城镇化与城市发展、公共安全和国防。

前沿技术：前沿技术包括：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先进制造技术、先进能源技术、海洋技术、激光技术、空天技术。

基础研究：基础研究包含学科发展、科学前沿问题、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基础研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

重点领域及其优先主题、前沿技术和基础研究构成中国未来十年科技发展的总体方向¹²。

在推动产业科技创新发展方面，2010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提出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抓住机遇，明确方向，突出重点，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现阶段重点培育和发展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产业。2012年7月，国务院又出台了《“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提出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年均增长率保持在20%以上，到2015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8%左右的发展目标。

同时，科技体制改革也面临着如何进一步深入的问题。2012年7月6-7日，全国科技创新大会在北京召开。2012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突出了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作用，明确坚持：1) 创新驱动，服务发展；2) 企业主体，协同创新；3) 政府支持，市场导向；4) 统筹协调，遵循规律；5) 坚持改革开放，合作共赢等五项基本原则。文件还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科技发展到2020年的主要目标为，基本建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科技发展规律的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原始创新能力明显提高，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大幅增强，关键领域科学研究实现原始性重大突破，战略高技术领域技术研发实现跨越式发展，若干领域创新成果进入世界前列；创新环境更加优化，创新效益大幅提高，创新人才竞相涌现，全民科学素质普遍提高，科技支撑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大幅提升，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¹³。

这些政策措施的出台，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创新能力的提高与科技事业的发展，推动创新型经济的转型。2010年发布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报告》指出，中国在“十一五”期间科技发展水平与世界科技强国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尽管中国面临着一个高流动性，快速变化的全球创新体系，中国正在稳步朝着到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前进。

但是，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意识到中国在建设创新型国家进程中面临的重重挑战，包括市场环境不尽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尚需进一步加强，中小企业创新融资困难，主要创新主体如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不顺，以及基础研究投入不足¹⁴。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中国坚定不移地继续改革开放的进程，同时，也需要通过深入国际科技合作来加快推动中国科技创新的发展。

11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2006年。

12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2006年。

13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2012年9月。

14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发展报告2010：当前世界科学的地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法国巴黎，2010。

中美科技发展比较：特色与优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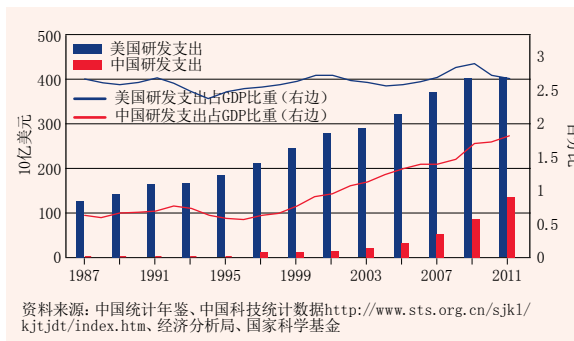
对比中美科技发展的规划与政策，从中不难发现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一面，合作空间潜力巨大。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进一步分析比较中美科技发展的特色与相对优势：

(1) 总体发展实力与投入：美国总体优势与中国的快速追赶

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就开始加强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多年来对科技研发的投入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的相当长一段时间，美国一个国家的研发投入就超过了其它经合组织（OECD）国家投入的总和，为美国的总体科技实力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同时，作为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美国的国家创新体系运行比较有效，大学、国立研究机构、企业、金融机构等在多年的实践当中形成了高效的促进创新的合作模式；美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的法律法规、促进中小企业创新的激励机制、有利于高科技创新的区域环境与氛围等等都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十分优越的制度基础。

中国的现代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在改革开放之前具备雏形。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国家创新体系经历了重大改革，从1985年的科技体制改革，到1999年的科研院所体制改革，到2006年的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中国的国家创新体系逐步走向成熟，科技发展与经济建设有机结合的体制基本形成，促进科技创新的制度环境不断完善，企业正在成为科技创新的投入和执行主体。同时，全社会对研发的投入也在快速增加。1996年全国研发投入占中国GDP比重为0.6%，从1999年之后多年保持两位数字的快速增长。2011年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研发投入国家。2012年，中国研发投入超过一万亿，占GDP比重超过1.97%，其中超过70%的研发投入和执

图表1：中美两国研发支出及其占GDP比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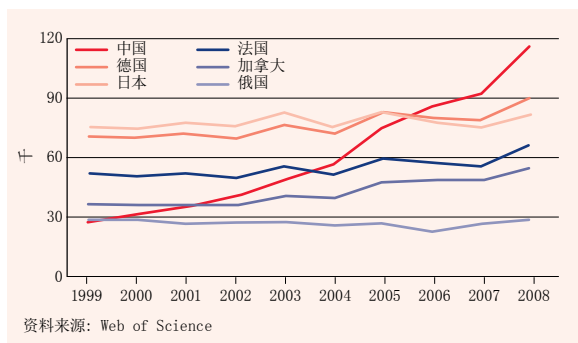
行是由企业完成的。

下图是中美两国从1987年以来25年间研发投入额度和其占各自GDP的比重。从中我们看到，美国在研发投入绝对值方面仍然保持较大的优势，而中国近年来在研发投入增长的速度方面则一直领先美国。此外，美国创新体制相对比较成熟，但改变起来也比较难。而中国的创新体系仍处于不断变革之中，比较容易适应新兴产业发展的需求。两国创新体系的实力与制度设计的差异，为我们促进中美科技合作提供了合作共赢的机会。

(2) 基础研究：美国的雄厚基础与中国能力的不断加强

美国历届政府的科技发展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要保持美国在基础科学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美国高额的研发投入中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始终保持着较高的比例，2009年美国研发投入中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占总研发投入的19%，其中53%是由联邦政府出资投入的。美国的基础研究主要是在研究型大学（53%）和一些国家实验室（15%）中进行。美国研究型大学把基础研究与人才培养有机结合起来，使得美国基础研究在重大科学发现和人才培养方面双双得益。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的半个多世纪以来，诺贝尔奖除文学与和平奖之外的其它基础科学领域的获得者超过半数以上都在美国。

图表2: 各国每年被Web of Science收录的论文数量



中国的基础研究多年来受到投入不足的困扰,基础研究占研发投入的比重多年在5%左右徘徊。近年来,随着“知识创新工程”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计划的实施,中国的基础研究也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中国在重要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数量高速增长。如下图所示,在本世纪初,中国在重要国际期刊发表文章的数量在世界主要科技大国中居后,但从2005年之后,就开始超过除美国之外的其它国家,成为国际期刊文章发表的第二大国家。

中国和美国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比较可以从科技论文产出入手。从国际学术论文来看,高被引用论文、三大名刊和各学科顶级期刊论文是一个国家科学研究质量和水平的重要体现¹⁵。2005-2010年,全世界高被引用论文年均增长4.9%,中国高被引用论文年均增长率为27.6%,中国发表数量为5,264篇(美国为56,299篇),排在世界第7位;2010年中国在三大名刊发表论文145篇(美国为2,538篇),与2005年相比增加了84%。实际上,2010年三大名刊发表论文总量比2005年减少了358篇,中国则是增加了66篇;对于世界各学科顶尖期刊来说,2010年刊载论文总量比2005年只增加了927篇,而中国在世界顶尖期刊发表

论文却增加了3,406篇,2010年中国在顶尖期刊上发表论文5,203篇(美国21,296篇),排在世界第2位,2005-2010年中国在顶尖期刊上发表论文数量年均增长23.3%¹⁶。可以看出,中国在基础研究方面的进展不但体现在科技论文发表的总量上,在体现质量的高水平期刊上,中国学者发表的论文也取得了高速增长。但与美国相比,中国高被引用论文、三大名刊论文和各学科顶尖论文只是美国的9.3%、5.7%和24.4%,仍然有相当大的差距。为了缩小这一差距,中国研究人员必须进入主流的跨国合作研究网络,进入知识创造的前沿。

(3) 科技人力资源: 美国高层次科技人才对海外移民的依赖与中国科技人力资源充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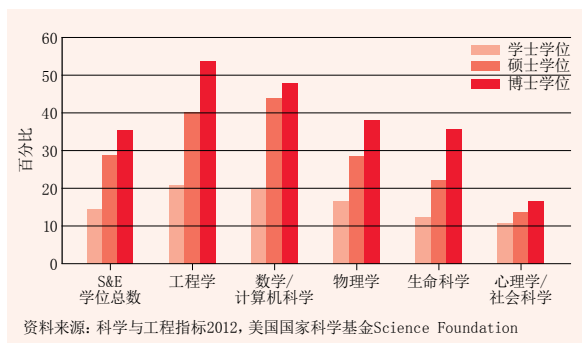
科技人力资源是一个国家科技发展的重要保障。美国科技人力资源比美国总体就业增长更快。在过去25年期间,其数量已经翻倍,达到665万人左右,在美国所有就业中占4.9%¹⁷,尽管少于2000年的5.3%。美国科技人力资源的一个隐患就是高层次的工程科技人才有较高的比例是国外科技移民。下图是美国2012年科学与工程指标(S&E)关于美国2008年科技人才的有关统计。从这个图表中可以看出,在不同的工程科技领域和不同层次的工程科技人才中,外国出生的人才比例相当高。如在工程领域中,超过一半的博士生,40%的硕士生,以及20%的本科生都是在外国出生的。在数学与计算机领域中情况类似。在外国出生的科学与工程博士中,来自中国大陆的比例相当高。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有大批留学生到美国攻读工程科技领域的研究生学位,人数在逐年增长。下图是2000-2010年间中国赴美留学生的一个统计。

15 高被引用论文是以论文发表10年作为统计时间段来计算论文被引用次数,引数次数排在各学科前1%的论文;三大名刊为Cell、Nature和Science;各学科顶尖期刊是所在学科中影响因子最高的期刊,一般说来也是最权威、最重要的学术期刊,根据汤森路透公司出版的《期刊引证报告》,2005年各学科顶尖期刊有157种,2010年各学科顶尖期刊有173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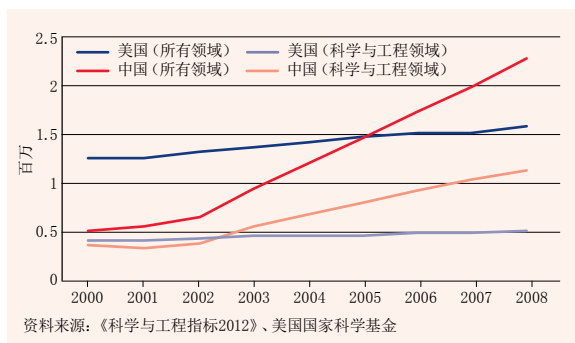
16 贺德方,“中国高影响力论文产出状况的国际比较研究”,《中国软科学》,2011,(9):94-99

17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科学与工程指标2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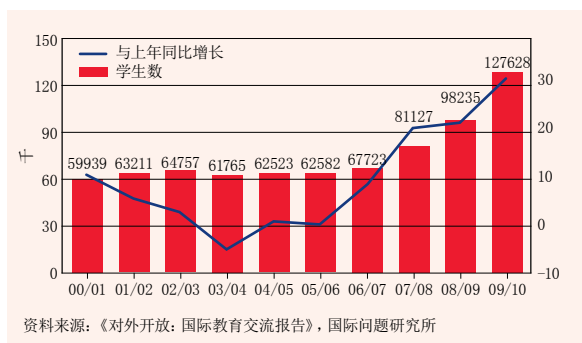
图表3: 2008年美国S&E学位持有人数中的外来人口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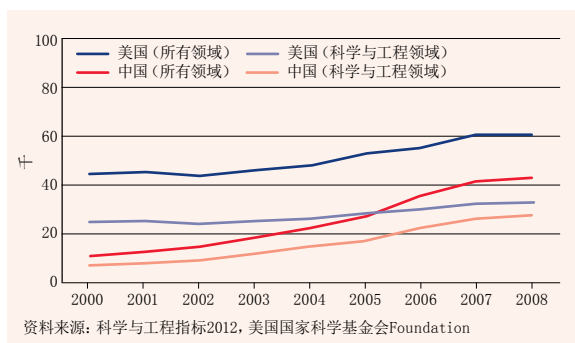
图表5: 美国与中国第一学位授予量: 2000-2008年



图表4: 2000年以来中国赴美留学人数及增长情况



图表6: 美国与中国博士学位授予量: 2000-2008年



图表7: 中国科技人才现状与主要发展目标*

年份	R&D人员(万人年)	R&D研究人员(万人年)	每万劳动力中R&D人员(人年/万人)	每万劳动力中R&D研究人员(人年/万人)	R&D人员人均R&D经费(万元)	R&D研究人员人均R&D经费(万元)
2008	196.5	105.0	24.8	13.3	23.5	44.0
2015	280	150	33	18	38	71
2020	380	200	43	23	50	100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2006年。
资料来源: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与美国相比, 中国高校每年培养大量工程科技领域的人力资源。中国大学所颁发的本科学位人数已经超过了美国大学。1999年的高校扩招政策带来了大学招生人数的快速增长。近年来尽管美国博士学位授予量仍然远远领先中国, 但是中国在科学与工程领域授予博士数量已经与美国持平。

根据中长期科技规划纲要预测, 到2020年中国科技研发(R&D)人员总量由2008年的196.5万人年达到380万人年。R&D研究人员总量将由

2008年的105万人年达到200万人年。每万劳动力中R&D人员和R&D研究人员分别由2008年的24.8人年和13.3人年增长到43人年和23人年(见图表7)。中国将在装备制造、信息、生物技术、新材料、航空航天、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新能源、农业科技等领域建成人才高地。

从以上分析比较可以看出, 中国是科技人力资源大国, 主要依靠自己培养, 但每年都有一部分科技人才到海外求学, 其中部分人在海外定居。美国也是科技人力资源大国, 但其中有相当



一部分高层次人才依靠科技移民，其中也包括很多中国赴美留学人才¹⁸。这些人才通过千人计划、兼职等途径参与中国的研究，很多华裔科学家与工程师参与中国政府赞助的项目，培训中国留学生，成为中美科技交流的纽带。

(4) 空间探测：美国引领世界其他各国

从二十世纪中期开始，美国就在空间探索领域占据了领导地位，卫星发射、载人航天计划、月球和火星探测计划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际空间站（ISS）是美国航天领域最有影响力的成就之一，已发展成多国宇航员共同使用的多用途观测研究平台。另一方面，中国的空间探测能力在过去的十年里取得了稳步发展。中国的载人航天飞行次数近年来持续增长，并在2012年实现了“神九”飞船与“天宫一号”飞行器的交会对接。但是中美两国在空间政策对话、信息共享和联合行动等空间探测领域的合作仍然有限。

(5) 科技消费市场：中国的巨大市场潜力形成“市场激增效应”

在科技消费市场方面，美国的市场比较稳定。而中国人口众多，为科技产品提供了一个潜在的巨大市场。随着中国“中产阶级”的壮大，具有一定消费能力的群体对优质科技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激增，中国GDP的不断提升带动背后庞大的消费市场，从苹果产品在中国的盈利可见一斑。根据苹果最新公布的2012财年第二季度财报显示，苹果在大中华区的营收同比增长三倍，创纪录地达到79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498亿元，约占其总营收的20%。苹果在第二财季每天从中国市场吸金约5.5亿元。苹果财报称，中国对 iPhone 4S 和 iPad 2 的需求很强劲，其中大中华区iPhone销量为去年同期的4倍，Mac销量同比增长超过60%。目前苹果大中华地区共有1,800个Mac产品销售点、1.1万

个iPhone销售点，以及2,500个iPad 销售点¹⁹。由此可见，中国的“市场激增效应”对科技产品消费及应用提供巨大的商机。

(6) 企业创新能力与国际市场竞争力：美国企业的领先地位与中国企业的实力增强

美国科技企业市场开拓能力强，灵活多元，产品符合客户定制需求。美国科技企业在清洁能源、生物医药、信息科技、航空航天、高端制造、军工等高精尖技术产业具备核心竞争力，全球市场占有率领先。2012年12月4日，汤森路透集团根据整体专利数、专利授权成功率、专利组合的全球覆盖率以及基于专利引用的影响力所评选出来的全球百强创新机构正式出炉。美国继续名列榜首，显示出美国科技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领先地位。共有45家美国企业上榜（美国还有两家政府机构上榜）。日本25家，欧洲有21家机构入选，韩国7家。

中国高科技企业近年来成长也非常迅速。2006年以来，中国申请PCT国际专利数量持续快速增长，中国已成为近年国际专利申请量增长最快的国家。2006年中国PCT国际专利申请量居世界第8位，2007年超过荷兰居世界第7位，2008年超过英国居世界第6位，2009年超过法国居世界第5位，2010年超过韩国居世界第4位。2010年中国PCT国际专利申请量12,337件，比上年增长56.2%（见图表8）。很多中国企业，如华为、中兴、中石油等等，在国际专利申请排行榜上也名列前茅。当然，专利的质量而非数量更加重要，国际上仍然存在着对中国专利商业价值的疑问。尽管在知识产权生产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中国仍然是新技术的主要进口国，而美国则保持了在相关商业新知识生产方面的领先地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09年中国在知识产权方面净支出100亿美元，美国净收入640亿美元。

¹⁸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发展报告2010：当前世界科学的地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法国巴黎，2010。

¹⁹ 《第一财经日报》，“苹果中国每日吸金5.5亿元，iPhone销量增4倍”，2012年4月26日。

图表8: 2006-2010年国际专利申请主要来源国的申请量及排名情况*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排名	申请量	排名	申请量	排名	申请量	排名	申请量	排名	申请量
美国	51280	美国	54043	美国	51637	美国	45618	美国	44855
日本	27025	日本	27743	日本	28760	日本	29802	日本	32166
德国	16736	德国	17821	德国	18855	德国	16797	德国	17171
法国	6256	韩国	7064	韩国	7899	韩国	8305	中国	12337
韩国	5945	法国	6560	法国	7072	中国	7900	韩国	9686
英国	5097	英国	5542	中国	6120	法国	7237	法国	7193
荷兰	4553	中国	5455	英国	5466	英国	5044	英国	4857
中国	3942	荷兰	4433	荷兰	4363	荷兰	4462	荷兰	4097

* “2010年PCT专利申请世界发展态势及中国特点分析”，《中国发明与专利》2011，(5)：33-36
资料来源：“关于2010年PCT申请的世界趋势与中国特点的PCT分析”，《中国发明与专利》，2011年(5)，第33至36页

小结

综上所述，根据美中两国各自科技的发展阶段及特点，不难看出，两国在科技领域优势互补性强，具有广泛的合作前景。美国基础研究带动的应用领域后劲强大，潜力无限，可依托优势产业占据市场份额，把握先机，同合作方进行良性互动，大力开拓广阔的中国市场，保持产业可持续性发展。对中国而言，中国的学术界和企业界正处于科技发展的追赶时期，同美国的科技合作可以提升科技水平，加快产业升级和全球化的步伐，逐步赶上全球科技发展的潮流。同时，中国企业可以学习美国企业的科技创新理念和实践，消化吸收，转化为推动适合中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

反之，如果两国错过合作机会，中国企业在发展转型时期将可能会不得不选择其它地区的伙伴开展合作，从长期看，实力壮大，迎头赶超，对美国而言将失去与中国经济发展共同成长获益的重要机会。由于认知和沟通的差异，贸易保护、限制出口目前仍是部分美中科技产业合作交流的壁垒，成为整体合作的瓶颈，当今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带来科技产业的融合与对接，零和博弈无益于各自科技产业的整体发展。

二、美中科技交流与合作： 经验与未来

建交三十年来美中科技交流合作回顾

美中两国的教育和科技合作起步于1979年1月。当时的邓小平副总理与卡特总统共同签署的《美中政府间科学技术合作协定》，是指导30多年来美中教育和科技合作的重要指导性文件。基于《美中政府间科学技术合作协定》，两国建立了美中科技合作联合委员会，中国开始大批选派留学生和科技工作者赴美。到1989年，两国政府先后签署了涉及27个分领域的科技合作协议、议定书和谅解备忘录，双方在运输、航空、核子学和生物医学等方面开展合作。30多年来，以《美中政府间科学技术合作协定》为基础文本，两国在高能物理、空间、大气、海洋、医药卫生、交通、能源等广泛领域，共签署了50多项目合作议定书或谅解备忘录。合作涉及能源、环境、农业、基础科学、科技信息和政策、交通、卫生医药、核安全与民用核技术、材料科学和工程计量科学、生物医学、地震、海洋、大气、中医药等众多领域，合作方式包括合作研究开发、联合调查、技术转让、技术示范、数据资料交换、学术会议、技术咨询、人员交流等多种形式，取得了遥感卫星地面



站、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中国数字化地震台网等一大批重要成果²⁰。双方本着平等、互利、互惠的原则，开展了高水平的合作研究，取得了一批具有重大科技和经济意义、体现国际先进水平的研究成果。

中美的科技合作已经远远超出政府间的联系，发展成包含高校及其教师、智库、企业和NGO的合作关系，两国的科技合作经历了政治分歧的考验，成为推动建立两国长期、跨文化互信的重要力量。

2000年以后，美中教育和科技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双方合作领域不断拓宽，合作深度不断加强。双方在第二代互联网技术、高能物理、核物理与磁约束裂变、地表水水文、电驱动和燃料电池汽车技术开发、先进反应堆技术等领域开展合作研究。美中科技合作已成为两国关系的新亮点，目前已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广伙伴、有重点、高水平”的特点，出现了政府间合作、科研机构间合作、企业间技术合作与科技人员交流并举的良好局面。

美中科技合作突破两国文化、体制等方面的差异，超越政治事件对其的影响。建交三十余年来，保持始终延续，经受住了政治风波的影响（1989天安门事件、1999南斯拉夫炸馆事件、2001南海撞机事件），成为两国各领域交往关系中的亮点。以下从重点合作领域、地方政府科技合作、企业建设研发机构、联合发表科技论文和专著、科技人才培养等方面勾勒出美中科技合作取得的主要成果。

重点合作领域。农业科技、清洁能源、生物医药、无线通讯技术等重点合作领域已取得阶段性成果。以美中农业科技合作为例，2002年为落实美中科技协定，美中两个大国前瞻性地就加强农业科技合作达成一致并签署了农业科技合作议定书。十年间，美中农业科技合作硕果累累：建

立了联合工作组机制，确定了自然资源管理、农业生物技术、农业节水技术、农产品加工、食品安全、乳品生产与加工以及生物燃料七大优先合作领域，成立了九个联合研究中心，合作执行了五十余个国际科技合作项目、联合培养了百余位博硕士研究生及青年科研人员，召开了一系列高水平的国际学术和专题会议，促进了两国在农业领域的学术交流与科技合作。未来的发展方向有农业生物技术、节水农业、基因库采集技术与实践三个优先合作领域等²¹。两国间的合作使美国企业在政策引导下积极开拓中国市场，占据了一定市场份额，给美国农业科技出口、农产品走向中国大市场提供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中国农业生产技术得到跨越式提升，中国吸收融合了美国先进技术，开发研制，提升自身的技术水准，解决中国人吃饭的大问题。同时农业科技合作真正做到互惠互利、和谐双赢。

地方政府科技合作。除了在国家层面的合作之外，在地方政府层面美中两国的科技合作也蕴藏着巨大的潜力。在地方层面的合作往往优势互补的特点更加突出，针对性可以更强。例如在中国青海省政府和美国犹他州政府的共同支持下，两省州作为美中唯一的省州于2011年5月被美国国务院和中国发改委批准为美中绿色合作伙伴。两省州并于2011年7月正式建立了姊妹省州关系。同期，美中省州长论坛在盐湖城举办。国际技术转移和科技成果转化是这一合作的重点，并体现在两地合作的西部创新枢纽建设上。在这一国家和地方合作的机制下，两地展开了全方位、多层次、多领域的合作，并取得了阶段性和突破性进展，尤其在联合知识产权、海外研发基地、地方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技术转移示范工程等领域都取得了可总结的进展，技术转移机制和政策也初具雏形。在犹他-青海的合作基础上，犹他也分别同中国发达地区和西部的其他省

20 新华资料，中美科技交流合作，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01/28/content_257226.htm。

21 《科技日报》，“中美农业科技合作十年硕果累累”，2012年8月22日。

图表9: 国际合著S&E论文(世界,中国和美国): 1995年与2010年

	1995	2010	变化比例
各国合著总数	79,128	185,303	134.18%
美国-外国	36,361	79,581	118.86%
中国-外国	2,914	24,164	729.24%
美国-中国	1,112	10,917	881.74%
美中合著占美国与外国合著比例	3.06%	13.72%	
中美合著占中国与外国合著比例	38.16%	45.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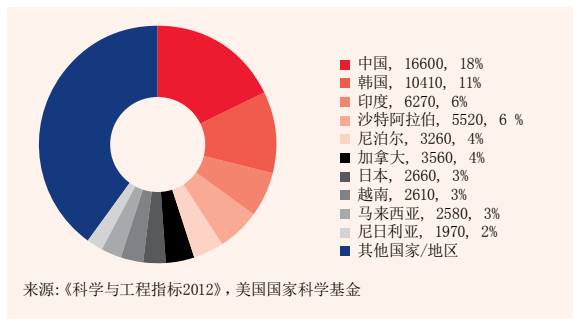
来源:《科学与工程指标2012》、美国国家科学基金

区初步建立了在这一领域的合作联系²²。

企业研发活动。过去十年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投入快速增加。美国是世界各国跨国企业在华设立研发机构最多的国家。目前,在北京地区美国跨国公司设立的研发机构已超过130家,为最多,约占在京跨国公司研发机构的36%²³。美国跨国公司在上海地区设立的研发机构94家,占上海地区跨国公司研发机构的31.8%,比第二名日本(45家)多出一倍还多。一些美国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机构,已由过去以针对中国市场的产品开发为主,升级为面向东亚乃至全球的技术研发中心,从事产业核心技术研究为全球市场服务。如惠普中国研发中心、微软亚洲研究院等。大量美国企业来华投资并设立研发中心,减少了美国企业的研发成本,增加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竞争力。尽管存在中国归国人员选择在外资在华研究机构就业引起的所谓“内部人才外流”的担忧,这些在华研究机构仍然带来了大量的技术溢出,促进了中国的国内创新体系建设。

合作发表科技论文和专著。美国一直是中国与外国合著论文最多的国家。如以下图表所示,中美两国合著论文数量在过去二十年快速增加。美中两国合著论文占美国与别国合著论文的比例从1995年的3%增加到2010年的超过13%。从美国

图表10: 美国大学科学与工程本科生在读留学生人数, 2010年11月



作者与外国合著论文数量来说,中国则排在美国对外合作发表论文的第7位。近年两国科学家在化学、纳米科学、基因和细胞生物学等领域,合作发表论文数量快速提高。以纳米科学领域为例,1996年,两国科学家在纳米科学领域合作发表论文仅有16篇,当年美国与德国科学家在该领域合作发表论文是86篇,与日本科学家是65篇,与俄罗斯科学家是43篇。到了2005年,美国与中国科学家在这一领域合作发表论文已经位列第一,达到293篇,超过当年与德国科学家合作发表的269篇、与日本科学家合作发表202篇和与韩国科学家发表195篇²⁴。合著论文基本上都发表在影响因子较高的著名学术期刊上,显示出美中合著论文是高水平的国际科技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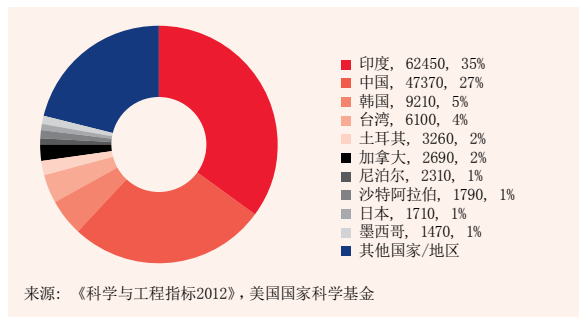
科技人才培养。美国长期以来是中国学生赴海外学习最主要的目的地国。2009-2010学年,美国高等教育机构中中国学生数达127,628人,比2009年增加29.9%,占全美各大学和学院国际学生总数的18.5%,超过印度的15.2%,位列各国赴美留学生人数之首。中国是美国科学与工程研究生的第二大来源国,位列印度之后。2012年,在美学习中国学生超过194,000人,留学生大部分来自中国最好的高中与大学。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国家“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

22 感谢犹他-青海西部联盟犹他绿色合作伙伴办公室胡向前先生提供的资料。

23 其后是欧盟约占24%;日本约占20%,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约占10%。

24 金碧辉、Richard P. Suttmeie等著,《中美科学合作:文献计量学分析》,科技部重大基础研究前期专项(2004CCC00400);美国国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OIsE 0440423),2007年。

图表11: 美国大学科学与工程研究生在读留学生人数, 2010年11月



计划”(简称“千人计划”)等引智政策的出台,一些赴美留学人员陆续回国,这些人已成为当前中国教育和科技发展的重要力量。

从大局看,美中双方高度重视科技合作。科技合作业已成为美中战略经济对话的首选项。双方支持建立“美中科技对话机制”,已经进行多次对话,取得成效,包括领域有:创建美中清洁能源研究中心、美中农业创新计划、美中环境保护、卫生与健康和美中自然科学基金会等。上述项目,企业投资约200亿美元,如第三代核能、中国的特高压输电、美中生态园科技、整体煤气化燃气蒸汽联合循环(IGCC)等。从科技合作不断推向经济合作。

展望未来的美中科技合作,有很多领域将会是潜在的重点和热点。例如,在第三代核电领域,美中已经成立合资公司,各占50%股份,向世界推广第三代核电技术,实现利益共享。在整体煤气化燃气蒸汽联合循环(IGCC)方面,煤变气技术中国已居世界第一,而美国在汽轮机技术世界居首位,美中合作可以实现强强合作,优势互补,利益共赢。此外在碳捕获、利用与封存(CCUS)等方面也有很多合作的潜力。

合作双赢: 合作模式及重点领域

总结美中两国过去几十年良好的科技合作,展望未来,双方的合作空间依然光明。从目前宏观情

况看,由于美中政治和军事互信基础仍然有待加强,美中全面科技合作的可能性不大。但另一方面,在现有基础上减少合作的情景也是难以想象的。这种举动违背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趋势,回到冷战思维,其结果必然是两败俱伤。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在维持现有合作基础上,保持合作动能,在局部合作方面力争有所突破。其中可能的合作模式包括:

(1) 以企业为主体的市场化模式(Business-to-Business):

继续鼓励美国企业发挥其成熟的技术和市场推广经验,利用中国市场庞大的需求,在通讯信息、生物医药等产业领域中开发中国科技消费市场的“市场激增效应”。美国苹果公司和强生公司在中国的成功业绩就是美国企业通过市场化模式进入中国市场的范例。同时,随着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对外投资逐渐活跃的趋势,必将有更多的中国企业有意愿在美国投资于高科技领域。美中两国政府应当减少这种投资的障碍,让市场机制发挥其筛选作用。中国企业应该对于美国政府的安全考虑和审查予以理解并积极配合,而美国政府此类审查应该更加公平透明。

(2) 各级政府积极推动的官方合作模式

政府推动是另一个重要的合作模式,政府推动不仅限于美国联邦政府与中国中央政府的层面,两国州省一级及各级政府的地方政策推动尤为重要。在农业合作和环保清洁能源领域,美中开展各自多级政府层面的政策合作,推动美国技术向中国推广,为中国解决粮食问题、更好地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全球性议题贡献良多。政府推动的合作优势在于,由各级政府牵头,推动力度大,目标群体针对性强。但这种合作模式必须保证其可持续性。同时具体参与合作主体的激励机制也必须设计合理,以保证具体参与合作的主体从合作中收益。

(3) 大学及科研机构的合作

美中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科技领域合作主要可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以政府主导推动下进行，往往通过整体项目驱动，以具体领域科研为导向的合作。另一种是科技学术界内部就某些领域自发形成的合作关系。就美中两国的国情来看，第一种形式的合作占了多数，而且针对性较高，资源动员力较强，更易出成果。以美中能源科技合作框架下的清洁煤技术联盟成员为例，该联盟美方由西弗吉尼亚大学牵头，包括肯塔基大学、怀俄明大学、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美国国家能源科技实验室和世界资源研究所等科研机构；中方由华中科技大学牵头，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矿业大学、西北大学、暨南大学、陕西省能源化工研究院等共同参与²⁵。美国的大学、科研机构在研发上具备一定的领先优势，在合作上优势明显。通过合作，双方就需共同解决的世界公共性问题吸收聚合美中杰出科技专业人才，对话合作，共同研发，取得技术进展和突破。

从上述三种合作模式及重点合作领域不难发现，中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提及的重点领域及其优先主题等相关产业同美国的优势产业农业、清洁能源、生物医药、通讯信息等产业对接度大，互补性强，美国的先进技术加之中国的庞大“市场激增”，给双方带来的收益叠加效应显著，清洁能源、生物医药、纳米科技都是21世纪美中合作的“蓝海”，科技合作对两国乃至世界将产生深远影响。

典型案例：美中能源科技合作 互利互惠、合作双赢

在推动清洁能源技术上，美中两国具有共同的

战略和经济利益²⁶。美中两国面临着共同的挑战，都认识到安全、经济、清洁的能源极端重要。为应对这些挑战，美国和中国均应采取前瞻性能源战略，并以释放技术创新潜力为基础，两国的未来将依赖清洁燃料和清洁电力的创新生产和高效利用，两国间的能源科技合作将营造互利双赢的效果²⁷。中美清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China-U.S. Clean Energy Research Center, CERC）就是在这样的共识下，在美中两国政府的共同推动下于2009年成立。

中心的成立为两国能源领域科技合作的深入开展搭建了良好的平台，对深化美中能源科技合作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一中心框架下，双方共同确认中心的三个产学研联盟单位，合作领域主要为清洁煤（ACTC）、建筑能效（BEE）和清洁能源汽车（CVC），两国共同吸纳整合了近百家企业、高校、研究所和国家实验室参与三个联盟的工作。

中美清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正在开发清洁煤技术、建筑节能技术和清洁汽车技术，这些技术是两国能源战略的核心要素，这些技术可以确保清洁、高效的能源未来；可以减少对进口原油的依赖；可以改善空气质量，可以通过降低能源成本促进经济增长，还将减轻能源生产和利用对全球环境产生巨大影响²⁸。

自2011年正式启动以来，中美清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已取得的主要成果包括：在管理制度上建立了正式的领导监督机制，在实施计划上制订了加强协调的《联合工作计划》并确定私营部门和政府共同投资的方案，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建立了开创性的知识产权保护框架，在合作关系上促进建立长期的研究合作伙伴关系，在技术研发上取得了显著的技术进展。

²⁵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中美清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2011年年度报告》，2011年。

²⁶ Kenneth Lieberthal & David Sandalow, 《克服中美气候变化合作的障碍》，John L. Thornton中国中心专著系列卷1, 2009年1月。

²⁷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中美清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2011年年度报告》，2011年。

²⁸ 科技部科技评估中心，《中美清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中期评估报告》，2012年。



由美中双方投入同等资金，5年投资总额将达1.5亿美元²⁹。中美清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促进清洁能源技术的合作研究、开发及商业化。通过科技、人才上的优势互补，中美清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有助于两国赢得繁荣、清洁和高效节能的未来。

三、美中科技交流合作存在的问题与摩擦

由于两国社会制度和发展阶段的差别，美中两国科技交流合作免不了出现摩擦与争议，这是正常和可以理解的，需要两国发挥共同的智慧协商探讨解决。为了更好地促进两国在科技创新政策领域的交流和磋商，从2010年10月起，美中两国建立了创新对话机制，轮流在北京和华盛顿召开创新对话，采取官产学研共同参与的模式，以务实的态度就关心的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同时还建立了联合专家组，就双方共同关切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为创新对话提供分析及建议。对话取得了卓有成效的结果，成为美中创新交流与合作的新平台，也成为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的组织部分，有助于科技议题整合到最高级别的双边政治关系当中。随着两国在基础、应用以及开发领域合作研究的发展与深入，对话将成为中美双边关系中更加重要的组成部分。

通过这一渠道和其它各种形式的交流，双方增进了对彼此创新政策的理解，减少了分歧，扩大了共识。但同时若在若干领域也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和分歧。从美方的角度看，主要问题包括：1) 中国政府的创新政策对市场干预色彩过浓，将自主创新产品与政府采购挂钩，有对外资企业歧视嫌疑；2) 中国应当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减少对外资企业技术转移的强制要求；3) 网络安全与工业间谍问题。从中方的角度看，主要

问题³⁰包括：1) 希望美方结束冷战思维，采取具体措施尽快解除对华高技术出口的管制³¹；2) 希望中国企业在美投资得到公平对待，解除对中国企业不合理的限制³²；3) 美中科技合作领域和内容应该得到拓宽和深化等。

尽管如此，美中科技合作仍然是两国关系的标志。在2011年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举行期间，双方在能源、科技、环境、交通、气候变化等多个领域达成共识与合作，签署了《中美关于促进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和经济合作的全面框架》。在对话中，美中双方就能源合作达成多项共识，同意在“中美能源合作项目”、“中美可再生能源伙伴关系”、“中美页岩气合作谅解备忘录”等既有合作框架下，深入开展智能电网、大规模风电开发、天然气分布式能源、页岩气和航空生物燃料等方面的务实合作；承诺分享能源监管经验和实践信息。在双方公布的“战略与经济对话”48项成果清单中，有15项直接涉及能源领域合作，双方还签署了6对新的绿色合作伙伴关系。

四、政策建议

1. 美中科技合作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在美中关系当中发挥了重要与积极的作用，成为两国合作的基石之一。美中科技合作在未来美中新型大国关系建设中仍将发挥独特而重要的作用，两国政府都需要高度重视并深化美中科技合作。

2. 美中两国在科技能力领域存在着高度的互补性。在这种互补性背后蕴藏着美中科技合作的巨大潜力。同时，美中两国在科技合作方面也存在着一些分歧和摩擦，应当引起双方的重视，采取积极措施，加强沟通与理解，求同存异，努

²⁹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中美清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2011年年度报告》，2011年。

³⁰ 美国对自主创新政策、知识产权保护与网络安全的关注，详见第二部分第14篇分报告。

³¹ 高技术出口管制，详见第二部分第9篇分报告。

³² 中国对中国企业在美投资不公平对待的关注，详见第二部分第13篇分报告。

力争合作共赢的局面。

3. 美中两国应当大力推动重点领域科技合作新模式，认清产业特点，强化市场化模式，发挥美国企业市场导入性强的特点，结合中国投资资源的可用性；巩固农业科技、清洁能源等领域的长期合作伙伴关系，促进医疗卫生、生命科学与制药等领域的合作；

4. 美中两国在空间探测领域有巨大的合作潜力。美国航天飞机于2011年7月退役后，俄罗斯成为国际空间站（ISS）项目中唯一能运送美国宇航员的国家。一些专家认为³³，与中国合作能

够增加前往空间站的途径，提高空间站的利用率。美国应邀请中国加入ISS项目，协助中国“神舟”号飞船与空间站实现对接。George Abbey与Leroy Chiao³⁴认为“与中国的合作关系的发展，可以遵循与俄罗斯合作的经验”。该模式下，美国不会丧失军事敏感技术，中国可负担较大份额合作项目的开支，美国的货币成本与隐性成本会最小化。

成功的联合载人航天飞行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将被视作两国友谊的标志，促进两国空间政策的透明与互信。

³³ George W.S. Abbey和Leroy Chiao, 《美国在空间上与中国合作的时候到了?》，2012年12月, <http://news.discovery.com/space/private-spaceflight/opinion-nasa-partner-china-politics-spaceflight-gap-121127.htm> .

³⁴ 同上。

美国空间计划合作伙伴与空间科学家的观点

Joan Johnson-Freese博士

海军战争学院国家安全事务教授、多部空间计划与合作主题的著作与文章作者Joan Johnson-Freese博士于2012年6月20日对CNN表达了她的观点：

“美国大致知道中国拥有什么空间技术，却不清楚中国的意图是什么，美国应该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太空目标。但是，法律禁止美国航空航天局与中国合作，这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我们认为中美两国并非天生为敌，那么空间项目的合作将会惠及彼此。如果相反，那么‘与朋友密切，与敌人更密切’的格言将会警醒我们。中美关系，尤其是空间关系，是不断变化的。只有我们参与其中并说服中国一同参与，美国才能影响中国的方向。这是阻止中国在银河系西部太空成为领导者的一种方法”。

2012年3月1日，加拿大ISS机构首脑会议期间，两位机构领导人谈到空间探索领域与中国的合作。俄罗斯联邦航天局总干事Vladimir Popovkin认为中国将来会与目前的五个成员（美国、加拿大、日本、俄罗斯与欧洲航天局）开展合作，“我们并不是封闭的，大门是敞开的。”欧洲航天局总干事Jean-Jacques Dordain说“我赞成看到我们如何与中国合作，这终究会发生”，“这不是一个封闭的伙伴关系，它是开放的，我们欢迎任何能支持该计划的成员”。

来源：

Joan Johnson-Freese, “Will China overtake America in space?”, CNN, 06/2012, <http://edition.cnn.com/2012/06/20/opinion/freese-china-space>.

Herald News, “Space station ‘not a closed club,’ would welcome China, India”, 03/2012, <http://thechronicleherald.ca/canada/69141-space-station-not-closed-club-would-welcome-china-india>.



5. 继续坚持和完善美中科技联委会的科技合作会商机制, 继续坚持中美创新对话, 通过双方高层交流和沟通, 推动科技发展战略、优先发展领域的了解和对接, 集成资源, 引导美中科技合作全面协调发展。

6. 为美中科技人才合作搭建良好平台和环境, 鼓励两国科学家对话互访, 联合开展科研项目, 联合培养科技人才和教师队伍。“全球人才循环流动”交流思想的重要性将迫使美国改变其移民政策。

7. 进一步加强美中在知识产权保护 and 信息安全方面的交流合作, 建立长效沟通管道, 巩固科技合作的战略互信基础。同时, 美国应减少对中国的部分高技术出口管制和贸易壁垒。在这方面, 美国需承认中国日益增强的影响力, 而中国需要承担更多的区域与全球责任。

8. 探讨在美国举办中国科技年, 在中国举办美国科技年活动, 进一步密切美中科技合作关系, 通过多种形式展示近年来两国的科技成

果, 增进公众对两国科技的全面了解。建立新机制, 培养美国的中国科技政策专家与中国的美国科技政策专家, 专家组会议落实为常规双边机制。

9. 最后, 美中双方都必须认识到, 随着美中科技合作范围的不断扩大与深入, 双方也必须关注随着合作点增加所带来的质量问题和有效的项目管理问题。在有些情况下, 由于双方期望不同, 跨文化的误解, 不当的政府干预或语言问题, 这种合作的效果不如预期。如近期双方在地理、地图与地震评估的合作遇到的一些小麻烦就使得合作双方都感到有在参与实地工作及提高效率方面改进的必要。双方都有必要在具体合作开始之前把各自关切的问题(如安全问题或其他问题)放到桌面上来, 从而避免出现双方在合作中的不愉快。幸运的是, 这类问题并非中美科技合作的主流。但是它们的偶尔出现也在提醒我们, 在各种具体项目合作之前, 必须做好各个方面的充分准备。

参考文献

George W.S. Abbey, Leroy Chiao, “美国在空间上与中国合作的时候到了?” <http://news.discovery.com/space/private-spaceflight/opinion-nasa-partner-china-politics-spaceflight-gap-121127.htm>

“苹果公司在中国日销量5.5亿”; “iPhone销售增长四倍” [N], 第一财经日报, 2012年4月26日

Jonathan Bell, “中国的新创新准则”, 远东经济评论, 2007年(3), 第34至36页

CENTRA Technology, “中国科学技术现代化计划: 对美国竞争性的影响”, 为美中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撰写的报告, 2011年

能源和自然资源委员会, 美国参议院, “清洁能源竞赛: 美国和中国”, CreateSpace独立出版平台, 2013年1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与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意见》, 2012年9月

Evan Feigenbaum, 《中国的科技战士》,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斯坦福, 2003年, 第189至232页

Bates Gill和 Martin Kleiber, “中国的太空之旅”, 《外交事务》, 2007年(5月/6月), 第2至6页

贺德方, “中国高影响因子论文的比较分析”, 《中国软科学》, 2011年(9), 第94至99页

Joanna I. Lewis, 《中国的绿色创新: 中国的风能产业与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 纽约,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2012年

Jeffrey Logan, “中国的太空计划: 中美合作的选项”, 美国国会调查局向国会的报告[EB/OL], 2008年9月29日, <http://www.fas.org/sgp/crs/row/RS22777.pdf>

Bihui Jin, Richard P. Suttmeier, “中美科技合作: 文献计量分析”, 科学技术部主要基础研究前期研究(2004CCC00400),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01sE 0440423), 2007年

Aiping Ma, “中美农业科技合作十年成果[N]”, 科技日报, 2012年8月22日

Andrew Mertha, 《盗版政治: 当代中国的知识产权》, 伊萨卡, 康奈尔大学出版社, 2005年

中国科技部, 《中美清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2011年年报》[R], 2011年

科技部评估中心, 《中美清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中期评估报告》[R], 2012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2006-2020)》, 2006年

《国家纳米科技战略计划》[Z], 国家科学与技术委员会, 2011年2月4日

Philip Adrews-Speed, 《中国的能源治理: 过渡到低碳经济》, 伦敦, 帕格雷夫麦克米兰出版社, 2012年

“2010年PCT专利申请的世界发展趋势及中国特点分析”, 《中国的发明与专利》[J], 2011年(5), 第33至36页



Denis Simon、Fengchao Liu、Cong Cao和Yutao Sun, “中国的创新政策: 演进、体制结构和路径”, 《研究政策》, 40卷, #7, 2011年(9), 第917至935页

Denis Simon和Cong Cao, “中国的未来: 拥有人才, 才能兴旺”, 科学技术期刊,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美国国家科学院), 2009年秋

Denis Simon、Cong Cao和Richard Suttmeier, “中国的创新挑战”, 《创新: 管理, 政策与实践》, 第11卷第2期, 2009年(8), 第253至259页

Denis Simon, “中国缩小科技差距的驱动力”, 中国季刊(四十周年纪念特辑), #119, 1989年9月

Denis Simon和Cong Cao, 《中国新兴的前沿技术: 评价高端人才的作用》, 剑桥大学出版社, 2009年

Denis Simon, 《中国的全球研发》, (与Yifei Sun和Max von Zedtwitz合编), Routledge出版社, 2008年

Denis Simon, 《毛后时代中国的科学与技术》, 与Merle Goldman合编. 哈佛大学出版社, 1989年

Denis Simon和C. Cao. “中国新兴科技人才大军: 定量和定性分析”, 收录在《教育创新: 对印度、中国和美国的影响》, R. DeHaan和K. M. Narayan(编者), 鹿特丹, 荷兰, Sense Publishers, 2008年, 第83至110页

Denis Simon, C. Cao和R. Suttmeier, “国家自主创新的成功? 中国科技发展计划的前景”, 收录在《亚洲科学、技术及创新的新动态》, G. Parayil和 A. D'Costa(编者), 伦敦, 帕格雷夫麦克米兰出版社, 2008年, 第247至264页

Richard P. Suttmeier和Cong Cao, “中美科技合作: 过去的成就和未来的挑战”, 向中美科技政策论坛提交的论文, 中国北京, 2006年10月15日至17日

Edward Steinfeld, “当代中国产业的创新、融合和科技改良”, 收录在Karen Polenske主编的《创新经济地理》, 剑桥大学出版社, 2007年, 第289至309页

Richard P. Suttmeier, 《构建中美科技合作的国家、自发组织和个性》[J], 亚洲展望出版社, 2008年, 32(1), 第5至31页

Richard P. Suttmeier, “从冷战科学外交到网络世界的合作: 中美科技关系的30年”, 俄勒冈大学, 该文章的早期版本在2009年尼克松论坛“现代中国进程中的科技”上发表, 哈佛姆德学院, 2009年2月27-28日

Richard P. Suttmeier、Xiangkui Yao, “中国知识财产的过渡期: 重新评价崛起的中国的知识产权”[R], NBR报告, 2011年7月

Juan Tang, 科学技术部: “2012年中国在研究开发上投资了一万亿, 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N], 中国新闻, 2012年12月24日

白宫文件,“为明天创建清洁能源以及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 [EB/OL], 2013年5月19日, http://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microsites/ostp/fy2013omb_ee.pdf

白宫文件,“准备21世纪的劳动力” [EB/OL], 2013年5月19日, http://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microsites/ostp/fy2013rd_stem.pdf

白宫文件,“奥巴马总统通过扩大无线接入来赢得未来的详细计划” [EB/OL], 2013年5月19日,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1/02/10/president-obama-details-plan-win-future-through-expanded-wireless-access>

白宫文件,“总统在密西根州马凯特就全国无线网络计划的演讲” [EB/OL], 2013年5月19日,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1/02/10/remarks-president-national-wireless-initiative-marquette-michigan>

白宫文件,“支持美国创新” [EB/OL], 2013年5月19日, <http://www.whitehouse.gov/omb/fact-sheet/supporting-american-innovation>

白宫文件,“国家奈米科技愿景及战略计划” [EB/OL], 2013年5月19日, <http://www.whitehouse.gov/administration/eop/ostp/NNIS-strategy>

Elsbeth Thomson和 Jon Sigurdson (编者),“中国的科学技术领域和全球化力量”,新泽西州,世界科技出版公司,2008年,1-30, 79-118, 143-17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发展报告2010:当前世界科学的地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法国巴黎,2010年

新华社,美中科技合作与交流, [EB/OL], 2013年5月19日,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01/28/content_257226.htm



第十三章

促进跨境直接和间接投资

赵令欢

弘毅投资创办人及总裁、联想控股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

参与撰稿人:关家明 王鹏 王天龙 张焕波

摘要

中国和美国是世界上非常重要的跨境直接和间接投资东道国及来源国。

然而，两国的双边投资却非常不平衡，美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是中国在美国直接投资的6倍左右。随着中国经济和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走出去”政策的实施，中国在美直接投资近年来正在快速增长。尽管过去五年，中美跨境直接投资经历了快速增长，但两国间的相互投资仅占两国对外直接投资一个很小的比例，表明未来两国的跨境投资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近来中国在美投资显示出积极的趋势：与并购投资相比，绿地投资成为主要的投资方式，投资方向也从传统的资源和贸易领域转向了制造业以及服务行业，私人部门正在成为中国赴美投资的主力军。

对中美两国来说，提高双向跨境投资的开放度，对两国来说均有很大好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跨境投资能够为本国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并能够创造就业；能够让企业降低生产成本以及消费价格，从而增加其全球竞争力。另外，通过促进专业化，实现更优的经济规模以及鼓励良性市场竞争来实现全球融合，能够极大地提升消费者福利。更重要的是，两国加强经济合作，有利于增加相互了解，并且进一步提高双边的开放度。

预计未来十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将达到1万亿或者2万亿美元。未来一段时间，中国每年对美国的投资流量将超过美国对中国的投资流

量。然而，中国人口老龄化以及由此导致的储蓄下降，也可能会逆转这种双边投资趋势。从微观角度来看，中国努力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继续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便利，努力获取经济发展资源，着力提升国际竞争力，寻求新市场以及合理使用战略资产，这些因素将继续推动中国海外投资增长，并且这种趋势在未来十年内还会得到加强。

然而，中美两国双边投资领域仍然存在障碍，其中有些障碍是实质性的，有些障碍则是观念意识方面的，包括对战略性产业投资的担忧，对投资领域不平衡的忧虑，对监管不透明和歧视性条款的忧虑，对签证限制过于严格的忧虑等，还有一些是缺乏有效沟通、交流与互信，以及文化差异和国内政策干扰带来的问题。

为促进中美双边投资，两国政府都应该在战略思路和方法上进行一些根本性的改变与调整。我们建议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通过相互的投资评估以及文化交流来促进彼此理解和双边联系；通过建立地方层面的投资促进机构和投资基金来使得投资促进措施更加系统化；消除行政限制，通过提高透明度和放松投资管制来改善两国投资环境，加强对非歧视性投资条款的应用；加强金融市场合作和改革，确保经济增长以及促进间接投资便利化；充分利用香港与中美两大经济体的密切联系及其在国际金融方面的专业经验。

促进跨境直接和间接投资

中美两国直接投资现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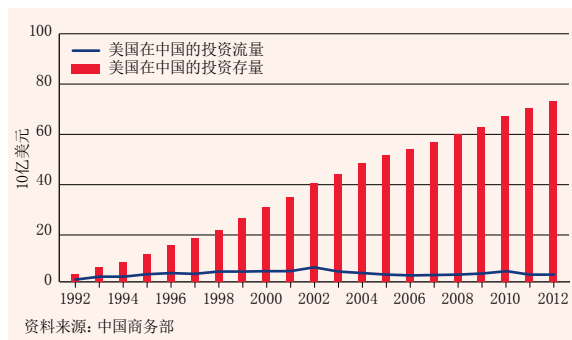
2011年，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FDI）东道国和来源国，中国是世界第二大投资东道国，是世界第七大投资来源国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上半年，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FDI东道国²。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重创了中美两国的FDI投资，但2010年投资已经开始反弹，尽管流向美国的FDI还没有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

美国是较早对中国进行直接投资的国家，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就开始对中国进行投资，而中国在美国的直接投资，大约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商务部和中国商务部以及其前身都有对两国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的统计，但是由于统计方法、口径等因素，这两套统计数据很少能够相互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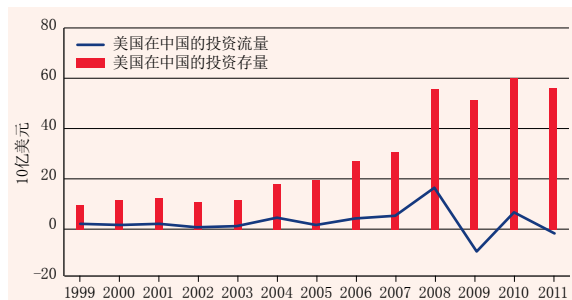
美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

过去三十年，美国公司在中国进行了很多直接投资。到2011年，美国公司在中国的直接投资项目有61,000个，设立了2万家企业、分支机构和合资公司，雇佣了成千上万的中国工人。截至2011年，美国在中国的投资存量达到701亿美元，是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存量的7.8倍³。这也能够反映出，美国在资金和技术上拥有优势，而中国在

图表1: 美国在中国的投资流量及存量*



资料来源: 中国商务部



资料来源: 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 两组统计数据往往不一致，因为统计方法不同。本报告包括两组数据的比较，尽管两组数据有些矛盾之处，但能够恰当地反映出中美两国间的投资趋势。

劳动力上具有比较优势，并且中国的国内市场巨大。

然而，近年来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下降趋势（图表1）。根据中国商务部的数据，2010年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41亿美元，2011年则下降至30亿美元⁴。下降的主要原因是，近些年中国的经济增速略有下降，而且一些美国企业家对中国的投资环境感到忧虑，更加重要的是，一些很容易进入的产业已经趋于饱和。尽管如此，一项由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USCBC）开展的调查表明，89%的美国企业在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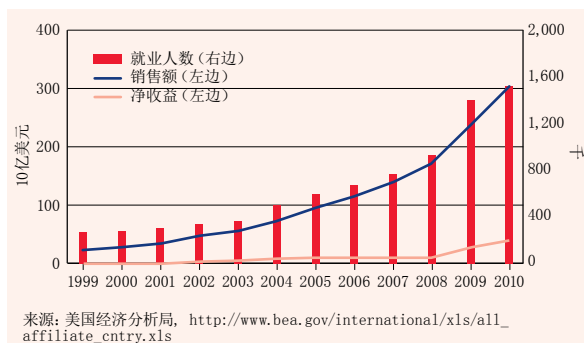
1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12年世界投资报告：迈向新一代的投资政策》，联合国，2012：“2012年上半年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外国投资目的地”。

2 Hanemann：《外国投资在中国：两个统计体系》，Rhodium集团，2013年1月4日。

3 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由于中美两国的统计数据并不一致，如果没有特别说明，本章所有的双边投资流量和存量数据都采用中国商务部的数据（中国官方数据）。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美国在中国的投资存量约为54亿美元。

4 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BEA）的数据，美国在中国的净投资流量下降了16亿美元。

图表2: 美国投资对中国GDP和就业的贡献



图表3: 美国在中国的十大企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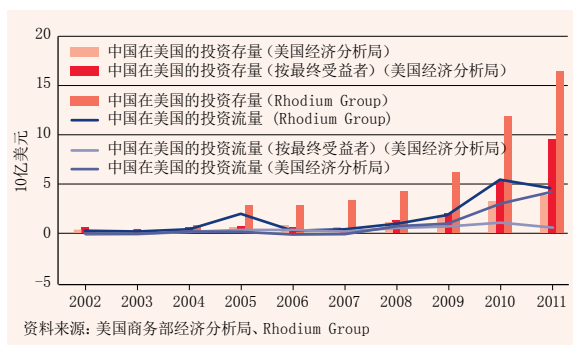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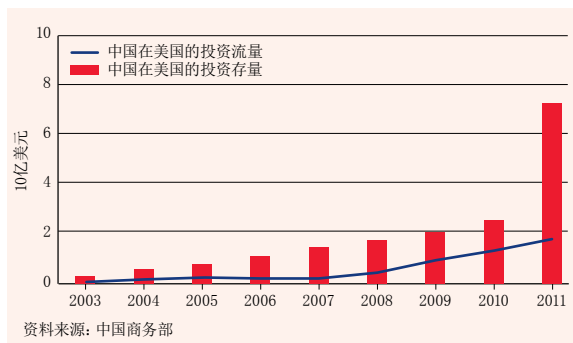
排名	企业
1	埃克森美孚
2	通用汽车
3	英特尔
4	卡特彼勒
5	沃尔玛
6	通用电气
7	可口可乐
8	宝洁公司
9	高盛
10	福特

来源: 中国商务部, 2012

国获益颇丰, 66%的企业2011年的商业收益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75%的企业预期2012收益还会增加, 66%的企业准备在明年继续扩大投资⁵。

2011年, 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存量占到中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存量的9.5%⁶, 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 (BEA), 2010年, 1,189家美国持股的公司在中国持有共计3,040亿美元的资产, 净收入达到390亿美元, 雇佣了154.1万名中国员工⁷。根据中国商务部研究院的数据, 2010年,

图表4: 中国在美国直接投资存量和流量



美国在中国投资的公司共上缴税收149亿美元, 雇佣了184.2万名中国员工。此外, 中国也从FDI的“溢出效应”和“纪律效应” (discipline effect) 中获益良多⁸, 主要表现在美国在中国设立了超过250家研发机构。

中国在美国的直接投资

中国在美直接投资是个新近才发生的现象。目前中国在美投资存量大约有90亿美元⁹。然而, 由于中国赴美直接投资增长很快, 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放缓, 中美投资流量的天平正在发生变化。从2003年到2011年, 中国在美直接投资大约增长

5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 2012: 《中国商业环境调查报告: 持续增长并盈利良好》; 由于成本日益上升, 竞争加剧和市场障碍, 对中国商业环境谨慎乐观, 美中商会, 2012年。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每年都对其会员企业进行调查, 以便评估中国的商业环境, 确定对中国商业环境的主要关切。

6 根据2012年联合国贸发会议的世界投资报告, 2011年中国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量达到7,120亿美元。

7 这个数字近计算那些有资产、销售额和或者净收入超过2,500万美元的分支机构。 http://www.bea.gov/international/xls/all_affiliate_cntry.xls

8 商务部研究院, 2011年10月《中美贸易合作前景及收益分析》。

9 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 中国在美投资为59亿美元。然而, 两国数据来源都表明, 美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要比中国在美国的直接投资大很多。也有一些其他办法来估计中国在美国的直接投资, 那就是根据最终受益人为中国人来估计, 从2003年到2011年, 年均流入美国的投资为9.83亿美元。根据Rhodium集团的数据, 从2000年至2012年, 年均流入约为19亿美元。2011年估计的数据是从5.7亿美元 (美国商务部数据) 到43亿美元 (美国商务部根据最终受益人来估计), 到46亿美元 (Rhodium集团的数据)。



案例研究：通用汽车

通用汽车 (GM) 1991年进入中国市场，是最早进入的外国汽车制造商之一。与其他外国汽车制造商不同，通用汽车不仅建立了制造和销售企业，而且通过设立11家合资公司，进入了研发、设计、融资、配送以及汽车安全和通讯等行业

今天，GM是中国汽车市场上的领导者，占有14.6%的市场份额。中国已经成为通用汽车最大的市场，2012年的销量占其全部销量的30.53%，收入占到全部收入的51.7%¹。2009年，上汽集团 (SAIC) 用8,500万美元资金购买通用汽车1%的股份，这为通用汽车提供了必要的现金流支持。通用汽车的中国合资伙伴，也为通用公司带来了152亿美元的净收入²。此外，通用汽车的中国机构充当了亚洲其他国家汽车产业的研发、制造以及测试平台，向亚洲市场引进了很多新车型，为诸如印度等国家提供产品。

中国也从通用汽车的投资中获得了巨大好处。除了通用汽车的巨额投资外，通用汽车的中国合资企业创造了35,000个新就业岗位，给中国市场提供了现代汽车产品³，为中国培养了汽车制造专家，培育了技术和汽车修理服务等。通用汽车的中国合资公司，比如上汽集团和五菱集团，通过与通用的合作也显著地增加了生产、研发和经营能力。

1 资料来源：通用汽车公司年度报告。

2 资料来源：通用汽车公司年度报告。

3 资料来源：通用汽车公司网站。

了28倍，从6,500万美元增至18亿美元¹⁰。根据美国的统计数据¹¹，2012年中国在美投资数量达到了创纪录的65亿美元。基于这个统计数据，中美双向投资的转折点很可能在2012年出现¹²。如果算上通过离岸金融中心进行的投资，中国对美投资增速则更加明显，过去五年，中国对美投资增长将近1,300%¹³。2010年，中国在全美50个州中的35个州都进行了投资 (见图表5)¹⁴。

中国在美投资呈现出多种独特和积极的趋势。首先，受到欢迎的投资模式是绿地投资，占了中国对美全部投资数量的大部分。从2000年到

2012年，大约完成了436个绿地投资项目，184个非绿地投资项目¹⁵。如今这个趋势仍在延续，尽管从美元价值上来说，绿地投资项目相对比较小 (30亿美元对190亿美元)¹⁶。与传统的并购投资相比，绿地投资项目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税收和消费者福利等，对社会的贡献也更大一些。

第二，行业选择正在逐渐发生变化。早期中国企业赴美投资的领域主要集中在能源相关的领域，与这一趋势不同的是，2008年以来的投资增加则主要在制造业相关的领域。尽管也有些案例，其主要的投资目的是获得能够运回中国的资产，但大多数中国企业都逐渐扩大在当地的运营。在美国投资的中国企业正在日益成为美国新工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寻求资

10 数据来源：中国商务部

11 Hanemann: 《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两套统计数据》，Rhodium 集团，2013年1月4日。

12 尽管还没有2012年美国在中国投资的官方数据，这个数字2011年仅为24亿美元。

13 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很可能被低估了，因为它们的数据并没有把从离岸金融中心过来的投资算上。Hanemann: 《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两套统计数据》，Rhodium 集团，2013年1月4日。

14 荣大晔、韩其洛，2011年5月，《美国敞开大门？充分利用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美中关系委员会，美国亚洲协会和基辛格研究所，伍德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

15 Rhodium集团，《中国投资监测》。http://rhg.com/interactive/china-investment-monitor

16 Rhodium集团，《中国投资监测》。http://rhg.com/interactive/china-investment-monitor

图表5: 中国在美国直接投资位于前20位的州 (2003–2010)

排名	州名	总投资 (百万美元)	交易项目数	排名	州名	总投资(百万美元)	交易项目数
1	德克萨斯	2719	20	11	密苏里	170	5
2	纽约	1874	24	12	乔治亚	154	12
3	弗吉尼亚	1771	5	13	明尼苏达	151	1
4	伊利诺伊	1540	7	14	马里兰	118	4
5	加利福尼亚	824	55	15	夏威夷	95	2
6	密西根	599	12	16	新墨西哥州	80	1
7	俄勒冈	282	5	17	佛罗里达	77	4
8	特拉华州	264	12	18	爱德华	62	1
9	新泽西	227	6	19	亚利桑那	61	3
10	密西西比	175	1	20	内华达	59	6

来源: 荣大聂、韩其洛,《美国敞开大门》第32页。

图表6: 中国在美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与交易数量 (2007–2012)

交易数量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07–12
信息技术	7	13	10	19	21	6	76
工业和电子设备	12	6	15	14	12	12	71
能源	6	3	14	20	15	10	68
汽车和航空	11	4	8	10	14	7	54
消费者产品和服务	6	6	13	9	13	3	50
金融和商业服务	3	6	6	6	7	6	34
基础材料	7	4	5	4	9	3	32
健康和生物技术	1	8	5	7	8	3	32
休闲和房地产	1	2	1	5	7	5	21
交通和建筑	5	0	0	8	1	3	17
农业和食品	1	2	0	2	3	4	12

资料来源: 中国投资监测, Rhodium Group

源。过去, 中国企业对第三产业进行投资, 主要目标是便利中美之间的商品贸易流通, 比如批发服务和贸易融资。而今天服务行业的投资主要以高附加值的服务为目标, 比如软件开发等。此外, 中国企业对房地产和基础设施的投资规模尽管仍比较小, 但是增长非常快。

最后, 美国对中国企业的投资也有一些误解之处, 那就是认为所有的中国企业都是与政府有关系的。事实上, 中国企业的所有权是非常分散的, 这充分反映在中国在海外的直接投资上。大多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都是私营企业进行的, 而不是国有企业(从交易数量上, 大约有435家私营

企业, 185家国有企业; 从价值上看, 140亿美元来自私营企业, 80亿美元来自国有企业¹⁷)。此外, 中国的国有企业在做投资决策时候, 也主要是利润导向和出于商业目的¹⁸。

与其他国家的资本流动以及美国对中国的投资相似, 中国在美直接投资不仅提供了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本并且创造了就业, 这种投资也能极大地提高美国市场上的产品竞争力, 并且能够提升双边贸易水平。举例来说, 中国的家电制造商

17 Rhodium集团,《中国投资监测》。http://rhg.com/interactive/china-investment-monitor

18 Yuen Pau Woo 和 Kenny Zhang (2006),《中国走向全球: 中国在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含义》温哥华: 加拿大亚太基金会。

图表7: 中国在美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与交易价值 (2007-2012)

交易价值 (百万美元)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07-12
能源	245	28	214	2,977	2,079	2,966	8,509
休闲和房地产	8	4	6	222	931	2,795	3,966
Ind. 和电子设备	84	20	422	1,298	108	69	2,001
汽车和航空	101	9	127	478	591	213	1,519
基础材料	37	9	1,043	43	126	173	1,431
信息技术	22	105	15	199	535	14	890
健康和生物技术	1	381	10	61	84	3	540
金融和商业服务	41	92	25	154	38	165	515
消费者产品和服务	15	215	62	51	52	15	410
农业和食品	1	16		30	29	34	110
交通和建筑	6			16	1	5	28

资料来源: 中国投资监测, Rhodium集团

海尔集团进入美国后,极大地增加了美国家电市场的竞争性,并且增加了消费者的可选择性,为美国带来了更加便宜和创新的产品。海尔的小型冰箱现在已经成为美国大学宿舍和美国旅馆里面的迷你吧的标准配置。

从创造就业这个角度来说,美国商务部估计,过去十年,流入美国的直接投资(超过17万亿美元)大约创造了超过500万个高端就业岗位,并将其工资提高了30%¹⁹。由于中国对外投资仍处于起步阶段,中国投资在美创造的就业数量还比较少,但是增长速度却非常快。美国经济分析局(BEA)的数据表明,中国非银行的美国机构,获得了大约42亿美元的收入,创造了6.63亿美元的增加值,雇佣了1.12万名员工,这一数量是五年前的5.6倍(图表8)。根据美中经济和安全检查委员会的研究,中国国有企业在美国投资创造的就业在过去五年中增加了1万至2万人²⁰。

一项由私人公司进行的研究也表明,12年前大约有2,000个工作岗位与中国的投资有关,这个数字在2012年则达到2.7万个。尽管这个数字

并不大,仅占外国在美投资创造的600万工作岗位的1%,甚至比德国和日本在美直接投资创造的就业还少,但是未来的潜力却很大。根据相关研究,到2020年,如果中国的投资维持目前的趋势,未来中国企业将雇用20万至40万美国工人²¹。

在这2.7万个就业岗位中,有8,000个净工作岗位是由绿地投资创造的,而自2000年以来绿地投资总额约35亿美元²²。例如,海尔集团投资了3,000万美元在南加州的卡姆登建立了一个冰箱加工厂,现在雇用了大约600人。万向集团是汽车零部件制造商,从1994年起开始在美国投资,其横跨14个州的28个分部共创造了5,600个工作岗位,2010年该集团上缴税金为3,240万美元,当地工人共获得2.5亿美元的工资好处²³。三一重工是另一家中国私营企业,在乔治亚州的桃树城设立研发中心和制造厂,雇用了200名员工²⁴。如果把中国企业少量持股的企业也算上,中国投资创造的就业人数将还要增加几千人。

中国在美投资还给美国带来了一些间接好

19 <http://www.commerce.gov/news/press-releases/2011/06/14/new-commerce-department-report-shows-foreign-direct-investment-support>.

20 Andrew Szamosszegi(2012),《中国对美投资分析》资本贸易和FDI研究,中美经济和安全评估委员会,2012年10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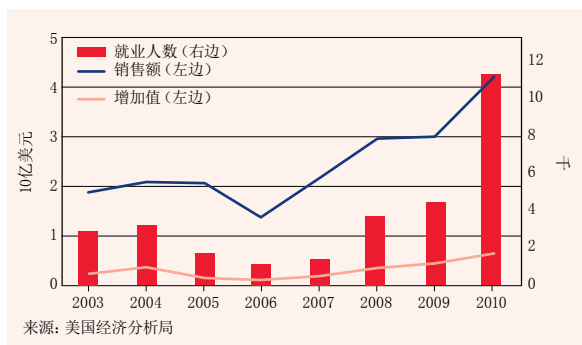
21 Thilo Hanemann 和Adam Lysenko (2012),《中国在美投资的就业效应》Rhodium集团,2012年9月27日。<http://rhgroup.net/articles/the-employment-impacts-of-chinese-investment-in-the-united-states>

22 同上

23 王天龙:《万象集团在美投资案例研究》,内部稿件。

24 荣大晔和韩其洛《美国敞开大门》,2011年,第45-46页。

图表8: 中国投资对美国GDP和就业的贡献



处,这可以从联想收购IBM案例中看出。这一并购使得IBM剥离了其业务中的软肋,以便其更好地将资源集中到更有发展前途的领域²⁵。天津钢管厂(TPCO)在德克萨斯州建立了一个新的钢铁厂,预计将雇用1,000到2,000名建筑工人²⁶。甚至一些在调研和准备中的投资项目,也能够给美国商业带来好处,因为中国投资者需要雇用美国的咨询公司和专业人员来提供法律、税收、会计、技术、金融和其他服务,比如天津钢管厂在德克萨斯州的投资就是如此²⁷。中国企业上缴的税金对当地的教育也有很大好处,这些教育经费通常是由当地政府来提供资金。根据荣大聂和韩其洛(2011)的研究,美国社会在中国直接投资中的损益与来自其他国家的投资一样:到目前为止,没有证据显示这种投资的后果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²⁸。

除了经济上的好处,中国投资也为美国带来了许多积极的、无形的好处。

中国企业在美投资,需要采用与经合组织(OECD)市场上一样的全球商业准则和商业惯例。当中国企业的全球参与增加后,有理由期待,中国的跨国企业将会去游说政府,力争说服

政府采用一个更加严格、与国际接轨的商业规则。因为这样,这些企业就会发现,与国内的竞争对手相比,其竞争力会更强。另外的好处是,中国企业到国外投资,需要严格遵守当地法律和政策,并且要依靠美国的法院和立法机构,这样如果竞争对手采取不恰当的行为,就将会诉诸法律。在外国的监管环境中进行经营,对中国国内也会形成一个正向循环,使得政府加速推进改革,以便帮助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上成功进行竞争。

中国不断增加在发达市场上的投资,也会加速中国国内市场的开放。目前中国仍然维持一些对资本流动和经济领域的管制,特别是在服务业方面。中国政府强调,将继续对私人部门和外国企业开放投资,但是将会以渐进的方式进行。随着对发达经济体进行投资的兴趣增加,中国自身也会加速国内市场的开放,可能会放开之前管制的很多产业,这会给很多外国企业带来广阔的商业机会。

中美证券投资流动态势

美国是世界顶级的跨境非储备证券投资国和接受国,2010年底非储备证券投资资产达6.7万亿美元,接受外国证券投资8.3万亿美元²⁹。相比之下,中国跨境非储备投资地位远远落后于美国,在2010年底有4,980亿美元证券资本流入,全球排名第17位,只约占美国的6%。中国非储备性投资流出没有官方数据,但它可能是非常小的,因为严格的资本账户的限制以及中国的对外投资的历史相对较短。然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储备持有国,2010年年底达2.85万亿美元,2012年3月底达3.31万亿美元。

由于中国的资本管制,中美之间的双边证券投资流动受到严格的监管。在2010年底美国持有

25 这个例子也可见Freeman(2009)的研究。参看:《不要忘记麦格昆磁:一个全球化的教训》,华盛顿季刊,2009年32期,第61-76页。

26 Thilo Hanemann 和Adam Lysenko (2012),《中国在美投资的就业效应》,Rhodium集团,2012年9月27日

27 参看“选择美国倡议”视频。<http://beijing.usembassy-china.org.cn/doing-business-usa.html>

28 荣大聂和韩其洛《美国敞开大门》,2011年,第45页。

29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调证券投资调查,2011》<http://cpis.imf.org>



案例研究：万向集团

万向集团是一个总部位于中国的全球汽车和清洁能源公司。万向美国公司成立于1994年，总部在伊利诺伊州的埃尔金，主要业务是在美国建立制造、研究和销售公司。目前，万向美国公司在美国的14个州设立了27家分支机构，与美国当地优秀的制造和外包公司形成了深入的合作关系，在工程、设计和技术方面为市场提供领先的汽车零部件产品、工业组件以及太阳能等清洁技术。今天，美国公路上每三辆汽车中就有一辆使用了万向美国公司生产的零部件。万向公司也成为了成功在美国进行绿地投资的中国企业。

到2011年，万向集团在美国投资超过5亿美元，创造了5,600个新的就业岗位¹。2010年，万向美国公司共上缴3,240万美元的税金，美国工人共获得2.5亿美元的工资收入²。此外，万向美国公司也是当地社区活动的一个强有力的支持者，包括在旧金山实施了一个项目，在清洁能源领域培训教师，支持奥巴马的“十万倡议”，也就是力争在四年内送十万美国学生到中国来学习的计划。

1 资料来源：美国商会

2 资料来源：王天龙：《万象集团在美投资案例研究》，内部稿件。

的6.7万亿美元非储备证券投资资产中，中国只占1,020亿美元，占到了其中的1.5%。不过，美国是中国的第二大投资组合的投资者，2011年年底在中国持有770亿美元的证券资产，约占外国证券投资总保有量的31%³⁰。像其他外国证券投资者一样，美国证券投资在中国的渠道主要是通过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机制，该机制允许获得许可的特定国际投资者参与中国的金融市场。2012年底有33个美国公司（所有国家一共是201个）³¹获得QFII资格，许多公司已经达到了十亿美元的投资上限。然而，中国政府持有的证券资产，在过去的十年中经历了爆炸式的增长，年均增长率为35.8%。自2008年以来，中国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美国政府证券持有者。中国持有的投资组合资产分为四种类型：国债、机构证券、公司债券和股票。2011年6月，中国持有的美国证券资产总额为1.7万亿美元，约占外汇储备总额的54%。其中，长期国债和长期机构证券总

额分别为1.3万亿美元和0.24万亿美元，几乎占中国在美国总证券投资的90%。

从过去的十年来看，中国购买美国证券是一个双赢的战略，符合双方的利益。这符合中国本身的利益，能降低中国外汇储备的风险，同时维护金融稳定的流动性和信用度。另一方面，中国在美国证券的持续投资为国债提供了强有力的需求，压低了长期利息率，为美国庞大的预算赤字融资提供了必要的经费。特别重要的是帮助美国应对了2008年金融危机。从2008年到2010年，中国政府已经增持美国证券5,770亿美元，占到了2009年2月美国经济刺激计划总开支的73.3%。这传达了一个重要讯息，即中国对美国信用有坚定的信心，虽然美国当时纠缠于债务上限问题和主权信用评级降级。

中美双边投资的驱动力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外国直接投资包括来自美国的直接投资，在中国的经济成功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外国投资者不仅带来中国急需的资

30 美国数据来自美国财政部，中国数据来自中国外汇管理局。

31 截至2012年11月份的完整QFII名单请见网址：http://www.china.com.cn/guoqing/zwx/2012-12/14/content_27412677.htm

图表9: 2011年中国持有的美国证券(百万美元)

类型	总数	国债	机构证券	公司证券
长期股权投资	158,781	/	/	/
长期债务	1,562,948	1,302,405	244,747	15,796
短期债务	4,891	4,571	41	279
长期和短期合计	1,726,621			

资料来源: 美国联邦储备局, 2012年。

金,也带来了管理和技术专家,为中国产品打开了出口市场,活跃了中国的国内市场。外国投资者也从这一过程中获益颇丰,中国帮助他们降低了生产成本,提升了全球竞争力,提供给他们所需要的资源和产品。很多外国投资者也从中国快速增长的国内市场上获得巨大收益,特别是像通用汽车和宝洁这样的公司

随着中国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并且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中国的国内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需要一种新的中美投资关系。

中国的过度储蓄与美国储蓄不足

中国已经积累了超过3万亿美元的官方外汇储备(图表10)。更进一步来说,巨大的国内财富被创造出来以后,私营部门的储蓄也随之增加,中国现在是拥有储蓄盈余的国家。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储蓄率大约是35%,90年代上升至40%,而2010年储蓄率则攀升至52.6%。同时,2002年至2011年,中国的投资率平均约为GDP的45%。在2002年至2011年的十年时间里,中国的储蓄盈余(或者是经常账户盈余)约占GDP的5.7%左右,尽管投资率也比较高。

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上世纪80年代美国的储蓄率已下降至国民总收入的20%左右,2010年储蓄率仅为12.4%(见图表11)。2002年至2011年期间,美国储蓄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平均为18.1%,这意味着在2002年至2011年的十年间,美国储蓄净赤字(经常账户赤字)平均约占美国国民总收入的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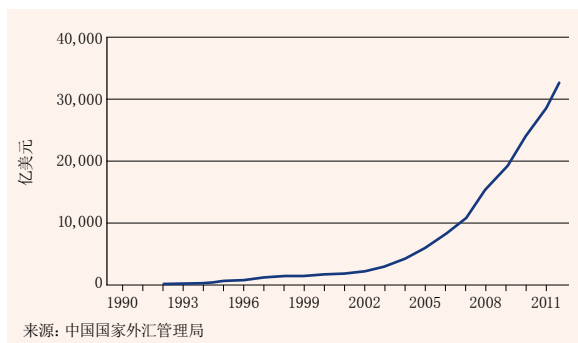
很多西方国家的公共和私人部门债务很高,这在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表现尤其明显。为重塑市场信心,需要私人部门去杠杆化和公共部门的财政巩固,而这些调整将需要很长时间。与此同时,中国则一直在处理储蓄率过高的问题。储蓄盈余是中国经常账户盈余的重要原因,反过来,鉴于中国要维持汇率基本稳定,这就将导致国内基础货币投放不断增加。

因此,一种新的投资互补关系逐渐浮出水面,那就是中国把其储蓄盈余以外国投资的方式投向西方国家,这些国家可以利用这笔资金,来抵消由于财政巩固和私人部门去杠杆化导致的收缩效应,并且以此来刺激其疲弱的经济发展。

中国“走出去”的需要

从宏观层面看,中国对外投资主要受国家需要的驱动,从微观企业层面来说,是公司经营的需要。随着国家的发展,很多中国企业已经变得日益成熟,在资产和金融状况上变得更加强大。中国需要走出去购买自然资源,包括能源、矿产和农产品,来支持国内的快速增长。投资于海外的这些领域,是获取长期稳定供给的好方法。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中国需要在国外重新配置生产或者通过与国外企业合作的方式,来培育全球合作伙伴,开拓新的市场,应对贸易限制。在新市场进行投资,也能够帮助中国企业降低费用,更多了解海外市场,并且能够对国外市场的需求变化进行及时和快速的反应。跨境收购和合并也能够使很多中国公司获取技术、管理和经营技巧。近些年人民币升值趋势,也增加了

图表10: 中国官方外汇储备



很多中国公司投资海外的能力。中国银行的强大能力在支持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方面也至关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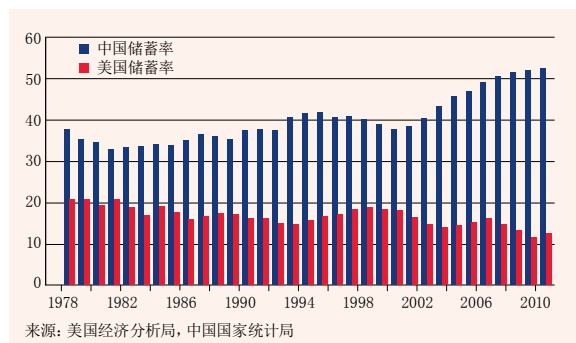
近年出现的中国对外投资大潮,也源于政策的刺激效应。中国政府实施“走出去”的政策,逐步改善了中国企业投资海外的商业环境,比如简化了审批程序,放松了融资安排,改进了外汇服务。2009年公布的《境外投资管理办法》也明确规定,很多海外投资项目不再需要中国商务部的核准。

中国的新投资机会

随着成本增加,中国作为低成本生产基地的吸引力正在下降。但是中国工人的收入增加,正在把中国变成一个重要的市场。基于在中国投资的几十年经验,美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的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潜力巨大的中国市场以及中国日益崛起的中产阶层的强大消费能力。一个更加发达的经济和日益繁荣的国家对不同的生产者和消费服务的需求也在日益增加。而在这些领域,很多都是美国公司的强项。具有更高教育水平以及技术更加娴熟的中国劳动力的快速增加,也使得越来越多的美国公司有动力来开发这个巨大的知识劳动力储备。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USCBC)的研究表明,对美国企业来说,中国未来将是一个2,500亿美元的大市场,94%的美国公司在中国经营主要是

图表11: 中美储蓄率对比



为获得中国的国内市场,而不是把中国发展成为一个出口平台。大约相同比例的美国企业或者把中国看作是他们的全球首选市场,或者把中国作为五大重点市场之一³²。

未来中美投资合作的潜力

美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

中国经济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给中美双边投资提供了巨大的空间。中国经济将经历根本性的结构变革:从出口驱动、劳动力和资源密集型产业转向依靠创新、技术进步、国内消费和服务业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这无疑将导致对高技术产品和服务的巨大需求。中国政府也将颁布更加有利于促进直接投资的政策,以便能够更好地使用直接投资来促进国内经济的转型升级。

城镇化是中国未来十年另一个关键性的经济发展战略,很可能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的城镇化率目前仅为50%左右,比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低20%。未来十年,持续的城镇化进程将会驱动40万亿人民币的投资,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将达1万亿人民币³³。这将给外国直接投资带来很多新的机会。

³²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 2012年中国商业环境调查结果:持续增长和有利可图;由于成本上升、竞争和市场障碍等持谨慎乐观态度。

³³ 《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0-2020)》,中国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NDRC), 2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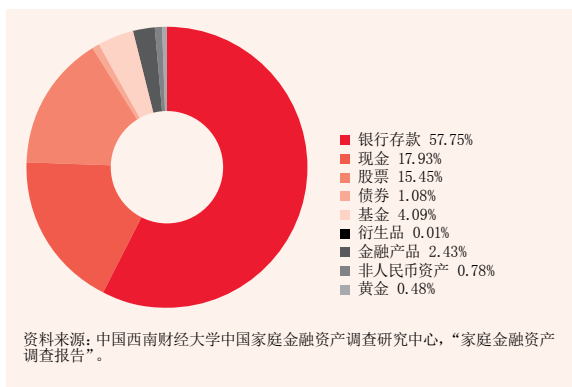
中国在美国的直接投资

中国“十二五”规划提出，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投资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政府已经决定为“走出去”投资的不同行业的企业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包括金融、能源、建筑、批发、教育等等行业的企业投资国外。伴随着充足的资金资源和过去几年获得的投资经验，未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无疑会进一步加速，不管是在投资数量上还是投资范围上。一项由美国私人公司开展的研究预测，2010年至2020年，中国将会有超过1万亿美元的直接投资流向海外，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将会流向美国³⁴。

美国的消费市场对中国企业来说具有很大吸引力。随着海尔集团和联想集团成功进入美国市场，未来还会有相似的企业进入美国市场。在能源和农业方面，不管是与科研相结合还是与生产相结合的投资项目，都将吸引中国企业到美国来投资。房地产市场可能是另一个对中国企业构成很大吸引力的领域。美国需要建设新的基础设施，或者修整基础设施，也会对中国企业构成吸引力。很可能在几年内，中国企业赴美直接投资将赶上甚至超过美国企业到中国进行的直接投资³⁵。

中国企业赴美投资带来的创造就业的潜力不应被低估。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估计，每50万美元的外国投资将会创造大约10个新的工作机会³⁶。如果2020年中国在美投资达到2,000亿美元的话，就将会创造大约40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

图表12: 中国家庭金融资产分配



中美证券投资流动

鉴于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和资本限制，从中国流入美国的证券投资中很可能中国主权财富基金会继续占主导地位，例如中国投资公司 (CIC) 和国家外汇管理局 (SAFE)。只要美国的国家信用仍然强劲，股市有竞争力，这样的投资会继续增加。

随着外汇管制规定逐步放宽，中国家庭对外投资的巨大潜力将得以释放。由于家庭收入和高收入群体的规模增加，中国家庭财富正在快速增长，但因为外汇管制，这些财富大部分是人民币。根据《2012年中国家庭金融资产报告》³⁷，中国家庭金融资产总额估计为9.5万亿美元³⁸，但其中海外投资很少。其中，存款占的比例最高 (57.75%)，其次是现金 (17.93%)、股票 (15.45%)、基金 (4.09%)、银行金融产品 (2.43%)。如此大的无风险资产持有比例，反映了许多中国家庭的保守投资习惯、在过去的二十年中表现欠佳的中国股市以及海外投资渠道的缺乏。

随着中国政府逐步放宽外汇限制，中国家庭证券投资的多元化将导致外币投资需求的快速增长，以满足证券投资平衡的需要。可以近似地

34 荣大聂和韩其洛:《美国敞开大门——充分利用中国海外直接投资》，2011年5月。

35 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2010年，中国在美外国直接投资为32亿美元，已经比美国在中国投资的30.2亿美元要多。然而，中国商务部的数据并不如此，根据商务部的数据，2010年中国在美直接投资为13亿美元，美国在中国直接投资为40.5亿美元。两个国家政府提供的数据不一致，并不令人吃惊，因为两国采取不同的定义与数据调查方法。然而，两个系统的数据都表明了相同的趋势，那就是中国赴美直接投资正在增加，与美国在中国直接投资的差距正在缩小。

36 见《中国在美外国直接投资：原因、案例研究和未来》，美国商会上海分会，2010。

37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

38 《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中国家庭的银行存款总额为5.5万亿美元，2012年中国的调查报告表明，银行存款占家庭金融总资产的57.75%。此外，从2013年中国人民的政治协商会议讲话材料显示，中国的家庭金融资产及银行存款金额为50万亿元 (8万亿美元) 和41万亿元 (6.6万亿美元)，这与我们的估计基本一致。

图表13: 美国企业在中国投资的十大担忧*

1	人力资本: 招聘并保持有技能劳动力
2	行政许可, 经营和产品许可证
3	与中国企业的竞争 (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
4	成本增加
5	知识产权保护
6	各地法律政策实施不平衡
7	投资限制
8	与在中国的其他外国企业竞争
9	在没有美国外国腐败行为的条件下与外国和中国企业竞争
10	标准和符合性评估

*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关于2012年中国商业环境调查报告: 持续增长并有利可图; 由于成本上升、竞争和市场障碍, 对中国商业环境谨慎乐观。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 2012。

通过日本的情形来估计未来的中国外币对外证券投资。日本家庭也有类似的储蓄习惯, 家庭总资产的55%为银行存款, 其海外资产的金额约为5,020亿美元, 占金融总资产的3%³⁹。

如果在未来十年中国的外汇限制大大放宽, 中国家庭可能持有相同比例的外汇证券资产, 中国家庭的国外资产将达到5,700亿美元⁴⁰, 平均增长速度估计约为28.8%⁴¹。很明显, 美国发达的金融市场和丰富的金融产品会吸引相当比例的中国家庭的投资流量。

中美双向投资的几点担忧

美国对在中国投资的主要关切

尽管历史上美国企业在中国投资有成功的经验, 但美国公司对在中国投资环境的忧虑也在逐渐增加。根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 (USCBC) 的调查研究⁴², 在受访的企业中, 45%的企业认为中国当前的商业环境比三年前要差一些。

图表13列出了美国企业在中国投资存在的主要担忧, 包括日益增长的成本, 特别是劳动力成本 (第1条和第4条)。公司在招聘、培训、雇用和保持劳动力方面也面临着严重困难, 特别是难以用合理报酬雇用有技能和管理才能的劳动力。根据这项调查研究, 2012年57%的美国公司遭遇了工资上涨, 一般上涨幅度在5%至10%之间。尽管已经提高了工资水平, 但是有技能的劳动力的流失率仍然达到了10%至20%。

其中有五方面的忧虑集中在不公平竞争、保护主义和对市场准入的限制方面 (第2、3、6、7、10条)。调查显示, 由于市场准入限制日益增加, 有半数的企业减少或停止了其在中国的投资计划。与此同时, 85%的企业认为, 由于中国实施了“自主创新”政策, 尽管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也对自主创新政策进行了阐述, 要公平和开放地对待外国企业, 特别是在政府采购方面, 但是在一些非歧视性做法上仍然有待改进。

管理透明度和知识产权保护仍然是广受关注的问题, 尽管很多美国公司也承认, 最近几年在这些方面已经有了很大进步, 但是改进仍然非常缓慢。95%的企业表示, 他们或者部分关注或者非常关注知识产权保护的实施。商业秘密、商标和专利是侵犯知识产权的3个主要方面。缺乏刑事阻吓的做法被认为是中国发展出一套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的主要障碍。

39 <http://business.financialpost.com/2011/03/29/why-japan-wont-repatriate/>

40 根据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 家庭收入到2020年将增加一倍。鉴于购买的金融资产主要取决于家庭收入, 家庭金融资产的总量将增加一倍是合理的假设。

41 根据《2012年中国居民金融资产调查报告》, 家庭资产总额中非人民币资产的比例为0.78%。由于资本流出和外汇的限制, 大多数的住户的外国资产被认为是外币存款, 在计算未来10年的平均增长率中, 基年家庭外汇资产量的估计为312亿美元。

42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关于2012年中国商业环境调查报告: 持续增长并有利可图; 由于成本上升、竞争和市场障碍, 对中国商业环境谨慎乐观。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 2012。

中国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主要集中在市场准入和外资持股比例限制方面。目录把在中国不同产业的投资设置为鼓励、限制和禁止等几类，并且在90多个行业施加了外商持股比例的限制（最近的USCBC出版物中列举了一些⁴³）。2011年4月，美国商会在一份给中国政府的备忘录中提到，“中国对待外国投资的方法总是变化，有时候不可预知，并且对外资看起来有些过度怀疑，除非这些投资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目标实现。⁴⁴”

美国公司也表达了对中国政府最新的关于境内兼并和收购安全检查方面的忧虑，这些主要体现在《国务院关于建立外资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通知》里面。除了缺乏程序上的透明度，美国商会认为，对于决定哪些交易要提交审查并没有一个清楚的界定⁴⁵。举例来说，一些行业，比如重要的农产品行业、重要的能源和资源行业以及核心技术行业等，都被描述为与国家安全有关。美国商会认为，这些条款更多是经济利益的检查，而不是狭义上国家安全的范围。

中国的回应与改变

中国已经对上述忧虑作出了积极回应，并开展了相关工作。最新的例子是，在市场准入方面，中国在2012年5月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承诺，“外资并购安全审查仅针对国家安全关切，并遵守规定的时限和审查标准⁴⁶。”

中国承诺将继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相关法律法规，并且考虑加强对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惩戒力度。中国也承诺将继续要求政府机构使用正版软件，并且履行之前关于技术转移和技术合作由经济主体自行决定，而不是作为市场准入的前提条件的承诺。中方表示，全国打击侵

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领导小组2012年年度工作计划将包括针对商业秘密不正当使用的执法行动⁴⁷。

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中国也承诺将继续核准合格汽车金融公司（AFC）和融资租赁公司，包括外国投资实体在中国发行金融债券。承诺将对外国和本国的金融机构在发行有资产担保证券上，在资产证券化试用期内一视同仁。中国官方承诺将通过修改相关规定，允许外国投资者在合资证券公司中持有不超过49%的股份，合资公司可从事股票（包括人民币普通股、外资股）和债券（包括政府债券、公司债券）的承销和保荐，允许合资证券公司在持续经营满两年以上且符合有关条件的情况下，申请扩大业务范围。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中国承诺允许外国投资者在合资期货经纪公司中持有不超过49%的股份⁴⁸。

因为中国国内市场尚不成熟，在进一步对外资开放方面，中国政府坚持渐进开放的基本原则，以维持宏观经济稳定。以金融部门为例，尽管国内外有很多对中国政府在开放金融市场上过于谨慎和保守的批评，中国政府仍然坚持审慎的自由化和开放进程，因为中国的金融市场仍然欠发达，并且非常脆弱。政府监管能力、市场风险管理能力和治理体系都无法满足全面开放市场的要求。过去几十年，全世界持续发生的金融危机已经表明，不成熟的金融市场开放将面临极大风险，中国对金融市场改革和开放应该坚持审慎的原则和进程。

中国对在美投资的主要关切

中国企业对在美国直接投资的关切，主要是美国政府对外国投资在具体产业部门的管制和政策。举例来说，外国投资在一些能源、电信、公众媒体、铁路建设、矿山开采、水电设施等领域是被禁止的。外国建造和外国拥有的船只不允许在美

43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中国对美国和其他国家投资者的所有权限制》，2012年5月。

44 美国商会和美国商会在中国的分布提交给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的报告，2011年4月。

45 美国商会提交给中国商务部的报告。2011年4月。

46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成果清单，2012年5月，第6页。

47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成果清单，2012年5月，第4页。

48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成果清单，2012年5月，第9页。

图表14: 中国在美投资的主要关切*

1	市场准入和外国投资所有权利限制
2	无法预测的安全审查
3	国有企业歧视
4	美国签证政策
5	美国国内政治
6	遵照美国对所有企业采用的法律法规

* 不是以排名列出

国的港口间从事客运或者商业运输。外国公司在美国航空公司不允许持有超过25%的有投票权股份,或者通过其他方式控制航空公司。对美国严格禁止外国银行在美国国内设立分支或者兼并美国银行也有很多抱怨,这些规定都限制了中国在美国的金融投资⁴⁹。

一些中国投资者已经提出,美国外商投资委员会(CFIUS)对外国投资的安全审查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并且常常不可预测。一些并购的案例通常都遭到了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这些利益集团主要是一些美国国会议员,商业利益相关者和媒体。然而那些较少有公众评论的项目却得以通过⁵⁰。这些不可预测性和评估的模糊标准让中国投资者感到投资成本过高,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甚至有可能让其名誉受损,从而影响他们的投资信心。

美国政府通常也限制外国投资者进入一些所谓的“战略性”行业或者与国家安全相关的领域。但与中国不同,美国并不明确地公布清单来指导外国投资哪些产业可以进入,哪些产业不可以进入,而只是笼统地宣称除了与美国国家安全相关的产业,美国欢迎所有种类的外国投资。然而对很多中国投资来说,这种方法过于模糊,并且缺乏透明度,因为很多高技术或者能源交易通常被冠以危及国家安全之名而遭到拒绝。

中国的很多私营企业在规模、资源和海外大规模投资方面的能力还不足,特别是在一些需要大量资本的投资项目中,中国的国有企业要充当主导地位,这时这些关切就更加明显。美国针对中国的高度政治化的环境使得中国国有企业赴美投资情况更加恶劣,尤其是美国进入选举季的时候⁵¹。例如,上次美国中期选举,至少有29位候选人加入到某种形式的反对中国的竞选活动之中。过去几年,对几个受到高度关注的交易的处理,比如2005年中海油收购优尼科公司的失败,就是受到了严重的政治影响,这次失败也对中国投资者影响很大,使他们对美国的投资环境更加没有信心。根据荣大聂和韩其洛的研究,干扰与中国有关的交易近些年有上升的趋势,这些干扰往往与国家安全或者特殊利益集团的游说有关系⁵²。

尽管中国国有企业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很大比例,但是中国国有企业进行海外投资正在减少,在数量上已经被私营企业超越。根据中国商务部的数据,2010年由国有企业开展的对外直接投资已经降至66.2%,比2009年下降了3个百分点⁵³。同时,荣大聂和韩其洛的研究也表明,2003年至2010年间,有记录的中国企业在美230项投资中,有170项来自私人企业,占全部投资总数量的74%⁵⁴。

另一个中国企业在美投资的主要关注,是美国的签证政策。对美国签证政策的抱怨不仅有签证的申请程序,也有美国移民办公室官员的态度方面。对于签证的主要抱怨是,美国签证的申请期很长,手续繁琐,有效期短,获签数量少,拒签率高以及什么情况能够获得签证的标准比

49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在美直接投资现状、问题及原因》,2011年6月。<http://bbs.jjxj.org/thread-1087112-1-1.html>。

50 可以参看荣大聂、韩其洛2011年的报告,第62页,中海油收购优尼科(2005)以及随后的中海油2010年在德克萨斯收购页岩气的案例;华为收购3com(2007)和联想收购IBM(2005);鞍山钢铁厂的收购(2010)以及天津钢管厂的收购(2010)。

51 一个最近的例子可以反映出中国在美国投资的高度政治化的环境。那就是《关于中国电信公司华为和中兴给美国国家安全带来影响的调查报告》,2012年10月8日发表。这项报告由美国情报委员会主席Mike Rogers等人提出。报告认为,华为和中兴为美国关键基础设施提供服务可能会影响美国的核心安全利益。在报告结论的背后,是认为两个公司都与中国政府有密切关系。

52 参看荣大聂和韩其洛2011年的报告地59-64页。

53 中国商务部:《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11年9月。

54 荣大聂和韩其洛,2011年第33页。

较模糊等等。在美国签证官那里，偶尔遇到的一些不愉快的案例，也进一步使中国人相信，美国实行歧视性的签证政策。这些问题近些年已经引起了美国政府的重视，并已经着手进行解决。根据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的说法，在过去两年中，赴美签证的等待时间已经从北京100天、上海70天大幅缩短到两天，不管是在北京还是上海的四个美国签证事务办公室，而这是在签证申请量增长40%，却没有增加任何一个签证官的条件下实现的⁵⁵。这确实是值得称赞的成绩，这也表明，在签证申请和审核安排上还有改进的空间，比如在增加签证数量方面。

美国的回应及行动

目前，中国在美投资覆盖了美国的很多产业，包括一些战略性和高技术产业、自然资源和基础设施领域。大量实际和潜在的中国在美投资（包括所有的绿地投资和大多数并购投资）通过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查，也很少受到阻碍。因此，一些独立观察人士指出，没有证据表明，中国企业在CFIUS审查过程中受到了歧视⁵⁶。

美国认为，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查体制设计良好，并且反映了美国对经济利益和提高来自外国竞争的开放传统⁵⁷。2007年美国提升了外国投资委员会的职责，赋予其立法委任权，并且将其职能扩展到审查关键基础设施和外国政府控制的实体企业方面，除非这些投资被美国财政部或者CFIUS的领导机构所豁免，CFIUS被赋予审查所有可疑交易的权力变得更加明确。

在去年五月北京举行的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美国重申欢迎外国投资于包括金融业的各部门，并承诺继续对中资银行、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的申请，提供在类似情况下与其他外国金融机构同样的审慎监管标准待遇。

美国官方也承诺，将积极审核和考虑中资银行的待批申请，主管当局将尽快加以处理。双方都承诺，加强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及专业金融机构方面的信息合作，加强两国在交易所和交易系统建设方面的合作交流。

美国启动了“选择美国”计划，旨在鼓励、便利化和加速国内外企业在美投资。进一步说，很多不同层面的投资促进计划被加以组织来帮助中国投资者解决相关问题。美国的商业部门，包括美国商务部和美中商业委员会，也都在帮助培育中美双边投资。

中美证券投资关切的主要问题

为了配合自1978年以来国家的经济改革和开放政策，中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逐步引入金融部门的改革。然而，多年来金融市场自由化一直被广泛认为落后于迅速发展的中国现代化建设。今天，中国仍然保持了全面系统的资本管制，调节资本流入和流出中国。和当前国家的发展水平相比，中国的金融市场也普遍不发达。相对于经济规模和储蓄规模，中国证券投资流入和流出，特别是私营部门，是非常小的。

随着中国居民财富的迅速积累，以及现代化经济迅速发展的需求，中国证券投资具备了激增的潜力，无论是流入还是流出。事实上，尽管中国的资本市场还不够成熟，也基本没有对外部投资者开放，但许多市场的规模和所涉及的营业额已经跻身世界最大的市场。例如，在A股市场，有7,800万散户投资者，超过1.68亿个交易账户，采用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电子交易技术⁵⁸。同时，中国拥有超过1,300万企业，4,000多万个体企业和大量新成立的创新企业，需要在资本市场筹集资金⁵⁹。

对资本流入和流出中国给予更多的自由，将

55 <http://www.carnegieendowment.org/2012/09/13/forging-u.s.-china-relations-with-ambassador-gary-locke/do64>

56 参看荣大聂和韩其洛2011年的报告，第61页。

57 参看荣大聂和韩其洛2011年的报告，第65页。

58 郭树清，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主席，2013年1月14日在亚洲金融论坛的讲话。（http://www.csrc.gov.cn/pub/csrc_en/newsfacts/release/201301/t20130114_220400.htm）

59 郭树清，同上。



鼓励更有效的资本配置，这对于中国下一阶段的现代化建设十分重要，不仅为中国的储蓄获得投资盈利提供更多渠道，也为不同类型的企业成长提供新的风险资本来源。随着中国的深入改革和金融市场的现代化，中国将继续放宽资本流动的限制，跨境证券投资流动迅速激增的巨大潜力将得以释放。

回应和行动

在最近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中国承诺将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配额总量增加到800亿美元，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的配额提高至人民币700亿元。

中国也承诺将与美国机构合作，扩大金融保险业。在该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中国重申将继续遵守主权财富基金普遍接受的原则和做法的承诺。美国重申将按照经合组织2008年6月公布的《主权财富基金与接受国政策宣言》对包括主权投资基金在内的外国投资者坚持公开和非歧视原则的承诺。

对于最近发生的反向并购，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中国的国有企业有直接参与。反向并购的大部分是中小民营企业筹集资金，具有战略意图的收购美国有价值资产的情况很少见。这种方法似乎是中国资本市场欠深度的一种症状，而不会威胁到美国的经济安全。此外，为了对中国会计和审计公司采取更加严格的监管，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和商务部正在进行讨论和沟通⁶⁰。

中美合作促进跨国投资的几点建议

中美两国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但两国政府公开承诺建立开放、非歧视性的投资环境，并采取切实

行动来促进目标的实现也至关重要。在2012年5月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后的联合声明中，两国政府都重申了培育开放、公平和透明的投资环境对两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重要性。美方欢迎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和国有企业的商业投资。两国政府声明，它们的投资审查程序将仅限于国家安全，并且同意通过中美投资论坛来讨论双方对这个领域的关切。双方都同意拟定中美双边投资协定第七轮及后续谈判议程，加紧进行谈判。

遵守这些承诺并采取后续步骤来提升两国的投资环境，对未来中美两国最大化经济合作收益来说至关重要。消除这些对FDI的障碍，将会对中国在美投资提供商业支持，有效实现双赢。

中美投资合作给两国带来的好处怎么估计都不过分。目前的挑战主要是如何解决双边投资中存在的障碍和问题。我们下面提出一些关于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建议。有些建议已经被提出来了，并且官方正在处理，特别是通过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这个平台，但是清晰的进展和突破需要在策略思维和方法上作出更多改变。

进一步促进相互理解

防止投资审查程序受到政治干扰。

美国投资审查程序总的来说设计良好。然而我们强烈建议，要防止审查程序受到政治干扰，并且进一步提高决策过程的透明度。举例来说，一些宽泛的定义，如“国家安全”、“关键基础设施”和“外国政府控制”等等，都应该明确加以界定。

加强文化交流以发展双边联系及避免误解。

本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可能要属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由于文化背景不同，中美两国人民应该进行教育、文化、政治和商业交往，以提升两

60 同上

国间的长期合作，并加深双方的理解。一些非盈利组织可以组织一些项目来提升两国人民的语言技能。法律术语、定义以及一些法律上的用词应该进一步澄清以避免法律上的争议。

将投资推广系统化

检查并改进投资指导。

中国外国投资指导目录和其他投资指导性文件，对于投资者来说过于宽泛，并且模糊，难以发挥清晰地指导投资者的作用。特别是审查过程通常复杂且冗长，评估的范围也进入了一些敏感但没有被清晰定义的领域，比如经济安全、商业秘密以及社会秩序等。美国也应该考虑对中国投资者常常碰到的问题制定一些指导意见（用汉语发布），比如说劳动力、税收、签证、知识产权保护和其他的一些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建立地方政府层面的投资促进机构。

除了高端的政府间对话，我们也需要加强两国地方政府间的合作以及地方商业组织间的合作。目前，美国的每个州都在中国设立了办事处，主要由州政府代表、市政府和旅游机构以及港口人员组成。这些机构的主要目的是提升中美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两国应该考虑建立地方投资促进机构，并且形成地方政府投资促进网络。美国政府最近发起了一项名为“选择美国”倡议，来吸引中国和其他外国投资者到美国投资，并且承诺鼓励地方政府层面的合作。这些行动都应该得到鼓励并且进一步加强。

举办投资项目洽谈会。

两国政府可以鼓励并组织一些非定期的中美直接投资项目洽谈会，可以提供相应的激励机制来鼓励地方政府和企业参加这些洽谈会。

鼓励建立投资基金。

两国政府可以考虑鼓励建立一些特别的基金来支持双边投资。特别是，中国可以考虑支持一些更加复杂的风险投资和私募基金在公司重组和融资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并且鼓励合格的境外投资者投资国内的股票市场。

改善两国的投资环境

公布“安全港”名录并且提升政策制定和发布的透明度。

两国政府都应该发布自己的产业“安全港”名单，或者一些可以免于审查的外国投资标准（比如投资的所有权上限）。提高美国的政策透明度，通过发布更加完善的政策指导原则和运用更多用户友好和有效的沟通渠道，在诸如国家安全、环境、反垄断等领域，可以减少投资者面临的不确定性，也能够消除中国投资者认为美国执行歧视政策的看法。相似地，中国也可以提升其与投资相关政策的透明度。

解除在一些领域的投资管制。

中国的《外国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仍然限制外资进入很多产业部门，比如能源、基础设施、金融、医疗等。即使在那些没有限制的产业领域，也很难保证外资能够进行公平竞争。中国应该创造一个对FDI更加友好的政策环境，给外国投资者更多的有利条件和国民待遇。

加快谈判并签订双边投资协议（BIT）。

中美两国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双边投资协议也将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投资协议之一。两国政府在最新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都已经承诺，要在2012年4月美方完成双边投资协定范本评估后，拟定中美双边投资协定第七轮及后续谈判议程，加紧进行谈判，但是并没有明确这一过程需要多长时间，也没有明确



说明，两国政府将如何采取具体措施，来培育一个对本国和世界经济都公开、透明的投资环境。为了与美国完成双边投资协议谈判，中国需要继续减少对外国股权的限制，以便满足美国的国民待遇标准。如果中美两国能够在双边投资协议上取得明显进展，就会有力地提升双方的互信，并发出强烈的信号，显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将一起致力于为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创造经济福利。两国也可以考虑使用其他的双边和多边投资平台，比如近期达成的《中国-加拿大外国投资促进和保护协议》（FIPA），正在进行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谈判（TPP），或者是提议探讨中美欧三边投资协议的可能性。

放宽签证限制。

两国都应该在澄清和加速签证申请程序方面多做工作，这有利于两国人民更容易获得签证。也可以对一些商业投资者的签证简化程序、延长停留期以及实行试点计划等等。

金融市场发展方面的合作

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大、最复杂且国际化的资本市场，但是最近的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也应该记取。尽管中国的金融体系在危机中仍然比较稳健，但是中国的金融市场仍然处于欠发达状态。为了保证经济政策和金融的稳定与安全，两国都要向彼此学习并加强合作。广义来说，可以进行三个方面的合作：

国内资本市场发展。

两国的金融体系都在经历巨大变革。在美国，最近的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国金融体系很多根本缺陷，并对监管者和市场参与者提出了新的挑战。在中国，外部冲击和不确定性也给其稳步推进和深化市场化金融改革带来了很大压力。然而，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需要根据其经济现实和基本情况作出改变，由于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经

济体的金融体系将不可避免地接触和相互影响，这也需要两国尽早开展密切合作，特别是在进行系统性改革的当口。对于中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监管和风险管理改革、解除金融体系管制、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改进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等，都可以得益于美国的经验和支持。相反，中国对美国货币政策的理解和支持，对美国财政巩固、融资以及其他问题的理解与支持，也有利于两国进行更好的合作和政策协调。

外部融资和双边汇率稳定。

中美双边关系一直是引人注目的话题。在最新一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中国特别强调将继续致力于推进汇率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供求在汇率形成中的基础性作用。尽管建立一个市场决定的汇率体系十分重要，但主要货币的金融管理当局也非常需要加强合作来避免汇率的过度波动。中国努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是国际金融的重要方面，这也需要与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国家紧密合作，特别是与美国合作。另一方面，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和中国快速发展的资本市场也应该引起美国当局的注意。

国际金融改革。

发展一个新的、更加有效的国际金融体系离不开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的积极参与。在最新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两国重申支持欧洲重建金融稳定和促进经济增长。双方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促进全球经济金融稳定发挥作用，确认按时落实201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十分重要。两国欢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推进综合监督决定方面所作的努力，并承诺支持这一进程。特别是对汇率政策进行严格监督，同时也支持监督活动拓宽覆盖领域，包括全球流动性、资本流动以及其他对外部稳定产生影响的相关因素。两国在对话中承诺，将

切实实施20国集团通过的国际金融监管框架，包括加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和风险处置，建立有效的金融公司处置制度，加强金融衍生产品监管。继续深化金融机构薪酬制度改革，支持建立全球统一的高质量会计准则的目标。双方还决定继续加强合作，打击洗钱、伪造货币、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恐怖主义融资等活动。

更好地利用香港的经验 and 资源

香港与两个经济体都有紧密的经济联系，其国际金融和商业方面的专业性对两个经济体来说都是重要资产。对中国大陆来说，香港将从原来的贸易和金融中心变成一个关键的人民币离岸市场和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通道。对美国来说，香港不仅是美国亚太商业活动的前站，也能够通过全球金融体系与中国大陆发挥重要的联系作用。如果说中国2001年加入WTO标志着中国正式融入国际贸易体系，那么近些年中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渐进地开放其资本市场，则标志着中国将日益融入国际金融体系。在这个方面，香港作为人民币离岸中心以及作为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试验田的角色将对中美两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第十四章

知识产权和信息安全

邵景春

北京大学国际经济法研究所所长

参与撰稿人:麦家驹 徐占忱

摘要

中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不够已经成为了美国许多商界人士心中的一大顾虑。主要问题有：

- 当前的知识产权法律执行不力
- 公众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淡薄
- 司法职能不够完善、处理知识产权案件有不足
- 法院结构分散化，导致一个案件需要诉讼多次且裁决判定可能不一
- 中国执行自主创新和技术转让政策时存在的问题
- 强制许可的使用和潜在的滥用

除此之外，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网络安全。美国指责中国政府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对美国进行网络攻击。中国政府完全不同意这种看法。事实上中国视自己为网络攻击的受害者，因为其自身的防御网络攻击的能力非常落后。认识到网络攻击可能造成的巨大损失，中国将黑客行径列为违法行为。然而，中国政府不排除有个人在中国参与网络攻击的可能。还有指控声称，有个人或组织在中国通过网络对美国进行商业和工业的间谍活动。

在过去的十年间，中国付出了巨大努力提高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中国加强了法律和相关机构的职能，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也在正在变化。但是，要对整个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需要时间也需要更多的努力。中国政府最近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在所有的政府部门使用正版软件，消除使用盗版软件的现象，政府采购与国内知识产权的拥有权进行脱钩，逐步改进执行知识产

权保护的司法部门职能，承诺解决跨境贸易中商品侵犯知识产权侵权产品问题。

美中两国政府一致同意继续携手合作提高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两个经济体继续实行双边合作机制。最近，《视听表演北京条约》被视为是中国和国际知识产权界的一个里程碑。

中国将进一步加强对知识产权所有者利益的保护，这不仅因为中国意识到必须采用国际上做法，也是因为这样做符合中国自身的利益。中国经济发展将不能单靠投入有形产品维持，知识创新和技术进步已经逐步成为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为了能在中国鼓励并促进创新，知识产权保护十分重要。近些年来，中国专利注册的数量逐渐攀升，许多中国公司还要求申请国外的专利注册。这些专利拥有者在中国迫切需要更有效的机制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因此希望在不远的将来，在这方面能够取得快速进展。

本文推荐了一些方法和措施，旨在深化美国和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 and 信息安全领域的合作：

- 相互承认各自知识产权的注册文件
- 更广泛地使用局域许可证，作为倡导使用正版软件的一种方法。
- 国有企业的软件合法化
- 建立国家知识产权法庭，处理国内所有知识产权权利人的诉讼请求
- 加强国务院跨部门知识产权组织的作为
- 改进技术转让市场安排
- 通过更紧密的双边交流与合作及国际合作加强网络安全



知识产权和信息安全

简介

近年来，尽管许多美国商界人士抱怨中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不当，但中国的确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例如，根据2012年美中商会¹的调查，超过一半的公司代表表示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在2011得到了改善或显著提升。

中国将会继续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不仅是出于中国的贸易伙伴和直接投资者的压力，更重要的是这样做符合中国自身的利益。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目标之一，就是从要素投入型经济转型成为创新驱动型经济。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必须加强在人力资源和研发方面的投入，更好地促进知识创新、专利保护和专业技术的发展。要达到这个目标，有必要建立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体系。

中国已经开始将经济发展的重点转向创新驱动。这具体反映在中国企业快速增加了申请专利和产权的登记（见图表7和8）。此外，许多中国企业在海外积极地购买新技术、新专利和商标。这些进步都表明越来越多中国企业会支持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有理由相信，中国政府会快速的其提升知识产权保护体制部门职能。这种模式与许多经济体类似，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台湾。

全球知识产权保护的发展和中国的积极参与

全球知识产权保护的发展

全球保护知识产权的多边体系，是由1883年《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1891年和1989年两条条约构成的《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19世纪末期《保护文文学艺术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等发展起来的。1967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成立，隶属于联合国大会。1970年签订的《专利合作条约》现在由该组织实施。

1994年签订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关于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最具影响力的协议。按照国际规定和最惠国待遇的规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建立了知识产权的最低保护层级，即每个世界贸易组织(WTO)必须提供给其他成员国的保护，并规定了在多边贸易体系中知识产权贸易的规则。强制许可，即“一国政府不需要获得专利所有者的同意，允许另外一方生产专利产品或进行商业操作”（世界贸易组织，2006年定义），根据《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的规定，在公共卫生危机发生的情况下是允许的，这包括HIV/AIDS 艾滋病、疟疾等其他传染病。2001年《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和公共健康的《多哈宣言》，基本认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成员国可以灵活操作，获得所必需的药物。2005年的部长声明进一步建立了法律框架，允许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出口根据强制许可生产专利药物的一般种类，使得那些在制药领域缺乏相关生产能力的国家能获得所急需的药物。

¹ 美国中国商会，“2012 中国商业环境成员调查报告 (UCBC)，2012年10月。”

图表1: 中国和美国签署的国际知识产权协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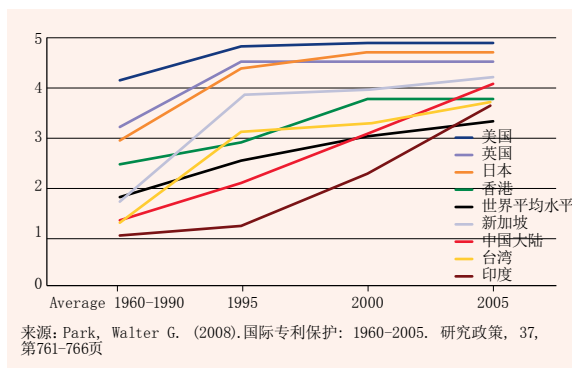
公约/体系/条约	中国	美国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	1980	1970
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	1985	1887
保护文学艺术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	1992	1989
专利合作条约	1994	1978
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	1995	2003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	2007	2002
视听表演北京公约	2012	2012

来源: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网站

过去十年, 全球知识产权保护尽管不时有争议发生, 但一直都在得到加强。2006年启动的专利诉讼快捷通道, 大大加快了专利审查处理的速度, 在参与国家收到广泛的欢迎。在另一方面, 美国、欧盟一些国家和其他一些发达国家²签订的《反假冒贸易协议》(ACTA), 却没有被许多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及一些欧洲国家所接受。尤其有人指责反假冒产品贸易协议(ACTA)谈判协商的过程并不民主, 条款的规定进行贸易犯罪制裁的门槛很低。许多终端用户担心他们在网络上进行的一些平常的操作也被当局认为是违反了该协议的规定。由于在许多成员国都有抗议, 欧洲议会最后投票表决, 于2012年否决了该协议的实施³。

最近, 2012年6月在北京举办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外交大会, 是中国也是世界知识产权保护的一个里程碑。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成员国签订的《北京条约》建立了国际法律框架, 来保护电影演员和其他表演者在数码领域的权利。这是中国自1978⁴年经济改革开始以来第一次举办此类会议, 签署国际知识产权条约。具有重要意义的是, 会议表明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符合中国自身的利益。按米歇尔·武茨——世界知识产权组

图表2: 专利保护指标, 1960-2005



织文化和创意产业版权保护法律部主任⁵的话来说, “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电影产业迅速发展, 并开始意识到的确需要保护电影演员和整个电影产业。”

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

尽管中国在知识产权领域是个后来者, 但是中国通过向西方学习, 在短短的三十年, 已经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而西方国家走过这一过程则用了二百多年的时间。正如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干事长阿尔柏德·鲍胥格所说的⁶, “在知识产权历史上, 中国所完成的一切, 速度是独一无二的。”

2 2012年6月30日反假冒产品贸易协议(ACTA)的签署国包括: 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摩洛哥、新西兰、韩国、美国、欧盟和22个成员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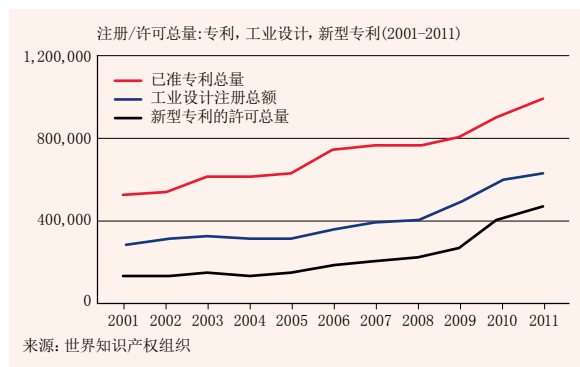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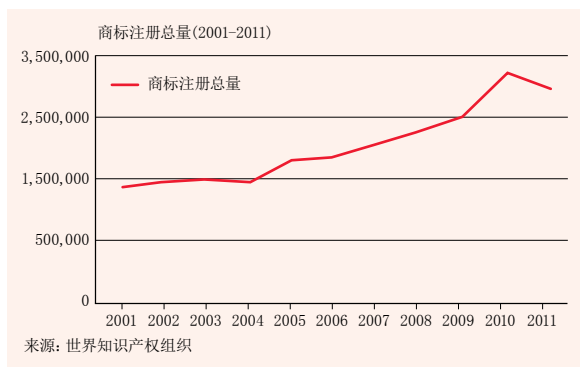
3 BBC新闻, “ACTA: 欧盟否决了存在争议的反侵权协议”。

4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办公室, “2012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北京协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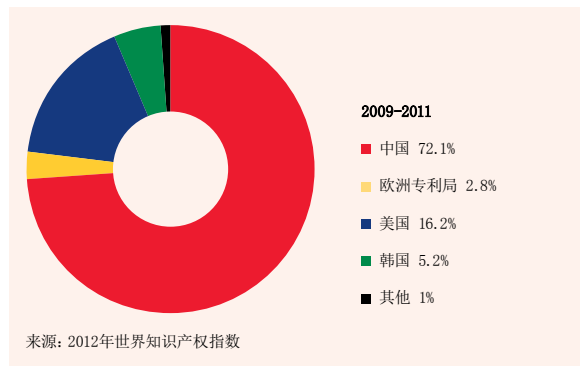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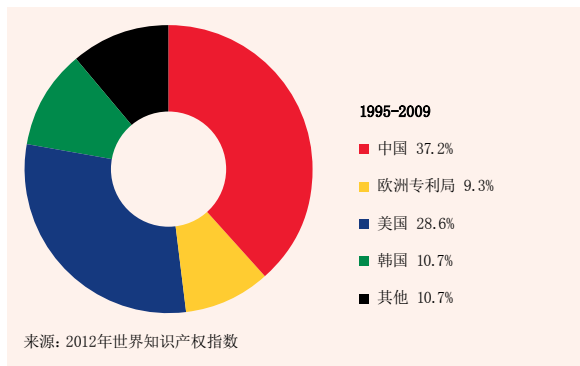
5 同上, 第四段。

6 中国知识产权办公室,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报告(白皮书)”, 1994年。

图表3: 世界知识产权注册/许可(2001-2011)



图表4: 国家/地区知识产权局在世界专利申请增长的贡献



他的观点被知识产权研究专家沃尔特·帕克所编著的专利保护指标(帕克, 2008年)所证实。专利保护索引⁷是122个国家在专利保护方面的力度指标。指标在1到5级之间变动, 逐渐增强。正如图2所显示的, 中国大陆的分数从1960-1990的1.33上升到2005年的4.08, 此时中国大陆的分数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3.34), 并高于印度、台湾和香港。但是, 中国要完全解决好所有知识产权侵权问题、一夜之间赶超现代水平,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是部分由于中国经济和社会的现实情况。尽管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比不上美国(4.88)、新加坡(4.21)和英国(4.54), 但中国近些年取得

了显著的进步, 并持续努力不断改进知识产权保护。

外国在华知识产权登记量、授权量的增长以及中国企业专利的申请量和授权量的增长

随着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体制的不断成熟以及中国市场的重要性不断提高, 日益受到关注的是在世界的知识产权登记授权上升的势头中(图表3), 中国的知识产权局2009年到2011对世界整体专利数目增长的贡献远大于1995-2009年(图表4)。

在过去几年, 外国在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利申请(图5)和专利授权显示有明显的上升势头; 日本、美国和德国是三大申请企业的主要来源国。

⁷ 具体来说, 指标是五项分数的非加权之和: 1. 覆盖面; 2. 国际条约的加入成为成员国情况; 保护时间区间; 4. 执行机制; 5. 限制条件。金那特和帕克讨论的两项敏感事项(1997)包括1. 现实情况和法规保护可能存在差距(例如: 法律在现实中得不到实施); 2. 每项不同分数的权重可能影响到跨国/跨地区的情况比较。这不构成专利保护质量的标准。

图表5: 中国专利局的国外专利申请情况(按国别)

国家或地区	所有年份	1985-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日本	417,991	223,545	38,188	34,480	34,381	38,241	45,228
美国	282,600	143,748	25,908	27,656	24,629	28,636	32,023
德国	105,974	52,354	9,388	10,145	9,694	11,297	13,096
韩国	93,647	48,971	9,601	9,320	7,113	8,782	9,860
法国	43,022	23,278	3,697	3,854	3,624	3,994	4,575
英国	24,822	14,304	2,012	2,233	1,911	2,087	2,275
加拿大	10,223	4,937	953	1,016	989	1,137	1,1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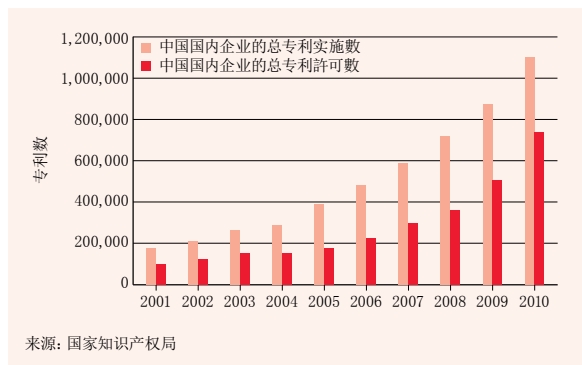
来源: 中国知识产权专利局

图表6: 中国专利局的国外专利实施情况(按国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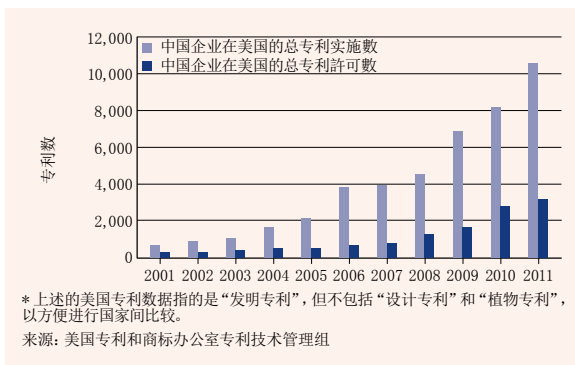
国家或地区	所有年份	1985-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日本	241,640	100,190	21,123	26,370	33,804	29,516	30,637
美国	117,881	50,944	9,709	11,195	15,273	14,938	15,822
德国	50,393	21,393	4,064	4,729	6,658	6,451	7,098
韩国	49,276	17,591	4,373	5,605	7,950	7,117	6,631
法国	22,191	10,259	1,861	1,849	3,004	2,690	2,582
英国	11,640	6,021	918	1,000	1,266	1,164	1,271
加拿大	4,397	1,666	335	443	599	677	677

来源: 中国知识产权专利局

图表7: 中国的专利实施和许可: 中国企业



图表8: 中国企业在美国的专利实施和许可*





图表9: 美国专利和商标办公室的发明专利许可情况(按国别)

国家或地区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美国	87,600	86,971	87,893	84,270	74,637	89,823	79,526	77,502	82,382	107,792	108,626
日本	33,223	34,858	35,515	35,348	30,341	36,807	33,354	33,682	35,501	44,813	46,139
韩国	3,538	3,786	3,944	4,428	4,352	5,908	6,295	7,548	8,762	11,671	12,262
德国	11,260	11,280	11,444	10,779	9,011	10,005	9,051	8,914	9,000	12,363	11,920
台湾	5,371	5,431	5,298	5,938	5,118	6,361	6,128	6,339	6,642	8,239	8,781
加拿大	3,606	3,431	3,427	3,374	2,894	3,572	3,318	3,393	3,655	4,852	5,012
法国	4,041	4,035	3,868	3,380	2,866	3,431	3,130	3,163	3,140	4,450	4,531
英国	3,961	3,831	3,622	3,443	3,142	3,581	3,292	3,087	3,174	4,302	4,307
中国	195	289	297	403	402	661	772	1,225	1,655	2,657	3,174
以色列	970	1,040	1,193	1,028	924	1,218	1,107	1,166	1,404	1,819	1,981

来源: 美国专利和商标办公室专利技术管理组

同时,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重点逐步转向技术进步和创新,中国企业专利申请和授予数量,无论在国内和还是在美国都显著增加(图表7和图表8)。然而,中国企业额在美国专利许可的数量(2011年是3174例)与其他发达经济体如德国(2011年是11,920例)、日本(2011年是46,139例)、美国(2011年是108,626例)(图表9)相比仍然较小。

网络安全

随着电脑、移动电话和其他网络设备与人们的生活联系日益紧密,个人、企业和政府变得越来越容易受到不同的网络犯罪的影响,其中包括间谍行为、破坏、颠覆和工业机密的窃取等,这会给受害者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2012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与会政府官员、企业界和学者人士普遍认为,网络攻击是一个全球性风险。虽然很难估量到底它对一国经济会造成多大的损失,但在某种程度上,这一问题可以从快速发展的网络风险市场和不断上涨的保险费中看出。

《反计算机犯罪布达佩斯协定》从2001年就允许国家加入,它被认为是第一项用于保护国家不受计算机网络和因特网攻击的国际条约。目的在于协调各国之间反计算机犯罪政策。美国、

加拿大、日本、南非和大多数欧洲国家是签署国或成员国,新兴经济体却很少支持。由于发展中国家不断增强的经济势力和电脑技术的不断复杂化,该公约是否能最有效的促进国际合作、提升国际意识和关注度仍然有待观察⁸。

肯尼斯罗格夫,是哈佛大学的国际经济学家⁹,他指出网络安全和金融稳定在许多方面很相似¹⁰。尤其是,两者都非常复杂、而且发展迅速,政府管理者很难跟踪。另外,就好像最近危机之前的金融市场发展,许多信息技术方面的利益相关者认为,政府的管理政策没有必要或者妨碍了产业的增长。据著名的反病毒公司卡巴斯基实验室的创立者卡巴斯基说,网络攻击是二十一世纪最危险的技术创新。罗戈夫和卡巴斯基先生都对最近出现的“震网病毒”和“火焰病毒”进行了评论,一致认为政府出于好意设计的病毒,可能会被用于其它可怕的目的。如果未来病毒被其它方利用,可能会对金融系统的运行或发电站等其他重要基建产生不可估量的破坏。

8 无论中国还是俄罗斯都是布达佩斯公约的签署国。“公约”体现的“越界访问”原则是他们主要关注的;国家的主权和国内法律可能会由于其他国家收集的跨国证据而被侵犯。

9 “政府是否准备好了应对网络危机?”, 2012.

10 专家发出网络战争警告”,纽约时报, 2012.

毫无疑问，在未来几年，信息安全需要进行更广泛的国际讨论和合作。

美国和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

美国

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知识产权密集型¹¹产业支持了美国大约四千万人的就业，（占了美国全部就业岗位的27.7%），占美国GDP的34.8% 和2010年的产品出口的60%。加强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知识产权的保护，一直以来是美国政府的核心政策之一。根据专利保护指数¹²的数据，美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有力和最全面的。最近，美国还进一步努力执行相关法律，打击盗版和假冒，通过私营企业的自愿行为减少网络侵权。在长期存在的法律和行政措施的基础上，美国根据2011年《莱西-史密斯美国发明法》进行了一次深入的专利改革。此法案的一条重要变化是，现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广泛采用的“发明人先申请制”，会替代现在实行的“先发明制”，这有利于建设一个全球统一的专利认定标准。

另外，为了保护美国公司在海外的利益，美国一直实行了两项针对其他国家的调查。首先，“特别301报告”起始于1989年，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对美国贸易伙伴知识产权保护情况进行的年度分析，该报告在对有关国家以案例分析为基础，并提供相关的建议，“特别301报告”根据知识产权保护和执行的情况将国家划分为三类，重点观察清单、观察清单和306条款监管国家。其次，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负责“337调查”，审查美国进口商品的不公平竞争情况，而近年大多数的审查都与知识产权侵权情况有关。

中国

中国是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后来者。为了适应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需要，中国政府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做了大量保护知识产权的相关立法工作。从本世纪初开始，中国开始着手改变发展模式，从出口导向型和物质投入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国内需求拉动的经济，重点强调创新和技术发展，此时中国也加强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投入的努力。

中国政府近年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取得的成就显著，令人鼓舞。例如2010年开始的知识产权执法专项行动，从2011年起中国政府将其列为持续性措施¹³。并于同年发布了“中国知识产权保护行动计划”¹⁴。考虑到其他国家的关切，中国取消了政府采购必须购买具有国内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规定¹⁵。第四届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宣布“与国务院立法计划及2012年财政部政府采购工作计划保持一致，中国将尽快发布政府采购法律的执行规定，及政府采购国内产品的管理措施的实施细则”。

另外，中国政府一直在推动政府部门使用正版软件：1) 2012年6月30日中央和所有省级政府都完成了任务；2) 省级和县级的审查和纠正工作预期在2013年年底¹⁶完成。中国政府已经将软件资产纳入到政府资产管理系统之中，并在政府财政预算账户中显示信息网络和软件购买更新的支出。实行优先企业试点项目，准备将使用正版软件的做法推广到企业。

中国政府进一步改进司法程序包含知识产权所有者的权利，这些努力已经得到了美国在华商会的肯定¹⁷：最近的一些美国司法专利试行规定和技术已经被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采用。

11 专利集中产业指的是专利密集度（也就是专利/岗位比例）高于所有其他产业的水平。商标集中产业指的是商标密集度（如商标注册/雇佣比例）高于所有其他产业的水平（2012年美国商务部）。

12 Park, Walter G. (2008). 国际专利保护：1960-2005. 研究政策, 37, 第761-766页

13 Gary Locke, “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大使圆桌会议”，2012.

14 中国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局, “2011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行动方案”, 2011.

15 中国的美国商会, “知识产权保护”, 2012 中国的美国商业白皮书.

16 中国商会 (MOFCOM) “中国：升级政府完成了软件合法化”, 2012.

17 中国的美国商会, “2012中国的美国商业白皮书”



美中知识产权合作及保护信息安全

近些年来，美国和中国建立了多种知识产权对话和协商合作机制。2011年¹⁸两国实行专利审查高速路试行计划，意义尤为重大。这标志着中国专利审查程序质量的改善获得美国认可。在此项目下，当中国的国家知识产权局或美国专利和商标办公室认为申请符合专利的规定，申请人可以要求对方机构快速审查相关申请。

在第四届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两国承诺共同解决跨国贸易中的知识产权侵权问题，并强调保护贸易商业秘密的重要性。中国政府已经确认了国务院知识产权保护领导小组的年度工作计划将出台非法使用商业秘密的规定。

另外，美中签订的知识产权保护合作框架协议、美国信息技术办公室大使圆桌会议、将知识产权保护列为执法合作联合行动小组的重点事项，过去两年引入的美中知识产权判决会，都表明了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政府间合作得到了加强。

另外，让人鼓舞的是美中安全对话，在2009年开始并由两国的研究机构进行组织，为美国和中国政府官员、学者提供了正式讨论和非正式交流的建设性平台。

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和网络安全的主要担忧

尽管近年来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增强知识产权保护，但中国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充分仍会成为众多美国企业的一大顾虑。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历史相对较短，加上其政治体制较大，其法律体系也仍处在不断成熟阶段，而且许多知识产权问题具有错综复杂性。

知识产权法执行

在过去十年里，美国政府和企业不断就中国知识产权侵权问题提起诉讼。尽管中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改革，但美国一些有关人士仍对中国态度的真实性，以及其承诺的可靠性表示怀疑。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政治、社会和经济环境较为复杂。尽管中央政府确定想加快知识产权保护的步伐，但最终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政府和法院的执法效率。由于中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和社会条件迥异，且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权力向地方政府下放，某种程度的地方自主性不可避免。知识产权法中意图良好的改革在地方执行时，因某些既得利益或官僚主义而延迟或受挫也在所难免。例如，2011年起中央政府决心把政府采购业务与国内知识产权产品脱钩，但在2012年许多省份和城市仍出现对此类作法持续存在的控诉。另一个引起公告与执法之间时滞的实际限制是，地方政府缺乏具有丰富经验和较高素质的处理知识产权争议和诉讼专业人员。知识产权全面调查资源匮乏，综合上述因素，使得中央政府的承诺兑现被延迟，从而给一些美国企业留下负面印象。

知识产权执法中存在的一个相关问题是，如何对待文化和历史因素。直到最近几年，知识产权保护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中国才受到重视。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知识产权法是对发达国家知识产权法的移植；改革开放早期，中国并没有形成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尽管法律框架逐步改善，但与现代知识产权保护有关的法律，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逐渐开始形成：《专利法》颁布于1984年，并在1992年、2001年和2008年进行了三次修订；《商标法》于1982年制定，1993年和2001年进行了两次修订；《著作权法》颁布于1990年，2001年和2002年进行了两次修订。2000年，辞条“知识产权”被加入《新华词典》（中国最畅销字典，1957年首次出版），这一事实从另一方面反映了普通中国民众对此类概

¹⁸ 美国专利商标局（2011），“美国专利商标局与国家知识产权局宣布实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专利审查高速公路试点方案。”

念的认识水平。这也客观体现了许多美国企业的不满，因为他们在评估中国市场绩效时往往期望太高。中国是美国《特别301报告》“优先观察国名单”上国家之一，因许多问题而受到指责，包括但不限于商标抢注、网络盗版，还有实用新型专利等创新性较低的垃圾专利和新产品审批过程中的商业秘密披露。

处理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完善司法程序的需要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具有“双轨制”特征：行政轨道和司法轨道。行政轨道包括各级商业和文化部门所设的办事机构；司法轨道则用于争议诉诸法庭裁决或和解。近年来，中国一直依靠前者在执行和保障知识产权所有者权益中发挥主导作用，因为中国的司法轨道落后于许多发达国家。且是美国企业投诉的主要来源，美方认为这不能充分补偿中国专利侵权的受害者。

据美国中国商会（简称Amcham China）¹⁹报告，由于诉讼程序中缺乏透露式流程，收集证明因侵权行为引起利润变化的证据可能会很费劲。在窃取商业机密或侵犯著作权的案件中，也经常碰到很难收集侵权行为的问题。

技术转让和自主创新

中国政府已颁布《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2006-2020年）》，旨在鼓励公司层面的商业性研究开发和提高国际竞争力。换言之，中国将自主创新政策视为提升经济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石。然而，在一些美国人看来，此政策象征着偏执的技术民主主义，反而不利于其经济福利。例如，有抱怨称，中国的自主创新政策使外国企业在软件、汽车和风能等行业遭遇了不公平待遇和市场准入问题。一些美国商人抱怨其技术以合资企业的强制性技术许可形式，或在

2009年著作权侵权案中体现的进步

尽管存在上述担忧，但2009年苏州虎丘区人民法院审理的“番茄花园”版权侵权案受到了众多美国企业的欢迎。四名在其tomatolei.com网站上传播微软Windows XP流行盗版软件的个人被判入狱并赔偿微软近300万人民币（合44.1万美元）。据美国商业软件联盟发布的一项声明称²⁰，“本案判决标志着中国最大在线软件盗版组织的瓦解，是中国打击互联网盗版行动的里程碑”。微软大中华区副总裁刘凤鸣称赞法院的判决道，“它展现了中国政府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切实举措”²¹。

根据要求设立的研发中心里，技术会被不自觉地转让到中国合作伙伴手中。此类研发中心，部分中方研究人员可能会在离开公司时将其技术带给中国公司。这些人还担心，在强制性测试和认证过程中，必须向政府所属或政府运营的实验室提供源代码、产品设计以及其它敏感信息。其它体现中国政府偏向国内技术标准的监管政策，也可能损害美国知识产权所有者的权益。

强制许可问题

国家知识产权局（SIPO）于2003年和2005年宣布了与强制许可有关的办法，并在2008年对其修订版《专利法》的相应条款进行再次修正。在整合了前述各版本法案后，知识产权局于2011年10月发布了一份新办法草案，征询公众意见。2012年3月，印度率先向一家治疗癌症的通用名药公司授予首个强制许可，此后不久，中国最新修订的《专利实施强制许可办法》于2012年5月正式生效。总体政策动向没有违反《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TRIPS）协议》，也与其他国际公约的规定完全一致。专门研究艾滋病、健康和人权问题的

¹⁹ 中国美国商会，《美国企业在中国2012白皮书》“知识产权”。

²⁰ 美国商业软件联盟，“番茄花园案主犯被判入狱”，2009年8月。
²¹ 美联社，“中国法院判决微软盗版者入狱并罚款”，2009年8月。



法律专家Kajal Bhardwaj²²称，中国政府能够大力修正相关条款并将该合法权利（强制许可）纳入其日渐成熟的知识产权制度，这是非常鼓舞人心的。尽管相关办法早在五年前就已到位，但中国制药公司并未申请任何强制许可。

然而，在一些外国药品原创企业看来，此举可能会损害到他们的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49条规定，“在国家出现紧急状态或者非常情况时，或者为了公共利益的目的，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可以给予实施发明专利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的强制许可”。此外，是否授予强制许可的一个决定因素是，专利权人是否充分实施专利或满足市场需求。某些美国利益相关者抱怨前述规定意义模糊，一些术语，如“公共利益”和“充分实施”等定义不清。中国政府与单个企业在闭门商议过程中缺乏透明性和存在议价能力不均等问题，使得外国制药企业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它们担心，强制许可可能成为中国政府迫使外国药品公司降低售价的一个有效策略，而这一目的是与WTO协议的初衷相背离的。

网络安全问题

美国不时指控中国当局直接或间接地组织或支持针对美国公司和政府部门的网络间谍活动。美国担心来自中国的网络犯罪会因中国公众与私营部门间的模糊分界线而变得复杂化。美国业界怀疑，一些中国企业可能在中国政府的帮助下或为中国政府通过非法途径获得美国机密信息。中国政府对此怀疑予以强烈否认，并一再重申中国也是网络攻击的受害者；尽管中国技术发展迅速，但中国政府进行网络战的能力仍较原始，所以不会对其他国家发起网络攻击。事实上，考虑到网络攻击可能造成的巨大损失，中国将黑客行径视作违法。中国相关法律的覆盖范围狭窄而对此类犯罪行为惩罚宽松，也可能是美国产生怀疑

的原因。尽管两国各自具有应对紧急情况的正式程序，但两国在应对网络犯罪方面却缺乏明确的沟通渠道。此外，相关机构很少就网络犯罪案件中执法合作和共同调查支持举行双边会议，这也成为有效解决网络犯罪问题的一大障碍。

如果通讯设施和设备的部分生产流程在国外进行，终端使用国不可避免地会遭受某种程度风险，有些漏洞或未授权功能被带入到相关网络或基础设施中。这个供应链风险不仅会存在于中国消费者使用的从美国进口的高科技产品中，也可能存在于利用中国工厂制造产品的美国公司中²³。作为中美网络安全企业间重要合资企业，2011年赛门铁克和华为合资公司解体，反映了在知识产权侵权和网络入侵问题上美国政府对中国不满而引发的紧张局势。

我们的建议

两国可以采取很多办法减少双方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的冲突或误解。我们认为以下建议符合中美两国利益，有助于建立促进经济合作和发展的商业环境。

相互承认知识产权专利注册文件

尽管《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著作权条约》已经制定了一系列国际版权保护协调标准，但全球仍未建立堪比这些协议的有效专利保护体系。三边专利局——即欧洲专利局、日本专利局和美国专利商标局——的专利申请在2004-2009年间的积压显得愈发严重。部分由于中国、韩国和印度专利局的专利申请迅速增长，预计在未来几年里，世界主要知识产权局的总工作量将进一步增加。理论上而言，最好的办法就

²² Tan Ee Lyn, “中国为获廉价药品修订专利法律”, 路透社, 2012年。

²³ 尽管有这些考虑，美国政府责任署（GAO）在2013年4月发现“在2010年1月到2012年10月期间没有一件涉及核心和通路通信网的网络事件通过[三个已建立]的汇报机制通报给联邦政府。细节请参阅报告“通信网络：基于成果的措施有助于DHS评估网络安全努力的有效性。”

是建立一套适用于全球（或加盟国）并由多边组织共同管理的统一的专利注册体系。遗憾的是，从中短期来看，这一理想还无法实现。

另一种理想的替代方案是通过签订双边或多边协议相互承认专利注册。根据英国知识产权局发布的一项研究结果²⁴，相互承认体系有助于大大减少审核二次申请所用的时间。比如说，如果相互承认体系能减少25%的二次申请，那么实施五年后，审核的滞后时间将缩短9个月（在基准情形下，处理积压工作会滞后48个月）。尽管相互承认体系具有很多潜在益处，但这一方案很难在最近付诸实践。比方说，美国与欧盟各国之间就没有签订此类协议。而中美两国达成此类双边协议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

尽管如此，如果允许一国的专利申请文件用于在另一国的专利申请，这也将是十分有益的事。如此能够大大促进美国专利在中国或者中国专利在美国的注册。这两大经济体之间已开展的专利审查高速公路试点方案不失为一个很好的试验基础，两国应当密切监测和评估测试的进度和有效性。双方知识产权局的政府官员应当定期会晤，就最新进度交换信息，并探讨拓展目前方案的可能性。考虑到中国专利申请量的迅速增加，并且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体制逐渐与国际标准接轨，加强双方合作将有利于减少专利积压时间量，进而缩短两国专利的处理时间。

广泛使用局域许可证

中美两国可通过签订商业协议，从知识产权密集型产品的交易中获得益处。比方说，一家美国软件公司以批量购买价格向中国一所大学出售软件，允许在校所有学生和工作人员合法使用其软件。

局域许可证不仅满足中国用户的需求，同时向美国的知识产权所有者给予合理的报酬。局域许可证允许一家组织（以批量折扣价）从软

件公司购买许可证后，在特定站点范围内的多台计算机上复制和使用此软件，这是实现中国私营和公共部门的软件合法化的一种有效途径。

在中国的电子杂志交易领域，也出现了相似的协议：1997年，在中国政府支付使用费的基础上，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和美国科学促进会会议达成协议，允许中国大陆互联网用户自由访问《科学》杂志。另外2002年，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从英国Maney出版公司和英国皇家学会购买电子期刊。这些交易主要涉及国家许可证的获得，可以视为将站点许可证延伸到了国家层面。

澳大利亚的经验表明，通过让药品供应商降低药品价格，争取政府补贴，消费者可受益于更低的药品价格，而药品的使用范围也将更广泛²⁵。这种方案具有把经济的无谓损失（垄断体制下产出更低，价格更高）转变成巨大的消费者盈余（价格更低，药品使用量更大）。另一方面，政府补助有助于保持或略微提升制药公司的利润。

国有企业的软件合法化

建议中国政府不仅在中央、省份及地方政府致力于消除使用盗版软件，同样也确保将这一措施推行至中央及地方的国有企业。

建立对中国所有知识产权案件具有管辖权的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法庭

最主要的问题是中国大陆三十一个省份、直辖市和自治区，对各自管辖范围内的知识产权案件具有单独的管辖权，这意味着企业要保护自身权益，可能需要向全国多家法庭提起诉讼。由于各种原因，不同地方法庭做出的判决可能不同，从而导致混乱和复杂化。例如，上海法庭和深圳法庭对唯冠科技（深圳）和苹果关于iPad商标在中国所有权的纠纷案件就有不同的裁决。

²⁴ 英国知识产权局，“专利积压与相互承认”（是伦敦经济咨询公司展开的一项经济研究），2010年1月

²⁵ Mark Johnston & Richard ZeckhaU.S.er, “澳大利亚药品补贴策略：从无谓损失和寡头租金转到消费者剩余”，选自Karen Eggleston编著的《亚太地区处方文化和制药政策》，2009年



知识产权是非常专业的问题。中国应当考虑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法庭，对所有涉及知识产权的案件进行统一审理，最终做出的裁决应对中国所有省份、直辖市和自治区具有约束力和强制性。在这方面，中国可以向发展更加成熟的国家学习。在日本和美国，有些类型的知识产权申诉案件是在专设的知识产权上诉法院审理的。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就是突出的例子，在美国，它扮演着知识产权案件的终审角色。在其他国家，包括韩国和英国，也设有独立的知识产权法院或专利法院处理所有的或重大的知识产权案件。在中国，成立一个全国性的知识产权法庭，能够集中各地区和省份的力量，提高司法程序的效率；法律和技术专家集中起来，可以建立起强大而统一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框架。此外，国内外的知识产权所有者，可以节省在中国各地法庭诉讼的资源，同时避免陷入裁定结果不一致的困境。

加强国务院跨部门知识产权组织的地位

考虑到有必要在国务院内部建立一个单一的跨部门知识产权组织，全国知识产权保护的领导小组于2004年成立。现在正逢进一步加强这一组织执行及协调能力的大好时机，确保达到全面合规。

改善技术转让安排的市场

中美两国在第四届中美战略和经济对话中承诺，“就中国2012年2月承诺——技术转让和技术合作应由商业因素独立决定，中国政府不得将其作为市场准入的前提条件——与所有相关机构进行的集中、持续对话”，并改善技术转让协议市场，让企业自愿达成安排，营造互惠互利的商业环境。同时坚持国民待遇原则，让中外企业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中开展竞争。

通过交流与合作促进信息安全

中美两国都已经在一些重要政府文件中表达了他们对网络安全问题的担忧。2011年，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了“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保护指南”草案供公众参考；同年美国白宫发布了“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报告。为了减少误解，战略和经济对话框架下的战略安全对话（SSD）为中美提供了一个对话平台。美国前国防部长帕内塔曾说过，双方应合作和开发多种渠道，避免影响双边关系的误会产生，这一点非常关键。除了战略安全对话外，双方政府还可以为文职和军事官员建立其他高层对话渠道，以便双方就信息安全交流观点，处理网络意外事件。更多私营企业参与双边对话也是很有必要的。双方还可以通过计算机安全应急响应组（CERT）推进合作²⁶。

事实上，自2009年开始两方智库机构——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CICIR）——就已经进行持续的“中美网络安全对话”。他们曾于2012年6月发表联合公报，概述了双方的一致观点以及存在的分歧。

网络安全是一个快速演变的全球性挑战。但网络安全问题非常复杂，从来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²⁷。我们很可能需要一种全新的国际管理机制来保护网络的安全。不过，各国对《布达佩斯公约》各持己见说明了对此问题达成国际共识所面临的挑战。我们建议中美就网络安全共识问题继续保持对话与合作。这不仅对中美两国很重要，对世界其他国家也同样重要²⁸。在美国国务卿克里2013年4月访华期间，双方达成共识，将在战略和经济对话框架（S&ED）下建立特别的工作小组，就网络安全问题展开讨论。该小组工作在于建立两国未来在以下方面的路径图：1)网络安全方面的合作；2)协作开发网络空间的国际协议。我们建议两国政府在未来18个月内致力于达成相关磋商。

²⁶ 2012年6月CICIR和CSIS就网络安全合作问题会晤后达成此项共识。
²⁷ 参见Dave Clemente的经典讨论，“网络安全和全球相互依赖：那一项更重要？执行纲要”，查塔姆研究所，2013年2月
²⁸ 参见Zbigniew Brzezinski的近期文章，“在网络时代，世界需要新的战争规则”，《金融时代》，2013年2月25日

网络僵局

John J. Hamre,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²⁹

我认识的所有商人都曾有过公司遭遇严重网络攻击的经历。最近,一位首席执行官告诉我,他的公司每天会收到60,000封攻击邮件。由于此类事件会引发非善意的媒体关注和过于频繁政府监督,大多数公司并不想公开讨论此类事情。

近几年,“网络攻击”和“中国”这两个词汇似乎总被联系在一起。网络罪犯无处不在,但中国俨然已经成了造成网络不安全的魔鬼。它正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稳定的主要源头。

几年前,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与中国安全机构就网络安全展开了低调对话。在这方面,没有任何一方是无辜的。中美两国从来没有打算放弃通过网络工具侦查对方。也没有一方否认双方发生战争时不会使用网络工具进行互相攻击。谁都知道与中国发生战争将是毁灭性的,并且会产生事与愿违的效果,但我们和中国都将储备网络攻击武器以备未来的不时之需。在这个问题上大家都心知肚明。

这并不意味着双方找不到能够合作的领域。任何一方都无意让第三方国家通过网络技术迫使双方发生战事或关系紧张。对网络攻击者而言,他们能轻松地拦截其他国家一台不知情的计算机掩饰自己的身份,然后发起攻击。我就经历过一个梦魇:一家敌对的外国情报机构对美国的公用事业部门设计了一起聪明的攻击——著名的“让芝加哥城熄灯”攻击——他们通过从中国发动攻击进行掩饰。当美国经历了耸人听闻的参议员炭疽攻击事件后,炭疽信件的粗糙设

计表明这次攻击来自穆斯林恐怖分子。而我们的中国同行对这一领域也与我们非常担忧此类问题。

中美都不希望本国的犯罪分子攻击对方的银行系统。日常金融交易网络与我们息息相关,它对双方国家都是非常有益的。我们并不希望这些领域受到犯罪分子或敌对情报势力的威胁。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想自己的计算机被恐怖分子劫持用来攻击其他国家或任何第三方国家。

简而言之,作为主权国家,纵使我们拥有为了国家利益而伤害另一方的权利,但双方在网络安全的许多领域仍拥有许多共同利益。

当然,更大的问题是与政府实体存在工作关系攻击者模糊不清的身份。当一家美国企业发现自己一个重要产品设计被一个国外黑客窃取,这个攻击行为是政府情报机构团伙所为?或是偷窃知识产权仅仅是为了经济利益?说实话,在世界上有些国家,这两者是没有区别的,中国就是此类国家之一。

但我始终坚信有许多机会可以与中国进行更加具有创造性的工作,来解决这个棘手的难题。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与困扰我们多年并且依然还在困扰我们的问题并无二致,中国私营企业某些部门窃取了美国产品的设计——或者只是创造了一个与美国产品相似的假冒商标,装进掺假的本地产品后卖给容易上当的中国消费者。十年前这是一个十分严峻以及非常棘手的问题。现如今这个问题已经得到大幅改善,因为美国公司直接向中国的政府官员表达了强烈不满,要求中国领导人采取措施。政府已经采取了系列措施来缓解这个问题。虽然这个问题还未解决,但事情正在朝着正确的轨道前进。美国企业如今在保护其生产线时也变聪明

²⁹ John J. Hamre, “网络僵局”,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2012年12月



了,并且凭借着产品的安全性和良好效果已经在中国抢占了相当可观的市场份额。

正如我之前所说,出现严重问题我们谁也逃不了干系。对美国公司来说,对中国横加指责也不是个办法,并且私人部门的市民们在保护自己计算机网络时能做得更好。计算机专家称,世界上超过一半的联网计算机没有配备有效的安全功能。这个问题十多年前就已经是非常严峻了。当然了,美国政府官员的确需要告知中国建立自己的原则,管好网络领域。这些活动已经日益成为更密切关系的严重障碍。

与此同时,我也认为我们有机会与中国同行就我们共同面对的问题开展真诚对话和建设性的合作。这个问题非常严峻,但是并非无计可施。

参考文献

Abbott, Frederick M., Thomas Cottier and Francis Gurry (2011), “世界经济一体化中的知识产权”, 纽约: 威科集团法律与商业业务部。

中国美国商会 (2012), “知识产权”, 《美国企业在中国2012白皮书》, 中国北京。

美联社 (2009), “中国法院判决微软盗版者入狱并罚款”, 摘自《纽约时报》<http://www.nytimes.com/2009/08/22/technology/22piracy.html>。

Atkinson, Robert D. (2012), “评估中国建设创新型社会: 进展报告”, 华盛顿信息技术创新基金会。

BBC新闻 (2012), “反假冒贸易协议: 欧盟否决有争议的反盗版协议”, 摘自<http://www.bbc.co.uk/news/technology-18704192>。

Brzezinski, Zbigniew (2013), “网络时代, 世界需要新的战争规则”, 金融时报, 2013年2月25日。

美国商业软件联盟 (2009), “番茄花园案主犯被判入狱”, 摘自<http://www.bsa.org/country/News%20and%20Events/News%20Archives/en/2009/en-08202009-tomatolei.aspx>。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与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2012), “网络安全合作的双边会谈”, 摘自http://csis.org/files/attachments/120615_JointStatement_CICIR.pdf。

Clemente, Dave (2013), “网络安全与全球相互依存: 孰轻孰重? 行动纲要”, 查塔姆研究所, 2013年2月。

经济学与统计管理局和美国专利和商标局 (2012), “知识产权与美国经济: 行业聚焦”, 华盛顿: 美国商务部。

Etzioni, Amitai (2013), “中国可能就网络安全展开谈判”, 《国家利益》, 摘自<http://nationalinterest.org/commentary/china-might-negotiate-cybersecurity-8222>。

Etzioni, Amitai (2013), “网络战争与私营部门”, 《国家利益》, 摘自<http://nationalinterest.org/commentary/cyberwar-the-private-sector-8160>。

美国总统办事机构 (2013), “关于减少美国商业秘密窃取行为的行政管理策略”, 摘自http://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omb/IPEC/admin_strategy_on_mitigating_the_theft_of_u.s._trade_secrets.pdf。

Ginarte, J., and W. Park (1997), 专利权的决定性因素: 跨国研究, 《研究政策》26, pp. 283-301。

Glenny, Misha (2012), “我们无法控制的武器”, 《纽约时报》, 摘自: <http://www.nytimes.com/2012/06/25/opinion/stuxnet-will-come-back-to-haunt-us.html>。

Hamre, John (2012), “网络僵局”, 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

Johnston, Mark及Richard Zeckhauser (2009), Walter H. Shorenstein亚太研究中心Karen Eggleston编辑《亚太地区处方文化和制药政策》一书的“澳大利亚药品补贴策略: 将无谓损失和寡头寻租转化成消费者盈余”文章。



Kramer, Andrew E. 以及 Nicole Perlroth (2012), “专家发出网络战警告”, 纽约时报摘自: <http://www.nytimes.com/2012/06/04/technology/cyberweapon-warning-from-kasper-sky-a-computer-security-expert.html>.

Locke, Gary (2012), “知识产权保护大使圆桌会议”, 摘自<http://beijing.usembassy-china.org.cn/20120412roundtable-on-intellectual-property-protection.html>.

伦敦经济咨询公司 (2010), “专利积压和相互承认”, 知识产权局。

Mandiant (2013), “APT1: 揭露中国网络间谍机构之一”, 摘自http://intelreport.mandiant.com/Mandiant_APT1_Report.pdf.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2012年), “中国: 省级机构完成软件合法化”, 摘自http://www.chinaipr.gov.cn/newsarticle/news/government/201207/1672593_1.html.

美国贸易代表署 (2012), “2012年特别301报告”, 华盛顿。

Park, Walter G. (2008), 国际专利保护: 1960-2005, 《研究政策》, 37, 第761-766页。

Rogoff, Kenneth (2012), “愚蠢的政府会容忍网络危机吗?”, 摘自<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will-government-allow-for-a-cyber-crisis->。

Spence, Michael (2012), “重塑中美关系”, 摘自<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reinventing-the-sino-american-relationship>.

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994),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报告 (白皮书)”, 中国北京, 摘自<http://www.chinaembassy.ee/eng/ztlm/zfbps/t112909.htm>.

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2011), “2011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行动计划”, 摘自http://english.sipo.gov.cn/laws/developing/201104/t20110426_601291.html.

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2012), “北京协议中的国际知识产权保护”, 摘自http://english.sipo.gov.cn/news/iprspecial/201206/t20120620_711999.html.

Tan, Ee Lyn (2012), “中国为降低药品价格修改专利法”, 路透社, 摘自<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2/06/08/us-china-medicines-patents-idusBRE8570TY20120608>.

美国国防部 (2013年), “年度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 华盛顿

美国财政部 (2012), “第四届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的经济对话联合成果清单”, 华盛顿。

美国政府责任署 (2013), “通信网络: 基于成果的措施有助于DHS评估网络安全努力的有效性”, 华盛顿

美国众议院特别情报委员会 (2012), “中国电信公司华为与中兴对美国国家安全影响的调查报告”, 美国众议院, 华盛顿。

美国知识产权执行协调员 (2012), “2011年IPEC知识产权执行情况年报”, 华盛顿。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2010), “中国: 知识产权侵权、自主创新政策和框架对美国的影响”, 华盛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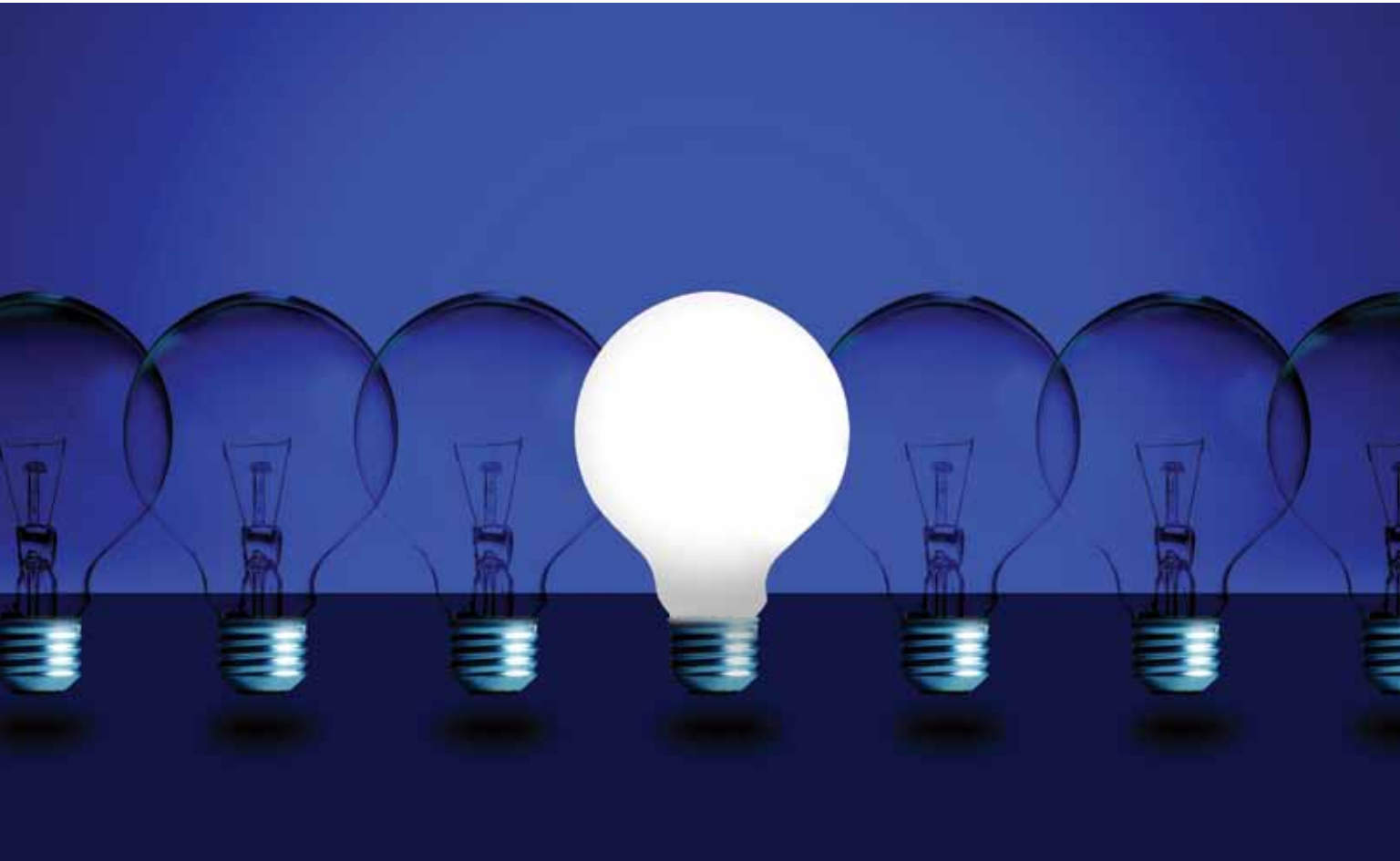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2011), “中国: 知识产权侵权与自主创新政策对美国的影响”, 华盛顿。

美国专利商标局 (2011), “美国专利商标局与国家知识产权局宣布实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专利审查高速公路试点方案”, 摘自<http://www.uspto.gov/news/pr/2011/11-70.jsp>。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 (2012), “USCBC 2012年中国商业环境调查报告”, 摘自<https://www.uschina.org/info/members-survey/>。

美中经济安全审议委员会 (2012), “占领信息高地: 中国的计算机网络操作和网络间谍能力”, 华盛顿

世界贸易组织 (2006), “TRIPS和药品专利: 情况说明书”, 摘自http://www.wto.org/english/tratop_e/trips_e/tripsfactsheet_pharma_2006_e.pdf。



第十五章

中美关系大局下的知识产权问题

柯白

柯氏策略咨询公司总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前任主席

摘要

知识产权问题在中美整体关系、尤其是贸易关系中长期并将继续占据着重要位置，多年来两国政府频频就此话题开展交涉。随着时间流逝，知识产权问题已成为两国间的老生常谈，双方都知道问题症结所在，并熟稔各种复杂的概念与词汇；不过令人略感沮丧的是，关于知识产权的对话似乎已陷入永无休止的僵局，双方都对彼此的观点置若罔闻。讨论大多沦为类似“杯子是半满还是半空”式的争论，双方互相指责的同时又对彼此的指控反唇相讥。

这篇短文不想花太多篇幅去讨论关于冲突与合作、争取与退让、磋商与排斥的“拉锯战”进展情况，而更希望将知识产权问题放在几个大背景下加以考量，其中大部分属于中国国情，但总体都与中美关系的现状和未来发展方向息息相关。

笔者研习中国现代历史并参与推动中美关系、尤其是商贸关系发展多年，在笔者看来，知识产权问题实际上是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及世界强国迈进的大转变中的小插曲。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作为世界主要科技与创意产业强国之一的美国已感受到其影响。随着中国经济发生量与质的双重飞跃，两国对彼此的评价也随之变化。不断扩大的经济联系为彼此带来了巨大收益，但新的分歧也层出不穷，而像广义的知识产权这种长期存在的分歧，很难找到一蹴而就的解决方法。

中美知识产权争议的最终走向将取决于中国的未来发展蓝图，而不仅仅局限于知识产权本身。过去150年间，中国一直在探索出路，希望在不牺牲中国核心本质的前提下，克服迄今为止

都不为其所控的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挑战。这种探索至今依然活跃，大胆些许的表述为“中国特色”，而最近又以更为自信的口吻提出了“中国梦”。政治家们重申中国将走自己的路，尤其在政治体制方面，不会简单效仿“西方”模式。如下文所述，随着中国逐渐明确其在全球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类似观点还会继续出现。

这些用词在实践中将对自身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产生何种影响尚不明确。具体到中美知识产权问题上，更为重要和紧迫的议题是：

- 中国一直力图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份子，随着它继续积累经济和科技实力并增强国际影响力，是否会尽最大努力融入国际社会？
- 无论是出于国内需要，还是在进一步适应外部标准过程中所带来的管理或文化压力，中国会否反而要求他人接受“中国特色”及其标准？
- 不能完全兼容的两者会混合出怎样的产物？

这一进程对中国、对世界乃至人类历史而言都具有重大意义。美国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和技术最先进的国家，拥有全世界工业及科技实力最强的军事力量，中国的发展对其而言非常重要。美国理应在主要利害问题上与中国密切开展磋商、合作，正如中国也要以开放、合作的态度与美国打交道一样。

然而，当美国知识产权持有人的宝贵经济资产在中国或其他地方遭遇侵犯时，开放与合作并不意味着美国应该背弃包括法治观念在内的传统。虽然在这些问题上，中美两国必须继续“寻



找共同点”，对美国来说，政府和私营部门也须着手制定切实有效的方法保护重要经济资产不被对手、竞争者甚至合作伙伴非法盗用。

好消息是尽管时间不长，中国已迈出了很大一步，建立起一套法律、制度框架，将知识产权

重要功能的概念化理念融入其发展战略中，并与美国及其他国家保持积极对话，在提升其全球利益的同时努力保持经济合作关系的稳定进步。

长期来看，中美两国必须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两国关系。

中美关系大局下的知识产权问题

一、中美知识产权对话概述

目前，美国与中国就知识产权的对话通常可以归结为：

美方通常会详细说明，规模或大或小的中国知识产权侵权者未经授权和支付版权费，仿造美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使美国公司蒙受了惊人损失。几年前，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所做的一项研究指出，中国侵犯知识产权导致美国企业销售量减少，再加上未付的版权费和许可费，美国企业每年蒙受的损失高达480亿美元。该报告还详细介绍了所采用的经济模型，估算出中国知识产权侵权者使美国失去了近百万个工作机会。

尽管注意到自1980年以来，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法律方面取得了进展，美方仍反复指出：

- 中国的法律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量罚不够，不足以制止潜在侵权者；
- 法律执行情况堪忧，逃避法律责任的现象普遍；
- 美国的耐心是有限的；
- 美国会在多边基础上或依照美国法律采取措施保护美国利益。

无论口头或书面，美国都传达了这一信息，即侵

犯知识产权在美国是一个高度敏感的政治话题。美方（无论是政府还是私营部门）于是就提出建议，中国政府应如何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尤其是对非中资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建议内容亦愈加细化。事实上，知识产权在每个最高层级的政府间会谈议题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例如，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ED）以及长期存在的中美商贸联合委员会（JCCT）。

中方回应时指出：

- 外国批评者必须要有耐心；法律的重要变更以及培养重视知识产权的文化与行为都需要时间；
- 三十多年来中国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对此应给予更多肯定；
-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与中国自身经济发展利益相关的有效知识产权保护的进展；中国已经为加快建立有效的知识产权体制提出了最新战略指引；
- 中国不仅通过了知识产权立法草案，而且已经在行政和司法部门成立了专门的知识产权机构；
- 中国已开展多项高规格的公众宣传活动，向

公众普及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并起诉侵权者；

- 中国已在高层设立了强大的政府机构，专心致力于知识产权保护；
- 中国已与美国携手，通过各种类型的双边和多边论坛，推进知识产权保护并增进“相互理解”。

二、定义、限定与肯定

首先跟大家分享笔者初步观察到的几个现象，从而避免可能出现的辩驳之声，同时驳斥认为知识产权问题简单易解的错误观念。

首先，整个“知识产权”概念一直都在变化，并且仍保持着某种文化产品特质，其定义的转变反映了科技变迁情况和国情。此外，在任何国家，知识产权无论在法律或者社会习俗中的定义和处理方式都存在着很大争议。不同观点的支持者有着不同的出发点和物质利益。例如：音乐文件共享在美国引发了极大争议。在中美背景下，双方对其自身形象的认定（美国认为自己原本就是这些来之不易、宝贵的私有经济资产的创造者和所有人；而中国认为自己贫穷落后、处于不利地位，要设法摆脱美国跨国公司科技经济霸权的过度操控，为自身发展创造机会。）使其对知识产权的看法很难达到统一。

对于大多数美国公司来说，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诸多不足多年来一直是他们在中国营商的主要困扰。中国商业环境的这一重大负面因素，令这些企业不得不采取各种复杂措施来避免损失，成本很高。目前推荐的用于避免知识产权损失的“最佳措施”在不同企业的执行情况不一，执行起来不但复杂、成本高昂，而且效果并不理想。美国企业一直以单独或通过行业协会的方式，与政府执行机构就知识产权开展着积极对话。

“知识产权”现在包含众多内容，作为一个

组织性概念，可能需要重新审视其有效性。商标、著作权、描述各异的专利权、商业机密等虽然都在知识产权范围之内，但其中每一项在各国的经济和法律制度下都极其复杂，在双边及多边环境下则更加晦涩难懂。

此外，由于专业性要求较高，知识产权本身成了一种行业，不仅有众多研究知识产权的法律、技术和政府专家，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政府、企业甚至社会的行为。例如，规模较小的美国公司由于对知识产权损失或高昂的知识产权保护成本（无论是预防知识产权被侵犯还是对侵权者提起诉讼）所带来运营风险不够熟悉，天生比较脆弱。

我们也明白，要使负责任的知识产权文化实现内在化，急切需要在中国政府和社会各个层面完成人力资源建设。接下来我们会关注中国的制度承受能力如何。

中国在知识产权方面尽管“底子薄”，但进步显著。

随着时间流逝，中国在1978年末决定“改革开放”（即在国内引入市场经济、与全球经济接轨）之前的样子越来越难被记起，但我们不应忘记中国已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上世纪70年代末，法律学者李浩（Victor H. Li）出版了一本页数不多的重要著作——《没有律师的法制》（Law without Lawyers），反映了经过长达几十年的毛式“政治”以及文化大革命浩劫后，中国法制有多么落后，法律专业人士几乎为零。尽管现今中国的法治或许依然不完善，但中国已制定了大量的法律法规，特别是经济方面。

大多数国家都普遍存在知识产权侵权问题，即使工业化程度略低、国际联系较弱的经济体也是如此，这在互联网时代意味着所有国家都参与其中。美中两国在考虑为解决知识产权问题而进行协调或对抗时，也应向对方指出（实际上他们也是这样做），这个困扰双方的问题不是单单一个双边的问题。这不仅包括“传统”形式的



知识产权侵权，而且包括目前最令人震惊的电脑黑客问题。《纽约客》(The New Yorker)最近刊载的一篇文章很说明问题，文章谈及最近美国年轻且性格复杂的电脑天才兼积极分子亚伦·斯沃茨(Aron Swartz)的自杀事件。作者在文中顺便指出：“众所周知，在麻省理工，黑客行为普遍作为一种传统为人所接受。即便为被攻击者带来很大困扰和损失，这一行径还是被当作科技创新文化的一部分而鲜受惩罚。”道理虽然显而易见，但我们仍需时刻铭记这一点。

三、不断变化中的中国经济环境下的知识产权问题

迄今为止，知识产权问题的核心对美国而言主要是商业问题，而对中国而言，则一直是国内和全球发展战略问题。不过，对美国来说，这个问题也迅速演变成为关乎国家安全的战略性问题。

几十年来，针对国际著名产品和品牌的猖獗盗版行为已成为带中国社会特色的现象。从山寨名牌服装，到廉价的海外电影光盘及盗版软件的泛滥等等，不一而足，对此我们不应忽视。这些行径在改革开放之初迅速扎根并延续至今。赝品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是孤立与贫穷的产物，使人们为了谋生而无视知识产权等细节问题，并引诱更多人购买那些他们原本无力负担的产品的仿制品。(事实上，中国作家余华最近曾在纽约时报刊登文章，提出对盗版书籍的需求主要源于绝大多数人无法承受合法版权书籍或其他产品的高昂价格。)

不过，随着中国逐渐走向富强，经济发展日益先进，知识产权管理政策、法律和制度日益完善，再加上21世纪“中华民族复兴”愿景驱动下的政治及对外政策影响，中美关系所面临的知识产权争议的核心问题也在不断变化。随着中国奉行政府主导战略，通过促进国内“创新”，提高先进经济领域的全球竞争力，减少对海外产品

和技术的依赖，早期实施“开放”政策所引起的激烈的国际争端也在变化。

四、对中国旧有问题的一些想法

可以理解，中美之间的知识产权对话通常着眼于当下的问题，这些笔者已经述及。关于中国目前知识产权问题的大框架，请允许笔者做些评论。

1.对“山寨”盗版及“梁山好汉”文化的有趣思考

中文里把充斥于整个社会的广泛生产和消费品牌消费品(如手机、运动鞋等)的廉价仿制品的行为称作“山寨”。学者Paul Hennessey在一篇引人入胜的文章中论述道，在如今猖獗的山寨现象背后，是人们巧妙而勇敢地向滥用权力的专制统治精英发起反抗的历史传统。Hennessey认为，这是长久以来深入人心的浪漫主义传统。地方官场通常腐败不堪、作风残酷，而民众钦佩那些大胆嘲弄政府权力的人，也欣赏那些巧妙绕开官方命令而正直做事的人，即便他们的行为不合正统，却仍能在另类世界里欣欣向荣。因此，Hennessey指出，山寨现象主要受到来自中国底层社会的热情推动，并因底层民众与代表国家权力的官员之间的关系而生气勃勃，这与15世纪的情况差不多。Hennessey的文章并非经济或商业研究，因此其新奇想法既无法证明也不好反驳。但该文提出不少有趣的问题，例如，除了我们说的“经济机会主义的普适性”激励了大批现代仿冒艺术家以及细气的伪造者，特定形式的消费品盗版行为也有其历史悠久的“小传统”。

2.儒家对沿袭历史传统的注重

自中国传统时期末期延续至20世纪的文化传承中，古典儒家思想及其后的演绎衍生出一种观点，即要在历史中寻找社会和美学进步之道，而

功成名就者的最高理想就是通过模仿接近先贤的高度。出于这种观点，中国很多政治和社会精英在20世纪末接受了“自强”这一当代挑战，但仍受限于对原创精神的文化偏见，尊重勤勉却喜欢模仿、抄袭。

现在，复杂的法律和监管框架已经建立，中央政府为此提供了日益全面的政策支持，旨在通过上述制度接纳尊重创新的文化以满足经济快速发展的要求；并设置了量化指标（例如，专利申请与授予数量）以明确考量中国经济的“创新”程度；过去十年间，中国企业专利申请也日趋增多，然而，中国的战略规划者仍然无法确定：历史沿袭下来的对于创新的压抑已经不复存在。

3. 近代历史背景下的中国管治架构

二十世纪初叶，皇权政治及社会制度历经几千年后土崩瓦解；民国时期（自1912年末代王朝终结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战乱纷纷，以及共产党治下的最初三十年（1949-1979）几乎不曾停息的政治动荡，导致中国仍未完全建立起一个有效的现代政治权力架构，而完成这一任务仍有很长路要走。其重要影响是，即使中国共产党实行列宁主义原则，但还是缺乏能够将中国大众与政府联接在一起的新型治理架构。这个问题表现在今天就是一元政府架构的悖论。在一元政府架构下，一方面，最终控制权掌握在庞大的行政体系金字塔的顶端，并通过省、县、镇、村层层下达；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国土广袤及人口众多，在实际操作上无法确保中央指令能得到完全贯彻。

实际上，这一“历史遗留”的结构性难题在日常现实中多有表现，例如：在知识产权政策和法规的实施中出现的区域或地方差异；将个人偏好作为地方知识产权裁定结果的决定因素；以及在全国范围内实际负责执行知识产权政策并管理相关纠纷的低级官僚和执法人员专业水平不一。

这一历史遗留的结构性问题不仅意味着在后“伟人统治”时期，由金字塔顶端定夺重大问题将受到来自各利益集团的强烈争议；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的中央政治部门需要仔细甄选那些他们必须严重依赖的党员以及政府官僚。后者队伍庞大甚至数以百万计，他们有权考虑是否执行中央意志。要想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从上至下建立外资企业所期待的知识产权体系，并确保该体系同等适用于全国各地的国内和外资企业，几乎是天方夜谭。

二十世纪初，革命家孙中山先生领导了武装起义，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功勋卓著。他曾批评中国人是“一盘散沙”，并慨叹要将中国庞大人口凝聚起来、达成对国家的一致认同并重拾民族尊严是多么困难。虽然孙中山先生的用词仍有待大众想象，但他应该不会是中国第一位或最后一位作出上述评论的人。

4. 改变“后文化大革命”的社会道德观念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围绕现代国民认同感，中国人民的凝聚力大为提高。但目标还远未完成，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构成了重大的挑战。

特别是，在这个历史节点上，中国社会仍在尽力应对曾经普遍认同的社会和道德准则土崩瓦解所带来的问题。这不但包括上文述及的传统精神的日渐式微，而且包括在毛主义政权更迭期间疾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导致规范遭到破坏的遗留问题，特别是上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那段狂暴而混乱的“文化大革命”时期。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社会道德共识的破坏程度，以及文革后初期，随着十年来的“革命”真理被迅速摒弃，社会共识被进一步削弱的的影响程度尚有待充分研究，而且仍属于敏感话题。

但可以推测，除了上述历史和文化遗留问题，另一个事实证明很难控制的当下中国的社会



现象是官员腐败和滥用职权问题。牢不可破、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人治”而非“法治”——在这个制度规范存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中找到了丰富养料。

现今中国面对的问题不少，例如：为了致富不择手段、层出不穷的炫富现象、对奢侈品的痴迷、别出心裁的会计欺诈、食品及药品造假以及社会服务几乎全盘市场化。中国人一方面担忧自己会成为肆无忌惮的假冒伪劣商品的受害者，另一方面却普遍认为制假带来的商机极具诱惑力。由此可见，不管中国政府高层如何三令五申、美国如何强烈要求，要在中国建立有效的知识产权体系将面临怎样的深层次挑战。

五、新的发展

近几年来，中美关系中的知识产权问题同时呈现出积极和消极两种方向的变化。

例如，知识产权机构在政府高层的一系列指示下成立，其发展程度已受到来自美国商界权威的私营部门的注意。美国的商业调查显示，美国企业逐渐开始考虑求助于中国专门的知识产权司法机关（估计在北京或上海更为明显，鉴于中国幅员辽阔，这类机构在数量和质量上可能发展不平衡），从而以较为可靠的方式就其知识产权损失讨回部分赔偿。很多人会发现，最近一段时间，中国企业的专利申报数激增，中国企业之间的知识产权争端案例也大幅增加。而美国的重要立场是，随着中国在科技方面日益成熟，中国企业创造出很多自有专利知识，中国将继续深入努力通过法律制度保护知识产权，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有好处。

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还有一件事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中国的知识产权环境和持续存在的中美知识产权问题的本质。那就是中国政府一直以来所发布的长远政策，旨在保护中国先进的工业及科技发展的本土基础，支持国家经济保

持全球竞争力，并确保中国本土企业将来能够在中国以及世界范围内与外资企业展开竞争。

过去的30年里，中国政府在制定并实现长期战略经济目标方面展示了非凡的能力，没有人能指责中国政府将中国迅速建设成为世界经济和技术强国的愿望。

将大量廉价且技能水平普遍较低的劳动力从农村引向城市的最初战略已结出累累硕果；依靠对基础设施投资的巨大成功，中国的出口体系直到最近还排名世界首位，一举跃居世界贸易大国前列，总体GDP仅次于美国，并将很快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中国数亿人口的生活水平已有提高，不仅超出了贫困线，其可支配收入还达到了“中产”水平。

但是中国的战略思想家们会察觉到，随着时间推移，后毛时期发展战略的影响将逐渐转弱。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适龄工作人口的增长注定放缓。另一方面，全球市场对中国工厂生产的低技术含量产品的需求不可能无止境扩大。

最关键的是，中国需要打破最初为自身打造的低附加值角色。人们早已认识到，中国贡献的附加产值在出口到发达国家的工业产品出口价格中占比很低，因为那些基于知识产权、包括设计以及先进科技的零部件的高附加值产品均产自国外，只是运到中国进行最终组装、打包并作为中国的出口销往世界各地。

此外，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增强、全球利益增长，中国政府认识到其军队需要面对21世纪的各种挑战。这也意味着，首先要应对美国强大的科技主导的军事力量。随着中国与美国在贸易、人权、第三世界问题等方面摩擦不断，再加上自天安门事件以来美国对中国施加的军事制裁依旧有效，中国的策略制定者再一次认识到，中国必须依靠自身努力避免对不确定的“外部世界”的科技依赖。

因而，中国在过去十年中提出了旨在推动“中国发明”的知识产权发展的一整套政策规定。国家对那些中国经济发展中最关键的经济部门和行业进行规划；大批项目都按特惠条件获得国家财政支持，科技项目以及“战略新兴产业”受到优待；中国还就创造知识产权设立了详尽的政府目标。同时我们还看到，虽然效果有待查证，但政府正在尝试调整官员的绩效评估指标，将促进创新的政绩纳入其中。

推动中国进入全球高附加值经济体前列所基于的根本性前提是，发展良好的知识产权所有体制。这体制与全球先进工业化经济体的知识产权体系在功能上类似，但仍存在关键性差别，其中一些成为中美知识产权关系持续摩擦的根本所在。

首先，随着政府开始探索国家实现科技进步之路，它保留甚至扩大了其在现代工业化经济中的角色。截至目前，尽管在非战略经济行业中存在大量活跃的小型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仍然占据着中国经济的很大部分，特别是在全球范围内的商业竞争中也以国有企业为主。政府对中资企业慷慨解囊，支持其高速发展高端技术，而资金大量流向国有企业。此举间接说明，中国政府引导下的知识产权发展由国有企业占据主导，并以国家支持的经济活动展开，在必要时候，会与同其竞争的海外私人企业的经济活动有所不同。

这种政府主导技术创新的体制产生的另一个问题是，政府出台的政策一方面促进本土企业利用自主知识产权取得商业成功并增强竞争力，另一方面却歧视使用海外知识产权的企业。外资企业及其国家政府对此提出了强烈抗议。这已成为政府采购方面一个尤其敏感的话题。

中国目前已经建立了完善的发展战略，内容包括推动科技水平达到世界先进、实现本土创新、鼓励外资参与中国经济以及减少对引起外部争议的国际技术来源的依赖等等。鉴于篇幅有限，在此不再赘述。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能

够利用其庞大的国内市场规模来讨价还价，说得难听点可能就是强迫海外企业与中国合作伙伴/使用者分享其自主知识产权，以此作为市场准入条件之一。虽然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后，根据相关条款此举被明令禁止，但在实际操作层面，它在中国的商业领域中仍普遍存在。境外企业及其政府一直强烈抗议中国提出的关于其自有技术或商业机密的强制性许可条款。

总而言之，中美知识产权争端的内涵已随着中国经济日益成熟以及世界经济及军事平衡关系的转变而改变。按照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政府一直在战略规划和利用经济资源支持实现国家既定目标的过程中发挥着核心作用，这种模式迥异于美国以私营企业为主导的科技发展模式。反过来，这也促使美国私营企业与美国政府更加紧密合作，寻求实现其在中国的关键目标，既包括进入中国市场也包括提高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六、网路现状以及威胁的 潜伏隐喻

最近出现了宣称是由中国特工发起的针对众多美国企业、政府以及基础设施网络的黑客事件，以及无数次所谓的美国黑客袭击中国事件。将这些迅速发酵的公开戏剧性事件称为“知识产权争端”不但会进一步弱化对“知识产权”所做的任何定义，同时也会给知识产权的相关讨论增加新的不确定因素。

笔者一直认为，在美国对中国的认知中隐藏着一种源自19世纪的扭曲，认为无论在物质上、医学上还是道德上，中国都是散发有毒、危险气息的源头。这并不是当今美国公众对中国的主流看法，在美国大众的想象中，对中国及其人民依然存有很多良好观感。然而，我个人认为，这种恼人的中国潜在威胁论依然是一股可能引起大众不安情绪的不稳定暗流，因此，也可能引起政治意义上的动荡。



类似的，来自中国的受污染产品威胁公众健康的消息不时占据报刊头条，同样助长了这样一种论调，即潜在危险正在从中国向美国泛滥。污染造成的印象，例如儿童玩具镀有含铅的油漆，又或者宠物食品掺有致命化学物质，抑或在农场处理猪肠用以生产美国手术室使用的大部分肝素（最近甚至发生了数以千计发泡变肿的猪隻沿黄浦江的油腻低洼处漂游而下的事件，而黄浦江是上海供水的主要来源），这些都成为美国对中国印象的一部分，令人忧虑和怀疑。

在对华关系中，美国必须尽量避免上述情况的发生。而笔者对目前爆发的有关网络攻击的争议非常担心，之前因企业谨慎心理和政府机密而被遮掩的问题正逐渐进入公众视野。

无论是出于技术驱动，还是人们对权力的渴望，或仅仅是人类天生喜欢刺激和消遣的心理，或是严重缺乏互信的政府采取的秘而不宣的策略，这种变化都远远超过了过去几十年中美关系观察家们主要关注的知识产权争议的内涵。然而，鉴于大部分所谓来自中国的渗透针对的是美国企业最重要的“商业机密”，因而网络安全课题依然属于中美知识产权讨论的衍生范畴。

很难预计这一争议的后果如何，希望这类黑客袭击事件本身不会成为中美之间的致命危机。然而，不管怎么说，黑客危机毕竟也是长期以来知识产权争端的延伸。这进一步说明，信息保密的难度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商业”和“战略”的界定更加模糊，以前美国在经济和科技领域被人仰望而中国还是一脸稚嫩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

七、乐观的总结

面对层出不穷的知识产权侵权、对某些“论点”的刻板解读以及中美知识产权交涉的苦无进展，我们必须铭记已经取得了多少成果，而不是面对未来无奈的搓手叹息。

在中国，尽管树立知识产权意识及尊重权利保护的文化建设仍在进行中，但毋庸置疑的是，政治领导人已经认识到切实可行的全国及全球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中国的自我看法与美国不同。在中国，各方对庞杂的知识产权问题的看法并不一致（美国的情况与之类似）。但我相信中美双方都明白，如果不坚持协作、努力寻找共同立场，那么情况将严峻得多。

此外，对于目前中美关系中无所不在的“战略不信任”而言，不断有证据证明：1) 当势态严重时，双方仍可达成彼此均可接受的协议；2) 无论是在民众还是地方层面，出于善意的利益才能生存。

中美关系显示，没有一方主要是受利他主义驱动，双方都是为了实现自身利益和目标。事实上，这也促成了以下成果：双向贸易额高达每年5,000亿美元；中国全面加入以前被排斥在外的主要多边经济组织；知识和文化交流加强，特别为学生创造了很多机会，这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尽管在国家首要任务及发展阶段方面的认识存在差异，但中美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开始合作，此外，还学会了在形势紧张的情况下，通过和平且为彼此顾全颜面的方式解决不愉快的纠纷。

管理知识产权相关的中美关系要付出专业而辛苦的努力，需要大批受过技术、语言及文化培训的专业人士。而且这种需求源源不断，现有专家总会退休，而未来的专家都需要从基础学起。要解决中美知识产权的难题，人力资源是一个重要因素，但也最容易解决。两国必须携手合作，通过政府和非政府资源，支持培养知识产权专业人士。他们不但能够管理本国的知识产权事宜，而且能够通过互相交流和学习，制定解决双边知识产权问题的时间表。要完成这一任务，就要从现在开始。

正如之前所说，美国不可能在中国的基本发展选择上做指指点点的导师。然而，美国可以也

必须与中国继续合作，推动发展公众教育，在中国社会、政府以及企业中建立负责任的知识产权保护文化。美国企业必须继续实施全面、有时可能成本高昂的战略来保护其知识产权，包括与教育机构、供应商及其自身在中国开展日常业务的雇员紧密合作。

我们必须寄希望于中国会继续深化并加强已有的知识产权保护架构，同时严厉消除对国内企业和外资（包括美国）企业的区别对待。

期待中美之间的知识产权争端突然发生奇迹般的转变是不切实际的。相反，我们应该转换角度，即采取笔者所谓的“互惠单边主义”，将各方单边行为造成的刺激因素逐步消除，而不是受强迫或者向外国势力让步。

最后，鉴于本文论及的大背景，关注知识产权困境的美国人应吸取在中国其他领域取得进展的成功经验。知识产权争端解决方案是中国现代化模式的组成部分，因此经常被提及的“法治”进步，或中美关系其他方面的改善所带来的间接而长期的影响，最终也会体现在知识产权环境的改善中（哪怕是间接影响）。

然而，对于目前的知识产权问题，无论从经济意义上还是从政治方面来看，都不能用一句“这些事情需要时间”来搪塞。上世纪80年代开始改革开放时，中国还只是世界联队中的一名新兵，工业落后、人口消费能力很低，与外部世界接触不多。随着中国开放国门，外资企业蜂拥而入，他们不仅受到长久以来“中国市场”梦的诱惑，还通过与中国企业开展业务帮助后者实现现代化。随着庞大的国内消费品市场的出现，很多工业现代化目标也已完成。中国需要世界，正如世界需要中国。这种依存关系让中国更有底气，它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如何与世界强者成功竞争方面。在知识产权领域，竞争对手通常是美国。

美国企业现在必须做出艰难决定，是出于担心在中国市场错失商机而容忍知识产权侵权行为，还是与重大侵权行径正面交锋、要求赔偿。

他们明白，长期对抗毫无意义，但美国企业在改革开放初期表现出的慷慨品性也不复存在。笔者认为，美国公司将会精挑细选一些案例提起赔偿诉讼。当类似事情发生时，建议中国的权威机构能够仔细聆听，并着手建立解决机制应对美国公司的诉求。届时，成功案例会越来越多，而这些解决案例本身会进一步改善中美知识产权问题所处的大环境。



第十六章

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角色

樊纲

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北京大学和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经济学教授

尼古拉斯·霍普

斯坦福大学国际发展中心及其中国项目主任

参与撰稿人:何泳榆 黄志龙 张焕波

摘要

中国国有企业历史悠久。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因长期战乱和落后，整个国家百废待兴。而当时既无民营企业也无任何组织机构来担此重任，于是国营企业逐渐承担了所有的建国任务。除了重建国家的历史作用外，对很多人的生活来说，国企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它们不仅提供就业机会，而且提供社会服务、教育、医疗卫生和退休养老等。

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国企经历了长期的渐进式改革。为了减少对预算和/或银行贷款的需求，许多低效、小型的国企被关闭、兼并购或出售，由此产生的失业和结构性调整问题曾让人头疼。但因中国保持了经济快速增长、建立了基本社会保障、医疗服务、教育、住房和其它社会保障措施，转型期所带来的破坏性得以降低。同时，更具积极意义的是，关键及战略行业中的许多大型国企从国家计划经济时期的低效生产单位成功转型为盈利的公司型业务实体，并逐步建立合理的公司管理架构。

随着一系列改革，越来越多非国有经济进入各行各业，国有经济比重相对大幅下降。例如，在国内工业总产值中，国企所占比重从1998年的约50%下降为2011年的25%左右。2003年，中央政府拥有国企196家，到2013年3月，下降到115家。但是，各级地方政府仍有不少小型国企，其中许多地方政府采取偏向当地企业的政策。

中国企业虽已进行大幅结构重组，但大型国企的成功还是导致了中国与一些贸易伙伴之间的摩擦，主要是因为这些国企在国内及全球市场上变成了日益强大的竞争对手。美国商界抱怨说，中国政府的政策向本土国企倾斜，导致了不公平竞争。另外，中国政府鼓励大型国企进行海

外投资，也使其他企业在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有些抱怨是有道理的。例如，国企的确在中国市场享有一些优惠待遇，包括获得许可和赢得政府采购合同，尤其在地方政府这一层级。然而，有些抱怨值得商榷，例如国企在融资方面获得政策支持的看法仍有争议。而且，许多国企相互之间竞争十分激烈，它们不应被简单地看成政府控制的垄断企业。

中国政府重申，决心让所有外资企业享受国民待遇。在2012年5月举行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S&ED)第四次会议上，中国承诺建设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平等对待所有企业。本着实施渐进式改革的长期战略，2012年中，中国政府发布了一系列指导方针，鼓励中国非国有企业成长发展。2012年底，中国政府又采取了进一步措施，在一些关键行业允许更多的市场竞争，其中包括金融服务、医疗卫生和电信行业。如今，中国需要用行动来证明其言而有信。

在过去很长时间内，由于国有企业肩负重大的社会责任，因此，中国政府对其实行渐进式改革也是可以理解的。现在，由于存在市场结构缺陷，政府还不能完全放手由市场力量驱动经济。因此，解决中国发展进程中出现的这些过渡问题，政府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本文建议，各级政府应把工作重点放在提供公共产品、发展和维护有效的市场基础设施、确保公平竞争，包括让所有企业享受国民待遇，不管企业所有制性质和背景如何。

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中国主要的国有企业将继续扮演重要角色，尤其在具有战略地位的行业和领域。但正如政府所承诺的那样，国有企业



和市场改革还将持续进行。我们建议，政府对国有企业持股可低于50%，而不影响国家作为主要控股股东的地位。从长期来看，国企的国有身份可以仅限于非竞争性行业。同时，国企治理的改革也应继续推进。最近出台的措施，譬如要求国

有企业提高股息分红，引入适当的高管和外部董事招聘任命机制，以及在处理关联方交易方面作出努力等，都是沿着正确方向迈进。尤其是，国企的决策流程必须高度透明，确保独立运行，避免政府过多干预。

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角色

一、简介

近年来，围绕国企出现的问题已成为中国与其某些贸易伙伴（包括美国）之间日益增加的摩擦源。贸易争端反映了中国国企在国内和国际上日益增强的影响力，并且由于一些高调的收购和兼并案而备受关注。美国商界的主要不满，是认为中国政府给予国有企业不公平的竞争优势，在中国市场上排斥外国公司。获得政府支持的大型国企进军国际市场，也明显给国外竞争者加大了压力，使其处于不利地位。

近年在中国国内掀起的关于“国进民退”现象的争论，突出地反映了对越发重要的中国国企的担忧。这些争论由各种发展情况所引起，包括：

为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引起的经济停滞，中国实施了4万亿人民币的一揽子财政刺激方案，还有用于支持财政刺激的10万亿人民币银行贷款，这些资金大部分最后都流向了国有企业。由于当时市场低迷和成本上升，许多非国有企业受到沉重打击。

山西煤矿企业大规模重组和整顿（在多起死亡人数众多的矿难之后），导致2009年和2010年许多中小私企倒闭，或者被国企合并。

近年来，许多国企子公司借助它们能获得的大量低成本资金和银行贷款涉足房地产业，在

土地公开拍卖中，积极参与竞标。这些举动被公众认为是在本已过高的房价上“火上浇油”。

2012年，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USCC)在发给美国国会的年度报告中指出，过去五年，中国政府在减少对经济的控制、提高市场开放度的趋势出现了逆转¹。不管这种评价是否真实，改变中国国企在国内外市场参与竞争的观念，中美两国都能从中受益。

二、中国国有企业的历史回顾和发展进程

国有企业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研究，2009年，在27个报告的成员国中，共有2,057家国有企业，总资产超过1.3万亿美元，雇佣大约430万员工²。

国营企业的历史和起源

当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没有可称道的基础设施，工业能力非常小，教育和医疗卫生严重短缺，社会保障处于空白状态。中国当时的人口数量占世界人口总数的20%，耕地面积占世界总数的7%，农业和

¹ “致国会的报告”，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2012年11月。
² “OECD国家的国有企业规模和组成”，OECD，2011年。一些受访者仅报告受政府部门控制的国有企业。一些国有企业部门较多的国家如日本、土耳其和美国的数据缺失。

能源等发展落后。当时，既没有西方援助，而前苏联的援助也在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后终止。后来，尽管逐渐获得了来自世界银行的援助和其他捐助，但国家建设的重任依然是中国人民面临的一大难题。

最初，由于没有私营经济，也没有组织机构来担此重任，中国政府实际上承担了建设国家的所有任务。在此过程中，国企逐渐地从政府手中接过重建国家的担子。

在中国，“国营企业”一词过去意味着企业全部为国家所有，是由政府部门直接管理的政府单位。国营企业遵循政府规定的政策，完成国家计划的生产任务，并按照预定的价格销售产品。当时，中国一穷二白，长期战乱和落后，百废待兴。因此，国营企业是建设中国经济的主要经济组织形式，提供大部分城市居民一辈子的生存保障。

过去数十年来的渐进式改革

自1978年以来，国企改革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国经济引入竞争机制，价格日益由市场决定，许多国企的盈利能力受到侵蚀。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国有工业企业总体上不再向政府上缴净利润，反而消耗掉预计高达 GDP 5% 的财政或准财政资源。而且，退休和在职工工的保障，也对国企保持竞争力产生不利影响，因为新加入的企业没有这种福利包袱。很明显，许多国企如政府部门般效率低下，中国国企需要改革，需要增加自主权和不同的激励措施，以促进其发展。“国有企业”³一词，也从中国决定将其进行两权（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改革后而开始使用。虽然国家仍拥有国企的所有权或绝对控制权，但经营者有了更多运作企业的自主权。

国有企业由中央政府、省级政府或市级政府所有。自1994年出台《公司法》后注册的国企开始转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制公司。上世纪90年代末，改革步伐加快。根据“抓大放小”的原则，中央政府控制最重要的大型国有企业，并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员工买断、公开出售、出租、合资、兼并购或破产等方式重组小型国有企业。许多小型国有企业被关闭，数以百万计的职工失业。另一方面，政府花大力气扭转大型国企低效、亏损的状态，尤其是那些在经济中具有战略地位的重点企业。

2003年，国务院下属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委”，SASAC）和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汇金公司”）作为国家投资机构设立后，隶属中央政府的国有企业管理机构布局改革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许多国企所有权从政府管理部门转移至国资委和汇金公司。这有助于促进各职能部委转型为政策制定部门、促进政府转型为管理者，避免政府部门间因国企两权（所有权和经营权）问题产生利益冲突。在这一框架下，多数大型国有工业企业现在隶属于国资委所有，而国有金融机构则隶属于汇金公司。此次改革不是很彻底，因为有些国企仍受中央政府部门控制，包括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部、教育部等⁴。国资委和汇金公司对国有资产的保护和国企的深化改革有监督权，但并不参与日常业务运行。在省级、市级和县级都有次一级的“国资委”，其职能与中央的国资委类似。

通过公司制改革和首次公开募股改善公司治理

- 国企公司制改革及改进公司治理

公司制改革就是把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让公司可以在更商业化的基础上运行，公司所有

3 中国的企业改革使得国有企业产生了多种不同的所有制结构。《中国统计年鉴》有时使用“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一词，包括了一系列国家拥有股权的企业。请查看脚注9。

4 “OECD国家的国有企业规模和组成”，OECD，2011年。一些受访者仅报告受政府部门控制的国有企业。一些国有企业部门较多的国家如日本、土耳其和美国的数据缺失。

权也可以进行分散化或通过股权交易进行改变。超过80%的中央国企（“央企”）和其子公司都通过公司化实行了股权改革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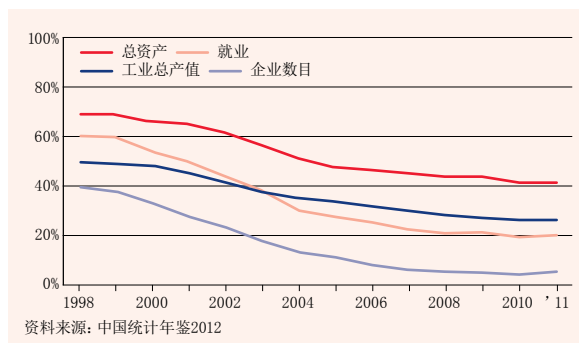
2005年，国家在数家全全国企中进行试点，设立规范董事会。通过引进外部董事，将高管任命权委托给公司董事会⁶，设立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薪酬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以加强国企董事会和管理层之间的权力制约和平衡。2012年初，42家央企已经建立了规范的董事会，外部董事占总席位的一半以上。国资委还通过引进监控机制和合同制，将高管报酬和绩效进行挂钩，更好地激励管理人员。

• 首次公开募股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中国贸易政策回顾》，截至2011年9月底，有1,047家国有企业在上海和深圳股市上市，占中国上市公司的44.7%⁷。许多国有企业也在香港或在纽约、伦敦和新加坡等海外股市上市。

大型国有企业的组织呈金字塔状，塔顶是隶属于国资委和汇金公司的控股公司。典型的首次公开募股，就是控股公司划出最有价值的资产和最盈利的业务，构成符合上市要求、有雄厚财务实力的公司。这些公司将一定比例的股票以首次公开募股方式售出，而控股公司仍保留上市公司的绝对控制权。上市国企的所有权结构和透明度得到改善，因为上市公司必须及时披露其运行情况、财务状况和其他相关信息。上市国企的治理也得到了改善，因为上市公司需要满足各股票

图表1: 国企在所有行业中的所占份额



交易和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定⁸。

国有部门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逐渐下降

• 国有企业的比重逐渐下降

据《中国统计年鉴》，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⁹的数量在全部工业企业中的比重从1998年的39.2%下降到了2011年的5.2%。同期，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49.6%下降到了26.2%，占工业资产总值的比重从68.8%下降到了41.7%，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从60.5%下降到了19.8%（图表1）。

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中国2030》研究表明，这种趋势还将持续下去，国有企业在工业产值的比重会进一步下降，到2030年大约降到10%的水平¹⁰。《中国2030》研究认为，这种结构性的持续改变，是由于消除了所有行业准入障碍（除了一些被认为是“自然垄断”的情况）以及提倡国内外私营企业与国有企业进行竞争的理想结果¹¹。

5 “中国贸易政策回顾”，世界贸易组织，2012。

6 在2008年，试点计划开始允许董事会招聘和任命高层管理人员。然而，国资委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组织部仍然保留央企大部分高层管理人员的任命权。

7 时任国资委主任的王勇在全国国有资产监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披露，截至2012年底，在沪深证交所挂牌的国有企业有953家，占A股市场上市公司的38.5%，其2012年市值为13.71万亿人民币，占A股市场所有上市公司市值的51.4% (<http://www.sasac.gov.cn/n1180/n1566/n259760/n264785/15106589.html>)。这些数据与WTO 报告披露的不同。

8 根据香港董事协会和香港浸会大学进行的针对在香港上市的公司管理标准的调查，在前十位拥有最佳管理实践的公司中，超过半数是有国有企业或有中国资金支持的企业。请参阅<http://www.hkiod.com/scorecard.html>获取更多信息。

9 “国有控股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国有独资企业、国有联营企业以及国有资产（或国家持有股份）比例大于该企业中其他单一股东的企业。

10 《中国2030》，世界银行，2012。

11 《中国2030》研究也指出，“要保持快速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中国必须在当前受保护的服务业和公共事业进一步提高生产力”（前面所提到的著作，第110页），同样，还必须方便私营经济的准入和解除管制，鼓励国际竞争。

图表2: 特定行业的国有企业(%)

	企业总数		工业总产值		总资产	
	1998	2011	1998	2011	1998	2011
煤矿开采和洗选	49.5	11.5	81.9	53.6	92.7	72.0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	81.7	40.2	94.5	92.1	98.9	94.7
食品生产	44.1	4.1	29.7	5.8	41.1	9.9
烟草生产	87.2	79.1	98.3	99.3	98.2	99.3
纺织生产	24.0	1.2	32.2	2.4	46.2	5.0
印刷和记录介质的再生产	58.0	8.0	37.9	11.5	51.2	18.2
石油、焦煤和核燃料的加工生产	28.3	10.9	91.0	68.6	90.3	58.8
化学产品生产	32.3	5.0	50.4	18.7	69.5	29.1
医药生产	45.3	7.1	49.6	11.8	60.8	20.3
橡胶生产	21.0	3.1	34.3	12.1	50.7	16.2
通用机械生产	29.6	3.2	38.4	12.5	60.7	22.3
特殊器械生产	40.9	5.2	41.2	20.5	63.3	32.2
运输设备生产	40.1	7.6	67.0	44.0	78.2	53.2
通信设备生产	29.8	5.2	37.7	8.3	51.0	19.6
电热生产和供应	85.6	66.4	85.4	93.0	89.1	90.7
水的生产和供给	92.6	61.4	87.8	69.4	90.3	79.6
天然气生产和供给	84.0	29.9	71.6	44.4	93.7	54.3

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1999年和2012年)

• 私营企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与国企比重下降相反的是, 私营企业成为促进经济增长和提供就业的有生力量, 同时也是创新的活力源泉。2011年, 私营企业占了固定资产投资约60%, 而私企解决的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超过了75%。除此之外, 超过60%的研发费用和65%的专利申请来自私营企业¹²。例如, 在竞争激烈的IT行业, 私营企业占据了主导地位, 非常成功的私企包括阿里巴巴、腾讯、华为、新浪和百度等。同样, 在房地产行业, 许多私企也同样占据领先地位, 其中包括大连万达商业地产集团、万科、恒大集团和碧桂园等。即使是在能源行业, 一些私企目前在向中国成百上千的城市输送燃气, 例如新奥能源(ENN)和中国燃气。现

在, 中国也有了本土民营汽车制造商, 如吉利和比亚迪¹³。

• 国有企业从可竞争性行业退出
经过数十年的改革和市场化发展, 国有企业在许多劳动密集型和竞争激烈的行业不再占据主导地位, 其中包括纺织生产行业、橡胶、医药、通用机械和印刷行业(图表2)。

由国资委直接领导的中央国有企业的数量从2003年的196家下降到了2013年3月的115家¹⁴。国资委鼓励中央国有企业集中发展核心业务, 改进企业架构。例如, 在2010年的3月, 国资委宣布了78家核心业务不包括房地产的中央国有企业

12 《中国统计年鉴》, 2012。年鉴中的“私营企业”仅包括由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企业。本文采用一个稍微广泛的私营企业的概念, 即除了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集体企业、股份合作企业、联营企业和自雇人士以外的内资企业。

13 中国2012民营企业五百强, <http://www.acfic.org.cn/zt/12/sgm/161213002302.htm>。

14 见附录“国资委属下的中央国有企业”。

图表3: 2011年, 前十大中国零售商

排名	公司	销售总额 (单位: 10亿人民币)
1	百联集团	118.2
2	苏宁电器	110.0
3	国美电器	110.0
4	华润集团	82.7
5	上海大润发	61.6
6	重庆商业集团	47.8
7	家乐福中国	45.2
8	百胜餐饮集团中国事业部	43.4
9	沃尔玛	43.0
10	物美	41.1

来源: 中国连锁及特许经营协会

应逐步从房地产行业撤出¹⁵。总的来说, 多数留下来的央企所处的行业对于国家安全和/或人民的生活具有重要意义, 其中包括国防、石油和石油化工、电力生产和传输、通信、航运和民用航空。

与央企相比, 地方国有企业的改革成果更加复杂。一般来说, 地方国资委属下的地方国有企业比央企规模小。各地的地方国有企业情况不同; 在私营经济更发达或是外国投资更多的地方, 地方国有企业的分布范围和重要性都不大, 例如, 浙江和广东等省份。

国有企业在许多行业中面临激烈竞争

• 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之间的竞争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行, 国有企业在国内市场面临来自私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日益激烈的竞争, 在竞争程度较高的行业尤为如此。例如, 在前十大零售连锁运营商中, 国有企业的子公司(如百联集团和华润万家) 正面临来自私营企业(如苏宁和物美等) 以及外国企业(如家乐福和沃尔玛) 的激烈竞争(图表3)。即使是在钢铁生产行业, 众多私有钢铁生产厂家如沙钢集团已成

为中国顶级的钢铁生产商, 对国有企业构成了挑战。沙钢集团在原钢生产中所占比例从2004年的7.8%上升到了2011年的11.1%(图表4)。快速变化的竞争形势反映出中国诸多行业的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过去国有企业在多数行业的竞争优势(即与政府关系密切或为政府部分所有) 已经迅速丧失。

• 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

即使是在中央国有企业仍然保持主导地位的行业, 例如电信服务、石油和石油化工、金融服务等行业, 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也十分激烈。像2009年发放3G牌照的情况就是如此, 电信行业的三大中央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趋于白热化。最后, 中国移动被要求制定中国3G标准——TD-SCDMA, 与之相比, 中国电信的CDMA标准和中国联通的WCDMA标准更加成熟。同样, 国有银行之间的竞争之激烈也人所共知。许多银行业务都是如此。这些案例充分说明了一个事实, 尽管国有企业由政府控制, 国有企业仍然是独立的商业企业。中国国有企业的国外竞争者和国外媒体对这一事实认识不足, 部分原因是因为政府依然存在明显的干预行为, 而且这些公司的财务状况缺乏透明度, 不能让竞争者和它们的政府相信, 中国的国有企业在和它们进行公平的竞争。

¹⁵ <http://www.sasac.gov.cn/n1180/n1566/n259730/n264168/11674985.html>.

图表4: 中国2004及2011年前十大钢铁生产企业(百万吨原钢生产)

公司	2004	市场占有率	排名	公司	2011	市场占有率
宝钢	21.4	21.9%	1	河北	44.4	15.4%
鞍山钢铁	11.3	11.6%	2	宝钢	43.3	15.0%
中钢	10.9	11.1%	3	武汉	37.7	13.1%
武汉钢铁	9.3	9.5%	4	沙钢	31.9	11.1%
首钢	8.5	8.7%	5	首钢	30.0	10.4%
马鞍山钢铁	8.0	8.2%	6	鞍钢	29.8	10.3%
沙钢	7.6	7.8%	7	山东集团	24.0	8.3%
唐山钢铁	7.1	7.3%	8	马鞍山	16.7	5.8%
济南钢铁	6.9	7.1%	9	本溪	16.5	5.7%
邯郸钢铁	6.8	7.0%	10	中钢	14.0	4.9%
合计	97.8	100.0%		合计	288.3	100.0%

来源: 世界钢铁协会

* 在2010年, 邯郸钢铁和唐山钢铁联合组建成立河北钢铁集团。

• 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前景

国有企业的改革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这是由国有企业的历史和可能受影响的诸多群体所决定的。国有企业肩负着巨大的经济和社会责任。即使是上市的国有企业, 其母公司也承担着成千上万名退休职工的养老、医疗等费用。到2011年年底, 仍然有超过八千家由中央国有企业运营的社会机构, 其中包括附属医院和学校, 这些机构每年需要数十亿的费用。除了在经济低迷的困难时期起到稳定作用, 以及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 国有企业也是中国政府促进工业转型、产业升级以及国家基础建设的可靠伙伴。国有企业还通过承担短期内不盈利、但有利于国家社会长期发展的项目, 肩负着消除不同地区和行业间发展不平衡的责任。

尽管如此, 中国政府已经表明了继续进行市场化改革的决心。如在“十二五”规划中, 中国政府指出:

“要营造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体制环境¹⁶”。

在2012年5月举行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S&ED)第四次会议上, 中国承诺将“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使各种所有制企业都能在信贷支持、税收优惠和监管政策方面进行平等竞争、得到平等对待”。中国还承诺稳步提高国有企业上缴红利的比例, 并增加需要上缴红利的中央国有企业和省级国有企业的数量¹⁷。国外竞争者将积极关注中国政府是否能有效实现这些承诺。

根据国务院在2012年10月发布的《关于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¹⁸, 将进一步降低电力、通信、石油和石油化工等行业的市场准入标准。在铁路、邮政服务和盐业行业, 政府的行政职能将与企业的管理分离。

三、对中国国有企业的抱怨及其分析

国有企业到底享有怎样的优惠待遇?

很多人共同的抱怨是, 政府对国有企业实行了特别优惠的政策。例如在获得批准许可、政府采

16 “坚持改进基本经济体系”, 中国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 国务院。

17 “中美联合经济情况说明”,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S&ED)第四次会议, 美国财政部, 2012年5月。

18 国资委主任王勇2012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的报告。

图表5: 中国的银行贷款细分

	银行贷款 (万亿元)				银行总资产 (万亿元)	国有企业贷款比例		家庭贷款比例	
	非国有企业	家庭	国有企业	总数		银行总贷款	银行总资产	银行总贷款	银行总资产
2000	5.08	0.00	4.86	9.94	13.74	48.89	35.35	0.00	0.00
2001	5.95	0.00	5.29	11.23	15.94	47.06	33.15	0.00	0.00
2002	7.11	0.00	6.02	13.13	20.44	45.83	29.44	0.00	0.00
2003	9.13	2.33	6.77	15.90	24.40	42.55	27.73	14.65	9.54
2004	10.59	2.92	7.15	17.74	27.98	40.32	25.56	16.47	10.44
2005	12.00	3.25	7.46	19.47	32.40	38.34	23.04	16.71	10.04
2006	13.99	3.87	8.54	22.53	44.13	37.90	19.35	17.16	8.76
2007	16.45	5.07	9.72	26.17	54.12	37.13	17.96	19.36	9.36
2008	19.57	5.71	10.77	30.34	64.15	35.51	16.80	18.81	8.89
2009	22.30	8.18	17.67	39.97	80.98	44.21	21.82	20.46	10.10
2010	29.07	11.25	18.85	47.92	96.16	39.33	19.60	23.49	11.70

来源: 中国人民银行

购和低成本银行融资方面, 政府都给予国有企业特殊的竞争优势。在这一方面, 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的一项报告指出, 国有企业更容易获得国有银行融资, 而融资成本往往很低¹⁹。尤其是在2008-2009年政府实行经济刺激政策, 大部分财政刺激计划的银行配套贷款都贷给了国有企业, 作为政府审批项目的启动资金。图表5显示, 虽然国有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比例有所减少, 但与其不断下降的经济地位仍然是不相称的。2009年国有企业的贷款比例大幅增加, 说明经济刺激政策主要是通过国有企业产生作用的²⁰。

此外, 由于中国银行市场不成熟, 国有企业允许通过商业银行进行所谓的“委托贷款”, 将其获得的低成本融资再次借出给子公司或私营企业。因此, 有些国有企业可以这样通过利差来获得额外的利润, 相反, 许多私营企业则抱怨说资金的短缺和高成本的贷款限制了他们的发展。

根据2010年OECD发布的《中国经济调查》报告, 中国政府近年来极大地削减了对国有企业

的补贴。但是报告也同时认为, 中国国有企业的资本密集程度远远高于他们的竞争对手私营企业, “说明由国有银行主导的银行业中, 国有企业更容易获得贷款”²¹。报告还明确指出, 如果正规金融能更多地支持私营企业中具有较高生产力的活动, 中国经济将从中获益。

然而, 中国的国有企业到底是否能优先获得银行贷款, 是否能以优惠的利率获得银行贷款, 目前还尚不清楚。国有企业的银行贷款是由银行做出的商业决策。除了国有企业由政府支持的因素之外, 拥有庞大的资产和长期的信用记录是银行贷款的两大关键因素。从这方面来看, 国有企业比私营企业的风险要小, 国有企业的信用更可靠, 银行愿意将更多的贷款以更低的利率贷给国有企业。这种贷款方面的考虑和决定不仅仅在国有银行很普遍, 而且在中国的外资银行也很普遍。从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获得的银团贷款也可以看出, 许多参与其中的外国银行同样使用了与国内相同的信贷定价模式。许多私营企业未能获得贷款或需要支付高额利率获得贷款, 这一事实更多的是由于中国的银行体系及其相关的商业、

19 “致国会的报告”, 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 2011年。

20 图表5还显示了家庭贷款(主要是抵押贷款)比例的增加, 具体从2002年的零增加到2010年的23.5%, 反映了银行系统和经济的良好发展。

21 “产品市场管理和竞争”,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国经济调查(2010)》第109-110页。

法律和金融基础设施不完善所造成的。这种不完善增加了银行贷款给中小型企业 and 私有企业的风险。政府的首要任务是要消除影响非国有企业融资的不利因素，全面改善金融体系的基础设施建设。

在分析美国公司抱怨中国国有企业从国有银行的低息贷款中获得不公平竞争优势的同时，也需要牢记近年来金融市场的背景。在过去的几年中，联邦基金利率²²接近于零，美国公司能以极低的利率获得贷款，而中国一年期的贷款基准利率接近6%²³。中国国有企业和美国的主要公司从过低的融资成本中获利，从长远来看很可能难以为继。

在评价国有企业从政府获得的优惠待遇时，过去外资企业在中国曾享受的政策优惠是另外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在过去的很多年间，中国为了吸引国外投资，对外资企业实行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许多地方政府为了获得外国投资争先推出各种不同的优惠政策。例如外资企业的所得税就比当地企业要低，并且还享受很多税收减免政策，其中包括免除外资企业的机械设备进口税。由于中国开始对各种不同企业实行国民待遇，外资企业享有的这种“超国民待遇”在近年来逐步被取消。2008年1月1日，中国政府取消了对外资企业的所得税优惠政策。现在外资企业与中国国内企业一样，需要缴纳25%的所得税。2010年12月1日起，外资企业还需要与国内企业一样缴纳城市建设税和教育税费。这些政策可以确保对任何所有制性质的公司都一视同仁、公平对待，是值得称赞的。这些政策还需要进一步延伸，减少中国国有企业在国内享有的优惠政策。

外国公司的市场准入

在美国企业看来，许多中国国有企业不断地从合法或自然的行业垄断地位中获益，同时享有多种监管优待和政策优惠。在他们看来，中国的产业政策使得在具有战略性和重要性的产业中逐渐涌现了一批国家垄断企业和国家领先企业。

2006年，国资委确定了七个应该由国家绝对控制的“战略产业”和五个应该由国家起主导作用的“支柱产业”。“战略产业”包括了国防、电力生产配送、石油化工、通信、煤炭、民用航空和水路运输。“支柱产业”包括机械、汽车、信息技术、建筑以及钢铁、基本金属及化工。

但是，无论是“战略产业”还是“支柱产业”的定义都过于宽泛。根据最新修改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上述行业的子行业是鼓励外资进入的²⁴。然而，在某些产业仍然要求以合资的形式进行投资，而在有些行业，外国合伙人不允许成为控股股东。如果能进一步降低外资企业准入的要求，中国经济将从中获益。

中国的产业政策随着经济形势和发展战略的变化而变化，而外国投资者的市场准入要求也随之改变。例如，过去汽车整车制造业是鼓励外国资本进入的，但现在的政策从“鼓励”变成了“允许”，主要是因为近年来汽车行业产能过剩和投资过度的结果。但由于中国对能源的迫切需求，中国政府鼓励外国投资者进行水力发电站和热电联产发电站的建设和运行，且不做任何外资股权限制。新能源行业如页岩油等也欢迎外国资本进入²⁵。

美国企业抱怨，外国企业被排斥在中国的战略产业之外，而在支柱产业中又受到种种限制²⁶。OECD的报告认为，尽管有些行业在严格意义上对国外投资者开放，但不公平对待和繁文

22 联邦基金利率指的是联邦储备资金托管机构的隔夜银行同业拆息率。联邦基金利率是金融市场的一项重要的基准利率。自2009年以来，银行最优惠贷款利率（银行使用的几种基本利率之一）被用于进行短期商业贷款，保持在3.25%的水平。具体见<http://www.federalreserve.gov/releases/h15/data.htm>。

23 中国人民银行，具体见

http://www.pbc.gov.cn/publish/zhengcehuobisi/631/2012/20120706181352694274852/20120706181352694274852_.html。

24 最新的目录发布于2011年12月，自2012年1月30日生效。

25 26例如可以查看“中国转变外商投资重点”。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0001424052970204720204577130011797163488.html>。

26 “致国会的报告”，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2011年。



环节导致他们无法进入²⁷。这种抱怨反映出中国政府需要进一步改进对外国投资进行审核和批准的手续和流程。

但从宏观上来看,与其他转轨经济和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对外国资本的态度是相对开放的,这可以从中国近年来所吸引的大量外国直接投资中得到验证(具体参见第二部分第13章,对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的情况有更深入的分析)。

与外国投资者进入中国市场的一个相关问题是,中国需要改进市场基础设施和加强监管能力建设,然后才能允许更大程度的市场竞争。中国政府最近采取的改革措施表明,中国政府愿意为所有竞争者创造一个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2008年8月生效的反垄断法也是中国政府改善市场竞争监管的重要一步。当前被国有企业垄断的一些行业如金融服务、铁路和医疗卫生将允许私人资本进入²⁸。例如在2012年3月,政府批准了一系列金融改革的措施,其中包括允许在温州进行民间借贷。温州是创业家的摇篮,也是民间融资非常活跃的地方。这是国家进一步放松对金融体系控制的实验性的一步²⁹。2010年的5月,政府颁布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的公告³⁰,此公告被称作“新36条”,标志着未来中国的改革将集中在鼓励市场竞争上,甚至鼓励在一些战略行业进行竞争。

地方保护主义导致的不公平竞争

商界不时抱怨,地方政府对当地企业(包括地方国有企业)进行保护或区别对待,造成不公平竞争和市场准入障碍。这种抱怨声音不仅仅来自国

外的企业,也来自中国本土企业。地方政府通常欢迎外商直接投资,这会增加当地的国内生产总值、税收收入和就业。但当涉及到政府采购和市场监管,当地政府则偏向于当地企业和优先采购本地生产的产品,尤其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期。例如,有些市级政府就给本地生产的汽车或家用电器提供消费补贴。有些则给当地企业提供较低成本的土地、许可审批方面的优惠待遇以及使其更容易获得政府采购合同和银行贷款等。这些不仅仅会影响到外国竞争企业,也会影响到非本地的中国企业。但是,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各地区发展不均衡以及机构设置和管理能力不足,导致了问题复杂而又难以解决。但是,这些问题又必须解决,因为这关系到能否在中国整体经济中提高效率及能否让外国企业相信中国政府言行一致。

在过去的两年间,中央政府重申了让外国投资企业享受国民待遇。在“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³¹一文中,政府承认外资企业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创新发展、产业升级和平衡各地区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政府还澄清了几项有争议性的政策。例如,产业结构调整 and 振兴规划以及自主创新产品的认定标准同样适用于外国投资企业。同时,还取消了政府优先采购自主创新产品的规定以消除不平等对待的现象。当然,对所有外国公司实行国民待遇取决于当地政府的政策执行是否有力。

对中国“走出去”战略的担忧

通过购买自然资源、开拓海外市场及获取所需技术,中国企业的足迹正在快速地向世界范围扩张。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来自大型央企³²。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从中

27 “产品市场管理和竞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国经济调查(2010)》第120-121页。

28 “概览:中国的民间投资”,路透社,2012年5月28日,具体见<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2/05/28/us-china-energy-fact-idUSBRE84R0IU20120528>。

29 “中国在温州试点金融改革政策”,华尔街日报,2012年3月28日,具体见<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0001424052702303404704577309051957346004.html>。

30 这是中国国务院在2010年5月发布的公告(具体见http://www.gov.cn/zwgk/2010-05/13/content_1605218.htm)。相关措施发布于2012年7月初(具体见<http://finance.people.com.cn/n/2012/0728/c70846-18617776.html>)。

31 2010年,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的文件,提出了二十项具体政策。

32 关于投资企业的数量,国有企业只占其中一小部分,这说明民间投资的数量庞大。

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结构调整中获益，并在世界大型企业中占据了一席之地。2011年，三家国有企业名列世界财富五百强前十位，还有超过四十家位列世界五百强的其他位置³³。中国国有企业的崛起引起了美国和其他国家商界的担忧，担心由政府支持的中国国有企业在全球竞争中享有不公平的竞争优势。还有一些指责认为，中国国有企业在美国的一些投资是基于战略考虑，而不是由商业目标驱动。

中国一直以来都是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接受方，中国对外投资水平在过去并不突出，也是近年来才开始快速增长。中国和中国国有企业已经不可避免地进入了“走出去”的发展阶段。只要中国企业的投资和运营符合相关国家法律法规，就应该以正常的法律和商业观点对待中国的对外投资。将这些问题政治化违反了包括中国在内的相关国家的长远利益。

正如其他国家的资本一样，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同样也会解决就业和促进经济增长。例如，中国远洋运输（集团）公司（COSCO）因其对美国经济和就业的贡献而在马萨诸塞州得到认可。2002年，在丹麦船运巨头马士基航运公司关闭服务后，中国远洋运输（集团）公司开通了直接连接中国和波士顿的航线。十年之后，中国远洋运输（集团）公司才得到这种认可。据马萨诸塞州港务局临时执行总裁大卫麦基说，中国远洋运输（集团）公司这一投资决定在过去十年至少挽救了34,000个就业岗位³⁴（关于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经济影响，请参阅第二部分第13章“外国直接投资”）。

四、意见和建议

国有企业在许多经济体中扮演重要角色。但一般来说，庞大的国有经济带来低效率、遏制市场

竞争、造成创新不足并阻碍私营企业的发展³⁵。随着中国的发展和经济的多元化，一个能够释放企业家精神以及带动亿万国民创新性、主动性和独创性的充满活力的私有部门对于提高中国的创新能力和促进生产发展至关重要。中国政府需要更多关注其在提供更广泛的公共资源和服务等方面的职能，包括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以及提供让市场有效竞争的健全的管理机构和监管法规。随着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世界经济活动，为了避免与其他经济体产生不必要的冲突，中国迫切需要对政府部门进行改革并调整国有企业的结构。

改善政府职能，提高透明度

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分界线应该进一步明确。从长远来看，中国政府应关注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建设一个各种类型的企业都能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国应通过产业政策的制定、有效的管理和法律的实施等方法达到宏观调控和既定目标，而不必参与企业的日常管理。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控制应逐步减到最低。

为了确保市场竞争机制的有效运行，中国的管理和监督能力、法律和法规体系以及软硬件机制都需要进一步改进。应公平地将反垄断法实施和应用于国有企业、国内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中国金融、会计、税收、法律及其他政府部门的发展应该围绕创建一个规范的市场环境而进行，以促进市场竞争的健康发展。

通过对支持市场经济的机构进行改革，可以进一步提高企业绩效。尽管上世纪90年代中金融和资本市场改革已取得显著进步，但显而易见的是，政府仍对银行和证券市场是否能配置金融资源以达到最佳利益缺乏信心。美国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所有政府都保留权

³³ 世界五百强2012年排名。
³⁴ 中国日报，2012年3月6日。

³⁵ 据世界银行发布的《中国2030》报告，非国有企业的平均股权收益率比国有企业高出9.9个百分点。如果排除某些垄断企业人为的高收益率，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收益率差距还将进一步扩大。

力干预或拯救可能暂时陷入经济困境的重要企业。但是，在一些并不十分极端的情况下，金融体系要确保那些使用资源不当的企业破产或退出市场。中国的许多行业都经历过不断反复的产能过剩，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在地方政府对中央认定的重点行业的过度投资。在较成熟的金融体系中，由于较少受到政府机构的干预指导，分析师会发现许多在当前寻求融资的项目是不可能指望获得资金的。提高企业投资效率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在银行和金融体系内提高信贷分析的专业水平。

由于中国决策程序的不透明和咨询机制不健全，经常会出现对中国政策和意图的质疑。政府应首先将这些程序透明化，尤其应系统地发布政府制定政策的目的、法律和法规以及公布如何执行管理措施。在制定规则之前征求所有利益相关方的意见，以逐步改进和正规化这些规则，尤其是在地方政府层级。影响商业运作的政府流程，例如行政审批和政府采购，应该进一步透明化。

逐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当前存在国有经济成分的行业和部门范围太广。正如世界银行所建议的那样³⁶，要解决“行政垄断”的问题，中国政府可以再审核“战略产业”和“支柱产业”名单，取消那些存在于国家控制不那么重要的行业或子行业之内的显性或隐性的竞争障碍。要促进私营企业的繁荣，国家的工作重点应该放在给具有战略地位的产业和非竞争性行业提供公共物品，例如国防和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在竞争性产业如房地产和建筑行业，国家应逐步淡出³⁷。在这些领域减少国家控制将改善各级政府干预经济的情况，并增加外国投资者的信心。

为减少那些与其他国家间不必要的、可能影响中国的国有企业“走出去”的摩擦，中国政府应考虑逐步将国家控股降低到50%以下。国家仍然可以保持大股东的地位或通过其他间接方式施加影响。考虑到这些国有企业规模庞大，出售股份可能会削弱股票市场的信心。但是这些股份可以转移到国家社保基金，以确保中国能更好地面对即将到来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同时，政府应继续改进上市公司的财务披露标准，而不论其属于哪一种所有制性质。

国有企业税后利润上交给中国政府的比例从2011年开始上升，该比例占能源、电信和烟草企业税后利润的15%；交通和金属冶炼行业的10%和其他国有控股公司的5%。与其他国家的上市公司相比，中国国有企业的分红相对较少。在完全市场化的经济条件下，分红的多少是由企业决定的³⁸。但是，正如中美战略经济对话(S&ED)第四次会议达成一致的那样，中国将稳步增加国有企业给政府分红的范围和额度。这将有助于减少国有企业可获得的低成本资金，从而限制低效的投资和过度的扩张。同时这还有利于降低私营企业竞争者的准入门槛，并增加财政收入。

让所有企业都享有国民待遇

有些美国公司抱怨说在中国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但与此同时许多中国投资者在美国的投资和业务也面临着市场阻碍和政治压力。因此中美两国政府都应维持一个让所有企业进行公平竞争的环境，而不管企业是来自什么国家或者是何种所有制，这样两国都会从中受益。

除了国家安全问题之类的敏感问题外，中美两国政府都应确保所有政策（包括市场准入和经济激励政策）的公平实施，而不应歧视外国公司。在政府采购方面，除非有区别对待的理由，中美两国政府都应确保所有法人提供的产品和

³⁶ 《中国2030》，世界银行，2012年。

³⁷ 由于“逐步”又可能包括好些年，为了更好地实行透明化，政府可以制定一个从某些行业撤出的明确日程表，统一各方意见后公开。

³⁸ 当然，政府可以征收不同于资本利得的税收来影响企业决定。

服务都享受平等对待。中国要在国际上争取“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同，仍然需要在所有这些方面付出更多的努力。

参考文献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2012)，“国有企业和中美两国之间的市场竞争”，华盛顿

汉斯·克里斯蒂安森(2011)，“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的国有企业规模和组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公司管理工作报告2011年8月第5期

盛洪和赵农(2013)，“中国的国有企业：性质、绩效和改革”，世界科学出版公司，新加坡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09)，“中国的国有企业：回顾数据”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0)，“产品市场管理和竞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国调查报告

中国国务院(2011)，“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北京，中国

中国国务院(2010)，“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北京，中国

中国国务院(2012年10月)，“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北京，中国

中国国务院(2010年4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北京，中国

中国国务院(2011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计划”，北京，中国，中共中央编译局

安德鲁·萨摩塞吉和科里·凯尔(2011)，“对中国的国有企业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分析”，华盛顿，美国，资本贸易

美中贸易委员会(2012年10月)，“中国经济环境调查结果”

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2011)，“致国会的报告”，华盛顿，美国，美国政府印务局

美国财政部(2012)，“美中联合经济情况说明—美中战略经济对话(S&ED)第四次会议”

世界银行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2)，“中国2030：建立现代化、和谐和创新型的高收入社会”，世界银行

世界贸易组织(2012)，“中国贸易政策回顾”，世界贸易组织

陈永杰(2011)，“‘十一五’私营经济发展十大变化”，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2011年第9期研究报告

舍希德、卡如内布和德怀特铂金斯(2006)，“新的所有制制度：中国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帕洛阿尔托，加利福尼亚，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黄志龙，“美国对我国国有企业的责难与对策建议”，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2012年。



附录

国资委下属的中央国有企业名单

Name	
1	China National Nuclear Corporation (CNNC) 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
	China Nuclear Engineering Group Corporation (CNEC) 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公司
3	China Aerospac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rporation (CASC)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
	China Aerospace Science & Industry Corporation (CASIC)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
5	Aviation Industry Corporation of China (AVIC)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China State Shipbuilding Corporation (CSSC)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
7	China Shipbuilding Industry Corporation (CSIC)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
	China North Industries Group Corporation (NORINCO GROUP)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
9	China South Industries Group Corporation (CSGC)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
	China Electronics Technology Group Corporation (CETC)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11	China National Petroleum Corporation (CNPC)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China Petrochemical Corporation (Sinopec Group)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13	China National Offshore Oil Corp (CN00C)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State Grid Corporation of China (SGCC) 国家电网公司
15	China Southern Power Grid Corporation (CSG)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China Huaneng Group (CNHG) 中国华能集团公司
17	China Datang Corporation (CDT) 中国大唐集团公司
	China Huadian Corporation (CHD) 中国华电集团公司
19	China Guodian Group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

20	China Power Investment Corporation (CPI)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China Three Gorges Corporation (CTG)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
22	Shenhua Group Corporation Limited 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China Telecommunications Corporation (China Telecom) 中国电信集团公司
24	China United Network Communications Group Co., Ltd. (China Unicom)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China Mobile Communication Group Co. (China Mobile)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
26	China Electronics Corporation (CEC)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China FAW Group Corporation (FAW)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28	Dongfeng Motor Corporation (DFM) 东风汽车公司
	China First Heavy Industries Group (CFHI) 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公司
30	China National Erzhong Group Co. (China Erzhong) 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公司
	Harbin Electric Corporation (HE) 哈尔滨电气集团公司
32	Dongfang Electric Corporation (DEC) 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Anshan Iron and Steel Group Corporation (Ansteel) 鞍钢集团公司
34	Baosteel Group Corporation (Baosteel)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
	Wuhan Iron and Steel (Group) Corporation (WISCO) 武汉钢铁(集团)公司
36	Aluminum Corporation of China (CHINALCO) 中国铝业公司
	China Ocean Shipping (Group) Company (COSCO) 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
38	China Shipping (Group) Company (China Shipping) 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
	China National Aviation Holding Group (CNAH) 中国航空集团公司
40	China Eastern Air Holding Company (CEAH) 中国东方航空集团公司
	China Southern Air Holding Company (CSAH) 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

42	Sinochem Group Corporation (Sinochem) 中国中化集团公司
43	China National Cereals, Oils & Foodstuffs Corp. (COFCO)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44	China Minmetals Corporation 中国五矿集团公司
45	China General Technology (Group) Holding, Limited (Genertec) 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46	China State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Corporation (CSCEC) 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
47	China Grain Reserves Corporation (Sinograin) 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
48	State Development & Investment Corporation (SDIC) 国家开发投资公司
49	China Merchants Group 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
50	China Resources (Holdings) Company, Ltd. 华润(集团)有限公司
51	China Travel Service (HK) Group Corporation (HKCTS) 中国港中旅集团公司[香港中旅(集团)有限公司]
52	State Nuclear Power Technology Corporation Ltd. (SNPTC) 国家核电技术有限公司
53	Commercial Aircraft Corporation of China, Ltd. (COMAC)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54	China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Group (CECEP)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
55	China International Engineering Consulting Corporation (CIECC)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
56	China Huafu Trade & Development Group Corp. 中国华孚贸易发展集团公司
57	China Chengtong Holdings Group Ltd. 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8	China National Coal Group Corp. (ChinaCoal) 中国中煤能源集团公司
59	China Coal Technology & Engineering Group Corp. (CCTEG)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60	China National Machinery Industry Corporation (SINOMACH)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61	China Academy of Machinery Science & Technology 机械科学研究总院
62	Sinosteel Corporation (Sinosteel) 中国中钢集团公司

63	China Metallurgical Group Corporation (MCC) 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64	China Iron and Steel Research Institute Group (CISRI) 中国钢研科技集团公司
65	China National Chemical Corporation (ChemChina) 中国化工集团公司
66	China National Chemical Engineering Group Corporation (CNCEC) 中国化学工程集团公司
67	Sinolight Corporation (Sinolight) 中国轻工集团公司
68	China National Arts & Crafts (Group) Corporation (CNACGC) 中国工艺(集团)公司
69	China National Salt Industry Corporation (CNSIC) 中国盐业总公司
70	Huacheng Investment & Management Co., Ltd. 华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71	China Hi-Tech Group Corporation Ltd. 中国恒天集团公司
72	China National Materials Group Corporation Ltd. (SINOMA) 中国中材集团公司
73	China National Building Materials Group Corporation (CNBM) 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74	China Nonferrous Metal Mining (Group) Co. Ltd. (CNMC) 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75	Gener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Nonferrous Metals (GRINM) 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
76	Beijing Gener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Mining & Metallurgy (BGRIMM) 北京矿冶研究总院
77	China International Intellectech Corporation (CIIC) 中国国际技术智力合作公司
78	China Academy of Building Research (CABR)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79	China CNR Corporation Ltd. (CNR) 中国北方机车车辆工业集团公司
80	CSR Corporation (CSR) 中国南车集团公司
81	China Railway Signal & Communication Corporation (CRSC)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公司
82	China Railway Engineering Corporation Group (CRECG) 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



83	China Railway Construction Corporation Group (CRCCG) 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
84	China Communications Construction Company Ltd. (CCCC)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85	Potevio Company Ltd. (Potevio) 中国普天信息产业集团公司
86	Datang Telecom Technology & Industry Group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
87	China National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Group Corporation (CNADC) 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总公司
88	Chinatex Corporation Limited 中国中纺集团公司
89	Sinotrans & CSC Holdings, Co., Ltd. (SINOTRANS Group) 中国外运长航集团有限公司
90	China Silk Corporation 中国中丝集团公司
91	China Forestry Group Corporation 中国林业集团公司
92	China National Pharmaceutical Group Corporation (SINOPHARM) 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
93	CITS Group Corporation 中国国旅集团有限公司
94	China Poly Group Corporation 中国保利集团公司
95	Zhuhai Zhen Rong Company 珠海振戎公司
96	China Architecture Design & Research Group (CAG)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97	China Metallurgical Geology Bureau (CMGB) 中国冶金地质总局
98	China National Administration of Coal Geology (CNACG)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
99	Xinxing Cathay International Group Co., Ltd. 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
100	China TravelSky Holding Company (TravelSky) 中国民航信息集团公司
101	China National Aviation Fuel Group Corporation (CNAF) 中国航空油料集团公司
102	China Aviation Supplies Holding Company (CAS) 中国航空器材集团公司
103	Power Construction Corporation of China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04	China Energy Engineering Group Co., Ltd.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05	China National Gold Group Corporation 中国黄金集团公司
106	China National Cotton Reserves Corporation 中国储备棉管理总公司
107	China Guangdong Nuclear Power Holding Co., Ltd. (CGNPC) 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有限公司
108	China Hualu Group Co., Ltd 中国华录集团有限公司
109	Alcatel-Lucent Corporation Limited 上海贝尔股份有限公司
110	FiberHome Technologies Group 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
111	OCT Group 华侨城集团公司
112	Nam Kwong (Group) Company Limited 南光(集团)有限公司
113	China XD Group 中国西电集团公司
114	China Railway Materials Commercial Corporation (CRMCC) 中国铁路物资总公司
115	China Reform Holdings Corporation Limited 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来源:SASAC网站, 2013年3月



第十七章

全球贸易体系的转折点： 中美伙伴关系的建立

詹姆斯·巴克斯

Greenberg Traurig 律师事务所全球业务部主任

冯国经

冯氏集团及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主席、中美交流基金会副主席

摘要

中美两国的关系正处于一个转折点。三十多年来，两国一直在多边贸易制度下拓展贸易，彼此建立了深厚的商业和投资关系。然而，到了今天，在许多具争议性的贸易问题上，中美的摩擦却日益增加。

与此同时，随着中美两国面对全新的经济挑战，两国商业联系的基础——中国作为美国消费品和工业品的生产基地——正在迅速变化，而中国更从全球生产中心演变为全球消费市场。简而言之，将中美贸易关系推进到一个新境界的时刻已经成熟，而这也是两国的当务之急。

订立一个新的贸易框架能帮助两国解决彼此在增长道路上急需处理的问题。在正式和非正式场合，也曾有人讨论过促进中美贸易关系发展的最理想框架。其中，可能最为人注意的是双边框架（如中美自由贸易协议）和地区性/优惠贸易安排（如正在进行磋商的泛太平洋伙伴关系）。

作为贸易框架，虽然双边的自由贸易协定和地区性的优惠贸易安排表面上具有很多优点，但这些机制却各有限制和缺点。自由贸易协定在理论上或许是一个好主意，但在付诸实行时却须要双方作出让步。而在知识产权、市场准入和科技等具争议的问题上，双方恐怕难以达成一致。优惠贸易安排或有助于成员国扩大贸易，但这些框架背后必须有一个强大的争端解决机制与公开和公平的贸易原则作为支持（如世界贸易组织这个多边制度）。

事实上，优惠贸易安排和多边制度的情况非常类似，不过前者使用封闭式的成员名单，而多边制度却采用容纳开放的组成原则。新成员的加入可扩大贸易基础，让所有成员国受惠，这个道

理人所皆知。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鼓励优惠贸易安排扩大成员基础。事实上，这种复边机制已经存在于WTO的运作之中。

今天，让贸易加快自由化发展的复边框架，是多边贸易制度的一个显著优点，但不是唯一优点。多哈回合谈判裹足不前的情况很容易让人忽略多边制度的优点，但中美两国却不应该掉进这个误区。两国都曾先后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和WTO的多边制度之中获得巨大利益，受惠于它们透明与公开的原则，以及它们对规则和争议裁决的遵从。因此，中美两国有充分的理由继续按照这些原则，将彼此的贸易关系推进到另一阶段。

遵循多边贸易的原则，中美伙伴关系将会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但这还不足够。针对WTO的批评带出了很多需要正视的问题，我们需要考虑如何更新这个制度，使其配合科技、全球价值链、服务业兴起与其他范畴的发展趋势。

这些改革对中美两国均非常有利：两国都会受惠于出口和就业岗位的增加；而随着WTO的系统 and 流程更新（以配合21世纪的发展需要），两国也会在更广泛的层面受惠。简而言之，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贸易经济体，如果中美两国同心协力地推动改革，可望为WTO向前发展提供动力。

最后，中美伙伴关系的建立可带动有关国际投资协定的探讨。目前，国际境外直接投资环境迫切需要一套多国认同和共同遵守的透明、公平的原则，而国际投资协定可为这个环境带来新的秩序。在这一点上，两国的共同利益同样显而易见。

总结而言，多边制度和集体责任制是解决国际社会面对的多项挑战的唯一途径，理据多



不胜数，中美两国应给予肯定。透过建立伙伴关系，中美可共同改善多边制度，透过这个制度更有效地解决全球问题。这样，中美两国将为国际社会带来莫大裨益，从而受到后人推崇。

全球贸易体系的转折点： 中美伙伴关系的建立

回顾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历史性到访中国40多年后的今天，中美两国的关系正处于转折点。在1972年以后，尤其在1979年踏入关系正常化阶段开始，中美关系成为国际上最重要的经济伙伴关系之一。两国的双边贸易额从1972年仅9,590万美元增长到1985年的70亿美元，再增至2011年的4,600亿美元。美国企业跻身中国的最大投资者之列，于2010年的在华投资总值超过500亿美元。今天，中国是通用汽车和百胜餐饮集团等美国企业的主要收入来源。

中美经济关系同时为两国的社会、文化、教育和科学等多个领域打下基础。2011年，在美中国留学生约200,000人，占美国所有外国留学生近四分之一。美国学生对中国的兴趣也与日俱增；过去五年，学习普通话的美国学生便已增加两倍至60,000人。

可以说，中美两国相互之间的贸易、投资和教育交流都增多了，应可为双方长远的和有建设性的伙伴关系奠定基础，而这一伙伴关系不仅能给两国带来许多互惠互利的好处，也能为国际社会带来很多利益。不过，虽然这是我们希望见到的局面，但当下出现的一些迹象却令人忧虑。

尽管中美两国的商业关系深厚，或可能正因如此，两国在国际贸易上的分歧越来越大。中美两国均曾透过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向对方提出诉讼，一些竞争更渗透到地缘政治层面。一方面，美方积极推动“重返亚

洲”策略，发展由其为核心但排除中国在外的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另一方面，双方亦相互指责对方进行商业间谍和黑客活动。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尤其是在这个互联网年代。中美两国均是大国，具有重大的影响力，双边关系注定存在一定的竞争性，而这些不必要的小插曲只会使双边关系复杂化。

两国之间的商业竞争可为双方带来好处。以公平条款和既定规则开展自由和开放的贸易活动，也可为相互竞争的两个国家缔造互惠互利的局面，让它们共同提升生产力和促进经济繁荣。所以，中美两国其实可以从它们的竞争关系中受惠。然而，中美两国拥有庞大且多样的经济实体，持续处于商业竞争始终会催生贸易纠纷，但这也是在预期之内。

但正如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所言，“中美之间的竞争是无可避免的，但冲突却可以避免。”可是，目前两国关系似乎有朝着冲突发展的趋势。

当务之急是创造条件，让中美关系踏上稳定、和谐和共享繁荣的道路。其中的关键在于重新建立互信。我们都知道，只有透过合作和共享经验，才可带来互信。换言之，我们需要寻找途径让中美双方朝向共同的目标合作——尤其在过去30年作为中美关系摇篮的贸易领域——从而促进相互了解。

过往关系的渊源

如上文所述，贸易和经济是目前中美关系的核心所在。它们既是过往维系双方关系的基石，也是未来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刻下的挑战在于当初驱使中美成为贸易伙伴的具体条件业已改变，过去主要以美国企业将制造业外包给中国、中国将货品输往美国以至世界各地为基础的合作关系，已不足以解决目前两国各自面对的问题。

美国面对包括政府财政整顿以及持续的去杠杆化过程等问题，未来数年的消费开支难望看到增长。美国企业需要在海外寻找增长源头，而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便成为当然选择。事实上，中国已经是美国产品的重要买家，随着财富增长，未来的进口量应会进一步增加。

至于中国，已开始演变为重要的全球消费市场，其经济有需要作出调整，从制造业等第二产业转向如服务业和零售业等第三产业发展。这给美国这个服务贸易出口的龙头国家带来重大机遇。对于希望走向国际、发掘海外市场的中国企业来说，中美关系加强可带来许多利益。

简而言之，两国均面对经济转型，积极的相互交往将有助双方顺利调整。关键的问题是，鉴于中美各有所需和优先处理的事情，什么样的框架才可以达成最理想的互惠互利合作关系？

在过去30多年，需求的互补性确立和推进了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不过，有一点很重要的是，如果没有多边贸易制度的支持框架，尤其是WTO，中美的商业关系大概不太可能取得成果。

这道理也许并非一下子就看得通，但肯定的是，中美是WTO多边贸易制度参与国之中最大的得益者。多边制度让中国一方面可依靠一套公认的行为准则，循规蹈矩地在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中推进发展和扩张经济，另一方面可在出现问题的时候，透过WTO不偏不倚、有效率和可执行的机制解决纠纷。

也许中美两国在WTO机制下提出的诉讼数量多得惊人，但考虑到这两个大国的双边贸易如此频繁，自然难免出现争端。在WTO的争端解决机制下，这些争端得以根据协议的贸易规则和平解决，相比在WTO成立前要进行冗长的法律程序，又或诉诸干戈或其它的方式要理想得多。

对于中美两国，可以按照共同遵守的贸易规则，与世界各地的成员国进行贸易，也许是作为WTO成员的最大得益。

根据WTO的基本规则，一切影响国际贸易的商业歧视均予以禁止。若非因为WTO成员国身份而享有最惠国待遇，并因此受到针对贸易歧视的法律保护，中国在其近年崛起、重拾经济大国地位的道路上，肯定是荆棘满途。

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中国人均GDP的年平均增长率达8%水平，出口则增加了五倍。尽管中国加入这个多边贸易制度不过十多年，按WTO规定进行的内部改革已经为中国经济带来增长，并让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走出贫穷。

另一方面，从WTO的前身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在1947年订立时起，美国已开始受惠于多边机制。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资料，美国在二次大战后单从自由贸易和其它形式的经济融合获得的利益，为美国人带来每年共一万亿美元的额外收入，这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整体增长10%，相当于每个美国家庭年收入增加10,000美元。

彼得森研究所估计，如果余下的国际贸易和投资障碍也得以一并消除，美国人每年可得的额外国民收入达5,000亿美元，相等于每个美国家庭年收入额外增加5,000美元。

可以肯定地说，中美两国各自和共同在WTO这个多边贸易制度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未来的中美贸易关系： 双边、地区性或多边发展？

虽然中美两国仍然视多边制度为主要发展平台，但两国似乎已逐渐偏离这个制度。多边贸易制度的确并非完美，多哈回合谈判停滞不前尤其使其成效受到很多方面的质疑。大部分的质疑虽得到恰当的解决，但WTO在很多时候即使明知急需需求变，也似乎无能为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近年来中美等多个国家对发展双边或地区性的贸易伙伴关系的探索是可以理解的。国际上似乎已经认定了一点：如果有150多个成员国的WTO不能就贸易自由化达成协议（尤其因为它采用把议题捆绑起来一次性谈判的原则），倒不如简单一些，由两、三个国家来另觅出路。

结果，双边和优惠贸易安排纷纷出台。根据WTO的资料，截至2013年1月，已生效的地区或优惠贸易安排超过350个。

有人提出可透过双边和地区贸易安排作为巩固中美关系的框架，让两国关系迈向下一个里程。这是值得考虑的做法，但各有利弊。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基于双边利益考虑，订立中美自由贸易协定之类的伙伴合作协议似乎是中美关系的一个顺势发展。道理看来很简单：中美是世界最大的两个贸易国，双方的经济互补性很高，订立中美自由贸易协定可让这两个经济体达到完全自足的状态。

中美自由贸易协定将会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贸易协定，让中美两国成为全球市场的霸主，尤其是当两国在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科技研发、军事和工业设备、农业市场开放等争议性问题上能够达成协议。中美自由贸易协定要解决的问题很多，而每一个都是棘手问题。如果这些问题能够透过中美自由贸易协定来处理，将有助于大幅促进两国的双边贸易，为彼此的伙伴合作打开新天地。

最大的难题在于以上是基于自由贸易协定可以（甚至更容易地）解决这一堆问题的假设之上，不管中美两国在这众多问题上的潜在利益矛盾。多年来，中美两国在很多问题上一直互不相让，透过自由贸易协定的框架解决，不一定就可以水到渠成。就算只是关乎哪些问题应该透过自由贸易协定解决，可能已经要花上多月甚至多年才能达成协议。结果很可能导致两国陷入艰难的谈判之中。

探讨自由贸易协定的可行性确实可带来得益。事实上，中美两国或许因此加深对彼此的观点、需要和面临的挑战的了解，能为双方的合作提供宝贵的基础。不过，即使这样，双方的利益集团和“挑拨离间者”恐怕不会就此消失，仍会继续百般阻挠。

中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另一问题在于中美两国是世界上规模和影响力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但它们不可能独断独行，而需要WTO框架下的机制带来稳定、制约和监管。

此外，中美两国间订立自由贸易协定可能会导致其它国家处于不利地位，这些国家或许会觉得有必要成立自己的联盟，以免受到中美贸易结盟的负面影响。它们的联盟将和中美联盟相互排斥，让国际社会的基本原则和分担责任的精神遭受破坏。

支持多边制度的理据

如果目前中美自由贸易协定在整体上看并不是一个值得努力的方向，我们又可否考虑一个层面稍微广泛的安排——由包括中美等多个国家订立地区或优惠贸易安排？

以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为例，这个被美国大力推广的平台，是它“重返亚洲”战略的商业核心。泛太平洋伙伴关系的优势被成员国广为宣扬，而这些国家在加入时均同意在关税和贸

易规则与事务上作出调节,以促进伙伴国之间的贸易往来。

让很多人感到诧异的是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并没有包括中国在内。所有成员国肯定都会感受到这个组织带来的好处。如果中国,或区内任何一个其它国家加入,也同样会为其成员国带来好处。那为什么不扩大这个组织?所有愿意遵守这个组织的规则的国家都应该被允许加入,这样才符合1980年代初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知名人士小组(Eminent Persons Group)讨论过的开放的地区主义原则。

到了现在,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变成一个复边主义的组织。而我们的主张正是以复边主义作为贸易自由化的出路,以避免上文所述WTO把议题捆绑起来一次性谈判的限制。

按照目前的情况,泛太平洋伙伴关系或任何其它优惠贸易协定,都是在WTO框架以外进行谈判,并只允许一个限定和排他性的名单内的成员参与。即使它们能够就协定的所有条款达成共识,参与这些优惠贸易协定的国家到某个时候必须明白这些协定如何才能被执行。为此,它们需要为每一个协定成立独立的争端解决机制。

这些解决争端的机制可能会跟WTO的现存机制相似,但既然在WTO之下已经有一个有效的机制,又为何要重新设立另外一些?仲裁为何要在WTO以外进行,而不是更合乎情理地在WTO之内处理?

除了实务以外,在WTO之外实施这些协定会衍生另外的一些风险,造成不必要的地缘政治影响。美国是否试图透过倡议成立泛太平洋伙伴关系来围堵中国?美国和欧盟又是否试图以所谓的泛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创造一个共同的经济壁垒,以抗衡中国和其它新兴经济体?

如果上述的讨论在WTO之内进行,就不会产生这些问题。泛太平洋伙伴关系以至泛大西洋伙伴关系,均可以在WTO成员国的同意下纳入WTO之内,但参与有关讨论的国家却无一提出这个建

议。而事到如今,有关讨论已引起猜疑,也使到中美两国和很多其它国家偏离多边贸易制度的轨道。

即使要在地区层面发展复边关系,各国也应该考虑在现有的多边制度框架之内发展,而存在共同利益的中国和美国可在WTO框架之内承担起领导责任。

今天,我们比以前更需要全球性的解决方案。信息和通讯科技的迅猛发展,使世界比以前更加联系紧密,更加唇齿相依。地球上某一角落发生问题,可能会牵连全球各地。有很多当代的全球性问题,如气候变化、国土安全、自然资源短缺和人口变化等,都必须由国际社会合力解决。

如果问题未能解决,将会影响到中美两国,也会影响到全球各国。因此,必须以多边制度为全球的最高决策机制,并由中美两国承担起领导责任,确保这个机制有效运作。当中的道理很简单:促进世界的良好发展是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

实际上,尽管中美两国存在分歧,但两国的经济利益息息相关。两国都不能在对方经济发展不顺利的情况下单独取得在经济上的成功。对于双方来说,最佳的方法就是按照两国认同的公平原则和共同的目标,进行开放和具透明度的合作。换言之,就跟今天的多边贸易制度的运作如出一辙。

中美伙伴关系： 重塑21世纪贸易体系

若双边和地区性优惠贸易安排均不能为未来贸易关系提供一个可行的框架,为什么它们却备受关注?又或者,若大家都知道多边制度可为多方提供莫大裨益,为什么会被视为不起作用和裹足不前?

确实,多边制度的问题(尤其就WTO而言)是众所周知和备受批评的。有人说,政治意愿是多



边制度向前迈进的最大阻力。但中美两国均明白多边制度可带来莫大裨益，并同意大力投入完善这个系统，相信两国的意愿应有足够的份量，为停滞不前的问题带来突破。

事实上，即使中美两国单单考虑本国利益，也有充分理据支持它们投入解决WTO面对的问题，更何况两国和国际社会在改革WTO问题上均有共同利益。

WTO之内、WTO成员国之间和公众社会探讨了需要改变的地方，其中几项当务之急包括：

- WTO的系统 and 流程需要跟随全球生产链和供应链的急速变化与时俱进。
- 鉴于从订立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时只有23个成员国，到今天WTO的成员国已增至158个，WTO的规则和程序需要现代化，而复边安排是其中一个可选择的出路，但也应该探索其它的可能性。
- WTO有需要加快信息技术、国际服务、环保产品/服务等崭新领域的开放。
- WTO的主要强项（如争议解决机制）也需要更新，以确保在今天的环境下仍可有效运作。

明显地，以上是一个雄心勃勃的长远蓝图，但中美两国均有很大诱因提供支持。

先谈更新WTO系统以配合全球供应链系统和生产链系统这个项目。当WTO成立之初，很多消费品均在一个国家生产，然后运到另一个国家消费。今天，全球供应链已变成一个零散的全球化系统，即使是一件很简单的产品的生产过程也可能涉及多个国家。有鉴于此，在东亚的地区性贸易之中，过半是中间产品贸易。一项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到底在何处经过“实质性加工”，评定工作越见困难。在全球供应链领域，产品不再是来自某一产地，而是来自世界各地。

此外，要在生产中取得利润，最重要的不是进行实质性加工，而是价值增值。若根据增值来

计算，世界贸易的面貌和结构以至众多双边贸易平衡，跟目前以“原产地原则”为根据之“来源规则”的方法计算所得大为不同。然而，WTO和很多国家的标准贸易量统计仍然依赖过时的生产概念，将产品的价值全部计入来源地——通常是进行最后组装的国家。

当中涉及的并非单单是贸易统计。当获悉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超过3,000亿美元，美国的政客可能会对本国和中国的经济以及两者之间的关联作出不正确的假设，而这些误会可能会引发地缘政治后果。

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说明为何现在的贸易规则未能符合21世纪的现实。我们至少需要将WTO的信息系统更新，以准确反映两国真实的贸易关系。

我们在上文谈到的其他项目也可同时为中美双方带来巨大益处，其中之一是关于服务贸易。如能订立国际服务协定，将有望加快中美伙伴关系的发展，扩大在中国提供的服务规模，并使之更加多元化，从而支持中国经济转型。

根据彼得森研究所最近一项有关在WTO内订立国际服务协定的研究，发现这样的协定可为全球出口带来1.129万亿美元的增加，创造860万个就业岗位，并推动全球生产总值增长达1.04万亿美元。

同样地，将WTO的信息技术协定扩大至包括更多产品，可望使全球生产总值增加1,470亿美元，出口增加1,780亿美元，创造就业岗位370万个。我们应该鼓励更多国家成为信息技术协定的缔约国，并大力解决阻挠信息技术贸易发展的非关税和关税问题。

目前，全球的焦点均投向可持续发展，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而WTO在这方面可以有很大作为，以确保环保产品和服务可以落在最有需要的国家手上。最近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发表的建议列出了一些合格的产品和服务，可能会有所帮助。举例来说，中美可以合作起带头作用，在WTO

之内订立可持续发展能源贸易协定；其中，开放环保产品和服务贸易可以是可持续发展能源贸易协定的重要一环。

此外，上述的可持续发展能源贸易协定亦可涵盖其它影响绿色发展的范畴，减少能源产品的进口和出口限制，也可以在WTO的补贴规定之中作出有限度的豁免，容许提供绿色补贴。这样的可持续发展能源贸易协定也可作为一个起步，落实中美和其它20国集团国家的承诺，削减对气候造成破坏的数以万亿美元计的化石燃料补贴。

为何中美两国要带领这方面的发展？更应该问的问题是：为何中美两国不担当这个重任？两国都需要创新科技和开拓市场，也都明白各国必须寻找经济增长的新出路，同时保护环境生态。

扩大多边制度以应对全球挑战

对未来中美关系的和谐发展进程有关键影响的还有另一个新方向，如能在这方面取得成果，将会是多边制度的一大跃进。这个新方向就是订立国际投资协定。

美国境外投资的发展众所周知。多年来，美国在境外的直接投资一直推动着全球的经济增长，中国也是受惠者之一。目前，中国是全球最受欢迎的境外投资目的地之一，未来相信亦会如此。

不过，当下令人激动的新话题是关于中国的海外投资。在21世纪开始时，中国的海外投资还不足10亿美元，如今已增至每年超过600亿美元。虽然中国的海外投资遍布全球各行各业，分布高度多样化，但经常由于一些有关投资性质和资金来源的误会而窒碍了这方面的发展。既然美国需要吸纳投资来创造就业岗位和刺激增长，我们如何能给中国投资打开通道，造福美国劳工、商界以至整体经济？

如中美就双边投资协定进行磋商，将会是一个好的开始，但这还不足够。目前有3,000多项同类的国际投资协定，当中规定了投资者与投资项目的权利和责任，可是它们组成的网络很大、很复杂，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存在矛盾。此外，受到这3,000多项协定保护的境外直接投资目前占全球总额只有三分之二，而且所牵涉的双边投资关系占潜在数目只有五分之一。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估计，如果要囊括所有国际投资，将需要增设14,000项双边协定。

在国际商界，贸易和投资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正如我们一直按照国际规则进行贸易，我们也需要一套国际规则来进行投资。简而言之，我们需要一项多边投资协定，为国际投资提供一个具有透明度和依循规则的框架。

多边投资协定的订立，可以由WTO成员国进行磋商，并将其纳入WTO体系，受WTO的争端解决机制监管。如此安排是当前为国际境外直接投资的持续增长提供支持的最佳方案。

有关多边投资协定的讨论早在差不多20年前已有提及，但当时这个构思的争议性太大，以致投资国和被投资国争持不下。但今时不同往日，从前的被投资国如今也是潜在投资国。譬如说中国，它到底是投资国还是被投资国呢？美国又如何？

全球对投资的关注日益趋于一致，就投资权利和保障而言，昔日的观念和教条已经被推翻，这为国际社会推进国际投资协定的订立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时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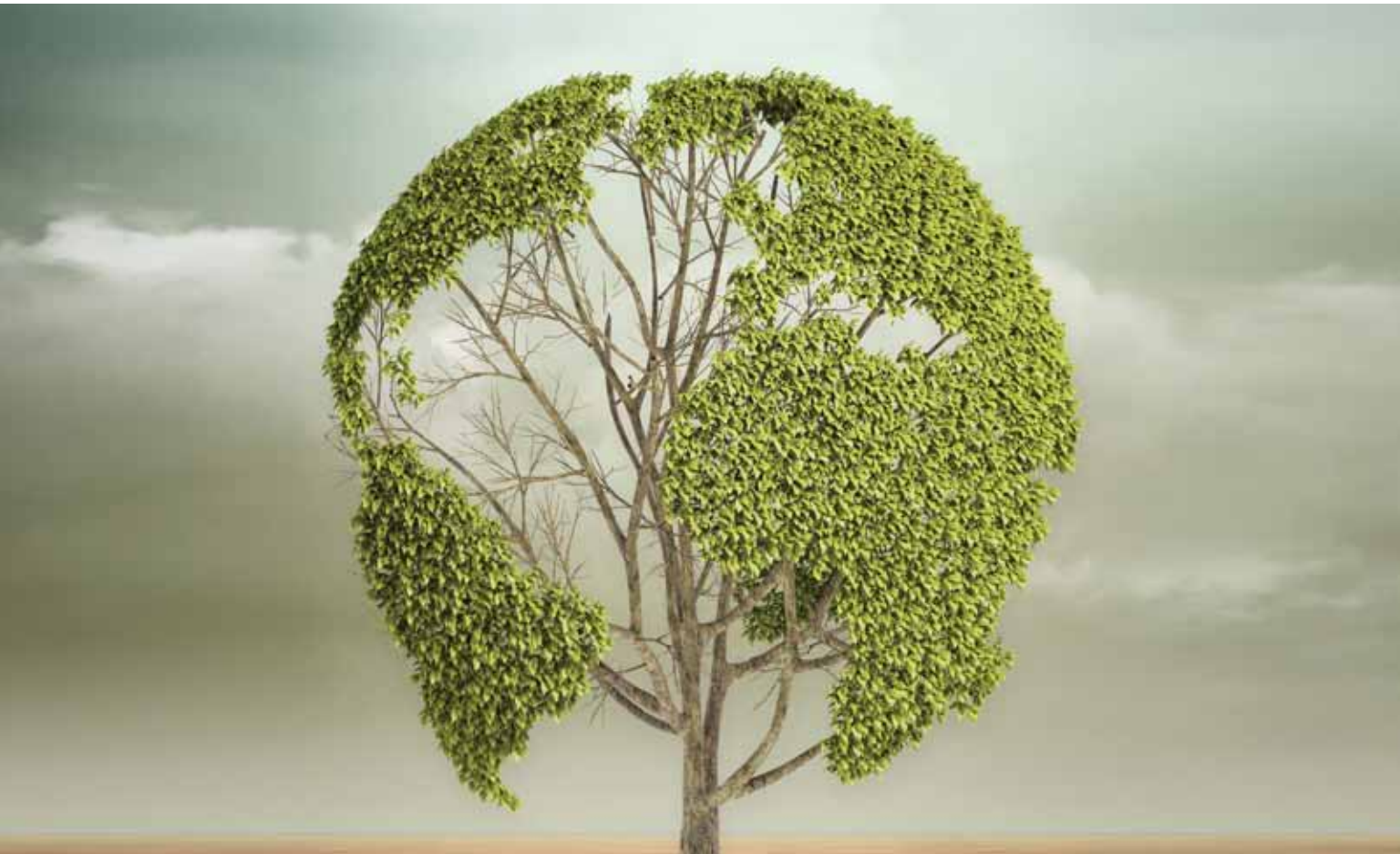
结语：从缺乏互信到可信赖的伙伴关系

合作可以成为一个习性。中美两国如能成功合作强化WTO和恢复国际社会对多边贸易的承诺，将给予双方更大的信心和动力，以应付多边制度要处理的其它任务。



中美两国可以合作（也必须透过合作）构建一个符合彼此需要的多边贸易制度，同时为国际社会带来莫大裨益。这样，两国将可让多边制度的价值获得肯定，令各国相信应该共同努力完善这个制度。

在这个全球紧密联系的复杂年代，经济增长和繁荣所面对的风险不断增加，中美两国在这方面的努力将成为中美伙伴关系在21世纪初留下的最伟大的贡献。



第十八章

追求地球的长久繁荣

彼得·塞里格曼

保护国际共同创办人、主席兼CEO

迈克尔·托顿

AssetsforLife.net创办人及总裁

摘要

作为世界最大的两个消费国，中美两国GDP（国内生产总值）合计占全球GDP总量的三分之一。两国天然气消费量占全球四分之一，石油消费量占全球三分之一，煤炭消费量占全球三分之二左右。两国还是地球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排放量占全球总排放量近一半。

常规做法已不足以应对中美两国以及国际社会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但

是，两国若能利用其前所未有的政治智慧、领导能力以及技术进步携手寻求解决方案，将为两国及全世界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对策。

中美两国发布联合倡议，符合两国自身利益，既有利于获得直接和持续的经济和环境利益，也有助于两国人民实现长久的幸福安康，还将为寻求防范人类和自然界面临的毁灭性风险做出重大贡献。

追求地球的长久繁荣

挑战

国际社会面临着两大无可逃避并相互交织的生物物理威胁，这种威胁规模空前且涉及全球，它们是：气候不稳定，以及地球生物圈生产力、适应性和稳定性的恶化和破坏所带来的灾难性风险，而这种生产力、适应性和稳定性正是人类健康幸福生活和繁衍后代的根本。

目前，主要有三个原因加剧了这些毁灭性威胁及其所导致的后果：

燃烧：每年通过燃烧化石燃料及生物资源来制造商品和提供服务，排放出超过400多亿吨二氧化碳。

消费：全球正在消费大量可再生及不可再生资源，而且消费量还在不断增加，导致废弃物泛滥成灾，污染了地球上的自然资源并使其不断退化。

人口：全球庞大的人口规模还在不断扩张，1950年至2050年间，人口增长500%。我们必须注意到人口增长是与可持续发展休戚相关的一个核心问题，但是，针对未来十年内我们为尽快缓和气候异常而必须采取的措施与人口问题关系不大。

燃烧

人类永不停息的创造力为数十亿人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成果，但是在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时间内，很多产品无法通过财富获得。而化石燃料对人类而言居功至伟，特别是过去一个世纪，由于廉价石油的出现，推动了经济引擎。可以说，全球经济总量已达70万亿美元，但几乎各个方面都依赖于过去廉价而丰富的化石资源。

但是，在生产及消费这些化石能源时，它们



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成为人类所面临的多数全球性风险和威胁的罪魁祸首。现在人们通过大量实证证据和科学发现，已经意识到它们的这种危害性¹。

在世界范围内，各国政府每年为化石燃料的生产和消费提供7,000亿至1万亿美元补贴。除了这些扭曲市场的补贴外，环境咨询公司TruCost最近评估指出：化石燃料外部性所导致的对全球人类健康及环境的影响每年超过4万亿美元。

例如，根据哈佛大学医学院的综合分析，每年仅源自美国煤炭生产及燃烧所产生的外部性成本就超过5,000亿美元，超过美国煤炭工业总收入的10倍。

不幸的是，电力价格未能考虑这些外部性影响，这意味着国民不得通过以下形式承担这些成本：疾病、慢性病、夭折以及陆地生态系统、水域和海洋生物健康状况的严重衰退。若将这些外部性成本计入电价，消费者每千瓦时耗电应支付0.37美元。这一价格比终端效率改进电价高出12到40倍，是风力发电价格的7倍，是太阳能光伏发电的两到三倍。

现在，这种外部性代价和后果无疑非常严重，它清楚表明，常规做法正在将经济、社会、人类及生物圈推向一个（过早）发病率及死亡率不断加速上升的不归路。我们在不断跨越安全环境界限，不断瓦解人类的安全生存空间。

2012年受20个国家政府委托而进行的一项评估——“气候脆弱性监测”（Climate Vulnerability Monitor）测算，每年有500万人死于气候变化和高碳型经济所致的空气污染、饥饿和疾病。若当前化石燃料利用模式保持不变，到2030年，因此而致死的人数很可能上升至每年600万人。

1 化石燃料及生物质能燃烧是造成以下变化的主要原因：气候不稳定；海洋酸化；酸雨、烟雾、大气颗粒物以及空气污染；淡水、陆地和海洋污染；滥砍滥伐，生态系统破坏和生物多样性损失（在生物质能燃烧的情况下）；国家之间的战争及冲突，包括种族屠杀及种族灭绝行为。它们造成大量水银、有毒金属及危险化学品泄露，而且是慢性病、过早发病及死亡的罪魁祸首；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它们还是淡水的主要消耗者。

该报告指出，气候变化效应导致全球产出降低1.6%，相当于每年1.2万亿美元；若全球气温继续上升，到2030年，损失可能翻番，达到全球GDP的3.2%。

人类健康和幸福安康处于危险之中。为避免全球气温上升超过2°C并诱发一系列危险后果，根据科学家计算，本世纪前50年可向大气层排放的二氧化碳累积量应低于9,000亿吨。

截至2012年，二氧化碳总排放量已达3,600亿吨，相当于50年计划的40%。若不加控制，二氧化碳排放量不断上升将导致全球平均气温在未来20年内上升2°C，到2040年上升3.5°C，到2050年则上升4°C²。

中美两国的农业中心地带多年饱受旱灾困扰，已经遭受到气温上升的苦果。发表于《科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在标题中总结了中国农业因气候变化而面临的窘境——《消失的耕地，中国面临严峻选择：适应或饥饿》³。中国拥有全球五分之一的人口，但其耕地却仅相当于全球耕地总面积的7%，而且还在继续萎缩，城镇化每10年会导致近900万公顷耕地改变用途⁴。

由于气温不断上升（过去50年上升了0.8°C）、降雨不断减少，导致中国农业和畜牧业增长趋势逆转的风险正在上升，农业地带生长季节不断缩短。2009年，中国科学院报告表示，从1979年至2000年，气候变暖导致中国小麦产量增速下降4.5%，每年因此所致的粮食损失达到几十万吨。

2 人类当前的排放趋势将导致本世纪地球温度上升5至7摄氏度，将发生世界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全球温度突变。回顾与2100年地球上二氧化碳水平相当的最近的年代，当时地球气温比现在高16°C（29°F），地球是一个没有冰的星球，海平面比现在高出200英尺，并以人类难以置信的速度上升。

其后果是，全球约四分之一的农业用地沙漠化（相当于非洲耕地的一半），几乎所有珊瑚礁均已死亡，多数海洋生物因海洋酸化中毒，并诱发全球生态系统出现不可逆的变化，这些变化在排放停止后一千年之内仍将存在。

根据国际环境与发展学会及格兰瑟姆气候变化研究所的一项评估，本世纪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成本预计将超过1,200万亿美元。

3 《科学》，2013年2月，vol. 339, no. 6120, pp644-645, DOI: 10.1126/science.339.6120.644

4 同时，中国中产阶级正在转向土地及水密集度更高的肉类食品，最近30年消费量从800万吨上升至7,100万吨。到2012年，中国的全部粮食作物中有三分之一被加工成饲料供牲畜和水产养殖使用，而最近40年从黄河及北方的含水层抽出1,200亿立方米水，超过降雨补充的水量。

资源模式破坏了生物圈的适应力、稳定性及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过去25年间,由于人类不断破坏此前一直保持完整的生态系统及动植物群落,地球陷入了一个物种灭绝周期,生物学家和生态学家对此发出警告。为了获取粮食、饲料、纤维、森林、燃料及其它物品,各种国家级自然地貌被移作他用,自然资源和服务也随之消失⁵。

正如多卷本著作《千年生态系统评估》及最近的研究报告《生态系统及生物多样性经济学》(TEEB)和《负责任的投资原则》中所详述,对全球范围内的生态系统服务(也就是地球自然资本)的大规模破坏,导致每年损失的资产和经济价值达到6万亿美元左右^{6,7}。

生态系统服务的不可逆损失

目前,全球每年新增人口数量是整个英国人口数量。预计到2050年全球人口规模将达100亿,这要求粮食产量增长70%。人类经济“新陈代谢”不断加快,养活人类所需的能源及原料也不断增加,与此同时,到2050年,生态系统服务和自然资本的持续损失估计每年将达到全球GDP的20%。这只是保守估计,因为它并未考虑如果保持当前排放模式所导致的全球气温上升4°C的情景。

全球渔业资源正在枯竭。在全球鱼类资源中,三分之一已经萎缩,按照目前的捕捞速度,到本世纪中叶它们将完全消失。当今的全球渔业资源中,整整四分之三要么已经枯竭,要么被过度开发或大幅减少。

由于栖息地被破坏,物种灭绝加速。现在物种灭绝速度是通常因环境自然变迁而发生的“自然”或“背景”灭绝率的百倍甚至千倍,这一现象与人类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哈佛大学生物学教授爱德华·威尔逊估计,每年有近40,000个物种灭绝。如果当前物种栖息地被破坏的趋势持续,到本世纪中叶,一半以上的地球物种将灭绝⁸。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生态系统的破坏助长了当前的二氧化碳排放。最近几十年有1,400万公顷热带森林被焚烧并清除,因此排放出了几十亿吨二氧化碳,这个规模大于全球运输业(包括所有车辆、卡车、飞机及轮船)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总和,差不多等于美国或中国每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TEEB估计当前森林生态系统仅在一年内损失就相当于2万至4万亿美元,远远超出毁林开荒获得的利润。据估计,由于每年有1,400万公顷热带森林被焚毁,约有1,600万个物种种群灭绝。

海洋酸化威胁导致渔业枯竭

海洋面临着多种极端风险。最近的海洋调查发现,在过去50年间,作为海洋食物网的基础,浮游植物减少了40%。与之对应的是,过去一个世纪全球气温上升0.5°C。此外,人类每年排放3,500多亿吨二氧化碳,正在导致海洋酸化速度不断加快,远远高于过去3亿年间的任何时期。

海洋学家警告称,若无法在使二氧化碳排放量于2015年达到峰值后以每年5%的速度平稳下降,到本世纪末,其造成的酸化水平将从根本上破坏海洋生态系统,并导致主要鱼类资源及海洋物种枯竭。目前,仅有1%的海洋渔业捕捞不受海洋pH值变化的影响。人类的主要渔业资源已经遭受严重过度捕捞、萎缩甚至枯竭的威胁,

5 随着地质年代更迭,物种灭绝无法避免,自从38.5亿年前地球首次形成生命以来,约有99.9%的生物已经灭绝。当前人类诱发的地球生物大规模灭绝与此前的生物灭绝的区别在于前者速度惊人,据估计相当于自然规律下平均速度的三至四个数量级。

6 考虑到仅对地球上1%的物种进行了研究,这是一个保守的估计;许多人认为21世纪呈几何级数增长的生物信息产业和生物科学产业将创造出庞大的未来价值,但是在科学尚未发现这些价值之前,它们将不可挽回的流失。生态系统服务已为医学创造了重要价值,而制药业严重依赖生物多样性。目前可用的所有抗癌药物中,42%为天然药物,34%为半天然药物。

7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千年生态系统综合报告》,3卷本,海岛出版社,华盛顿,2006, <http://maweb.org/en/Synthesis.aspx>; TEEB,《经济、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4卷本,劳特里奇出版社,波士顿,2012。

8 全球约有50亿公顷土地用于农业生产,但全球的农业用地中近40%严重退化。最近40年,全球近三分之一的农田已被废弃,因为土地侵蚀导致其无法生产;由于干旱和沙漠化,每年有1,200万公顷耕地流失,而这些耕地原本可种植2,000万吨粮食。



而海洋酸化和全球变暖的风险正在使这种情况更加恶化⁹。

近年来，由于海洋变暖所致的褪色变白和疾病，导致三分之一的珊瑚物种已经处于灭绝的危险之中。当酸化与珊瑚礁温度相互作用，灾害风险就会急剧上升：温度上升1.7°C，所有珊瑚都将褪色变白；若温度在数十年内上升2.5°C，它们将灭绝。近期研究表明，即使温度上升较少，农用化学品和工业废料流入富含珊瑚的沿海地区也会加速珊瑚的灭绝。

能源、资源及原材料的消耗

过去的一个世纪，低成本化石燃料的出现、技术进步的加速以及优惠的政府政策及补贴，推动了资源消耗的急剧增长。20世纪期间，扣除物价因素，重要资源的价格下降近一半，而同期人口翻了两番，经济产出增长了20倍，对各种资源的需求增长了6倍至20倍不等。

不同资源之间的关联度日益增加。许多国家为了获得用于进口燃料和建设发电厂的资金，大举出售本国的自然资源。过去十年间，各种资源产品的价格及波动已经高度相关。一种资源的价格变化和短缺迅速对其它资源产品价格产生影响¹⁰。

传统的“用完即扔”的消费习惯进一步恶化了价格和波动问题。由世界资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牵头进行的一项涉及多国的研究项目《国家的重量》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社会所消耗的原材料和资源中的四分之三

在12至24个月内即变为废料¹¹。

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这种不断扩张的采掘—消耗—产生废料的线性增长模式将对全球保持年均2%—3%的经济增长率构成巨大障碍（即使这种障碍并非不可逾越），而这种增长速度意味着全球经济在本世纪内将扩张10倍至20倍。

迈向前进

越来越多的政治家、企业及民间领袖和科学家大声疾呼，未来十年人类需要立即采取行动实施并实现转型，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将全球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C以内¹²。

业已探明的十几个“负临界点”可能导致不断逼近的灾难规模再次扩大，例如由于永久冻土不断融化而释放出巨量甲烷以及亚马逊雨林枯死所致的大量排放。因此，无论是领袖还是平民均有责任支持和推动大胆而雄心勃勃的全球经济发展转型变革。

本节强调了为确保人类和大自然当代和后代的经济和环境可持续性，我们面临多个重大转型机遇。过去的一个世纪见证了知识产生、科学突破、技术进步及工程学进步的爆炸性增长，以及越来越多来自市场和治理方面的创新应用，它们为解决人类和地球面临的棘手风险带来了光明的前景。

过去40年积累的经验表明，在所有机遇中，提高向终端用户提供公用事业（水、电、气）、运输及工业服务的效率对立即持续和大幅度地降低全球二氧化碳排放代价最低、风险最小。

这意味着经济增长需要摆脱工业烟囱年代的发展范式：在这种范式下，通过建造由集中式发电厂供电的大型工厂实现规模经济。在固态电

9 世界范围内约有10亿人依靠鱼类作为主要的动物蛋白来源，而5,000万人以渔业及水产养殖为生，其中绝大多数生活在发展中国家。与珊瑚礁有关的渔业资源占全球渔业资源的十分之一，在印度洋—太平洋某些地区，占全部鱼类捕捞量的25%；此外，珊瑚礁还是四分之一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的海洋渔业资源的繁殖、哺育及觅食区。

10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在《资源革命：满足全球能源、原材料、粮食及水需求》中强调，“当前，资源价格之间的相关性比上个世纪任何时期都要密切，而且许多因素正在推动这种相关性进一步上升。”能源与水的关系日益凸显。随着地下水位的下降、海水淡化工厂的扩张及大型地表水调水工程（如中国南水北调工程及美国西部州际调水工程）的开发，水的能源密集度不断上升。

11 艾米丽·马修等，《国家的重量：工业经济的材料流出》，2000年，世界资源研究所，华盛顿。

12 总统奥巴马在2013年就职演说中明确指出，我们的义务“不只是对我们自己而言，还包括子孙后代”，此外他还提到了我们的以下责任：“保护我们的星球，那是上帝托付给我们照看的。”

子学及航天材料领域的科学革命为终端用户提供了分布式服务，从而实现新的规模经济。

《小即有利可图：让电力资源规模恰到好处的隐形经济效益》中对公用服务做出大篇幅详细介绍：新规模经济在提供服务的同时还大幅度削减了上游自然资源的消耗量，以及下游产生的废料和污染数量¹³。

例如，艾莫里·洛温斯在《重新利用火：新能源时代大胆的商业方案》中指出，通过提高效率，美国可将石油的日消费量削减2,500万桶，而这样做的平均成本不到每桶20美元。相比之下，2006年以来，世界原油价格处于每桶60美元至120美元的区间。

考虑到中国的新建工程、制造业扩张及消费者购买规模，它在大幅降低成本方面拥有更大机遇¹⁴。

以最低成本与危害 (Least-Cost-and-Risk, LCR) 提供公用服务

提高向终端用户提供能源、水及其他资源服务效率可产生巨大且仍在持续扩大的效益。中美两国均已开始发掘这一效益¹⁵。

在美国有十几个州在效率改进方面已经处于领先地位，其中加利福尼亚州就是一个榜样。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加利福尼亚在制定公用事业规章制度上就已经领先全球，这一程序协调了公用事业用户的经济利益，旨在提高终端使用效率。它同时适用于私有及公共运营的公用事业部门。该州通过将公用事业收益与收入脱钩的方式，消除了对扩大供应的不良激励，而这种扩大供应成本比终端用户效率改进高出5倍。

以上做法与全面的“集成资源规划”（IRP）方法论结合，后者对所有供应端和终端用户效率选项所提供的公用服务平准化生命周期的成本及风险进行了测算。所有选项均按LCR进行排序。终端用户效率选项排序与LCR排序一致。由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所做的评估显示，基于公用事业10%-12%的固定资本收益计算，LCR终端用户选项

13 如果缺少速度更快、效率更高的手段来提供能源服务，1973年至2005年美国的能源消耗会上升225%。但是事实上，这期间美国能源消耗仅上升30%，这项差额（75百万兆焦耳，缩写为EJ）为美国每年减少了7,000亿美元的能源成本。

75 EJ是多少？想象一下，这相当于一列车运输量约为1,800万车皮煤炭的货运火车围绕地球7圈。据世界能源专家艾莫里·洛温斯的估算，1975年至2000年间单位GDP能耗下降了近40%，到2000年，节约出的能源“相当于美国石油消费量的1.7倍以及美国国内石油产量的5倍。”

14 能源效率改进可以为世界带来多大的经济和环境机遇？Ecofys最近一项分析指出，到2050年节能收益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电力：节约的电量相当于每年12,800兆瓦小时（12.8万亿千瓦时），相比之下2009年全球电力消耗为20,000兆瓦时；

热能：节约的热能相当于每年46 EJ，而2009年全球热能消耗为160 EJ；

运输：节约的燃料相当于每年80 EJ液体燃料，而2009年全球液体燃料消耗为80 EJ；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巨大的数字，因能源效率改进而提供的服务可代替对以下所有资源供应的需要（大体描述，数量不一定准确）

煤炭：相当于每年使用2,800万节车皮运送28亿吨煤。作为比较，2011年中国利用2,000万节车皮运送了20亿吨煤，美国利用810万节美式车皮运送了8.1亿吨煤，两国合计消耗了全球产量的近三分之二；

液化天然气：相当于1,775艘超级油轮运送3.55亿立方米液化天然气（每艘油轮运送200,000立方米）。作为比较，2011年全球范围内运送的液化天然气为3.55亿立方米；

石油：相当于每天1,700万桶近海石油。作为比较，2011年全球150座近海石油平台每日产量为3,000万桶；

棕榈油：相当于1,500万公顷用于加工柴油的油棕榈种植园。作为比较，2011年全球油棕产量为1,500万公顷；

蔗糖：相当于1,030万公顷用来加工乙醇的蔗糖。作为比较，2010年全球蔗糖总产量为2,400万公顷；

玉米：相当于3,240万公顷用来加工乙醇的玉米。作为比较，2011年全球玉米总产量为1.62亿公顷；

核能：相当于总装机容量为372,000兆瓦的核电厂。作为比较，2012年全球总核装机容量为372,000兆瓦；

水电：相当750,000兆瓦水电大坝的总装机容量（41座巨型三峡大坝）。作为比较，2010年全球水电总装机容量为100兆瓦。

这些效率改进也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与供应扩张相比，效率改进的成本要低数倍。考虑到这一点，相当于累计节约直接成本几十亿美元，这还包括几乎零成本避免了几千亿吨二氧化碳排放。

15 一个鲜明的例子是如何为城市热岛降温。通过这个改进过程，可避免总计达250亿吨至1,500亿吨的二氧化碳排放，同时由于减少了发电厂和空调设备使用，可节约几万亿美元。它包括将平屋顶涂白，用高反射率的屋顶木瓦取代低反射率的屋顶木瓦，这样就不会吸收太阳的热量，还包括用可反射太阳热量的白色水泥表面材料重新铺设原本使用黑色沥青的路面。屋顶能效测算具有非常大的成本效益，它现在已被纳入加利福尼亚世界领先的Title 24建筑标准中。



可在全球范围内提供一半至四分之三的新增公用服务¹⁶。

将效率提高30%的一项方案： 高性能电动机传动系统

下面给出一个清晰的案例，说明全面IPR公用事业管理制度改革在获取终端用户效率改进服务方面的重要性：全球长期普遍使用陈旧且效率低下的电动机传动系统。工业电动机传动系统，包括电动机、泵、压缩机及风机（60%在中国）消耗了全球一半的电力资源。

若用户采用高效电动机工业传动系统部件，新型电动机系统可节能50%。但是，传统做法往往是购买最便宜的技术，却忽视了这些技术在能源消耗、生命周期成本和排放等方面效率低下。在某些情况下，这些低效设备消耗的电力成本比电动机的购价高出20倍。

过去几十年，基于IPR的公用事业效率激励计划有助于克服这种扭曲。接受公用事业部门资助对现有系统进行效率升级改造，可节约耗电30%，与新建发电设施为目前市场上的低效率设备

供电相比，每千瓦时成本比后者低5倍至10倍¹⁷。

中国终端用户效率改进行动

中国正在努力实现雄心勃勃的能效目标，并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从1980至2002年，中国单位GDP能耗水平年均下降5%。

但是2002年至2005年间，这种趋势出现急剧扭转，其间能源效率改进选项基本被搁置，能源密集度每年上升5%。不过，中国的“十一五”规划制定了到2010年将能源密集度降低20%的目标，而随后“十二五”规划的目标是，在2011年至2015年间将能源密集度降低16%¹⁸。

推动零排放选项的适当政策： 补贴电价

目前已经广泛证明，补贴电价支付政策是众多激励零排放及接近零排放发电方式的基础，这些发电方式包括太阳能、风能、地热、生物废料及小型水电。根据补贴电价政策设计和实施的有

16 加利福尼亚州高度创新的管理框架非常有效，由于公用事业企业在帮助用户获得具有成本效益的终端用户及当地分散式效率改进方面可能导致销售额下降和收益损失，这些改进涉及建筑、工厂、家电及设备，该管理框架将对其进行补偿。这种强有力的模式转变又一次吸引了公用事业部门的注意力和积极性。尽管公用事业服务的基准价格上升（以补偿公用事业部门的收入损失），用户将更加合理使用公用事业服务，以降低支出，因此虽然公用事业部门的营业收入下降，但是他们的实际收入依然保持稳定。最重要的是，公用事业部门的资本投资，先前仅限于运营寿命在30-50年之间的大型发电厂，现在通过更多低成本终端用户效率改进服务而变得多样化。若与加州在制订不断强化的家电和建筑能效标准上的世界领先地位相结合，将使该州每年为用户带来的电力及供水公用服务费用下降到人均165美元。此外，该州的公用事业部门二氧化碳排放量比美国平均水平低50%。若美国所有的州均仿效加州的终端用户效率改进模式，美国的能源费用每年可下降几千亿美元，美国也会因此超额完成京都议定书中规定的二氧化碳减排目标，而公共服务缴费人和纳税人承担的成本几乎为零。

17 在世界范围内，提高电动机系统效率的一项倡议提供的服务大约为每年2万亿千瓦时，相当于2030年前计划建设的所有发电厂提供服务的四分之一。一项成功的市场变革可将全球能源支出每十年削减1.6万亿美元。对于一个面临着干旱和水短缺的世界而言，附加收益是显著的，如下文所述。若发动机效率改进用来减少使用火力发电厂，每年可节水约20亿至2,000亿立方米，相当于1至10条科罗拉多河的用水量。在中国，电动机传动系统效率改进措施带来的潜在节能收益每十年可达到几千亿美元，可取代多座计划修建的总装机容量为63,000兆瓦的发电厂。在这方面，江苏省已经处于领先地位，江苏省已明确10,000兆瓦的发动机效率改进收益，这些电能以每千瓦时0.01美元的成本进行供应。相比之下，2012年江苏省工业部门的电价为每千瓦时0.14美元（0.87元人民币）。假设在整个中国的住宅、商业、机构、工业及农业部门中全面实施终端用户效率改进，据估计，终端用户效率改进及脱钩方法，有助于将2030年前计划用于建造发电厂的公用事业支出降低10万亿美元。

18 根据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最近的一项评估，中国为实现国家目标而实施的部分政策和计划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许多能源效率改进计划似乎正在达到，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超过节能目标。在“十大重点节能工程”、“1,000家最大企业节能工程”（1,000家最大企业，大约消耗了中国三分之一的能源）以及“关闭小工厂计划”（关闭了总计80,000兆瓦的效率低下的火电厂及其它工厂）中，多数已达到或超过了“十一五”规划中规定的节能目标。在“十二五”规划中，计划将1,000家最大企业节能工程推广至10,000家最大企业节能工程。根据中国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统计，在2006年至2010年间，中国政府的三大重点能效项目降低能耗6亿吨标准煤。1,000家最大企业节能工程节能1.5亿吨标准煤，10大重点节能工程节能3.4亿吨标准煤，而淘汰落后产能计划节能1.1亿吨标准煤。随着更高效的技术投入使用，2006年至2010年间，生产每吨钢能源消耗下降12.1%。与此同时，所有重大新技术的投入使用率上升。与日本同行相比，大中型钢铁公司的绩效更优，而根据很多指标衡量，前者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效性,该政策能够显著影响清洁发电规模。鉴于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紧迫性,为了协调有效治理与市场繁荣的关系,推行先进的补贴电价政策势在必行。截至2011年,该政策已在中国、美国七个州及其它50多个国家实施¹⁹。

在执行规定的州进行公用事业投资通常可以保证获得10%至12%投资回报。补贴电价的定价通常可带来8%至10%的内部回报率。补贴电价可以保证发电部门获得长期支付,以帮助投资者收回投资。太阳能、风能及终端用户效率改进计划不需要燃料、水或废物贮存,亦不产生处置成本,因此它们的投资属于先期投入。有效期通常达到20年的长期付款合同可以保证能源供应商收回成本和筹集资金²⁰。

实现零排放

• 风能

中国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迅速成为世界最大的风力涡轮机和太阳能光伏面板的生产国。它在2009年为风力发电建立了补贴电价,在2011年则为太阳能光伏发电建立了补贴电价²¹。

最近几年,中国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可再生能源发电目标,并为风能设备制造出台扶持政策,推动了相关产业的迅猛发展。2006年,中国的风电装机容量仅为3,000兆瓦,在国际上无足轻重。但是到2012年末,中国的风电装机容量超

过70,000兆瓦,占全球总装机容量的近三分之一,6年内增长了25倍,而全球其它地区仅增长了2.6倍。

哈佛大学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与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于2009年进行的一项联合评估发现,中国优越的海岸风力资源每年可发电约25万亿千瓦时,相当于其2012年国内耗电量的5倍以上。研究小组还重点指出,假设每千瓦时的10年补贴电价支付价格与当前电价相当,“预计风能可满足2030年的全部电力需求,约相当于当前耗电量的两倍。”

哈佛大学的研究小组测算,风力发电量可以达到全球总耗电量的40倍,是全球总能源消费量的5倍以上²²。从美国可用风力资源来看,据估计,大平原地区所蕴含的风能相当于当前美国总耗电量的16倍²³。

人们已经确定,风能是一种代价和风险最低的发电能源。中美两国可逐渐用风电取代现有和计划中的全部火电厂及多数天然气发电厂²⁴。

• 太阳能

太阳能系统的生产成本已经大幅度下降,在世界许多地区实现了具有成本竞争力的电网平价。截至2012年,全球装机容量已经超过100,000兆瓦,年增长率达25%(即每三年翻一番)。

太阳能目前比核能更便宜。2013年初,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称,大规模太阳能成本将很快降至煤和天然气成本之下。例如,2012年第一太阳

19 “税务观察”, http://www.pv-tech.org/tariff_watch/list

20 即使不考虑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精心设计并实施的补贴电价的效益也超过了可再生能源的补充支付成本。管理补贴电价的德国政府部门估计,相关立法的总收益已经高出成本三倍。

21 中国正在根据各地资源条件制订不同的补贴电价。国家发改委确定了四类海上风能项目。拥有较优风力资源的地区获得了较低的补贴电价,而那些产出较低的地区将可获得较高的补贴电价。根据规定,每千瓦时的风电价格在0.082美元(0.51元)和0.098美元(0.61元)之间。作为比较,向煤电机组支付的平均电价为每千瓦时0.055美元(0.34元)。

中国预计将超额50%完成政府制订的2015年100,000兆瓦的目标。中国一直在超越自己的风电增长目标,因此很有可能很快达到其宏伟目标,其中2020年的目标为200,000兆瓦,2030年为400,000兆瓦而2050年为1百万兆瓦。

美国的风能装机容量为60,000兆瓦,占全球风能装机容量的25%,排名第二。2013年之后,美国可能不再实施风能税收激励政策。如果国会真的放弃激励措施,将是一个悲剧性错误。与中国一样,美国拥有巨大的风力资源,远远超过其巨大的煤炭和油页岩储量,而且比它们更具有经济性。

22 迈克尔·麦克尔罗伊教授等人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文章中指出,“仅限在无森林、无冰块、非城市地区运行的一个陆基2.5兆瓦风力涡轮机网络,若只在20%的额定功率下运行,发出的电相当于当前全球总电力消耗量的40多倍,相当于全球消耗的所有形式的能源的5倍。”

23 风电场的占地面积非常小。分析表明,发电量相当于美国当前耗电量的几百万座风力涡轮机,占地面积不到大平原地区面积的3%,而支付给风电场地的特许使用费将为该地区创造的收入,是农场和牧场当前创造收入的两倍,而后者却占据了大平原面积的75%。

24 中国目前计划建设几座总装机容量为558,000兆瓦的煤电厂(而美国计划建造的煤电装机容量为17,000兆瓦),此外美国计划建设几座总装机容量为141,000兆瓦的天然气发电厂。当逐步实施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及公用服务费用削减效率改进项目时,供电的系统性成本和风险应与煤电厂或天然气电厂的低效设备供电成本相当甚至更低。这一改革行动还会帮助两个风能强国在全球几万亿的风电出口市场获得相当大的份额。



能公司签订了一份电力购买协议，通过在新墨西哥州的一个50兆瓦太阳能电厂向当地电力部门供电，价格为每千瓦时0.06美元，这相当于一个新火电厂成本的一半²⁵。

据美国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室评估，为满足美国当前全部电力及能源消耗，太阳能光伏面板大约将占据现有城市陆地面积的15%。这些面板可设置在屋顶、停车场、公路、桥梁和铁路旁以及建筑物两侧。当前美国耗电量的四分之三以上可由建于“棕色地带”的光伏系统提供。所谓“棕色地带”是指美国各城市废弃的工业用地，面积估计为200多万公顷²⁶。

未来20年，中国城市将拥有3.5亿以上居民，超过美国当前的全部人口数量。到2025年，中国将拥有221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相比之下当今欧洲达到如此规模的城市仅有35个。设计建设新城市及扩张改造现有城市应尽可能利用已证明有效的方式，提供成本更低的公用及运输服务，实现二氧化碳零排放或低排放，并减少废弃物排放。

中国宣布到2015年实现太阳能装机容量增加8倍至40,000兆瓦的目标²⁷。这将使中国远远领先其他国家。相比之下，2012年底，美国的太阳能装机容量为6,400兆瓦，而其太阳能税收激励

政策将于2015年到期²⁸。

使用零排放电动车辆

发展超轻电池电动车（BEV）是替换燃油动力车的重要机遇，这样做还基本避免了生物质能动力车²⁹。

将农作物转化为燃料的效率非常低下，且要求大量的土地资源、农药和水资源消耗。例如，仅将柴油转化为生物柴油，以满足全球海上商船的燃料需求，就需要当前全球棕榈种植园产量增长40倍。最近几十年，在拥有丰富生物多样性的热带雨林中，棕榈园已成为被广泛砍伐的主要目标，也是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罪魁祸首之一。

中美两国政府均提出对石油安全问题的关切，因为两国的石油消费都依赖进口，而石油进

28 正如美国那样，风电生产税收抵免计划于2014年到期，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发展方向。为什么？

首先，它撕开了任何公平竞争假象。过去50年中，化石燃料以及核能接受的政府补贴高出太阳能和风能20倍。此外，与化石燃料外部性产生的巨大成本相比，对太阳能和风能的税收激励显得微不足道。

第二，与化石燃料发电厂（以及核电站和大型水电站）不同，太阳能光伏及风电所需要的水比它们少5%，而化石燃料发电厂所消耗的水占美国水资源开采的40%。在一个受水资源约束且情况不断恶化的世界中，太阳能光伏和风能的节水特性使之在价格持续波动的使用期内成为低风险资产。此外，它们本质上就是低风险资产，可以抵抗未来价格波动，因为它们的发电机组不需要消耗能源也不产生排放、污染和废弃物。

第三，考虑到加快一个由零排放能源驱动的全球经济发展的需要，太阳能及风能技术出口市场潜力巨大。斯坦福大学教授马克·雅各布森及加州大学教授马克·德卢基在《2030年前建立可持续未来的规划》一书中的全球可再生能源情景中描述了这一点。

巨大的出口市场潜力，不仅在于其自身，更在于每个能源消耗型终端家电、装置和设备类别，应从上文所述的实施稳健的能源效率改进计划着手。作者指出，太阳能和风能可在几十年的时间内，逐步满足90%的全球电力及能源需求。地热及水力发电提供剩下的10%中的绝大部分，同时还可提供重要的能源储存功能，以补充偶尔中断的太阳能和风能。

对可实现年均增长率依旧存在争论，对于风能而言，年均增长率可以达到25%，而太阳能光伏则为40%。对于如此高的增长率历史上有先例可循。1956年至1980年期间，在核能失宠之前，全球核电装机容量以年均40%的速度增长。与处于全盛期的核能相同，风能和太阳能需要有力而持久的公共扶持政策以维持如此高的增长率。

29 随着汽车制造商开始使用防碰撞型超轻碳复合材料取代笨重的钢部件，车辆重量显著下降，减少了所需要的电池的数量。一辆电池电动车的运行成本主要来自电池组的维护和更换。一辆电池电动车的维护成本较低，因为其发动机仅有5个活动件，而汽油内燃机引擎包含成百上千个活动件。

电力传动系统的效率为80%，比柴油（20%）或汽油（15%）分别高出4到5倍。据美国环境保护署（EPA）的城市驾车燃料经济性评级，2012年出售的11款电池电动车平均为33至59公里/升当量，或77至138英里/加仑当量。相比之下，EPA的2012年（燃料燃烧）新车的燃料经济性评级为每升9.4公里（22英里/加仑）。

EPA估计，一辆新汽油汽车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每公里311克（500克/英里），其中包括汽油生产上游的二氧化碳和废气排放。一辆电池电动汽车每公里排放出的二氧化碳克数差别很大，因为这取决于电网的清洁程度。雅各布森-德卢基的清洁电网情景显示，电池电动汽车二氧化碳排放量接近10克/公里，但若通过煤电厂电网发电，排放量将超过250克/公里。

25 由于一系列技术、金融、地理和制度因素，太阳能光伏系统的成本和成本效益变动非常大。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201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重新思考光伏发电经济学》对这些因素进行了深入探讨。

26 硅是地壳中含量第二高的元素。从一吨沙中制造出的非晶硅太阳能电池可产生的电能相当于500,000吨煤燃烧所产生的电能。目前生产出的太阳能电池（可发电26年或更长时间）在6个月至3.5年内即可“偿还”生产它们所消耗的能量。从创造就业的角度来看，花在光伏面板上的每100万美元创造的就业比采煤业高3倍，比石油和天然气勘探高出9倍。

27 补贴电价对刺激太阳能光伏（及风能）增长而言至关重要。中国从2011年开始就制定了太阳能发电项目补贴电价，为每千瓦时0.15美元。2012年底，中国的太阳能光伏装机容量为5,000兆瓦，其2015年的宏伟目标为其它承诺发展太阳能的国家设立了一个新的标杆。

口渠道并不安全。到2020年中国石油进口量预计将翻番。2012年美国在石油进口上的花费约为4,300亿美元,这意味着大量财富直接流出。为维持石油运输航线的畅通需额外花费数十亿美元,而石油地缘政治也带来相当大的额外负担³⁰。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2年国情咨文中公布了一项目标:到2015年,将有100万辆电池电动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车上路行驶,而2012年此数字为50万辆。这与中国“十二五”规划的目标不谋而合,中国计划到2020年将拥有500万辆电池电动车及插电式混合动力车³¹。

太阳能和风能综合动力电池电动车将产生多种经济和环境效益:城市及农村空气质量改善,为那些忍受空气污染屡破纪录的人们带来健康环境;降低脆弱且价格经常波动的石油进口;节约了昂贵的汽油成本;消除了汽车燃料燃烧和排放,大幅降低了二氧化碳排放。

消费

对“消费”及“消费者”的定义包括两方面的要素:购买一种产品;利用、消耗及浪费一种资源。人类同时进行这两种活动,但是后者对长期经济和生态状况构成了威胁。

世界现在坐在一个消费定时炸弹之上,消费者数量增加导致更多的消费和更高的原料

密集度。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预计,到2030年,全球中产阶层数量将增长250%,达到50亿人,其中近90%的增长来自亚太地区。到2025年,新兴市场的消费预计将从2010年的12万亿美元增长至30万亿美元。这些新消费者的购买习惯将从无品牌的散装商品升级为精加工的包装商品。

2012年报告《走向循环经济》³²指出,2010年约有650亿吨原材料进入经济系统,2020年该数字有望增长至约820亿吨。在传统的采掘—消耗—废弃物线型经济模式中,目前社会仅可回收这些原材料中的20%,远低于不久将来可以实现的50%回收率。

供应链实践——从线型经济转向循环经济³³

联合利华首席执行官保罗·波尔曼对商业活动向循环经济转型的重要性做了如下总结:

“很显然,无视其运行所处的环境,无视地球资源边界,以不断增加的速度采掘资源的经济,无法永远持续下去。在一个积极购买制成品的消费者数量很快达到90亿的世界中,这种模式将束缚公司的发展并破坏各经济体。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商业方式。循环经济的概念帮我们找到了出路。在循环经济中,产品不会很快成为废弃物,而是被重新利用以尽可能挖掘其价值,然后让其安全、富有成效地回归生物圈³⁴。”

30 这是促进两国开发国内页岩油储备和生物燃料的主要动力,尽管这样会增加大量二氧化碳排放。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生产国,每4辆汽车中即有1辆为中国制造;此外,中美两国的汽车市场合计超过了全球汽车销量的三分之一。麦肯锡咨询公司在其最近的报告《为中国的电动车辆雄心充电》中强调,若中国希望自己的人均车辆渗透率达到美国的水平,它对石油的需求将增加15倍,超过全球的石油总产量。因此,电池电动车对于中国的经济、安全及环境可持续发展增长而言至关重要。

31 两国政府已经投入了几十亿美元资金用于开发先进的电池,并激励消费者购买电动汽车。但是,正如麦肯锡的电动汽车报告中详细论述的那样,两国均需实施精心设计的实质性政策和激励措施,确保加速并扩大电动汽车的生产与销售。

电池电动自行车和小型摩托车是一个不同但非常成功的案例。中国经历了电池电动自行车、电动小型摩托车和电动摩托车销售的爆炸性增长,年销量从1998年的56,000辆增长至2008年的2,100多万辆。截至2012年,中国拥有1.5亿辆电动自行车,销量年均增长10%。无论在电动自行车生产(每年2,200万辆)还是消费方面,中国都领先于世界。预计到2016年,电动自行车和电动小型摩托车的销量将超过4.66亿辆,届时中国仍将以95%的销售份额统治世界市场。

此外,随着汽油价格超过每升0.80美元(每加仑3美元),相当于电价为每千瓦时0.32美元,用太阳能充电站为电动自行车供电具有成本效益。

32 《走向循环经济》,2012,埃伦·麦克阿瑟基金会,怀特岛出版社,英国, <http://www.circulareconomy100.org/>

33 若线型经济模式转为循环经济,废弃物成为消费过程的有用投入,降低对未开发资源的需求,我们将会取得何种成就?麦肯锡接受委托,对将循环经济作为一种创新框架的经济和商业理念进行了评估。

麦肯锡分析了快速消费品行业的循环经济机遇,这一行业的产品拥有较低的单位成本,购买更频繁,与耐用品相比服务周期较短,每年消耗的原料总价值为3.2万亿美元。这些快速消费品占经济体原料投入的35%,占市政废弃物的75%。更值得注意的是,消费品行业吸收了90%以上的农业产出。

循环经济可节约原材料约7,000亿美元,相当于2010年GDP的1.1%。消费品行业可节约当前原料投入成本的20%。

34 波尔曼继续强调,“对于商业领袖而言最重要的是,这样一种经济可带来增长。创新产品的设计师和商业领袖已冒险进入这一领域。我不认为在赋予其生命的体系中,企业仅仅充当一个旁观者。经济增长与环境影响挂钩,以及不断提高积极的社会效用是我公司战略核心的两大优先目标。”



中美两国在各自供应链网络中拥有强大的国际地位，两国严重依赖其它国家的自然资源，以满足自身对粮食、饲料、纤维、鱼、燃料、矿产品等方面的需求。现在他们面临一个共同机遇和全球责任，来促进和鼓励来自资源供应国的可持续资源开发领域的根本性创新。

两国如能携起手来鼓励和扶持其它国家，以可持续的方式管理资源，包括能源、水资源和其他资源的全面效率改进，以及尽可能减少土地和水资源消耗，则能取得巨大进步。下一步则是在推动发展中国家满足全球最佳实践标准并逐步强化这些标准时，调整中美两国的资源开采政策。

中美两国的政治治理能力及市场领导力

中美两国拥有“庞大多样性”，这意味着它们拥有丰富的生态资产，按社会经济价值计算，差不多相当于几十万亿美元。多数人并未意识到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丰富多样性提供了这些免费服务。许多自然资源的替代成本极其昂贵，而且其中一些一旦遭受破坏则无可替代和逆转³⁵。

两国面临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基本挑战，主要是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保持而不是消弱或耗尽自然资本生产力及适应力。科学清晰说明了确保这一点的主要步骤：转向使用零排放的可再生能源；在整个经济活动周期中，从根本上提高能源及资源使用效率；在气候、资源存量和流量、淡水系统等方面严格维持安全的全球界限（所谓“环境安全界限”）。

尽管中美两国分别面临经济和环境挑战的不同阶段，但越发容易受到资源稀缺（矿产、水、粮食和生物多样性稀缺）及气候不稳定（干旱、洪水、大火灾及极端天气）的侵害。两国还在其它拥有丰富多样性的国家经营着广泛的供

应链，并从这些国家获取大量资源。这些国家面临着相似的自然资源枯竭和瓦解的威胁，但各国可利用市场和治理方面的大量最佳实践来维持自己不可替代的自然资产。

中美两国可在许多领域进行合作，帮助自己和贸易伙伴实现大规模的可持续发展收益。两大主要领域包括：

- 技术知识

中美合计占全球研发活动的50%至60%，通过协同创新网络等机制，两国可从根本性创新中获取巨大的双赢利益。技术知识是一个含义宽泛的术语，包括科学、技术、工程学、经济学、金融及各种附属领域的进步，这些附属领域包括能力建设、技能培养、持续学习、通讯等。

- 政策

当良好的治理制订了符合市场机遇的政策和激励措施，并生产出令人满意的社会和公共产品的时候，技术知识就会繁荣起来。对于制订有效政策帮助推动市场实现本文强调的以最低代价和风险实现零排放的最低代价和风险公用和运输服务而言，未来十年至关重要。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两国应率先促成全球协议，如气候变化和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根本性创新方案治理。这要求推行已获证实的最佳选项取代过时、次优的补贴/激励、代价和风险无法达到最低的公用事业管理规定、宽松的环保标准和执行机制，以及在建筑、发动机、家电、车辆等方面薄弱或不够严厉的效率标准。

对于自然资源保护，中美两国应竭力实现生

³⁵ 根据多卷本全球科学报告《新千年生态系统评估》中详细论述，大自然为社会提供了基本服务，如气候稳定、淡水供给、粮食安全、健康和医药、免遭风暴、洪水和干旱、土壤侵蚀，它还是维持几十亿人生计的重要来源。

生物多样性公约中规定的陆地和海洋保护目标³⁶。

联合国全球契约及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有关企业行为对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服务影响的框架

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影响及依赖性的管理失灵，带来了可能出现的高风险，这些风险可以直接影响企业的竞争力和盈利能力，造成潜在负债上升，将公司的长期生存能力置于危险之中。这些风险涉及商业活动的方方面面：运营、监管、法律、市场、财务及声誉。

若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退化或丧失，公司的运营可能面临以下问题：生产率下降、业务活动中断、获取资源渠道受阻或受限。所有这些问题都会提高实现盈利的最小运营成本。公司会发现，因为无法利用生态系统管理，公司很难保证获得一个法律、管理或社会许可来进行正常业务³⁷。

企业需要以“具体、可衡量、可实现、有意义及有时间限制的”方式设计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目标。它们应首先确认哪些是应该避免的。

对于采掘行业，应从查明勘探或清除的“禁区”着手，包括确定禁止使用的技术。用更为积极的语言表述，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目标能促进“减排，重新利用，回收及修复”，并采用“净平衡”的方法。

将“减轻层级”（指的是减轻公司活动对环境影响的四个层次：避免、最小化、复原/恢复及补偿³⁸）纳入公司实践是管理生物多样性风险的实践方法。这样做的结果应为阻止或避免伤害生物多样性及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因此，应不断采取行动关注修复不良影响，然后应对任何残存的不利影响。这可以通过“生物多样性补偿”来实现，其目的是实现生物多样性“零净损失”或对生物多样性的“净积极影响”。

正如2009年制订的“企业多样性补偿计划”（BBOP）中《要求、指标及原则》关于生物多样性补偿标准制层级给出的定义，补偿是“旨在对项目开发及在采取适当防治措施之后仍然持续的、对生物多样性具有明显剩余不利影响的行为进行补偿的可衡量的保护效果”。此标准提供了一种净损失为零的审计方法，并可让审计人员和评估人员决定某项补偿是否按照BBOP的原则进行设计和实施，以此来让项目开发更好地控制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风险。

净值正面效益

许多公司在探索如何管理其活动对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的同时³⁹。少数公司已经公开承诺实现对生物多样性或特定生态系统服务（如水资源）的“零净损失”、“生态中性”甚至“净值正面效益”。控制生物多样性风险不应只着眼于厂址和产品，应关注更广阔的陆地和海洋地貌。这些努力包括：

36 生物多样性公约三大主要目标为：1) 保护生物多样性；2) 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各组成部分；3) 公平合理分享使用遗传资源的收益，包括通过合理获取遗传资源、合理转让相关技术（考虑对这些资源和技术的所有权），以及合理的投资。

生物多样性公约最近通过了一个十年战略规划：《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规划提供了如何更好调整企业战略、生物多样性公约的主要目标，以及新的或经改进的公共政策和管理框架之间关系等方面的机遇。它还启动了全球商业和生物多样性平台，推动支持自然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市场发展。

两国还需要制订并实施有关减少对生物多样性的过度利用和交易的重要政策。中美两国均为CITES（《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的签字国。此公约旨在保证国际野生动植物标本交易不会威胁这些动植物的生存。

随着全球范围内富裕程度的扩大、运输和贸易关系的改善，非法动物交易案例持续上升。据全球金融诚信组织统计，野生动植物、木材和鱼类的非法交易每年总计达250亿美元，位居全球五大利润最丰厚的黑市之列，紧随假冒产品、毒品、人口和石油非法贸易之后。某些动物和植物物种的开发量在急剧上升，与它们有关的贸易以及栖息地严重损失正在导致种群大量减少，某些物种甚至濒临灭绝。

37 道德生物贸易联盟（Union for Ethical BioTrade）2011年对生物多样性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80%的消费者希望能更加了解公司的采购行为。更高比例的消费指出，如果了解到某品牌未能遵守生态或道德规范，他们将不再购买其产品。四分之三的受调查消费者在购买食品和化妆品时仔细检查了有关环保和道德的标签。

在普华永道2009年对全球首席执行官进行的一项调查中，四分之一以上的受调查者表达了对生物多样性损失对其业务增长前景影响的担心。《生态系统及生物多样性经济学：面向企业的报告》强调，企业对管理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承诺应从企业治理着手，并将其融入管理的各个方面。这需要将企业为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制订的所有目标融入企业风险和机遇评估、运营和供应链管理、财务会计、审计报告和交流之中。

38 参阅：http://bbop.forest-trends.org/pages/mitigation_hierarchy

39 彪马公司编制了一份环境、社会及经济损益表，按照生态和社会成本对其商业效益进行评估。这一过程揭示了为实现净值正面影响应采取哪些行动。



消费品论坛：一个由零售及制造企业组成的全球性网络，其目的在于调动集体资源，帮助在2020年前实现森林砍伐净平衡，由此显示其与成员合作开发标准方法的能力。

沃尔玛公司：承认自己90%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源于供应链。它与Earthster联合发起了一项行动，为产品设计师、制造商、供应商及可持续发展专家建立一个开放的数据库，以寻找与产品生命周期中有关的原材料、能源、水、社会及气候影响的现行信息。2005年以来，沃尔玛开发并利用“可持续产品指数”对其产品的环境影响进行评估，并利用一套标签系统来将这些信息传递给消费者。该指数对生产过程中的能源利用、原料效率及工人工作条件等方面进行了衡量。

力拓：承诺实现对生物多样性的净值正面效益，这是于2004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世界自然保护大会上启动的一项战略。公司对生物多样性在2004年至2065年间的损益进行了测算或预测，以确定由力拓质量改进团队管理的马达加斯加矿业公司(QMM)当前及计划执行的缓解环境影响行动，是否能够在项目到期前实现净值正面效益的目标⁴⁰。

欧盟：在政策领域，作为欧盟走向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的一部分，欧盟已经制订了一份《欧盟零净损失倡议》，将于2015年启动。

生态系统及生物多样性经济学：《生态系统及生物多样性经济学企业报告》记载了全球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自然资源商业机遇（例如能源、森林、粮食和农业、水资源以及金属）。到2050

年，这些商业机遇的价值可能高达6万亿美元。生物多样性或生态系统服务会成为这些新增商业的基础。

但是，生态系统及生物多样性经济学评估强调，“有效应对生物多样性损失及生态系统服务衰退要求对经济激励政策及市场进行改革。”全球碳交易市场从2004年的近乎于零扩大至2009年超过1,400亿美元，大部分归功于与气候相关的新规定。碳交易市场的潜力巨大，有可能提供足够资金阻止全球大多数森林砍伐及生态系统破坏⁴¹。

全球现在也拥有多个同时应对贫困及生物多样性的商业倡议。咖啡零售商星巴克支持“保护国际基金会”关于Verde Ventures投资组合的一项倡议。Verde Ventures是向当地非政府组织和种植咖啡的农户提供贷款帮助维护当地森林生态系统和项目。举例来说，向马德雷山脉附近的一家种植咖啡的合作社发放的贷款为收割咖啡提供了资金，同时还允许农户在其土地附近开展再造林活动。贷款资金还为对环境无害的咖啡种植培训项目给予支持，这些培训项目还帮助女性接受教育⁴²。

40 为降低项目对关键栖息地和物种的影响，力拓正在实施四种主要类型的保护行动：
建立“回避区”。对于力拓所有已经开采的铁铁矿中的8%而言，这是一种成本，而且维护这些区域还存在管理成本。此外，这些回避区保护了矿床上剩余最优质森林植被中的27%。
最小化。必须降低采矿活动对生物多样性影响的可能性和程度。
复原及修复。通过更换表层土（在采矿过程中已储存），并种植力拓苗圃中培育的合适的原生物种，在曾被破坏过的区域修复海岸森林。
生物多样性补偿。力拓正在对该地区的多个森林地区进行生态补偿投资，其目的在于降低高居不下的森林砍伐率。
此外，力拓QMM正在实施更多保护行动（如环境教育、能力建设、用于维持生计的其它方案等），其目的在于对该地区可持续发展和降低人对生物多样性压力做出积极贡献。

41 充分释放保护碳补偿（REDD+）的潜力有待所有国家做出可行承诺，希望中美两国采取联合行动，利用必要的碳预算将气温上升控制在2°C以下。
42 企业应对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服务的关键行动要点：
1. 确定你的企业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有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和依赖。
2. 评估与这些影响和依赖性有关的商业风险和机遇，对其定价可以帮助澄清这些风险和机遇。
3. 开发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服务信息系统，制订一个具体、可量化、可实现、相关并有时间限制的目标，衡量和评估性能，并报告结果。在给同行业伙伴形成压力的同时，与外部利益攸关方建立信任的关键一步，是企业衡量并报告自己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行动和结果。
4. 采取行动避免、最小化以及减轻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服务风险，包括实物补偿（“抵消”）；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服务的目标可建立在“零净损失”、“生态中性”或“净正面影响”的理念之上，如有必要应包括对生物多样性补偿的支持。
5. 抓住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服务的商业机遇，例如可通过成本效益、新产品和新市场，与公共机构、制订会计及财务标准机构、保护组织和社区促成机遇。
6. 将有关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企业战略和行动与更为广泛的企业社会责任相结合。可以通过将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纳入企业可持续发展和社区参与战略，来改善生物多样性状态和人类生活，并帮助减少全球贫困
与企业同僚和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及民间团体等利益攸关方建立良好关系，以改善生物多样性的指导和政策。企业需要更积极参与公共政策讨论，推动适当的管理改革，制订互补性和自愿性指导计划。

利用期权价值保护自然资本资产

传统发展模式对本文所强调的经济和环境可持续发展框架构成了重大威胁。中美两国携起手来促进并支持其它国家实施这些积极的气候和生物多样性解决方案，符合两国利益。这要求开发零排放技术，为代价和风险最低和补贴电价能源服务找到创新融资手段，采用零废物排放的闭环制造工艺并保护生态环境。未来的不确定性日益加剧，充斥着有害的、破坏性的意外事件。面对这样的未来，企业和政府应采取风险和成本最小化战略，为实行一系列稳健的市场做法以及协调一致的治理政策，开发一条通向资源高效、零二氧化碳及废弃物排放并寻求排放补偿的可持续道路⁴³。

上文中第三点的一个典型机遇是寻求陆基的二氧化碳排放补偿。为什么？将能源效率改进和加强零排放的太阳能和风能系统相结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此外，农业及化工业存在与能源无关的温室气体排放，这些排放无法降至零，并将在不可预见的将来持续存在。寻求补偿提供了一条立即可用且成本效益较高的途径，有助

于保证当前及未来数十年所需要的年度减排规模⁴⁴。

寻求基于标准、多重收益的保护性碳补偿

一个鲜有报道的惊人事实是，在过去20年的多数时间里，全球二氧化碳排放中有15%-20%归咎于每年焚烧的1,400万公顷热带雨林。此数字高于全球运输业的排放量，差不多与美国或中国每年二氧化碳排放量相当。

大约十年前，作为寻求陆基排放补偿并拥有多重收益的一条途径，“气候、社区及生物多样性(CBB)标准”出台。从技术角度而言，它们指的是REDD+，即削减因森林砍伐和退化所导致的排放并进行保护，或通常所指的“生态碳储存”(ECS)。这些自愿性标准可帮助设计并识别陆地管理活动，同时尽量缓解气候变化，支持当地的可持续发展并保护生物多样性⁴⁵。

CBB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最常用的陆基标准，被广泛认为是一项高质量、三重收益的标准，用来应对迫在眉睫的三大社会和环境问题。在一个仍未就温室气体排放上限及主要减排指标达成一致的世界中，此类自愿性领导行动对于逐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言仍是不可或缺的，它同时还表明发展与维持健康的生态系统服务两

44 一项被大肆吹捧的碳减排技术——化石燃料的碳捕获及封存(CCS)，在未来几十年将完全失去意义。假设即使CCS一夜之间突然变得可用，并用于处理2010年美国化石燃料发电厂排放出的23亿吨二氧化碳，成本将达到令人吃惊的1,150亿美元，相当于将每千瓦时电价提高3美分(假定预计未来CCS的成本为每吨二氧化碳50美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正如其在气候谈判中所提到的，生态碳封存(ECS)或削减因森林砍伐和退化所造成的排放，并加强保护(REDD+)随时可用，处理一吨二氧化碳的平均成本仅为7.50美元。这差不多只相当于CCS成本的七分之一，而且它导致的电价上涨仅为每千瓦时0.004美元(1美分的十分之四)。若与通过综合IPR公用服务规划程序实现终端用户效率改进相结合，所降低的公用服务支出规模将更大。假设美国抵消了来自公用事业部门和公路运输部门的化石燃料排放，那么可为ECS/REDD+筹集多少资金？2010年，美国公路消耗燃料1.7亿加仑，排放出15亿吨二氧化碳。为此ECS/REDD+需要获得110亿美元的补偿，每加仑燃料价格会上升6.5美分(1.7美分/升)。为公用事业部门和公路车辆排放寻求补偿，每年将产生280亿美元。这相当于为阻止全球砍伐热带雨林行为提供的所有激励性支付的金额。其发生概率与1787年美国宪法结束奴隶制的政治可能性相当。但是，对于实现大幅度削减二氧化碳排放，同时获得具有多重全球性利益的一个较快减排选项而言，它仍然是一个最低代价和风险的参考基准。

45 CBB标准与LEED等绿色建筑标准相似。LEED认证标准使建筑效能更高。相似，CBB标准要求补偿项目不只是减低碳排放，还应包括社区可持续发展，改善当地人的生活水平，以及保护或修复生态系统服务和功能的健康和完整。

43 资源效率。在向终端使用者提供服务、获得运输服务、实施工业生产程序、设计基础设施等过程中，通过大幅度持续的“深潜水”效率改进，稳步降低能源密集度。
• 零二氧化碳及废弃物排放。鼓励通过各种技术措施和零排放能源选项，特别是太阳能、风能和其他可再生能源选项，来鼓励大幅度削减碳密集度，并从基于单向、资源密集型生产力经济转向基于知识密集型生产力(信息比特取代能源和原料分子)的繁荣经济，后者处于一种资源封闭循环而废弃物转为有用投入的体系之中。
• 获得补偿。寻求多重效益、基于标准的保护碳补偿对完整生态系统(如热带森林、红树、泥炭地及草地)的保护措施，以抵消当前的排放，基本上考虑了碳燃烧所致的二氧化碳排放的负外部性。



者可以兼得。

寻求基于ECS/REDD+标准的补偿为接受受偿国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期权价值。发展中国家的热带森林拥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植物和动物，多数为所在地区土生土长的独有物种。避免焚烧清除这些富含碳的森林可直接缓解气候变化。

此外，本土物种及生态系统服务提供了除碳储存价值之外的多种价值，其中多数价值仍有待估算。然而即使估算出价值，多数也未反映在市场交易中。随着科学技术及工程学进步为医疗、制药及农业相关产业（食品、饲料、纤维、燃料及林业）创造出新产品和服务，其中一部分价值越来越高。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家肯尼斯·阿罗几十年前所描述的那样，面对未来价值的如此不确定性，执行期权变得具有经济优势，推迟不可逆转的投资决策直至获得新信息。

海洋健康指数

人类依赖海洋。海洋是全球最大的银行账户，向人类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估计为每年30万亿至50万亿美元（2012年价格）。地球上健康的海洋向我们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包括海鲜、碳储存、生物多样性、自然产品、清洁的水、岸线防护、人工捕捞、方位感、旅游休闲和维持生计的捕捞等。

由于不可持续的过度捕捞、气候变化、栖息地遭到破坏、污染和外来物种入侵，导致海洋生态系统退化，我们和后代的未来已处于危险之中。全球已经有8%的渔业资源被开采或枯竭，野生捕捞在2000年达到顶峰，此后一直处于下降趋势。

维护并修复海洋健康的重要步骤包括，国际和国内的政策决定，对可持续商业实践进行排序，以及在多边计划评估过程中将“海洋健康指数”（OHI）作为一个重要的衡量工具加以考虑。

于2012年推出的“海洋健康指数”是由一群来自全球的科学家开发的一种复合指数。它衡量当前及未来海洋为人类提供多少福利⁴⁶。

“海洋健康指数”通过在决策过程中对沿海及海洋生态系统服务进行估值和核算，帮助各国认识海洋的价值。估值过程的重要环节是确定海洋标志性物种的价值，以及通过一种标志性物种方法建立新的海洋保护区。

例如，研究表明，“一条活鲨鱼价值超过一条死鲨鱼。”据估计，在巴哈马群岛附近禁止捕鲨的518,000平方公里水域中每条鲨鱼对于旅游业的价值为245,000美元，而对于巴哈马群岛的鲨鱼潜水旅游而言，每年的价值为8,000万美元。与此同时，对于在巴哈马群岛水域捕鲨行为的罚款为最低3,000美元，最高5,000美元。

对于理解海洋所创造的价值和修复收益而言，“海洋健康指数”也很重要。各国在《生物多样性公约》中同意将10%的海洋纳入海洋保护区，以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经济生态系统服务。尽管海洋保护区在不断扩张，全球所付出的努力仍然远远低于目标，因为当前海洋保护区仅不足海洋面积的1.5%⁴⁷。

“海洋健康指数”有助于解决沿海渔业管理中的经济和环境可持续性问题的，包括渔权管理和可持续水产养殖发展。这涉及到开发和分享新的方法和建议，以在岛国及沿海国家确定水产养殖业生态、社会及环境后果。

若能正确操作，养殖海鲜与养殖陆生动物相比可将更多饲料转化为营养蛋白质。在全球消费的海鲜中，20%至50%来自水产养殖业，此比例

46 “海洋健康指数”具有科学性，获得了全球认可。它揭示了海洋健康的变化和趋势，提供了考察人类利益和海洋及海洋生物要求的新途径。主要通过以下方法实现：提供对海洋的可行评估，主要反映在，全球和国内范围内评估基于约100个指标的10大公共海洋目标的分数，强调改善海洋健康的机遇，权衡取舍并强调成功的行动。此外，每年对指数进行更新，这样可让指数始终反映最新信息，并强调在改善海洋健康上取得的进展。

47 海洋保护策略整合并包含了一个海洋保护区网络，许多海洋物种会在繁殖、哺育和捕食区之间长途迁徙。海洋保护策略满足了在迁徙物种生命周期中将空间相互分离的距离连接起来的要求。

每年都在上升⁴⁸。用13公斤粮食饲料喂养的鱼类可以生产1公斤蛋白质，而相比之下，需要38公斤饲料养猪和61公斤饲料养牛才能转化为相同数量的蛋白质。

中美两国均高度依赖于健康的海洋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两国应引领“全球海洋伙伴关系”，帮助加快并扩大“海洋健康指数”以及广受推荐的可持续性实践的运用。

蓝碳自然资本

海洋生态系统在控制二氧化碳水平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⁴⁹。海草、潮汐沼泽及红树林在植物体内及下方沉积物中封存了大量的蓝碳。在这些沿海系统中，每平方公里储存的碳的总数量可达热带森林碳储存量的5倍。但是，这些生态系统正在以比热带森林快4倍的速度被破坏，导致大量二氧化碳排放至海洋和大气中，加快了气候变化。过去35年间，全球354%的红树林已经被摧毁⁵⁰。

“蓝碳”是指在潮汐沼泽、红树林及海草组成的沿海生态系统中储存、封存或释放出的碳。蓝碳活动指的是沿海生态系统中的一系列可持续发展政策、管理及规划活动，其目的是降低因海洋生态系统转化和退化所导致的排放，保护并以可持续的方式管理沿海碳汇。

保护并修复陆地上的森林，以及最近开始实施保护和修复的泥炭地，已被公认是缓解气候

变化的一个重要部分⁵¹。这些做法现在应进一步推广至其它碳贮存丰富的自然系统，降低因这些系统的转化和退化所导致的潜在大规模排放⁵²。

实行自然资本核算

会计界及财务报告机构应加快工作，为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所产生影响的信息披露和审计鉴证工作制订标准和指标。

但是现有的多数倡议无法在人类福利方面对生物多样性影响（即所谓的商业“外部性”）进行量化。我们需要在行业和商业层面量化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方法，以及适当的呈报要求。我们还需要可靠的审计和鉴证机制对商业绩效及信息披露的质量进行验证⁵³。

自然资本和服务对于企业和社会的幸福不可或缺。不幸的是，尽管它们面临快速消耗且威胁与日俱增，社会的经济会计体系并未对其充分反映。与其它形式的资本一样，如果希望自然资本对人类的繁荣和幸福安康发挥充分作用，我们需要对其进行投资、维护和良好管理。

自然资本核算是一个有助于衡量和管理一个国家的全部自然资本的工具，现在对于国家层面的自然资本核算，已经存在一种国际社会公认的方法：环境—经济会计体系（SEEA）。

48 全球海鲜养殖（水产养殖及海水养殖）产量中的三分之二在中国，90%在亚洲。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官方数字是超过50%，而考虑到附带捕捞、丢弃、非法、不受管制或未报告捕获，以及因为维持生计和休闲的捕捞，这个数字低估了约20%，而且在某些地区，维持生计和休闲捕捞的数字可能非常大。

49 在过去200年间，海洋从大气中吸收了5,250亿吨二氧化碳，差不多相当于同期化石燃料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一半。目前海洋吸收了三分之一排入大气的二氧化碳。这个自然过程大幅减少了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因此最大程度减轻了一些气候不稳定影响。但是海洋每天吸收2,200万吨二氧化碳正在对海水化学造成伤害。目前，海洋化学的变化速度比工业时代之前的650,000年间的速度快100倍。

50 过去100年间，在加利福尼亚萨克拉门托河—圣华金三角洲，由于农业1,800 km²湿地已经干涸，导致向大气释放出了大量二氧化碳。每年三角洲仍在继续释放相当于一百多万辆汽车排放的二氧化碳。

51 几个国家正在制订政策和计划，通过削减与其经济增长有关的碳排放来扶持可持续发展，包括保护并以可持续的方式管理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和REDD+（削减因森林砍伐和退化所导致的排放和加强保护）机制相关的自然系统。

52 国际和国内气候变化响应战略尚未充分认识到为应对气候变化而进行海岸碳管理的重要性。当前并未利用气候变化融资机遇来推动以保护、修复及可持续利用海岸生态系统为目的的应对行动。

蓝碳政策框架有五大具体政策目标：

1. 将蓝碳活动作为缓解气候变化机制的一部分，充分纳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国际政策和融资程序；
2. 将蓝碳活动充分纳入其它碳金融机制，例如，作为一种应对气候变化机制的自愿性碳市场。
3. 建立一个蓝碳示范项目网络。
4. 将蓝碳活动纳入其它全球、地区及国内框架和政策之中，包括海岸和海洋框架和政策。
5. 推动将海岸生态系统的碳值纳入生态系统服务会计。

53 TEEB报告指出，“千年生态系统评估”以及一些知名委员会的报告一致认为，政府在提供有效职权及财政上可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如本文所强调，此类行动包括取消不利于生物圈并具有破坏性的补贴，为保护性投资提供税收抵免或财政激励，建立更强的环境责任（如履约保证书、补偿要求等），制订新的生态系统产权及交易机制（如水质交易），鼓励通过报告和披露规则让公众获得更多信息，推动跨行业协作。

实施生态系统服务的财富会计和估值

在2012年“里约+20”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会议上，世界银行集团启动了“50:50”活动，这是一个联合公共和私人部门，在国际舞台上采取集体行动，以支持在经济决策或企业运营中保护自然资源的活动。它将政府、民营企业领袖及其它利益攸关方的支持结合在一起，争取将自然资本纳入决策过程。所谓“50:50”代表了做出承诺争取实行自然资本核算的50个国家政府及50家企业⁵⁴。

“生态系统服务的财富会计及估值”（WAVES）为以上工作奠定了基础。此倡议旨在将自然资本价值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由此鼓励更优、更有效率的决策和规划。WAVES是五个试点伙伴国正在实施的一个全球伙伴关系项目。发展中国家如博茨瓦纳、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马达加斯加及菲律宾正在争取在实践中建立环境账户⁵⁵。

建议中美两国应采取联合行动抓住以下机遇

1. 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两国应带头促成全球协议，协议主要是应对气候变化，以及为促进全球生态可持续发展提出创新方案市场配置的治理政策。

54 在“里约+20”会议召开前个月，参加在博茨瓦纳哈博罗内举办的非洲可持续发展峰会的十位非洲国家元首成为《自然资本会计联合公报》的首批签字人，他们将这一文件纳入非洲可持续发展峰会哈博罗内宣言中。非洲是一个拥有丰富自然资源却很贫穷的大陆，它将面临因不加控制地排放二氧化碳而导致的一些严重灾难。保护并修复非洲生物多样性以及生态系统服务自然资本，对于缓解并应对气候不稳定而言非常重要。因此，非洲领导人处于向各国领导人敲响警钟的最前线，要求后者帮助解决两大孪生挑战：稳定地球气候，承认自然资本资产的巨大价值。

55 发达国家中澳大利亚、日本、挪威、英国及加拿大已经采取行动，推动实行环境会计，因此它们成为重要的WAVES伙伴。其它重要伙伴包括国际组织，例如多个联合国机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及联合国统计委员会）以及许多给予支持的研究组织和非政府组织。WAVES寻求促成自然资本会计的实施，最终目的是将其纳入政策分析和发展规划的同时，支持发展国际社会认同的生态系统会计指导计划。

例如，马达加斯加的WAVES示范项目对Ankeniheny-Zahamena森林走廊的重要生态系统服务的贡献进行了深入评估，该走廊是马达加斯加东部保留下来的最大一片连续性湿润森林。项目阐述了评估生态系统服务经济规模及收益的多种方法，以及用于生态系统服务的详细和空间直观的动态方法，例如由生态系统服务人工智能工具（ARIES）给出的方法之间的相关性。

2. 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应被视作有利于缓解及适应气候变化的可行性投资选择。在实施气候协议的过程中，应优先考虑加快实施REDD-Plus，从试点项目和工作着手加强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帮助建立可靠监测及核查体系，以对此进行全面部署。
3. 到2020年实现森林砍伐净平衡是一项可实现且富有吸引力的机遇。鉴于两国的供应链网络范围具有强大的国际地位，以及两国的粮食、饲料、纤维、林业产品、鱼、燃料及矿产品等资源严重依赖拥有丰富森林资源国家的自然资源，两国均应做出表率，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承担领导责任。对于促进和鼓励供应国在可持续资源开发领域的根本性创新，两国拥有共同的机遇及全球责任。
4. “零净损失”或“净值正面效益”原则应作为通行的商业惯例，它们指的是利用强大的生物多样性绩效基准及评估过程来避免和降低损害，并通过有利于生物多样性的投资来对无法避免的负面影响进行补偿。
5. 中美两国高度依赖健康的海洋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因此，两国应引领“全球海洋伙伴关系”，帮助加快并扩大“海洋健康指数”以及广受推荐的可持续性实践的运用。
6. 化石燃料包含相关外部性成本。相比之下，三大接近于零排放的能源选项，即终端用户效率改进、风能和太阳能，均可以最低的生命周期成本和风险提供公用服务、运输和工业服务。考虑到中美两国在以上三个能源选项上拥有巨大潜力，两国应认识到这一巨大机遇，推行已获证明的最佳选项来取代过时的补贴/激励、次优的公用事业管理规定、宽松的环保标准和执行机制，以及有关建筑、发动机、家电及车辆等软弱无力或不够严厉的效率标准。
7. “污染者付费”及“收回全部成本”原则对于重新调整激励结构和财政改革而言是有力

的指导方针。在某些情形下,可采用“受益者付费”原则支持新的正面激励措施,例如为生态系统服务付费、税收减免及其它旨在鼓励私人及公共部门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财政转移手段。

8. 政府应力争全面披露补贴,每年对它们进行测算和报告以便确认、记录并最终取消使用不当的部分。
9. 企业及其它组织的年度报告和账目应披露所有重大的外部性,包括影响社会的环境破坏以及当前并未在法定账目中披露的自然资本变化。
10. 对于自然资本保护,中美两国应努力实现生物多样性公约中规定有关陆地及海洋保护目标。
11. 若两国携手鼓励支持其它国家以可持续的方式管理自己的资源,包括综合能源、水资源和资源效率改进,尽可能减少土地和水消耗,就能取得巨大进步。下一步则是在致力于推动发展中国家达到全球最佳实践标准并逐步强化这些标准时,调整中美两国的资源开采政策。
12. 中美两国需要从传统的采掘—消耗—废弃的线型经济模式转向循环经济模式,前者仅可回收20%的原材料而后者可将所有废弃物转化为更多经济活动的有效投入。两国可领导此项创新过程。
13. 当前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应升级,将自然资本存量的变化及生态系统服务流动价值纳入其中。
14. 当务之急是为森林存量和生态系统服务建立统一的实物账户,例如制订新的森林碳机制和激励将需要此类账户。
15. 建立全面、有代表性、有效和公平管理的国家级和地区保护区(特别是在公海),来保护生物多样性并维持广泛的生态系统服务。生态系统估值有助于说明保护区政策的合理

性,确定融资及投资机会并说明保护的优先次序。

16. 人类对生态系统的依赖,特别是生态系统服务在许多贫困家庭中扮演了生命线的角色,因此在政策中应充分考虑这种依赖性。这适用于确定发展干预的目标,以及对影响环境的政策的社会影响进行评估。

努力实现地球的可持续繁荣

正如本章所强调的,一系列人类破坏性行为的影响表明,这些行为急需转型。与此同时,大量的财富创造机遇也等待人类在未来实现。

即便我们尚未完全了解威胁生命的气候影响,采用“改善气候变化,提高收入”及自然资本保护的策略组合也是明智的。现在,为避免遭受无所作为带来的悲惨结局,这是我们拥有的唯一明智的希望。正如科学家在《崩溃:社会如何选择失败或成功》⁵⁶中阐述的那样,过去许多文明的崩溃只是由于它们不能选择合作并摆脱“囚徒困境”。

中美两国之间的联合行动及合作伙伴关系,展示了它们的市场领导力和在国家治理上的政治能力,将为各自国家、国际社会及地球生物圈带来充满希望和光明的前进之路。让我们充分利用两国的合作,让我们的后代为我们维护地球(也是据我们所知宇宙中唯一拥有生命的星球)健康的决心而骄傲和自豪。

⁵⁶ 杰莱德·戴蒙德,《崩溃:社会如何选择失败或成功》,企鹅出版社,2011



第十九章

中国可持续发展中的挑战、 机遇与中美合作前景

何建坤

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低碳经济研究院院长、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齐晔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百人计划”特聘教授、清华大学气候政策中心主任

邬桐

清华大学气候政策研究中心高级政策分析师

摘要

十年前，发展是中国政治、经济和民生的关键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已故领导人邓小平便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一直是中国政府政策的基本方向。但到了今天，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新的关键词。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一起在中国共产党于2012年11月召开的“十八大”上正式纳入了党章。

在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这和他强调建设“和谐社会”的主张一脉相承。目前，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国家发展指导思想其重要性更加突出。2006年4月，时任总理温家宝在第六次全国环境保护大

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我国环境形势的严峻性和复杂性，充分认识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把环境保护摆在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以对国家、对民族、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精神，切实做好环境保护工作，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30多年中中国政府始终对发展所带来的资源环境影响保持高度警醒。而在追求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给予一个更优先的考虑。

新一届中央政府在习近平和李克强的领导下更加注重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明确提出以生态文明建设为统领的“五位一体”战略和“美丽中国”梦想。在这一指导思想下，中国政府和企业将大力投资于生态系统的恢复和保护，并以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和低碳发展作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三大支柱，以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中美作为引领世界的两大经济体和温室气体排放国，有责任、有义务、有能力、也有动力紧密合作，并为其他国做出表率。



中国可持续发展中的挑战、机遇与中美合作前景

一、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挑战

中国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和行动正是对面对的生态和环境危机作出的回应。事实上，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中以每年两位数的速度增长确实成绩骄人。然而，在自然资源和环境方面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2011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占全球十分之一，但消耗的煤和钢铁却差不多占到全世界总产量的一半，而水泥的消耗更超过全年世界总产量的一半。中国的资源生产力不但远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任重道远。

资源开发和利用造成许多严重的环境问题。2011年，中国的煤炭消耗量为33.5亿吨，燃煤释出的二氧化碳占全国的八成，对国内和全球造成严重的环境问题和气候变化。煤炭开采不但每年直接造成数以千计的矿工死亡，对采煤区的影响也十分严重。例如，淮南矿区采煤塌陷积水区便淹没了大片的土地，居民被迫放弃家园及耕地。此外，开采煤矿会对蓄水层造成破坏，也使地下水减少。据研究显示，2007年的采煤和运煤外在成本达人民币1.7万亿元，占全国GDP的7.1%（茅于軾等，2008）。

目前中国每年生产钢材6.1亿吨，相当于世界总产量的44.53%，而位处北京和天津都市外围的河北省便占三分之一。钢铁、电力等高耗能产业造成的一个众所周知的苦果，就是其PM2.5含量（经中国科学院确定对人体呼吸器官损害尤其严重的污染物）处于有害水平。目前，在中国境内十大污染城市中有七个便来自这个北方省份（<http://www.cnemc.cn/>，2013年3月9日）。

2013年1月，北京上空遭雾霾笼罩，持续二十六日之久。期间，其PM2.5含量介乎每立方米200至700微克，有些日子更高达每立方米1,000微克。世界卫生组织曾发出警告，指出如在24小时内的PM2.5含量平均超过每立方米25微克，就已经触碰到警戒线。除了北京，中国境内还有其它地方面对这个危害，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就说河北省会石家庄，虽然在国际媒体上的曝光率较低，但受雾霾的情况更严重。事实上，华东境内也有占地多达140万平方公里的重化工业重地受害其中。著名的医学专家钟南山在战胜10年前爆发的沙土疫症一役中曾担当重要角色，也警告说灰霾的危害甚至比SARS更可怕。

土壤污染尽管未受到国际媒体的重视，却是另一个严重的问题。2013年，在中国境内广泛发行的人民日报刊载了环境保护部关于土壤污染的一份重要调查。据近期进行的一项调查，中国境内受污染的农地面积达1,000万公顷，情况令人担忧；另外200万公顷的农地污水灌溉；还有13万公顷的农地受破坏或以固体废弃物影响。也就是说，全国有超过10%的农地受害于环境污染。由于土壤受到严重的金属污染，以致每年有多达1,200万吨的谷物报销（国家环境保护总局，2006）。事实上，据近期进行的一项调查，从基本农地储备抽取的300个样本得出的结果显示，平均每8公顷的农地之中就有1公顷受到严重的金属污染。

水污染已穿越土地表层，对地下水造成严重影响，在城镇的情况尤其厉害。据中国中央电视台近期播放的一个节目报导，城镇的地下水有55%的水质为差或极差（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1+1》，2013年2月21日）。北京大学对118个城镇进

行的多年持续水质监察研究显示,当中有接近三分之二的水质已受到严重污染,而三分之一的污染程度为轻微,只有一小部分城镇的水质为近乎洁净(<http://www.foodmate.net/special/anquan/90.html>)。专家们警告,由地表水污染而造成的地下水污染被视为导致癌症急速增加的主因之一,严重威胁人体健康。近期一幅谷歌地图显示了247个所谓“癌症村”的地理分布(环球时报微博,2013年2月22日)。

资源和环境问题的严峻程度已经对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构成威胁。此等问题不但会祸及子孙后代可得到的资源,也损害了当代人的福祉,并对政治领导层和执政者造成巨大压力。

二、政策应对

面对这些严峻的环境挑战,中国政府一直保持警惕,并积极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自1980年代起,中国政府和政策专家一直不断提醒,要汲取早年工业化国家“先污染、后治理”模式的教训。但是,中国的污染情况依然同样严重,甚至更糟糕。遗憾的是,中国不单未能避免重蹈覆辙,反而让工业化较落后的西部地区跟随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踏上“先污染、后治理”这条老路。正因如此,由于未能采取具前瞻性的方案,全国很多地区都不得不为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可持续平衡付出长期的艰苦努力。

不过,也不要误以为近几十年未有采取切实的措施来解决问题。事实上,近几十年来,中国一直积极推行有关保护环境和天然资源的政策,这可追溯到1972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会后不久中国国务院成立了作用非凡的环境保护委员会。其后,中国在1979年制定了第一条环境保护法,其后有大约30条涉及保护环境和天然资源的法案出台。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之后,中国正式确定“可持续发展”为国家发展战略。中

国响应联合国环发大会呼吁,率先完成了《中国21世纪议程》,以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国21世纪议程》重点列述了多项国家计划,也勾勒了多个解决未来环境挑战的方案。早在1980年代,环境保护就被列入中国的基本国策。在过去30年里,中国制订了几项基本国策(即中央决策体系的核心政策),几乎全部都跟保护环境、控制人口和节约资源有关。这个牵涉广阔层面的战略也改变了中国在环境监管上。1992年,国务院成立了中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由32名中国委员和25名国际委员组成,并由国务院副总理领导。委员会每年委聘几个专责小组,研究重大的可持续发展议题,然后提交政策建议予中央政府作为政策考虑。众所周知,这个委员会是中国唯一持续运作的重量级国际政策制订合作机构。

无可否认,在环境控制上的努力投入,并不足以阻遏环境的恶化,而这也是大部分其它大型经济体面对的问题。尽管如此,中国还是取得了相当大的积极成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带来乐观前景。我们在下文中会详细讨论。

三、成果

提高资源的经济生产率和使用效率

自2004年以来,中国的谷物产量一直超逾5亿吨,较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前的产量增长了四分之一。目前,每公顷农田的谷物产量已达4吨以上,属世界先进水平。对中国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来说,尤其当考虑到土地和水资源有限这一点,谷物产量的提升一直是食品安全的一个重要环节。中国的人均可耕地只是世界平均的40%,而人均淡水供应量也只是世界平均的28%。中国的农作物产量提升主要是通过农田基本建设和科技优化而达致的成果。“绿色”和低碳耕作正在不断增加。2010年,农林业占全国GDP9.4%,耗能3,700万吨标准煤,占全国终端总耗能约1.14%。在各行业之中,农业是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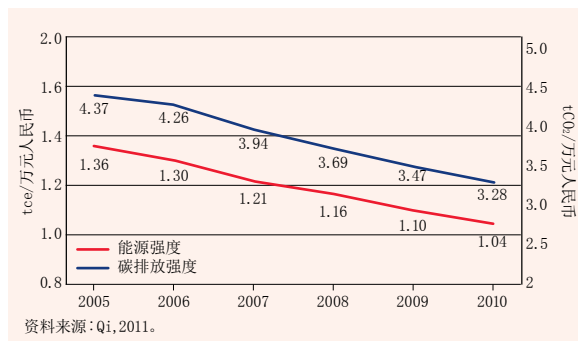
一在“十一五”期间实现能耗稳定的行业；2005年至2010年期间的能源强度大幅减少17.4%。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与农业生产相关的隐含碳排放量却有所增加。2009年，农业生产物料的嵌入式碳排放量为325 Mt CO₂-eq（百万吨二氧化碳当量），或农业直接碳排放量的2.6倍。肥料是嵌入式碳排放量的主要来源，占有源头排放总量的86%。按需施肥是减少肥料使用量的一个有效方法，有助减少农业的嵌入式碳排放量。相比很多其它国家，中国农业的低碳特质相当强。2006年，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一部分成员国比较，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IEA, 2009)，中国的农业耗能为发达国家组别平均水平的19.0%，分别是澳洲、美国和日本的24.4%、22.1%和36.5%。

在第一届里约热内卢会议后的二十年间，中国已从农业经济主导转型为世界制造业基地。目前，工业占全国经济的比例已增至40%。在全球500种工业产品之中，中国是其中220种的最大产地。为提升工业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已着力进行重组，以减少能源和资源密集型行业所占比例，包括关闭了那些资源和能源效率低的生产设施，和采用持续性发展能力较高的技术。

节省能源在制造业更显重要。2010年，制造业的耗能约为18.3亿吨标准煤，占终端能源总消耗量的60%，全国总耗能的56%；而二氧化碳排放量为4.30 Gt（10亿吨），占全国能源相关总排放量的59%。在“十一五”期间，制造业的总耗能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均有增加，但能源强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却大幅减少。

制造业的能源效率可以两个指标量度——每个增值单位的耗能（可反映个别工业的整体能源强度）和个别工业产品的每单位耗能。从2005年到2010年，制造业的每个增值单位耗能减少了23.2%，平均每年减少5.14%，快于国家平均，实现总节能3.29亿吨标准煤，占全国的52.5%。每万元人民币增值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由2005年

图1：制造业的能源强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2005年至2010年）



的4.37吨减少至3.28吨，全期减幅为25.1%，每年平均减少5.6%（见图1）；累积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幅为1.16 Gt，占全国减幅74.8%。

六大高耗能工业行业的16个主要产品的单位能耗全面下降。制造业通过提高单位产品能源效率实现节能共3.11亿吨标准煤，占制造业总节能94.6%，全国总节能49.6%。

取得以上成就的主要原因是科技进步和结构优化。科技进步的工作包括技术创新、淘汰落后产能和加大运用先进科技，以及引进节能设备和加大研发投入。于2006年至2010年间，《千家企业节能计划》¹实现节能1.5亿吨标准煤（发改委，2011a），其中的《十大重点节能工程》²更实现节能3.4亿吨标准煤（发改委，2011b），而《淘汰落后产能项目》也实现节能超过1.1亿吨标准煤。这三个项目均成功达到节能目标，甚至超标。透过采用较高效率的科技，2006年至2010年的吨钢综合能耗下降12.1%（统计局，2011c）。同时，各项重大新技术的采用率也全面提升。中型和大型钢铁企业取得的成绩更优于一些根据多项工业指标被评为世界领先的日本同业。透过大规模引入新型干法水泥技术、余热转化电

1 约1,000家最大型的节能企业入选为此工业节能项目的主要目标。此项目原名为《千家企业节能计划》，为“十一五”的关键项目之一，其后于“十二五”期间扩大规模，成为《万家企业节能计划》，以覆盖更多类型的企业。

2 《十大重点节能工程》列出的十大主要工业获得国家支持实现节能。

能技术和增加大型水泥生产，水泥业实现综合能耗强度下降28.6%（统计局，2011c）。中国有色金属业在节能上也取得佳绩。电解铝新型异型阴极槽制造工艺的提升，使能耗下降12.0%（统计局，2011c）。此外，铜冶炼的综合能耗更下降35.9%（统计局，2011c），成为2006年至2010年间实现最大节能成果的行业。

在结构转型方面，2006年至2010年间首三年的行业发展趋势仍是以工业为重，但有缓和迹象。与此同时，制造业的结构开始转型，转向较高节能的模式。随着高能耗的工业占比下降，低能耗的产品占比有所增加。此外，服务业占比从39%升到21世纪初的43.2%。单是这个转变，已有助创造650万个就业岗位，全国经济也迈向明显具有较高能源和资源效率的模式。

减贫和区域均衡发展

据中国政府早前定下的贫穷线，2000年至2010年间，全国的贫穷人口从9,422万人减少至1,688万人，占整体人口的比例则从10.2%降到2.8%。贫穷人口的减少有多个原因。其中一个明显的原因是大部分贫穷地区的基础建设大幅改善。硬面路、电力、通讯和电视网络的覆盖现在已近乎遍及全国。这些改善工程使交通和交易成本下降，带动了新的收入和工作机会，透过提供信息和通讯网络，让原来被边缘化的社群的社会资本大增。此外，由于教育开支增加和政府的重视，贫困地区的文盲人口比例已下降至约10%。

全国性的扶贫行动，也受惠于较为平衡的地区发展。华东沿海省份的经济发展领先西部的情况已在调整。自2007年起，西部的整体经济增长率一直超逾东部，而这个改变看来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长远发展势头。尽管目前全国的GDP增长有所放缓，但西部仍能保持双位数的增长率。

从2006年开始，中国政府一直推动形成主体功能区这个策略愿景。到了2010年，中国终于发布了《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正式蓝图。根

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强度和发展潜力，中国政府正在统筹谋划各区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国土空间分为四个类别：优化开发区域、重点开发区域、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透过确定不同区域的主体功能，并据此明确开发方向，完善开发政策，控制开发强度，规范开发秩序，逐步形成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

城镇化和基础设施改善

城镇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宏观趋势。每年有1,000多万的农村居民迁徙至城镇。2011年，中国史上首次实现城镇居民人口超过农村人口。促成这一变化的原因是城镇的经济机会比较多，而城镇的基建和建设环境也让更多人可以享有较好的生活水平。2010年，城镇的自来水供应覆盖了96.7%的人口，天然气供应的覆盖率为92%，而在2000年分别只有63.9%和50.1%。同期，地区供热的覆盖率增加3倍，公交车增加1.2倍，而城镇绿化率也增加1.55倍；废水和垃圾处理设施的覆盖率分别提高到82.3%和77.9%。城镇化已成为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近几十年来改善了数以亿计人民的生活水平。

与此同时，城镇的建筑和交通的能源效率也大幅提升。在“十一五”期间，随着城镇化和生活水平提高，建筑业的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量持续增加，但两者的年增长率却明显低于“十五”期间，而且目前有四分之一的城镇建筑达到国家的节能标准。在2005年至2010年间，单位面积能耗增加19.7%，每年平均增加3.7%；同期的单位面积二氧化碳排放量整体增加17.9%，每年平均增加3.3%。目前，中国的建筑单位面积二氧化碳排放量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更只是美国水平的三分之一以下。这些成果令中国这个收入相对偏低的经济体跻身可持续发展建筑环境领域的世界领先国家。



建筑能耗可分为四个类别。北方城市的地区中央供热系统在节能方面取得进展最大。在北方城市，中央供热系统的单位面积能耗从2005年的每平方米17.78千克标准煤，持续下降至2010年的每平方米16.28千克标准煤，减幅为8.41%。同期所涉的单位面积二氧化碳排放量也从2005年的每平方米47.48千克，减少至2010年的每平方米43.87千克，减幅为7.6%。由此可见，北方城市中央供热系统相关的总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均有所回落，2010年约占全国建筑总能耗的25%。

2006年至2010年间，透过改造建筑的外墙结构、推进地区中央供应系统的制度改革和提高节能照明设备和家用电器的能源标准，建筑业实现节能6,750万吨标准煤，相等于其间累积减少排放1.85亿吨二氧化碳。

随着道路、车辆和交通快速增长，中国运输业的能耗也有增无减，从2005年的2.3亿吨标准煤增至2009年的30亿吨标准煤，四年间的增幅超过30%，虽然低于上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幅度，但依然高于其它行业的平均增幅。不过，运输业的能源效率却显著提升。铁路运输的能耗从2005年的6.48吨标准煤/百万换算吨公里，减至2010年的4.94吨标准煤/百万换算吨公里，减幅为23.8%（铁道部，2011）。航空运输的吨公里燃油消耗也从2005年的0.336千克减至2010年的0.298千克，减幅为11.3%（民航局，2011）。

为了应对流动性越来越高的城镇人口的需求增长，中国政策一直鼓励集体运输的发展，而城镇居民出行占公共交通量的比例也持续上升。譬如北京在2010年上半年的公共交通出行比例便达39.3%（北京网，2010），较2005年增加差不多7%。在轨道交通方面，北京政府制订了一个全面的计划，并优先落实轨道快线的建设。长期而言，预期北京的轨道快线将为居民提供飞机和汽车等高碳交通工具以外的选择。

此外，为了应对私家车过多的问题，政府已提高燃油效率标准，并于2008年开征汽油税，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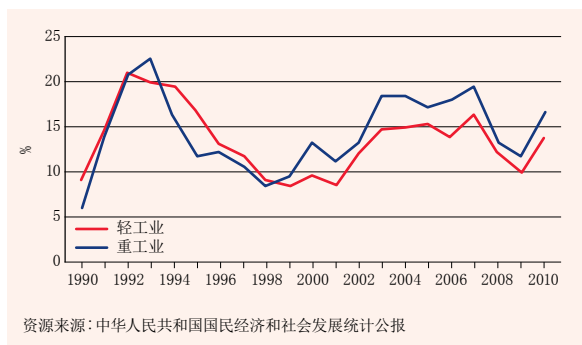
鼓励生产节能性能较佳的汽车。政府亦针对高油耗汽车实施了累进税制，为购买节能车带来诱因。2005年，1.6升及以下排量的汽车占中国普通载客车总数的三分之二（中汽中心，2011年），并于2010年升至68.77%（中汽协会，2011）。政府也为另类燃料汽车市场提供所需的空間。2009年，科学技术部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手推出一个试点项目，在十个城市引进1,000部新能源汽车，以促进这些车辆的量化生产，减低消费者的购置成本。科学技术部与工业和信息化部并制订了《新能源车开发计划》，为有关技术开发工作勾划蓝图。

植树造林、资源和环境保护

1998年发生长江流域洪水灾害以后，中国政府随即实施全面禁令，禁止在原始森林进行伐木。其后，政府出资支持六个以提高森林覆盖和保护生态为目标的大型绿化和造林项目。过去十年已植树造林超过4,300万公顷，较十年前的覆盖率增加差不多四分之一，而全国的森林覆盖率已增至20.36%，高于十年前的16.55%。与此同时，国家的保育工作也包括生态修复，如草地和湿地；为此，政府资助和出资支持多个项目。至今，共修复7万公顷的湿地和建立550个湿地保育区，包括41个国际重要湿地和213个国家湿地公园，为涉及广泛层面的自然保育系统给予重大支持。2010年，中国已设立2,588个自然保育区，占地1.49亿公顷，成为官方保育项目。目前，中国的自然保育区总面积较用于生产食品的土地总面积大25%。

保护水资源也是一项重要工作，过去20年间一直得到高度重视。2012年里约+20会议举行前发表的《可持续发展国家报告》指出，自2001年以来，中国制订了300个试点项目，以构建一个节约用水的社会，提高农业、工业和城市节约用水的技术标准。结果，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由2000年的285立方米下降到2010年的124立方米，

图2：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增长率(1990年至2010年)



万元GDP用水量也从2000年的554立方米下降到2010年的225立方米(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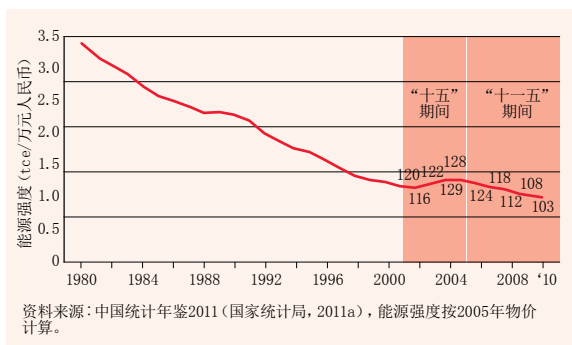
减缓气候变化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强调减缓并重。目前的大量工作在于减缓气候变化,包括开发节能和可再生能源项目。

从1980年到2000年,中国的GDP增加了6.15倍,但耗能的增加只有2.14倍,能源强度也减少了63.3%。然而,随着国家进入新纪元,工业化加快能源的使用带来新的挑战,而高能耗的重工业的占比也急速增加(见图2)。整体能源强度原来向下的趋势改为急升,单位GDP能耗继2003年上升4.8%后,在2004年增加5.5%,到了2005年再返回1999年的水平;连续两年的升势,将能源强度在1999年至2005年间的减幅拉倒,而GDP在其间增加了70%。由于预期如此高的增长率会在未来持续,如果不加以妥善控制,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势将大幅飙升,对中国能源供应、环境质量和气候变化带来严峻的挑战。

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十一五”规划,2006年至2010年)为能源强度定下了一个明确的目标:减少20%,并点名几个主要的工业界别作为节能政策的重点范围。“十一五”规划更将这个目标定为“强制性标准”,并规定所有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尽最大的努力和尽可能投入最多的资源以求达标。

图3：中国能源强度的变化(1980年至2010年)



根据发改委的数据(发改委、国家统计局, 2011),截至2010年底,中国的能源强度较2005年下降19.1%,近乎达标。按年计算,2006年的减幅为2.72%,2007年是5.01%,2008年是5.23%,2009年是3.62%,而2010年是4.10%。2008年的能源强度已降到2002年的水平(见图2)。由此可见,“十五”期间(2000年至2005年)能源强度的急升趋势已转为急降,并按每年4.3%的幅度下降。作为比较,美国的能源强度每年平均下降1.2%(BEA, 2011;EIA, 2010)。2011年(“十二五”的第一年),中国经济的能源强度进一步下降2.01%,朝向16%的五年目标减幅进发。

低碳发展的关键在于走向零排放经济发展,这赖于透过减少单位生产和消费的石化能耗而达成。在“十一五”期间,中国成功缓和了能源强度的升势,踏上低碳发展的道路,这有助于舒缓能源供应的压力(中国过往经常出现能源供应短缺),也使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增加受到明显抑制,同时又可保持经济高增长。

中国的大规模造林工作促进了生态系统的碳汇能力。2009年的森林覆盖率达20.5%,实现了“十一五”的目标。一个横跨2004年至2009年的全国森林资源综合统计显示,中国森林的碳储存为222.90亿吨,比较上一个统计期(1998年至2003年)的总增幅10.4%,平均每年增加4.20亿吨二氧化碳。德国政府的智库 Ifo Institute 经济研究所曾发表报告指出,虽然全球森林总面积



平均每天减少两万公顷，中国的人工造林却在增加，占全球人工造林面积的73%（新华社，2010年）。中国在造林方面的持续努力，可确保森林面积稳步增加，为中国的低碳发展和全球二氧化碳减排工作带来莫大好处。

四、中国可持续发展中的障碍

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和资源条件的限制

中国国土辽阔，环境优美而多样，但也突显了其地理、地形和地貌的复杂性。虽然中国可能是自然学家的蓬莱仙境，却恐怕不是农家或厂家的理想土壤。中国的大部分国土都被视为不适合农业或工业生产，也不适合人类居住，因为有超过20%的土地处于世界上最高的青藏高原上，另外10%则处于山脉连绵的华南岩溶区，而岩溶区的土质非常差劣，超过一半的土地处于干旱或半干旱的气候环境。此外，中国的人均淡水供应仅占世界平均的28%，可耕地也不过占世界平均的40%，人均矿产资源更乏善可陈。天然资源不足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制肘，尤其是目前的需求随着消费者层面扩大而与日俱增。中国的生活水平要是与美国看齐，所花的力气要大很多，对国内的天然环境造成的压力也大很多。事实上，有人认为，在目前的资源条件下，即使在可见的未来，科技进步可令情况有所改善，中国依然不可能实现这个愿景。此外，基于本身的气候和人文及地形条件，中国很容易出现各种天灾；加上人口密度高，台风之类随着海流袭来的灾害造成的破坏尤其严重，而筑造在沿海大城市之上的经济繁荣，也动辄受到牵连。据估计，中国遇到与气象相关的灾害接近美国的10倍。

经济增长带来的压力

如果说可持续发展关乎在环保和发展之间取得平衡，那么，极度倚赖经济增长的中国面临的挑战尤其巨大。虽然中国经济急速扩张，但目前国

内大部分地区仍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初期，而且大部分的人口还处于贫穷线以下。据2011年新订的贫穷标准（城镇地区人均年收入2,300元人民币以下），中国有1.20亿人口仍处于贫穷生活环境。虽然按GDP计算中国已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其贫穷人口却与日本总人口一样多！由于大部分贫穷地区均处于恶劣的自然环境中，所以发展经济尤其困难。因此，中国仍然面对巨大的压力，需要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尤其是数以千万计渴望迁入城市的农民工，以及每年数以百万计涌进职场的毕业生。百上加斤的还有人口急速老化的问题，也为未来的社会资源带来沉重负担。到目前为止，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老龄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社会保障、医疗卫生需求持续上升，全都有赖强劲的经济增长。

五、中美合作的前景

中美两国在经济上存在互补性，也共同面对着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挑战，这为双方在可持续发展上的合作创造了坚实的基础。首先，美国的天然资源丰富，坐拥1.97亿公顷可耕地，较中国多三分之二，人均可耕地面积更是中国8倍。两国在淡水和其它天然资源方面也存在很大差异。尤其在食品生产上的互补，就像对贸易带来的影响一样，也会对环境带来重大影响。

美国在科技创新上一直领先世界。除了在信息和通讯科技方面具有全球领先优势，美国在洁净能源方面也非常先进。这些优势不但使美国处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领导地位，其它国家在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也可望受惠。中美双边合作可为中国带来巨大帮助，加快其转型成在低碳模式下寻求增长，对抗气候的急速恶化。然而，这种关系也是互惠的：美国亦可从中国的经验中获益良多，尤其在运用资源方面。数千年来，中国积累了很多智慧，以求在资源有限下生存，并和大自然共存。事实上，传统道教思想对

中国世世代代影响深远，中国文化笃信“与大自然和谐共存”和“天人合一”。这种和谐关系一直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直到近几十年受经济全球化和追逐利润的现代思潮影响，这种传统的社会生态平衡才被打破。不过，在高层决策者的不懈努力下，加上越来越多的民众支持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和保育（如前文所述），昔日对可持续发展的态度可望得以发扬。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工业化国家，中美两国均可受惠于上述传统智慧。

基于相互的谅解和共同的目标，两国近年在气候变化和洁净能源方面达成了重要的协议。2013年4月，中美在可持续发展合作上有重大突破，美国国务卿克里到访北京进行高层会谈，将气候变化行动方案正式纳入具影响力的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同时，这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和最大碳排放国发布了一个联合声明，呼吁“中美两国采取强而有力和适合国情的行动，包括大规模的合作”，并指出“这些行动对于遏制气候变化和树立鼓舞世界的榜样都极为重要”。这可能是国际环保事业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该声明和其它围绕克里这次访华的其它讨论和协议，也强调了在中美双方互信和互相尊重的平台上促进能源科技、环境保护和资源保护的重要性。

可持续发展的挑战也提供了机遇，让中美乃至世界各国紧密合作，从而形成新的地缘政治关系，而近年的良好发展肯定是朝着这个方向走。中美在气候变化和能源上的合作，可成为两国在由安全到商业等双方和国际关注的其他事务上开展合作的桥头堡。从这个意义上看，两国在可持续发展上的合作不仅是这项工作上的成就，也是迈向更广泛良好关系的重要一步。事实上，中美双方的有识之士一贯表示希望两国保持友好关系。亨利·基辛格博士最近表示，中美两国未来必须和平共处，共谋发展，并要找到共同的项目来建立合作(Kissinger, 2011)。虽然应对

气候变化等全球环境问题十分艰巨，但也提供了以前所未有的新方式开展合作的机遇。

然而，也有一些反对的声音，认为冲突不可避免，并鼓吹采取较强硬的姿态。如此的话，对中美两个大国和与之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国际社会都将十分不利。历史学家指出，新旧强国之间往往可能出现误解。要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奠立巩固的基础，需要双方真诚的努力，相互了解和协调目标。当前的重大生态变化带来的挑战极为棘手，极度需要中美这两个全球最大的国家共同合作。在近年取得的成果基础上，希望中美两国能把握和谐之道，带领世界走向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更美好未来。

参考文献

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U.S. Economic Accounts 2010 [EB/OL] 2011-8-16, <http://www.bea.gov/national/>

北京网，“北京市公共交通出行比例达39.3%”，2011-07-08, <http://jtex.beijing.cn/jtxx/jtxw/n214098639.shtml>

BP,《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11》，2011-8-16, <http://www.bp.com/statisticalreview>

中国民用航空局，《中国民用航空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2011年至2015年）》，2011-6-20, http://www.caac.gov.cn/I1/I2/201105/t20110509_39615.html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2010年汽车产销及经济运行情况信息发布稿”，2011-07-07, <http://www.auto-stats.org.cn/ReadArticle.asp?NewsID=6839>



-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中国汽车工业年鉴(2009)》,2009
-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全国电力工业年度统计数据(2009)》,2011-8-16, <http://tj.cec.org.cn/tongji/niandushuju/2010-11-17/160.html>
-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电力行业2010年发展情况综述》,2011-8-16, <http://tj.cec.org.cn/niandufazhanbaogao/2011-06-27/58873.html>
- 美国能源信息署, Annual Energy Review 2010, 2011-8-16, <http://www.eia.gov/totalenergy/data/annual/>
- Han Wei, “中国如何支持‘核’信心: 专访国家环境保护部核安全与环境专家委员会委员Yu Zusheng”, Energy Review, 2011, 31(7): 100-105
- 国际能源署, Energy Balances of OECD Countries (2009 版), 巴黎, 国际能源署, 2009
- 亨利·基辛格, On China, Penguin Press, 2011
- 李俊峰等,《中国风电发展报告2011》,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11
- 茅于軾、盛洪、杨富强(2008),《煤炭的真实成本》, 北京, 煤炭工业出版社
- McKinsey&Company, China's Green Revolution: Prioritizing Technologies to Achieve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2009, 2010-08-18, http://www.mckinsey.com/locations/chinasimplified/mckonchina/reports/china_green_revolution_report_cn.pdf
- 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2010年铁道统计公报》, 2011-8-20, http://www.china-mor.gov.cn/zwzc/tjxx/tjgb/201105/t20110511_23696.html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1)》,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1a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能源统计司,《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10)》,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1b
- 国家统计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取得重要进展——“十一五”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六》, 2011-5-20, http://www.stats.gov.cn/tjfx/ztfx/sywcj/t20110311_402709772.htm
-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2年度报告》, 2011-3-20, http://qhs.ndrc.gov.cn/gzdt/t20101126_382695.htm
-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统计局,《关于“十一五”各地区节能目标完成情况的公告》, 2011-6-20, http://www.stats.gov.cn/tjdt/zygg/gjtjjgg/t20110610_402731394.htm
-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千家企业超额完成“十一五”节能任务——“十一五”节能减排回顾之六》, 2011-5-20, http://www.sdpc.gov.cn/xwfb/t20110314_399363.htm
-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十大重点节能工程取得积极进展——“十一五”节能减排回顾之三》, 2011-5-20, http://www.sdpc.gov.cn/xwfb/t20110311_399214.htm

国家发改委等, (20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局、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公告2011年第6号》, 2011-5-20, http://www.sdpc.gov.cn/zcfb/zcfbgg/2011gg/t20110422_407267.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2) 2012年《可持续发展国家报告》, 北京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十一五’前四年中央财政和预算投资1285亿元” 2011-3-20, <http://www.scio.gov.cn/xwfbh/xwfbh/wqfbh/2010/0929/zy/201009/t773380.htm>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06) , 《China faces severe threat of soil pollution — 中国新闻网》, 2006-7-18, <http://www.sina.com.cn>

齐晔 (2011) 中国低碳发展报告: 2011-2012,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世界自然基金和发展研究中心, 2011, *Impacts of China's Economic Stimulus Plan on Climate and Energy Consumption*, 北京, 世界自然基金中国项目

新华社, “‘十一五’期间中国单位GDP能耗预计下降19.06%”, 2011-3-20, <http://energy.people.com.cn/GB/13888788.html>

新华社, “德国智库发表公报: 中国人工造林面积占全球73%”, 2011-5-20, http://www.gov.cn/jrzq/2010-01/20/content_1515227.htm

